

新世纪高校**经济学**教材译丛

#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 Critical Perspective

(第二版)

E. K. 亨特 著  
(E. K. Hunt)

颜鹏飞 总译校

# 经济思想史

——一种批判性的视角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责任编辑：仲崇巍  
封面设计：未名  
版式设计：孙国义

《经济思想史》为经济思想史课程提供了一本权威性的、批判性的教科书。这本书将经济思想史与形成这些经济思想的整个历史背景融为一体。它还专门论证了为何新理论的出现，事实上总是相关现实问题以及政治、社会和道德诸问题激烈争论的结果。E.K.亨特对从启蒙时代至今的经济思想发展历程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检验和经验分析。

本书考察了资本主义理论及其产生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亨特证明了这一点：几乎所有经济思想方面的进展都是特定问题和背景的反映。经济学不是、并且永远也不会是非价值取向的，这是他着重强调的观点。总之，《经济思想史》无论如何是一部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著作。

本社网址：[www.sufep.com](http://www.sufep.com)



定价：52.00 元

新世纪高校经济学教材译丛

# 经济思想史

——一种批判性的视角

(第二版)

E. K. 亨特 著  
(E. K. Hunt)

颜鹏飞 总译校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第二版)/(美)亨特(Hunt E. K.)  
著;颜鹏飞总校译.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3

(新世纪高校经济学教材译丛)

书名原文: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 Critical Perspective

ISBN 978-7-81098-849-0/F·794

I. 经… II. ①亨…②颜… III. 经济思想史-研究 IV. F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03741号

- 责任编辑 仲崇巍
- 封面设计 未名
- 版式设计 孙国义

JINGJI SIXIANGSHI

### 经济思想史

——一种批判性的视角  
(第二版)

E. K. 亨特 著  
(E. K. Hunt)

颜鹏飞 总译校

---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321号乙 邮编200434)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sufep.com](mailto: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宝山蔚村书刊装订厂装订

2007年3月第1版 2007年3月第1次印刷

---

787mm×960mm 1/16 30.75印张 654千字

印数:0 001—4 000 定价:52.00元

研究思想的历史是解放思想的必要前提。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我们凭知识所领悟的观点,包含在对事物的看法之中,并在我们的良知中锤炼形成,这是我们无法摆脱的精神枷锁。它们是恶魔,我们只有屈服于它们,才能最终征服它们。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 译者序

《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是美国犹他州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亨特(E. K. Hunt)于2002年推出的著作。这一领域的许多学者认为,这部书“无论如何是一部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著作”;亨特“为经济思想史课程提供了一本权威性的、批判性的教科书”。这本书将经济思想史与形成这些经济思想的整个历史背景融为一体,还专门论证了为何新理论的出现,事实上总是相关现实问题以及政治、社会和道德诸问题激烈争论的结果。书中处处批评“非价值取向”(value free or non-value orientation)观。这种自由游离于价值判断之外的所谓价值中立化倾向,就是完全否定规范分析而一味推崇实证分析。亨特因而提出了经济思想史教科书编纂三原则:其一,社会理论和社会—历史进程是相互联系的,理论是基于或产生于或者反映和试图阐释正在发生的社会事件和环境,因此,应该涉足该理论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以及经济史领域作简要的阐释和概括;其二,社会和经济变迁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应该通过追溯其历史渊源来阐明当代经济理论争论的实质;其三,所有经济学家的作品既有认知和科学成分,同时也具有感情、伦理道德或意识形态成分。即使我们能够部分地将社会理论的科学和意识形态成分区分开来,但这种区分绝对不可能是完全的。如果不理解理论所包含的评估和意识形态成分,我们就永远不能完全理解经济学家理论中的认知和科学成分。亨特依据这三大原则对从启蒙时代至今的经济思想发展历程进行了科学的梳理、理论检验和经验分析,并且这也是他选择、取舍和锁定经济学家入书的原则。

基于上述三大原则性信条和多元化主线论而被亨特列入经济思想史的数十位经济学家中,既有主流经济学家也有非主流派,既有激进经济学家也有非激进派,既有正统的保守派也有新锐的异端者,既有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家也有经济学帝国主义者,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因此,该书专辟一章评论马克思,专列一章评价“穷人政治经济学”以及威廉·汤

普森和托马斯·霍奇斯金的理论,并且把霍布森、卢森堡和列宁的著作也囊括其中,这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就为我们编织了一幅波澜壮阔、绚丽多姿的经济思想史画卷,在一定程度上贴近了经济事物及经济理论发展的主观与客观辩证法,较为真实地再现了其历史的本来面貌。但是,西方学者出于各种原因,一般不太可能全面和科学地评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思想,这是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必须以批判的眼光和审慎的态度看待的。

总的来看,西方的经济思想史著作有美欧中心主义情结,例如埃里克·罗尔的《经济思想史》、斯坦利的《经济思想史》和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的《经济思想的成长》皆如此。《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也不例外。其中,夏尔·季德和夏尔·李斯特写的《经济学说史》的特点在于:该书用大量篇幅介绍了法国本土经济思想史。而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分别评述了从纪元前四五百年希腊—罗马时期起,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作者去世前为止,绵延二千四百余年的经济分析发展史,包括各个时期的重要人物、思想观点、学说体系、分析工具和方法、贡献和影响、评价等等,是迄今西方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学特别是关于经济分析方法的演变方面最广泛而详尽,而溯源又比较深透,分析评论又多具特色的第一本巨幅专著(张培刚语)。并且该书不仅介绍了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和方法论,而且在第五篇第三章“极权主义国家的经济学”中,还介绍了俄国的经济思想,尽管篇幅很短。然而此书总的说来并没有跳出欧美中心主义的窠臼。当然,由于这是一本未完成的遗稿,就部分的内容而言,有些地方显得不甚均匀或相互重复。至于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的《经济发展思想史》、布劳格等著的《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M·卢瑟福的《经济学中的制度:旧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和阿萨·林德贝克的《新左派政治经济学——一个局外人的看法》等只是断代史、专门史或流派史。马克·斯考森的《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则风格迥异,是学术和情节的集合体,着重阐述经济学大师如何建设一门严谨的社会科学的戏剧性故事。

而苏联的经济思想史著作又或多或少带有卢森贝烙印。M. H. 雷金娜等主编的《经济学说史教科书》是卢森贝1932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史》的改进版。该模式突出苏联中心论,一味突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相比较而言,亨特的这部书吸收了以前同类书籍的长处和优点,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是近年来国外经济思想史领域的上乘之作。

## 二

此外,亨特在这本书中提出一个关于经济思想史的主题和发展主线的重大问题——“经济思想史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该主题也是本书的中心——资本主义究竟是导致和谐还是导致冲突的一种社会制度。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著作中,对两种观念都有进一步阐述。李嘉图之后,大多数经济学家要么认为资本主义是根本和谐的,要么认为是根本冲突的。这一分歧决定了每一个经济学家如何选择其分析的范围、方法和内容。另一个经常争论的主题是有关资本主义是内在稳定还是内在不稳定的问题。关

于经济理论中合理的价值判断问题也一直有不同的意见。”<sup>1</sup>

所谓主线就是各个历史阶段反复出现的主题。<sup>2</sup>因此,亨特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西方和谐与冲突理论是贯彻于经济思想史的一条主线。它足堪以与其他主线媲美;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入成熟阶段后,这条和谐与冲突主线却被砍掉了,下降到仅仅在危机阶段才浮现的“主题”的地位。一言以蔽之,经济思想史不能搞单线论,而应是并行不悖的多元化主线论。这对于我正在主持编写的“十一五”国家级教材《经济思想史》(即将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具有借鉴意义。

《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实际上承认,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确实存在着一条和谐与冲突理论主线。亨特从经济理论路线视角出发,把它归结为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的对立、生产优先论(vantage point of production)与交换优先论(vantage point of exchange)的对立;而从阶级分析视角出发,归结为富人经济学(economics of the rich)与穷人经济学(economics of the poor)的对立。并且从经济学流派视角出发,演绎和构筑了附着于和谐与冲突理论主线之上的和谐学派与冲突学派这两大派别及其嬗变的谱系。

这种裂变始自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斯密。“斯密—李嘉图—穆勒定律”(Smith—Ricardo—Mill Law)——我们简称为“李嘉图定律”——是和谐抑或冲突这两条理论路线分歧的一个起点或分水岭。斯密是这一定律的始作俑者,但是他却不断游离于两条对立的理论路线之间,一方面强调劳动价值论和阶级冲突,而另一方面则强调效用价值论、社会和谐和“看不见的手”。然而,实际上,他建立了一个较完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即在竞争、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自由市场会把所有利己主义的、营利性的和惟利是图的行为纳入到一个和谐占主导的互惠互利的“最明白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后完成者李嘉图,也是这一定律的完成者。他是生产力经济学家,并把分配问题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主题。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是李嘉图评价经济现象的基本原则,并公开承认资本主义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种生产方式,尽管它是和构成整个这一发展基础的工人群众的利益相矛盾并以牺牲后者的利益为代价。而作为西方经济学第一次大综合完成者的穆勒,把李嘉图的上述观点作为一种“生产规律”和“分配规律”纳入其折衷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有所区别的是,斯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前途表现出一种乐观主义情绪,而李嘉图和穆勒,尤其是穆勒已经看到了分配制度的弊病,所以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是喜忧参半的。总之,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以牺牲某些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为代价,被称为绝对合理的必然规律。这就是“李嘉图定律”的实质。马克思指出:“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



至于这种感化议论的徒劳,那就不用说了,因为在人类,也像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因此对李嘉图来说,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究竟是毁灭土地所有权还是毁灭工人,这是无关紧要的。”而“穆勒并不掩盖资本同劳动的对立。……为了使人类的(社会的)能力就在那些把工人阶级只当作基础的阶级中自由地发展,工人群众就必须是自己的需要的奴隶,而不是自己的时代主人。工人阶级必须代表不发展,好让其他阶级能够代表人类的发展。这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以及过去的一切社会所赖以发展的对立,是被宣扬为必然规律的对立,也就是被宣扬为绝对合理的现状”<sup>3</sup>。

简言之,“李嘉图定律”崇尚生产力法则并承认阶级对立和不和谐,这无疑是正确的,因此马克思把李嘉图视为“博爱主义者”,并具备“客观的”、“科学的”“斯多葛精神”,即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但同时这一定律力图证明资本同劳动严重对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天然合理的永恒社会,并赋予其绝对合理性和规律必然性,这表明李嘉图其人具备唯物与唯心、斯多葛精神与新斯多葛主义的双重品性。这也是一个双重悖论:其一,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先进生产力也是消除不和谐的物质基础;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又以阶级对立和分配悬殊为代价。其二,阶级对立是不和谐的,但是资本同劳动严重对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又是一个所谓天然合理的永恒的社会。

“李嘉图定律”是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路标。由此出发的和谐理论路线,历经马尔萨斯的供给过剩理论和第三者理论—巴斯夏经济和谐论—凯里利益调和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论—帕累托最优原理—克拉克边际生产力分配论—马歇尔“四位一体”公式,力图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和谐性和分配的公正性。而始于霍布森、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新福利经济学、新新福利经济学、福利国家政策和后福利国家理论,是迄今为止现代经济学和谐路线的终点。其中,帕累托最优原理可以说是西方和谐理论路线的典型,也是对“李嘉图定律”的反动,因为它主张:一个人福利的增加、效用水平的提高的同时不能使其他任何人的福利和效用水平受到损害;使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受损的资源配置的变化就不是帕累托最优。

由此而分道扬镳的另一条理论路线是为冲突作论证的,其理论成员主要来自广义激进经济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亨特列出了一个长名单,其中包括威廉·汤普森、托马斯·霍奇斯金、卡尔·马克思、托尔斯坦·凡勃伦、霍布森、卢森堡和列宁等等。

应该着重指出的是,西方冲突理论的典型是“李嘉图定律”和“库兹涅茨假说”。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发展是和构成整个这一发展基础的劳动群众的利益相矛盾并以牺牲后者的利益为代价,则是“李嘉图定律”的实质;而人均财富差异与人均财富增长、增长与不平等的关系、公平与发展遵循库兹涅茨所谓的倒“U”型曲线规律。库兹涅茨指出:“在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极为快速转变的经济增长早期,不平等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不平等缩小。”<sup>4</sup>而激进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只是这条理论路线的另一条分支,表

现为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

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和后工业时期,这两条理论路线实际上有融合的趋势,其特征是往往用和谐理论来掩盖或粉饰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对抗。新自由主义学派是体现这一趋势的最重要代表。

### 三

西方国家为了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和社会制度运行的稳定性,力图跳出“李嘉图定律”怪圈和“库兹涅茨假说”阴影,因而在某些观念、生产关系和具体政策上作了局部改变、调整和变革。稀释和缓解社会矛盾和非和谐的主要办法是发展生产力和全球化扩展(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全球范围不断地复制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扩充中产阶级(这种橄榄状的社会结构在加强社会系统稳定性的同时,也给资本关系扩展设置了新的社会结构界限),重视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NGO)和慈善事业(这是旨在弥补市场或政府失灵的所谓“第三次分配”的主导力量),强化对企业的微观规制和劳动立法,其中包括缓解劳资矛盾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这是全球在20世纪末兴起“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产物)、发展社会保障制度(这是给资本关系扩展设置了新的再分配界限)、倡导绿色的新发展观(这表明资本关系已被设置了限制其扩展的人文界限和生态界限)以及西方国家尤其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化(混合经济体制、“第三条道路”思潮和工党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倾向(这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行程内对原教旨或古典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的局部调整和否定)等。美国为此耗费了近一个世纪,而日本用了半个多世纪(自诩“一亿中流”的“均质社会”),韩国大约用了四分之一世纪,社会矛盾和非和谐情况才有所缓解。可是,上述做法在客观上却又带来另外一种后果和发展趋势,即为资本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一步扩展设置了新的界限、障碍、限制和桎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阐述了资本的八大界限),从而进一步促进对资本关系自身规定性及本质的自我背离、自我否定和自我扬弃的进程。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辩证法。建立剥削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铸就其永久徘徊于“李嘉图定律”怪圈和“库兹涅茨假说”阴影之中的历史结局。

我们正处在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全球化时代。但是,“李嘉图定律”和“库兹涅茨假说”的阴影正在游荡。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处于从人均GDP大约1 000~3 000美元的社会发展阶段,一般呈现两元化特征,即它既是经济的加快发展机遇期,又是各种矛盾凸显期和非和谐期。这已为许多国家的发展实践所证实,甚至被称为“狄更斯悖论”或“双城记情结”。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处于具有鲜明两元化特征的体制转轨时期,这是一个改革开放狂飙突进,凸显实践、创新和借鉴以及不断“试错”、反思、争论和“纠错”的重要历史时期。我国正位于这样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拐点上,即从“李嘉图推进”转向“次帕累托改进”,从西方市场理论和制度大规模借鉴性移植进入以自主创新为主的历史大转折时期,从增量改革转入存量改革,从保持比较优势(如低廉的劳动力资源)到追求竞

争优势,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体制外渐进式改革跨入体制内激进式改革,以及各个阶层、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博弈、深层次矛盾尤其分配问题凸现,从而使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从社会发展模式的大视角上看,中国改革开放已到达向纵深化、系统化和全面化发展的一个战略转折点,即从单一的市场化改革转向旨在构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和谐社会的多元化改革。这就需要在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的过程中,解决不发达的经济同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矛盾,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的矛盾,而就业、社会保障、扶贫、教育、医疗、环保和安全生产问题十分突出。因此,人们不禁要问: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发展必然要以牺牲某些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以冲突取代和谐为代价吗?社会的发展一定要采取对立和不公平的形式吗?人均财富差异与人均财富增长、增长与不平等的关系、公平与发展(效率)是一种倒“U”型曲线规律吗?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没有跳出“李嘉图定律”怪圈和“库兹涅茨假说”阴影,难道社会主义社会就一定重蹈这一历史覆辙吗?马克思关于“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型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的基本原理及其新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尤其是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论和新发展模式是涤荡“李嘉图定律”怪圈和“库兹涅茨假说”阴影的思想武器。中国应该为击破“李嘉图定律”和“库兹涅茨假说”做出历史性的贡献。

#### 四

《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的翻译工作是在我的主持之下,主要是由我指导的在读的或已经取得学位的欧美经济思想史和西方经济学流派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合作完成的,最后由我统一校译、修订和定稿。安慧、吴文劲和刘和旺做了部分初校及大量技术性辅助工作。常庆欣在后期也参与其中。本书的35幅插图和表格均由吴海林进行技术处理。各章翻译分工如下:

序、前言、目录:颜鹏飞;第1章:吴文劲;第2章:戚义明;第3章:马瑞;第4章:唐文进;第5章:吴文劲;第6章:唐翀;第7章:江晴;第8章:安慧;第9章:刘和旺;第10章:肖殿荒;第11章:齐绍洲、关琦;第12章:傅耀;第13章:马瑞;第14章:陈银娥;第15章:齐绍洲、赵翊;第16章:王兵;第17章:文建东、吴淑帆、林琳;第18章:戈国莲;第19章:颜鹏飞;阅读书目和索引:梅兆华。

毋庸置疑,译校肯定有讹误和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应该强调指出,本书出版事宜得到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高等教育图书公司麻俊生同志,尤其得到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领导和编辑仲崇巍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颜鹏飞

2007年3月18日

武昌 珞珈山

## 注 释

1. 亨特(E. K. Hunt):《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第二版序言,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2. 这里讲的主线大抵上可分为基础性主线与专题性主线。前者往往是以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形态和生产的变革或以每一个经济时代和历史时期出现的应该着重解决的重大经济问题为主线,展开对经济思想发展过程的论述。基础性主线具有一元性或单一性,它们构成了全部经济思想史的“骨骼系统”和“神经系统”。后者即专题性主线以方法论的演绎,或以流派的更替、主流和非主流的嬗变,或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两大思想之争,或以范式的演化,或以和谐与冲突理论为主线,从而呈现主线的非线性、非单一或非一元化性。基础性主线和专题性主线是经济思想通史赖以旋转的轴心和主线;它们的交织、综合和互补在一定程度上逼近了经济事物及其经济理论发展的主观与客观辩证法,较为真实地再现了其历史的本来面貌。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第 2 册第九章;第 3 册第 102~103 页。

4. Kuznets, Simon,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5(1: 18).

## 前 言

M. E. 夏普出版社出版了 E. K. 亨特(E. K. Hunt)的著作《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第二版),我非常高兴。该书所涉及的重要课题如此精彩,以至于所有钻研经济学的学生都可以从中获益。

大概没有任何一门学科能够毫不歪曲地反映事实真相从而使人们只需考察最新发生的事件。但是经济学科却不在其中,因为某些分析类疑难问题具有延续性。尽管原先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有助于对事物的了解,但结构或经济体制本身的变更,使得相关因果关系的延续性变得不确定从而使该问题又浮出水面。例如,资本主义经济是否停滞、长期浪费劳动力以及诱致收入不变或下降的问题。而资本主义体制怎样演进、经济学家又如何理解经济力量在不断变化的结构中的作用,各种答案却不尽相同。学习经济思想史有助于理解为什么试图对此找出统一答案的经济学家和常人一样往往被误导。

误导并非纯粹归咎于个人缺陷。经济理论的发展与经济利益的影响有关。占社会主导地位的阶层总是寻找和支持能够代表本阶级利益的理论,同时阻碍与其对立的利益集团所推崇的批评性思想观念的传播。经济学家无疑会对此做出反应,并且主流经济学在初期总是倾向于保守,这不足为奇。阐明这一点在经济思想史中的作用非常重要。这甚至同样适用于诸如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一类保守派,藉此可以了解这些经济学家为什么如此笃信他们所认定的东西。

与此紧密相关的一个议题是道德价值对经济分析的影响问题。当今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断言,事实与价值在逻辑上是不同的,他们为自己有事实依据和非价值取向的努力成果而倍感自豪。然而,这种结论极易被推翻。所有理论都必须侧重于经济关系的某些方面而不得不忽略其他方面,对于被忽略的方面则不能做出任何有事实依据的或基于任何标准的评估。考虑到文明史中各种理论进程,这些忽略或沉默自然具有道德意义。毋庸置疑,学习经济思想史比其他经济学科更有助于有效地理解决此类发展。

与此紧密相关的另一个议题是,现代经济学家习惯于忽略那些不便记忆的历史事件。

## 2 ◀▶ 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

例如,如同与国际贸易密切相关一样,当今的经济全球化与帝国主义也是密切相关的——这是正统经济理论所特别关注的——这一点应该值得特别重视。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经济发展往往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从事贸易的国家初始条件各不相同,从而导致结果也大不相同。显而易见,现代经济学如出一辙,往往忽略历史而导致一系列错误。

亨特教授的《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的最大优点是不隐瞒或者不忽略任何观点,并把这一点始终放在首要和中心位置。因此,在教授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们如何认知这门学科的本质方面,亨特教授贡献颇多。该书非常值得一读。

M. C. 霍华德(M. C. Howard)

经济系

瓦特洛大学

加拿大安大略州

## 序

经济思想史的作者必须首先确定一定的选择原则。成百上千的经济思想家在二百多年间写了成千上万本有关经济理论和资本主义的书籍。因此，当代知识界的历史学家仅凭借一书之篇幅而抒怀，故只能择其要者而言之。

所谓“重要”并非是思想史学家都持有一致意见的科学范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有某些自己独立的选择标准。如果我们查看目前所有已经出版的经济思想史书籍，就会发现习俗和传统似乎是主要标准。一代思想史所具有的观点似乎又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地被下一代大多数的历史学家们所袭用。其差异仅取决于这些经济学家如何表达他们所找到的第二手资料，至于在多大程度上他们采用相同的选择标准来进行选择则很难说。

这本书与已出版的其他思想史书籍大相径庭。因此，很有必要给读者讲述一下我选择标准的基本原则。它基于下述三条基本信条。

首先，我相信社会理论和社会—历史进程是相互联系的。理论是基于或产生于或者反映和试图阐释正在发生的社会事件和环境。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社会理论是源于一定的社会和经济环境的产物。但也同样可以认为，基于对环境的认知，人类会作用于或创造或者形成和改造他们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社会和经济环境是人类思想观念和社会理论的产物。所以，尽管该书是有关经济思想史的著作，我却涉足社会和经济史领域作了一些简要的阐释和概括，这也许有助于理解该书所讨论的观点。

其次，我认为社会和经济变迁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当今的资本主义与18世纪晚期的资本主义在许多方面有根本的不同，尽管贯穿这些变化之中的那些根本制度始终扮演了资本主义基石的角色。因此，根据经济学家与这些资本主义基本特征相关联的程度，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的经济学家们的不同观点在当今经济学家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到对应物。所以，我试图通过追溯其历史渊源来阐明当代经济理论争论的实质。这也影响了我所选

择的理论学家。例如,大多数经济思想史并不讨论汤普森(Thompson)、霍奇斯金(Hodgskin)和巴斯夏(Bastiat)的思想观点,我却囊括其中,因为我认为这些清晰的、有说服力的思想观点只需稍加润色,它们对于今天的情况仍起重要作用。

其三,我认为,所有经济学家一如既往地非常关注实际的、社会的、政治的和伦理道德的问题。他们的作品既有认知和科学成分,同时也具有感情、伦理道德或意识形态成分。我认为这两者并不是完全分开的。认知和科学探求总是针对某些问题和疑点,而思想家设计的“合法”地解决问题的方案总是有限的。思想家的道德情感和意识形态观点限定了其认知和科学探寻的方向,也决定了该思想家所能认定的“合法”的解决方案的选择范围。再则,道德情感和意识观念是基于同时也一直是通过思想家对社会究竟如何起作用的认知或科学理论的方式来加以维护的。结果是,即使我们能够部分地将社会理论的科学和意识形态成分区分开来,但这种区分绝对不可能是完全的。如果不理解理论所包含的评价标准和意识形态成分,我们就永远不能完全理解经济学家理论中的认知和科学成分。贯穿全书,我都在试图研讨各个不同理论中的上述两种成分。

第三个信条也许是该书区别于其他同类书籍的最主要原因。在学术界中,一个普遍的观点是科学与价值判断是相对立的。根据这种观点,如果将价值判断放入任何一部著作则此著作就不具备科学性。因此,持有这种观点的历史学家一般认为他们的经济思想史著作是非价值取向的,并将他们所推崇的理论学家的著作也说成是“非价值取向”。同样,对于他们不喜欢的理论学家,特别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就认为这些人在他们的著作中包含了价值取向(至少是隐含了价值取向),而正因为如此才损害了其著作的科学价值。就我个人看来,所有的理论学家,所有的历史学家,甚至所有人(当然包括我自己)在所有的认知活动中都明显包含相互贯穿的价值取向。因此,当我讨论不同的理论学家著作中的价值和意识形态成分的时候,我并不认为包含价值取向本身即意味着对一个思想家的批评。我认为关于一些理论学家是“非价值取向”的论调要么是自欺,要么是欺人。判断不应建立在一个理论学家是否具有价值取向的基础上——因为确实每个人都有价值取向——而必须建立在这些价值取向的具体本质的基础之上。正因为如此,我也讨论了所提出理论的一些价值取向,并在此书中最后提出了我自己的价值观,这些也影响了该书的写作。

基于上述三大信条,我选择了一些我认为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很重要的一些观点。经济思想史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该主题也是本书的中心——资本主义究竟是导致和谐还是导致冲突的一种社会制度。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著作中,两种观念都有进一步阐述。李嘉图之后,大多数经济学家要么认为资本主义是根本和谐的,要么认为是根本冲突的。这一分歧决定了每一个经济学家如何选择其分析的范围、方法和内容。另一个经常争论的主题是有关资本主义是内在稳



定还是内在不稳定的问题。关于经济理论中合理的价值判断问题也一直有不同的意见。

本书还详细论述了其他问题。在序言中需要特别提出的问题是消费品价格与“生产要素”价格或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问题。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把收入分配当成是商品价格的重要决定因素,而新古典经济学家通常将上述因果关系颠倒过来。经济思想史的大多数作者毫无疑问地接受了新古典主义的观点,并把马克思的古典主义观点视作一种已被摒弃的过时的理论。皮罗·斯拉法(Piero Sraffa)在《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提出的新理论扭转了这一形势。现在看来,古典—马克思主义观点似乎具有更牢固的理论基础。我相信,这本书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全面地描述了斯拉法的理论突破,并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解释了先前思想家们基于斯拉法的许多观点。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在经济思想史中也曾经深入地探讨了这个问题。

该书最后讨论了当代经济理论之间的差异。我们希望读者籍此书更为广泛地了解当代理论。该书只涉及了为数不多的简单的数学公式和图表,不具备经济理论背景的读者也能够阅读和理解该书。同时,我认为,由于我是从与其他经济思想史完全不同的角度对各种理论展开讨论的,所以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和教授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原创性、启示性和激励性的新知识。

我要感谢很多学术界的朋友。首先是引发我研究经济思想史兴趣的劳伦斯·内伯斯(Lawrence Nabers)老师。其他对我有很大影响的作家包括卡尔·马克思、约翰·杜威(John Dewey)、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利奥·罗金(Leo Rogin)和莫里斯·多布。此外,约翰·格林曼(John Greenman)和詹姆斯·M.西佛尔(James M. Cypher)教授、道格拉斯·多德(Douglas Dowd)教授、霍华德·谢尔曼(Howard Sherman)教授、诺里斯·C.克莱门特(Norris C. Clement)教授和维伦·塞缪尔斯(Warren Samuels)教授对此书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我还要感谢马克·普赖斯(Mark Price)费心整理提供给出版商的文稿。我要特别感谢金杰尔·阿莱温(Ginger Alewine),没有她就没有这本书。我对她充满感激和爱意。

对允许我在其出版书籍中摘抄和引用某些片段的出版商,一并表示感谢<sup>1</sup>。

最后,谨将此书赠给我所挚爱的两个儿子,杰弗里(Jeffrey)和安德鲁(Andrew),用以表达我对他们的深厚感情。

E. K. 亨特

#### 注 释

1. 其中包括 Property and Prophets,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Ideologies*, 6th e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90); “Marxian Labor Values, Prices, and Profits,” *Intermountain Economic Review* (Spring 1978); “An Essay on the Criteria Defining Social Economics,” *Review of Social E-*

*conomics* (December 1978); "Value Theory in the Writings of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Thomas Hodgskin and Karl Marx,"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Fall 1977); "Utilitarianism and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Spring 1980); 杜克大学出版社还允许我引用了两篇文章中的一些观点: "A Radical Critique of Welfare Economics," in *Value, Distribution and Growth: Essays in the Revival of Political Economy*, ed. E. J. Nell"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8).

## 致 谢

经每月评论出版社(Monthly Review Press)允许,引述了保罗·A. 巴兰(Paul A. Baran)和保罗·M. 斯威齐(Paul M. Sweezy)的《垄断资本》。

经人文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Humane Studies)允许,引述了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的《经济和谐》。

经每月评论出版社允许,引述了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的《劳动和垄断资本:二十世纪劳动的退化》。

经奥尔丁出版公司(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伦敦贝辛斯托克(Basingstoke)的麦克米兰出版社(Macmillan London)允许,引述了马丁·布郎芬布伦纳(Martin Brofenbrenner)的《收入分配理论》。

经剑桥大学出版社允许,引述了莫里斯·多布的《亚当·斯密以来的价值和分配理论》。

经剑桥大学出版社允许,引述了C. E. 弗格森(C. E. Ferguson)的《新古典主义的生产和分配理论》。

经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允许,引述了芝加哥大学1962年出版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和自由》。

经密歇根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允许,引述了J. A. 霍布森(J. A. Hobson)的《帝国主义论》。

经哈科特·布雷斯·约万诺维奇(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和卡恩勋爵(the Right Honorable Lord Kahn)允许,引述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经理查德·D. 欧文(Richard D. Irwin)允许,引述了理查德·B. 麦肯齐(Richard B. McKenzie)和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的《经济学新世界:人类经历的探险》。

经伦敦贝辛斯托克的麦克米伦出版社(Macmillan, London) 允许, 引述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经济学原理》第八版。

经兰登出版社(Random House) 允许, 引述了马丁·尼古拉斯(Martin Nicolaus) 翻译的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经查普曼(Chapman)和霍尔(Hall)出版社的允许, 引述了罗纳德·L. 米克(Ronald L. Meek)的《经济学、意识形态及其他》; 经每月评论出版社允许, 引述了罗纳德·L. 米克1976年编辑的《劳动价值论研究》修订版。

经人文研究所允许, 引述了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的《国民经济学原理》。

经D. M. 纽第(D. M. Nuti) 允许, 引述了E. K. 亨特和杰西·G. 施瓦茨(Jesse G. Schuartz)编辑的D. M. 纽第的《经济理论批评》一书中的《收入分配理论中的庸俗经济学》。

经约翰·威利(John Wiley) 允许, 引述了保罗·A. 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的《综述》,《经济学季刊》; 经麦格劳—希尔(McGraw-Hill) 允许, 引用了麦格劳—希尔出版社版权所有的1976年的《经济学》第十版。

经剑桥大学出版社允许, 引述了皮罗·斯拉法(Piero Sraffa)的《用商品生产商品》。

经罗素与罗素出版社允许, 引述了由约瑟夫·多尔夫曼(Joseph Dorfman)于1919年重新撰写了前言的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的《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及其他》; 经奥古斯塔斯·M. 凯利(Augustus M. Kelley)的允许, 引述了《制度变迁论》、《不在所有权和近代企业》、《作业的本能》、《工程师和价格体制》、《企业论》和《有闲阶级论》。

# 目

# 录

译者序 .....	1
前言 .....	1
序 .....	1
致谢 .....	1
图表索引 .....	1
<b>第 1 章 绪论</b> .....	<b>1</b>
资本主义的定义 .....	1
前资本主义时期的欧洲经济 .....	5
长途贸易的增加 .....	7
外包制和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 .....	9
庄园制的衰微 .....	10

## 2 ◀▶ 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

工人阶级的产生 .....	11
向资本主义转化的其他力量 .....	12
重商主义 .....	14
<b>第2章 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 .....</b>	<b>17</b>
早期重商主义有关价值和利润的著作 .....	17
晚期重商主义著作和个人主义哲学 .....	21
新教和个人主义伦理 .....	22
个人主义的经济政策 .....	23
古典价格和利润理论的兴起 .....	25
重农主义者的社会改革思想 .....	26
魁奈的经济思想 .....	27
小结 .....	28
<b>第3章 亚当·斯密 .....</b>	<b>31</b>
斯密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	31
斯密的史学和社会学理论 .....	34
斯密的价值理论 .....	38
斯密的经济福利理论 .....	44
阶级冲突和社会和谐 .....	48
<b>第4章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b>	<b>52</b>
马尔萨斯时代的阶级冲突 .....	52
人口理论 .....	57
交换经济学与阶级冲突 .....	63
供给过剩理论 .....	66
<b>第5章 大卫·李嘉图 .....</b>	<b>74</b>
资本家和地主之间冲突的经济基础 .....	78
劳动价值论 .....	80
资本构成不同时的价格决定 .....	84

价格决定的数字例解 .....	88
收入分配和劳动价值理论 .....	90
供给过剩的不可能性 .....	93
机器导致的非自愿失业 .....	94
比较优势和国际贸易理论 .....	95
社会和谐和阶级冲突 .....	97
<b>第 6 章 理性主观主义:边沁、萨伊和西尼尔的经济学说</b> .....	102
效用理论产生的社会根源 .....	102
杰里米·边沁的效用理论 .....	105
作为社会改革者的边沁 .....	108
让·巴蒂斯特·萨伊的效用、生产和收入分配理论 .....	109
萨伊的市场定律 .....	112
纳骚·西尼尔的社会取向 .....	113
西尼尔的方法论 .....	116
西尼尔的四个命题 .....	117
西尼尔的效用最大化、价格和供给过剩理论 .....	118
西尼尔的人口和工人福利观 .....	120
西尼尔的资本积累和节欲论 .....	120
西尼尔的地租和阶级的收入分配理论 .....	121
社会和谐论与穷人政治经济学 .....	123
<b>第 7 章 穷人政治经济学:威廉·汤普森和托马斯·霍奇斯金的理论</b> ...	127
工人对工业化的抵制运动 .....	127
汤普森的功利主义和劳动价值论 .....	129
汤普森的平等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观 .....	130
汤普森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 .....	132
对汤普森功利主义的批评 .....	135
托马斯·霍奇斯金的利润来源观 .....	137
霍奇斯金论资本 .....	140
霍奇斯金的功利主义 .....	141

<b>第8章 纯粹功利主义与折衷功利主义：巴斯夏和穆勒的著作</b> .....	145
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 .....	146
巴斯夏功利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和研究范围 .....	147
效用和交换 .....	149
巴斯夏对私有财产、资本、利润和地租的辩护 .....	151
巴斯夏关于交换、社会和谐与政府职能的观点 .....	154
穆勒的功利主义 .....	155
穆勒的价值理论 .....	157
穆勒的工资理论 .....	160
利润率下降的趋势 .....	161
穆勒的社会主义思想 .....	162
穆勒折衷的干预主义思想 .....	164
对穆勒改良主义思想的批判 .....	166
<b>第9章 卡尔·马克思</b> .....	171
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 .....	172
商品、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	174
有用劳动和抽象劳动 .....	177
商品生产的社会性质 .....	178
简单商品流通和资本主义流通 .....	179
剩余价值、交换和流通领域 .....	180
资本循环和生产的重要性 .....	181
劳动、劳动力和资本主义的定义 .....	182
劳动力的价值 .....	183
必要劳动、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产生和实现 .....	184
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率 .....	186
工作日的长度 .....	187
劳动价值理论及其转型问题 .....	188
私有财产、资本和资本主义 .....	194
原始积累 .....	195
资本主义积累 .....	196



经济集中·····	197
利润率下降的趋势·····	198
部门不平衡和经济危机·····	200
无产阶级的异化和日益贫困化·····	201
<b>第 10 章 功利主义的胜利: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的经济理论</b> ·····	208
杰文斯的边际效用和交换理论·····	210
门格尔的边际效用、价格和收入分配理论·····	215
门格尔的方法论·····	219
瓦尔拉的一般经济均衡理论·····	221
一般均衡的稳定性·····	228
瓦尔拉对资本主义的辩护·····	231
新古典边际主义小结·····	233
<b>第 11 章 新古典厂商和收入分配理论:马歇尔、克拉克   和庞巴维克的著作</b> ·····	238
马歇尔对效用理论和需求理论的贡献·····	239
新古典家庭理论和厂商理论的对称性·····	241
马歇尔的厂商理论·····	243
短期厂商的生产和成本曲线·····	244
短期均衡·····	245
长期和竞争问题·····	246
马歇尔对资本主义的辩护·····	248
克拉克和边际生产力分配论·····	251
交换经济学和企业家的职能·····	254
克拉克对私有财产的辩护·····	256
克拉克论资本·····	257
庞巴维克衡量资本的方法·····	259
新古典分配理论中的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	260

<b>第 12 章 托尔斯坦·凡勃伦</b> .....	265
凡勃伦的演化的社会哲学观 .....	266
凡勃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 .....	269
资本主义对抗性的两分法 .....	272
私有财产、阶级分化社会与歧视妇女 .....	272
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与商业对工业的统治 .....	275
政府与阶级斗争 .....	278
资本的帝国主义 .....	281
金钱文化的社会道德观念 .....	283
凡勃伦思想的评价 .....	288
<b>第 13 章 帝国主义理论:霍布森、卢森堡和列宁的著作</b> .....	294
霍布森的资本的帝国主义理论 .....	296
卢森堡的资本的帝国主义理论 .....	301
列宁的资本的帝国主义理论 .....	307
霍布森、卢森堡和列宁理论的比较 .....	310
<b>第 14 章 看不见的手的成就、贡献及式微:新古典福利经济学</b> .....	314
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 .....	317
极乐世界和永恒幸福 .....	320
微观经济学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 .....	321
福利经济学的享乐主义基础 .....	323
帕累托最优标准的本质 .....	324
福利经济学的社会价值观 .....	325
福利经济学的实证分析的假设 .....	326
指导政策制定的新古典福利经济学 .....	328
福利经济学和外部性 .....	329
对帕累托分析的批判 .....	333
<b>第 15 章 新古典主义理念和自我调节的市场神话:凯恩斯的著作</b> .....	337
凯恩斯分析的理论框架 .....	341

凯恩斯对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的辩护·····	343
凯恩斯对资本主义经济萧条的分析·····	345
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效验·····	350
军事经济·····	352
债务经济·····	354
凯恩斯思想的基础·····	355
<b>第 16 章 可测资本生产力神话的破灭:斯拉法的著作</b> ·····	360
新古典分配理论的现状·····	360
斯拉法对新古典理论的批判·····	365
<b>第 17 章 当代经济学 I:正统经济学的分裂</b> ·····	375
布尔什维克革命和苏联的工业化·····	375
大萧条·····	378
阿瑟·刘易斯和发展经济学的起源·····	381
自由的和保守的新古典经济学·····	384
保罗·A. 萨缪尔森、米尔顿·弗里德曼以及保守的新古典主义者·····	385
萨缪尔森对功利主义的辩护·····	386
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	390
<b>第 18 章 当代经济学 II:制度经济学和后凯恩斯主义</b> ·····	401
克拉伦斯·E. 艾尔斯的制度经济学·····	402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408
斯拉法的价格理论·····	412
<b>第 19 章 当代经济学 III: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复兴</b> ·····	419
劳动价值理论的复兴和发展·····	420
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过程的变化·····	425
总体水平下的资本主义状况·····	429
对本书社会观的评论·····	433

8 ◀ 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

阅读推荐 .....	440
术语对照表 .....	445

## 图表索引

### 表格

5.1	工资率为 1 美元、利润率为 50% 时的成本和价格 .....	89
5.2	工资率为 2 美元、利润率为 10% 时的成本和价格 .....	89
5.3	在英国和葡萄牙生产 1 单位布料和葡萄酒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	96
9.1	当价格与价值相等时的利润率 .....	193
9.2	相同的利润率条件下, 价格与价值的偏差 .....	193
10.1	边际效用递减示意表 .....	215

### 数据图

5.1	三种不同等级土地上的净产品和地租 .....	76
5.2	农业部门逐渐降低的生产力 .....	77
5.3	地租与利润和工资的区分 .....	77
5.4	随耕种边际扩张而产生的收入分配的变化 .....	79
5.5	过去劳动的资本递减 .....	86
5.6	以时间为顺序的劳动投入 .....	87
5.7	具有等量劳动和不同资本构成的两个生产过程 .....	88
10.1	总效用和边际效用的关系 .....	216
10.2	商品 <i>a</i> 供求均衡时的价格 .....	226
10.3	商品 <i>b</i> 供求均衡时的价格 .....	227
10.4	<i>a</i> 和 <i>b</i> 市场均衡和四个非均衡区域 .....	227
10.5	<i>a</i> 、 <i>b</i> 和 <i>c</i> 市场均衡和六个非均衡区域 .....	228

## 2 ◀▶ 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

11.1	可变比例法则	244
11.2	厂商成本曲线	245
11.3	行业及其代表性企业的短期均衡	246
11.4	厂商边际产品曲线和边际产品价值曲线	252
11.5	工资率的决定和厂商的劳动就业水平	253
11.6	利率的决定和厂商的资本利用水平	254
14.1	消费者效用最大化	318
14.2	利润最大化	319
15.1	新古典主义的工资率和总产出决定论	342
15.2	利息、储蓄和投资	343
15.3	利率的决定及储蓄与投资的不对等	348
15.4	利率不能使充分就业水平下储蓄与投资相等的情形	348
15.5	货币政策不能使充分就业水平下储蓄与投资相等的情形	349
16.1	$r$ 与 $w$ 的三种可能关系	370
16.2	选择成本较低的生产技术	370
16.3	再转换的生产技术	370
16.4	再转换的一般情况	372

# 第 1 章 绪 论

当代经济理论一般被认为始于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本书主要叙述自斯密以来的经济思想。贯穿于这些思想的基本观点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的理解。书中出现的作家们都试图找出资本主义运行的基本特征、资本主义制度是如何运作的、是什么决定了生产量、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什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财富和收入的分配等等以及其他许多问题。这些作家也都试图评价资本主义:这种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如何改变这种制度使之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

## 资本主义的定义

简单地说,当然应该从亚当·斯密开始来了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首先作为欧洲、然后是世界大多数地区的主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缓慢发展。自它出现时起,人们就试图了解这种制度。

要探讨人们理解资本主义的努力,必须首先对这种制度下一个定义,然后再简要地回顾该制度出现以来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对于什么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至今仍没有统一的答案。实际上,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对各种明显不同的经济制度下定义根本不会有任何结果;他们认为相同的普遍规则的历史连续足以让人理解所有的经济安排。尽管如此,大多数经济学家还是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与以往经济制度和当代非资本主义制度根本不同的经济制度。本书从方法论的角度,基于该制度所依据的生产方式,界定了各种经济制度。事实上,生产方式取决于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

生产力构成了通常被称为社会生产技术的部分。这些包括现存的生产或科学技术、技能、组织技巧等等,加上生产中使用的工具、生产手段、机器和建筑物。任何一个给定的生产力系统中,总会有某些保证该系统存在的必要的开支。一些新资源,或是原材料,必须不断地从自然环境中获取。机器、工具和其他生产手段由于使用消耗而必须更换。最重要的是,那些努力获取原材料并将其制成成品的人,必须有最低水平的食品、衣服、住房和其他一些生活必需品以维持其生存。

不能满足这种持续性生产最低需求的生产方式已经逐渐消失了。历史上,许多曾在一段时间中成功地满足了这些最低需求、但后来因为环境变迁不能继续满足这些需求的生产方式也消失了。许多长久维持下来的生产方式,实际上其生产不仅能够满足这些必要开支,甚至还能超过这些必要开支而生产出社会剩余产品。社会剩余产品被定义为在扣除满足社会必需的物质生产开支之后,剩余下来的社会物质产品。

生产力的历史发展导致了社会生产更多社会剩余产品的能力的持续增长。在这个历史演变过程中,社会一般被分为两大不同的集团。每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辛苦劳作,生产必需的产品以维持和保证生产方式和社会剩余产品的持续,而少数人却分配和控制社会产品。在本书中,社会阶层也相应地区分开来,同时,社会生产关系被定义为这两大阶级之间的关系。生产方式则是社会的生产技术的总和(生产力)以及某个阶级如何使用这些生产力来生产所有社会产品(其中包括剩余产品),以及另一个阶级如何分配这些剩余产品(社会生产关系)的社会安排问题。

从众多经济思想家对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生产方式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给资本主义下定义。资本主义特征一般体现在如下四组制度和行为安排中:以市场为导向的商品生产;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市场上存在许多不得不出卖劳动力而生存的大批劳动者以及经济制度中大多数人最大限度的个人主义和惟利是图。这些特征将在下面一一进行简单的论述。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劳动的产品因为两个明显的原因而具有价值。首先,产品因具有特殊物理性质而有用并且可以满足人的需求。如果某个商品具有满足人类需要的价值,我们就说这个商品具有使用价值。所有社会中的一切人类劳动产品都具有使用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也因为其能够在市场上出售换取货币而具有价值。货币因为它能够交换具有人们所需的使用价值的产品而被接受。因此,只要产品能够与货币进行交换,它就具有价值,这种价值叫做交换价值。人类劳动的产品只有在以商品生产为特征的生产方式中才具有交换价值。社会必须有发展完善的市场机制,以便产品能够自由买卖换取货币,这样商品生产才能存在。而只有当产品的生产者对自己生产的产品的使用价值并没有立即的个人需求,而只对其交换价值感兴趣时,商品生产才能存在。因此,商品生产并不是满足需要的直接方式,而是一种通过货币交换产品从而获取货币的方式,然后,换来的货币再被用来购买生产者意欲获得其使用价值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劳



动的产品就是商品,这种社会也因而被称为商品生产社会。

在商品生产条件下,个人的生产活动与其消费没有直接联系;交换和市场调节生产和消费。进一步说,个人与生产其所消费商品的生产者没有直接联系。这种社会关系也由市场进行调节。商品生产意味着更高的专业化生产程度,其中的每一个独立的生产者只生产一个或几个商品,因而必须依赖与之没有直接个人关系的其他个人在市场上购买其所生产的商品。一旦这个生产者将其生产的商品交换成了货币,这个人又必须依赖那些与其没有直接个人关系的人向市场提供其必须购买的商品以满足个人需要。

这种经济类型具有极其复杂的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不牵涉个人直接的相互作用和联系。个人通过用商品交换货币或用货币交换商品,从而只与市场这个非个人社会机构发生作用。因而,对单个个人来说,复杂的社会和经济关系仅仅表现为事物之间的非个人关系——即商品。每个人都依赖于非个人的市场的作用——买卖或供求——从而满足需要。

资本主义的第二个标志性特征是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这意味着社会授权私人使用生产中所必需的原材料、工具、机器和厂房进行生产。这种授权意味着其他个人无权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进行生产。早期私有财产的辩护者认为单个生产者拥有并因而控制了个人生产资料。但在资本主义演化初期,情况却并非完全如此。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第三个标志性特征是大多数生产者并不拥有其进行生产活动所必需的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资料被集中在社会少数人——资本家手中。生产资料所有者——资本家并不需要参加直接的实际生产过程以控制生产;他们只需掌握生产资料即可获得对生产的控制。并且,正是这种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资本家阶级得以对社会剩余产品进行控制。因此,拥有生产资料的这种资本主义特征使资本家阶级控制了社会剩余产品从而成为社会主导支配阶级。

这种支配权自然暗示着资本主义的第三个标志性特征——存在一大批没有任何生产资料而进行生产活动的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大多数工人既没有原材料,也没有生产商品的手段。因此,他们生产的商品不属于他们自己而属于掌握了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典型的工人进入市场,只具有或只掌握一样东西——工作的能力,即他或她的劳动力。为了从事生产活动,工人必须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回报,工人接受工资而将自己生产的全部商品交给资本家。因此,与以前的任何一种生产方式不同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将人的生产力本身也变成了商品——劳动力——并且产生一种前提,即大多数人如果不把他们的这种劳动力商品出卖给资本家以换取工资,他们就无法生存。工人的工资使他们得以从资本家那里买回一部分他们自己生产的商品,而他们生产的商品中的剩余部分就构成了社会剩余产品,被资本家阶级持有和控制。

资本主义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标志性特征是大多数人都为最大限度的个人主义和惟利是图所驱使。这也是资本主义得以成功运作的保证。首先,为了保证足够的劳动力供给和便于对工人进行严格控制,工人阶级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必须大大超过其所消耗



的影响。本书中大多数经济思想家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理解这些危机的本质和原因,并找到根除或至少是减轻这些危机的对策。

## 前资本主义时期的欧洲经济

为了追溯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变进程,首先必须了解封建主义——在西欧早于资本主义而出现的社会经济制度。古罗马帝国的西欧领地衰落后,欧洲失去了罗马帝国提供的法制和保护。取而代之的是封建等级制度的建立,农奴或佃农受庄园主的保护,而后者又效忠并受更高一级大庄园主的庇护。该制度这样延续下去,直至国王。强者保护弱者,但后者却要付出高昂代价。作为缴纳货币、食品、劳动或宣誓效忠的回报,大庄园主授予其隶属或家臣封地——世袭使用土地的权利。封建庄园里,地位最低的是种地的农奴。大多数人依靠种植庄稼获取食物或衣服,或放养羊群以获取羊毛和衣服。<sup>1</sup>

习俗和传统是了解中世纪各种关系的关键。庄园的习俗代替我们今天的法律进行管理。中世纪没有能够施行法律制度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整个中世纪的组织机构都基于一套从上至下各阶层都共同遵守的义务和服务。对土地的拥有和使用使人们具有某些传统义务和为获取保护而提供的赋税,庄园主有义务为农奴提供保护,而农奴则必须向庄园主上缴部分收成或服劳役。

当然,传统习俗被打破了,实际上没有任何一种制度的运行状态能达到理论设计水平。但我们不能低估习俗和传统决定中世纪人们生活 and 思想观念的作用。农奴之间的争执根据每个案例的特殊情况和庄园处理该类案例的惯例在庄园主的法庭上进行裁决。当然,在处理与农奴之间纠纷时,庄园主通常会作出对自己有利的裁决。在此情况下,特别是在英国,大庄园主会对经常违反习俗对待其农奴的庄园主——其隶属——进行裁定或处罚。庄园的这种习俗与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形成了鲜明对比。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执行合同和普遍法规约束的基础之上的。在中世纪,环境和习俗经常影响庄园主的判断,而这种作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却很少行得通。

庄园主行使“权利”的程度因时间和地点而有极大不同。正是这种义务的强化和贵族在长期的封建制度中普遍使用该权利,才最终导致了单一民族国家的兴起。这个过程发生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化的时期。但在中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由于政治统治不统一,许多庄园主的权利非常弱小和不确定。

中世纪农村生活的基本经济机构是庄园,庄园一般分为两个阶级:贵族或庄园主和农奴(源于拉丁语“servus”,其意思是“奴隶”)。农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奴隶,不像奴隶一样仅仅是财产,可以任意买卖,农奴不能离开其家庭或土地。如果庄园主将庄园转让给另一个贵族,农奴只是换了一个庄园主而已。但在不同程度上,农奴时常被强加上繁重而无

法逃脱的劳役,通常情况下他们毫无自由可言。

庄园主依靠农奴的劳动而生存,农奴耕种庄园主的土地并根据庄园惯例缴纳实物或货币税金。同样,庄园主根据庄园惯例进行保护、监督和管理。需要补充的是,尽管这种制度确实是建立在互惠的义务之上,但由于庄园主集中掌握了经济和政治权利,所以,无论以何种标准来衡量该制度都是对农奴的极度剥削。

天主教会是中世纪最大的土地拥有者。虽然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与封建制度下的伯爵和公爵拥有同样的地位,但他们之间有一个极大的差别。世俗的庄园主可能从一个大庄园主转而向其他的大庄园主宣誓效忠,这取决于环境和所牵涉力量之间的平衡。但是宗教庄园主通常(至少原则上)是首先向罗马教皇宣誓效忠。这也是宗教教义在整个西欧具有极强的、普遍深刻的影响的时期。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教会成为这时期最接近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的机构。

因此,庄园或许是世俗的,或许是宗教性的(很多时候,世俗的庄园主依附于大的宗教的庄园主,反之亦然)。但是,庄园主和农奴的基本关系并没有受到这些差别的明显影响,很少有证据显示农奴所受的宗教庄园主的压迫比世俗庄园主的少。宗教庄园主和世俗贵族是联合的统治阶层,他们控制了土地和与之相伴随的权力。作为对农奴繁重的劳动、产品和所缴纳货币的回报,贵族提供军事保护,教堂则提供精神慰藉。

除了庄园,中世纪的欧洲还有许多作为重要制造中心的城镇。生产的货物出售给庄园,有时也进行长途贸易。城镇中主要的经济机构是行会——手工业行会,特定职业者行会和贸易机构自罗马帝国起就一直存在。任何人都必须加入行会,才能生产和出售货物和提供服务。

行会也参与经济、社会和宗教活动。它们约束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个人的、社会的、宗教的和经济的。虽然行会确实是很仔细地约束商品的生产和销售,但相比获取商业利润,它们更关注拯救其成员的灵魂。这就要求个人遵守教堂教义和习俗,过循规蹈矩的生活。因此,作为社会现状的保护者,行会在中世纪的城镇中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

但中世纪社会主要是农业社会。社会的等级制度是基于个人与土地的联系,整个社会制度建立在农业的基础之上。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个世纪以来,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却是一系列复杂变革的原动力,并最终导致中世纪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建立。中世纪最重要的技术进步是土地的二耕制被三耕制所替代。虽然有证据显示三耕制早在8世纪就已传入欧洲,但直到大约11世纪,它才开始被普遍推广采用。

由于年复一年地在同一块土地上进行耕种耗尽了土地肥力,并最终使其不能再进行耕种。因此,在二耕制中,半数以上的土地总是在休耕以使其恢复肥力。随着三耕制的出现,可耕作的田地被分成三等分。秋天在第一块地里播种黑麦或冬麦,春天在第二块地里耕种燕麦、豌豆和蚕豆,第三块地休耕。这些轮作年复一年地进行。每一年,任何一块土地都有第一年的秋播和第二年的春播和第三年的休耕。农业生产的不寻常的增产就从这

些看似简单的农业技术变革中产生。在同样可耕地数量的条件下,三耕制将一定时期里耕种的数量增加了50%。<sup>2</sup>

三耕制也带来了其他重大变化。春天,耕种燕麦和其他饲料作物使人们可以喂养更多的马匹,那时,马已经开始代替牛成为农业中主要的劳力。马比牛速度要快得多,因此,耕种的范围扩大了。可耕种土地的增加使农村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密集的中心。马使得人、商品和设施的运输变得更有效率。耕地也比以前更有效率:牛耕需要三人,而马耕只需要一人。13世纪,四轮单轴马车替代了两轮车,农产品的运输费用也因此大幅度降低。农业和运输的这些进步引起了两个重要而意义深远的变化。首先,使人口的快速增长成为可能,历史统计显示欧洲人口在1000~1300年之间翻了一番。<sup>3</sup>其次,紧随人口增长的是城镇的快速增长。公元1000年以前,除了地中海的几个贸易中心,绝大部分欧洲都只有庄园、村庄和几个小镇。到公元1300年,就已经出现了许多新兴城市和较大的集镇。

集镇和城市的发展导致了农村—城市专业化分工的增长。随着城市工人摆脱了与土地的所有联系,生产有了极大的增长。伴随着生产的增长和经济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人类生产力也得到极大提高。区域间和长途的商业和贸易是这种专业化程度提高的另一个重要结果。

## 长途贸易的增加

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商业和贸易的传播是导致中世纪封建主义分裂的惟一重要因素。贸易的重要性确实毋庸置疑,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贸易并不是偶然的或者由诸如与阿拉伯不断增加的联系等欧洲经济以外的因素引发而出现的。相反,上文显示出这种贸易兴起是欧洲自身内部经济演变的结果。农业生产力的增长意味着为当地和国际市场提供了剩余的食品和手工产品。运输的进步意味着在城镇集中工业进行大规模生产并向远距离市场大量销售货物已成为可能且有利可图。因此,这些基本的农业和工业发展是商业和贸易传播必要的前提条件,这也因此进一步促进了工业和城镇的扩展。

然而,商业增长不能被当作封建主义解体或资本主义产生的主要力量。封建主义转化为资本主义并与西欧商业增长相耦合,而商业无疑是西欧封建主义解体和资本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与此同时,东欧商业活动的增长却导致了封建社会经济关系的加强和巩固。

商业的这些不同作用是由于封建主义在这两个地区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东欧,封建主义是一种相对年轻的、具有活力和相当发展潜力的经济制度。在这种环境之下,商业被严格限制在符合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范围内。而在西欧,封建主义已经发展到、甚至超过了其全部的经济潜力。早在商业成为西欧生活重要组成部分之前很久,西欧

的封建主义就已经开始解体。西欧封建主义解体的主要原因是,尽管生产率增长,但社会剩余却越来越不足以养活迅速增长的统治阶层。这导致统治阶级之间不断增长的激烈的且不可调和的冲突,而在这些不同派别的贵族和教堂之间激烈的冲突之中,商业成为了腐蚀性和不稳定的因素。<sup>4</sup>在我们简短的总结中,我们将讨论仅限于西欧的封建主义,在这里,商业加速了封建主义的解体,并加快了许多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基础的建立。

贸易的扩展,特别是早期长途贸易的发展,导致了为这种贸易提供服务的商业和工业性城镇的建立。城市和集镇的发展以及其越来越受控于商人资本家的局面,导致了工业和农业的重大变迁,弱化并极大地分解了将封建经济和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的传统纽带。

从封建社会初期起,欧洲许多地方都开始出现长途贸易。这种贸易在南欧地中海和亚得里亚海地区以及北欧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这两个地区的商业保护主义,大多数欧洲的封建庄园制度直到中世纪晚期都没有受到商业和贸易的冲击。

从大约 11 世纪开始,基督教十字军为商业拓展提供了极大的推动力。但十字军本身并不能被视为欧洲发展的偶然或外部因素。这场战争并不是由于宗教原因引起,也不是因为土耳其坚持采取宽容穆斯林政策而干扰了基督教徒朝圣的结果。穆斯林的发展确实导致了对拜占廷不断增加的攻击,但是,西方通常只会给予象征性援助,因为它对拜占廷没有很深的感情。十字军东征的基本原因是由于法国国内的发展使之具有极其强大的后备支持。法国变得更加强大,与东方有了更多的贸易联系;同时,它需要为国内社会不稳定寻找一个发泄口。十字军东征也被威尼斯的政治寡头所鼓吹,因为他们希望扩展其在东方的贸易和影响。<sup>5</sup>

与阿拉伯国家贸易的发展——北面与维京人的贸易——导致了出口产品生产的增长,并运输到兴盛于 12 世纪到 14 世纪晚期的大贸易集市。欧洲主要的贸易城市每年都举行的这些大贸易集市,一般持续一到几个星期。北欧的商人用大米、鱼、羊毛、布料、木材、沥青、柏油、盐和铁换取南欧商业贸易中的主要商品——香料、丝绸、葡萄酒、水果和金银。

到 15 世纪,这些贸易集市已经被具有常年兴旺市场的商业城市所替代。这些城市中的商业和贸易与严格的封建习俗和传统背道而驰。通常这些城市都成功地从教堂和封建庄园主那里获得了独立。在这些商业中心,出现了复杂的货币交换体制、债务清算和信贷活动,现代商业工具,如汇票也开始被广泛使用。新的商业法体制开始形成。与盛行于庄园的父系社会基于习俗和传统的裁决制度不同的是,商业法规根据严格程序制定。因此,它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合同法、谈判工具、代理销售和拍卖的基础。

在庄园手工工业中,生产者(手工业者)同时也是销售者。工业萌芽于新兴城市,但最初主要是出口业,生产者和最终购买者之间相距很远。手工业者将其货物出售给批发商,这些商人再将这些商品运往别处销售。另一个重要的不同是庄园手工业者同时也一般是

农民,新兴城市手工业者却放弃了耕种,一心一意从事手工业,并以此获取货币收入,满足个人需求。

## 外包制和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

随着贸易和商业的兴旺和拓展,产生了对商品的更多需求和对供给的更多依赖,这导致了商人资本家对生产过程控制的不断加强。到16世纪,手工业类型的工业,即手工业者作为独立的小作坊主,拥有工作作坊、工具和原材料,在出口业中已经基本上被外包制所代替。在外包制的初期,商人资本家为独立的手工业者提供原材料并支付一定费用,以使其将原材料制成成品。这样,虽然产品是在各自独立的作坊里进行加工,但是资本家却获得整个生产过程中的全部产品。在外包制的后期,商人资本家拥有工具、机器,并通常拥有进行生产的工场。商人资本家雇佣工人使用这些工具,提供原材料并占有全部成品。

工人不再将成品出售给商人,而只是出售其劳动力。纺织业是外包制最先发展起来的行业。织工、旋工、漂洗工和染匠不得受雇于商人资本家以养活自己和家庭,而商人资本家出售工人生产产品的价格必须足以在支付工人的工资和其他开支之后,仍可带来利润。

资本家的控制于是扩展到生产过程之中;同时,出现了很少或没有资本、只能出售自己劳动能力的劳动力阶层。这两个特征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出现。一些作家和历史学家认为资本主义是随着贸易、商业和商业精神的扩展并在欧洲变得更加重要而出现的。但是,贸易和商业在整个封建时期都一直存在。然而,只要封建传统仍是生产的主要组织原则,贸易和商业在实际上就处于社会和经济体制之外。市场和对货币利润的追求替代了习俗和传统,决定了是谁在做什么、怎么做和工人是否能够找到工作养活自己。当这些发生时,资本主义制度就建立起来了。<sup>6</sup>

只是在16世纪,这种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由出口贸易延伸到经济的其他许多领域中时,资本主义才成为主要的社会关系。这种制度的演变必须打破封建庄园中自给自足的经济,根本破坏或摧毁庄园的习俗和传统。农业必须成为资本主义企业,工人将其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资本家出于对利润的追求而购买工人的劳动力。

资本主义纺织工业早在13世纪就出现在比利时的法兰德斯。由于各种原因,这种工业由兴旺开始衰退,从大约1280年开始,它所造成的贫富差别导致了一系列激烈的阶级斗争,这些斗争几乎完全摧毁了这个行业。14世纪开始,资本主义纺织业在佛罗伦萨兴盛起来。如同在法兰德斯一样,不利的商业环境导致了贫困的工人阶级和富裕的资本家雇主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紧张局势最终导致了1379~1382年的激烈的暴乱。由于不能解决这些阶级之间的对抗,佛罗伦萨纺织工业如同法兰德斯纺织工业一样,急剧衰退。

15世纪,英国控制了世界纺织市场。其资本主义纺织工业通过使该工业农村化而成功地解决了阶级冲突的问题。鉴于法兰德斯和佛罗伦萨早期资本主义纺织工业一直以人口稠密的城市为中心,工人被集中在一起,因此,极易组织起来进行反抗,英国的纺织工厂散布在各地的农村,这意味着工人被分散开来,因而有效的反抗没有组织起来。

然而,以后的制度,即富裕资本家雇佣一无所有的手工业者,却经常出现在城市而不是在乡村。从一开始,这些资本家企业就力求垄断从而为其产品销售创造需求。行会制度的兴起,即商人资本家雇主联盟,为保护这些雇主而设立了层层障碍。各种各样的学徒制给予富家子弟的特殊权利和豁免权,高额会员费和其他障碍阻止了有抱负的贫穷手工业者与资本家竞争从而进入新兴资本家阶层。的确,这些障碍一般导致贫穷手工业者及其后代转化为以出卖劳动力为唯一生存方式的新兴城市工人阶级。

### 庄园制的衰微

然而,早在完善的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以前,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的力量已经渗透到乡村的庄园这个封建主义的据点。这是随新兴贸易城市中人口的大量增长而完成的,而大批城市人口依赖乡村提供食品和出口工业中的大部分原材料。这些需求形成了农村—城市的专业化分工和乡村庄园与城市之间的大量贸易流。庄园主开始依赖城市提供制造品,并对商人出售的奢侈品有越来越多的需求。

庄园农民也发现他们能够在当地粮食市场交换剩余产品以换取货币,换回的货币可以作为购买其劳动服务的代偿金。<sup>7</sup> 代偿金通常使农民转变为独立的小商人。农民可能从庄园主那里租用土地,出售产品以支付租金并持有剩余收益。这种体制激励了农民更高的生产积极性并因此增加了其剩余产品的销售,这样一来又会导致更多的代偿金和更多销售,如此循环下去。代偿金制与庄园传统之间的联系是一个逐渐分离的过程,它形成了市场和以追求利润为组织原则的生产。到14世纪中叶,在欧洲的许多地方,货币租金超过了以劳动力提供服务的价值总和。

与代偿金制紧密相联并将市场带进乡村的另一种力量,是庄园主土地的转让。需要现金以交换产品和奢侈品的庄园主开始将他们的土地租借给农民,而不是将土地直接投入传统的义务劳动生产之中。这一过程导致了庄园主越来越近似于现代意义上的地主。实际上,庄园主经常成为“不在地主”(absentee landlord),因为许多庄园主移居城市或因参加战争而离家在外。

然而,庄园制的解体更直接地源于14世纪晚期到15世纪的一系列大灾难。法英百年战争(1337~1453)在这些国家制造了混乱和不安,黑死病更加具有毁灭性。1348~1349年大瘟疫前夕,英国人口约为400万。而15世纪早期,经过战争和瘟疫,英国人口



减少到250万。这一现象在其他欧洲国家也相当普遍。人口减少引起了劳动力极度短缺,劳动力工资迅速上涨。由于土地变得相对充足,所以土地租金下降。

这些事实导致了封建贵族试图取消他们所授予的代偿金制而重新恢复农奴和农民的义务劳动制(所谓农民是指从封建束缚中获取了一定独立和自由的前农奴),但是他们发现时光不能倒流。市场已经渗透到乡村,随之而来的是农民更多的自由、独立和繁荣,他们艰难地反抗恢复旧的义务劳动制,其反抗却阻力重重。

结果发生了从14世纪晚期一直延续到16世纪早期席卷整个欧洲的著名的农民大暴动。这些暴动极其残忍和凶猛。当时的一位法国作家描写了一群农民杀死了一位“骑士并把他叉起来,当着他的妻子儿女的面在火上烤他。这些人中的10~12个人强奸这位骑士的妻子并强迫她吃自己丈夫的肉。然后,他们杀死了这位骑士的妻子和她的儿女。这些残暴的人到处摧毁房屋和牛棚”。<sup>8</sup>造反的农民也被贵族以同样的、甚至更为残忍的方式大肆杀戮。

14世纪晚期到15世纪,英国经历了一系列这样的暴动。但16世纪早期发生在德国的暴动也许是最血腥的。1524~1525年的农民暴动被神圣罗马帝国国王的军队镇压,成千上万的农民被屠杀,仅在德国一地就有十多人被杀。

我们在此提及这些暴动是为了阐述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制度中经济和政治结构的根本变迁经常是经历过痛苦和猛烈的社会冲突之后形成的。任何经济制度都产生一个或几个特权阶级,后者与该制度共存共荣,这些阶级当然会极力反抗任何变化以保护自己现有地位。封建贵族进行了反对新兴资本家市场制度的野蛮斗争,但是变革的力量将他们无情地抛到一边。尽管是新兴商人和小贵族发动了这些重大变革,但农民却成为随之而来的社会巨变的可怜牺牲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常常为维护社会现状而前仆后继。

## 工人阶级的产生

16世纪早期是欧洲历史的分水岭,标志着旧的腐朽的封建秩序和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模糊分野。1500年以后,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变革更为频繁,这些变革相互推进并引致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诞生。最重要的变化是制造了工人阶级,他们被剥夺了对生产过程的控制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作为惟一的生存方式。西欧的人口数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相对停滞,在16世纪几乎增长了三分之一,1600年达到7000万。

伴随人口增长而来的,是早在13世纪就在英国出现的圈地运动。由于日益增长的对现金的需求,封建贵族将以前的公有草地围起来,或者说圈起来放羊,以满足英国兴旺的毛纺业和纺织工业对羊毛的需求。而羊可以带来好价钱,而且牧羊对劳动力的需求极小。

圈地运动在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达到顶峰,当时一些地方四分之三甚至十分之九

的佃农被迫离开农村到城市寻找出路。不断兴起的圈地运动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圈地运动和人口增长进一步摧毁了残存的封建纽带,制造了一大批新的劳动力——丧失了土地、没有任何生产工具、从而只有靠出卖自己劳动能力的劳动力阶层。这种向城市的迁移意味着为资本主义工业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为军队提供了更多的人员、更多的新殖民地开发者、更多的产品潜在消费者和购买者。

但是圈地运动和人口增长并不是新兴工人阶级的唯一来源。无数农民、自耕农和小贵族由于货币租金增长过高而破产沦为工人阶级,还有其他许多人由于无法偿还债务而沦为工人阶级。在城镇,行会与其会员的收入水平有越来越多的关联。显然,行会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们尽力减少会员人数以垄断技术和增加收入。由于行会越来越专断,从而使得越来越多的城市生产者被剥夺了独立生产的能力。这样,城镇中出现了相当比例的新兴工人阶级。

大多数农民和手工业者因此而被迫背井离乡,丧失了先前的生产资料而沦为流浪者和乞丐。一些人甚至试图在城乡边缘的闲置地上开垦种植以维持生计。残酷的镇压法规因而被制订出来,禁止此类开垦并禁止成为无固定职业的流浪汉<sup>9</sup>。因此,当武力、欺诈和饥饿不足以形成新兴的工人阶级时,苛刻的法规和政府压制就被采用了。

### 向资本主义转化的其他力量

在向资本主义转化的过程中,其他变革也同样发生了作用。其中包括 16 世纪人文主义思想意识的觉醒,这促进了科学进步,这些科学进步迅速被用于实际的航海活动。望远镜和指南针使人们能够更加精确地远航,从而开创了“探险时代”。在很短的时间里,欧洲人就绘成了到印度、非洲和美洲的海上航线图。这些发现有双重重要性:首先,导致了贵重金属迅速和大量地涌进欧洲;其次,把世界带进殖民主义时代。

1300~1500 年之间,欧洲黄金和白银生产不景气。资本主义贸易的迅速发展和市场向城乡的扩展引起货币极度短缺。由于货币主要是金币和银币,因此产生了对黄金和白银的大量需求。从 1450 年开始,葡萄牙开始在非洲黄金海岸攫取这些金属以后,这种情形有所缓和,但这种短缺一直持续到 16 世纪中叶。此后,黄金和白银从美洲大量流入,欧洲经历了历史上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的通货膨胀。

16 世纪,欧洲不同的地区和国家的价格上涨了 150% 到 400%。生产产品的价格比租金和工资上涨速度更快。实际上,这种价格和工资之间的不一致一直持续到 17 世纪晚期。这意味着由于收入低于支出,地主阶级(或封建贵族)和工人阶级都成为受害者。资本家阶级是价格革命最大的受益者。因为他们可以支付较低的实际工资,并由于盘存货物大幅增值而获得越来越多的利润。

这些日益增长的利润被累积起来作为资本。资本意即进行生产、贸易和商业所必需的物质,它包括所有的工具、设备、工厂、原材料、加工过程中的货物、运输方式和货币。任何经济制度中都存在物质生产资料,但只有在存在于商品生产和私人所有得以滋生的社会关系中,它们才能转化为资本。因此,资本不仅仅指简单的物质产品,同时也包括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关系。如前所述,我们已经探讨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标志性特征是拥有资本的资本家阶级的存在。正是由于拥有了资本,资本家阶级才能够获取利润。这些利润然后又重新投入生产以获取更多资本。进一步的资本积累带来更多利润,从而导致新一轮积累,如此循环下去。

“资本主义”一词很好地描述了这种旨在追求利润和资本积累的制度。对资本的拥有是利润的源泉,因此,也是进一步资本积累的源泉。但这种“鸡—蛋”的过程必须有一个开始。资本最初的规模积累,即资本原始积累发生在我们研究的这段时期之中。资本最初积累的四个最重要源泉是:(1)贸易和商业额的迅速增长;(2)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出现;(3)圈地运动;(4)大幅度通货膨胀。此外,还有其他资本原始积累的源泉,其中有些并不光彩而常常不被提及——例如殖民掠夺、海盗抢劫和奴隶贸易等。

16世纪到17世纪之间,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成为最主要的生产方式。虽然这还不是现代形式的工厂生产,但是这种制度提高了专业化程度并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造船业和航海业的技术改进也降低了运输成本。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贸易和商业在此期间迅速发展。新的资本家阶级(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逐渐取代了贵族成为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主导阶层。

新的单一民族国家的出现标志着社会新的主导阶级的形成。新王朝通常依靠资本家阶级的支持来打败其封建的竞争对手,并将国家统一于一个中央集权之下。这种联合使商人摆脱了封建制度、规章、法律、度量衡和货币的束缚,巩固了市场,并为商业投机提供了军事保护。作为回报,君主从资本家那里取得财政收入。

虽然英国名义上统一的时间要早得多,但直到亨利七世(1485~1509)建立图特王朝,英国才达到了实际上的统一。亨利八世(1509~1547)和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正是因为有代表城镇中产阶级的国会的支持,才得以完成国家的建立。在1648~1688年的革命中,国会的统治即资本主义中产阶级的统治被最终确立起来。

在此期间,其他重要的早期资本主义单一民族国家也应运而生。法国的路易十一(1461~1483)是自查理大帝以来有效地统一了法国的第一位国王。1469年亚拉贡(Aragon)的斐迪南(Ferdinand)和卡斯蒂尔(Castile)的伊莎贝拉(Isabella)的联姻和他们随后对摩尔人战争的胜利使西班牙成为统一的国家。第四个重要的早期资本主义单一民族国家——荷兰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Netherland)直到1690年才将西班牙统治者驱逐出去而最终获得独立。

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早期,英、法、西班牙和低地国家(包括比利时和荷兰)的大多

数大城市都转化为商人资本家控制的兴盛的资本主义经济地区,商人资本家不仅控制了商业,而且控制了大部分制造业。在这些现代单一民族国家中,结成联盟的国王和资本家从封建贵族手中攫取了许多领域的控制权,特别是与生产和商业相关领域的控制权,这一早期资本主义通常被称为重商主义(mercantilism)。

## 重商主义

早期重商主义通常被称为重金主义(bullionism),因为这一时期,欧洲经历了黄金和白银的极度短缺,没有足够货币来支持迅速增长的贸易额。重金主义政策旨在将黄金和白银吸引进来并禁止其出口。这种限制从中世纪晚期一直延续到16至17世纪。

西班牙作为美洲黄金最大的输入国,采取了最长时间的重金主义限制政策,并对黄金和白银输出者处以死刑。但是贸易需求极其迫切,进口国外商品又具有极高的利润,所以即使在西班牙,商人资本家仍然贿赂腐败的官员,偷偷将大量金属货币运出国外。西班牙金属货币在整个欧洲迅速蔓延开来。这与我们早先描述的长期通货膨胀有很大的关联。直到16世纪中叶,英国和荷兰废除重金主义限制政策之后很久西班牙才将黄金和白银出口合法化。

重金主义之后,重商主义者仍然希望将国内黄金和白银的持有量最大化,因此他们通过政府采取措施以保持贸易顺差,即保持进入国内的货币超过流出的货币。所以,国家鼓励出口、航运业和保险(国内出口由外商支付),同时限制进口、国外进口国内支付的航运业和保险业务。

增加出口和减少进口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是设立贸易专利权。例如,在英国,如果只有一个而不是几个英国商人相互竞价与外国商人展开贸易,那么,就能够购买到便宜得多的商品(譬如从落后地区)。同样,如果只有一个英国卖主而不是几个英国卖主竞价,用以吸引彼此的客户推销货物商品,英国商人就能够以较高的价格出售其商品。

英国政府能够禁止英国商人在建立了贸易专利权的地区彼此竞争,但却很难禁止法国、荷兰或西班牙商人在以上地区同英国商人竞争。各国政府试图通过建立由母国控制的殖民帝国,排除外国竞争者来确保贸易垄断,殖民地能够为母国提供廉价原材料并购买母国昂贵的制造品。

除专利权制度之外,所有的西欧国家(除荷兰外)均实行大量的进出口法规。这些法规在英国最为繁复,英国对难以与国外对手竞争的出口商办理返程手续,如果这还不能使本国产品具有足够的竞争力,则给予补助金。对大批原材料出口则实行征收出口税制度以保证原材料留在英国国内。因此,英国商业生产者对这些原材料所需支付的价格被降到最低。有时,当英国原材料供应短缺时,国家会完全禁止其出口。英国纺织工业一直受

到这种政策的保护。18世纪早期,英国纺织工业出口将近占英国出口总额的50%。英国禁止纺织业所需的大多数原材料和半成品,例如羊、羊毛、毛线和绒线的出口。

限制进口的措施也在广泛开展。一些商品被禁止进口,其他一些商品被课以重税以使其从贸易领域退出。特别的重点放在保护英国主要出口业免受国外竞争者染指该出口业国内市场。

当然,这些限制措施有利于一些资本家而对另外一些资本家则产生了不利影响。可以预料,特殊利益集团联盟总是试图维持这些限制措施或以不同方式将这些措施运用于不同领域。例如,1651年和1660年的英国航海条例,旨在提高进出口贸易中对英国船只的使用率(英国制造和英国配备人员)。外贸和航运业的所有这些规章制度都是为了支持货币的输入和减少货币输出。毋庸置疑,许多措施也是源于特殊利益集团的呼吁和压力。

除了这些外贸限制,国家也制定了复杂的限制和法规以控制国内生产。除了免税、补助金和其他鼓励重要行业出口商大批生产的优惠政策,国家还针对生产方式和生产货物的质量制定了大量的规章制度。法国路易十四期间,编纂、集中和扩展了旧的行会分权控制制度,其内容包括对特殊的生产技术采取强制性措施,采取了大量的质量控制措施,并由巴黎指派视察员监督地方施行这些政策。路易十四著名的大臣和经济顾问柯尔培尔(Colbert)负责制定各种具体法规及实施细则。例如,在纺织业中,政府甚至严格限制每匹布的宽度和所含纱的具体支数。

英国的技工条例(1563年)有效地将旧手工业行会的职能转移到国家手中,这导致了对产业工人培训、雇佣条件和各行业劳动力分配的中央集中控制。英国这一时期也实施对有关工资、商品质量和国内生产其他细节问题进行管理的法规。

很难准确清楚地区分究竟有多少重商主义思想是旨在增强国家的权力,又有多少是为了保护资本家特殊利益。这种区分也不是十分重要,因为大多数重商主义者认为促进国家利益的最好方式是制定增加商人资本家利润的政策。更让人感兴趣的是贯穿在本书中的重商主义的观点:利润的本质和源泉究竟是什么?我们在下一章将讨论这一问题。

#### 注 释

1. 有关对中世纪经济和社会的更完整探讨,请参见 J. H. Chapman and Eileen E. Powers, eds., *The Agrarian Life of the Middle Ages*, 2d ed.,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1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2. Lynn White, Jr.,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2), pp. 71~72.

3. Harry A. Miskimin, *The Economy of Early Renaissance Europe, 1300~1460*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9), p. 20.

4. 有关封建统治阶级不断增长的矛盾的具体历史事例和随后商业增长之前封建主义的社会经济恶化的情况,请参见 Jane K. Beitscher and E. K. Hunt, "Insights into the Dissolution of the Feudal Mode of

Produc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40, no. 1 (1976): 57-71.

5. 有关贸易和商业兴起的更完整的研究, 参见 Dudley Dillar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 Atlantic Communit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7), pp. 3~178.

6. 参见 Maurice H. Dobb,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46), 特别是第四章有关内容。

7. 代偿金涉及农奴替代劳动服务所需支付的货币租金问题。

8. N. S. B. Gras, *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Europe and America* (New York: Appleton, 1940), p. 108.

9. 参见 Dobb,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ch. 6.

## 第 2 章 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

在重商主义初期阶段,多数生产仍由拥有并控制其生产资料的工人从事。资本家主要是商人,而他们的资本也主要由货币和将要出售的存货构成。所以,重商主义作家理所当然把交换或买卖视为利润的来源,当然,这些利润与部分构成剩余价值的商品进行交换。但在这一阶段,商人并不是通过控制生产过程而分享剩余价值的,封建庄园主仍然普遍控制着生产并剥削剩余,商人与庄园主之间交换的结果是两者共同分享剩余。因此,从商人的角度而言,利润来自交换而非生产。

商业资本由用以从事买进、运输和卖出的财富所有权构成;而产业资本则由生产所必需的财富所有权构成。这一阶段产业资本依然无足轻重、不引人注意,而商业资本则普遍而重要。因此,并非智力或理论缺陷导致重商主义作者将流通而非生产视为利润的源泉,他们的思想反映了其所处时代的经济现实。

### 早期重商主义有关价值和利润的著作

当商人卖出商品的价格高到足以弥补买入该商品所支付的价格、加上转运、储存、运输和卖出商品的所有费用、再加上超过并高于这些费用的剩余时,利润自然会使商业资本增加。这种剩余是商人的利润。因此,理解商品买卖的价格决定因素对于理解商人的利润至关重要。

中世纪早期的思想家曾经断言,商品的价格应当足以弥补手工业者的直接生产成本,并使其劳动耗费得到的收益足以使他维持传统上认为合适的生活方式。换言之,价格应由生产费用决定,其中包括付给工匠劳动的估算的适当酬劳。<sup>1</sup>

早期重商主义者通常放弃了这种理解价格的生产费用方法,而专注于售卖以分析交换价值。一位研究重商主义思想的学者总结道,尽管对具体问题存在一系列广泛歧义,有三个重要概念贯穿早期重商主义者关于价值论的大部分著述。首先,商品的“价值”或“自然价值”只不过是实际市场价格。第二,供给和需求的力量决定市场价值。第三,重商主义者通常把“内在价值”或使用价值作为决定需求的最重要因素,并从而是市场价值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sup>2</sup>

尼古拉斯·巴邦(Nicholas Barbon)是最重要的重商主义作家之一,他在《论商业》这本小册子中总结了三点:

1. 商品的价格就是它的现在价值……市场是价值的最好的公断人;通过买卖双方的集合,商品的数量以及对商品的需要都知道得很清楚:商品能够卖得的价格恰等于这些商品的所值,按照古典的说法就是:东西能卖出多大价钱,它就只能值多少(Valet Quantum Vendi Potest)。

2. 商品的价格就是它的现在价值;它取决于对商品供需情况的估计。……当商人买进商品以后,他不可能知道他将要卖得多少钱,因为商品价值是取决于供需之间的差额;尽管这是商人首先要注意的事情,但由于它取决于这么多的情况,因而是无法知晓的。所以,如果商品充斥,尽管价格降低,这时商人将它们贮藏起来,直到商品消费到一定数量,价格就又上涨了。

3. 一切商品的价值都取决于它们的用途;没有用处的东西就没有价值,正像英国俗语所说的:毫无裨益(good for nothing)。各种东西的用处,就是满足人们的欲望和需要:人类生来就有两种普遍的欲望,一是肉体的欲望,一是精神的欲望,世界上的一切东西能满足这两种需要,就有用处,从而才有价值。……一切商品的价值都取决于其用处,而它们的贵贱则取决于其数量的多少。<sup>3</sup>

巴邦的小册子写于人们的经济观点开始经历激烈转变的时期,上述引用的几段反映了他们认为利润主要产生于交换行为的早期重商主义观点。他们的利润有两大来源。第一,16世纪和17世纪的通货膨胀(前一章讨论过)造成的局面是所持存货的价值通常大大升值。在商人买进商品和卖出商品的时间差内,这些商品价格上涨导致意外获利。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在一国的不同区域或世界不同地区从事生产的条件不同,再加上在这些地区资源、技术和劳动力流动性很差,导致商品相对价格在不同区域和国家存在巨大差异。这样,商人会在商品相对低廉的地区或国家买入某种商品,然后在相对昂贵的地区或国家卖出。

在这种情况下,商人依据市场价格而不是生产条件设想商品价值就不足为奇了。而且,他们认为导致商品市场价格差异的原因是人们购买具体商品的不同意愿和愿望,这是非常自然的。商人考虑供给因素,仅仅因为他们发现当人们购买一种商品的愿望一定时,



如果供给短缺则价格较高,如果供给过剩则价格较低。正因如此,大的商业公司都寻求国家创建并强制实施的垄断。

商人间的竞争不可避免地导致相对价格差异缩小,从而导致他们的利润减少。如果某种具体商品在某个特定区域要价特别高,那么,商人以低价买进这种商品并运到这个区域卖出,就会赚得大笔利润。然而,这种利润必然诱使其他商人在同一区域出售同一商品。但是,商人越多意味着供给越多,这会使价格变低、利润下降。因此,大的商业公司不遗余力地排除竞争者以维持垄断特权。

对早期重商主义者而言,控制影响商品供给的条件似乎是获得并维持高额利润的主要手段。但在重商主义初期社会观念还未发生转变,直到后来这种仅仅为利润而无止境地追求利润的观念才被认为是可宽恕的和正当的。政府动机及其促进商业利润政策的理论解释与表现 19、20 世纪资产阶级政府特征的动机和理论解释截然不同。

重商主义初期,在为重商主义政策所作的理论辩护与支撑中世纪经济秩序的早期思想方式间还存在着某种思想方式的连续性。后者的理论基础是基督教家长式统治伦理,这种伦理观在上帝选择富人作众人物质财富仁慈管理者的假设下,认可财富占有的极端不平等。<sup>4</sup> 罗马天主教会是这种家长式统治得以实现的机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教会势力越来越微弱,崛起中的民族国家政府越来越强大。重商主义初期,经济学家越来越认为国家应该代替中世纪教会作为对公众福利进行监管的机构。

亨利八世统治期间,英国与罗马天主教会决裂。这一事件意义重大,因为它标志着中世纪教会各种功能的最终世俗化(至少在英国是如此)。亨利统治期间,“国家以上帝君主政体国的形式,承担起传统万能教会的角色和功能。而亨利以他直率的方式所做的一切就是认可这个世界的进程”。<sup>5</sup> 在亨利八世、伊丽莎白一世、詹姆斯一世和查尔斯一世(1558~1649)统治期间,社会呈现普遍动乱。这种动乱由贫困引起,贫困多半由失业造成,而失业又主要由圈地运动引起。

然而,普遍动乱的另一个原因是 16 世纪后半叶毛织品出口量减少,它还造成英国最重要的制造业产业中出现大规模失业。商业危机也经常发生,这种商业危机类似于后来商业周期中的萧条阶段,只是不具有类似的规律性。除了上述所有因素,季节性失业致使许多工人一年长达 4 个月无工可做。

人们不能再指望罗马天主教会把他们从普遍的失业和贫困中解脱出来。对教会权力的破坏使有组织的慈善制度瓦解,而国家试图为社会整体承担福利责任。为承担起这种责任,“英国的统治者通过确立生产和销售标准的具体细则,着手制定重组、改组工业的总体协调方案”。<sup>6</sup> 所有这些措施都旨在刺激英国贸易并缓解失业问题。

事实上,希望实现充分就业似乎是重商主义作家倡导的多数政策措施的一致主题。重商主义者更偏向那些旨在促进国外贸易而不是国内贸易的措施,“因为他们相信,国外贸易对就业、国民财富和国家力量的贡献更大。1600 年以后的重商主义作家强调了出口

盈余带来的通货膨胀效应和由通货膨胀导致的相应就业增加”。<sup>7</sup>

此间,颁发垄断特许权是所采取和鼓励产业发展的其他措施之一。第一个重要的特许权于1561年即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颁发。赋予垄断权是为了鼓励发明和创建新产业。正如人们预料的,这些权利被严重滥用。此外,它们还导致了特设特权以及庇护权的复杂体系和其他诸多弊端,这使大多数重商主义者极其愤怒,其程度正如类似的权利滥用使19世纪后期的美国改革家极其愤怒一样。垄断的诸多弊端导致了1624年《垄断法》的出台,该法规定,除了赋予真正的发明或有助于促进收支盈余的垄断之外,所有其他垄断一概不合法。由于条文漏洞百出,垄断的滥用依然几乎不受限制。

《手工业者法令》(1563年)详细规定了雇佣条件和学徒时限,为周期工资评估作了准备,并确定了可支付给劳动者的最高工资率。该法令的重要性在于它表明了如下事实,即王权的家长式统治伦理从来不会试图提升劳动阶级的地位。这个时期的君主感到有必要保护劳动阶级,但是,与他们中世纪的前任君主一样,他们又觉得那些阶级应维持原有地位不变。制定最高工资率是为了保护资产家,而且,设定这个最高工资率并强制执行这个法令的法官通常属于雇主阶级。由于在随后的年月物价总体上比工资上涨得快,所以,这些最高工资率很可能起了降低劳动者实际工资的作用。

1531年和1536年颁布的《济贫法》试图解决英国普遍存在的失业、贫困和苦难问题。第一个法令试图区分“值得帮助”和“不值得帮助”的穷人,只有值得帮助的贫困者才被允许乞讨。第二个法令规定英国领域内的每个教区都要对其穷人负责,而且,教区应该通过人们的自愿捐献维持一个贫困基金。事实证明这条法令作用非常有限,穷人问题日益严重。

最终,国家于1572年接受了贫困者必须得到来自税收基金的帮助这一原则,并且规定了一个强制“济贫税”。在1576年,关押“无可救药的游民”的改造所获准建立,还制定规则要求购买原材料以待那些驯良的游民和乞丐加工。从那时到16世纪结束,其他一些济贫法相继出台。

1601年《济贫法》得以出台是由于都铎王朝试图将这些济贫法整合到一个统一框架内,其主要条款包括正式承认贫民有接受救济的权利、课征以教区水平为依据的强制济贫税和给予不同种类的贫困者以差别待遇的条款。按照这个法令,老年人和伤病者可在家中接受救助;对那些年纪太小、还不能在某一行业中做学徒的贫困儿童允许其退出;按1576年法案的规定向“值得帮助的”贫困者和失业者提供工作;而“无可救药的游民”必须送到惩戒所和监狱。<sup>8</sup>

综上所述,英国重商主义时期,一般是以基督教家长式伦理观的精神接受“国家有义务通过接受并履行公众福利责任服务社会”这一思想。<sup>9</sup>这段时期颁布的各种法规“以这种观点为依据即贫穷并非个人的罪恶而是由经济制度决定的”。<sup>10</sup>这些法令承认,成为经济制度缺陷牺牲品的那些人,应该得到经济制度受益者的关照。

## 晚期重商主义著作和个人主义哲学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两方面的发展变化,使得重商主义观点越来越不能满足那时的新制度和多数重要资本家的需要。第一,尽管大贸易公司竭力维持垄断地位,商业发展和竞争加剧(尤其在民族国家自身内部)不断降低着不同区域和国家间的价格差异的相对大小。这就相应减少了纯粹利用价格差异就可赚取的利润。

第二个变化与前一个变化紧密相关,随着单纯得自价格差异的潜在利润减少,资本家对生产过程和商业控制的整合随之出现。这种整合来自两种动力。起初,商人通过创建生产制度(如上一章所讨论的)试图加强对生产的控制。然而,稍后不久,一种新的、根本上更为革命的发展状态出现了。早在16世纪,手工业者行会通过限制能成为师傅的学徒和熟练工数量,使行会逐渐变为一种旨在保护行会师傅社会地位及收入的相对封闭制度。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行会中的师傅逐渐变成生产过程的组织者和控制者,而不再仅仅是与学徒和熟练工一起工作的劳动者。这样,师傅逐渐转变成雇主和资本家,而熟练工逐渐变成纯粹的雇工,他们成为师傅的机会很小或根本不存在。

到了17世纪早期,这些生产者资本家开始转向贸易领域。他们很快构成英国经济生活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多布(Dobb)认为这种力量构成了“英国社会经济制度重心的一次重要转移”。<sup>11</sup>从一开始,这部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就经常同旧式商业资本家的利益相抵触。

这些具有深远影响的经济变化导致经济思想在两方面发生重要转变。首先,出现许多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思想家,他们拒绝关于国家和国家管理的陈腐的家长式统治观点,并且开始阐述新的个人主义哲学。其次,人们对价格和利润的看法从主要由供求关系尤其是由效用决定转变成价格由生产条件决定而利润主要源于生产过程。我们将依次考察这两种变化。

到了17世纪晚期,越来越多的资本家,尤其是那些崛起于手工业者行会的资本家,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受到那些最初使大贸易公司受益的错综复杂的重商主义限制和规定的严重阻碍;他们试图摆脱这些阻碍。陈腐的基督教家长式重商主义残余同样让他们厌恶,因为其谴责贪婪的营利性行为和积累财富的欲望。可是,正在迅速向生产和贸易各重要领域扩张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要求追逐私利、自私的营利行为能成功发挥作用。在这种背景下,论述人类行为的新理论开始出现,并断言自私、以自我为中心的动机如果不是促使人类采取行动的惟一动机,也是主要动机。

对人类行为的这种解释,在那一时期许多重要思想家的著作中都有表述。许多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宣称,每种人类行为都与自保(self-preservation)有关,并因此在最基本

的意义上是自私自利的。英国贵族罗伯特·费尔马爵士(Sir Robert Filmer)对许多人谈及的“人类的天赋自由是一种全新的、似是而非的、危险的、具有无政府主义含义的观点”<sup>12</sup>感到大为震惊。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1651年出版的《利维坦》中,犀利地表达了一个广为接受的观点——人的所有动机都源于任何能促进人的“至关重要动机”的愿望。霍布斯相信,人的所有动机,甚至同情,都只是许多被掩饰了的不同种类的自利(self-interest):“为他人的灾祸感到悲哀是怜悯,产生于假想类似的灾难可能降临到自己身上;并因此被称为……同情和……同情心。”<sup>13</sup>

在这一阶段,除了极少数从对贸易和制造业的广泛限制和管制中受益的特殊利益集团外,绝大多数资本家在追逐利润时深受国家规则的约束与妨碍。个人主义和自私原则得到这些人的急切认可,并开始从重商主义者中成为主导经济思想。一位谨慎的历史学家指出,“多数重商主义……政策假定自利支配个人行为”。<sup>14</sup>

绝大多数重商主义作家不是资本家就是拥有特权的资本家雇员。因此,这些人很自然地将资本家的动机普遍化。为古典自由主义奠定基础的个人主义哲学产生于资产阶级的人性观和他们要求免受广泛经济制约的需要,为反对欧洲从封建社会继承下来的秩序井然的家长式统治观点,他们断言“人应当是独立的、自我引导的、自立自由的观点,意即人应当是一个个人、应当是一个与社会大众截然不同而不是淹没其中的单元”。<sup>15</sup>

## 新教和个人主义伦理

产生于宗教改革的新教神学是这种个人主义和中产阶级哲学最重要的一种例证。新兴中产阶级资本家不仅想摆脱有碍制造业和贸易发展的那些经济限制,还想摆脱罗马天主教会对其动机和行为的道德谴责。新教使他们不仅免受宗教谴责,还最终把中世纪教会极其鄙薄的自私自利和营利性动机变成了美德。<sup>16</sup>

新教运动主要发起人在诸如高利贷和公平价格等问题上与罗马天主教会的立场十分接近,在许多社会问题上他们都表现得极为保守。1524年德国农民起义期间,路德(Luther)写了一本极其恶毒的小册子,名为《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书》。在书中他写道,君主们应该“打倒,扼杀,猛刺……这些正是君主们用流血而不是祈祷能得到永恒幸福的美好时光”。路德的主张对整体氛围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种氛围中十多万农民在宗教正义的借口下被屠杀。

然而,尽管新教教义的创建者有其保守主义的一面,但这种宗教观点依然对新个人主义哲学影响的扩大有所帮助。新教教义的基本教理是人因其信仰而不是依据善行而释罪,这为支持中产阶级从事商业实践提供了宗教基础。而罗马天主教会一直宣扬以人的善行赦免其罪,这通常意味着宗教典礼和仪式。依据罗马天主教的观点,没有人能只凭个

人自身的美德而赎罪。“依据善行赦免其罪……并不意味着个人可救赎自己,而是意味着他能通过教会获得救赎。因此也就是通过神职人员的权力,强迫忏悔、强制全人类苦修……连同不予赦罪的可能性共同赋予牧师一种可怕的权力。”<sup>17</sup>这些权力同时造成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的各项原则难以轻易废弃,且个人仍然依附于社会(由教会代表)的局面。

因信仰而释罪的新教原则断言动机比具体的行为或仪式更重要。信仰“只是来自心灵的真义”。<sup>18</sup>每个人都应当自我反省,以发现自己的行为是不是源于纯净的心灵和对上帝的信仰;每个人都不得不出自我判断。这种个人主义的、对每个人良心的信赖,对新兴中产阶级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具有强烈吸引力:

当16、17世纪日内瓦、阿姆斯特丹或伦敦的商人审视内心最深处时,他们发现上帝已经让他们从内心深处对私有财产怀有深深的敬意……这些人真切而强烈地感觉到,他们的经济实践尽管与旧式教会的传统法律相抵触,却并不触犯上帝。相反,他们崇拜上帝。<sup>19</sup>

正是通过坚持对上帝的旨意的个人自我解释,“清教徒努力圣化新兴经济过程”,并最终相信“上帝创立了市场和交换”。<sup>20</sup>然而,新教徒认为,他们希望每个人都笃信新教只是时间问题。新教教义与中世纪信条根本不同。新教教义强调,取悦上帝的最好方式是一定要做好世俗职业,并强调了勤奋和努力工作。

由于旧式基督教徒对财富的不信任被解释为对奢华和财富不必要的浪费行为的谴责,因此,新教伦理强调了苦行主义和节俭的重要性。一位研究宗教和资本主义联系的神学家对两者间的关系做了如下总结:

建立在持续的、系统的和有效的职业工作之上、作为获得某种救赎和使上帝荣光的最现成方式的宗教价值观,成为经济扩张过程中一个非常有力的介质。这种一方面对消费的严格限制、另一方面对生产的系统强化,只会导致一个结果——资本积累。<sup>21</sup>

因此,尽管加尔文和路德都不是新兴中产阶级资本家的代言人,但是在新宗教个人主义背景下,资产阶级找到了一种宗教,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个新的宗教下,“利润……逐渐被视为是上帝的选择,是他的恩惠的标志和职业成功的证明”。<sup>22</sup>

## 个人主义的经济政策

整个重商主义时代,这种新个人主义导致了对经济事务从属于国家意志的无数抗议。从17世纪中期开始,几乎所有的重商主义者都谴责国家授予的垄断和其他形式的保护以及国内经济(与国际贸易相对)特惠。许多人相信,在买者与买者、卖者与卖者、买者与卖

者相互竞争的市场中,如果价格不受干扰地自由波动并达到恰当(市场均衡)水平,则社会受益会极大。重商主义早期非常重要的一位作家约翰·海尔斯(John Hales)认为,农业生产力能得到最大改进,如果允许农民

从事农业获得比现在更多的利润,允许他们像从事其他行业的人一样自由地在任何时候向任何地方出售农产品。但是结果毫无疑问,谷物价格将会上升,特别是在刚开始而不是长期内;但是价格会吸引每个人从事农耕、开垦荒地,将牧场圈地变成可耕种土地;因为每个人都乐意经营能获得更多利润和收益的事业,因而,结果必然是对利润和收益的追求带来大量的谷物和财富;除此以外,还保证为我们带来大量其他粮食。<sup>23</sup>

从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初期,对国内生产和贸易的限制将会对每个利益相关者产生危害这一信条变得越来越普遍。在诸如马利尼斯(Malynes)、配第(Petty)、诺思(North)、罗(Law)和蔡尔德(Child)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关于这种观念的许多论述。<sup>24</sup>在这些人中,达德利·诺思爵士(1641~1691)或许是最早的个人主义伦理观的明确代言人,个人主义伦理后来成为古典自由主义的基础。诺思认为,所有人都主要受自私动机所驱动,要使公众福利达到最大化,就应该让他们不受干扰地在自由市场中相互竞争。而且,无论何时,当商人或资本家赞成管制生产和贸易的特别法时,“他们通常认为自身的直接利益与普遍的善恶衡量尺度等同。而且有许多人,为了在交易中获得一点利益,根本不在乎他人损失多少;每个人都力求为了自己的利润使所有其他人在交易中逆来顺受,但总是以公众利益作借口”。<sup>25</sup>诺思相信,彻底撤销那些授予特权的多数限制性法律最有益于公众福利。

1714年,伯纳德·孟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出版了《蜜蜂的寓言: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一个看似奇怪的悖论,即多数传统道德鄙视的罪恶,但是如果由所有人都来实践,则可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他坚持认为自私、贪婪和营利行为会对勤奋和繁荣经济有所裨益。这个悖论的答案在于,那些原本被中世纪道德主义者视为罪恶的动机,恰恰就是推进新兴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动力。依据资本主义时期新的宗教、道德和经济哲学,这些动机不再是罪恶。

整个重商主义时期,许多资本家努力摆脱在追逐利润时受到的约束。这些约束——仅有相对少量的旧式垄断性商业公司从中受益——源于家长式法律,这些法律是基督教家长式伦理的封建残余形式。这种伦理与新经济制度实在不相容,因为新制度建立在人与人严格的契约义务基础上而非传统人际关系上。无数新兴商人和资本家试图削弱旧式商业垄断的特权地位,并试图建立一种更有益于自由赚取利润的社会政治制度。投入大量资本于市场冒险事业的商人和资本家,不能指望依靠习俗的力量来保护其投资。他们当然也不可能具有早期重商主义特点的、错综复杂的政府干预的约束下有效地追逐利润。

只有在—个以保护财产权利和强制执行个体非人格化合同义务为基础的社会中,人们才能有效地追逐利润。在这种制度框架下,必须允许资本家自由追逐利润。深深植根于17、18世纪的新思想方式使这些动机和个体的关系合理化。同时,经济思想家解释价格和利润的本质与起源的方法也发生了同样重要的变化。

### 古典价格和利润理论的兴起

随着生产和商业一体化以及单纯利用价格差赚取利润越来越难,—种理解价格和利润新方法初露端倪。此间—位重要学者这样写道:“17世纪晚期,尤其在英国,早先用以分析价值的生产者成本法显示出明显的复兴迹象。人们日益强调生产成本,尤其是制造业生产成本。”<sup>26</sup>

—个明显的事实是:伴随“自由”劳动力的形成——大量被剥夺了必要生产资料控制权、并为生存而被迫出卖劳动力的生产者,赚取利润的关键是控制这些生产者。这种见解的典型表述来自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贸易通史》(1713年):“仅仅是人的劳动和勤奋创造了财富,并使……贸易对国家有利可图。”<sup>27</sup>在众多相关表述中,另—个有关这种见解的表述,可以在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的《大不列颠的语言》(1680年)中找到:“如果不是借助人物的勤奋,是不可能得到足够的财富储藏的……因此,人是最主要的、最基本的和最宝贵的商品,从人的身上可以榨取各种制造业品、船舶、财富、征服地和大片领地。”<sup>28</sup>

通过深化劳动分工,使劳动者专门从事—项或几项工作,资本主义工业开始实现劳动生产力的大幅提高;18世纪早期的经济思想家已经认识到对生产力的增长起作用的两个独立而重要的原理。第—,他们意识到,只有当劳动将自然资源转化成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后,它们才成为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第—,随着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程度的提高,很显然可以把商品交换看成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不同专业化劳动的交换。伯纳德·孟德维尔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点:

好像上帝安排—样,不同的国家有其独特的、最适宜的生产,即使—国内的不同地区也是如此。同样,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才智,适合于各种不同工业和生产。因此,商业——即—种商品或制造品与另—种相交换——对于人类是十分便利和有益的事情……为了便于交换,人类发明了货币,它也可以适当地叫做交换的媒介,因为通过货币,劳动得与劳动相交换,或—种商品得与别种商品相交换……—般来讲,贸易不是别的,不过是劳动与劳动的交换而已,—切东西的价值……都可以十分公正地用劳动来衡量。<sup>29</sup>

古典经济学家劳动价值理论的先驱无疑是1738年出版的名为《关于货币利息—般问

题的几点意见》小册子的匿名作者，这位作者断定：

[商品]互相交换时所依据的价值是由生产它们所必要的和通常耗费的劳动数量决定的；它们用来进行买卖，并用来和一个共同的交换媒介物进行比较的价值和价格，是受生产时所使用的劳动数量支配的，但同时也受交换媒介物或共同尺度的数量多少的支配。<sup>30</sup>

由此观点显然可以推出，如果劳动是价格最重要的一般决定因素，那么劳动必然是利润的源泉，因为利润得自商品的买卖。如果利润的获取以控制生产过程为条件，那么利润必然反映了生产所必需的投入品价格和所生产的产出品价格间的差异。整个这段时期，无数作者开始将利润视为扣除劳动者用于自身消费的必要商品后的剩余。1696年，约翰·卡里(John Cary)写道：“出口商品或多或少总是有利可图的，因为人的劳动增加了商品的价值。”<sup>31</sup>到1751年，这种利润源泉被视作扣除工人必要消费之后的生产剩余：

财富源于居民的多少……一国的人口越多，这个国家就越富有或可能越富有；因为……土地是最可感谢的，它给予劳动的回报不只是足够的而是充裕的……既然他们的一切所有都超过消费，剩余就成为国家的财富。<sup>32</sup>

但是，这些思想家对这一过程理解得不够清楚，以至于没能表明为什么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既可能是价格的决定因素，同时又可能是剩余价值和利润的源泉。在这种可能实现之前，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资本利润是一种增加给资本所有者的种类独特的阶级收入，因为所有权允许资本所有者控制劳动者的使用，而正是对劳动者的使用以大致同等比例增加了所有者资本的交换价值。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者罗纳德·L.米克(Ronald L. Meek)推断：

资本利润和取得这种收入的社会阶级，自然是几个世纪以来经济发展的最后产物。但是，只是到了18世纪后期，资本利润，作为一般新型的阶级收入，才能明显地同其他类型的收入区别开来，从而使经济学家们能理解它的全部意义，并能表述它的基本特征。<sup>33</sup>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其名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本书第一次对资本主义作了系统而广泛的分析，书中充分阐释了如上所述的对资本利润的理解。在下一章我们将考察斯密的思想。然而在此之前，有必要简要概括一下重农主义者的思想，该学派是18世纪法国的经济学派，他们的著作对经济学说的随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 重农主义者的社会改革思想

重农主义者由一群法国社会改革家构成，这些改革家同时又是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的理论信徒。他们的思想大多数都直接或间接来自魁



奈的《经济表》(Tableau économique)。<sup>34</sup>而他们对法国经济和政治事务的直接影响持续了大概二十多年,最终随着杜尔哥(Turgot)——重农主义者最具政治影响力的成员——在1776年失去法国财政大臣一职而结束。

重农主义者对法国的改革很感兴趣,那时的法国正遭受着主要由封建主义与商业资本主义各种最恶劣特征杂然结合所导致的经济和社会混乱。赋税混乱、低效、沉重且不公平;农业依然采用封建技术,规模小而低效,并仍然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特权的根源。政府是工业和商业领域内极其广泛而复杂的关税、限制、补贴和特权的制造者,所有这些导致了以法国大革命为终结的经济和社会混乱。

重农主义者认为社会由自然秩序支配,法国的诸种问题都是因为其统治者未能理解这种自然秩序从而不能对生产和贸易做出相应的安排所导致。魁奈提出了一个社会应如何构建以表现自然秩序性质的简单模型,以此模型为基础,重农主义者提出了政治改革措施:废除行会制度,以及取消一切现存的妨碍工业和贸易的关税、税赋、补贴、限制和管制。他们主张用大规模资本主义农业取代法国普遍存在的低效率的小规模农场。但是人们对他们的改革提议记忆最深的是他们建议所有的财政收入靠一种全国性的农业单一税来筹集(其原因会在下面的讨论中变得清晰)。

这些改革注定要失败,因为重农主义者虽然没有质疑封建贵族凭借土地获取地租的权力,但是,贵族阶层却非常明智地预见到重农主义方案会导致土地所有者阶级的贫困和资产阶级夺取控制权。以一个统治阶级取代另一个统治阶级的社会变革不可能经由改革完成。这需要革命,在类似重农主义者所拥护的那些变革实现之前,法国需要的是1789年的大革命。<sup>35</sup>

因此,重农主义者的影响主要在学术而非政治方面。魁奈《经济表》中所表述的一些思想后来在经济学文献中变得非常重要。本章以下篇幅将讨论魁奈具有重大影响的三大思想:(1)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概念和经济剩余;(2)各生产过程的相互依赖;(3)货币和商品周转及由货币窖藏引起的经济危机。

### 魁奈的经济思想

《经济表》所阐述的基本上是一个经济模型,这个模型表明了生产过程、货币与商品流通、以及收入分配。模型假设生产周期是一年一个循环,而且当年生产的一切产品,不是用于当年消费,就是作为来年生产的必要投入品。模型的中心重点是农业。例如,某一年农业部门的产出是50亿,<sup>36</sup>制造业部门的产出是10亿,总产出是60亿。其中有10亿直接用于补偿生产中损耗的耐用农业资本,剩下50亿为净产出。

耕种者将其中20亿农业产出留为己用。这其中包括下期生产所需的谷物种子、资本

家农场主的管理工资(利润)以及农场劳动者的工资。全部货币资本(20亿)在生产初期阶段掌握在资本主义农场主手中。他们用20亿的货币向地主阶级支付地租,这是整个生产系统的剩余收入。但由于地主阶级不具备任何经济功能,因此这是一种支付。

这20亿是农业部门生产的、超过生产者的消费及补偿农业产出生产中损耗的资产费用的一种剩余。重农主义者将这种剩余看作是自然的馈赠,并相信只有在与自然直接相关的采掘业和农业生产中,人类劳动才能生产出剩余。耕作者因此被看作生产阶级。制造品的生产者被看成是不生产阶级,不是由于他们不生产,而是因为他们产出的价值被认为与必要原材料成本加上生产者的必要生存工资相等。任何剩余或利润都不是制造业创造的。因此存在三个阶级:生产阶级(从事农业生产的资本家和工人)、不生产阶级(从事制造业的资本家和工人)以及有闲阶级(消费生产阶级创造的剩余的地主)。

当地主阶级获得货币地租后,《经济表》对所有交易作了非常详细的讨论,以表明农业和制造业部门的产品是如何分配或配置的、以及货币的平稳流通对于这种配置如何之必要。在整个过程结束时,如果总计所有的交易,我们发现经济回复到初始状态。每个周期中,制造业部门再生产出与所费投入等值的产出(原材料以及来自农业部门的必要消费);农业部门再生产出与其投入等值的产出(谷物种子、生存必要消费以及损耗的耐久性农业资产)和20亿的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被地主阶级占有,并用于农产品和制造品形式的消费。

这个模型说明:两个生产部门是相互依赖的,每个部门的产出都是另一个部门的必要投入。这种不同产业联系的技术依赖性(后面的章节我们还将予以讨论)为未来形式的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基础。该模型还表明,投入和产出的配置,要求持续的货币流通。重农主义者预言了后来马尔萨斯、马克思、凯恩斯和随后一些经济学家的阐释,即货币窖藏或发展瓶颈或货币流通过程不平衡会如何扰乱投入和商品产出配置并引起经济危机或萧条。

最后,尽管事实上所有后世的经济学家都排斥了经济剩余是自然馈赠这一命题,但是,将创造剩余价值的那些工人的劳动力归为生产性的而将不创造剩余价值的那些工人的劳动力归为非生产性的这种分类,是19世纪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基石。

## 小 结

总而言之,在亚当·斯密之前几乎没有经济学家提出过我们在下面几章中会看到的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同样连贯而详尽的分析。但是,这不是因为他们的智力比后继者逊色,而是因为他们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在那个时期,新生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与无数旧制度残余交织在一起。到18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已变得更加明显。自那以后,经济思想家能够愈益清楚地观察那些特征。而一旦资本主义完全成为西欧的主导经

济制度,后继的经济学家可以对前辈的经济思想继续加以构建和锤炼。

然而,读者会发现本章讨论的许多思想迄今仍然反复出现。尽管自16世纪以来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巨变,最初统治西欧社会,隐约可辨的社会、政治、法律和经济基础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依然如故。

#### 注 释

1. 参见 Ronald L. Meek, *Studies in 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 rev. e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6), pp. 12~14.

2. 同上书,第15页。

3. 引自上书,第15~16页。

4. 参见 E. K. Hunt, *Proerty and Prophet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5), pp. 8~11.

5.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The Contours of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Quadrangle, 1960), p. 36.

6. 同上书,第40页。

7. William D. Grampp, *Economic Liberalism*, 2 vol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6), vol. 1, p. 59.

8. 作为对关于济贫法的讨论的扩展,请参见 Arthur Birni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British Isles* (London: Methuen, 1936), ch. 12, 18.

9. Williams, *Contours of American History*, p. 41.

10. 同上书,第44页。

11. Maurice H. Dobb,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 Publishers), p. 134.

12. Lee Cameron McDonald, *Western Political Theory: The Modern Ag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62), p. 29.

13. 引自 Harry K. Girvetz, *The Evolution of Liberalism* (New York: Colliers, 1963), pp. 28~29.

14. Grampp, *Economic Liberalism*, vol. 1, p. 69.

15. McDonald, *Western Political Theory*, p. 16.

16. 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是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Scribner, 1958), and Richard H. Tawney,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Mentor Books, 1954).

17. Christopher Hill, "Protestantism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in D. S. Landes, e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Macmillan, 1966), p. 43.

18. 同上书,第43页。

19. 同上书,第46~47页。

20. 同上书,第49页。

21. Kemper Fullerton, "Calvinism and Capitalism: an Explanation of the Weber Thesis," in *Protestantism and Capitalism: The Weber Thesis and Its Critics*, ed. Robert W. Green (Lexington, MA: Heath, 1959), p. 19.

22. 同上书,第 18 页。
23. 引自 Grampp, *Economic Liberalism*, vol. 1, p. 78.
24. 同上书,第 77~81 页。
25. 引自 Robert Lekachman, ed., *The Varieties of Economics*, 2 vols. (New York: Meridian, 1962), vol. 1, p. 185.
26. Meek, *Labour Theory of Value*, p. 18.
27. 引自 Edgar S. Furniss, *The Position of the Laborer in a System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5), p. 16.
28. 同上书,第 16~17 页。
29. 引自 Meek, *Labour Theory of Value*, p. 41.
30. 同上书,第 42~43 页。
31. 引自 Furniss, *Position of the Laborer*, p. 19.
32. William Hay, 转引自上书,第 19 页。
33. Meek, *Labour Theory of Value*, p. 24~25 页。
34. François Quesnay, *Tableau économique* (London: H. Higgs, 1894); original privately printed (Versailles; 1758).
35. 对这个观点的详细的辩护,参见 Leo Rogin, *The Meaning and Validity of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57), pp. 14~50.
36. 我采用的是 Rogin, *Economic Theory* 第 20 页中用的术语,而不是魁奈用的术语。

## 第3章 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生于苏格兰,并且一生多数时间都在那里度过。他先后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和牛津大学学习(1737~1746),并于1751~1764年任格拉斯哥大学教授。1759年,他的两部主要著作之一的《道德情操论》出版,这是一篇关于社会哲学和道德哲学的论文。1764~1766年的两年时间他是在法国度过的,期间他与许多法国一流的知识分子——包括重农主义者的魁奈和杜尔哥——往来频繁。1776年,他最重要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通称《国富论》)出版。

斯密与他之前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不同,不仅因为他的学识和渊博的知识,还因为他提出了一个完整而又相对一致的有关资本主义制度性质、结构和运行的抽象模型。他清楚地认识到,在主要社会阶级、不同生产部门、财富与收入分配、商业、货币流通、价格形成过程和经济增长过程之间彼此存在着重要联系。他的许多政策建议都以他从模型中得出的结论为基础。无论从整体或从局部来考察,这种资本主义的系统化模型成为斯密之后大多数重要经济学家著作的特点。无论是考察其逻辑连贯性还是矛盾所在,斯密的模型让人感到一样有趣。斯密对现代经济思想具有开创性的影响,大多数19世纪或20世纪在学术上有尖锐冲突的经济学家都可以在《国富论》首次系统提出的那些概念中追溯到他们的重要观点。

### 斯密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在最终克服了封建主义的桎梏并度过了重商主义的过渡期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巅峰,并在大概肇始于18世纪后三十年和19世纪初、首先发生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

工业革命中异常明显地显示出其所固有的社会经济特征。这一生产方式在 19 世纪初期扩展到了西欧的许多地方。

1700~1770 年期间,英国商品的海外市场增长远比英国国内市场快得多。1700~1750 年,国内工业产量增长 7%,而出口工业产量增长了 76%;1750 至 1770 年期间,国内工业产量和出口工业产量的增长分别为 7%和 80%。这种迅速增长的对英国制造品的海外需求引发了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最终被证明是历史上人类生活极其重要的变革之一。

18 世纪的英国经济市场发育良好,传统的反资本主义市场偏见在人们的心态和意识形态领域已大为削弱。在当时的英国,以较低价格生产的制造品的产量越高,意味着利润会不断增长。因此,受不断增长的外国需求刺激,对利润的追求实际上导致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技术革新的爆发——这场革新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英国并最终改变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区。

在工业革命初期,纺织工业是最重要的。1700 年,政府禁止进口印度棉花,从而为国内生产者取得了一个受保护的国内市场。如上所述,增长的国外需求刺激了纺织工业的机械化。

更确切地说,纺纱与织造过程失衡导致了許多革新。手纺车的生产力比不上手摇纺织机,特别是 18 世纪 30 年代以后,飞梭的发明使织布过程大大加速。这种不平衡被随后的三项发明所逆转:首先是 1769 年发明的珍妮纺纱机,使一个人可以同时纺几根纱线;其次是 1775 年发明的水力纺纱机,它通过运用以不同速度运转的滚子,改进了纺纱工艺;最后是 18 世纪 70 年代后期发明的“骡机”,它综合了其他两种机器的特点,并利用了蒸汽动力。这些新发明可以在接近水力资源(后来是蒸汽动力)的工厂里得到很经济的应用。水力纺纱机的发明者理查德·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筹集了足够的资本开办了多家工厂,每家工厂雇佣 150~600 人不等。其他人争相效仿,使英国的纺织制造业迅速从农村手工生产转变为工厂生产。

钢铁工业也是促使工厂生产机械化非常重要的一种早期动力。18 世纪早期,英国的钢铁工业非常落后,自史前时期到那时木炭仍被用作熔铁的燃料。然而此时,铁矿附近的森林资源几乎完全消耗殆尽。英国被迫从瑞典、德国、西班牙和其殖民地进口生铁。1709 年,亚伯拉罕·德耳比(Abraham Darby)发明了从煤炭中炼制焦炭用于熔炼过程的工艺。尽管铁矿附近有相对丰裕的煤矿资源,直到 18 世纪后期(当对武器和军火工业的军事需要非常大时),钢铁工业才广泛使用焦炭。需求的增长导致搅炼法的发明,这一方法除去了焦炭中的残余炭。接着发生了一系列的革新,包括轧钢机、鼓风机、蒸汽锤和金属车削凸轮。所有这些发明导致钢铁和采煤业的迅速扩张,使钢铁机械设备在各种产业中的广泛应用成为可能。

许多其他工业中的企业家发现,如果他们增加产量并降低成本,就有获得更多利润的可能。在此期间,出现了“发明行为名符其实的爆发”:

18世纪后半期,对于技术革新的兴趣变得异常广泛。1760年之前的一百年时间里,每十年授予的专利数仅有一次达到102件,否则就在最低22件(1700~1709)和最高92件(1750~1759)之间波动。在随后的三十年时间中(1760~1789),专利平均授予数从18世纪60年代的205件增加到18世纪70年代的294件,到18世纪80年代则增加到477件。<sup>1</sup>

毫无疑问,蒸汽机的发明是所有这些革新中最重要的。工业蒸汽机早在18世纪初期就已引入,但是机械上的难题使其应用限制在从矿井中抽水。1769年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设计了一种规格如此精确以至于能将对活塞的直接冲击转变为旋转运动的蒸汽机。伯明翰的一位名叫布尔顿(Boulton)的工厂主与瓦特组成了合伙制工厂,利用布尔顿的经济资源,他们能够大规模制造蒸汽机。到了18、19世纪之交,蒸汽已代替水成为制造业的主要动力来源。蒸汽动力的发展导致了深远的经济和社会变革。

蒸汽机的发明这一重大事件,开始了工业革命的最后的、最具有决定性的阶段。蒸汽把那些还压在大工业身上的束缚解放之后,就有可能无限迅速地发展了。事实上,使用蒸汽并不像使用水那样必须取决于位置和当地资源等绝对条件,凡能获得公道价格的煤的地方,都可以安装蒸汽机。英国煤藏丰富,煤的使用在18世纪末已经增多了,那里特设的航路网有可能以很少的费用把煤运送到各处,全国已经变成一个特别易于工业发展的享有优惠的地方。工厂现在可以离开其原来孤立于水流岸边的曾在其中成长起来的溪谷了;工厂接近市场可以购买原料和出卖产品,移近人口中心可以招募人员;工厂将汇合集中起来形成一些巨大而黝黑的工业城市,蒸汽机将使无穷无尽的烟云飞翔在这些城市的上空。<sup>2</sup>

大工业城市的增长确实蔚为壮观。例如,曼彻斯特的人口数从1760年的17 000人增加至1831年的237 000人,到1851年其人口总数则增至400 000。制造品的产量在18世纪下半期大概增长一倍,19世纪初期增长更快。1801年,接近30%的英国工人从事制造业和采矿业;到了1831年,则增长至超过40%。因此,工业革命将英国变成了由巨大的城市制造业中心组成的、并且工厂体系已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其结果是生产力迅速增长,英国一举成为19世纪最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

亚当·斯密在工业革命伊始之际写作《国富论》的这一事实证明,19世纪初在众多大工业城市普遍存在的多种经济特征,在18世纪中期的英格兰和苏格兰某些城市中(特别是格拉斯哥)只是以某种方式呈现出来;同时证明斯密确实是一位非常敏锐的社会科学家。这一时期的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这样写到:“斯密观察他那个时代的工业组织,能很明显地视之为一种典型事物,而当今的一些经济史学家,在回顾同一历史时期时,却把它只看成一种特例。”<sup>3</sup>

18世纪中期,在许多商业和工业城市中(包括格拉斯哥),大量的生产是在被称为“手

工工场”(manufactory)的地方进行的。工场是一个生产中心,在这里资本家拥有厂房、生产设备、原材料,并雇用工资劳动者进行生产。工场能与工业革命后期的典型工厂相区别,因为在工场中劳动者一般运用传统的手工生产技术,而不是机械的组装线技术。

在手工工场里,资本主义工场主在经济上与商人和工资劳动者均不同。而且,在斯密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的巨大生产潜能已可以在这些手工工场里明显看出来。他们从事劳动分工的程度及其导致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给斯密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这种背景下,斯密是对产业资本、工资、地租利润和商业资本的利润加以明显区别的第一位重要经济学家。他还是认识到收入的三大主要组成部分——利润、地租和工资——相对应其所处时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三大重要社会阶级——资本家、地主和如果不出卖劳动力就会饿死的“自由”劳动者的意义的第一人。他不仅提出了一种历史理论——试图解释这种阶级社会的演进,还提出了一种社会学理论——用以解释三大阶级之间的关系。

### 斯密的史学和社会学理论

斯密的史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既包括对社会阶级冲突起源与发展的分析,又包括对阶级斗争中权利运用方式的分析。与此同时,贯彻这些理论始终的、斯密在其经济理论中讨论得非常完善的一个主题是:尽管每个人的行为或许是自私的、并严格以个人利益或所从属的那个阶级的利益为行动准则;尽管表面看来个人冲突和阶级冲突似乎是这些行为的结果,“自然法则”或“神的旨意”即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依然起作用,并指导这些表面上制造冲突的行为达成一种仁慈的和谐。“看不见的手”不是任何个人的刻意设计,而仅仅是自然法则系统运作的结果。毫无疑问,如果算不上是矛盾,这也是斯密著作中最重要的不一致之处。在第4章中我们会看到,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著作中也有相同的矛盾。正因为如此,19世纪和20世纪两大冲突的主要经济思想流派,其中一派强调社会冲突,都能在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中追溯其思想根源。

斯密的史学理论以这一命题开始,即人们生产、分配物质生活必需品的方式是任何社会中社会制度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更是社会成员间个人和阶级关系最重要的决定因素<sup>4</sup>。财产关系的类型对于一个社会政体的决定尤为重要。斯密认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经历了四个显著不同的阶段:狩猎、游牧、农业和商业。在各个阶段,理解一个社会生产和分配经济必需品的的方式,是理解其社会制度及政体的关键。然而,经济基础及其社会与政治上层建筑之间并非僵化的决定关系。斯密为地理和文化原因导致的地方和区域差异留了余地。所有的社会都主要地属于四个阶段中的某一个,尽管它们或许经历着一个过渡期,并同时呈现两个阶段特有的某些特征。可是,斯密并没有假定社会必然从一个阶段向下一个更



高阶阶段发展。只有当一系列适合的地理、经济和文化决定因素都具备时,进步性的社会演化才会发生。

斯密把狩猎阶段定为“最低级最粗野的社会状态。现今北美土人就是如此”。<sup>5</sup>在这样的社会中,贫困和生存的不确定所产生的平等,使得制度化的特权和权力形式不存在,因为缺乏这种特权和权力得以存在的必要经济基础。因此,“在这种状态下,当然既没有君主,也没有国家”。<sup>6</sup>

接下来的较高级阶段是游牧社会,“一个更为进步的社会状态,如鞑靼人和阿拉伯人的社会状态”。<sup>7</sup>这一阶段,经济能支撑更大的社会团体。生产建立在驯养动物的基础上,而放牧要求一种游牧生存方式。在这类社会中,我们首次发现了一种可以积累的财富形式——家畜。这样,对家畜的合伙拥有关系成为最早的财产关系形式,随着这种关系的出现,建立对特权和权力的制度化保护成为必要:

因此,大宗财产的获得,必然要求民选政府的建立。在没有财产可言的社会……就不需要设立这种政府。

一个民选政府,必先取得人民的服从。民选政府的必要程度,既是逐渐随财产价值的增大而增大,所以使人民自然服从的主要原因,也是逐渐随财产价值的增长而发展。<sup>8</sup>

然后斯密研究了“使若干人……对他们的大部分同胞有支配权利”<sup>9</sup>的情形和原因。他分析了不同社会背景下,使一些人制度化地、被迫服从其他人的一些特别决定因素。但是,有一种重要的决定因素是所有社会共有的:“就保障财产的安全说,民选政府的建立,实际就是保护富人来抵抗穷人,或者说,保护有产者来抵抗无产者。”<sup>10</sup>

第三种社会状态即农业社会,中世纪西欧封建经济多属此类。在这一阶段全社会定居在一个区域,农业成为最重要的经济行为。相应地,在依照其特权和权力区分阶级时,土地所有权成为最重要的财产关系。这一时期所有的土地“都被吞并了,其中大部分是被少数大地主所吞并”。<sup>11</sup>

大宗地产所有权是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的源泉,社会因此被划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统治者是贵族,而且被认为是先天就比被统治者优越。长子继承法阻止了大宗地产被分割,维护了统治阶级的权力:

当土地被看作不单是谋生的手段,而是权力强弱所系的时候,就被认为以不分割而专归于一人比较适当。在那些不安靖的时候,大地主同时都是小贵族。他的佃户,便是他的隶属。他们是他们的裁判官,是他们和平时节的立法者,亦是他们战争时节的领导人。<sup>12</sup>

斯密认为农业社会有两个特征尤为重要。第一,富裕贵族能够消费财富的方式受到严格限制:

在既无国外贸易又无精制造业的农村,一个大地主,对维持耕作者所剩余的大部分土

地生产物,既无物可以交换,就无所谓地将其花费于乡村式的款客。这剩余部分,若足够养活一百人,他即用以养活一百人,如足够养活一千人,他即用以养活一千人。舍此以外,实无其他用途。所以,他的周围常有成群的婢仆和门客。他们依赖他的给养,既无任何等价物为报酬,就服从他,像士兵服从国王一样。<sup>13</sup>

第二,这种经济组织方式必然导致贵族行使绝对权力,而绝大多数人民几乎没有权利也没有什么自由。因此,在斯密看来,绝大多数生产者权利的增多和自由度的扩展,是社会发展至最高或商业社会状态的两项最重要的改进。

根据斯密的观点,欧洲城市的兴起是导致社会发展的商业阶段确立的主要力量。这些城市依赖对外贸易,从而很大程度上在经济上独立于中世纪农业经济。而中世纪的庄园主允许独立城市的发展,是因为地租和其他能从城市获得的利益。城市中,新的政治氛围不断形成,使置身其中的生产者享有的自由比以往任何社会发展状态下都多。同时各种更为宽泛的财产权利也得到发展,这使生产者渴望为他们自己而不是大庄园主创造财富。这种更多的自由和安全触发了人类最强有力的动机之一——积累物质财富的愿望。

斯密认为天性已经在民众间制造了一种无处不在的幻觉:个人的幸福主要来源于物质财富。尽管斯密本人认为这种幻觉是错误的,但这种幻觉造成的人们对个人利益渴望而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后果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在讨论天性的欺骗时,斯密写道:

天性很可能以这种方式来欺骗我们。正是这种蒙骗不断地唤起和保持人类勤劳的动机。正是这种蒙骗,最初促使人类耕种土地,建造房屋,创立城市和国家,在所有的科学和艺术领域中有所发现、有所前进。这些科学和艺术,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使之更加丰富多彩。<sup>14</sup>

这里我们看到了贯穿斯密著作的主题:即人们受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而促进社会利益,但这种促进从来都不是出自他的本意或动机。

斯密认为,城市的增长通过创建一些使封建庄园主能用农业剩余交换制造品的市场而彻底改变了农村农业,并开创了社会的商业阶段——资本主义。对制造品的渴求,引发了圈地运动。斯密认为,这是因为中世纪农业效率一直非常低下。购买更多制造品的愿望使地主通过解雇不必要的佃农并“根据那时耕种和改良的不完全状态,将田间劳动者人数减至耕作所必要的数目”<sup>15</sup>来提高效率。

这也带来了斯密认为的资本主义最进步的特征——绝大多数生产者自由和安全的增加。当地主为了尽力提高经济效率时,纯粹自私的动机使他们废除了农奴制和奴隶制度,并允许这些先前的农奴和奴隶享有某些财产权和安全。斯密认为:“一个不能获得任何财富的人,除了尽可能多吃而少干之外,不会有其他兴趣。”<sup>16</sup>这样,一种看似开明而又道德的举动,事实上是“看不见的手”或“神的智慧”的又一个例子:“当天赋原则引导我们去促成那些纯真而开明的理性会向我们提出的目的时,我们很容易……认为那个理性是出

于人的聪明,其实它是出于神的智慧。”<sup>17</sup>

以商业为导向的农业效率的提高,不仅为城市的扩张、也为盈利制造业的持续扩张奠定了经济基础。在此意义上的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促进了有效率的资本主义农业生产,而后者又反过来刺激了前者的更快发展。这种互惠互利交换的增长使商业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得以产生,这被斯密认为是人类社会最高级、最进步的形式。但是,要再次强调,这一结果从来就不是其制造者的本意。借用斯密思想研究的一位主要学者安德鲁·斯金纳(Andrew Skinner)的话来说:

这样,一方面,他(斯密)认为所有者用他们土地的生产物交换制造品只是为了满足“十分幼稚的虚荣心”;而另一方面,商人和技工只是依照“能获利就获利”的(自利)原则行事。他还说:“没有人具有那种大变革的常识和远见,这种变革是人的愚蠢和勤劳所逐渐导致的”。我们再一次发现了斯密命题的典型例子,人们好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去促进并非他们原初本意的目的。<sup>18</sup>

斯密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财产所有权状况再一次成为主要阶级划分的依据。财产所有权决定了个人收入的来源,而收入来源是社会阶级地位的主要决定因素:

全部年产物,自然分解为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三部分。这三部分构成三个阶级人民的收入,即以地租为生、以工资为生和以利润为生这三种人的收入。此三阶级构成文明社会的三大主要和基本阶级。<sup>19</sup>

然而,在土地和资本还未被不同阶级所拥有的市场社会——一个工人们自身控制生产资料的社会中,“劳动的全部生产物都属于劳动者”。<sup>20</sup>斯密从未怀疑以下事实,即三个主要的社会阶级中,劳动阶级是价值和财富的惟一创造者:“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只有两个方法,一为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目,一为增加受雇劳动者的生产力。”<sup>21</sup>并且再一次强调:“世间一切财富,原来都是用劳动购买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sup>22</sup>

可是一旦一个小阶级开始拥有生产资料,凭借财产权,便获得了阻止工人生产的权力,直到他们占有工人劳动生产物的一部分:

资本一经在个别人手中积聚起来,当然就有一些人,为了从劳动生产物的售卖或劳动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上得到一种利润,便把资本投在劳动人民身上,叫他们劳作。所以,劳动者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就分成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另一部分支付雇主的利润。<sup>23</sup>

劳动生产物划分为工资和利润是在劳动者和资本家针对工资率大小的斗争中决定的:

劳动者的普通工资,到处都取决于劳资双方所定的契约。这两方的利害关系绝不—

致。劳动者希望多得，雇主希望少给。劳动者都想为提高工资而联合，雇主却想为减低工资而联合。<sup>24</sup>

但这种斗争绝不是平等的斗争。斯密毫不怀疑资本家是冲突中更有力的主导阶级。下面详加引述的一段，表明斯密识别出资本家控制工人权力的三个来源：他们的巨额财富使他们在产业冲突中能坚持得更长久；他们能控制并操纵公众舆论；而且他们拥有政府支持（必须记住，“政府的建立，实际就是保护富者来抵抗贫者”）这一无可比拟的优势。在斗争中，资本家和工人都会在各自内部彼此串通（用斯密的话来说，他们形成联合）以改善他们在阶级斗争中的处境：

但在一般的争议情况下，要预知劳资双方谁占有利地位，谁能迫使对方接受自己提出的条件，绝非难事。雇主的人数较少，团结较易，加之他们的联合为法律所公认，至少不受法律禁止。但劳动者的联合却为法律所禁止。有许多议会的法令取缔为提高劳动价格而联合的团体，但没有一个法令取缔为降低劳动价格而联合的组织。况且，在争议当中，雇主总比劳动者更能持久。地主、农业家、制造者或商人，即使不雇用一劳动者，亦往往能靠已有的资本维持一两年生活；失业劳动者能支持一星期生活的已不多见，能支持一月的更少，能支持一年的简直没有……雇主们为使劳动工资不超过……随时随地都有一种秘而不宣的团结一致联合……我们所以不常听说这种联合，正因为那是一种不被人知道的普通联合，或者说是一种自然联合。此外，雇主们为要把劳动工资减低到其实际工资率以下，有时也组织特殊的联合。此种联合，直到达到目的为止，总是保持极度的沉默与秘密。劳动者这时虽深切感到资方的这种秘密联合，却往往无抵抗地屈服，其他人因此都不知晓。不过，对于雇主的这种联合，工人们往往也组织对抗的防御性联合……他们的联合……总是闻名遐迩……他们处于绝望的境地，铤而走险，如果不让自己饿死，就得胁迫雇主立即答应他们的要求。这时，雇主也同样喧呼呐喊，请求官方援助，要求严厉执行取缔工人联合的严苛法规……工人的联合往往以为首者受到惩罚或一败涂地而告终。<sup>25</sup>

所以，斯密很清楚地认识到资本家、工人阶级之间冲突的突出重要性。他看出阶级划分的主要基础是土地或资本的所有权。他还看出，资本家的力量来自几个相关的源泉：他们的财富、影响公众舆论的能力以及其对政府的控制。

## 斯密的价值理论

尽管斯密从未提出过一种始终如一的劳动价值论，但他确实提出了许多思想，而这些思想后来成为大卫·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更为深奥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劳动价值论的起点，就是承认一切社会的生产过程能简化为一系列的人类劳动。与一些生活在自然

环境、而自然环境常常适合其生存需要的动物不同,人类如果不付出努力将自然环境改造得更适宜居住,通常将难以生存。人类生产力的进步通常与特定劳动过程的扩展或愈加精密相联系,这种劳动过程体现为创造某具体产品的结果,一般而言,这种提高了的生产力是制造新工具的结果。

当这些工具用于随后的生产时,对一些观察者,特别是某些当代经济思想学派而言,似乎工具本身部分地是随后生产的原因。因此,“资本”(即工具和其他生产资料)与劳动都是生产性的,两者对随后的生产都做出了同等的贡献。然而,斯密和其他劳动论者认识到这一明显的事实即工具是劳动的产物,那么事实上,它们对生产所做的贡献,不过是工具生产者所做的人力贡献。一个织机制造工人确实为布匹最终生产的多种系列劳动耗费做出了某种贡献;照此看来,织机是一种中间产品,这种中间产品可被视为部分生产了的布匹。这是劳动价值论的起点,斯密如此加以强调:“劳动是第一性价格,是最初用以购买一切货物的代价。世间一切财富,原来都是用劳动购买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sup>26</sup>

所以,斯密认为,商品以它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为其具备价值的必要前提条件,但是劳动价值论并非仅此而已。该理论以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该商品所包含的劳动量、加上生产中所运用的间接劳动(那些商品生产中所运用的制造生产资料的劳动)和直接劳动(运用生产资料生产商品的劳动)不同时段中的相对分配所决定。斯密认为,只有在前资本主义经济初期,劳动才是交换价值的决定因素,在那种经济中,既不存在资本家也不存在地主:

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惟一标准。例如,狩猎民族捕杀1只海狸所耗费的劳动通常2倍于捕杀1只野鹿所耗费的劳动,那么1只海狸自然就会交换2只野鹿,也就是值2只野鹿。通常耗费2日劳动的产品,其价值会2倍于通常耗费1日劳动的产品,通常耗费2小时劳动的产品,其所值会2倍于通常耗费1小时劳动的产品,这是自然的道理。……

……在这种社会状态下,劳动的全部生产物都属于劳动者自己。一种物品通常应可购换或支配的劳动量,只由取得或生产这物品一般所需要的劳动量来决定。<sup>27</sup>

但是斯密认为,当资本家控制了生产资料、地主垄断了土地和自然资源之后,交换价值或价格变成三个组成部分即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总和。他写道,“只要资本积聚在个人手中”,那么劳动者:

大都须与雇用他的资本所有者共分(他劳动的产物)。一般用于取得或生产任何一种商品的劳动量,也不能单独决定这种商品一般所应交换、支配或购买的劳动量。很明显,还须在一定程度上由另一个因素决定,那就是……资本的利润。

……一国土地,一旦完全成为私有财产,有土地的地主,像一切其他人一样,都想不劳

而获,也要求地租。……劳动者必须把他所生产或所采集的产物的一部分交给地主。这一部分,或者说,这一部分的代价,便构成土地的地租。在大多数商品价格中,于是有了第三个组成部分。<sup>28</sup>

因为要决定价格必须将利润和地租加到工资之上,所以斯密的价格理论被一位知名的历史学家称为“‘加总理论’(Adding-up Theory)——即仅仅是三个主要构成的加总”<sup>29</sup>。这一理论不同于那个斯密认为适用于“早期原始社会状态”劳动理论的原因在于,价格中的利润构成与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没有任何必然关联。斯密意识到竞争倾向于使等价值的资本获得相等的利润,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资本家拥有价值 100 美元的织机并且每年由此获得 40 美元利润,那么竞争和追逐最大利润将导致任何价值 100 美元的其他形式资本同样取得每年 40 美元的利润:

也许有人说,资本的利润只是特种劳动工资的别名,换言之,不外是监督指挥这种劳动的工资。但利润与工资截然不同,它们受两种完全不同的原则的支配,而且资本的利润同所谓监督指挥这种劳动的数量、强度与技巧不成比例。利润完全受所投资本的价值支配,利润的多少与资本的大小恰成比例。<sup>30</sup>

依据这一原则可以推断,只有当不同生产行业中单个工人占有的资本量相等时,价格才会与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成比例。如果这种条件成立,那么在每一个生产行业基于资本量的利润将与工资成同比例,而工资加利润的总和(或者说价格,如果忽略地租)会与商品生产中包含的劳动成比例。但是,如果在不同经济部门,单个工人占有的资本量不同,那么把利润加在工资之上得出的总数不会与商品生产中所包含的劳动成比例。斯密承认不同产业内单个工人占有的资本量不同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经验事实,他找不到任何方法可以表明这种情况下生产中所包含的劳动如何决定交换价值。直到大卫·李嘉图才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商品中包含的劳动与交换价值关系的一般性质,而直到马克思和其后的理论家才设计出一种完整而具有内在逻辑性的劳动价值论。

斯密的生产费用价格理论(cost-of-production theory of prices)理论无意去解释市场上实际的、日复一日的价格波动。他区分了市场价格和自然价格。市场价格是特定市场、任一特定时间点的实际商品价格。他认为,市场价格受不同价格水平下卖者想要卖出的商品量和买者想要买入的商品量之间关系的制约。换句话说,市场价格由供给和需求的力量决定。如果供给相对于需求较小,那么小量供给会分配给那些愿意支付较高价格的买者;如果供给相对于需求较大,那么价格不得降低以吸引买者购买全部商品。自然价格是这样一种价格,即该价格下的售卖收益将恰好足够向地主、资本家和工人提供与普通的或社会平均的地租率、利润率和工资率相一致的地租、利润和工资。

然而,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间存在非常重要的联系。自然价格是一种均衡价格,围绕着该价格市场价格每天发生变动,而正是供给和需求的力量使市场价格趋近自然价格。

如果需求大于供给,市场价格将会高于自然价格,那么利润就会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下的利润。这种高利润将会吸引其他一直在寻找能获得更高利润的产业的资本家。当这些新进入的资本家开始生产并卖出商品时,他们将增加商品供给,并因此使商品价格降低。只要市场价格仍然高于自然价格,这种过程将会持续。但是当市场价格被降到与自然价格相等时,从事那一产业所获得的利润将与社会平均利润率相等,资本家也不会再有扩大该商品供给的动力。

如果需求小于供给、市场价格低于自然价格,那么利润水平将会低于社会平均率。这种低利润会导致一些资本家退出该产业并将其资本投资于其他利润率较高的产业。这会减少供给从而使商品价格上涨。同样,这种过程将会继续,直到市场价格被提升到自然价格的水平。

这样,自然价格就是一种由生产费用决定、但在市场上由供给和需求力量确定的均衡价格,而市场价格总是倾向于围绕自然价格发生波动。在斯密的价格理论中,需求量将社会资本在不同的产业间进行分配,从而决定了所生产的不同商品的构成或相对数量。但是,生产费用本身将决定在市场上占主导的均衡价格或自然价格。

斯密的价格理论有两大缺点。首先,价格的三个组成部分——工资、利润和地租——本身就是价格或是从价格中衍生而来,而一个以其他价格为基础对价格进行解释的理论通常是不能解释价格的。如果要理解一种价格,我们必须知道其他价格,随之产生的问题是如何解释那些其他价格。而如果对那些价格的解释又要依据另外的价格,我们就陷入一种永远不可能对价格的最终决定因素进行解释的循环论证之中。

斯密模糊地明白这一困难,并在《国富论》第一篇第8、9和11章试图依据他那个时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和制度因素来解释工资、利润和地租水平。这些努力,尽管充满了重要的见解,但是并不成功,可以断定斯密的价格理论包含一种循环因素(依据其他价格来解释价格),而且斯密从来没能彻底摆脱这种循环性。正如我们在以后的章节中所看到的,只有两种价值论确实成功地打破了这种循环并在外在决定因素的基础上解释了所有价格。一种是劳动价值论,斯密不可能阐释该理论,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同的经济部门内每个工人占有的资本量不同。另一种是效用价值论,它使价格的决定依赖于使用价值或效用。

斯密明显反对将使用价值看作是可能的价格决定因素:

应当注意,“价值”一词有二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交换价值,甚或没有;反之,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使用价值,甚或没有。例如,水的用途最大,但我们不能以水购买任何物品,也不会拿任何物品与水交换。反之,钻石虽几乎无使用价值可言,但须有大量其他

货物才能与之交换。<sup>31</sup>

赞同效用价值论的经济学家通常将这一段话称为“水—钻石悖论”。<sup>32</sup>然而，斯密并不把这看成是一种矛盾，而是简单地视为关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并非系统性的彼此相关的一种陈述。后来效用论者是通过区分钻石的总效用（也是斯密所提及的）和边际效用来解释这一矛盾的<sup>33</sup>。效用价值论将在后面的章节予以讨论。目前为止，完全可以说斯密明确地反对价格决定的效用和劳动理论，并因此留下了一个无法解决的循环理论。

斯密生产费用价格理论的第二大缺点，是其结论涉及一般价格水平（与货币购买力是一回事），而没有涉及不同商品的相对价值。这也是李嘉图批评斯密的焦点所在。在斯密的理论中，如果有任何情况导致某种商品成本构成三因素中的任意一个上涨，那么该商品价值必定上涨。工资尤其如此，因为它们代表着所有商品生产费用中的主要构成部分。斯密和所有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工资水平总是倾向于达到或接近维持生计水平。食物是工人维持生存的主要组成，在斯密那个时代，食物主要是谷物制品（或称 corn，那个时代人们称 grain 为 corn）。那么可以推断，如果谷物价格高，维持劳动力生存的必要货币工资就必然高。但是如果工资高，那么所有商品的价格必定是高的，因为在生产的成本构成中，工资所占的份额最大。

根据这一推理思路，斯密得出以下结论，即用于补贴谷物出口的税收将立即使国内谷物的货币价格上涨。这种税收的最终结果是：

与其说是提高谷物的真实价值，毋宁说是压低银的真实价值，换句话说，使等量的银，不仅只交换较小量的谷物，而且交换较小量的其他一切国产商品，因为谷物的货币价格支配着其他一切商品的货币价格。……劳动的货币价格，一切土地生产物或劳动生产物的货币价格，都必然按照谷物货币价格的升降比例而升降。<sup>34</sup>

当代英国政府影响谷物价格的各种税收和补贴的实际政治意义，将在有关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章节中予以讨论。此处，我们感兴趣的是对于价值理论而言，这种观点的隐含意义。与其他商品不同，银的价值不是由生产费用决定而是由谷物价值决定的，这种观点似乎是一个需要解释的悖论。而且，被广泛用作生产性投入的任何商品价格的变化对银的价值影响与谷物价值变化对银的价值的价值影响是一致的。因此，斯密的理论可以简化为这样一种论断，银的价值决定于被普遍用作生产性投入的那些商品的价值。

但这又引出了特殊问题。银（或货币）是普遍使用的交换价值尺度（或表达相对交换价值的单位）。对于李嘉图 and 斯密的其他批评者而言，很明显，如果谷物或任何其他广泛使用的生产性投入品的价格上涨，那么这对不同商品价值产生的影响将会不同。对有些商品而言，谷物是非常重要的投入品（可称之为谷物密集型商品），而对其他商品而言，谷物相对不那么重要。很显然谷物密集型商品的货币价格将会比非此类商品（谷物不是那么重要的投入品的商品）的货币价格增加得多。这意味着两类商品的交换比例将会发生



变化。谷物密集型商品的价值相对高些,而其他商品价值相对低些。但在斯密的理论中,一切商品价值都会增加只是因为价值衡量尺度(价值单位,或货币)已经发生变化。对于谷物价格增长将会贬抑银的相对价值这种观点,斯密并没有给出论据加以佐证。而且,如果把谷物是最密集使用的一种投入的商品当作衡量尺度,那么事实应该是所有商品的价值将会降低(因为相对于所有其他商品,这种商品的价值将会增加)。

那么可以推断,在斯密的理论中谷物价格变化对其他商品价值的影响取决于哪种商品被选为价值单位。但是斯密、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感兴趣的是提出一种价值理论,这一理论使他们以一种不反映任意选择衡量尺度的模糊性的方式,不仅能解释相对价格,还能计算产出的总价值。如果产出构成是变动的,相对交换比例和衡量尺度的价值也是变动的,那么视所选择的衡量尺度,总产出价值会增高或降低。

对于那些发展了劳动价值论的经济学家而言,衡量尺度的选择是一个尤其重要的问题,对此,我们将在有关李嘉图和马克思的章节中看到这一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需要一种独立于价格变化的衡量尺度,运用这一尺度,他能够比较社会总产出和必要投入总量,以得到总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反过来成为计算利润率的基础,而利润反过来对于解释相对价格形式是必要的。稍后对此将作更为详细的讨论,但是,目前为止足以解释古典经济学家为什么寻找一个“不变的价值尺度”和为什么李嘉图对于斯密价格理论中的这种缺陷给予特别批评。

然而,尽管斯密未能表明劳动价值论何以能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各种价格,这表明他并不像李嘉图和马克思那样重视找到一个不变的价值尺度,他确实试图发现可作为最佳价值尺度的衡量尺度,他以拒绝金或银作为衡量尺度开始,因为金银的生产条件是变化的,因此它们是可变的衡量尺度。他坚持认为“自身价值会不断变动的商品,也绝不是计量他种商品价值的准确尺度”。<sup>35</sup>在他看来,最佳的价值尺度就是在交换中商品所能支配的劳动量。当一个人拥有一件商品时,斯密认为:

财产对他直接提供的权力,是购买力,是对于当时市场上各种劳动或各种劳动生产物的支配权。他的财产的大小与这种支配权的大小恰成比例,换言之,财产的大小,与他所能购买或所能支配的他人劳动量或他人劳动生产物数量的大小恰成比例。一种物品的交换价值,必然恰好等于这物品对其所有者所提供的劳动支配权。<sup>36</sup>

然而,这一选择并非明智。正如金银的价格会变化一样,劳动工资也会变化。而且因为工资率代表能以何种价格买到劳动,斯密的价值尺度是可变的。很明显,任何商品的价格都会而且确实变化,因此能购买的商品数量不仅取决于它自身的价值,还取决于与它相交换的商品的价值,而且当两者中的一个或两者都变化时,它就会变化。所以交换中所能得到的商品量从来都不是不变的价值标准。

有时,通过学习伟大思想家科学有效的命题,同时也分析他们所犯的错误,使我们能

够获得理解力。斯密选择可支配劳动当作不变的价值尺度就是这样一种错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考察社会一般远景的洞察力,斯密经常倾向于通过这种洞察力来观察他所处时代的经济过程。历史学家罗纳德·L.米克(Ronald L. Meek)曾经写道:

从资本家雇主的视角来看,他们组织商品生产不是因为自己要消费或换取生存必需品,而是因为他希望售卖商品获得利润并积累资本,衡量这些商品“实际价值”最合适的尺度似乎是工资劳动量,而卖出它们的收益是他在下一个生产期间能支配的资本。商品能支配的工资劳动量越大,他能增加的劳动力就越多,从而能积累的量就越多。<sup>37</sup>

应当说明的是,在对斯密价值论的讨论作总结时,如同在斯密的社会和经济理论中的其他许多部分要说明的一样,斯密的理论存在着令人困惑的模糊之处。他明白地陈述道,当资本家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地主垄断了土地所有权时,不同商品生产中所包含的劳动量不再能规定这些商品的价值;然而,在他的许多讨论中,他的论述又好像劳动价值论仍足以解释价格。下面的三段引文就是他运用劳动理论的例子:

此等金属由矿山上市所需劳动较少,故上市后所能购买或所能支配的劳动也按同一程度减少。<sup>38</sup>

在土壤肥沃而大部分区域又全未开垦的国家,家禽、牲畜和猎物都不难由极少量劳动获得,因此它们所能购买的劳动极为有限。<sup>39</sup>

往时,此等货物上市,费去更多劳动,所以上市后,必须交换更大量劳动的价格。<sup>40</sup>

## 斯密的经济福利理论

斯密的经济理论,首先是一种规范性或政策导向性理论。他重点关注何种社会和经济力量最有助于增进人类福利,并在此基础上给出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政策建议。斯密对经济福利的定义相当简单而浅易。经济福利由“劳动产物”的年产量和“消费它的人数”<sup>41</sup>决定。另一种福利标准斯密没有明确陈述,但在他的众多讨论中却占有重要地位,即当生产性产出构成同购买并消费这些产出的那些人的需要和愿望越是趋于一致,就越能增进福利。

在分析那些有助于增进经济福利的力量时,斯密创建了一个模型,其中描绘了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社会和经济构成因素,并明白揭示了推进该制度发展的主要动机。资本主义被分成两个主要的生产部门——农业和制造业。商品生产需要三种完全不同的投入——土地(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和资本。与这三组投入相对应的是资本主义三大主要的社会阶级——地主、劳动者和资本家。这种阶级划分的法律基础和社会基础是财产所有权法以及人与人之间实际所有权的分配。三大社会阶级各自获得不同形式的货币收益——地

租、工资和利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阶级收入形式与生产成本的三个构成部分相对应并决定了商品价格。斯密假设所有经济行为都具有自私、营利动机的特点(尽管他承认在非经济行为中也存在其他动机,包括那些被认为是利他主义的动机)。假设所有经济行为以自私和营利动机为基础,成为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

在斯密历史理论框架内,资本主义代表文明的最高阶段,当它发展到政府采取一种自由放任政策去允许竞争力量和供给与需求的自由相互作用来调节经济——一种几乎完全不受政府限制和干扰的经济这样一种状态时,资本主义就发展到鼎盛阶段。《国富论》的整体结构都是围绕斯密的自由放任结论而建筑。斯密在《国富论》的前三分之一(第一篇和第二篇)提出了自己的经济概念和理论。第三篇详述了他对资本主义历史崛起的见解。第四篇主要讨论重商主义(第1~8章)和重农主义(第9章)政策与理论。

在第四篇第9章的末尾,所有的分析线索汇总起来。基于其分析,斯密对重商主义者、重农主义者的理论和政策予以了否定,并陈述了什么制度会使经济福利最大化。该篇的主要结论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或如斯密所言“最明白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被认为是可能最好的经济制度。

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每一个人……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这样,君主们就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sup>42</sup>

这里我们将对斯密赖以得出其最终结论的论据加以概括。

在斯密看来,任何社会的产出水平取决于生产性劳动者的数目及其生产力水平。反过来,生产力决定于专业化或劳动分工程度:“劳动生产力上最高水平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高水平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sup>43</sup>劳动分工程度受两种因素制约。第一,要使广泛的专业化发生,必须有一个发育良好的市场或一个商品交换经济。当市场经济存在时,专业化的程度取决于市场规模“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sup>44</sup>

农村农业与城市制造业间的分工是最重要或最基本的劳动分工。“有一些产业”,斯密写道,“除了大城镇任何地方都无法从事”。<sup>45</sup>经济发展的自然顺序是农业第一,然后是城市制造业,最后是对外贸易。“文明社会的重要商业,就是都市居民与农村居民通商。这种商业,有的是以原生产物与制造品直接交换。”<sup>46</sup>

当商业社会发展到城乡专业化成为可能这种状态时,影响劳动分工程度的第二种因素变得更为重要:

按照事物的本性,资财的蓄积,必须在分工以前。预蓄的资财越丰裕,分工就能按比例地越细密;而分工越细密,同一数量工人所能加工的材料就能按更大的比例增加。每个

工人所担任的操作,既渐趋简单,便有各种新机械发明使操作更为简便迅速。……所以……必须预先储蓄材料和工具。<sup>47</sup>

因此,我们如果比较同一国民的前代和后代,发觉那里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后代比前代多了,其土地耕作状况进步了,工业扩大了、繁盛了,商业推广了,我们就可断言……这国的资本,必定增加了很多。<sup>48</sup>

此后,资本积累成为经济成长的主要源泉,而利润则是新增资本的源泉。在假定了利润和资本积累的这种重要意义后,斯密着重区分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斯密重点是要驳斥花费在制造业中的劳动是无用的或非生产性的这种重农主义论点。他意识到,这种劳动是利润和进一步积累的源泉,并从而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斯密提出了两种生产性劳动的定义。第一,他主张当劳动者的劳动带来的收入,增加了资本家的资本,足以偿付工资费用仍有利润剩下时,他们的劳动就是生产性的。第二,他主张包含在有形的、有销路的商品中的劳动者的劳动是生产性的。在两种情形下,他试图把对资本积累过程做出贡献的劳动者与那些只把服务出卖给富人或政府的劳动者加以区分。他视后者为各种“家仆”,其服务无论多么受欢迎,都不能产生利润或使资本得以积累,因而不能促进经济增长。他认为这些服务是非生产性劳动。

很显然,从我们当代的有利地位来看,斯密生产性劳动的两个定义并不一致。但是,正如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观察到的:

可以合理假设斯密认为两种定义不存在冲突,因为如果所提及的劳动力不能生产可销售商品,那就不可能有利润和剩余价值存在。毫无疑问,广义而言,这两个定义确实是相同的。但是,如马克思……所观察的,演员、音乐家、舞蹈家、厨师和妓女或许都为雇主创造剩余价值或利润,如果他们恰好被剧场、音乐会和妓院等的主办人雇佣。<sup>49</sup>

重要的是生产性劳动是能促进资本积累的劳动。新增资本增进了经济福利,因为它提高了劳动生产力。

然而,斯密又主张资本运用于某些行业比其他行业更具生产性。运用在农业中的资本是最具生产性的,其次是制造业,然后是国内贸易,最后是对外贸易。<sup>50</sup>读者会回想起对资本生产力的这种排序与斯密认可的经济发展的自然顺序相一致。如果政府既不鼓励也不阻碍资本对任意特定部门的投资,那么资本家对最大利润的自私追求,将会使经济发展按照自然而对社会有益的顺序发生。“农村先于都市的势态……又有人类天性促其实现。只要人为制度不压抑人类天性……”<sup>51</sup>,斯密这样写道。按经济发展的自然顺序,农业最早得到发展。如果市场是自由的,而且不存在政府干涉,“多数人必宁愿投资以改良土地开垦土地,不愿投资于工业及国外贸易”。<sup>52</sup>

当农业生产在“自然自由制度”下发展之后,资本将会流入制造业。当然,在发展的

这一阶段,国内工业对人类福利的贡献大于对外商贸。当描述“在一个自然自由的制度之下”资本向国内产业流动时,斯密阐述了他最著名的命题,即在一个自由的市场中,个人的自私的行为似乎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而促进经济福利的最大化:

每个人把资本用以支持国内产业,必然会努力指导那种产业,使其生产物尽可能有最大的价值。

劳动的结果是劳动对其对象或对施以劳动的原材料所增加的东西。劳动者利润的大小,同这生产物价值的大小成比例。但是,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既以牟取利润为唯一目的,他自然总会努力使他用其资本所支持的产业的生产物能具有最大价值,换言之,能交换最大数量的货币或其他货物。

但每个社会的年收入,总是与其产业的全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恰好相等……所以,由于每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确实,他通常既不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sup>53</sup>

因此,斯密的结论是政府干预、管制、授予垄断和特许补贴都会误导资本并会减少资本对经济福利的贡献,而且,这些政府行为会制约市场从而降低资本积累率、降低劳动分工程度并相应降低社会生产水平。

自由竞争的市场不仅能指引资本运用于那些最具生产性的行业,而且依然借助“看不见的手”的指引把自私的利润最大化行为纳入有益于社会的渠道,使得所生产的商品是人们最需要、最欢迎的: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sup>54</sup>

斯密对以往两个世纪社会保守经济原则的影响主要在于,他相信在一个竞争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自由市场会把所有利己主义的、营利性的和惟利是图的行为纳入到一个使社会受益的、和谐的“最明白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中。他断言,政府的适当职能应受到严格限制:

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

需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个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行使的人,是再危险也没有了。<sup>55</sup>

应当只赋予政府三项职能:

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其建设与维持绝不是为着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sup>56</sup>

## 阶级冲突和社会和谐

很明显,斯密所谓“最明白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被预想为一种和谐占主导的经济制度。斯密当然清楚自私的、营利动机引发个人和阶级冲突。但是在竞争资本主义的社会背景下,这些冲突只是表面上的而非最终实际的冲突。“看不见的手”以最有益于人类幸福的方式自动解决了肤浅的或表面上的冲突。

然而,在资本主义阶级冲突与社会和谐的问题上,斯密著作给读者留下极端模糊或自相矛盾的印象。在本书随后章节中反复出现的一个重要争论是,劳动价值论的支持者认为阶级冲突对于理解资本主义具有根本重要性,而效用价值论者认为社会和谐是最根本的,并必然得出某种形式的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说法。仅就斯密抛弃劳动价值论而言,他会支持“看不见的手”与社会和谐。

但是斯密的很多分析都源自其劳动论观点。这样,他能论证劳动是价值的惟一原始创造源泉;劳动者不得不与其他两个阶级分享其劳动的产物,而那两个阶级的权力来源和对收入的索取权不是因为他们创造了商品而是因为财产所有权,正是那种财产所有权赋予某些人“不劳而获的权利”,而政府对财产权的保护主要是“为保护富者来抵抗贫者”。

此外,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斯密相信工资是由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斗争决定的,而在这些斗争中资本家几乎总是占上风。他还清楚商人运用他们能够支配的各种方法来避免竞争以获得垄断,下面的两段引文可以予以证明:

同业中人甚至为了娱乐或消遣也很少聚集在一起,但他们谈话的结果,往往不是阴谋对付公众便是筹划抬高价格。<sup>57</sup>

其实,不论在哪一种商业或制造业上,商人的利益在若干方面往往和公众利益不同,有时甚或相反……缩小竞争,无疑是一般商人的利益……后者却总是和公众利益相反。

缩小竞争只会使商人的利润提高到自然的程度以上,而其余市民却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承受不合理的负担。<sup>58</sup>

在对资本主义、资本积累及随之而来的绝大多数工人劳动分工的影响进行分析时,下面两段引文同样具有启示性:

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并不像我们所感觉的那么大……例如,两个性格极不相同的人,一个是哲学家,一个是街上的挑夫。他们间的差异,看来是起因于习惯、风俗与教育,而不是起因于天性。从他们生下来,到七八岁以前,彼此的天性极相类似,他们的双亲和朋友,恐怕也不能在他们两者间看出任何显著的差别。大约在这个年龄,或者此后不久,他们就从事于极不相同的职业。<sup>59</sup>

分工进步,依劳动为生者的大部分的职业,也就是大多数人民的职业,就局限于少数极单纯的操作,往往单纯到只有一两种操作。可是人类大部分智力的养成,必由于其日常职业。一个人如果把他一生全消磨于少数单纯的操作,而且这些操作所产生的影响,又是相同的或极其相同的,那么,他就没有机会来发挥他的智力或运用他的发明才能来寻找解除困难的方法,因为他永远不会碰到困难。这一来,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习惯,而变成最愚钝最无知的人。他精神上这种无感觉的状态,不但使他不能领会或参加一切合理的谈话,而且使他不能怀抱一切宽宏的、高尚的、温顺的情感。其结果是,对于许多私人日常生活上的平常义务,他也没有能力来做适当的判断。<sup>60</sup>

而对于这些工人而言,“看不见的手”的价值与“最明白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似乎相去甚远。而且,当考虑到政府的存在只是“为保护富者来抵抗贫者”,在关于工资率的斗争中政府是资本家用作制服工人的主要手段,资本家运用它们能支配的各种方法(包括政府)去取得并保护垄断,那么,人们不禁想知道斯密怎样希望实现“自然自由的制度”,而这种制度下的政府仅具有三种职能,而且“看不见的手”会将所有自私的、营利的行为纳入互惠互利的和谐整体。

考虑到这些难题和《国富论》中许多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在19、20世纪两个相互对立的经济思想传统中,看到斯密思想的学术影响是不足为奇的,其中一方强调劳动价值论和阶级冲突,而另一方则强调效用价值论、社会和谐和“看不见的手”。

#### 注 释

1. Reinhard Bendix, *Work and Authority in Industr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3), p. 27.

2. Paul Mantoux,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27), pp. 344~45.

3. Ronald L. Meek, “Adam Smith and the Classical Theory of Profit,” in *Economics and Ideolog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967), p. 25.

4. 有关斯密历史理论的有用概括,参见 Ronald L. Meek,“The Scottish Contribution to Marxist Sociology,”in *Economics and Ideology*, pp. 34~50, and Andrew Skinner’s introduction to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 Andrew Skinner (Baltimore: Penguin, 1970), sect. 2, pp. 29~43. 有关斯密社会学的有用概括,参见 Warren J. S. Samuels,“Adam Smith and the Economy as a System of Power,”*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31, no. 2(1973), pp. 123~37.

5.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37), p. 653.

6. 同上,第 653 页。

7. 同上,第 653 页。

8. 同上,第 670 页。

9. 同上,第 670 页。

10. 同上,第 674 页。

11. 同上,第 361 页。

12. 同上,第 361~362 页。

13. 同上,第 653 页。

14. 引自 Skinner, *Wealth of Nations* 介绍,第 23 页。

15. 同上,第 39 页。

16. 同上,第 39 页。

17. 同上,第 26~27 页。

18. 同上,第 40 页。

19.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p. 248.

20. 同上,第 47 页。

21. 同上,第 326 页。

22. 同上,第 30 页。

23. 同上,第 48 页。

24. 同上,第 66 页。

25. 同上,第 66~67 页。

26. 同上,第 30 页。

27. 同上,第 47~48 页。

28. 同上,第 48~49 页。

29. Maurice Dobb, *Theories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 since Adam Smith*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46.

30.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p. 48.

31. 同上,第 28 页。

32. 例如,可参见 Mark Blaug,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Homewood, IL: Irwin, 1968), p. 41.

33. 同上,第 43 页。

34.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第 476~477 页。



35. 同上,第 32~33 页。
36. 同上,第 31 页。
37. Ronald L. Meek, *Studies in 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3), pp. 65—66.
38.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p. 32.
39. 同上,第 246 页。
40. 同上,第 246 页。
41. 同上,第 lvii 页。
42. 同上,第 651 页。
43. 同上,第 3 页。
44. 同上,第 17 页。
45. 同上。
46. 同上,第 356 页。
47. 同上,第 260 页。
48. 同上,第 326 页。
49. Maurice Dobb, *Theories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 p. 61.
50.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p. 341~355.
51. 同上,第 357 页。
52. 同上,第 357~358 页。
53. 同上,第 422~423 页。
54. 同上,第 14 页。
55. 同上,第 423 页。
56. 同上,第 651 页。
57. 同上,第 128 页。
58. 同上,第 250 页。
59. 同上,第 15 页。
60. 同上,第 734~735 页。

## 第 4 章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出生于一个舒适富裕的英国家庭。他曾就读于剑桥大学并于 1805 年受聘于哈莱堡东印度公司学院。他获得英国第一个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并任职直至 1834 年逝世。

马尔萨斯生活在阶级冲突激烈的喧嚣时代,他的文章反映了他对于这些冲突的立场。当时主要有两大冲突,不妨在此对其各作一简要的讨论。首先,工业革命只有通过工人阶级巨大的、广泛的牺牲和苦难才可能实现。而工人并不总是顺从地接受这些牺牲,结果不仅要遭受社会和经济上的贫困,而且要承受法律和政治上的压迫。其次,在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旧地主阶级仍然有力地控制着英国的国会,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就在他们与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之间展开了,这场斗争主要是争夺对国会的控制权,但最终问题是,英国究竟是维持相对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还是变成一个主要从事工业生产的岛国。

### 马尔萨斯时代的阶级冲突

工业革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人类生产力发展。工厂的普遍建设和机器的广泛使用构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机械化基础。然而为了将经济生产能力转化成资本品的创造力,有必要将经济生产力相对较小的一部分投入消费品生产。资本品的获得必须以对民众的剥削为社会成本。尽管技术进步提高了生产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种社会成本,但是其效应并不足以不断增长的资本积累提供支撑。

从历史上看,只要社会有一部分成员被迫过着维持生计的生活,那就总是那些经济和政治权利最少的人作出这样的牺牲。英国的工业革命同样如此。工人阶级生活接近

1750年维持生计的水平,他们的生活水平(按照工资购买力衡量)在18世纪后半期不断恶化。19世纪前几十年内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走向是历史学家争论的话题。事实上,许多杰出学者都发现了足够证据来证明这一时期的生活水平并未上升,甚至是下降了,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这一时期的任何增长是微乎其微的。

毫无疑问,在整个工业革命时期,与中上层阶级相比,穷人的生活水平急剧地下降。一项详细分析显示:

相对而言,穷人越来越穷,原因很简单,因为国家、那些富人还有中产阶级,很明显地越来越富有了。正当穷人在生活的边缘徘徊时……在烟雾缭绕的北部城市,中产阶级正携带着超额的资本,大范围地投资于铁路,并为了那些陈列于1851年的大型展览会上富裕家庭豪华的室内陈列品和富丽堂皇的市政建筑而大肆挥霍。<sup>1</sup>

按照工业化必须耗费的消费量来衡量哪个阶级承担了这种社会代价,是不言自明的。

但是,消费减少绝不是工业革命强加给工人阶级的惟一代价,或许甚至还不算是最坏的苦难。新的工厂系统完全破坏了工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将他们扔进了一个他们毫无准备来应付的梦魇般的世界。他们失去了作为手工艺者的自豪以及曾经存在于手工场工业时代的亲密的人际关系。在新的系统中,他们同雇主之间惟一的联系是通过无人格的市场或者现金交易关系来维系的。他们失去了与生产资料的直接接触,而降为完全依赖市场条件维持其生活的仅仅出卖劳动力的人。

或许比所有这些更糟糕的是工厂系统施加于工人的单调而机械的规则。在工业革命前的欧洲,工人的工作没有如此的专业化。工人可以在不同的任务之间转换,工作会由于季节或者天气的变化而中断。当工人希望休息或游玩或改变日常工作的节奏时,他们是有一定的自由的。工厂雇佣带来了苛刻的时间约束。生产机械化了,绝对规则对于协调复杂的制造过程的互动和最大化地利用昂贵的新机器而言就成为必然。工作的节奏不再决定于工人而取决于机器了。

机器以前是工人的附属品,而现在成了生产过程的焦点。工人仅仅变成了冰冷的没有人情味的定速机器的附属品。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一场自发的反对新工厂系统的起义中,联合起来的工人毁掉了他们认为置其于困境的机器和工厂。这些起义被称为路德分子(Luddite)起义,在1813年结束时,大批工人因此被处以绞刑或遭驱逐。

工厂中普遍的劳动分工使得大多数工作常规化和简单化,以至没有受过训练的妇女和儿童也能做得和男工一样好。由于妇女和儿童的工资较之男工低廉许多,而且许多时候全部家庭成员必须都去工作才能填饱肚子,妇女和儿童被广泛雇佣。许多工厂主更愿意雇佣妇女和儿童,是因为要他们被动地服从比男工容易得多。这一时期流行的认为顺从的女人才是好女人的思想观念帮了雇佣者们的大忙。

儿童必须以学徒身份订立契约服务于工厂长达7年或直至他们21岁。他们在最恶

劣的条件下长时间工作,但却几乎什么也得不到。济贫法的官员可以用契约来约束那些贫民的小孩,这就导致了“经常的讨价还价……[在这里]儿童……被当成纯粹的商品交易……一边是纺织主们,另一边是济贫法的官员。大量的五十、八十、或者一百的儿童像牲口一样被送入工厂,在那里他们被困困多年。”<sup>2</sup>

这些儿童忍受着最残酷的奴隶般的待遇。他们同那些可能怜悯他们的人完全隔离,因而只能受那些主要关心别的工厂竞争挑战的资本家或雇主的支配。这些儿童每天的工作时间是14~18个小时或直至他们筋疲力竭。监工的所得是根据儿童的工作量来支付的,因而极其残忍地驱使他们。大多数工厂中儿童每天的主餐(通常只有一顿)时间不得超过20分钟。“事故非常平常,尤其是在长时间劳作了一天的结束、那些疲倦的儿童在工作的时候都几乎入睡的时候。那些手指被切掉和肢体被轮子碾伤的事没有穷尽。”<sup>3</sup> 这些儿童被如此暴力和残忍的手段管制着,以至于这些叙述在今天的读者看来完全难以置信。

妇女们被几乎同样严酷地虐待着。在工厂工作是长时间的艰辛和枯燥无味的。工厂纪律相当苛刻。许多时候工人的工资都屈从于雇主和监工的性别取向。<sup>4</sup> 煤矿中的女工一天要苦干14~16个钟头,她们赤裸上身和男工一起工作,干男工的事情。有报告说有女工跑出煤矿去生孩子而在产后数天之内就返回矿山了。许多记录里都记载了这一时期女工所忍受的难以想象的非人的残酷工作条件。当然,男工比女工和儿童也好不到哪里去。

评估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工人阶级生活水平要考虑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这一时期发生的急剧城市化。1750年,英国只有两个人口超过五万的城市。到了1850年,就有29个了。到后来,接近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居民人数超过五万的城市里。

这一时期的城市的情况是可怕的:

这是什么样的城市啊!不只是烟雾笼罩与污秽充斥,基本的公共服务——水的供应、卫生设施、街道清洁、露天场所等等——都无法与人们大量涌入城市的速度保持协调。由此产生了,尤其是1830年后,霍乱和盲肠炎的流行以及19世纪两大城市杀手——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或者说呼吸道与肠道疾病令人惊惧地敲响了警钟……这些新城市人口……被挤入过度拥挤且寒冷的贫民窟,目睹者不寒而栗。“文明创造了奇迹”,法国著名文学家曼彻斯特的德·托奎维尔(de Tocqueville)写道:“文明人几乎退化成了野蛮的原始人。”<sup>5</sup>

根据一位政府专员的报告,这些贫民窟蠕集在格拉斯哥某个地区,

这里面藏纳了15 000~30 000的流动人口。这个地区由很多狭窄的街道和正方形的院子组成,每个院子的中间都是粪堆。尽管这些地方从外面看来已经令人恶心了,我在里面发现的污秽和痛苦还是十分没有准备。晚上我们去了几个卧房,我们发现全部都躺在地板上。通常大约有15~20个男女蜷缩在一起,有的和衣而卧,有的则裸体而睡。

几乎没有什么家具,惟一使这些洞穴还像个住处的东西是壁炉里燃烧的火苗。偷盗和卖淫成为这些人主要的收入来源。<sup>6</sup>

工人传统生活方式的彻底毁灭和严苛的新工厂系统的规则,伴随着悲惨的城市生活条件,产生了社会经济和政治动荡不安的局面。社会剧变、暴动和反抗的链式反应爆发在1811~1813、1815~1817、1819、1826、1829~1835、1838~1842、1843~1844和1846~1848这此年间。许多地区的起义纯粹是自发的,主要也是与经济相关的。据报道,1816年,一个反抗者呼喊道:“我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上帝救救我!我死也不愿意像现在这样回家。我想要面包!我会有面包的。”<sup>7</sup>1845年,一个名叫科尔曼(Colman)的美国人报道说,曼彻斯特的工人“是悲惨的、被欺骗的、被压迫着垮掉的人们,他们躺在支离破碎的社会的血泊中”。<sup>8</sup>

毫无疑问,工业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劳动阶级的悲惨痛苦之上的,他们被剥夺了经济快速扩张的成果,背负着极大的耻辱而为资本家增加利润。这一时期巨大罪恶的基本原因在于

资本主义拥有绝对且失控的权力。在这个大企业的辉煌年代,这是被残酷而直白地告知、承认、甚至是公开宣布的。这是雇佣者自己的事情,他做了他所选择的,并不认为其行为的任何其他正当理由是必要的。他拖欠雇佣工人的工资,而一旦付了工资,他就不再理会他们任何进一步的要求。<sup>9</sup>

从工厂生产最早被引入纺织工业开始,工人们就试图联合起来集体保护他们的利益。1787年,高就业时期,格拉斯哥生产薄细棉布的制造商们试图降低其应支付的工资。工人集体抵制,拒绝在某一最低工资水平之下工作,并且组织起来联合抵制那些不愿意支付最低工资的制造商。这场斗争发展到公开的抵抗和枪杀,但是工人们被证明是强大的和训练有素的团队,他们建立了强大的联盟。1792年,纺织工人的联盟迫使波尔顿和柏利的制造商们达成了集体协议。

劳工组织在18世纪9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由于对社会经济不满的同时上升,上层阶级开始变得非常不安。法国革命在他们脑海里还记忆犹新,他们害怕工人联合起来的力量。结果就有了1799年联合法案,它将那些希望提高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和引入任何限制雇主自由行动规则的任何工人组织驱逐出去。支持者们依据自由竞争的必要性和垄断的罪恶来支持他们的论点——这是古典自由主义最重要的原则——但却绝口不提雇主的联合和资本主义垄断的现实。这项法案的作用被归纳如下:

联合法案对于阻止工人破坏性勒索是绝对必要的,如果不加限制的话,他们就会毁坏国家整个的贸易、生产、商业和农业……这种错误的观念是如此之彻底,以至于无论何时那些工人因联合起来要求调整工资和工作时间的任何要求而被起诉定罪,不管对他

们的判刑有多重,也不管有多严酷,任何人都不会对这些不幸的受难者表示哪怕最轻微的同情。公正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们几乎不可能在那些地方官员面前得到任何申辩的机会,且从来没有免于不耐烦的对待或侮辱……如果可以精确地记录那些在地方官员、庭审和最高法院的长椅面前的诉讼和申辩的话,那么几年过后,总体的不公待遇、恶劣的谩骂以及可怕的惩罚会作为最佳证据而不会烟消云散。<sup>10</sup>

另一个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支持者为之激烈斗争的原因是1795年救济穷人的斯宾汉姆兰德(Speenhamland)体系的废除。这个体系(保持着伊丽莎白时代技工条例的传统)源于基督教家长主义的道德标准,它认为那些不幸的人无论有无工作都有权享有某种最低生活标准。确实,这个体系有严重的弊端:很多情况下它实际上将工资压低到救济线以下(以地方税补偿差额),并且在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时却严格限制劳动力流动。但是大多数争论并不限于斯宾汉姆兰德体系的这些问题。他们反对政府对穷人的任何救助,其中许多论调是以马尔萨斯的观点为基础的。

18世纪90年代,工人的困境严重恶化。英国正在进行的战争切断了许多食物进口,谷物的价格显著上涨。举例来说,1750年每250公斤小麦的价格是31先令;到了1775年,卖到了46先令,25年后高涨到了128先令。尽管这一时期的货币工资增加了,但是工人能够以其工资购买的食物数量却减少了。

同样重要的是,一般而言,事实上制造品的价格并没有工资上涨得快(有些在这个时期甚至跌价了),而农产品的价格却上涨得快得多。1815年,长期的战乱结束后,谷物法成了英国国会面临的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地主阶级调动了其全部社会的、理论的和政治上的影响以便对农产品实行一系列新的关税。他们要增加关税以阻止那些进口价格比英国国内通行价格低得多的外国谷物的进入。这样就可以使英国农产品价格居高不下,从而确保那些地主们可以继续得到与他们在整个战争年代享受同样高的收入。

然而,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反对谷物法,他们有两个基本理由。首先,谷物和由谷物制成的产品构成了劳动力赖以生存的必需品的最大部分,谷物的高价使得资本家必须向工人支付更高的货币工资以维持工人及其家庭的生计。更高的货币工资削减了资本家的利润。因此,高农产品价格有着将工人创造的许多剩余价值由资本家的利润转变为地主的的地租的效应。其次,19世纪初,英国制造业的效率已经比其欧洲大陆的竞争者高得多,因此,英国制造品的价格也比欧洲其他国家低很多。这意味着,如果废除所有关税,自由贸易将得以建立,英国的制造商就能够低价击败其欧洲竞争者。英国人把制造品卖给欧洲大陆,但是他们也必须从那里购买某些商品。如果英国从欧洲大陆进口谷物,就能让欧洲人把赚来的英镑又用来购买英国制造品。

胜败攸关时刻的最后一个问题至关重要。地主希望英国保持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以便永远保有他们的地位、收入和权力。工业资本家则希望英国专门从事制造业以便增加他

们的收入和权力,并减少自然转加给地主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事实上,正在发生的是英国统治阶级中两个敌对势力的最后抗争。地主阶级是封建统治阶级最后的残余,和封建贵族一样,他们的权力来自对土地的控制。资本家的权力源于对劳动力和生产过程的控制,而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和地主分摊,后者为了成为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控制方而彼此争斗。

1815年,地主阶级赢得了—个回合的战斗。—项谷物法通过了,该法律规定在本国价格达到某—相对较高的价格之前禁止所有的谷物进口。例如,小麦被禁止进口直至英国小麦的价格达到每250夸特80先令。工业资本家虽然占有经济优势,但是地主阶级仍控制着国会。不过,这种形势不会无限地保持下去。占经济优势的阶级最终总是会将其经济优势扩展为政治优势。所以,斗争仍在继续,最后,1846年,国会投票彻底废除了谷物法。这一事件最终戏剧性地表现了工业资本家所取得的政治优势。

## 人口理论

马尔萨斯—生中写过很多书、小册子和文章。他的作品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每个时期都表现了其主要的社会观和理论方法的特色。18世纪90年代和19世纪初期,他主要关注的是劳动力动荡不安的状态和激进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关于重整社会结构以增进工人福利和幸福的计划。马尔萨斯准确地察觉到,这些计划只有通过销蚀掉两个所有者阶级即资本家和地主阶级的财富和权力才能促进劳动者事业。马尔萨斯是富人的代言人,他的人口理论为其提供了保护富人利益的框架。1798年他出版了《论影响于社会将来进步的人口原理,反对葛德文、康多塞和其他作家思想的评论》,通常称为《人口原理》第一版。1803年,他出版了修订版本,其中修改非常广泛,以至于它实际上是一本新书。这本书—般被看作是《人口原理》第二版。后来他出版了《人口原理总论》。<sup>11</sup>

从大约1814年以后,马尔萨斯转而主要关注谷物法和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这一时期,他是地主阶级利益坚定的守护者。其保护地主阶级的理论基础包含在1820年初次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个实际应用的视角》—书中。<sup>12</sup>在《原理》—书中,他用来为地主阶级辩护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是他的经济“过剩”或萧条理论。

18世纪末工人阶级可怜的条件和劳动力动荡不安的局面使得工人阶级获得了许多知识分子的支持。其中特别有影响的是法国的马里·吉恩·安托万·尼古拉斯·德·卡里塔特德·康多塞侯爵(Marie Jean Antoine Nicholas de Caritat, Marquis de Condorcet, 1743~1794)和英国人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 1756~1836)。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第一版主要是反对这两个人的观点的。

康多塞是对法国革命的最初阶段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但当雅各宾党在国会中取得

支配地位后,他认为法兰西共和国应该废除死刑,反对处决国王和逮捕吉伦特党,并且告知国会,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缺乏思想和人性。因此,康多塞被判处死刑。藏匿期间,康多塞写了他最著名的著作《论人类精神进化的过程》。在该书中,他认为,人类进步有其自然顺序,在法国革命之后的时期里将达到其最高阶段。在这一阶段,人类在道德、精神、智力上的发展将远远超过以前可能达到的水平。

然而,这种发展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更多的经济平等和保障。康多塞提倡实现这些目标的两项基本改革。首先,在接受现有社会的阶级划分的同时,他认为,贫穷的工人阶级收入的不稳定性可以以这种方式得到消除,即政府为年老的人、那些丧失了丈夫的妇女和没有父亲的儿童建立福利基金。其次,他相信,政府可以利用信贷调节机制来减弱资本家的权力和财富。通过对有权势的资本家可获得的信贷数额的限制,以及对普通工人的信贷扩张,他相信劳动者可以慢慢地变得更独立于资本家,由此使得社会经济更加平等。

威廉·葛德文比康多塞激进得多。当多数英国保守派和许多古典自由主义改革者哀叹工人阶级天生的惰性和堕落时,葛德文反驳道,工人阶级的缺陷应该归因于腐败和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诡计和掠夺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每个人都能完全自如地获取生活必需品……那么诱惑就将失去作用。”<sup>13</sup>由于私有财产法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不公,人们往往不能得到生活必需品。应该公正要求取消资本主义财产关系,财产应该属于那些对他最有用的人:

假如有一块面包,财产法规定给谁才是公正的呢?给那些最需要它的人,或者给那些拥有它可获得最大收益的人。这里有六个非常饥饿的人,并假设面包能满足他们所有人的欲望。谁最应该从面包所赋予的品质中获利?他们要是兄弟,按照长子继承法最年长的将独占面包。但是这种给予公平吗?不同国家的法律处理财产的方式千差万别,但是可能只有一种方式最合理。<sup>14</sup>

当然,这种惟一的方式必须建立在人类平等的基础上。穷人可以要求谁改变不公平的制度呢?在葛德文看来,政府当然是最不可能的。因为经济权力会转变成政治权力。富人是“国家直接或间接的立法者;结果将压迫形成一种永久的制度”。<sup>15</sup>法律于是成了富人压迫穷人的工具,因为“总体上几乎所有国家的立法都是反对穷人而支持富人的”。<sup>16</sup>

葛德文的两个思想被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们反复宣扬:一是资本主义社会与经济体制,特别是私人财产关系,导致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和不幸。二是处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政府因受制于资产阶级而绝不会纠正这些罪恶。但是葛德文对这个似乎不可能解决的情况作出了回答。他相信人类的理性可以拯救社会。一旦人们了解了这种罪恶,他们将共同研究进而得出惟一合理的解决方案。正如葛德文所看到的一样,这种解决途径必然导致政府、法律、私人财产和社会阶级的消亡,从而建立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平等。

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第一版再次直接反对康多塞和葛德文的观点。马尔萨斯认



为,支持这些观点的人,

等于是跟事实作对。他们只把眼光放在更美好的社会状态,用最迷人的色彩勾画美好愿望,他们自我沉溺于对所有现有国家机构的猛烈抨击中,而没有把聪明才智用于思考消除弊端最好和最安全的方法上,甚至在理论上也没有意识到威胁人类走向完美进程的巨大障碍。<sup>17</sup>

《人口原理》第一版中反复出现了两个重要主题。第一个主题是,不管改革家改变资本主义的尝试有多么成功,现有的财富所有者和穷苦工人这两大阶级结构将不可避免地重现。马尔萨斯相信此种阶级划分是自然法则的必然结果。

马尔萨斯用详尽的论据表明:即使葛德文和他的信徒们能够按照他们的理想重建社会,这个

按照人们的想象力所能设想的最美好的方式组成、以仁爱心而不以利己心作为其行为原则、并且靠理性而不靠权势来纠正其一切成员的有害倾向的社会,很快就会按照我们本性的必然法则而不是由于人类的任何原始罪恶,蜕化为与目前在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国家里普遍存在的社会没有本质区别的一种社会;我指的是,会蜕化为分成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并以利己心作为那庞大机器的主要动力的一种社会。<sup>18</sup>

贯穿于他的人口理论的第二个主题是可怜的贫苦大众是每个社会不可避免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任何减轻贫穷与受难程度的尝试,不管出于多么好的目的,最终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而不是好转:

从我们本性的必然法则来看,必须有某一些人承受贫困的痛苦。这些不幸的人们在他们的人生蓝图上留下一片空白。<sup>19</sup>

无论是谁,没有任何富人的牺牲,特别是在金钱上的牺牲,可以在某一时候阻止社会底层成员贫穷的反复出现。<sup>20</sup>

我们“应当痛斥那些为人类的痛苦准备的特效药”,马尔萨斯写道,我们还应当斥责“那些慈善的、但屡次犯错的人,他们以为自己正在通过制定计划来完全消灭失控的混乱而服务于人类”。<sup>21</sup>

马尔萨斯基于人口理论的这些推论相对而言是简单的。他认为大多数人被不知足的情欲所驱动,结果是,当未加抑制时,再生产率将导致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人口在每一代都会加倍。马尔萨斯还说:“所有的动物一定都有以几何级数繁殖的能力。”<sup>22</sup>在这方面,人类与其他动物并没有什么不同:

尽管人类在智力上高于其他一切动物,但是不能由此认为人类必须服从的自然法则与人们看到的普遍存在于生物界其他部分的自然法则有本质的区别。<sup>23</sup>

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说,在没有受到抑制的情况下,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以致每25年总数要翻一番。<sup>24</sup>

马尔萨斯认为,很明显,没有哪个社会的人口能够长时间以这样的速度增长,因为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每一寸的土地都将被居住。于是他为自己提出了核心问题:过去是哪一种力量在抑制人口的增长?将来起作用的又可能是哪种力量?

最快的和最明显的答案是可供使用的食物限制了既定土地上的人口。马尔萨斯知道,通过提供更多的劳动和更好的食物生产方法可以增加食物产出水平,他宣称,在既定的土地上,世代之间食物生产的连续增长总是逐渐减小的。他认为,食物生产充其量是以算术级数率增加的,也就是说,每一代人只能增加和上一代人增加差不多的数目的食物。

按照关于有限土地上生产能力的自然法则,对土地所生产的食物来说,其在同样长的时期内所能达到的增长,过了一个短时期后,必然会或者持续下降(这种情况确实是会发生的),或者顶多也会停滞不前,以致只能按算术级数来增加生活资料。<sup>25</sup>

因此,如果没有其他的限制,最终饥饿会将人口增长抑制在食物生产增长所能维持的最高水平上。但是,除饥饿外,还有其他一些限制因素。有时马尔萨斯将其分为两类:预防的抑制和积极的抑制。预防的抑制降低了出生率,包括绝育、节欲和生育控制。积极的抑制提高死亡率,包括饥荒、病痛、灾难、战争和最终不可避免的饥饿的抑制。人口总是被上述因素的某种组合所抑制,从而被控制在可获得的食物供给的范围之内。如果预防的抑制不充分的话,那么积极的抑制不可避免;如果没有足够多的疾病、战争和自然灾害,那么,饥饿将总会抑制人口的增长。

马尔萨斯的另一个分类方法使我们更容易理解他的理论标准。积极的抑制和预防的抑制“阻止了人口增长的强大力量,使得人口和生活资料的数量相适应,这种抑制被划分成道德的抑制、罪恶和苦难”。<sup>26</sup>在这个分类中,马尔萨斯指出,如果增加社会中每个人的财富和收入,大多数人就会因此养育更多的孩子以至于不久就回复到原来维持生计的状态,只有品德高尚者可以逃脱这个命运。“道德抑制”被非常简单地定义成“不结婚但是也不允许有不正当性行为发生的抑制”。<sup>27</sup>然而贯穿马尔萨斯的著述,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即他认为只有那些具有他所认可的美德的人才具有道德抑制力。同样明显的是,马尔萨斯认为,那些将其维持生计之外的每一便士用于“喝酒、赌博和放荡”<sup>28</sup>的人缺乏性抑制。

因此,在马尔萨斯的理论中,富人和穷人最终的不同就在于富人的道德品质是高尚的而穷人则道德沦丧。他认为,生育控制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几乎不会提及也决不会提倡的罪恶。他个人还把这一理论同婚前性行为和通奸联系在一起。

为了阻止孩子的出生,这样的滥交严重降低了人的尊严。这对男性有影响,对女性性格的影响更明显,并破坏了女人亲切和与众不同的性格特征。<sup>29</sup>

当马尔萨斯观察到“粗心和节俭的需要……掌握在穷人手中”的时候，结论就很明显了。他注意到“甚至当他们有储蓄的机会的时候，他们也很少会去做，但是一般说来所有超出他们目前生活必需的一切都会贡献给啤酒屋”。<sup>30</sup>任何像马尔萨斯那样的基督徒绅士都会下这样的结论：在缺乏道德抑制的地区，人口或被罪恶或被贫困所抑制。因此，一个好的基督徒必须善良地斥责这些恶习并现实地接受为阻止人口超出维持生计的水平而必需的不可避免的贫困。

因此，马尔萨斯拒绝所有的财富和收入重新分配的计划。这种重新分配仅增加贫困工人的数量并把他们推回到仅能维持生存的状态。有时马尔萨斯甚至指出这种重新分配在工人能够生育子女之前甚至是不会增加他们的短期福利的：

假设靠富人捐助，每天挣得 18 便士的人现在可得到 5 先令；人们也许认为，这样穷人的日子便会过得称心如意，每顿饭都有肉吃。但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结论……每天得到 5 先令而不是 18 便士，会使每个人产生幻觉，以为自己已较为富有，可以有许多时间不用去干活。这会立即对生产活动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要不了多久，不仅整个国家会比以前穷，而且下层阶级的处境也会比每天仅仅得到 18 便士时更为悲惨。<sup>31</sup>

事实上，马尔萨斯也反对用立法的形式去减轻穷人痛苦的各种努力。

最近英国的济贫法倾向于降低穷人的一般境况。首先他们一个很明显的倾向就是增加人口的数量而不增加为他们提供的食物……其次，通常未被看作最有价值的社会部分中家庭消费储备量的份额减少了，否则这一份额将属于更勤勉的和更有价值的成员。<sup>32</sup>

社会中最有价值的成员当然是指那些富有的所有者阶级，他们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方面，而且体现在文化方面。为了说明富有阶级的经济价值，马尔萨斯认为，任何社会摆脱混乱和危险的惟一途径就是建立财产权和婚姻制度。一旦这些制度建立，那些品德高尚的人将越来越多，而大多数社会成员也会在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消耗其财产。

这时，底层阶级无法维持生存，除非那些有道德的富有人士与他们分享其积累的资金。但是穷人太多，富人就只能对其加以选择。

看起来名正言顺……他们只会选择那些有能力也忠于其意愿努力创造更多剩余的人；从而使这个团体马上受益，使这些所有者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目前所知的所有国家里底层阶级普遍认为的幸福，或痛苦的程度都依赖于这种[资产所有者的]财产的状态。<sup>33</sup>

这种论述是由前面引述的论断引出的，即“不可避免的自然法则”判决所有社会都将“被分成资产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

而作为资产所有者的富人阶级的社会和文化价值就更大了。马尔萨斯相信私人财产

所有制和由此产生的阶级不平等对于人类巨大的文化成就负有责任：

无论是天才人物的全部卓越努力，还是人类心灵的所有美好而细腻的感情，实际上文明状态区别于野蛮状态的一切东西，有哪一样不是依赖于现行的财产制度？有哪一样不是依赖于表面狭隘的自爱心呢？现行的财产制度和自爱心是人类得以上升到目前这一高度的阶梯。文明人的本性尚未发生足够大的变化，使我们能够说他现在或将来能抛开这个阶梯而不掉下来。应观察到这本书的主要论点只是要证明资产阶级与劳动者阶级的必然性。<sup>34</sup>

有时，马尔萨斯并不仅仅停留在反对财富与收入的再分配和各种缓和贫困的严酷性的立法尝试上面：

事实证明，无论生活资料以怎样的速度增长，至少是在食物被分成最小份额来维持生命之后，人口的增加都受其约束。那些超出此种水平所需人口而出生的孩子都必然死去，除非那些成年人的死亡给他们让出空间。

……因此，为保持行动上的一致，我们将使得引起死亡的自然的作用更加容易，而不是愚蠢徒劳地费力阻止这种作用。如果我们担心可怕的饥荒频繁出现，我们可以刻意鼓励其他形式的毁灭，这些形式我们可以迫使自然来使用。我们可以鼓励相反的行为习惯而不是向穷人推荐清洁卫生的习惯。在城镇里，我们可以使得街道变窄令更多的人涌入屋内以求得灾祸。在乡村，我们在停滞的池塘附近建造村庄，特别鼓励在湿地或不卫生的环境下定居。但是，总而言之，我们应斥责对毁灭性疾病的特别治疗；斥责那些善意但屡次犯错还以为自己在为消除总体的混乱和无序而服务于人类的人。如果通过这些和类似途径每年的死亡率将上升……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年轻时结婚而绝对不会死于饥饿。<sup>35</sup>

也许马尔萨斯意识到即使心肠最硬的保守派都会觉得他的政治建议有点过于残忍，所以他在《人口原理》第一版的末尾表达了他假装圣洁地对于宗教和神的意愿的呼吁。在最后一章的结论处他向读者再保证说：

一般说来，生命是一种恩赐……造物主在创造出无数个人，使其能享受无限的幸福时，虽然也给人带来了一些痛苦，但同赐予人类的幸福相比，痛苦只不过是天平上的一粒灰尘。我们有一切理由认为，世间的罪恶只不过是那个伟大过程的一个要素，并未超过绝对必需的限度。<sup>36</sup>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有着重大的理论影响。它激发达尔文形成了进化论，现在这种人口理论的各种变化形式也被广泛接受了——尤其是在解决欠发达国家的经济问题的理论上。沿袭至今的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规范性定位，就是使我们相信，贫困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对此仍然束手无策，一般来说，贫困源于穷人自身的缺陷和道德低下。

## 交换经济学与阶级冲突

19世纪20年代期间及其以后,马尔萨斯的关注点由资产所有者和劳动者阶级之间的冲突转到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这两大对立的所有者阶级之间的冲突。在此期间他的大部分理论著作都收入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本章剩下的部分将全部用来讨论此书中蕴涵的思想。

马尔萨斯缺乏斯密的历史观。在他的文化界限和私利的观点里,只有两种社会形态:野蛮的非文明的状态和文明状态。他在《人口原理》中深入讨论关于在每个文明社会中“证明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的必然性”。但是这样的阶级划分不仅预先假设了货币交换和商品生产的社会,也预先假设了劳动力成为商品的社会。基于这种违背史实的观点,马尔萨斯不能够像斯密那样将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中经济剩余的占有方式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较就不足为奇了。如果他做了这样的比较,他就会同斯密一样意识到剩余是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为了理解剩余创造,必须考察生产过程,而不是货币和商品的循环过程;也就是说,交换或市场供需的过程是无法阐述剩余价值的本质与来源的真谛的。

当斯密从生产优先论(vantage point of production)来研究资本主义时,其观点体现为经济的阶级冲突观;当他从交换优先论(vantage point of exchange)来看时,其观点体现为社会和谐论。马尔萨斯强烈地意识到决定英国社会性质的阶级冲突,采用了交换或供需优先论。结果在他看来,现有的冲突是建立在忽视资产阶级经济如何运作的基础上的。马尔萨斯相信,当达到一种正确理解的时候,所有的阶级都会看到它们共同的、和谐的利益。

一般说来,交换优先论支持社会和谐论的原因在于它把现有的所有权法和现有的财产分配权看成是理所当然的。相反,生产优先论(或劳动价值论)认为这些是可以被其理论解释的经济要素,一般把它们看成阶级划分在法律上的表现。当所有权法和财产分配权被认为理所当然时,每一个交换都被认为是对交换双方互惠互利的。劳动者除了劳动力别无他物可卖,他们如果能找到买主的话——不管工资多么低廉——总比挨饿要好。因此,所有交换对于资本家和劳动者都是有益的,特别是当他们接受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共存的不可避免性的时候更是如此。

在后几章中我们将看到,交换的普遍有益性成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准核心,对此,马尔萨斯简单地论述道:

一国中发生的每一次交换都对其生产的分配发生作用使其更好地适应社会需要。就交换双方而言,用较少需要的东西去换取较多需要的东西,一定会提升交换双方产品的价

值。<sup>37</sup>

这是社会和谐论的理论基础。因此,马尔萨斯必须得证明在他所说的社会中,表面的阶级冲突是可以得到和谐的解决的。为此他辩论说,资本家和劳动者二者的最终长期利益会因地主眼前的短期利益的提升而得到提升,尽管表面看来恰恰相反:“可以断言,没有哪个阶级的利益能像地主阶级一样同[国家或整个社会的]富强、繁荣和权力如此紧密而必然地连接在一起。”<sup>38</sup>

交换优先论贯穿于马尔萨斯的分析。鉴于斯密将财富定义为劳动生产品,马尔萨斯写道:“我应该将财富定义为个人或国家自愿占有的、必要的、有用的、合意的物质对象。”<sup>39</sup>在对这个定义的注释中,他指出:“这种对象是没有负载雇佣劳动的财富。”<sup>40</sup>他将生产性劳动定义为生产物质财富的劳动。但是,他反对非生产性劳动的提法,认为它暗含了这种劳动在社会中是不重要的。他宁愿“以‘私人服务’代替非生产性劳动的说法”。<sup>41</sup>

和斯密一样,马尔萨斯认为可支配的劳动量是最好的价值测量尺度。他同样接受生产费用价值论。当所有花费使得其对象在劳动、土地和资本上获得“正常”回报率时,自然价格就表现为工资、租金和利润的总和。然而,马尔萨斯关于生产费用价值论的讨论,在两个重要方面不同于斯密。首先,不同于斯密将劳动看成生产的惟一绝对必要的社会成本,马尔萨斯认为,工资、租金和利润都是同等必要的。第二,马尔萨斯认为市场的供求力量不一定能将市场价格推向到自然价格的水平。鉴于这两个不同点的重要性,我们将对其分别讨论。

生产优先论中,我们可以将经济剩余藉以被侵吞的特定社会机构即给定经济中普遍的财产关系的形式抽象化。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生产可以看作是将自然资源转化成有用产品的劳动投入时间的一系列过程。每个生产模式都是如此。正是在生产优先论中,斯密宣称劳动是生产的惟一必要的社会成本;并且优于土地和资本的私人占有,劳动获得了其自身生产的全部收益。

马尔萨斯基于交换优先论,认为财产所有权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生产被看作是一种生产性投入的交换。每个阶级都拥有不同但同样必要的投入。如同在《人口原理》中一样,马尔萨斯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喜欢提到“碰运气”,一些人碰巧只有他们自身劳动的所有权而另一些人碰巧拥有资本和土地的所有权。他认为这三种情况下所有权的基本原则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因为劳动者并不属于其他人,或者说不是奴隶,他们与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具有同等的社会经济或法律地位)。他宣称,人们“不能认为,劳动者或者农民,在人生博彩中没有抽到土地这一奖品,就会因为被迫拿出东西换取本属于别人的东西的使用权而遭遇不公平的困境”。<sup>42</sup>

每个阶级都有其独特类型的商品,如果它将商品用于生产就必须获得酬劳。马尔萨斯坚持:“因此,以斯密为代表的把资本利润当作从劳动力产出中扣除一部分的观点是不

正确的。”<sup>43</sup>此外，“说到地主，亚当·斯密的语言又得遭到反对了。他认为，地主热衷于不劳而获，令人愤恨”。<sup>44</sup>自然价格的所有三个方面都有着共同的财产所有权基础：

土地占有者……对他们的占有物自主管理，完全同劳动和资本的占有者一样，以需求者愿意支付的价格出让或交换他们拥有的东西。

这种……[形成]任何可交换商品一般价格的……补偿，可以看成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用来支付生产过程中雇佣劳动力的工资的部分；用来支付资本利润的部分，包括带来生产便利的劳动者的进步；用来支付土地的租金或对附着在地主占有的土地之上的权力的补偿。这几个部分的价格都是由与总体价格决定同样的因素决定的。<sup>45</sup>

由于生产不能脱离自然资源、过去或现在劳动的产品而进行，而且所有这些的所有者都碰巧“在人生博彩中”中得到此种特殊类型的财产，所以每个阶级都同样有权获得相当于其财产对生产过程的贡献的补偿。从后来成为新古典经济学主导的交换优先论出发，人类对生产最明显的贡献就是占有财产——这只是一法律关系而不是生产性活动。此外，大体上仅拥有其自身的劳动力，无异于占有生产资料。

马尔萨斯将利润作为资本家生产性贡献之回报的论断过于简单了。有了工具和机器后工人能生产更多的东西。这个增加的生产力是由允许使用其工具和机器的资本家带来的。因此，斯密是错误的，资本家确实是对生产做了贡献的。马尔萨斯完全忽略了斯密关于工具和机器是过去劳动创造而在现在体现的观点。

马尔萨斯为地主辩护，认为地租也是他们对生产所做贡献的酬劳。他努力反驳当时广泛坚持的观点，即地租要么是垄断的回报要么是某种形式的不劳而获的收入。早在1815年，他就出版了一本题为《地租的性质与原因及其调节原理》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中，他提出一种地租理论，该理论与大卫·李嘉图等人同时期提出的一种理论非常相似，并且后来主要与李嘉图联结在一起。这里很简要地总结一下马尔萨斯关于地租的思想。下一章中我们将完整地讨论后来众所周知的“李嘉图地租理论”。

马尔萨斯将垄断收入与由人为的供给限制带来的收入等同。他坚持说：“地租是土壤质量最无法估计的自然结果，是上帝赠与人类的——能够维持比创造它更多的人的生活质量。”<sup>46</sup>但是土壤的回报不尽相同。“所有国家都必然存在着土壤和环境的差别，所有土地，”他辩驳道，“不可能都是最肥沃的。”<sup>47</sup>地租是由于土壤肥力的不同而产生的。

当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尚少的时候，对于食物的需要仅靠耕种最肥沃的土地就能满足了。然而，随着资本积累和人口增长，耕种土壤肥力渐次的土地就成为必要了。在比较贫瘠的土地上，生产给定数量的农产品的利润和工资成本就增加了。因此，要在比较贫瘠的土地上获得农业利润，农产品价格就必须上涨到足够高的水平以弥补这些增加的成本。但在最肥沃的土地上生产给定数量农产品的成本依然要低得多。随之而来的是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产生了超过肥沃土地上庄稼生产成本的较大的价格剩余。正是这一由土壤肥力

不同产生的剩余构成了地租的基础。因此,地租不是人为限制供给的回报,它源于自然给人类的馈赠的差别。马尔萨斯还是没有质疑财产所有权,而是认为自然的馈赠可以很恰当地被看作地主在生产中的个人贡献。除了认为地租的基础是土壤肥力的不同,马尔萨斯还认为土壤肥力的某些差异是由于地主对土壤的改良,且租金也有利润所没有的特殊的社会价值,即增加的食物生产使得更多的人口得以生存并因此创造了其自身的需求,因为新增的人口也必须吃饭。他还说道,制造品的增加不能为更多的人口提供必需品,从而也就不能创造任何额外的需求。在他的供给过剩或萧条理论中,可以看到,这种需求创造是农业重要的社会收益。

在讨论高额地租的经济原因过程中,马尔萨斯总结道,高额利润、经济繁荣和人口增长总体上导致了农产品生产的增加。增加的农产品生产必然引起所耕种土地的肥力持续下降从而增加地租。因此,高额地租是经济和社会繁荣的结果也是经济和社会繁荣的最好的“晴雨表”。

地租是现在的勇猛和智慧以及过去的实力和能力的回报。每一天人们都是用勤劳和才智的果实来购买土地的。他们买得起这一巨大奖赏,对每种值得称颂的努力悠闲自得;在社会进程中,我们有种种理由相信,随着资本、人口的增长和农业的进步,他们的价值将增长,而由此产生的收益也将被分配给更多的人们。

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每一种观点中,由于我们本性的规律,土地质量必然产生地租,这似乎是对人类幸福最重要的一种恩赐。<sup>48</sup>

## 供给过剩理论

马尔萨斯与斯密的价格理论的第二个区别是他坚持认为市场的供求力量无法自动将市场价格推向自然价格。马尔萨斯写道,“商品价值,在其被估计的地方,就是它的市场价格而不是自然价格。”<sup>49</sup>当市场价格不同于自然价格时,前者“决定于不平常或者偶然的供求关系”。<sup>50</sup>正是在其对此种不平常或者偶然的供求关系的分析中,马尔萨斯对经济理论作出了其最重要的、影响最深远的贡献——他的供给过剩或萧条理论(theory of gulfs, or depressions)。

虽然,较之马尔萨斯,斯密和李嘉图利用生产优先论得出了对剩余价值性质的更成熟的理解,但马尔萨斯的交换优先论也许是促使他以更加全面和精巧的方式研究货币和商品循环过程的一个契机。马尔萨斯意识到所有生产商品的自然价值都要通过货币交换来实现,这些与其自然价值相等的商品的货币需求就必须在总体上是“有效的”(或者如今天普遍标注的“有效率的”)。因为所有商品的自然价值的组成部分代表社会中三个阶级的



收入,某一既定时期,构成所有商品生产的总的自然价值的总成本,必须与这一时期三个阶级的收入相等。因此,有效需求同所有生产商品的价值相等的必要条件,是从总体看来每个生产时期这三个阶级必须愿意并能够将他们的集体收入用来购买生产的商品。

花费收入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为消费而获得商品,第二种是获取商品作为资本积累。古典经济学家(和几乎迄今为止所有经济学家)都把储蓄定义为扣除消费支出之后剩下的收入。于是,在所花费的所有收入中,作为资本积累的商品支出必须等于被储蓄起来的收入额。(现代经济学家将以资本积累为目的而购买当前生产的商品定义为投资。因此,总供给和总需求相等的必要条件是投资等于储蓄。)

亚当·斯密已经意识到这个货币和商品得以平稳持续循环的必要条件。然而他假定,没有人会储蓄,除非他希望将来使用。利用这个储蓄,他就能积累资本给原来的储蓄增加利润,就能将钱借给资本家以获得资本家利润的一部分,且以利息形式支付。无论如何,比起让货币闲置来,人们都会在将来获得更多的收益。于是斯密得出结论:

一个人节省了多少收入,就增加了多少资本。这个增多的资本,他可以亲自投入到雇用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亦可以有利息地借给别人,使其能雇用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

每年节省的像每年花费的一样,经常被消费掉,而且,几乎是同时被消费掉。但消费的人不同。<sup>51</sup>

因此,斯密以及几乎所有其他古典经济学家都认为,资本主义不会存在对所有待售的生产商品的总需求不足的困境。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确存在并经常发生这种问题。

从一开始起,无论何处只要依靠市场的供求力量来调节商品生产和资源分配,结果就会引起经济危机和萧条的反复出现。在这样的萧条中,商人总是难以为其商品找到买主,生产能力闲置,工人失业比平常更为严重,贫困和社会危机的增加也就不可避免了。

1818年后期的英国,农业价格迅速下跌,随之而来的是1819年的大萧条。大萧条导致了严重的失业、劳动者斗争精神的复苏和普遍的社会动荡。当年8月,数以千计的工人涌上曼彻斯特街头示威。英国政府出动了军队,示威者被残忍地镇压了。十名示威者被屠杀,数百人重伤,这就是广为人知的“彼得卢(Peterloo)大屠杀”。在此仅一年之后马尔萨斯就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一版。马尔萨斯深知,萧条不仅可能而且的确已经发生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他也非常清楚这种工人起义的潜在的革命性危机。他写《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惟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更深地理解这些危机或过剩,并提出缓解的政策。这些政策当然总是与他的观点一致的,即“这个国家里没有哪个阶级的利益能像地主阶级一样同富强、繁荣和权力如此紧密而必然地连接在一起”。<sup>52</sup>

显而易见,对马尔萨斯来说,产生商品巨大供给剩余的原因是周期性的有效需求不足。为了找出需求不足的根源及其解决方法,他分析了三个阶级各自的消费模式。贫困的劳动者花光了全部收入以维持生存。资本家被资本积累的热情驱使着没有花费许多利

润在消费或个人服务之上的嗜好和时间。他总结道：

此种消费与资本家大方的实际习惯是不相符的。他们生活的最大目的就是积累财富，因为供养家庭是他们的职责，并且他们被迫一天七八个小时待在账房里也没法花掉收入来获得很大的舒适。<sup>53</sup>

然而，地主是悠闲的绅士。有源源不断地租收入的保障，他们把所有的收入花在舒适的环境、仆人与赞助艺术、大学和其他文化机构上面。他们总是将其所有收入花在消费品或者“个人服务”之上，并在此过程中提升“人类天才的所有最崇高的努力以及灵魂上所有细致微妙的情感”。<sup>54</sup>

这三个阶级都试图花掉他们所有的收入，但是资本家试图将其所有利润花在新的资本上面。马尔萨斯认为，问题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家必然会拥有太多的收入。他们无法将他们全部的积蓄用于资本的投资并盈利。马尔萨斯写道，“在繁荣时期，几乎所有的商人和厂商积累的速度都比国家资本增长的速度要快得多，从而维持高生产价值”。<sup>55</sup>

马尔萨斯必须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资本家为何不像斯密所言，在他们扩张资本的时候，尽其所能不断雇佣更多的工人创造更多的利润呢？马尔萨斯给出了两个答案。新的资本或者是体现与以前相同的技术，或者用于使工人效率更高的技术革新。他相信，无论哪种情况，问题都会出现。

繁荣时期，如果将利润投资在体现与旧资本相同的技术的新资本上，那么任何既定量的新资本都会雇佣与等量的旧资本相同数量的工人。为了得到足够多的工人，这就必然要求劳动力与资本同比例增长。问题是随着繁荣来临，资本将会马上开始增长。但马尔萨斯坚持道，“很明显……从人口的本质和成年劳动力进入市场所需的时间来看，资本和生产突然增加无法在16年或18年以内实现与之成比例的劳动力供给”。<sup>56</sup>因此，当新的资本超过劳动力供给时，就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某些资本将雇佣不到劳动力从而仍然会闲置。第二，会有暂时的劳动力短缺。“如果市场中劳动力储备相对不足”，马尔萨斯写道，“地主和资本家将被迫给每个工人分配更大的生产量”。<sup>57</sup>在这种情况下，“工资……将持续上涨……只要资本持续增加”。<sup>58</sup>无论哪种情况，资本家都宁愿以无息的现金形式持有其收入也不愿继续因为积累更多资本而降低现有资本的利润。因此，资本家会停止花费其所有收入，从而就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了。

这种货币和商品循环的不平衡无疑的确会出现，马尔萨斯分析了其影响并对经济理解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这种分析看起来是同他的人口理论相抵触的。尽管事实是，资本积累率是“突然的增加”的，但是成年劳动力的规模却不能突然增加。为什么会有要求人口突然增加的资本的突然增加呢？这个问题在其人口理论中并没有解释清楚。不管利润率和跟着发生的积累率是多少，一旦他们历史地形成了，人口增长率似乎就只能同积累率相适应了。因此，如果资本都以每年10%的速度积累，人口只要一年增长10%就能为

10%的资本增长提供劳动力,而这需要16年时间。类似的,如果这一增长率在一段时间内维持不变,那么16年前的人口增长就足以满足当前劳动力需求了。这个难题,在笔者看来,是存在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而并非其供给过剩理论。

第二种可能的积累涉及到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技术变化。新的节约劳动的资本将代替劳动。可以用更多的资本和更少的劳动来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但是工人的失业将减少需求,因此,

如果前者(固定资本替代)的速度快于后者(为从替代中产生的更多的供给和被挤出雇佣市场的劳动力的新产品寻找适当市场)的速度的话,那么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和社会中劳动阶级的痛苦就将作为普遍现象。<sup>59</sup>

因此,无论如何供给过剩的最终原因都是导致不可持续的资本积累率的过量利润。马尔萨斯认为,这个问题的惟一答案是实施改变收入分配的政策,给资本家少一点利润,其他阶级就有更多的收入可用于消费。马尔萨斯的供给过剩理论与围绕谷物法的论战,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现在得以浮出水面了。用马尔萨斯的话来说:

因此必须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阶级,他们愿意并且有能力消费比他们所生产的更多的物质财富;否则,商业阶级就无法继续进行远超过其自身消费量的生产并获得利润。在这个阶级中,地主无疑居于显著的地位。<sup>60</sup>

地主本身不能消费掉所有过剩的物质产品。马尔萨斯认为,他们可以雇佣大量的奴仆和其他非生产性劳动者,或者那些提供“个人服务”的人,这些人会将其收入花费在制造部门生产的物质商品上。因此,马尔萨斯的解决方案需要创造出一支作为地主奴仆的非生产性工人大军。他们仅消费物质财富而不生产,因此消除了总需求不足问题。

于是,确保有效需求充足的惟一途径是再分配政策,如谷物法等,允许地主收取更多的租金,从而通过他们自己及其奴仆支出增加总需求而不引起更多的生产增加。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又将依赖于地主阶级利益的提高。为了进一步巩固他的例证,在说明了地主阶级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对于英国是必不可少的之后,马尔萨斯争辩道,地主阶级在国会的政治权力也是全社会的最佳利益所在:

这是不可辩驳的史实,即我们目前的宪法和迄今显示英国人特色的自由与特权的最初的形式和接下来的保护及进步,主要都归功于地主的贵族统治。<sup>61</sup>

最后一个问题是:马尔萨斯是如何反驳通过增加工资以增加总需求的再分配的呢?从他的《人口原理》中,人们可能认为他的观点是再分配没有任何社会利益,因为工人数量的增加只会将他们推回到最低生存水平。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在他的供给过剩理论中,马尔萨斯至少是在短期内抛弃了其人口论。再看看《人口原理》,人们也许认为他会说工资的增长“使得人们感觉自己相对富裕”并因此而成为“生产性工业强烈而直接的阻碍”。<sup>62</sup>

尽管《政治经济学原理》后面的论述中有暗示，马尔萨斯反对增加工资的主要观点还是包含在如下这段话之中：

仅靠劳动阶级的消费能力无法促进资本的利用，认识到这一点确实是最重要的。没有人会仅仅为了那些为其工作的人造成的需求而动用资本。除非他们生产了超过其消费的价值剩余……很明显，他不会雇佣资本来维持他们的需求……工人阶级消费的巨大增长必然大幅增加生产成本，这一定会降低利润，减少或者毁灭积累的动机。<sup>63</sup>

这一段话很有趣，因为它说明了本书前一章表述的一个观点：当一位显赫的思想家犯了看起来明显的逻辑错误时，通常说明这位思想家的社会取向或阶级忠诚而非纯粹的逻辑能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他或者她所作的结论。因为阶级收入分类与生产成本的三个组成方面是相同的，任何导致地租和工资上升的政治手段，如谷物法等，都会起降低利润的作用。马尔萨斯正确地假设，资本家反对通过增加工资减少利润的改革同他们反对通过增加地租减少利润的改革的理由是相同的。

大卫·李嘉图，当时资产阶级的主要知识分子代言人，很快清楚地看到了马尔萨斯结论的错误。他写道：

从未来角度来看，正如火一样，非生产性劳动者也是必要且有益的，消费厂商仓库里的商品，否则就是这些非生产性的劳动者来消费它们了……让另一个人来消费我的商品却不给我任何回报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呢？这样的消费怎么能让我实现我的利润呢？……为使资本家继续保持他们储蓄的习惯，马尔萨斯说：“他们一定要么消费多些要么生产少些。”……那些由非生产性劳动者消费的商品是给与而不是出售给他们以换取等价物的……从一个制衣厂拿走100块布给士兵和水手做衣服，会给他带来利润吗？这会刺激他的生产吗？——是的，会以与火所做的一样的方式……如果马尔萨斯的学说正确的话，那么还有什么比增加军队和让所有政府官员的薪水翻倍更明智的方法呢？<sup>64</sup>

在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论战中谁才是正确的呢？按照笔者的观点，他们都是部分正确，但是各自都忘掉了对方观点的部分正确之处。资本主义的确倾向于产生货币和商品循环的不平衡性。这些不平衡性频繁地以经济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危机中总需求不足以购买生产出来的全部商品。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集体作为一个阶级而言，出于自身利益要找出扩大需求的途径。但是，每个资本家，作为个体而言，觉得他或她自身的生产成本不会对他或她产品的需求产生直接而显著的影响。但是他或她的成本的确显著影响利润。因此他们有强烈的动机使得生产成本尽可能的低。但是就集体而言，资本家的生产成本产生了用于购买其商品的收入。因此，对单个资本家来说，理想的做法是，使其自身成本保持尽可能低的水平而所有其他的资本家都支付高工资和高租金，从而对该个体资本家的产品形成高需求。

简言之,作为个体而言的任一资本家的需要与作为集体而言的所有资本家的需要之间存在矛盾冲突。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各自都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个难题的一个方面,但是都试图以忽略或否定问题的另一面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样的解决方法过去和现在都是行不通的。我们将在第15章中更充分地讨论这个难题,并评估他的思想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

## 注 释

1. E. J. Hobsbawn, *Industry and Empir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50*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8), p. 72.

2. Paul Mantoux,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27), pp. 410~11.

3. 同上,第413页。

4. 同上,第416页。

5. Hobsbaum, *Industry and Empire*, p. 67~68.

6. 引自 F. Engels,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New York: Macmillan, 1958), p. 46.

7. 引自 Hobsbaum, *Industry and Empire*, 第74页。

8. 同上,第75页。

9. Mantoux, *Industrial Revolution*, p. 74.

10. 同上,第449页。

11 第一版《人口原理》和《总论》是在同一卷中出版的, T. R. Malthus,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and a Summary View of the Principles of Population*, ed. A. FLew (Baltimore: Penguin, 1970). 第二版有两卷。 T. R. Malthus,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New York: Dutton, 1960).

12. T. R. Malthu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4).

13. 引自 Alexander Gray, *The Socialist Tradition* (London: Longmans, 1963), p. 119.

14. 同上,第131页。

15. 同上,第119页。

16. 同上,第119页。

17. Malthus, *First Essay*, vol. 1, p. 68~69.

18 同上,第144页。

19 同上,第143页。

20. Malthus, *second Essay*, vol. 2, p. 68~69.

21. 同上,下册,第179页。

22. Malthus, *First Essay*, vol. 1, p. 226.

23. 同上,第225页。

24. 同上,第238页。

25. 同上,第 242 页。
26. Malthus, *second Essay*, vol. 1, p. 19。
27. 同上,上册,第 14 页。
28. 同上,下册,第 13 页。
29. 同上,第 1 卷,第 13 页。
30. Malthus, *First Essay*, vol. 1, p. 98。
31. 同上,第 94~95 页。
32. 同上,第 97 页。
33. 同上,第 143~44 页。
34. 同上,第 176~77 页。
35. Malthus, *second Essay*, vol. 2, p. 179~80。
36. Malthus, *second Essay*, vol. 1, p. 215~16。
37. Malthu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p. 282~83。
38. 同上,第 206 页。
39. 同上,第 33 页。
40. 同上,第 34 页。
41. 同上,第 35 页。
42. 同上,第 76~77 页。
43. 同上,第 76 页。
44. 同上,第 76 页。
45. 同上,第 7 页。
46. 同上,第 148 页。
47. 同上,第 149 页。
48. 同上,第 216~17 页。
49. 同上,第 78 页。
50. 同上。
51.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37), p. 321。
52. Malthus, *Principles*, p. 206。
53. 同上, p. 400。
54. Malthus, *Second Essay*, vol. 1, p. 176~77。
55. Malthus, *Principles*, p. 400。
56. 同上,第 280 页。
57. 同上,第 279 页。
58. 同上,第 277 页。
59. 同上,第 238 页。
60. 同上,第 400 页。

61. 同上,第380页。
62. Malthus, *First Essay*, vol. 1, p. 95.
63. Malthus, *Principles*, vol. 1, p. 404~5.
64. 引自 Sydney H. Coontz, *Productive Labour and Effective Demand*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y, 1996), pp. 45~46.

## 第 5 章 大卫·李嘉图

大卫·李嘉图(1772~1823)出生于英国富裕资本家家庭,他的父亲从荷兰移民至英国,从事证券交易并发了财。年轻的李嘉图比其父在证券交易中表现得更为出色,在 30 岁之前就已经是一个大富翁。1799 年,李嘉图阅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之后,从那时一直到他去世,他一直都在致力于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写作,同时继续扩大其财产。一般认为,大卫·李嘉图是最严谨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家。他超越其所处的时代,构建了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抽象模式,并描述了资本主义的所有逻辑内涵。此外,他的经济理论体系建立了一套抽象演绎经济模型,至今仍一直主导着经济理论。与亚当·斯密一样,大卫·李嘉图对于 19 至 20 世纪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和保守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都有很深刻的影响。毫无疑问,他是近代最具有影响力的五六位经济学家之一。

李嘉图与马尔萨斯生活在同一个混乱的时代,与后者一样,李嘉图也深受法国革命、工业革命、不断加强的工人运动和英国资本家与地主之间斗争的影响。李嘉图对工人阶级的态度与马尔萨斯没有根本差别。他接受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以及有关工人阶级贫穷的本质和原因的结论。李嘉图写道:

关于马尔萨斯先生的《人口原理》,我在这里能有机会表示赞扬,不胜欣幸。反对这部伟大著作的人的攻击只能证明它的力量。我相信它应有的声誉将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而传播遐尔,因为它对于这门科学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sup>1</sup>

李嘉图虽然是马尔萨斯的私人密友,然而,他与马尔萨斯在经济理论上一生都是对手。他们对资本家和地主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社会问题持有不同的看法,李嘉图自始至终都是资本家阶级利益的辩护者。他们理论上的主要分歧在于他们对于价值理论和马尔萨斯供给过剩理论的不同看法。



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以下简称《原理》)一书序言中,李嘉图叙述了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

土地产品——即将劳动、机器和资本联合运用在地面上所取得的一切产品——要在土地所有者、耕种所需的资本的所有者以及进行耕种工作的劳动者这三个社会阶级之间进行分配。

确立支配这种分配的法则,乃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sup>2</sup>

1815年,马尔萨斯出版了《论谷物法的影响、地租的性质与发展》,李嘉图立即进行了阅读。他认识到马尔萨斯的地租理论完善了他自己一直在研究的利润理论。<sup>3</sup> 相对制造业商品的价格,他总结了谷物价格是取决于由劳动力和资本在肥力递减的土地上,谷物生产越来越低的生产力。他还总结出利润率是由农业劳动力逐渐降低的生产力决定的。马尔萨斯的地租理论对隐含在李嘉图利润理论中的观点进行了明确的叙述。马尔萨斯的这本小册子发表后三个星期,李嘉图出版了《论低价谷物对资本利润的影响,不合时宜的进口限制》。在此书中,李嘉图首次阐述了其分配理论的基本观点。

李嘉图在《原理》一书中的地租理论是他1815年《论低价谷物对资本利润的影响,不合时宜的进口限制》一书中所表达观点的继续。他将地租定义为“使用土地的原有和不可摧毁的生产力而付给地主的那一部分土地产品”。<sup>4</sup> 李嘉图的地租决定理论是以两个假设为基础的:首先,土地肥沃程度具有差异,所有土地都可以按照从最肥沃的土地到最不肥沃的土地的顺序进行排列;其次,竞争总是使从地主那里租借土地进行耕种的资本家的利润率趋于相等。李嘉图对自己的地租理论进行了最好的总结。因此,有必要详细地引用他对地租决定因素的讨论。在阅读这段引文之前,读者还是有必要先了解李嘉图对净产品的定义。净产品是生产产品总额扣除生产中的必要支出(包括支付生产中所消耗资本和工人的工资)之后的部分。因此,净产品是指劳动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表现为利润或地租。用李嘉图自己的话来表述其地租理论:

使用土地支付地租……只是因为土地的数量并非无限,质量也不是相同的,并且因为在人口的增长过程中,质量……较差的土地也投入耕种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当次等肥力的土地投入耕种时,头等的土地马上就开始有了地租,而地租额取决于这两份土地在质量上的差别。

当三等土地投入耕种时,二等土地马上就会有地租,并且也和前面一样,数额由生产力的差异规定。同时,头等土地的地租将会提高,因为它的地租必然总是高于二等土地的地租,差额等于这两份土地用一定量资本和劳动所生产的产品之差。一个地区的人口每发展一步,这个地区就不得不使用质量较差的土地以增加食物的供给,这时一切较肥沃的土地的地租就会增长。

假设第一、二、三等土地使用等量资本和劳动时所产净产品分别为100、90和80夸特谷物……一旦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以至必须耕种……第二等土地时,第一等土地马上就会有地租;因为要么就是农业资本必须有两种利润率,要么就必须从第一等土地的产品

中扣除 10 夸特……用于某种其他用途。无论耕种第一等土地的是土地所有者还是别人，这 10 夸特都同样会形成地租。因为第二等土地的耕种者无论是耕种第一等土地而支付 10 夸特地租，还是不支付地租而继续耕种第二等土地，他用他的资本所获得的结果总是相同的。同样，我们也可以证明：当第三等土地投入耕种时，第二等土地的地租必然是 10 夸特……而第一等土地的地租则增长到 20 夸特。因为第三等土地的耕种者无论是耕种第一等土地而付 20 夸特的地租，还是耕种第二等土地而付 10 夸特的地租，还是耕种第三等土地而不付任何地租，他所得的利润总是一样的。<sup>5</sup>

资本家农场主之间的竞争使地租能够以这种方式进行。假设在李嘉图例子中，耕种一等土地的农场主，在三等土地被投入耕种后，仍只支付 15 夸特地租。那样一来，投入相同的资本，他就可以获得 85 夸特的利润（100 夸特净产品减去 15 夸特地租），而其他两位资本家农场主只获得 80 夸特利润。其他两位资本家农场主如果对一等地地主支付更多的地租，比如说 18 夸特，来取得对该土地的耕种权，就可以增加他们的利润。因此，只要一等地土地的地租低于 20 夸特，资本家就会有动力进行竞争从而抬高地租。只有当一等地土地的地租被竞价到 20 夸特时，资本家不再有竞争动力。在 20 夸特这一点上，所有资本家农场主的利润都是一样的。李嘉图相信，一般来说，竞争将使所有资本家的利润率趋于相等。“所有使用资本的人都希望放弃比较不利的行业而倾向于比较有利的行业，”李嘉图写道，“这种孜孜不息的要求具有一种强烈的趋势，使得大家的利润率都平均化。”<sup>6</sup>

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对其经济模型得出的结论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用图 5.1 和图 5.2 来加以说明。在图 5.1 中，三个条状几何图形分别代表李嘉图图例中的净产品。净产品由利润和地租构成，也就是总产出扣除工资和生产中所消耗的资本。如果只有一等土地投入耕种，资本家农场主获得 100 夸特的利润。如果二等土地也投入耕种，竞争将使一等土地的地租抬高到 10 夸特，因而每一个资本家都获得 90 夸特利润。如果三等土地也被投入耕种，竞争会将二等土地的地租抬高到 10 夸特，同时将一等土地的地租抬高到 20 夸特，每一位资本家将获得 80 夸特的利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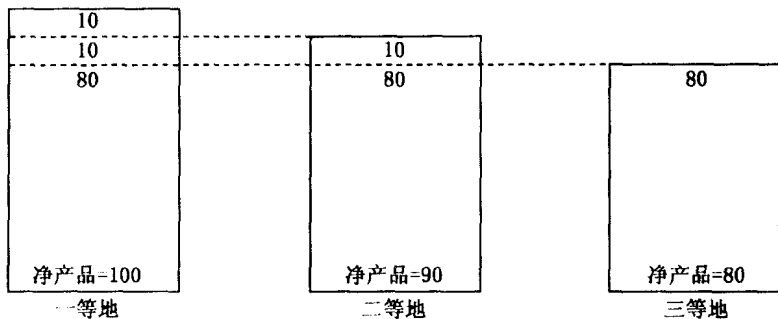


图 5.1 三种不同等级土地上的净产品和地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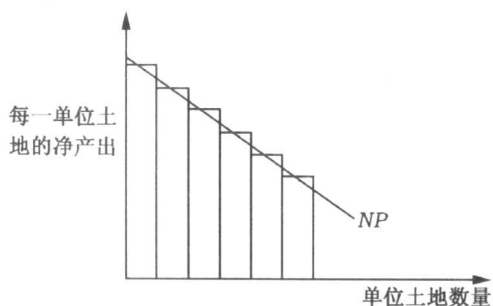


图 5.2 农业部门逐渐降低的生产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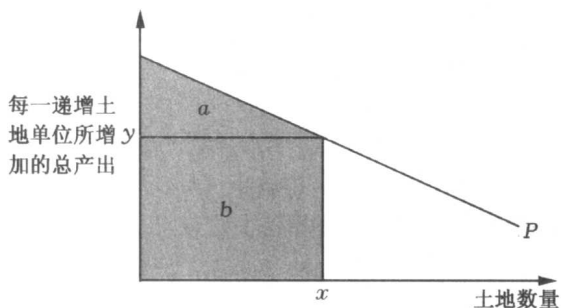


图 5.3 地租与利润和工资的区分

由于不断有土地被投入耕种,我们划分土地的等分又是随机的。因此,既然我们假定土地肥力持续下降,我们就可以把土地分成越来越小的等分,每一等分取得比前一等分少的净收入。将这些条状几何图形放入一个坐标轴中,其轴分别代表投入耕种的土地等分和每一等分的净产品,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如图 5.2 所示的图形。由于等分越来越小,这些梯形条块的顶部也越来越近似于一个向下的斜线。我们可以假设每一土地单位小到可以用一条直线来表示土地逐渐降低的肥力。在图 5.2 中,  $NP$  就是这样的一条直线。它表示每一小单位的净产品随着投入耕种土地的增加而减少。如果我们假定工资是生产中的惟一开支,那么,每一单位耕种土地所支付的工资可以被加到图 5.2 中的  $NP$  直线上代表全部的产出。结果可以得到一条如表 5.3 中的直线,代表随投入耕种土地增加,在任一土地单位数量上的全部产出额  $P$ 。  $NP$  直线只代表净产品(利润加地租),直线  $P$  则代表全部产品(利润加地租加工资)。如果  $x$  个单位的土地被投入耕种,那么,  $y$  则代表投入耕种的最后一单位土地(或没有地租的土地)的全部产出。三角形  $a$  将是地主阶级地租收入的总额。长方形  $b$  则代表农业资本家和农业工人利润和工资的总额。这个图形在下面将被用来阐述李嘉图模型中最重要的一个结论。

李嘉图的利润理论也许是他全部理论中最重要的核心部分。在他初次探讨利润理论时,他假设了一种简单经济,由地主、资本家和工人组成,只生产谷物。李嘉图将利润视为一种剩余。我们已经知道,竞争将使所有资本家农场主,不论是耕种优良土地还是耕种没有地租的边际土地的,利润趋于一致。因此,利润是由耕种没有地租的资本家的土地上的利润来决定的。

李嘉图接受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和其中最重要的推论——即人口增长倾向于使劳动工资保持在维持生存的水平。因此,没有地租的土地上的利润水平相当于该土地的全部产品减去维持在该土地上劳动的劳动者生存的必要开支。换言之,利润就是扣除支付工资之后的剩余。在这种简单的商品模型中,资本纯粹由谷物构成,资本家也以谷物支付工人的工资。因此,利润率是用谷物表示的,没有地租的土地上的净产品与工资的比率。只要净产品随投入耕种的土地的肥力下降而减少,并且只要谷物工资率保持不变,利润率(用谷物表示的净产品与用谷物表示的工资之比)就必定会下降。

这种利润理论被称作是李嘉图的“谷物利润理论”。<sup>7</sup> 李嘉图认为这种模型能够很容易地推广到制造业商品行业。因为如果人口增长减少了农业的利润率,而且如果利润率仅仅只由没有地租的土地上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决定,并且如果竞争使所有利润率保持相等,那么,制造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利润率都只取决于没有地租的土地上的生产率。

### 资本家和地主之间冲突的经济基础

我们现在可以用图 5.3 来阐述李嘉图在《论低价谷物对资本利润的影响,不合时宜的进口限制》中“地主的利益总是与社会中其他任何阶级的利益相对立的”的论点。<sup>8</sup> 李嘉图认为经济繁荣即等同于资本积累和资本积累所孕育的经济增长和繁荣(所有的古典经济学家都这么认为)。当资本家获得利润之后,他们进行资本积累,这导致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这种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导致了市场工资率上涨到超过自然工资率(维持生存的工资率水平),这又导致了人口的增长。只要资本家能够继续获得利润,这一过程将会不断地循环下去。只要这种循环持续出现,经济就会增长,就会出现普遍的繁荣,劳动力工资就会高于维持生存的水平。但是,由于农业生产率下降导致地租挤出利润,并最终使经济陷入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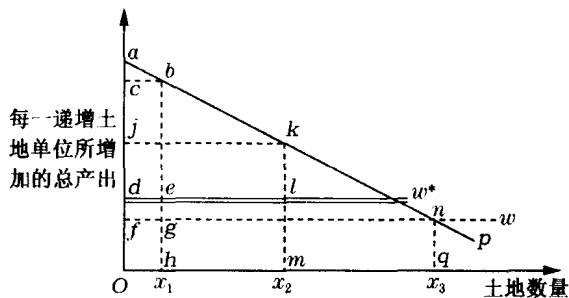
图 5.4 阐述了李嘉图的这种推理。该图与图 5.3 一样,除增加了  $w$  线来表示必须支付给在单位土地上耕种的工人维持生存的工资,增加了双  $w^*$  线以表示只要存在资本积累,就可能有较高的工资。该图上的许多地方都用字母标示出来以说明我们的观点。

假设我们观察有  $x_1$  个单位的土地被投入耕种的那一点,并假定已经有资本积累,工资率是在  $w^*$ 。现在,在  $x_1$  点,总产出中的地租部分用三角形  $abc$  来表示。工资用长方形

$Ohed$  来表示(而长方形  $fged$  代表超出维持生存水平工资之外的剩余)。剩余部分是利润,或者说由长方形  $debc$  表示。 $w^*$  的工资超出维持生存的水平,人口将增长。而这又要求将更多的土地投入耕种。

现在假设人口增长到有  $x_2$  点所代表的土地投入耕种。在这一点上,工资由长方形  $Omlk$  表示,而地租则由三角形  $akj$  表示,利润由长方形  $dlkj$  表示。注意当工资率保持不变时,总利润、利润率也一样,作为总产出的一部分,大幅度下降了。

从图 5.4 中容易看出这种经济增长有一个最终的限度。一旦有  $x_3$  点所代表的土地被投入耕种,工资将被推回到维持基本生存的水平线( $w$ );地租由三角形  $anf$  表示,工资则由长方形  $Oqnf$  表示。由于没有利润,工资将回到维持基本生存水平。



注:  $P$  代表每一递增单位土地所增加的总产出  
 $w$  代表每一单位土地维持生存水平的工资  
 $w^*$  代表积累工资

图 5.4 随耕种边际扩张而产生的收入分配的变化

这解释了为什么在资本家和地主争夺剩余产品或净产品的斗争中,李嘉图认为农业生产率的降低会导致利润持续地被越来越高的地租所挤出。因此,在他的《论低价谷物对资本利润的影响,不合时宜的进口限制》中,李嘉图将地租叙述为:“无一例外全部都是源于土地利润的一部分。它……绝不是一种新的收入方式,而总是已经创造了的收入的一部分。”<sup>9</sup>

在李嘉图的模型中,地租并不直接挤出利润,而是由于维持劳动力主要生计的方式——谷物成本增加导致了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李嘉图不得不说明工资的上涨如何从净产品中越来越大的份额从利润重新分配地租。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假设了一个不变的平均价格水平(或者说一个不变的货币购买力)。由于他认为竞争使所有的利润率趋于相等,那么,随着谷物和劳动力价格上涨,价格将会随之调整以使经济中不同行业的利润率保持一致。谷物生产中所包含的劳动也增加了,因为劳动随边际耕种扩张而变得缺乏效率。这降低了农业部门的利润。但制造业中的劳动生产率仍然保持不变。因此,制造业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没有变化。为了使竞争保持相同的利润率,有必要使大多数的制

制造业商品价格下降到与谷物相当的价格。由于李嘉图假设有一个不变的平均价格水平，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将至少由部分制造品价格的降低来抵消。这些价格变化的结果是在两个部门中重新建立统一但相对较低的利润率。边际耕种的每一次增加将因此导致制造品价格水平的进一步普遍下降（所有价格，包括农产品价格，又再一次保持在相同的平均水平之上），并导致利润率的普遍降低。利润的下降意味着积累率的下降，因此，妨碍了经济的增长和导致了社会福利的普遍减少。

基于上述理由，李嘉图反对谷物法。通过禁止谷物进口，英国政府正迫使农业部门不断将越来越贫瘠的土地投入耕种。这降低了利润，并且如果持续足够长时间，将使经济增长停滞。在谷物法论战中，李嘉图的观点无疑比马尔萨斯的理论更具有连贯性和逻辑性，虽然李嘉图的观点通常并没有能够影响代表地主利益的大多数国会议员们。

然而，马尔萨斯找到了攻击李嘉图的几个理由，其中的一个理由得到了李嘉图特别认真的考虑。马尔萨斯写道：

利润取决于商品的价格，并取决于决定这些价格的其他因素，即与需求相对的供给……（而李嘉图的）利润理论则完全取决于当货币价值不变时，相同价格条件下生产商品的外部环境。而忽略了劳动力价格的变化……如果商品并不总是保持相同价格，而是受到很大的不同影响，一些商品价格上涨，而一些商品价格则下降，同时还有小部分商品价格仍然保持不变，那么对因货币工资上涨而引起的利润率变化问题，我们不能作任何推断。<sup>10</sup>

李嘉图意识到为了反击马尔萨斯的批评，捍卫自己的模型，他需要找出更完整的价格理论。他在《原理》中正是这样做的。

## 劳动价值论

在《原理》一书中，李嘉图一开始便论述了所有具有价值的商品必须具有效用，否则，这些商品将不可能在市场上出售，效用并不能节制价值。他叙述道：“具有效用的商品，其交换价值是从两个泉源得来的——一个是它们的稀少性，另一个是获得时所必需的劳动量。”<sup>11</sup>接下来，他论述了稀缺性只对于那些不能任意进行再生产的商品才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些商品，例如“罕见的雕像和图画、稀有的书籍和古钱，以及只能在数量极为有限的特殊土壤上种植的葡萄所酿制的特殊葡萄酒等”具有“与原来生产时所必需的劳动量全然无关，而只随着希望得到它们的人的不断变动的财富和嗜好一同变动”<sup>12</sup>的价值。

然而，这些商品在李嘉图看来非常不重要。他坚持认为大多数商品“只要我们愿意投下获取它们所需的劳动，这类物品就可以……几乎没有定限地增加”。<sup>13</sup>这些能够任意地

进行再生产的商品正是李嘉图价值理论的研究对象。

后来的效用价值论倡导者提出的观点比李嘉图的理论更具普遍性。这些效用价值论理论家认为所有价格最终取决于“希望得到它们的人的不断变动的财富和嗜好”。然而，效用价值论这种广为接受的理论对李嘉图不可能产生多大的影响，他认为那几个不能进行再生产的奢侈品对影响“土地产品……在三个社会阶级之间进行分配”<sup>14</sup>的分配规律没有任何作用。因此，它们对于资本积累无关紧要。资本积累是一个国家福利的主要决定因素。“一国的生产量必然会随着资本的减少而成比例地减少……而年再生产量又不断减少时，人民和国家的资源就会日益迅速地趋于枯竭，贫困和灾殃就会随之而来。”<sup>15</sup>

劳动价值论使李嘉图更加关注那些影响资本积累的因素。效用理论对如何理解这些因素从来没有起过任何作用（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来探讨其中的原因）。因此，李嘉图也不会被效用理论可以解释那几个稀有的、不能进行再生产的奢侈品的价格，而劳动论只能解释可以任意进行再生产商品的价格下述事实所影响，即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会讨论劳动价值论关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社会性而效用价值论只关注交换的个别性的问题。为此，后一种理论在后来的越来越被广泛接受的过程中，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李嘉图写道：“如果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规定商品的交换价值，那么，劳动量每有增加，就一定会使在其上施加劳动的商品的价值增加，劳动量每有减少，也一定会使之减少。”<sup>16</sup>对于这一点的重要性，李嘉图毫不怀疑“除不能由人类劳力增加的东西以外，这一点实际上是一切东西的交换价值的基础。这是政治经济学上一个极端重要的学说”。<sup>17</sup>

李嘉图发展了这一理论，首先，他简单地假设商品价格与生产过程中生产它们所消耗的劳动成严格的比例。然后，他具体描述了这一简单原理在一些特殊条件下是怎样被修改的。李嘉图认为这些修改完全可以进行系统而连贯的解释，因此，并不与劳动价值论相冲突，而恰恰显示了该理论的复杂性和现实性。

李嘉图赞赏亚当·斯密先前已经引述的论断。

例如，狩猎民族捕杀1只海狸所耗费的劳动通常2倍于捕杀1只野鹿所耗费的劳动，那么1只海狸自然就会交换2只野鹿，也就是值2只野鹿。通常耗费2日劳动的产品，其价值会2倍于通常耗费1日劳动的产品，通常耗费2小时劳动的产品，其所值会2倍于通常耗费1小时劳动的产品，这是自然的道理。<sup>18</sup>

与亚当·斯密不同的是，李嘉图认为这个断言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和“早期野蛮”社会状态同样适用。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对这个有关所包含劳动和商品价格的简单比例的断言需要做几个规定和修改。在进行修改之前，李嘉图讨论并否定了劳动价值论的两个缺陷。首先，不能混同不同技能和工资水平的不同劳动。其次，劳动价值论没有说明自然资源和资本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两个缺陷自劳动价值论问世以来一直反复出现。因此，李嘉图对这两个缺陷问题的回答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讨论关于劳动者之间不同的劳动技巧和工资水平的问题时,李嘉图主要对随时间而产生的相关价格的“改变”,即为什么农业价格会随制造业价格上涨而上涨产生了兴趣。在这一点上,他十分正确地断言了不同劳动技巧和工资率的一般结构“一经形成,就很少发生变动”。<sup>19</sup>从中他得出一个有效的结论:

因此,比较同一商品在不同时期的价值时,我们无需考虑这种商品所需劳动的相对熟练程度和强度,因为它的作用在两个时期里是相同的。<sup>20</sup>

但是,当劳动价值论被用来解释特定时间内相关价格的具体结构时,该理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不充分的。李嘉图下面这句话后来成为对该问题充分解答的基础:“不论……学习一种手艺所需要的技术、技巧或时间比另一种多多少,其差别总是世代相传近乎不变。”<sup>21</sup>劳动价值论以后的发展采用了这个论点,即技能水平的差别会由于掌握技能所需的时间而减少,这也说明了技术劳动本身也是由于劳动的运用而产生的。因此,在计算商品中所包含的全部劳动时,技术劳动等于简单非技术劳动的倍增。李嘉图没有得出这个结论而后来马克思却得出了这个结论,主要原因在于李嘉图并没有将劳动力本身的价值决定方式,等同于其他商品价值的决定方式。马克思将劳动力视为一种商品,其价格可以像其他商品一样进行解释,这使得他比李嘉图在发展劳动价值论方面更进一步。

然而,针对劳动价值论没有考虑关于土地和资本可能使劳动生产力得到提高的指责,李嘉图的回答更加完整。这一答复作为劳动价值论的整体阐述沿用至今。李嘉图认为工具和机器是劳动的“中间”产品,由于能够生产出最终的消费性商品而被制造出来。生产是一系列运用劳动的过程,它将不能使用的自然资源通过人类活动转换为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没有转换的环境,生产无法进行,因此人类无法生存。但如果认为环境本身具有生产性则是对人类生产活动的能动性的否定。生产和交换价值的产生仅仅与人类劳动相关。李嘉图坚持认为自然资源:

由于使产品数量增加,使人类更为富裕,并增加使用价值。所以对我们是有用的;但由于它们所做的工作无需报偿,由于使用空气、热和水时无须支付任何代价,所以它们供给我们的助力就不会使交换价值有任何增加。<sup>22</sup>

李嘉图当然清楚地租是支付给自然资源所有者的。实际上,《原理》的大部分内容都在分析地租。但是,严格地说,地租是一种分配劳动产品的社会方式。生产却只是单纯的人类活动。就人类耗费成本而言,李嘉图将自然资源描绘为“无偿地起作用”当然是正确的。他非常赞同地引用了亚当·斯密如下的话:“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劳动是第一价格,是最初用以购买一切货物的代价。”<sup>23</sup>

那么,自然资源是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所转换的对象。但它们仅仅是无偿地存在,并不构成生产的社会成本。资本只是人类劳动的产品,代表着部分地转换为其最终使用形式



的资源。比如说,人类劳动生产出织布机仅仅是为了有助于布料的进一步生产。因此,织布机包含了部分最终体现在布料中的人类劳动。这样一来,织布机可以被当成生产出的布料的一部分。生产是一种人类活动。李嘉图认为织布工和生产织布机的劳动者一起生产了布料,而不是如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认为织布工和织布机一起生产出了布料。我们引用李嘉图自己的话来说:

例如,在评定袜子的交换价值时,我们就会发现它和其他物品相对而言的价值取决于制造它和把它运到市场上所必需的劳动总量。首先是耕种生产原棉的土地所需的劳动;其次是运送棉花到织造地的劳动,其中包括以运费形式收取的制造运棉船舶所投下的劳动的一部分;第三是纺纱工人和织袜工人的劳动;第四是修建织袜厂房和制造织袜机器的工程师、锻工和木工的一部分劳动;第五是零售商人以及其他无需一一列举的人的劳动。以上各种劳动的总和决定袜子所能交换的其他物品的数量,而对于其他物品所投下的各种不同劳动量的这种考虑,也会同样决定其交换袜子时所要付出的数量。<sup>24</sup>

李嘉图认识到机器在生产中的作用仅仅是过去的劳动,他这是在重复斯密的观点,这也是劳动价值论的起点。但是,李嘉图关于资本主义的观点缺乏历史性,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是自然的或永恒的。因此,他将资本主义以前的所有历史都仅仅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阶段。结果,他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断言资本无处不在,并且是与工具、机器和生产出来的其他生产资料一样的。他写道:“资本是国家财富中用于生产的部分,包括实现劳动所必需的食物、衣服、工具、原料、机器等等。”<sup>25</sup>因此,他断言:“即使是在亚当·斯密所说的那种早期状态中,虽然资本可能是由猎人自己制造和积累的,但他总是要有一些资本才能捕猎鸟兽。”<sup>26</sup>当“捕猎海狸和野鹿所必需的一切工具可能属于一部分人,捕猎所用的劳动可能由另一部分人提供”<sup>27</sup>时,李嘉图认为即使工人制造并拥有他们自己的资本,那也不会导致一个与现实迥异的价格体系。

李嘉图进而推理,当劳动者拥有自己的资本时,他们的收入将由利润和工资组成。价格体系也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运行,但每个人都同时是劳动者和资本家。李嘉图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尽管工具总是在生产中使用,但利润绝不会因为仅仅拥有工具就自然地产生。直到一个阶级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而获得垄断,另一个阶级被剥夺了所有生存方式而不得不靠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商品时,人们才想象或设计通过拥有资本来获取利润。当这种阶级关系发展起来之后,资本于是产生了。而工具却是自有人类生产以来便一直存在。我们在第7章将讨论的托马斯·霍奇斯金(Thomas Hodgskin)提出了资本的基本特征是它反映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

排除了劳动价值论前面提到的两个缺陷之后,李嘉图接着研究了导致亚当·斯密放弃劳动价值论的缺陷。由于李嘉图只考察了没有地租的边际耕作中的农业生产和制造业,所有的价格只分解为工资和利润。地租是由农业产品价格(该价格又取决于耕种程

度)决定的剩余收入部分。因此,地租并不是决定价格的费用的构成成分,而是由价格决定的剩余物。因此,通过分析决定商品自然价格的生产费用,李嘉图仅仅考察了利润和工资。除没有将地租当成生产的必要开支的一个部分之外,他对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定义与斯密是一致的。他分析了供给和需求如何通过使所有利润率保持一致,而使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趋于相等,这一观点也与斯密的观点相同。劳动价值论的问题是说明由工资开支和利润开支构成的自然价格,如何由包含在商品生产中的劳动来决定。

### 资本构成不同时的价格决定

我们知道斯密已经认识到为了使价格和其所包含的劳动成比例,必须使每一个商品保持相同的工资—利润比例。但由于竞争使不同资本的利润率趋于一致,因此,相同的工资—利润比例必然暗示着在每一个商品生产中,有一个相同的资本—劳动比例。他意识到每一个行业的资本额根据行业有很大的不同,并且这种差别会一直存在。他因此抛弃了商品中的劳动决定其价值的论调,而采用了一种简单的生产费用价格理论。

李嘉图和马克思都认为竞争会使不同资本的利润率趋于一致。他们还认为,当劳动和资本处于社会平均的工资率和利润率水平时,自然价格(或均衡价格)与生产费用相等。但他们两人都意识到由于工资和利润都是价格或是从其他价格中产生,如果不找出本身不是价格的原因或决定因素,就不可能从总体上解释价格。我们在第3章对亚当·斯密理论的讨论中,解释了为什么他的价格理论总体上是循环的,因而显得不够充分。对于李嘉图和马克思而言,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是偶然因素或是非价格的决定因素。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这将在以后章节进行讨论)是解答了这个问题的惟一连贯的理论。

然后,李嘉图必须说明,即使是具有不同的资本—劳动比例,劳动价值论也必须进行修改,以表明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和该商品的交换价值有系统的联系。如果假设有两个资本家公司,就可以简单地理解这个问题,在第一家公司,所有者的资本几乎完全由一个基金组成,该基金在生产的商品出售前,支付生产过程中工人的工资。在第二家公司,所有者的资本主要是由昂贵的机器构成,只有小部分资本是用于支付工资的基金。如果在第一生产阶段,每家公司雇佣100名工人,第一家公司的商品价格必须等同于这100名工人的工资加上利润,比如说基金的10%,以使资本家能够支付工人工资。第二家公司的商品价格要高一些。第二家公司的商品包含了100名工人的劳动加上生产那些昂贵机器工人的部分劳动。因此,第二家商品的价格由100名工人的工资,加上资本家支付工资基金的10%的利润率,加上生产中所耗费的机器的费用,加上资本家投资机器货币的10%的利润率。把所有这些开支加在一起,第二家商品的价格是第一家商品价格的两倍。

现在,让我们假设在下一阶段的生产中,不管由于何种原因,工资率上涨。假设产出

和劳动就业率相同,并使用同样的生产技术,显然,高工资将导致利润下降。但如果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是其价格的惟一决定因素,只要商品所包含劳动保持不变,相关价格将保持不变。

但是如果考虑新价格,工资构成第一种商品大约90%的费用,利润占10%。工资的上涨将会对新价格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而利润率减少的影响则相对较小。第一种商品的价格无疑将显著上涨。工资在第二种商品费用中所占比率相对较小,因此,工资上涨的影响对于该商品的全部费用来说相对影响较小。生产使用的机器费用可能上涨,也可能下降,这取决于工资上涨对生产该类机器的公司的影响。但第二家公司商品的费用中包括工资基金和生产中使用昂贵机器的利润。因此,新的较低的利润率对第二家公司商品费用的影响要比对第一家公司商品费用的影响大得多。

第二种商品的价格可能出现三种变化。首先,工资费用的小幅增长除抵消利润率引起的费用下降外,仍会有盈余。在这种情况下,价格将会上涨,但是以比第一种商品小得多的比例上涨。其次,其增加的工资费用可能正好等同于其下降的利润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价格将保持不变。第三,利润开支的下降可能会比工资费用上涨的幅度更高,在这种情况下,价格将会下降。(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忽略由于工资率的变化,第二家公司不得不为其机器支付的价格的变化。)

在这三种情况下,有一个事实存在:不管第二种商品的价格上涨或下降,第一种商品的价格会比第二种商品的价格增长幅度大得多。因此,价格比率将不再是2:1;第一种商品将有一个较高的相对价格。价格比率将上升到比如说1.5:1。我们能够从这个例子中推理出第二种商品必须仍然具有较高的价值(因为它除有同样的工资费用之外,还有机器成本),而这两种价格的不同将会减少(因为第一种商品的价格相对第二种商品增加)。最重要的是当两种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没有变化时,价格比例却发生了变化。正是这个现象促使亚当·斯密放弃了劳动价值论。

李嘉图的任务是解释在何种情况下,工资率的变化,甚至是在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不变的情况下,会导致相对价格发生变化。这一点对于李嘉图非常重要,因为他坚信扩大农业边际耕种会使谷物价格上涨,而谷物价格的上涨又要求有更高的工资来维持劳动力的生存,高工资总是降低一般的利润率水平并降低制造业商品的平均价格水平。他必须运用劳动价值论来阐述,随着边际耕种的扩大,所有这些后果是如何发生的。他认为,工资率的变化在三种情况下可能改变相对价格,即商品价格将与商品所包含的劳动不成比例的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维持劳动的资本和投放在工具、机器、厂房上的资本的比例也可能有各式各样的配合方式”。<sup>28</sup>这也是我们上面的例子中所讨论过的那种情况,即资本家工资基金与其机器的价值有不同比率。李嘉图将资本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在流动资本中,包括了工资、原材料和在一次生产过程中被消耗掉的所有资本。固定资本指那些具有

更大耐久性的资本。如果这两者在两个生产过程中具有不同的比例,那么,价格将与商品所包含的劳动量不成比例。第二种情况是,“不同行业所使用的工具、用具、厂房和机器的耐久性可能是彼此不一的”。<sup>29</sup>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生产中投入的直接劳动与实际上所耗费的机器费用相等,拥有更耐久性机器的资本家将会有更多的货币投资在机器上。相同的利润率意味着该资本家,相比拥有不那么耐久性的机器的资本家,可能得到相对于生产中所包含的劳动更多的利润。因此,这两种价格与生产中所包含的劳动量不成比例。第三种情况是“(不同资本家的资本以)不同的速度……返回其雇主”。<sup>30</sup>虽然投入的劳动数量相同,但相对于投资时间短的资本家,投资时间长的资本家所获利润更多,比例更高。

实际上,李嘉图的三种特殊情况仅仅是看待同一个现象的不同方式而已。由于这种现象自李嘉图以来劳动价值论中都相当重要,我们将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

李嘉图的三种特殊情况都能够以如下两种方式进行归纳。首先,如果我们将资本视为仅仅是作为生产投入的先前生产的产品,那么,在每一种情况下,商品与生产中的劳动的比率都是不同的。记住李嘉图是将资本视为体现在现在生产过程中的商品的过去的劳动投入的替代物,我们可以这样复述:在这三种特殊情况下,过去劳动(包含在商品之中)和现在劳动的比率都是不同的。其次,只要我们引入了过去和现在这两个名词,我们就已经将时间度量引入了生产之中。在李嘉图的三种情况下,如果将生产视为以时间顺序的劳动投入也是正确的,那么,每一种情况下,都会有不同的劳动输入的时间顺序。叙述李嘉图三种情况的这两种方法都是相同的。

我们现在来阐述不同的资本—劳动比例(或者说过去劳动与现在劳动之比)的作用。首先,在图 5.5 中,我们看到了资本是怎样被改变为一系列的以时间为顺序的劳动投入。最上一排条形代表了生产性的劳动投入( $l$ )和以前生产的商品( $c$ )。商品( $c$ )由劳动( $l_1$ )和商品( $c_1$ )在前一段时间生产的。而商品( $c_1$ )依次由劳动( $l_2$ )和商品( $c_2$ )在更早以前生产,以此类推。每一种情况下,代表商品的条块由虚线组成以显示这些商品可以由前阶段投入的劳动和使用的商品所代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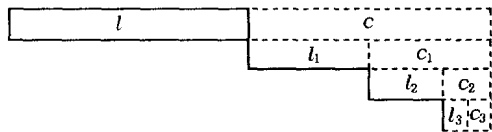


图 5.5 过去劳动的资本递减

在图 5.6 中,我们简单地省掉了代表商品的虚线长方形。这种省略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一个商品条块都恰好等同于先前的劳动和商品。在一些点上,剩余商品已经小到可以被忽略不记的程度。生产过程中所剩余下来的是一系列以时间为顺序的劳动。在图 5.6 中,现在的劳动被标为  $l$ ;过去的劳动有一个下标,显示表明过去在几个时段中运用

了该劳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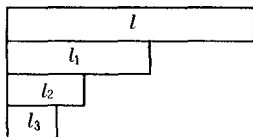


图 5.6 以时间为顺序的劳动投入

当认识到利润源于资本家投资于整个生产过程的资本,我们也就找到了问题的根源。譬如在图 5.6 所代表的生产过程中,资本家三年前雇佣了劳动力,这由  $l_3$  表示(假设每一阶段为一年)。 $l_3$  生产的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到现阶段末,才在完成的消费商品中得到真正实现。三年前,资本家支付了  $l_3$  的工资。那年底, $l_3$  所生产的中间商品价值是劳动开支加上资本家由于在生产中投入了资金而获得的利润。下一年年底(两年前),资本家重新积累利润,这次是在过去阶段所投入,现在仍然在生产中使用的工资开支和利润的基础之上。这一相同的过程年复一年地重复进行,三年前的初始资本每年以累加的利率增长。

例如,如果这一阶段  $l_3$  的工资开支是 100 美元,利润率是 10%,那么,资本家有两种选择。他们可以在这一系列的一年生产过程的开始将这 100 美元进行投资,然后将这 100 美元连同其所获利润一起每年进行重复投资。他们也可以如图 5.6 中所表明的那样进行一个四年的投资项目。如果资本家选择第一种方式,他或她第一年底将获得 110 美元。将这 110 美元重新投资,第二年年底,这个资本家将获得 121 美元,第三年年底,他或她将获得 133.10 美元。因此,如果这个四年投资每年的利润相等,代表包含在劳动中的那部分资本的商品在最后一年年初将获得 133.10 美元的价值,这部分资本最后一年生产的利润一定是 13.31 美元。因此,劳动  $l_3$  原来耗费了资本家 100 美元,最终带来 146.41 美元价格的商品。其中,100 美元偿还资本家 100 美元的初始工资开支,46.41 美元被作为这 100 美元四年投资的利润。如果资本家进行四个一年投资项目,每年接受 10% 的利润,假若资本家每年都将这 100 美元和其利润重新投入投资,那么,到第四年底,他将获得与以上同样的数额。

这就是为什么在李嘉图看来,给每个工人更多的资本和更长的生产周期都会带来同样的结果。如果资本家只将这 100 美元投资两年,最后一年年初该资本的价值为 110 美元(100 美元加上前一年 10% 的利润)。但是如果资本家将 100 美元投资四年,该投资额在最后一年年初的价值将为 133.10 美元(100 美元加上第一年的 10 美元利润,第二年的 11 美元利润和第三年的 12.10 美元的利润)。因此,即使在这两种情况下,初始工资成本相等(因而资本中所包含的原始劳动相同),但进行四年投资的资本价值大于进行两年投资的资本的价值。

## 价格决定的数字例解

虽然价格决定的数字实例相当乏味,但如果举一些这样的实例,而不是仅仅依赖于抽象的数学公式,大多数读者就可以更容易地理解这个原理。因此,我们将通过数字阐述:(1)不同的资本—劳动比例怎样导致价格与所包含劳动不成比例;(2)工资率的变化怎样改变价格。在图 5.7 中,阐述了两种生产过程。在(a)中,400 个单位的劳动生产了 100 个单位的商品  $x$ ,而在(b)中,400 个单位的劳动生产了 100 个单位的商品  $y$ 。它要求 100 个单位的现在劳动(用  $l$  表示)和 300 个单位的过去劳动(用  $c$  表示),在过去四年中,统一采用每年 75 个单位劳动来生产商品  $x$ 。它要求 300 个单位的现在劳动和 100 个单位的过去劳动,在过去两年中,统一采用每年 50 个单位劳动来生产商品  $y$ 。显然,如果商品的价格与其所包含的劳动成正比,这两个价格应该相等。然而,商品  $x$  有更多的过去劳动和更长的生产周期,它因此会具有更高的资本与现在劳动的比例。我们假设所有的商品投入在每一个生产过程都被消耗完。

我们用图 5.7 的生产公式来做两个简单的计算。在第一个计算中,我们假设工资率是每劳动单位 1 美元,利润率为 50%。在第二个计算中,我们假设工资率是每劳动单位 2 美元,利润率减为 10%(这两个例子中的利润率和工资率有很大变化,以便更戏剧性地阐述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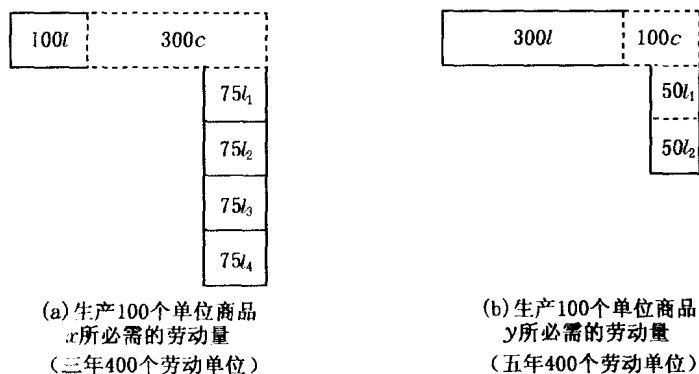


图 5.7 具有等量劳动和不同资本构成的两个生产过程

我们可以从表 5.1 中看出,在这些特别的利润和工资率上, $x$  的价格比  $y$  的价格翻了一番多,即使它们都在 100 个单位的商品中包含了 400 个单位的劳动。这两种商品之间的不同全部在于生产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中, $x$  的费用中包含了更多的利润。

表 5.1 工资率为 1 美元、利润率为 50% 时的成本 and 价格 (以美元计)

	A. 劳动成本 (劳动单位数量乘以工资率)	B. 机器成本 (过去劳动成本乘以年利润率)	C. 利润成本 (利润率乘 A 和 B 之和)	D. 总成本 (A+B+C)	E. 每单位价格 (D 除以 100)
商品 $x$	100.00	914.08	507.04	1 521.12	15.21
商品 $y$	300.00	187.50	243.75	731.25	7.31

现在,我们假设工资率上升到每单位劳动 2 美元。相同的生产数量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平分,其结果是利润率必定下降。我们还假设该利润率下降到 10%。当李嘉图断言高工资率总是意味着低利润率时,他是在比较生产技术和产出数量相同情况下的两种状态。表 5.2 显示了这些新比率的计算结果。

表 5.2 工资率为 2 美元、利润率为 10% 时的成本 and 价格 (以美元计)

	A. 劳动成本 (劳动单位数量乘以工资率)	B. 机器成本 (过去劳动成本乘以年利润率)	C. 利润成本 (利润率乘 A 和 B 之和)	D. 总成本 (A+B+C)	E. 每单位价格 (D 除以 100)
商品 $x$	200.00	765.78	96.58	1 062.36	10.62
商品 $y$	600.00	231.00	83.10	914.10	9.14

比较表 5.1 与表 5.2 的结果时,可以得出三个重要的结论。首先,工资率的变化极大地改变了  $x$  和  $y$  的相对价格。在表 5.1 中, $x$  的价格比  $y$  的价格翻了一倍多,但在表 5.2 中, $x$  的价格只是相对  $y$  的价格有轻微上涨。这表明了正是由于利润的不同才导致价格与所包含的劳动不成比例。在表 5.2 中,利润要小得多。因此,价格比例与劳动比例的偏差也小得多。如果工资率上升到零利润的水平, $x$  和  $y$  的价格将相同,反映了它们所包含的相同的劳动总额。

值得注意的第二点是这些表格表明了为什么李嘉图否定了亚当·斯密的断言,即工资的增加总引起劳动生产商品价格的上涨。在表 5.2 中,工资率翻番的结果却使商品  $x$  的价格从 15.21 美元下降到了 10.62 美元。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没有能够认识到在任何一个产出水平上,资本家和劳动者都是劳动生产的竞争对手。当生产技术和产出总额保持不变时,工资率的上涨只能通过利润率的下降来实现。这一点对于李嘉图的观点十分重要。如果工资率上升,随之而来的利润率下降将会降低利润所占成本比例较大的商品的价格。

这两个表中阐述的第三个重要的观点是:只要利润率是正数,商品  $x$  将会一直比商品  $y$  具有较高的价格。商品  $x$  同时还比商品  $y$  具有更高的资本—劳动比例。这为李嘉图提供了两个系统的预言价格比例与劳动比率相偏离的规则。首先,只要利润率是正数,

价格比率将以每个工人资本比例产生偏离相同的方向,偏离劳动比例。换言之,包含了相同劳动量的两个生产过程,投放较多资本额的单位工人(capital per present labourer)的生产过程总会具有较高的价格。所谓投放较多资本额的单位工人与李嘉图所指具有较高的耐用品—流动资本比例的生产过程,或具有更高耐用性机器,或具有更长的资本家资本返还周期的生产过程是一回事。<sup>31</sup>其次,利润率越高,价格比例与劳动比例的偏差就越大。

### 收入分配和劳动价值论

我们现在回到对李嘉图价值理论的讨论,其价值理论是如何与他早期简单的谷物利润理论模型的结论结合在一起的。在那个简单的模型中,只生产谷物,利润率是由单个工人在没有地租的边际土地上[或净产品减去在所有土地上单个工人的地租(rent per worker)]生产的净产品与每个工人为维持生存所必需的产品数量之比决定的,这两者都以谷物表示。研究李嘉图思想的主要学者莫里斯·多布简要地阐述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在其整个经济理论中的地位。

通过劳动价值论……李嘉图实际上是以劳动代替谷物来表达产品,工资和剩余产品的数量。利润现在由作为剩余产品,或为生产维持劳动者生存的所需劳动与全部劳动量之间的差额所构成。<sup>32</sup>

用李嘉图自己的话来说,在劳动所生产的全部价值中,一些

所生产的价值虽然增加了,但这一价值在支付地租后所剩余的部分中却有更大的比例由生产者消费,而规定利润的正是这一比例,也惟有这一比例……于是,我们又得到了以前曾经试图确证的同一结论: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时期中,利润都取决于在不支付地租的土地上或用不支付地租的资本为劳动者提供各种必需品所必需的劳动量。<sup>33</sup>

正是社会生产产品价值总额以及其在社会三大阶级之间的分配引起了李嘉图的兴趣。商品价值是由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决定的,但是,个人资本的价值差异会导致价格的差异。李嘉图写道:“在研究商品价值变动的原因为时,完全不考虑劳动价值涨落所发生的影响固然是错误的,但过于重视它也同样是错误的。”<sup>34</sup>

这些差异由于两个原因而变得相对不那么重要。首先,李嘉图认为这些差别非常小。<sup>35</sup>其次,当考虑李嘉图分配和积累理论所关注的数量总额时,价格比例与劳动比例的不同可以被忽略。显然,如果所有的生产过程都具有相同的资本构成,这些比例将会是相同的。依此类推,在一个生产过程中,在社会平均资本构成条件下所生产出来的任何商品



总是具有与其所包含的劳动成比例的价格。以高于社会平均资本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在“工资上涨时,它们就会跌落;工资跌落时,它们就会上涨”。而以低于社会平均资本生产的商品的价格会“在工资上涨时上涨,在工资跌落时跌落”。<sup>36</sup>从平均的定义可以看出,超过平均的偏差正好抵消了低于平均的偏差。因此,任何“对于一切和它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商品或者与社会平均资本有相同的组合的商品“是完美的价值尺度”。<sup>37</sup>因为,其价格仅仅决定于其所包含的劳动。

当李嘉图考察复杂经济的时候,净产品和工资的总额是由许多商品组成的。为了测量这些总额并得出一个利润率,李嘉图不得不寻找一种当工资和利润发生变化时,其价格一直保持不变的商品。其他商品因此可以用这种商品进行衡量,而它们的价值总量不会随工资和利润的变化而变化。如果李嘉图没有能够找到这样一种商品,他的总量将不仅仅反映劳动生产的实际商品的数量,而且反映收入分配。进一步说,正如我们在先前的数字例解中所观察到的,当某种商品的生产涉及一系列偏离了社会平均的资本组合时,要了解详情该商品价格在何种程度及比例上,相对于其所包含的劳动而变化,取决于先前对利润率的了解。换言之,李嘉图的价格理论要求先确定利润率,才可能计算价格比例与所包含劳动比例发生的偏差。

由于这些原因,对于李嘉图来说,寻找一种在平均社会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商品作为“不变的价值尺度”<sup>38</sup>就非常重要。斯密与马尔萨斯都在寻找这样的一种价值尺度,是李嘉图第一个认识到这种寻找的极端重要性。这样的价值尺度对于直至今天的劳动价值论理论家来说,一直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不幸的是,李嘉图没有能够找到任何一种可以作为不变的价值尺度的商品。虽然明明知道这并非最佳选择,但他也只好尝试暂时地将黄金作为这样的商品。

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李嘉图为图 5.4 中所阐述的简单分配模型构筑了更为精巧的理论框架。其中的理论精华,可以用李嘉图自己的话来进行简述:

利润的自然趋势是下降的;因为在社会和财富的发展中,必要的食品增加量是通过牺牲越来越多的劳动获得的。<sup>39</sup>

但假定谷物价格因谷物生产所需的劳动量增加而上涨,这一原因并不会使生产所需的劳动量没有增加的工业制品价格上涨……但如果工资由于谷物价格增加而上涨(这是绝对肯定的),他们的利润就必然会下落。<sup>40</sup>

因此,工资每有上涨……就会使运用性质耐久的资本生产出来的商品的相对价格降低,并使运用较易耗损的资本生产出来的商品的相对价值相应地提高。<sup>41</sup>

因此,在研究商品价值变动的原因为时,完全不考虑劳动价值涨落所发生的影响固然是错误,但过于重视它也同样是错误的……商品相对价值的一切巨大变动都是由于生产所必需的劳动量时有所增减而引起的。<sup>42</sup>

商品……也会由于工资和利润的涨落而发生另一种虽然是次要的变动……但如果商

品的价格不随利润率的涨落而变动,其利润就不会相等了。<sup>43</sup>

如果一个制造业者售货所得价款始终相等,他的利润就要取决于制造这些商品所必需的劳动的价格……因此,工资上升,利润就会成比例地降低。但是人们也许要问:如果农产品价格也上涨,农场主虽然支付更多的工资,他所获得的利润率是否至少会和以前不同呢?当然不相同,因为他不仅要和制造业者一样,对所雇每一劳动者增付工资,而且还必须支付地租,或增雇劳动者以取得同量的产品;同时,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只会与所付地租或增雇的人数成比例,而不会为他补偿工资的上涨。<sup>44</sup>

(最终,随着利润跌落)就已经没有积累的动机;因为人们积累只是为了使积累能够生产,而且也惟有这样使用,它才会产生利润,没有积累的动机就没有积累。<sup>45</sup>

这种积累中止的结果是经济进步的停滞,市场工资率下降到维持生计的水平之下并引致社会普遍危机和贫困。这就是李嘉图的静止状态。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李嘉图的理论是悲观和阴郁的,因为他的模型似乎暗示着这种静止状态是不可避免的。其他人则认为李嘉图的理论是错误的,因为该理论没有预见19~20世纪农业生产中的技术变化。这些变化或多或少地导致了农业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因此,李嘉图理论的两个断言都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之上。

李嘉图从劳动理论或生产角度观察社会。他主要强调其所处时代的两大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因此,他的理论中,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是相互对立的。他反复强调:“如果工资上涨,那么,利润必然会下降”。<sup>46</sup>同样,资本家和地主的利益也总是相互对立的。他的理论实际上并没有试图预言下一个世纪将要发生的事情,而是要试图影响国会对正在讨论的一些问题和政策的看法,特别是他希望看到谷物法被废除。

在考察社会三大对立阶级的时候,李嘉图与马尔萨斯一样认为,由于收入增加,工人阶级倾向于增加家庭人口,所以,他们总是在维持生计的水平线附近徘徊。在地主和资本家的冲突中,李嘉图试图说明地主的利益总是与社会的普遍富裕相对立,而资本家的利益总是与社会的普遍富裕相一致。

英国在19~20世纪并没有面临食物生产的危机。然而这是因为英国废除了谷物法并允许食物自由进口,还因为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率提高了。从以下两段李嘉图《原理》的引文中,很显然可以看出,他明了这些:

幸而生产必需品的机器常有改良,农业科学也有发现……所以才屡屡遏制了利润的这种(下降)趋势。<sup>47</sup>

反之,在面积小但土地肥沃,特别是允许自由输入食物的国家中,就可以积累巨额资本而不致引起利润率的大大减低或地租的任何大量增加。<sup>48</sup>

李嘉图只是试图说服国会议员们相信地主的利益是与英国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的这两个促进因素相对立的。显然,国会议员们反对食物自由进口。李嘉图还认为农业技术

的进步会立即降低谷物的劳动含量并降低农产品价格。地租会马上减少,尽管进一步的耕种会最终恢复甚至使地租上涨。一般来说,地主反对导致地租下降的任何因素。李嘉图总结道:

除此以外,地主的利益永远是和消费者以及制造业者的利益相对立的……地主和社会上各阶级之间的关系跟买卖双方都可以说得到了利益的贸易关系不同,这种关系是一方面完全受损失,另一方面完全得到利益。<sup>49</sup>

### 供给过剩的不可能性

马尔萨斯的理论将总需求不足(inadequate aggregate demand)描述为周期性供应过剩的原因,或者说,萧条是马尔萨斯鼓吹地主应该获得国民生产更大份额的基础。李嘉图自然反对这种理论。首先,正如我们在以上章节中所述,李嘉图认为让资本家来补助不从事生产的地主的消费,对资本家来说,就如同在资本家的仓库放了一把火,烧掉了资本家的一些商品。其次,李嘉图认为供给和需求会自动地调整价格和总产出的构成,因此,普遍的过剩是不可能的。李嘉图以后又提出一种从根本上与法国经济学家J. B. 萨伊的理论相类似的观点。该分析通常是与萨伊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该分析被称为萨伊定律)。该定律将在下一章做详细的解释。萨伊定律具有很大的影响,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的追随者。

该理论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它断言资本家生产他们自己不需要的产品,仅仅是因为他们期望能够用这些商品来交换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货币调节交换,但是对货币本身并没有需求。生产者生产一件商品以与不同的商品进行交换。当生产者将商品与货币进行交换时,他或她是试图用货币再来交换其他商品。因为,除能够购买其他商品外,货币本身并不具有使用特性。没有人愿意储藏货币。因此,生产创造了自己的需求。资本家生产每一美元商品的同时,也就为其他商品创造了一美元的需求。李嘉图非常简明扼要地叙述了这一点:

任何人从事生产都是为了消费或销售;销售则都是为了购买对于他直接有用或是有益于未来生产的某种其他商品。所以一个人从事生产时,他要不是成为自己商品的消费者,就必然会成为他人商品的购买者和消费者。<sup>50</sup>

产品总是要用产品或劳务购买的,货币只是实现交换的媒介。某一种商品可能生产过多,在市场上过剩的程度可以使其不能偿还所用资本;但就全部商品来说,这种情形是不可能有的。<sup>51</sup>

然而,李嘉图也认识到,《原理》第三版出版的前十年一直是商业大萧条和普遍失业的

时期。他对此的解释与那些在其后一百六十年中,尽管有不断的周期性危机和经济萧条,但仍然相信资本主义会自动创造充分就业的理论学家所提倡的相似:

大的工业国家特别容易遭受由于资本从一种行业转移到另一种行业而引起的暂时困难和意外事故……任何一种制造品的需求都不仅要受到购买者的需求支配,并且要受其嗜好和变化无常的欲念支配……(当对一种商品的需求减少时)从事制造这种商品的人都会遭到很大的困难,并且无疑还会受到若干损失。这种情形不仅会在发生变动的时候出现,并且会在他们把他们的资本和他们所能支配的劳动由一种行业转移到另一种行业的整个期间内出现。<sup>52</sup>

因此,李嘉图将其时代所出现的经济萧条解释为仅仅是对前一段战争年代供给与需求的非正常模式的必要调整。

### 机器导致的非自愿失业

然而,在与马尔萨斯的辩论中,李嘉图在《原理》第三版中还是做了一个大的妥协。他增加了题为“论机器”的第31章。这一章专门讨论了在生产过程中取代劳动力的新机器会对工人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性。在第1章中,李嘉图就讨论了引进能够降低资本家生产成本的新型机器的后果。他推断,这将导致生产增加和由机器生产而带来的较低的商品价格。因此,他总结说,整个社会将从这些机器中获益。

然而,那些……能够使用不致增加商品生产费用的机器的制造业者,如果仍然可以为他的商品取得和以前一样的价格,他就可以得到特殊的利益。但是……他将不得不降低自己商品的价格,否则资本就会流入他的这种行业中去,直到他的利润降至一般水平为止。因此,受机器之惠的便是一般公众。<sup>53</sup>

李嘉图相信,社会总能受益于引进机器的观点是建立在市场价格将平稳而迅速下降,劳动力将平稳而迅速地进行重新分配以增加生产量的假设的基础之上的。然而,李嘉图与马尔萨斯的辩论使他相信情况并不一定如此。在《原理》第三版中,李嘉图以如下叙述开始了他新增的第31章:

自从我开始注意政治经济学问题以来,我一直认为在任何生产部门内应用机器,只要能节省劳动,便是一种普遍的利益,其不便之处只是资本和劳动由这一种用途转移到另一种用途时在大多数情形下会出现的一些麻烦。在我看来,地主的货币地租如果不变,用地租购买的商品的价格的跌落将有利于地主,而价格跌落必然是采用机器的结果。我还认为,资本家最后也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获得利益。发明机器……虽然可以暂时获得厚利

而享受额外的好处。但随着机器的普遍应用,产品的价格就会由于竞争而降到等于其生产成本的程度。这时资本家们所得到的货币利润就会和从前一样,因而便可以用同样的货币收入支配更多的享用品和享受……我认为,劳动者也将因为采用机械而同样得到好处,因为他们将能用同样的货币工资购买更多的商品。<sup>54</sup>

李嘉图然后仍然认为资本家和地主将会从生产技术的这种变化中获益,但是“用机器来代替人类劳动,对于劳动者阶级往往是极为有害的”。<sup>55</sup>这是因为首先劳动者将会从工资商品(wage goods)的生产转移到生产资本商品(capital goods)。接下来,工资商品会越来越,工资商品的减少限制并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当新机器投入使用时,将会需要一定的劳动者,但所雇佣的劳动人数不可能与所解雇的劳动人数是相等的,因为,制造机器是为了减少既定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力,从而减少资本家的工资开支并增加利润。因此,社会净收入(利润加地租)将会增加,而总收入(利润、地租和工资)将会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劳动者将“会被迫失业”,并且一大批工人阶级将“会受损害,因为其中一部分将会失业,人口与雇佣基金相比较将会过剩”。<sup>56</sup>

李嘉图总结说:“劳工阶级关于机器的采用往往有损于他们的利益的看法并非基于成见与错误,而是符合于经济学正确原理的。”<sup>57</sup>这种结论意味着他同意了马尔萨斯的观点,即当生产条件发生变化后,市场在重新分配资源时,也许并不一定十分有效率,结果可能是劳动力市场出现长期萧条,这将减少经济生产总量。这同时也意味着李嘉图关于资本积累是增加整个社会经济福利的主要力量的观点并不成立。但李嘉图显然主要是同情资本家,而不是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同情。他以如下叙述结束了本章:“我希望以上的说法不会导致一种推论,即机器的使用不应当加以鼓励。”<sup>58</sup>李嘉图的这一愿望并不是基于改善工人状况的计划,因为他仍然相信“工资正像所有其他契约一样,应当由市场上公平而自由的竞争决定,而绝不应当用立法机关的干涉加以控制”。<sup>59</sup>

## 比较优势和国际贸易理论

李嘉图认为自由的国际贸易对进行贸易的两个国家都有利,即使当一个国家能够比另一个国家更有效率地生产进行贸易的所有商品时情况也是一样的。他是第一位自始至终都坚持这一观点的经济学家,同时他也是最早指出由于资本在国家之间的相对静止性、必须将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明确区分开来的经济学家之一。

李嘉图认为一国在生产国际贸易中所需的商品时并不一定需要“绝对优势”才能对本国或他国双方都有利。绝对优势意味着生产有更高的效率,或在生产中使用较少的劳动。两国可以在国际贸易中都受益于生产各自具有“相对优势”的商品。相对优势仅仅意味着

两国之间的两种商品所包含的劳动率不同,一国至少有一种商品所包含的相对劳动量少于另一国生产该商品的劳动量。表 5.3 是李嘉图用以阐述比较优势的原理。在这个表中,葡萄牙在生产葡萄酒和布料这两种商品上具有绝对优势,即在葡萄牙生产这两种商品比在英国生产同样两种商品需要较少的劳动时间。如果我们假设葡萄酒和布料的价格在葡萄牙和英国都与它们所包含的劳动成比例,那么,这个国家两种商品的价格比例将与生产它们所需的劳动时间比例相同。

表 5.3 在英国和葡萄牙生产 1 单位布料和葡萄酒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布料	葡萄酒	葡萄酒价格与布料价格之比	布料价格与葡萄酒价格之比
英国	100	120	1.20	0.83
葡萄牙	90	80	0.88	1.12

在葡萄牙,需要 90 小时生产 1 单位的布料和 80 小时生产 1 单位的葡萄酒。这意味着葡萄酒只需要生产布料劳动量的 88%,即葡萄酒的价格是布料价格的 88%。在英国,葡萄酒所包含的劳动和价格都是布料的 120%。因此,葡萄牙生产葡萄酒所需的劳动相对较少,价格相对较低。另一方面,葡萄牙却要花费相当于生产葡萄酒 112% 的劳动来生产布料,因此,布料的价格是葡萄酒价格的 112%。英国却只需要 83% 的生产葡萄酒的劳动来生产布料,因此,布料的价格只是葡萄酒价格的 83%。因而,英国使用相对较少的劳动来生产布料,即使其投入的绝对劳动较多,因此,英国生产布料具有相对优势。

现在假设葡萄牙人一直只生产葡萄酒(他们具有相对优势的商品)并假定他们也需要布料。他们有两种方式可以得到布料——将生产葡萄酒的部分劳动转向生产布料,或者是与英国进行用葡萄酒交换布料的贸易。假设贸易以英国现行的价格比例进行。生产 1 单位的布料将需要 90 小时劳动。这意味着葡萄牙人必须为生产 1 单位的布料而放弃生产 1.12 单位的葡萄酒。但如果以英国的价格比例与英国进行贸易,他们只需为每单位布料放弃 0.83 单位的葡萄酒。显然,这种贸易带给他们比同时进行两种商品生产大得多的葡萄酒和布料总量。

同样,如果英国一直以来都只从事布料生产,而能够以葡萄牙的现行价格比例进行贸易,那么,它将停止葡萄酒的生产。这样一来,按照其国内的现行价格比例,需要它为生产每单位葡萄酒放弃 1.2 个单位的布料,但如果与葡萄牙进行贸易,它只需要为每单位葡萄酒放弃 0.88 个单位的布料。

显然,两个国家按对方现行价格比例进行贸易,都可以从中获益。但两个国家按每一个国家现行价格比例的中间值进行贸易也都可以获益。葡萄酒对布料的价格比例在英国是 1.2,在葡萄牙是 0.88。如果两个国家以 1 比 1 的基础进行贸易,1 单位布料换取 1 单位葡萄酒,两个国家都可以获得比同时进行两种商品生产要多的葡萄酒和布料总量。

以上是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解释。在此基础上,李嘉图得出结论,认为自由贸易对两个国家都有利。贸易的每一次扩张“大大有助于—国商品总量的增长,从而使享受品总量增加”。<sup>60</sup>而对贸易的任何限制都将会减少“享受品总量”。这一原理也是李嘉图反对谷物法的另一条主要理由。

## 社会和谐和阶级冲突

李嘉图的“咬文嚼字”清楚地阐述了该书的主题思想:效用价值论,或使价格与效用趋于相等的经济学方法,该方法通常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通过自由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导致了社会和谐。当李嘉图断言自由贸易可以增加每个国家的“享受品总量”时,他只是在重述亚当·斯密有关自由交换可以增加交换双方的效用或“享受”的原理。当这一原理变成经济分析的焦点时,对人类物资匮乏的所有问题的补救方法,几乎都归于市场扩张或使交换和贸易更加自由化的问题。如果采用了这样的政策,似乎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中获益,因而所有的利益也就都趋于和谐了。

为了能使他的结论与其前提保持一致,李嘉图不得不假设英国进口了相对更为昂贵的商品,那么,商品高昂的价格将会是“享受品总量”增加的合理的指数。换言之,假设只有地主和资本家消费葡萄酒。而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却没有足够保暖的衣服。劳动价值理论倾向于着重考察导致如此多的劳动产品被剥夺为地租和利润的外部条件。然而,效用理论通常假设财产的所有权和财富的分配法则是固定的,或是“自然的”,结果是,效用理论倾向于强调资本家和地主会将其所得的剩余产品用于衣物和葡萄酒,而不仅仅是用于衣物的这一事实。自由贸易将增加那些拥有财富和购买力阶层的享受,但却不一定增加工人阶级的享受。

比如说,李嘉图可以建议,应该禁止进口葡萄酒,直到每一个工人都有足够的衣服。一些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将比为资本家和地主进口更多的葡萄酒能增加社会福利。但李嘉图却没有这么做,相反,他坚持认为自由贸易能够使“享受品总量”最大化。

这一点阐明了我们在讨论李嘉图理论中所再现的亚当·斯密的观点时,两者表现出的同一种矛盾。李嘉图《原理》的大部分都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或生产优先论的基础之上。《原理》一书中充满了关于社会三大阶级之间根本的阶级冲突的讨论。李嘉图问道:“那么工资上涨时利润就必然低落。这一点岂不是再清楚不过了吗?”<sup>61</sup>他再次重申:“地主的利益永远是和消费者和制造业者的利益相对立的。”<sup>62</sup>李嘉图的《原理》大都是关于这些冲突形成因素的分析。

亚当·斯密的历史理论停留在资本主义,他认为资本主义是社会演进的可能的最高阶段。因此,斯密倾向于将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和财富分配看作是既定不变的。只有当

这些阶级差别被当成是既定不变的时候,斯密才能够讨论“看不见的手”的种种好处。李嘉图理解资本主义的方法比斯密更缺乏历史性。他将私有财产关系、财富和权力的分配和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当成是永恒不变的和自然的。劳动价值论以冲突为重点考察社会,正如李嘉图《原理》中所清楚地阐述了的。但是,冲突暗示着变化,变化又暗示社会经济体制如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具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它们诞生、成长并成熟,最终腐朽并消亡。李嘉图正好否定了劳动价值论的这一观点。在他最精彩的一章中,他写道:

同时我们还必须记住,退步状况永远是一种反乎自然的社会状态。个人的生长过程是由青年而壮年,而老死;但是国家的发展过程却不如此。国家达到最旺盛的状态以后,再向前进时诚然可能受到阻碍。但它们的自然趋势却是永远地继续发展,使它们的财富和人口永远不会减少。<sup>63</sup>

不足为奇,由于这个缺乏历史性的观点,李嘉图没有考虑到政策将可能通过改变财富、特权或权力的分配的方式来增加“享受品总量”。当这些分配被当成是自然的或永恒的时候,拥有购买力的那部分人的享受通常被当成是社会全部福利的同义词。从这一点中,总会得出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将每个人的福利最大化的观点。因此,李嘉图为自由贸易作了如下的辩护:

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在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这种个体利益的追求很好地和整体的普遍幸福结合在一起。由于鼓励勤勉,奖励智巧,并最有效地利用自然所赋予的各种特殊力量,它使劳动得到最有效和最经济的分配;同时,由于增加生产总额,它使人们都得到好处,并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sup>64</sup>

“看不见的手”在地区、国家和国家之间进行调节,使每个人的利益趋于和谐。

但是,李嘉图认为资本家的利益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能够得到最好的诠释。因此,在资本主义究竟是导致各阶级利益冲突还是导致和谐的问题上,其观点将不可避免地自相矛盾。我们已经遭遇过了“看不见的手”失效的例子。“地主和社会上各阶级之间的关系跟买卖双方都认为受利益的贸易关系不同,这种关系是一方完全受损失,另一方完全得到利益。”<sup>65</sup>同样,在讨论国际贸易时,一旦他忽略真正的强制力量之间的平衡,对于李嘉图来说,出现的结果显然就是冲突而不是和谐。这一点对他来说再清楚不过了,比如说:

母国可能……有时从限制殖民地的做法中得到利益。比方说,假定英国是法国的殖民地,谁又能怀疑英国对谷物、毛呢或任何其他商品的输出支付大量补贴将使法国得到利益呢?<sup>66</sup>

在其后的第四页中,李嘉图再一次写道:“因此,显然可以看出,对殖民地的贸易可以调节得使之比完全自由的贸易更有利于母国而不利殖民地。”<sup>67</sup>



以牺牲殖民地的利益以有利于母国,并对自由市场进行强制限制的李嘉图理论同样适用于阐述这样一种现象,即强制限制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相互交换是以损害工人的利益来对资本家有利(反之亦然,这正是李嘉图时代兴起的工人运动中许多领导人所希望的)。

正如亚当·斯密断言:“民选政府的建立只是为了保卫财产,实质上它的建立就是为了保卫富人反对穷人,或者说为了保卫有些财产的人反对没有财产的人。”<sup>68</sup> 斯密和李嘉图都应该解释为什么政府不能这样被资本家利用;否则,“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将不可避免地用于解释以市场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所产生的现象的合理性。

显然,斯密和李嘉图理论中的这一个主要矛盾导致了其理论最终分裂为两大相互对立的思想体系。在第6章中,我们将分析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让·巴蒂斯特·萨伊(J. B. Say)和纳骚·西尼尔(Nassau Senior)的理论。他们三人开始用效用价值论的观点来替代斯密和李嘉图理论中的劳动价值学说。第7章将讨论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和托马斯·霍奇斯金的著述,他们的阐述将劳动价值论推到了顶峰。

#### 注 释

1. David Ricard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Lodon: Pent, 1962), 第 272 页。这是李嘉图经济理论的主要作品。在 1817 年首次出版,第二版于 1819 年出版,第三版于 1821 年出版。这里所引用的 Dent 版本是其第三版的重新印刷。

2. 同上,第 1 页。

3. 参见 Maurice Dobb, *Theories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 since Adam, Smith*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第 67~69 页。这一章主要基于该书。如果读者希望进一步了解劳动价值论者和效用价值论者之间正在进行的有关概念性、分析性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重大问题的辩论,本书的作者认为多布的这本书是最好的,同时也是惟一的选择。

4. Ricardo, *Principles*, 第 33 页。

5. 同上,第 35~36 页。

6. 同上,第 48 页。

7. 参见 Dobb, *Theories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 第 70 页。

8. 引文,同上,第 72 页。

9. 引文,同上,第 71 页。

10. 引文,同上,第 74 页。

11. Dobb, *Theories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 p. 5.

12. 同上,第 6 页。

13. 同上。

14. 同上,第 1 页。

15. 同上,第 95 页。

16. 同上,第 7 页。

17. 同上。
18. 同上。
19. 同上,第 12 页。
20. 同上。
21. 同上。
22. 同上,第 191 页
23. 同上,第 6 页。
24. 同上,第 14~15 页。
25. 同上,第 53 页。
26. 同上,第 13 页。
27. 同上,第 13~14 页。
28. 同上,第 18 页。
29. 同上。
30. 同上,第 24 页。

31. 然而,该问题要比我们的讨论复杂得多。在 1960 年出版的一本非常重要的书中,一位李嘉图的当代追随者提出,当对两个生产过程进行比较时,它们过去的劳动输入的时间模式可能会一直贯穿于工资比例(或是利润率)的过程之中。一种过程可能会有更高的单位工人的资本价值,而在另一个工资比例(或是利润率)过程中,另一个过程将会有更高的单位工人资本价值。Piero Sraffa, *The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年,第 1~95 页。我们将在第 16 章讨论斯拉法著作的一些重要的结论。

32. Dobb, *Theories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 第 74 页。
33. Ricardo, *Principles*, p. 75~76.
34. 同上,第 22~23 页。
35. 同上,第 23,26 页。
36. 同上,第 27 页。
37. 同上,第 28 页。
38. 同上,第 27~30 页。
39. 同上,第 71 页。
40. 同上,第 64 页。
41. 同上,第 25 页。
42. 同上,第 22~23 页。
43. 同上,第 26~27 页。
44. 同上,第 64 页。
45. 同上,第 72~73 页。
46. 同上,第 64 页。
47. 同上,第 71 页。
48. 同上,第 76 页。

49. 同上,第 225 页。
50. 同上,第 192~193 页。
51. 同上,第 194 页。
52. 同上,第 175 页。
53. 同上,第 26 页。
54. 同上,第 263~264 页。
55. 同上,第 264 页。
56. 同上,第 266 页。
57. 同上,第 267 页。
58. 同上,第 267 页。
59. 同上,第 61 页。
60. 同上,第 77 页。
61. 同上,第 68 页。
62. 同上,第 225 页。
63. 同上,第 177 页。
64. 同上,第 81 页。
65. 同上,第 225 页。
66. 同上,第 227 页。
67. 同上,第 231 页。
68.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37 年), p. 674。

## 第 6 章 理性主观主义： 边沁、萨伊和西尼尔的经济学说

我们在第 1 章已经谈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必须包括一定的社会经济组织、人类行为模式、以及人们对他人和对自我的认知。无止境追逐利润的动机引发了劳动者之间的分工和生产专业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而专业化则意味着社会间相互依存程度的提高，但是这种提高了的社会依存度并不表现为作为个体的人对于其他社会成员的依赖，而是指依赖非人格化的社会组织——市场。支配并控制着市场的人们被追逐利润所驱使。而支配和控制了市场的资本家阶级，他们并不能从主观上亲身体会并感知到这股支配性的力量。资本家们所经历的激烈市场竞争是一种单个人很少能够也几乎无法控制的力量。市场竞争的力量就像自然法则一样，被认为是一种自然永恒的法则。

### 效用理论产生的社会根源

上文所谈及的竞争性过程将会产生几种后果。这几种后果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产物，但通常人们却把他们视为是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中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下的普遍情况。在前三章的几处，我们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中已经强调了劳动价值论或是说生产视角 (production perspective) 与效用价值论或是说市场视角 (market perspective) 间的区别。效用学说的理论基础是：(1)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产生的特殊人类情况的认知；(2) 这些特殊条件是存在于一切社会中的人类普遍、不变和自然的特征。下面我们将讨论资本主义的五个重要特征，以及效用理论学家是如何看待这五个特征的。

首先，劳动的专业化和生产者之间的分离使得人们并不把自身看作是身处于一个相

互依赖、相互联结的社会经济体这个整体中的一员;相反,人们认为彼此是疏远的、独立的、如同原子一般的个体。每个人都在关心着自己是否能够在同非人格化的、不可改变的市场力量搏斗的过程中生存下来。人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觉得自己在人群中是孤立的、彼此疏远的、没有人情味的,很少把其他人看作是人类共同体中相互联系着的一员,而是仅仅把他们视为非人格化市场力量的一种化身或多种表现形式。

因此,基本上每个人都可以被视为是自利的,并且同其他人之间是天然对抗或竞争的。我们可以在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著作中清楚地找到上述这种新观点。霍布斯生活在资本主义关系只是第一次被视为是一种对人类关系越来越起着支配作用时代下的英格兰。在他于1651年出版的《巨轮》一书中,清晰有力地表达出了这样一个共识——人类所有的行为动机都是源于人们对所有能够促进个人“重要利益”的手段的自利的渴望。他相信,人类所有的动机,甚至包括同情,都只是自私自利的种种表现形式。他写道:“在他人遭遇到灾难时所表现出来的同情,只是出于在脑海中担心相似的灾难某一天会降临到自己身上。因此,它被视为是……同情和……人类情感。”<sup>1</sup>

霍布斯认为在缺乏社会抑制的情况下,这种与生俱来的自利倾向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的“自然状态”,人们之间彼此争斗不休。而在这种所谓的“自然状态”下,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孤独的、可怜的、令人作呕的、残忍的并且是短暂的”。霍布斯论述道:“脱离这种野蛮斗争状态的惟一途径就是建立起绝对的权威——中央政府——每个人都要服从于它,作为受到社会其他人的保护的回报”。<sup>2</sup>

第二,如果承认人性是好胜的、自私的,那些持有传统效用观点的思想家们又是如何构筑人类行为动机的基础或本源的呢?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把人类的动机视为源于追求快乐、避免苦痛的需要。这种观点被称之为效用主义,它是效用价值论和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尽管我们应当看到,20世纪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在掩饰其理论的效用主义基础方面技高一筹)。效用主义在杰里米·边沁的著作中得到了其最出色的古典主义形式表达,我们将在下文具体讨论。

第三,经济专业化必然导致个人和社会以有效运行的市场为纽带完全联结在一起。拥有专业技能的劳动者如果不把自己的商品出售,并购买到由其他拥有专业技能的劳动者生产出来的各式商品,那么他就无法生存下去。显然,这是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须的。因此,一个相对运转自由的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要环节——虽然它可能不是以往的生产方式或是未来生产方式的必要环节。

但是,绝大多数效用理论的经济学家都总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在评价市场体系时,他们看不到市场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最有价值的一环。在把资本主义的产生当作是理所当然且自然永恒之后,经济学家们着力强调在市场机制运行良好的时候,人们将会比在市场机制运行不畅的情况下生活得更美好,或者是有市场相比于没有市场的状况下,人们生活得更加幸福。市场于是被视作普遍有益的社会机构。

当我们以资本主义是永恒的作为出发点,那么显然,不仅仅是资本家,包括工人和社会的其他成员在内,都是从市场中获益的。确实,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几乎没有人能够脱离市场而存在。对市场的普遍依赖一直是传统的效应价值论构建全人类利益的社会和谐的基础。我们已经在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和马尔萨斯与李嘉图的理论中,了解了这种普遍依存理论的合理性。

但是,在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中,这种社会和谐论通常是与他们通过劳动价值论所揭示的阶级矛盾的结论相冲突的。本章所涉及的三位经济学家,在抛弃劳动价值论——也因此抛弃其阶级冲突的结论——并支持盛行于19世纪大部分时间的正统保守的经济学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的影响帮助清除了斯密和李嘉图理论中的内在矛盾之处,从而使得正统经济学成为社会和谐的基本理论。

第四,生产专业化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创造并积累新的更加复杂的工具、机械和工厂,即资本的积累。显然,在任何社会,只有当社会生产能力的大部分被用于生产工具和机械,而不是用于生产食物、住房、衣服和其他消费品时,生产资料才能得以生产和积累。

因此,资本积累或工业化,必须减少一些原本可能进行生产的消费品的生产。这也是实现工业化所必须付出的社会成本。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小群资产阶级掌握并控制了生产资料,这就意味着利润必然相对工资而增长(或换一种方式说,工资相对利润而下降),这样做的目的是为资产阶级的消费和工业化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如果资本积累不能从利润这一块获得资金支持,那么资产阶级将丧失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经济体制将不再是资本主义体制。因此,资本主义工业化必然意味着由利润向资本积累提供支持。

但是,实现工业化所必须承担的消费缩减这个实际社会成本,究竟是由资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承担的?这取决于在这一进程中工资和利润的相对大小。实际上,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表明,大部分的实际社会成本毫无疑问是由工人阶级承担的。经济史学家一般都认同工资的购买力在18世纪后三分之一时期内的英国趋于下降的这一事实,但是,对于在19世纪前半段的工资购买力变化的方向是存在争议的。一些历史学家争论说,这一时期的实际工资(工资的购买力)是上升的,一些则说它们是下降的,另一些则认为它们是维持不变的。显然,历史学上的证据是相互矛盾的,并不能就这一点给出清楚的答案。但是,至少有一点是显然的,那就是任何实际工资水平的上涨相对于这一时期生产总量的上升幅度而言要小得多。

因此,在英国的工业化时期,实际工资水平相对于利润的规模是下降了。工业化的实际社会成本在事实上由工人阶级承担了。我们将在第4章简要地阐述这对工人阶级的贫穷和苦难意味着什么。

但是,如果理论家们将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与生俱来的,并假设市场对工资和利润的决定是自然和公正的,那么,就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工业化的社会成本是由资产阶级支付的。如果我们不对收入在工资和利润间的最初划分结果产生怀疑,那么,由利润向资本积

累提供资金支持的事实,看上去就好像是资本家承担了这项社会成本。那些认为社会和谐、相信传统效用论的理论家们总是把收入在各阶级之间的分配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从我们在这一章将要讨论的西尼尔开始,这些理论家们总是试图在资本家做出了牺牲了的道德基础上去证明利润的公平合理性。

第五,在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发展起来后,资本家间的竞争程度也越来越激烈。获得利润不再是一件轻松的、随意的、悠闲的事情。每个资本家都面对着希望通过压低成本、多销售自己的产品等手段从经济上将其摧毁的竞争者。获取利润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靠理智的计算,预先对原材料、劳动力、生产运输费用以及最终在市场上的销售制定计划做出控制。复式记账法、复杂的会计系统、针对私有财产统一制定的法律、委托合约和商业法,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都开始出现。这些都是资本家们控制生产和交换所必不可少的。

资本主义体系下所必然包含的资本家的行为方式,被持有传统效用论的理论家们视为是人类一切决策行为的核心。在他们看来,人类的行为从来就不曾是具有惯性的、反复无常的、偶然的、迷信的、利他的、宗教的或是单纯感性和不理性的。人类所有的行为都被视为理性思考的结果,通过计算做出决定,所有人都能像会计一样,衡量某项特殊活动的所有收益(快乐)减去这项活动的所有成本(痛苦),然后理智地选择能够使快乐最大限度超过痛苦的行为。因此,在现代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的教科书中,人类的所有行为都被归结为理性的,并且是通过计算以实现利润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的。而利润最大化总是被视为仅仅是效用最大化的间接形式(尽管我们会看到“效用”这个词有时沦为“偏好次序”的同义语)。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行为和自我认知的这五个特征:原子般的个人主义、自利的效用主义、对市场的依赖、由利润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理性的计算,已经成为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的新古典经济学效用论和社会和谐论的理论基础,边沁、萨伊和西尼尔构建了效用价值论的大部分理论框架,后来的经济学家运用这些理论将有关社会和谐和市场的社会有益性的观点从劳动价值论中剥离了出来,这些观点在斯密和李嘉图作品中显得不伦不类。

### 杰里米·边沁的效用理论

杰里米·边沁(1748~1832)是英国人,在其六十多年的写作和颇具影响力的社会理论家生涯中,撰写了大量关于经济题材的论文、散文和小册子。<sup>3</sup>但是,对19世纪的经济理论产生了极大影响的作品,是边沁把他的注意力转向经济理论前沿问题的六年前(即1780年)出版的一本名为《道德和立法原理导论》(以下简称《导论》)的书。这本《导论》原意是想成为纯粹论述法律规则的一般性导言的一部分。尽管它并没有直接涉及到经济理论,但这本书包含着对功利主义哲学的重要说明,这使得它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间成为

新古典经济学的哲学基础。

《导论》的第一章以下面一段话作为开头：

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至高无上的君主——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他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干什么……凡我们所言、所行、所思，无不由其支配……功利原理承认这一切被支配的地位，并将其作为自己社会理论的基础。<sup>4</sup>

边沁以这样一段话作为开头，断言在任何时期，任何地点，人类的所有动机都可以归结于一个简单的原理：即追求效用最大化。

功利是指任何客体的这样一种性质：由此，它倾向于给利益相关者带来实惠、好处和快乐、利益和幸福（所有这些在此含义相同），或者倾向于防止利益相关者遭受损害、痛苦，祸患或不幸（这些也含义相同）。<sup>5</sup>

边沁相信，所有这一系列的动机，都只是人们追求快乐、避免痛苦的表现形式，因为痛苦只是快乐的对立面。所以边沁的功利主义可以重新被表述成“人类所有的动机都起源于对快乐最大化的追求”。

通过把人类的所有动机都归结于某一个原理，边沁相信，他已经掌握了通往人类福利和幸福这门“科学”的钥匙，这门科学可以用数学的形式表达出来，甚至在某一天可以发展出像物理学那样严整的表达形式。边沁辩称：“快乐……和避免痛苦……能用数学定量表达的结果，这使我们清楚的理解了它们各自的价值。”<sup>6</sup>

边沁提出了量化快乐的一种可行的方法。

对于人们而言，一项快乐或痛苦本身的值多大多小，将依据下列 7 种情况而定。

- (1) 其强度
- (2) 其持续时间
- (3) 其确定性或不确定性
- (4) 其临近或偏远
- (5) 其丰富程度
- (6) 其纯度
- (7) 其广度<sup>7</sup>

于是他进一步讨论了人们可以理性地计算快乐和痛苦值的特殊方法。

边沁不仅认为人们是期望通过计算来实现快乐最大化的，而且认为从本质上而言，人是自私的。他写道：“一般就每个人心中关于生命的意义而言，自我利益要比其他所有利益加起来还重要……这种对自我的偏爱无处不在。”<sup>8</sup> 边沁相信，从本质上而言，人们总是懒惰的，任何付出或工作都被视为是痛苦的。因此，如果不是带来更多的愉悦或是避免更大的痛苦的缘故，将无人愿意承担工作。他坚持认为：“厌恶是劳动本身所带来的情绪，而



且是惟一的感受……直到此刻,劳动才显示出其真正的意义,热爱劳动只是概念上的相对说法。”<sup>9</sup>

边沁的这些思想对后来效用价值论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应当记得,斯密是反对效用与交换价值系统相关这一说法的。尽管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都认识到商品只有具有使用价值,才能拥有交换价值,但他们并不认为能够通过检验商品使用价值的大小就能够科学地解释出交换价值的大小。斯密通过列举水和钻石的例子来证明上述系统相关的关系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后来,效用价值论的拥护者们否定了斯密的例子,并争辩说,交换价值不是由商品的总效用决定的,而是由边际效用决定的,即商品数量微小的、边际增加所带来的效用。在这里,边沁又一次充当了边际效用理论的重要先驱。

财富和价值这两个术语是可以相互解释的。一件物品只有拥有价值,才能成为一份财富。通过价值的大小,财富的大小才能得以确定。

所有的价值都是以效用为基础的……如果没有用,那么是不可能有任何价值的。<sup>10</sup>

斯密和李嘉图都认同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必要前提这一观点。但是,正如李嘉图所坚持认为的那样,如果人们把价值视为是由劳动创造的,那么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会降低产品的价值,但是却增加了财富的总量。当边沁宣称“财富的大小通过价值大小的程度才能得以确定”的时候,他是站在效用论的立场上指出:效用的增加,提高了商品的价值,因此增加了其所有者拥有的财富。

在同一篇文章的后面部分,边沁批评了斯密所列举的钻石和水的例子,紧接着几乎十分明确的提出了边际效用理论,这随后成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石。

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这种区分来自于亚当·斯密。但是,斯密并没有对此做出清晰的说明……

斯密用水这一例子来证明那一类拥有很大使用价值却几乎不被认为具有交换价值的物品的存在。为了说明斯密的断言犯了多大的错误,我想斯密最好去查阅伦敦新河董事会的资料,并记住他在巴黎将会见到的人们运水到住宅零售的场景。

斯密用钻石这一例子来证明那一类具有很高的交换价值却不具备很大的使用价值的物品的存在。这个例子同前面的例子一样,也是存在谬误的。

钻石的使用价值……既不是像水一样必要,也不是像水一样永恒,但考虑到它所带给人们的享受,将其效用翻倍并不是毫无理由的。

水之所以被视为是不具有任何交换价值的,只因为从使用的角度而言,它几乎毫无价值。如果所需的全部数量都唾手可得,那么多余的将毫无价值。这也同样适用于酒、谷物和其他任何物品身上。水是由自然供给的,而无丝毫的人力可言,人们很容易就发现水是十分丰富的,花钱补偿它完全是多余的。但在很多情况下,它又是具有交换价值的,比如当人们用水酿酒时。<sup>11</sup>

1  
5  
K  
P. 51,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1, 842, 843, 844, 845, 846, 847, 848, 849, 850, 851, 852, 853, 854, 855, 856, 857, 858, 859, 860, 861, 862, 863, 864, 865, 866, 867, 868, 869, 870, 871, 872, 873, 874, 875, 876, 877, 878, 879, 880, 881, 882, 883, 884, 885, 886, 887, 888, 889, 890, 891, 892, 893, 894, 895, 896, 897, 898, 899, 900, 901, 902, 903, 904, 905, 906, 907, 908, 909, 910, 911, 912, 913, 914, 915, 916, 917, 918, 919, 920, 921, 922, 923, 924, 925, 926, 927, 928, 929, 930, 931, 932, 933, 934, 935, 936, 937, 938, 939, 940, 941, 942, 943, 944, 945, 946, 947, 948, 949, 950, 951, 952, 953, 954, 955, 956, 957, 958, 959, 960, 961, 962, 963, 964, 965, 966, 967, 968, 969, 970, 971, 972, 973, 974, 975, 976, 977, 978, 979, 980, 981, 982, 983, 984, 985, 986, 987, 988, 989, 990, 991, 992, 993, 994, 995, 996, 997, 998, 999, 1000

由此可见,边沁不仅制定出了后来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哲学基础,更是几乎发展出了有关边际效用和价值之间关系的理论。边沁思想的发展同样也是传统的效用论从经济学中分离出来的重要先兆。在18世纪晚期,边沁成为自由放任政策的热心鼓吹者。他相信自由市场能够以最有利于社会的方式配置资源和商品。但在边沁后期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他从根本上转变了这一观点。

### 作为社会改革者的边沁

从边沁的早期作品中可以发现,他接受了斯密的观点,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将会把生产性资源配置到那些能够最有效利用它的产业中去。边沁相信,政府对于自由市场的干预可能会降低生产的水平,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干预也可能不会提高生产能力。因此,“没有任何来自于臣民或是管理者所制定的规则或是努力,能够在特定的时间内增加财富生产的数量”。<sup>12</sup>

在早期,除了马尔萨斯和一些不太著名的学者,边沁同样接受了与他同代的经济学家,所信奉的在自由市场中总供给总是等于总需求这一原理。在这样一个市场中,不可能出现衰退或任何非自愿失业,因为所有的储蓄都会自动转化成资本,去雇佣更多的劳动力。边沁宣称“无论是谁储蓄了货币,他都相应地增加了资本总量”。<sup>13</sup>

但是,到了1801年,边沁关于政府干预经济的观点发生了转变。

对于政府之手,我并无任何厌恶和反感的情绪,也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我把这归结于亚当·斯密及人权拥护者们(因为把最好的国民同最差的市民混杂在同一层面上的思想混乱)总是去讨论天赋自由的被侵犯,并力图否定这种或是那种法律,争辩说所有的法律都有可能产生消极的影响。政府的干预……总能产生最小的……优点……我可以证明的一件事是……满足。<sup>14</sup>

这种思想上的转变主要是由两个观点促成的,而每个观点随后都成为了反对自由放任的重要依据。第一,像马尔萨斯一样,边沁开始看到,储蓄可能与新的投资并不相符。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将会下降,失业将会产生。自由市场将不能按照最有利于公众利益的方式发挥作用。“如果人们节俭的习惯上升了,”边沁写道,“它的直接作用是减少了消费的支出数量”。<sup>15</sup>而最终的效果将取决于储蓄是如何被使用的。他继续写道:假如货币“不是被投入到经济运行中,而是放在箱子中保存起来预防不确定性”。<sup>16</sup>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储蓄将导致价格和生产的下降,利润将会下降,投资也是如此。边沁争辩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增加经济运行中的货币数量,“这些受引导的货币将成为财富增长的来源”。<sup>17</sup>

政府干预市场的第二个原因是减少财富和收入极度不平等所造成的有害于社会的效应。边沁相信,一个人从货币中得到的乐趣将随着其所拥有货币数量的增加而递减。用现代效用术语来讲,即边沁相信货币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因此,其他因素不变,政府采取行动将富人的钱通过再次分配转移到穷人身上将增加社会的总效用。

举个例子,一边是一个劳动者,其一生除了拥有必要的维持生计之物外一无所有,而另一边是这个国家最富有的人……假设这个富人在同一时期内的收入相当于穷人收入的50 000倍。在这个假设中,富人心中所拥有的幸福程度当然比劳动者的快乐程度要大,也应当是这样的。但是,要大多少倍呢? 50 000倍吗? 这当然要比任何一个人自己认为的还要多。那么,10 000倍呢? 100倍? 10倍? 5倍于劳动者看上去也是非常大的了。不夸张地说,即使是2倍也是一个慷慨的数字。<sup>18</sup>

边沁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公平至上的拥护者。他认为,如果财富和收入重新分配能达到某一点,在这一点上,其正效应要能够抵消掉其负效应,甚至更多。尤其要指出的是这种政策的负效应导致了工人的劳动热情下降。边沁还认为,想象中的不公平程度“应当是发生在祖籍在英国的美国人的州,意味着那些拥有奴隶的人在这里将毫无立锥之地”。<sup>19</sup>在现代读者眼中,边沁所拥护的可能只是一项极小的改革。但在他撰写这些观点的年代,其所列举的这些州的不公平程度实际上要远远低于英国的不公平程度。这个标准实际上已经是非常激进的改革了。

因此,在边沁的一生中,他早期的极端自由放任态度和后期的改革主义态度之间有一个分离或对立。这种分离和对立同样出现在以边沁的效用主义哲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新古典主义传统之中。

另外,遍布在新古典论中的一个不当之处也同样清楚地体现在边沁关于改革主义的表述中:如果政府实行改革,通过重新分配,将富人的财产和收入分配给穷人,以增加总福利,那么,政府就不应该为自己谋取私利。它应当是一个仁慈而公正的组织,平等的致力于每个人的福利。但是,政府并不能做到像天使一样,或是“哲学家国王”。政府是由一群同样具有“一般人类特征”的普通人所组成的,同样是自利的,并对于自身快乐最大化感兴趣。如果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存在立法者通过促进穷人利益或促进富人利益而为自身牟取物质上好处的可能性? 那么,边沁关于通过公平、公正的政府来推动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改革的信念,其内在困窘之处也就显而易见了。

### 让·巴蒂斯特·萨伊的效用、生产和收入分配理论

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自称是亚当·斯密的信徒。他宣称自己所做的不

过是简单地把斯密的思想系统化,并顺带修正了斯密所犯的一些小错误。但是,正是他所谓的那些被修正的小错误,最终导致了对斯密某些最重要思想的抛弃,并为一个与传统迥异的经济理论创建了基础。一个历史学家这样总结萨伊和斯密的关系:“萨伊对待斯密理论的方式,犹如一个细心的妻子对待他丈夫的裤子一样,先是从中掏出最重要的东西,然后将其头朝下折叠起来。显然这是一种更加安全的方式。所以说,萨伊清除掉了斯密中的一些危险思想。”<sup>20</sup>

在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的导论中,他赞扬了斯密对政治经济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并进行了总结。这个总结可以看作是理解萨伊大部分作品的关键。

在展示了……斯密先生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之后,再指出其所犯的一些错误,显然也是必要的。

他把价值的创造仅仅归结于劳动者的劳动,这是一个错误。<sup>21</sup>

萨伊宣称,商品的价格或是交换价值,完全取决于他的使用价值或效用。

人们把价值归结于物的使用性……特定物品的内在适用性和性能满足了人们不同的需要。我在这里将引入“效用”一词……物品的效用是价值的基础,而他们的价值则构成了财富……

尽管人们认为价格是物品价值的尺度,价值又是效用的尺度。但是这种推论是不合理的。如果我们强行提高物品的价格,他们的效用会增加吗?交换价值或价格,只是反映出人们所认为的物品效用的指标。<sup>22</sup>

在反对劳动是价值的起源这一观点并坚持认为只有效用创造价值时,萨伊不仅严重背离了斯密和李嘉图的思想,同时,萨伊还将效用论引入到方法论和社会哲学中去,这显示出他与纳骚·西尼尔一样,是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占据支配地位的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最重要先驱者。在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中,劳动收入同通过占有生产资料所获得的收入,显然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澄清了它们各自不同的来源后,斯密和李嘉图得出了资本主义是以阶级矛盾为特征的结论。但我们也看到,如果从经济理论中的交换论或效用论出发,我们却可以得到自由的市场资本主义是一个内在和谐的社会体系这一结论。

萨伊试图通过完全否定劳动价值论或生产视角来消除这种相互矛盾的困境。在他的效用框架下,萨伊完全忽略了不同社会阶级之间收入的理论差别,萨伊宣称存在着不同的“生产性服务”去共同创造商品,而每一个生产性服务共同创造了最终的“效用”。生产性服务包括“人力产业,资本的扶助,自然服务以及所有权”,它们共同参与了“每一种效用”的创造,并成为价值的主要源泉。<sup>23</sup>换而言之,在创造效用的过程中,一边是人类劳动的努力,一边是资本、土地和所有权,两者在本质上并无区别。

萨伊通过说明“商品是通过放弃对一些东西的投资才具有价值”,<sup>24</sup>来力图证明劳动

者和所有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有当人们做出牺牲时才能获得财富,工人们为了生产产品所做出的牺牲是显而易见的。萨伊想要证明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也是因为做出了相同的牺牲才获得收入的。他宣称,节俭是所有资本的来源,节俭也包含着同劳动一样的牺牲。他写道:

或许这几乎不用去强调,相比于拥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同资本的一般名目相区别被称为人力产业、拥有自然力和服务的阶级,并不是神圣的和不可置疑的。一个人的勤奋、智力以及体力和灵敏度,对每个人而言都是特有的,是他的内在特性。资本或累积性产品,只是人们节俭和节约消费的结果,这完全是一种努力,既能够创造生产又能够破坏生产。而且,永远不可能存在只拥有其中的任何一方。因此,没有人,除非他否定了自我,能宣称它的结果是体现着公正的。节俭是创造产品过程中的另一个相关因素,毫无疑问应当赋予拥有他们的所有者以报酬的资格。<sup>25</sup>

萨伊因此认为,劳动和拥有资本包含着相似的牺牲,资本家和工人在获得各自的收入上拥有相似的道德公平性。萨伊通过彻底的修改斯密和李嘉图所发现的收入分配与商品价值的关系,提出了新古典分配论的雏形。对于斯密和李嘉图曾认为的商品价格反映出工资和利润的比率(尽管对于李嘉图而言,这只具有次要意义上的影响),并且这些比率是由其他社会和技术条件所决定的(即工人维持生计所必需的物品和总劳动生产力),萨伊则争辩说,工资和利润的比例是由资本和劳动在创造效用过程中的相对贡献所决定的。用萨伊的话来说:

商品的价值并不如一些作者所错误断言的那样,取决于生产性服务(即并不取决于利润和工资的比例)……既然物品是被人们所需要的,那么它的价值应当起源于它的效用。它创造效用的能力……赋予了生产性服务价值。价值的大小是同它在商品的生产性协作中的重要性成比例的。<sup>26</sup>

我们将在第12章看到,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全面发展了这种收入分配理论。克拉克观点上的进步之处在于指出了每个人获得的收入总是取决于他或她在创造社会所需要的效用过程中做出牺牲的重要程度。不仅利润和工资是因为相似的原因而被支付的,而且每个人从社会中所获得的,都取决于他或她自己(或者是他或她的资本)对社会福利所做出的贡献。这点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不足为奇,在这种效用价值和分配理论中,所有关于阶级矛盾的观点都会消失不见。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的主旨就在于证明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然结果是社会和谐而非阶级冲突。一旦这些思想被广泛理解了,“人们将对他们的真实利益更加了解,将发现他们的利益并不是彼此不一致的、冲突的”。<sup>27</sup>萨伊相信,“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大意义在于认识到政治经济学证明了富人和穷人……并不是彼此对立的。那些所有的竞争关系全都是愚蠢的说

法”。<sup>28</sup>

萨伊的观点是建立在全盘接受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基础上的。他宣称，“所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并且认为，“所有者无论是通过事先占有，暴力掠夺还是欺骗占有等手段获取实际拥有者的所有权，这对于产品的生产和收益的分配而言，并无意义上的不同。”<sup>29</sup>

## 萨伊的市场定律

在萨伊的著作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条。那就是他认为自由市场总是能够自动调节到均衡状态。在自由市场中，所有资源——包括劳动——都能被充分利用，即达到劳动力和工业能力充分使用的均衡状态。尽管，我们已经看到，斯密、李嘉图和边沁（在他们的早期著作中）都曾认为一个自由的、竞争性的市场能自动创造出充分就业。但是，这个关于市场机制的信条随后由萨伊继承并发展成了“萨伊定律”。反对萨伊定律的经济学家则有马尔萨斯、边沁（早期著作）、卡尔·马克思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在同马尔萨斯进行长期的、广为人知的通信过程中，萨伊始终捍卫着他的信条——永远不存在普遍的供给过剩或是包括非自愿失业在内的经济衰退。他认为，市场经济是一个专业化的生产者交换各自产品的场所，货币不具有内在的必要性，只是有助于交换的一种手段。萨伊说，除非他想要同别人交换自己的商品，否则没有人愿意生产。因此，供给创造自身的需求，“生产为生产自身打开缺口”。<sup>30</sup>他坚持说，如果我们能够认为这对于每个生产者个人而言是成立的，那么对于总供给和总需求必然也是成立的，也就是说总供给必然等于总需求。

萨伊也认为：某些商品暂时的供给过剩是可能的。但这是因为没有达到市场均衡的结果，一些商品的价格太低，另一些价格太高。在这种情况下，商品价格太高的那些商品将供大于求，而同时，商品价格过低的商品将供不应求。供过于求和供大于求在总量上是完全抵消的。进一步来说，那些按低价出售商品的资本家将获得较低的利润，而那些按高价出售商品的资本家将获得较高的利润。追逐最大利润动机然后将驱使资本家离开那些低价的产业，而进入到高价产业中。这种资本家的迁移将产生两个效应：第一，它将改变价格，提升原本过低的价格（因为生产和销售变少了，消费者将争着购买更少的产品而把价格拉升），降低原本过高的价格（因为生产和销售变多了，生产者为了把更多的产品卖出去而降低价格）。第二，它将减少供过于求的商品生产数量，增加短缺商品的产量。因此，通过这整个过程，总供给将始终等于总需求。但个别的短缺和过剩将通过价格变化以及资本从低利润行业进入高利润行业的迁移而消除。

用萨伊的话来说：

如果存在很多库存的、过剩商品,这是因为其他商品生产得不够多。<sup>31</sup>

那些按高于生产成本销售的商品将刺激其他商品生产者去生产……直到该行业商品所产生的利润与其他行业完全相同。<sup>32</sup>

因此,不仅能确定总供给等于总需求,而且每件商品的供给和需求都是相等的。因而,市场上永远也不会出现所有商品过剩的情况。更进一步来说,各种商品暂时的短缺和过剩将通过市场自由竞争而自动消失。这些结论构成了萨伊定律。直到今天,仍有许多经济学家接受这一定律。

### 纳骚·西尼尔的社会取向

纳骚·西尼尔(1790~1864)同边沁、萨伊一道,是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开创者。他同萨伊一样,谨慎地继承了先前古典经济学家的某些思想,修正了部分观点,并增加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从而发展出了一套从理论上论证19世纪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公平合理的学说。他强调要用恰当的方法研究经济思想,用效用来解释价值、利润和地租具有道德上和理论上的公平性。这些观点都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新古典经济学,并构成了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西尼尔是一个律师,对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都十分感兴趣。他是辉格党许多重要成员的密友,也是该党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总顾问。1825年,他被任命为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的首席教授。西尼尔密切关注着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状况、贫困的起源和后果。但在1830年,西尼尔对工人阶级和贫困的看法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830年以后,他的观点则极大地影响了政界和学界。

在1830年以前,西尼尔在政治上相对保守。他一直同情并关心工人阶级的贫困状况。在他发表于1826年的《政治经济学绪论》和他出版于1828年的《人口论二讲》等早期著作中,西尼尔都对工人阶级的未来表示了乐观的看法。他不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将导致一个必然的结果,即工人阶级将永远停留在维持自身生存的水平上。相反,他相信,随着工人阶级道德素质的进步,生产率将会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也将随之提高。他积极地支持那些他所认为能够提升穷人知识和道德水平的举措,并把道德教育视为是消除贫困的惟一希望。但在1830年,西尼尔的思想发生了转变。

1829~1842年期间,英国长时间爆发了一系列劳工问题。工业化使得英国劳工的生活水平几乎下降到了维持必要的生存和繁衍水准之下。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工人阶级奋起反抗,许多劳工组织在1829年后成立,随后就遭到了残酷的镇压。而后,大规模的罢工、骚乱和生产破坏性行动爆发,并迅速蔓延。所有的一切深深地震撼了西尼尔,

并使他感到十分恐惧,进而改变了西尼尔的看法。特别改变了西尼尔观点的事件是他称之为“1830年的恐怖之秋,火和暴力震惊了整个英格兰的南部”。<sup>33</sup>西尼尔转而认为济贫法和政府对穷人和失业者的救济,是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也是英国资本主义存在的极大威胁。

在1830年早期,西尼尔出版了《工资率三讲》,而在“这可怕的1830年秋季”之后,他在本书的序言上加上了一个标题:“当前骚乱的成因和解救措施”。在这篇序言中,他认为存在着一个资本家用于“维持劳动者生存的基金”(这一概念在经济学课程中被称之为“工资基金学说”)。<sup>34</sup>他宣称这个基金的规模是由劳动生产力决定的。因此,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或者需要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或者需要参与基金分配的工人数量的下降。他声明有两种方法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一,取消对资本积累和自由贸易的所有限制。第二,废除济贫法,它“阻碍了工资成为雇主和工人间的契约,而是成为一方的权利,而另外一方类似于税收一样的义务”。<sup>35</sup>

在这篇序言中,西尼尔显然不再关心贫困所造成的不幸,转而关注“傲慢的劳动阶级所产生的威胁。他们凭借着暴力、罢工和联合,不仅是在威胁着财富的基础,更是在威胁着自身的生存”。<sup>36</sup>而在西尼尔眼中,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工人阶级组织力图实现——工资应该反映每个工人家庭的需要,而不是供给和需求力量下的自由浮动要素——这一目标。济贫法是建立在对失业和极端贫困人口进行系统的家庭补贴基础上的。西尼尔认为,这种法律降低了工人参与劳动的动力,并使得工人因此产生了即使他们没有找到工作或不工作,他们的家庭也应当继续生存下去的傲慢态度。这使得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变得“不自然”。而西尼尔认为,当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处于“自然状态”时,

(对劳动者而言)不幸的根源……在于付出更多的努力,提供更多的服务。他将带着感激去获得那些慷慨赐予而他们自身所不能获得的东西。劳动者和其雇主之间的关系是自愿的、友好的、互助的。每一方对自身的利益都有着清醒的认识,每一方都认为自身的利益必须依靠于……他人的福利。但是,即时工资制使得商品交易停止了。劳动者不是因为其价值而是根据他的意愿而获得支付的工资。他停下手中的工作而成为一个自由人,他要偷懒、掠夺,要不节约,要做邪恶的事情,他不愿意再成为温顺的奴隶。他被告知,他对于自己的工资拥有权利……但是谁又敢去质疑,他将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设定自己的权利呢?或是随着愿望的进一步满足,野心将进一步膨胀呢?当前的这股潮流或许不会淹没海堤,但如果我们把退潮看作是永远的消失了,那将会成为致命的错误。拦海大堤已经破裂了,而每一次成功的入侵,它们的势头将会越来越猛烈,蔓延越来越广泛。相比于我们能够预见到的,我们现在所承受的实在是微不足道。<sup>37</sup>

西尼尔写道:穷人毫无节制的愤怒、傲慢以及狂热,将最终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地租、什一税和资本都被吞噬掉,如果不加以制止的话,贫困将发挥其自然效应——饥荒、瘟疫和内战。”<sup>38</sup>



在这段时期,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传播得很快。托马斯·霍奇斯金(Tomas Hodgskin)和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曾在19世纪20年代写的书中坚持认为利润是从工人那里剥夺来而未让工人获得的部分。<sup>39</sup>这些观点广为传播并引发了激烈的讨论。罗伯特·欧文的社会主义学说迅速成为颇具影响力的观点。西尼尔十分痛恨社会主义观点,认为不平等的状况可以消除是完全错误的。他把这种错误的信条称之为“穷人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poor)。他认为,这些观点很对那些未受到过教育的民众的胃口。他争辩道:“公平只会带来极度的痛苦,因为它赋予了社会机构有权力去让每个人变得一样穷的权利,却无法让每个人都变得一样富裕……他们只会传播痛苦,而不能带来欢乐。”<sup>40</sup>

西尼尔相信,每个受过教育的、有知识的人都将明白社会主义思想是根本无用且十分危险的。在分析社会主义思想是如何无用的时候,他写道:

在理解无效用时,哲学家们都确信,这只是中产阶级或是更高阶层建立在自身眼前利益基础上的一种偏见。但是,低阶层的眼前利益则是另外一回事。他们十分错误地计算了生活中奖券获得的奖品数量和质量。他们认为多少得到一点总比什么都没有强。他们相信有些人告诉他们的话,一旦高奖额的奖券消失的话,那么每个人都可能获得一百英镑的奖品。

这就是穷人政治经济学。看上去似乎只有三种方法去管理这构成一个国家人口绝大部分的组成。一是把这些穷人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这正是我英国的政策……另一个是在他们中间对国家和法律事务进行不计名的投票……第三是依靠军事力量——去组织和训练中产阶级和更高阶层,并用暗中听从于他们训练有素的常规部队作为支撑。<sup>41</sup>

凭借同辉格党最有权势的大人物们的交情,西尼尔能够把自己的一些思想转变成现实。在1832年,西尼尔被任命为济贫法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去研究现存的济贫法,以及如何解决贫困问题,并提出能够系统有效地减少贫困且十分经济的改革建议。据可靠的说法,公布于1834年的委员会报告大部分出自西尼尔之手,它成为了在1834年通过的新济贫法的基础。新济贫法体现了委员会报告的如下观点:(1)不论工作环境和工资状况如何,工人都接受市场提供的任何工作;(2)任何不去工作,或找不到工作的人,只给他不必忍受饥饿的救济;(3)救济不应当高于市场中的最低工资,应使他的境况变得十分痛苦,从而促使他有动力去寻找工作而不计较工作环境和工资。

一位当代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历史学家在评价西尼尔影响甚大的济贫法时,这样写道:

与其说这是一个物质解决方案,还不如说它是一个压迫的和退化的机制。这比1834年前的济贫法有更多的非人待遇,并比最低外部工资制度更加不合理。作为对贫困的惩罚,它强制劳动者进入像监狱一样的工厂,强行分开丈夫、妻子和孩子,甚至打消他们生育出更多贫民这一危险的诱惑。<sup>42</sup>

这就是从西尼尔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分析得出的社会哲学基础和所提出的政策主张。

## 西尼尔的方法论

西尼尔的经济分析方法在他出版于1836年的《政治经济学大纲》中几乎得到了完全体现。《政治经济学大纲》的第一章包含着对他方法论的一个说明,而这个说明体现了如下三点重要意义:第一,这是第一次对某个方法论做出明确的交待说明,在经济学家和其他学科的社会学家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且一直沿用至今。第二,这是一个试图模糊和隐藏西尼尔(及后来的保守经济学家)保守的传统理论基础的方法论。对此,我们将在本章和第18章的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中进行讨论。第三,它似乎为西尼尔(以及此后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们)树立起了公正、客观、中立和科学的权威这一形象,使他免除了所谓为特定阶层或个人利益辩护的责难。

西尼尔相信,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之所以存在如此多的争论,是因为经济学家们自己更加关注社会福利,而不是仅仅分析财富。当一个人在思考社会福利问题时,他立即被卷入到关于反应社会冲突中各种竞争性利益集团地位的规范化或伦理学的阐述中。因此,理论争论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西尼尔声称,伦理学的阐述并不属于科学范畴内的证明或是反证明。因此,只要它们是经济理论的构成部分,科学进步就永远也不可能使经济学家们达成一致。如果政治经济学要成为一门科学,那么其首要任务便是消除掉一切蕴含其中的不科学的、伦理学的命题。当这些命题被消灭掉以后,就只留下几条经济生活的经验主义原则。尔后,通过运用演绎推理的逻辑方法,经济学家能够找出这些经验主义原则所蕴涵的理论和实践观点。这些结论的运用和实施并不是作为科学家和经济学家所关心的问题,而是伦理学家或立法者所关注的。政治经济学也将成为一门非价值取向的、中立的“纯科学”。西尼尔这样写道:

政治经济学所讨论的主题是……不是福利,而是财富,构成它前提的是很少的几个一般命题。这是观测或是意识的结果。简直不需要证明,甚至不需要详细表述,差不多每一个人一听到就会觉得在他的思想上久已存在,或者至少是在他的知识范围之内;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的推断如果是正确的,推断就会和他的前提具有几乎一样的普遍意义,一样的确定。有关财富的性质和生产的那些推断是可以普遍适用的……但他所做出的结论,不管有多大的普遍性和真实性,并不能使他可以借此进行指导,在这方面有所主张。<sup>43</sup>

西尼尔的方法论的困难之处在于现行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体制的经验主义现实是由

几乎无限多的相联和相关的经验主义“事实”所构成的,并没有任何的内在经验暗示我们在理解资本主义上存在着十分重要的、任何特殊的“一些基本命题”。构建社会理论的过程,是我们从不计其数的事实中进行抽象,忽略掉一些因素,同时着力挑选和聚焦于另一些我们认为具有解释力因素的结果。

如果一个人相信他或她的理论是十分重要的(西尼尔以及运用其方法论的后世经济学家都十分相信他们的理论是极其重要的),那么,这个人必然是相信他或她已经剔除或抽象掉不相关的、不重要的内容,并且着力于相关的、重要的内容。但是,相关性和重要性这一问题其实是毫无意义的,除非我们在询问相对于什么问题才是相关的或重要的。因此,理论所要解决的社会或经济问题,在决定理论家们应当忽略那方面的现实或应当重点研究“一些基本命题”时是十分关键的。但是,什么才构成重要问题或重要事实?这完全是建立在理论家自己的价值判断基础之上的。

因此,价值是建立在这样的理论推导基础之上的,他们不仅要求理论家要考虑重要的社会问题,而且还要考虑该问题的何种解决方案能够被接受。社会理论通常致力于解决那些理论家们认为是重要的问题。更进一步来说,“一些基本命题”被选择出来,以便于能够在理论家自己价值范围内产生能被接受的理论。同样,“一些基本命题”通常已经将一些在道德和伦理上令人无法接受的结论剔除在外了。这就是西尼尔明确列举出的例子。事实上,这个例子后来被继承其思想的经济学家们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它假定道德和伦理价值已经被抽离出去了。

显然,西尼尔希望他的理论能够被他同时期的在重大的社会、政治和道德问题上握有决定权的大人物们接受。事实上,在其社会和道德价值观的指导下,西尼尔相信,如果立法者们不遵循他理论中的结论行事,那么必将会酿成灾难性的后果。这一点在他谈论方法论所说的一句话中体现得十分明显:“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既不是推荐,也不是劝阻,而是公正的发现普遍原理,如果忽略这些原理那将是致命的。”<sup>44</sup>

所谓的“忽略那些原理将会是致命的”,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当然,他不可能说这种忽略将会导致人类走向灭亡,人类在没有西尼尔的理论指导之前已经存在很多世纪了。这句话的惟一可能的含义就是,西尼尔相信,如果不遵从他的原理行事,他所认为的道德堕落结果将会出现。

西尼尔在区分科学性和规范性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我们应当看到,虽然后来追随西尼尔的经济学家因为相同的原因都做了此类区分,但无出其右者。

### 西尼尔的四个命题

在阐述了他的方法论后,西尼尔从日常经验和思考中得出了四个他自己认为是不言

而喻的基本命题,他写道:

前面已指出,政治经济学所依据的一般事实,可以概括成出于观测或出于意识结果的几个基本命题,当时所暗指的几个命题如下。

1. 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牺牲取得更多的财富。
2. 限制世界上的人口或限制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数的,只是精神上或物质上的缺陷,或是各阶级中各个人对于在养成习惯下所要求的那类财富可能不足以适应其要求的顾虑。
3. 劳动的力量和生产财富的其他手段的力量,借助于将由此所产生的产品作为继续生产的工具,可以无限度地增加。
4. 假使农业技术不变,在某一地区以内的土地所使用的增益劳动,一般会产生比例递减的报酬,也就是说,尽管在土地上增加劳动,虽然总的报酬有所增加,但报酬不能随着劳动成比例地增加。<sup>45</sup>

在这四个假设的非价值取向的基本命题的基础上,西尼尔相信他所努力构建的政治经济学显然是科学有效的。我们将通过逐个检验这些命题的前提条件,来理解西尼尔是如何看待这些命题所隐含的观点的,以及他是怎样基于这些命题,把自己的结论从道德约束中解放出来的。

### 西尼尔的效用最大化、价格和供给过剩理论

在发展第一个命题的过程中,西尼尔在该章的第一部分,清晰地表达出了两个主题:第一,他相信,反省将证明所有的经济行为都是精于计算和理性的。像边沁一样,他把这种行为最终简化为效用最大化。西尼尔也讨论财富最大化,但在解释财富的本质时,他写道:“使任何事物成为一项财富,或者换句话说,使之具有价值,最显著的是它直接或间接产生愉快的能力,效用……这个词是比较接近的(表达这种特质)。”<sup>46</sup>第一个命题宣称,人们总是希望以最小的牺牲来增加他们的财富,而在讨论西尼尔的第三个命题时,我们将会看到,在西尼尔看来,在人们获得财富的所有手段中,理当应包括牺牲和非效用(或负效用)在内。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效用最大化和负效用最小化方面,西尼尔同边沁是一样的。但是,在简单计算效用最大化的加总方法上,西尼尔和边沁又是不同的。如前所述,在为后人所争论的平等主义改革的基本假设上,边沁所信奉的是随着财富或收入增加,每个连续增加的效用或边际效用是递减的。

财富的边际效用递减这一观点,是边沁认为应当将富人的财富分给穷人以增加社会总福利的理论基础。以下两个前提构成了边沁信奉这一观点的基础:第一,获得大量财富

的人 would 感到十分满足。因而,任何财富的微小增加或是减少都对总效用产生不了或只能产生微小的影响。第二,任何两个人从各自财富中获得的效用都是可以比较的。边沁之后的效用论者们比他保守多了,他们必然否定这两条平等主义的前提,西尼尔也断然否定了这两个前提。

西尼尔宣称不管财富的分配是多么不平等,“没有人会认为他的需求是已经完全被满足的。每个人都有一些不被满足的欲望,以至于他相信,财富的增加将会有所帮助”。<sup>47</sup>更进一步而言,“每个人需求的属性和紧急程度同个人的性格一样是因人而异的”。<sup>48</sup>因此,我们不能在个人之间对他们从财富中获得的或是失去的效用大小进行比较。

西尼尔在讨论他的第一个命题时,在该章中所表述的第二个重要主题是,价格体现的是个人从消费各种商品中获得的效用,而不是反映在商品中的劳动。尽管他并没有发展出一套完整的“效用是如何决定价格”的理论,西尼尔重申了商品“是按照它们所被赋予效用的大小比例进行交换的”。<sup>49</sup>对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他作出了如下说明:

假使人类使用的一切商品都是来自自然的提供,而无需任何人力参与,且所提供的数量同现有的完全一致,那么就没有理由假定其具有价值,或者可以按照不同于现在的任何比率进行交换。

对于李嘉图先生的答复是这样的:价值的重要部分并不是来源于各自生产过程中使用劳动的那部分财富,所构成的实际上是财富的大部分,而不是财富的小部分或是无关紧要的部分。<sup>50</sup>

最后,西尼尔的第一个命题被用来反对马尔萨斯的观点,证明经济中的过剩或衰退是不可能的,他相信,如果对财富的追求是永远无法满足的,那么就永远不可能出现商品普遍过剩的局面。因为广泛的观察已经“证明”对财富的追求是永远无法满足的,所以相信衰退或普遍过剩的存在,或在将来是存在的,就一定是个错误。西尼尔写道:

关于普遍过剩的假设能够成立的惟一条件就是普遍的厌腻,每个人都完全获得了他所需要的物品。这个前提同我们所设定的每个人都希望尽可能多地获取财富这一命题相矛盾。<sup>51</sup>

西尼尔在反对过剩的问题上,显得比李嘉图和萨伊更加极端。后两者至少承认存在着普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但又认为竞争市场将自动消除这种危机,并使发生不均衡的产业恢复平衡。但在西尼尔的诸多著作中,并不承认这种周期性危机的存在。而是如我们在上文所言的那样,价值通常指明了那些理论家们将会抽象掉现实的某些方面,并且暗示那些被他所忽略掉的部分其实是不重要的。

## 西尼尔的人口和工人福利观

西尼尔的第二个命题几乎是对马尔萨斯人口观点的重复。同马尔萨斯一样,他相信,除非穷人的道德品质提高了,否则贫困将是他们不可避免的命运。1830年以前,西尼尔仍然相信英国穷人的道德品质正在提高,他乐观地表示在未来还会改善得更多,但在“1830年恐怖之秋”之后,西尼尔的观点改变了。在1831年《工资率三讲》的序言中,他阐述只有一种“有效且永恒的方法”去减少贫困——“提高劳动人口的道德和智力品质”。尽管以前西尼尔宣称工人的品质已经提高很多了,但现在他开始认为“我恐怕得说,还是要去提高和培养节俭、自尊和自我约束的习惯”,<sup>52</sup>显然,他所说的是要养成这些习惯,实际上是暗示,英国的工人们目前还完全缺乏这些品质。

因此,在第二个命题的说明中,西尼尔强调惟一能够在控制人口方面取代“道德和身体上的罪恶”的是人们“对贫困的恐惧”。西尼尔相信,让工人阶级长期生活在极端“对贫困的恐惧”中绝对是有必要的。他相信旧的济贫法通过赋予工人最低生活保障而减轻了这种恐惧。因此,他对旧济贫法持反对态度,并相信保持对贫困的恐惧和不安全感是必要的。这些构成了1834年新济贫法的基础。西尼尔同马尔萨斯一样,相信要达到社会进步的最终状态,经常需要承受(他们认为应当由穷人来承受是不可避免的)一定的代价。“大自然已经退化了”,他写道,“这就是所谓的欲成就好事,就必须先承受坏事——如果没有部分人去承受代价,那么就不会有普遍的进步产生”。<sup>53</sup>

## 西尼尔的资本积累和节欲论

西尼尔的第三个命题在表面上是否定生产收益递减的。随着投入生产的劳动量增加,生产出的产品产量如果不是以更高的比例增长,那么至少是成比例地增长。而这取决于劳动产品和资本品是否按照以资本积累的方式进行积累并因此而促进生产力。西尼尔赞同萨伊的观点,认为资本同劳动一样,是有生产力的。事实上,他认为在创造商品的过程中,资本比劳动更加重要。他在阅读汤普森和霍奇斯金的著作时(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两个人)发现,他们经常呼吁并认为只要进行生产,劳动这种人类活动就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坚持认为,资本只不过是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关系,对于生产而言并不是必须的。他们宣称,劳动才是生产过程中的真正的人类成本,而资本却不是。因此,工资作为人们实际努力的报酬在道德上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但利润却未必是合情合理的。

西尼尔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尽管他认为道德在政治经济学中本应无立足之处,他依

然为利润做出了道德合理性的解释,而这一直被保守主义经济学家们沿用至今。因此,仅仅证明物质资本是生产性的还远远不够,因为物质资本同资本家是不同的概念。西尼尔还需要证明资本所有关系是如何包含类似于劳动的真实人类成本的。如果他打算赋予利润和工资一样的道德合法性,他就必须在这一点上做出说明。这也正是他所试图做的:

根据以往政治经济学的说法,劳动、土地和资本是生产的三要素。劳动者、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是生产的三个阶级。整个产品可以划分为工资、利润和租金三个部分。从总体而言,我们是赞同这种分层原则的。但是,现在我们不得不违背本意对以往我们所表述的语言做出相当大的修改。<sup>54</sup>

毫无疑问,西尼尔所提到的术语上的重大改变,是指对资本、资本家和利润这三个术语进行修改。

这些术语表达了人们雇佣或使用要素的报酬,但并没有我们熟知的术语去表述行为、利润分配的原则以及如同劳动对应着工资一样,利润应当相对应的关系。对此,我们已经赋予了它“节欲”一词。节欲一方面表达了对非生产性资本的节约行为,同时也表达出了一个人将他的劳动投入到远离产品成型的生产环节中,而不是立即产生结果的类似行为。<sup>55</sup>

因此,资本家从非生产用途中节约出了资本,而利润就是他做出贡献的报酬。西尼尔同边沁一样,认为劳动是痛苦的,因此,需要工资去补偿工人对痛苦的忍耐。相应地,他宣称:“从享乐中节约也是一种克制的能力,去寻求远期而非眼前的利益,是人类意志中最痛苦的一种努力。”<sup>56</sup>因此,像工人一样,资本家也应当获得对他们所忍受痛苦的补偿。因此,资本家获得了利润。工资和利润在性质方面以及公平性方面并无任何重大区别。

只有通过小心地保护私有产权,才能保护资本和利润,政府才能确保人们实行节欲(abstinence)并积累资本。西尼尔第三个命题所得出的最后和最重要的结论便是,只有资本积累才能确保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增长至少与其人口的增长一样快。因此,一个国家财富最重要的来源取决于资本家的节欲。

### 西尼尔的地租和阶级的收入分配理论

西尼尔的第四个即最后一个命题,似乎只是对李嘉图农产品收入递减理论的重新阐述。但是,他所关注的重点却与李嘉图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事实上西尼尔对于“农业技术条件保持不变”并不感兴趣,他同马尔萨斯一样都认为农业技术的进步将更多地抵消没有技术进步条件下的生产性收入递减。他相信这种

进步实际上已经导致了英国的农业生产性收入比上个世纪增加了。“英国农产品的年产量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两倍多了。而每年雇佣的劳动力却不可能是上个世纪的两倍。”<sup>57</sup>在这里,西尼尔再次把英国的兴旺和避免了李嘉图所预言的经济静止状态归功于经济中的节欲和资本在农业部门的积累。

西尼尔对于级差地租定义的修改也是他在发展第四个命题时不同于李嘉图的第二个重要之处。地租被西尼尔定义为“从非普遍可用的自然要素中获得的好处”。<sup>58</sup>这是由垄断而产生的所有权的报酬,因为拥有的物品不能任意再生产。或许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地租不同于工资和利润,它在西尼尔的理论中不再具有道德的合法性。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西尼尔争辩说,农业地租是“一个国家的人口同劳动力需求成比例的惟一手段。在这种以及其他很多种情况下,自然向土地所有者提供的利息同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利息是一致的”。<sup>59</sup>

西尼尔在讨论地租时最重要的部分在于,他认为地租是以往人们称之为工资和利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如果工人和资本家享有其竞争对手所不能复制的优势,那么他工资或利润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地租。他认为,土地的肥沃程度差异,同工人或机器的生产能力差异,两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推理过程的第一步是重要的,借此西尼尔否定了不同阶级之间收入的差别,使所有收入在本质上相同。如果所有收入的来源都是相同的,那么不同阶级的不同特征就经济意义而言就是不重要的——最终,那些深受西尼尔影响的思想家们都相信,资本主义是一个在本质上无阶级的社会,对于经济理论中的社会和谐论而言,这是其发展的最重要一步。因为阶级间的区别是既不重要又不存在的,那么阶级冲突同样也是既不重要也不存在的。

西尼尔对三个阶级收入差别的否定,可以体现在下面的引文中:

我们已经把地租定义为自然或是偶然提供的自发收入。工资是劳动的奖励,利润是节欲的奖励。远远看来,这些区别是明显的。但当我们深入到细节后,我们会发现,他们是如此的含混,以至于几乎不能对它们进行准确的归类。归类有些时候看上去并不是永恒的,反而通常是任意专断的。出于某些有用的目标,当资本的特定收益上升时,将地租从利润中分离出来,可以判别这是偶然获得的还是继承来的;判别一个人的所有权是通过节欲获得的还是通过他的努力工作获得的。

超额的劳动力报酬,是在超额的天然帮助下获得的,或许可以更准确公平地说是地租。劳动者实际上得到的是作为地租的工资,这是因为他自身所拥有的自然要素。

抽象出工资和利润的关系则是更加困难的……并且,按照一般原理而言,可以得出,资本是生产利润过程中必需的工具。而一个人在雇佣中所能掌握的是劳动,劳动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他必须克服懒惰,牺牲他的爱好,并且要忍受诸多不便。<sup>60</sup>

因此,西尼尔相信,阶级差别是一种错觉。“阶级之间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错



觉。在自然的情况下,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是自发且友好的,他们的利益是和谐的。”<sup>61</sup> 这种关系在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的保护下将得到最好的促进。

## 社会和谐论与穷人政治经济学

西尼尔将阶级之间天然对立的说法和工人阶级将从损害地主及资本家利益的行动中获益的观点,贴上了“穷人政治经济学”这一标签。他认为,这种观点只会被那些“思维没有受过训练的或是感情泛滥的人接受”。<sup>62</sup> 正确的观点应当是所有的利益都是和谐的,能被自由市场和资本积累所促进。“在哲学家中”,他写道:“这是对中产阶级和更高阶层定罪……这是一种偏见,部分建立在……他们自己的眼前利益上。”<sup>63</sup> 只有当劳动者意识到了建立在当前利益基础上的偏见,并看到哲学家们(比如西尼尔)所证明的穷人同富人的利益是一致的事实,他们才会抛弃阶级对立的错误观点,并开始支持“富人经济学”(economics of the rich)(这最终将促进全社会福利的提高)。

直到19世纪中期,大部分后来支持西尼尔所谓的“穷人政治经济学”的人都接受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地租和利润之间的区别是不重要的。在17~18世纪,地主阶级仍然保留着许多旧的封建统治阶级特征。在该时期,他们的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总是相冲突的(正如我们在马尔萨斯和李嘉图这两章所见到的那样)。到了19世纪中期,产业资本已经建立起了其霸权地位。结果,越来越多的资本家放弃了充当生产的组织者和所有者的职能,转而雇佣经理人去执行这些职能。利润越来越像地租一样,成为了所有权本身的收益。随后,资本家和地主之间的区别、地租和利润之间的区别就开始不再重要。

但是,“穷人政治经济学”拥护者们则继续坚信从工作中获得的收入和从所有权中获得的收入是有重大区别的,他们相信,这两种收入的来源不同,构成了现行阶级对立的基础。因此,毫无疑问,这些理论家们始终攻击西尼尔关于节欲是资本家付出的社会生产成本这一概念。

这些针对西尼尔的批评坚持认为资本几乎绝对不是源于资本家的节欲(参见第9章马克思部分)。或者更进一步,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绝大部分资本是继承来的。因此,这取决于出生的运气。当节欲被定义为“从资本的非生产性用途中节约下来”,<sup>64</sup> 它仅仅意味着资本家运用他的工厂(或是其他物质资本)作为一种获取利润和积累更多资本的手段,而不是用于个人的享乐(如果一个人能想象出如何把工厂当成消费品来满足个人享受的话)。这意味着用资本去创造利润可以被简单地视为是痛苦的,并且利润因为这种痛苦而显得合理。但即使是西尼尔,在他作品的很多地方,都不得不承认这一观点是荒谬的。与西尼尔节欲论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们享受利润的创造,事实上,这是一股支配他们生活的激情。西尼尔认为,虚荣心鼓舞着上层社会去节欲而不是消费,在受过教育的

阶层中,虚荣是“人类激情中最有力量的”。<sup>65</sup>更进一步来说:

资本家将通过扩大他们的财富生产,提升他们的信用等级来展示自己的财富。卖弄和炫耀只会降低而不会提升人们对该阶级的价值评价。他们不停地生产和积累,并把消费的任务留给他们的继承人去完成。<sup>66</sup>

最后,西尼尔认为:“对财富本身的需求是无止境的。它作为对懒惰和奢侈的一种平衡,看上去根植于我们的天性之中。”<sup>67</sup>

因此,当西尼尔不直接从道德上力图证明利润是合理的时候,他实际上做出许多评论驳斥了他自己所提出的节俭是“人类意志中最痛苦努力”<sup>68</sup>的观点。

#### 注 释

1. 引自 Harry K. Guvetz, *The Evolution of Liberalism* (New York: Colliers, 1963), pp. 28~29.

2.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in *Ethical Theories*, ed. A. I. Melde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55), pp. 192-205.

3. 边沁大部分经济题材作品收入 Jeremy Bentham, *Jeremy Bentham's Economic writings*, 3 vols., ed. W. Stark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54).

4. Jeremy Bentha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in *A Bentham Reader*, ed. M. P. Mack (New York: Pegasus, 1969), p. 85.

5. 同上,第 86 页。

6. 同上,第 96 页。

7. 同上,第 97 页。

8. Jeremy Bentham, *Jeremy Bentham's Economic Writings*, vol. 3, p. 412.

9. 同上,第三卷,第 428 页。

10. 同上,第三卷,第 83 页。

11. 同上,第三卷,第 87~88 页。

12. 同上,第三卷,第 201 页。

13. 同上,第三卷,第 196 页。

14. 同上,第三卷,第 257~258 页。

15. 同上,第三卷,第 120 页。

16. 同上,第三卷,第 123 页。

17. 同上,第三卷,第 124 页。

18. 同上,第三卷,第 441 页。

19. 同上,第三卷,第 442~443 页。

20. Leo Rogin, *The Meaning and Validity of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57), p. 209.

21. Jean-Baptiste Say, *A Treatise on Political Economy*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863 年), 第 xi 页。该翻译来自出版于 1821 年的法语第四版。

22. 同上,第 62 页。
23. 同上,第 284 页。
24. 同上,第 286 页。
25. 同上,第 293 页。
26. 同上,第 287 页。
27. 同上,第 lii~liii 页。
28. 同上,第 lix 页。
29. 同上,第 293 页。
30. Jean-Baptiste Say, *Letters to Thomas Robert Malthus on Political Economy and Stagnations of Commerce* (London: George Harding's Bookshop, 1936), p. 3.
31. 同上,第 62 页。
32. 同上,第 62 页。
33. Nassau Senior, *Industrial Efficiency and Social Economy*, 2 vols. (New York: Holt, 1928), vol. 2, p. 156.
34. Nassau Senior, *Three Lectures on the Rate of Wages*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6), p. iv.
35. 同上,第 v 页。
36. Rogin, *Meaning and Validity*, 第 251 页。
37. Senior, *Three Lectures*, 第 x~xi 页。
38. 同上,第 xiii 页。
39. 请参见第 7 章。
40. Nassau Senior, *Journals Kept in France and Italy*, 2 vols., 2d ed. (London: Henry S. King, 1871), vol. 1, p. 150.
41. 同上,第 150~152 页。
42. E. J. Hobsbawm, *Industry and Empir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50* (London: Weidenfield and Nicolson, 1968), pp. 69-70.
43. Nassau Senior, *An Outline of the Sci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38), pp. 2~3.
44. 同上,第 3 页。
45. 同上,第 26 页。
46. 同上,第 6 页。
47. 同上,第 27 页。
48. 同上。
49. 同上,第 14 页。
50. 同上,第 24 页。
51. 同上,第 29 页。
52. Senior, *Three Lectures*, 第 v 页。

53. 同上,第 xiv~xv 页。
54. Senior, *Sci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第 88 页。
55. 同上,第 89 页。
56. 同上,第 60 页。
57. 同上,第 86 页。
58. 同上,第 115 页。
59. Nassau Senior, *Journal, Conversations and Essays Relating to Ireland*, 2 vols. (London: Longmans, Green, 1868), vol. 1, p. 153.
60. Senior, *Sci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pp. 128~30.
61. Senior, *Three Lectures*, pp. ix, x.
62. Senior, *Journals Kept in France and Italy*, vol. 1, p. 4.
63. 同上,第 150 页。
64. Senior, *Sci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p. 89.
65. Senior, *Industrial Efficiency and Social Economy*, vol. 1, pp. 67, 69.
66. 同上,第一卷,第 69 页。
67. 同上,第一卷,第 68 页。
68. Senior, *Sci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p. 60.

# 第 7 章 穷人政治经济学： 威廉·汤普森和托马斯·霍奇斯金的理论

在纳骚·西尼尔所说的“1830 年的恐怖之秋”，英国爆发了骇人听闻的大规模工人阶级暴动。一连串的罢工、骚乱和造反渲泄着劳工们的愤怒，因为工业革命极大地伤害了他们及其家庭。工业化的结果彻底摧毁了劳工们的传统生活方式。难得的就业机会和害怕失业造就了工厂里苛刻的规章制度和城市里悲惨的生活境况。高失业率使人们得到和保持一份工作变得极不确定。更糟糕的是，随着不可避免的大多数生产技术重大革新，大批的工人失去了与这些技术相关的工作岗位。当时，绝大多数工人的反抗都是由于三个缠绕其身的恶魔所引发：低廉的工资、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经济上的无保障。

## 工人对工业化的抵制运动

最初，工人为抵制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结果，频繁地结社和组织工会。在第 4 章里曾提到的那些纺织行业工会就是早期成功的例子。18 世纪 90 年代的英国，充斥着劳工普遍的骚乱和频繁的结社事件。英国的富人们对法国大革命记忆犹新，他们对结社运动和许多激进作家（如葛德文）日见扩大的影响越来越感到恐惧，1799 年《结社法》就是他们对工人运动的回应。

工厂老板们意识到，单个工人对他们的反抗是软弱无力的，因为只要储备了大量失业劳动力，任何“傲慢”或不听话的工人都可以轻易地被迅速取代。这种取代效应使留下来的工人们更加感到没有保障，因而更加顺从听话。然而，当工人集体进行谈判的时候，就显示出强大得多的力量。实施《结社法》的惟一目的就是要彻底摧毁联合运动，使工人们

毫无反抗力量。尽管《结社法》最终没有能够真正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在随后的25年时间里,它对工人运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结社法》的执行是难以置信的严酷。通常情况下几乎没有诉讼辩论,只有粗野的谩骂。即使说那些证据不是捏造的也是不足的,但惩罚却是可怕和残酷的。

工人反抗的另一种形式是捣毁机器。他们往往意识不到,并非机器本身,而是资本家用它们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方式夺走了他们的工作岗位。1758年,英国的工人们捣毁了许多羊毛修剪机,这几乎造成大规模恐慌。议会通过法案宣称,对任何破坏工厂和机器的工人,一旦抓住即判处死刑。然而,伴随工人们面对经济无保障和贫困的蔓延,机器遭破坏的境况也在继续。

《结社法》通过之后,工人们没有合法反抗的途径,因此对机器的破坏行为变得更加普遍。从1811年起,反抗行动的数量迅速增加,程度也更加激烈。在下面这几年里发生了系列反抗运动:1811~1813年,1815~1817年,1819年,1826年,1829~1835年,1838~1842年,1843~1844年,以及1846~1848年。其中大多数反抗事件是极其可怜和绝望的工人阶级的自发示威行动。1812年,尽管拜伦阁下(Lord Byron)表示强烈反对,但英国政府仍然不断以判处破坏机器者死刑来解决问题。

然而,到19世纪10年代末,许多工人阶级利益的捍卫者清楚地意识到机器不是罪恶的根源。他们指出工人的境况是经济、法律、社会以及政治制度造成的结果。因此,对贫民处境的任何实质性改善,都需要对现有制度的改革。工人阶级必须看清剥削的制度基础,组织起来去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

罗伯特·欧文是一位仁爱的中产阶级资本家,他成为19世纪30年代这场运动最有影响的领袖。欧文生于1771年,10岁开始当布商学徒,20岁成为一家大工厂的经理。明智的商业决策和好运很快给他带来了可观的财富。他在纽兰拉尔克拥有一家工厂。这家工厂因坚持良好的工作条件、能够维持生计的工资、以及向工人阶级的孩子提供教育而闻名英国。

他是一位富有慈爱之心的人,对工人们忍受的苦难和艰辛感到震惊。最初,他希望以他在纽兰拉尔克的工厂作示范,使其他资本家明白他们对待工人的方式是短视和无知的。他相信如果他们对待工人更仁慈些,他们将从工人那里获取更大的生产力,最终获得更多的利润。

然而,他发现几乎没有资本家愿意效仿。于是他认为答案在于建立自愿“合作社”。在这个合作社里,生产者共同掌握自己的经济命运。他相信合作社制度可以与现有的资本主义企业共存和竞争,最终完全替代它们。

这种合作社将是自我管理的工业和农业组织。在这个组织里,生产方式的私有制被废止,对利润的自私要求被铲除。

如果现在,一部分人将不再被训练和安排旨在用暴力和欺骗压迫另一部分处于极大

弱势的人;既不存在一部分人游手好闲,靠被压迫者的劳动过着奢侈生活,致使后者被迫终日劳动而过着贫困的生活,也没有人被造就成向人类心灵灌输谎言,并因此而获取超额报酬,而另一些人则被阻止告之真理,否则将因试图得到真理而遭到严厉的惩罚。<sup>1</sup>

欧文主张的合作社运动在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工人运动中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在《结社法》于1824年废止后,劳工组织重新合法。因此,毫不奇怪的是,这个时期一些同情工人运动的理论家,将欧文合作社运动的许多观点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著述中基于劳动价值论的阶级冲突视角联系起来。最引人关注的和最有影响的理论家当数威廉·汤普森和托马斯·霍奇斯金。

### 汤普森的功利主义和劳动价值论

威廉·汤普森(1775~1833)发表过几本著作和小册子。其中最重要的是《财富分配原则的研究》(1824)和《有酬劳动》(1827)。对汤普森影响最大的三个主要理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欧文式合作社运动思想、杰里米·边沁的功利主义。

在前一章里,我们谈到边沁的功利主义为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和效用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我们还谈到效用价值论来源于社会和谐观,而且又从理论上充实了社会和谐观,从而成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顶峰。然而,正如前一章所讨论的,在边沁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十年里,他成为一个影响颇为深远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倡导者。汤普森的改革观比边沁要激进得多。我们还将在下一章谈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他自视为边沁的信徒,相信法律改革能够限制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泛滥。

因此,在下面关于汤普森思想的讨论中,我们将指出边沁的功利主义何时(被边沁、穆勒或汤普森)用来为改革辩护,用来限制或铲除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以见其中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观点。我们认为,只有自由资本主义的保守新古典理论才存在边沁功利主义内涵逻辑上的一致,且边沁主义只适用于该理论对资本主义的保守辩护。

汤普森是公认的边沁信徒。与边沁一样,他既信奉心理享乐主义,也信奉道德享乐主义,尽管我们将看到他仍然信奉的社会理论与他的功利主义不可共存。他的心理享乐主义观从下面这段文字中可见一斑:

我们的机体使我们成为有知觉的生物体。这就是说,能够从各种渠道感知快乐和疼痛。任何行为的惟一理性动机,不管是索取财富还是别的什么目的,都是为了立即或在未来增加幸福感,或者是为了驱赶或减少引起烦恼的原因。<sup>2</sup>

汤普森没有为他的道德享乐主义作出理论辩护。他仅宣称功利主义道德理论,在边沁的著述中,已经是“排除了所有其他伪道德试金石,而得到完善发展和永恒确立的理

论”。<sup>3</sup>

汤普森认为,财富分配是社会各个成员能够获得多少愉快和满足的最重要决定因素。他还相信,随着个人财富的增加,等量财富的增加将带来越来越小的愉悦。<sup>4</sup>而且,如果社会成员待遇平等,他们对愉悦的感受就会是相同的。<sup>5</sup>这些观点与上一章中所讨论的边沁理论非常相似。

汤普森也接受劳动价值论。他认为,只有劳动才能创造财富,且一个社会所得到的劳动赠予量是那个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决定因素。

没有劳动就没有财富。劳动是财富的重要来源。自然力没有给予任何财富实物。劳动是惟一的财富之母……

土地、空气、热、光、电流、人、马、水等等,都不能被称作财富。它们可能是欲望之物,愉悦之物,但是直到它们被劳动的双手改变后,才成为财富。<sup>6</sup>

### 汤普森的平等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观

汤普森以其功利主义为前提指出“在与生产无关的所有人类活动事务中,公平分配是正义的法则”。<sup>7</sup>然而,他却认为仅有一种不平等能成立:

没有保障——即被每个拥有劳动优势的人排他性占有——劳动将不被提供。因此,在分配这种雇佣劳动物品时,该物品称作财富物品,且仅在此情况下,公平必须受到保障的限制,因为在任何其他情况下,公平与生产没有矛盾。<sup>8</sup>

汤普森对惟一非公平认可的描述与边沁相似。但是汤普森比边沁激进得多。边沁虽然看到英国的财富和收入分配远远偏离必要的公平程度,然而他认为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财富和收入的公平分配是完全可以共存的。汤普森则强烈反对这种观点。他不相信资本主义制度会成为一个“保障制度”,即保障每个人得到他或她的劳动成果。“目前对财富分配的制度安排,是以广大劳动者利益为代价,使少数人富裕而让穷人更加绝望的制度。”<sup>9</sup>

汤普森认为,资本主义贫富的两极分化绝非靠功利主义所能纠正。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对财富占有的不平等没有边界。它变成了一种占支配地位的癖好:财富带来的高贵和所引起的嫉妒,使人们不择手段地去获取它。一切充满暴力和诡计的伎俩都能够被用来将别人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在这样的认知下,人们变成了无知、好斗的苦役。它形成了一种习俗或规则。普遍的、持续的资本家监督共谋……无处不在……使劳工们为可能



得到的最低工资辛苦劳作。而他们的劳动产品却尽可能地变成了资本家的消费和积累。然而,资本家为了显示高贵,不是为了任何直接享受而像一个被高贵驱使的工具一样消费,这就是这些人的疯狂。成千上万的劳动产品被无止境地吞噬,来取悦这种虚渺的欲望。在这样的社会里,全部积累的财富都被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与周围的贫困形成鲜明对照,他们的巨额财富引人瞩目。那些从事生产的劳动者,没有资本,没有工具,没有住房,也没有生产材料供他们从事劳动。他们为需求,为获得生存的必需品辛苦劳作。他们得到的是最低工资,却保持着勤勉劳作的习惯。<sup>10</sup>

此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对财富份额的过度占有产生了罪恶”。<sup>11</sup>它“引起(穷人)的嫉妒和幻想,富人的罪恶行为在社会中广泛传播”。<sup>12</sup>

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强制性地剥夺了至少一半归生产者所有的劳动产品。”<sup>13</sup>而且,资本主义天生动荡不安。这种不稳定性引起的萧条,造成了失业、经济浪费和广泛的疾苦。

社会一般需求和生活条件长期以来基本保持相同:食物、衣服、住所建筑的形式和风尚,虽然改变着,但是慢慢地……由此形成的生产本质和形式,当然地分享了这种稳定性……

然而,对那些被称作过度财富的极端奢侈品的需求,却存在本质上的多变性……这种多变的急迫性,增加了对欲望物品的需求……这样自然引起许多人放弃一些产业,而去从事被更自由支付的新产业。然而,长此以往,由于对时髦休闲的病态追求,那些没有实际价值的玩物变得过时和不再新奇,不再被人喜欢。这种行当成为冗余,不久前还活跃非凡的,现在却几乎停滞。在巨大需求时所投入的固定和流动资本,必然在转产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遭受损失……劳工们的工作愿望和能力仍和以前相同,但是,尽管并非他们的过错,就业机会不再。<sup>14</sup>

汤普森总结道,资本主义是一种不能避免剥削、堕落、动荡、苦难、古怪、贫富两极分化的制度。他认为功利主义的周密思考往往得到相同的结论。具有讽刺性的是,汤普森几乎接受了功利主义关于自由竞争市场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所有观点。他认为,自愿交换总是会使双方受益,因为各方都能得到比所失去的多的效用:“所有财货的自由交换,隐含着双方对获得物品较之放弃物品的偏好,从财富中增加满足感,从而增加生产的动力。”<sup>15</sup>这个观点与功利主义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理论相一致。正是基于这个对自由交换的辩护,功利主义才可以得出市场使所有人的利益达到和谐,包括工人和资本家。

汤普森之所以能够反驳这种对资本主义的保守的功利性辩护,是因为他否定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力出售是自由的。他坚信如果工人们不拥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他们是不自由的。他们出卖劳动力不是自由交换,而是被强迫的。他们被迫面对饥饿的威胁,如同面对暴力威胁一样无奈。

因此,汤普森的结论是,在公正、竞争的交换社会“劳动的全部产品应该保证还给它们的生产者”。<sup>16</sup>这意味着资本所有者只能过着“与付出更大创造的工人们一样舒适的生活”。<sup>17</sup>汤普森指出,如果实行这样的规则,在一代人时间里,所有的工人,要么单个要么集体地拥有自己的资本,享有劳动的全部成果。<sup>18</sup>

因此,汤普森认为,要使交换和谐地惠及所有交换者,必须具备两个重要条件:第一,要使工人自由而不是被迫生产,他们必须拥有自己的资本和生产资料。由于没有哪个工人会比其他工人实质上消耗更多资本,这样的社会在财富分配上会比资本主义实质上更公平,尽管仍然会有某种程度的不公平。第二,如果竞争是普遍有益的,那么所有对自由竞争的限制应该被废除。要废止所有诸类法律:限制和管制生产,在任何市场上建立或保持垄断优势,允许政府规范货币供给,或允许通过继承获取财富等。<sup>19</sup>

汤普森描述的制度与许多 20 世纪的理论模式、平等主义观点、市场社会主义思想非常接近。汤普森相信,任何逻辑通顺的功利主义理论都会得到相似的结论。<sup>20</sup>

### 汤普森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

汤普森在尝试用功利主义的道德论说明竞争性的市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后,提出这样的问题:

或许找不到一种与保障一致的劳动模式,它不但可以避免个人竞争的害处,还可提供它特有的好处——丰硕的产品和发达的服务——达到一种比个人竞争所能提供的最好的安排更多、一种多得数不清的程度。<sup>21</sup>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列举了五个“个人竞争原则本身”“与生俱来”的孽障。<sup>22</sup>

竞争市场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孽障:“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工人、工匠、商人,彼此都(被看成)是相互竞争的对手。”而且,各类人都参与“第二层竞争,(他或她的行业)与公众之间的竞争”。<sup>23</sup>因此,“自私原则必然存在于(流行于)所有的生活事务中”。<sup>24</sup>例如,在竞争的市场社会主义(competitive market socialism)中,“疾病的存在和流行会符合医生的利益,不然他们的生意会减少 10 倍或 100 倍。”<sup>25</sup>实行社会性的医学预防绝不可能符合这些医生的利益。许多其他职业也会图谋创造或引起对他们产品和服务的强烈需求,来获得同样的利益,即使他们的产品或服务并不需要有利于社会。这种孽障在市场社会主义中是不可医治的。因为:

个人报酬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与慈善原则相背离的。该制度对这种公共罪孽所能医治的惟一办法,是将个人竞争限制在同行业之间,以使其在小范围内发生而减少大范围内的罪孽……获取个人财富中的自我利益追求,导致了几乎所有孽障和罪行。这些孽障

和罪行必然在某种程度上继续着,直到自我利益不再与他人利益相背离。<sup>26</sup>

个人追求财富导致的第二个孽障:对妇女的制度性压迫,即使在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中也是如此。这种压迫不但本身是一种罪恶,而且还造成了经济上的巨大浪费。汤普森认为,个人对财富的追求仅与单个原子式家庭并存。在单个的家庭,“所有沉闷的苦力活”都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干完”。假如“多个毗邻家庭……(建立)一种共同烹饪食物和教育孩子的基金”,妇女们就会从这些沉闷的苦力中解脱出来。<sup>27</sup>但是,如果在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她们仍然处于以往那种个人竞争资本主义境况之中,这种合作安排就不可能持久。要么“由此产生一种共同慈善……”,它将导致一套完整的“共同合作和高质量享用联合劳动产品”的制度,要么自私流行,以“乐衷个人消费和享受”毁掉了合作制度,回到原子式家庭。<sup>28</sup>

在个人竞争的制度下,“动物性体力优势”与“知识和社会政治权利施加的不平等”必将使妇女

持续地沦为(经济意义上的浪费)奴隶的隔离和艰辛境地……她们的全部行为都受制于他人,她们的活动和责任被限制于照料她们的主人和孩子的家庭生活之中……(而从不出现)在社会层面上。<sup>29</sup>

然而,这纯粹是个人竞争制度,而不是天然性别差异的结果。在工业技术时代,体力很少成为更大生产力的来源,“妇女,如果受到同等教育……将成为与男性一样的生产力”。<sup>30</sup>在汤普森眼里,这种劳动平等是社会平等的必要前提。然而,它的实现需要一个合作和共同分享的社会,而不是个人竞争的社会为基础。

其中,汤普森关于妇女压迫的论断值得关注。他对妇女压迫的本质及其后果的理解,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近半个世纪后才出现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理论。不幸的是,穆勒的性压迫分析受到了广泛称赞,而汤普森的论述却几乎被人们遗忘。下面是汤普森关于妇女压迫问题的一段精彩论述:

在盛行的这些制度下,无论是专制还是共和,没有一个科目,如同土地或家庭奴役一样,能够恰当地将这样一笔账项归属其下,即人类虚伪淫荡的那一半称最可爱、最无辜、最好的另一半——女人。宇宙间,男人对女人来说是最可爱和最令人愉悦的生物,女人对男人也一样;因此,这个账户平衡了。自然给予女人更小的体力,使她们的身体承受许多不便和痛苦,而男人则被免去了这些不幸。难道这就是男人应该在自然和不可避免的罪孽上,再加上本可以避免的人为束缚和罪孽的原因吗?<sup>31</sup>

紧接着这段论述,汤普森进行了一长段具有非凡洞察力的讨论,阐述妇女受压迫的状态,不仅毁掉了妇女的福利,最终也毁掉了男人们的福利。他的分析旨在说明幸福和“社会全体成员的一般认识,男人和女人……”都因性别不平等“而被限制或扭曲”。<sup>32</sup>

市场竞争的第三个孽障: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是市场无政府主义引起的经济不稳定。尽管社会主义能够铲除资本家任性的奢侈嗜好这个危机和萧条的根源,但是只要由竞争市场分配资源,就会产生经济不稳定、失业、浪费以及社会苦难。

这里的第三孽障归咎于个人竞争原理自身。它必然会因个人是非判断认知有限,而不时地引起无益或不明智的个人行为方式……在平等的保障下,每个人都拥有必要的体力和脑力,使其劳动具有高生产力;每个劳工也是资本家,这些众多的孽障无疑将消失。但是,只要竞争仍然存在,每个人必须自我判断他所从事的行当成功的可能性。他判断的途径是什么?每个在自己行当里干得好的人,都会隐藏起成功的秘诀,以免竞争减少他的得利。个人如何判断那些经常是遥远的、有时在另一个半球上的市场情况?那里是否对他意欲生产的那种产品供给过剩,或者有可能过剩?……假如有任何判断错误,他的产品就会滞销,他的生产因此不能带来收益。这将造成什么结果?仅一个判断错误……可能使之陷入严酷的困境,即使不是完全被毁掉。充其量,这种情况在个人竞争制度下似不可避免。<sup>33</sup>

竞争的第四个孽障:市场社会主义不可能铲除许多资本主义因对市场依赖而形成的无保障因素。自由竞争社会孕育出来的自私和自我主义将带来“贫困……畸形,疾病,衰老,或多起事故”。<sup>34</sup>

市场竞争的第五个孽障:由于获取知识变成贪婪获取个人财富的帮手,所以市场竞争妨碍了知识进步和传播。“诚然,向竞争对手隐藏新的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必然伴随个人竞争……因为强烈的个人利益是与慈善之心相违背的。”<sup>35</sup>

于是,汤普森作出这样的结论:就竞争而言,市场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巨大改善。然而它对市场的依赖,仍会导致一些社会罪恶。他认为,社会的最好形式应该是一个有计划的、合作的社会。这样的社会由共同合作、自我管理、合作社区组成。每个社区有500到2000个成员。

在这样的社区里,人们可以免费从一个公共商店里得到生活必需品。儿童由公家照管,在公共宿舍里睡觉,成年人可以在小公寓里生活。设立供所有人使用的公共厨房设施。劳动不分男女性别。做饭、照料儿童以及其他妇女的琐碎劳动将由所有人轮流分担。所有人都具备各种职业技能,他们可以定期变换工种以消除工作的单调感觉。社区的每个成年人将定期参与协调和管理机构。每个人都能无偿得到最好的教育,保证绝对的政治、知识、宗教自由。总而言之,共同控制和分享所有的财富,使人们不再因财富分配而产生差别。<sup>36</sup>汤普森关于合作社会主义社区的观点,从总体上反映了欧文运动中大多数人的观点。在整个欧文运动历史时期,他是继欧文后最有影响的代言人。汤普森关于有计划的、合作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描述是历史上最早、最完整阐述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之一。

然而,汤普森不是一名社会主义革命者。他痛恨暴力,并深信他提出的合作社会主义

计划如果被广泛理解,将会产生极大的吸引力。他坚信,一旦大多数人认识到这个社会可能带来的好处,他们将会自愿且和平地创造出这样一个社会。

### 对汤普森功利主义的批评

本书的一个中心主题是:功利主义为新古典效用劳动价值论提供了理论基础,即后一理论主张全体成员利益的和谐。这个理论传统是对市场资本主义现状的最精细、最深远的理论辩护,也是意识形态上予以支持的代表。正如保守理论家,如李嘉图,在将劳动价值论观点与效用理论观点融合时,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一样,激进资本主义社会批评家,如汤普森,也必然在综合这两种观点时,陷入同样的矛盾之中。在这一部分,我们将说明为什么功利主义不能支持激进社会改革,而必然倾向维持资本主义现状。

功利主义既是人类行为的心理理论,也是人类应该如何行为的道德理论。我们已经谈到,汤普森至少在某些叙述中,同时接受了功利主义这两个方面的理论。在他看来(与将在下一章讨论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一样),功利主义支持他的平等主义观点。它是一种民主理论,因为它提出在进行道德判断的时候,一个人不应该只考虑贵族的享受(无论是关于出生,还是关于财富),而应该顾及全体人民的享受——包括最贫穷、最受压迫的人。然而,如果更仔细地思考,功利主义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和民主是虚幻的。

功利主义的问题在于,个人的快乐和痛苦是判断好与坏的惟一道德标准。然而,快乐和痛苦是主观感受。直接体验到快乐和痛苦,本质上是个人的私自行为。尽管个人可以比较或将主观感受到的快乐程度进行排序,但是没有方法可以将一个人的快乐程度直接和另外一个人相比。此外,任何个人对快乐的私自、主观、相对排序可能与另一个人的排序有本质区别。由于个人快乐是功利主义的终极道德标准,就没有办法在两个人的快乐之间作出道德判断。边沁承认这一点并写道:“如果得到的快乐量相等,针戏(pushpin)就和诗歌一样好。”

因此,功利主义不能为所谓平等市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观点提供理论支持。如果汤普森是一个坚定的功利主义者,他就会说:“我赞成平等主义,市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因为前者比后者可以给我带来更多的快乐。”但是任何资本主义者可以回答他,他们更偏爱资本主义而不是平等市场社会主义。对功利主义而言,这种争论无异于汤普森说他偏爱诗歌而非针戏,而资本主义者说他偏爱针戏而非诗歌。在这两个争论中,每个人就自我而言都是正确的,但是就抽象理论而言又都是不正确的。功利主义没有提供比个人偏好更高的标准,以供人们在不同的偏好中判断哪个最好。

然而,汤普森相信,平等分配财富可以增加社会的总快乐量。功利主义会赞成这种观点吗?回答是否定的。为了说明这个结论,我们似乎不得不对个人、私自、主观感受快乐

的能力进行定量比较。没有人曾经指出过怎样做这个比较。汤普森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写道：

假设……不同人的这些能力，或对快乐的感受力不同……（一个）实际操作困难，或不可逾越的障碍就产生了。用谁来作感受力的尺度？富人还是穷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学者还是文盲？……因此，我们必须彻底抛弃毫无价值地猜想不同人对快乐的感受力来影响财富分配的做法。<sup>37</sup>

那么，汤普森是怎样得出财富的公平分配在道德上优于极度不公平分配的结论的呢？他从最初的分配是平等的假设入手，接着指出，由于我们不能说明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有更大的能力享受快乐，所以我们不能从效用的原理上证实从最初的公平分配转化为不公平的分配。他的结论完全建立在他对初始公平分配的假设基础上。

汤普森的困难在于，就像我们不能说明人们对快乐的感受能力是有区别的一样，他没有意识到我们也不能证明人们对快乐的感受能力是相同的。对任何现实财富重新分配中，将一些人的财富拿来给另一些人，我们都不能从道德上进行评价，因为我们必须从数量上比较因失去财富而丧失的快乐与因得到财富而得到的快乐。而汤普森承认，这种比较是不可能的。

因此，功利主义总是支持任何财富分配的现实。如果分配是公平的，就像汤普森假设的那样，功利主义就支持公平。但是，正如后来的保守新古典经济学家认识到的，如果分配是不公平的，功利主义就支持不公平。这种支持当然只是一种间接的支持。功利主义没有说明自由市场现状优于任何其他形式，它只是说明仅从功利主义的角度，不支持对自由市场现状的任何改变。但是，由于功利主义者除了功利外没有其他的实际标准，就往往意味着不改变现实是最合理的。

因为资本主义现实是一个不公平的恶魔，就像汤普森充满感情地指出的那样，功利主义实际上是一种非常保守的理论，它以“存在即合理”来维护不公平。这是因为在功利主义的理论中，我们不能从数量上比较不同人的主观状况，致使我们不能从道德上评判两种不一致或矛盾的情况。功利主义也因此可被看成是一种非常有限的或狭隘的理论，它只能对完全一致的情况作出判断。

如果人们接受现实的财富和收入分配，那么市场交换是这种一致性存在的惟一社会状况。交易双方都在交易中满足一种欲望，即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多。因此，仅就交易而言，我们看到一致性存在，社会达到和谐。这就是为什么功利主义被视为基于交换角度的经济理论，也是为什么从交换角度看，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和谐的制度。

劳动视角理论与效用或交换视角理论最重要的规范区别因此便一目了然了。当一个身无分文的工人一份微薄的工资出卖劳动力，在恶劣的工作条件下工作，劳动视角理论的焦点在于只有劳动才能将自然材料变成可消费产品的事实。它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

形成的财产关系,迫使生产者过着可怜的生活,而不参与生产过程的财产拥有者,却积聚了大量财富。冲突是以劳动为中心的。然而,效用视角理论则将财富分配(即财产权利的分配)看成是天然的,它关注的是和谐或交易中的互惠,即在低工资和饥饿两者中,工人偏好低工资;在更多利润和较少利润之间,资本家偏好更多利润。于是,工人和资本家都从交易中获益,社会达到和谐。

从上述讨论中,我们得到这样的结论:汤普森的功利主义没有给他提供任何理由使他更偏爱竞争性平等的市场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当我们考察他的有计划的、合作的社会主义优于市场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观点时,我们发现,他的功利主义理论使他陷入了更深刻的矛盾之中。

他认为合作社会主义优于竞争个人主义。主要理由是,前者会激励慈善之心,而后者则激励与社会相背的自私之心。这个观点恰恰与他自己的功利主义心理理论相矛盾。他的功利主义心理理论基础是假设所有激励最终都是自我利益的理性追求。用边沁的话说:“在生活的一般进程中,在每个人的心中,自我利益高于一切其他利益的总合……对自我利益的偏好处处站得住脚。”<sup>38</sup>显然,汤普森关于合作社会主义的观点置于功利主义哲学框架之中是站不住脚的。

关于汤普森著述的讨论总结如下:尽管汤普森的著述属于最引人关注和影响最大的早期社会主义著作之列,他的经济理论真正称得上是“穷人政治经济学”,然而,事实上他的功利主义理论使他陷入了不能解决的矛盾之中,因为功利主义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最坚定的支持者。

### 托马斯·霍奇斯金的利润来源观

托马斯·霍奇斯金(1787~1869)是另一个在19世纪2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运动中产生过较大影响的作家。<sup>39</sup>他建立了资本与利润的理论,一个完全属于劳动价值传统的理论。霍奇斯金的影响连同他的激进理论结论,无疑是使纳骚·西尼尔和19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的另一一些保守经济学家放弃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因素。保守学派一般将李嘉图的理论与汤普森、霍奇斯金的理论,以及工人运动联系起来。一位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写道:

托马斯·霍奇斯金的名字是在1824年《结社法》废止后的那些日子里用来恐吓小孩子的。因此,这样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即许多更保守的经济学家转而认为,李嘉图的价值论不仅在逻辑上不正确,而且还有社会性危险。<sup>40</sup>

霍奇斯金的写作生涯漫长而著作丰富。他的大部分著作和文章都是论及经济和政治

问题的。<sup>41</sup>他在最早的两本书里,公开指责那些因拥有财产而获取收入的不公正性。他在1813年发表的《论海军纪律》一文中写到,财产产生了“非公正和非公平的影响”。<sup>42</sup>因为财产“完全是……剥夺劳动者而送给游手好闲绅士的日常劳动成果”。<sup>43</sup>然而,当时支持这种观点的论述很少,也没有关于价值或利润来源的研究。

在1818~1819年期间,霍奇斯金写了《北德之行》。人们从这本书里,再一次看到了他对利润和地租的责难:“地主和资本家不生产任何东西。资本是劳动的产品,利润只是劳动产品的一部分,却苛刻地要求工人们只可消费自己生产的一部分产品。”<sup>44</sup>

尽管“资本是劳动产品”的格言孕育劳动价值论的种子,但这个理论并没有在这本书里展开。而谈得更多的,是利润和地租被视为“合法的抢劫”。霍奇斯金解释道,这是一个存在阶级区分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富人控制了立法程序,并因此可以永久施加他们的影响,获取财富,拥有权力:

法律……是对那些毫无提防的人们设下的无处不在的陷阱,是特殊阶级用来养肥自己、剥夺他人的器物。<sup>45</sup>

在立法者的眼中,财富仅本身具有万千魅力还不够,他们要赋予它多重特权。事实上,它现在已经占据了全部立法权,致使绝大多数刑法仅为守护财富而设立。<sup>46</sup>

霍奇斯金指出,医治这种社会不公平的药方是取消政府和法律。尽管霍奇斯金在《北德之行》中没有提及曾受到哪些作家的影响,但从他的观点中,似乎看到葛德文和斯密的影响。

许多证据显示,目前存在大量的法律灾难。这个时代有一种病态的立法欲望,每个欧洲国家的法令全书都充斥着大量自相矛盾的法令。<sup>47</sup>

他们索取财富的手段是合法地压迫劳工,使他们看起来如同慈善法令的缔造者,或福利社会的领袖。苦难的民族渴望慈善或福利。自然赐予每个人能满足自我需求的力量,她将成百上千万的财富交到他们自己手里,并且没有使他们受制于和他们自己一样的一个或几个人。然而,我们的认识和知识只给我们自己的小圈子。那种让我们的力量和影响惠及更广的愿望,不仅愚蠢而且荒唐。我们只会首先将他们判罚到不幸的境地,然后对着这些不幸发泄我们的高兴。这是一种使用得再频繁不过的伎俩:一个阶级的勒索加上立法者的辅助创造了贫穷和苦难,而正是这些创造了贫苦的人,有时却如此焦急地要减轻苦难。慈善和一无所有共同制造了一部分人压迫和统治他们的同类这个事实。自私的信条确实充满仁爱和智慧。没有那种情感如同这种带着关爱进行咒骂的慈善值得寻味。<sup>48</sup>

1817年,在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出版后不久,霍奇斯金便开始研究李嘉图的理论。而在此之前,没有资料显示霍奇斯金有任何价值理论来充实他的利润是“合法抢劫”(legislated robbery)的理论。起初,霍奇斯金对李嘉图的理论是持否定和反对态



度的。<sup>49</sup>他在1820年5月28日给弗朗西斯·普莱斯(Francis Place)的信中写道:“我不喜欢李嘉图先生的观点,因为它们是为现实社会政治制度涂脂抹粉的,还对我们未来改进的希望设定了范围……我开诚布公地表示,这是我反对它们的根本原因。”<sup>50</sup>在同一封信中,他借助亚当·斯密的理论,简述了一种价值理论,并将此看成是对李嘉图价值理论的反驳。霍奇斯金下面这段关于价值理论的叙述很重要,因为他在随后的三本政治经济学著作里再没有修改过,而只是对此进一步展开和作出详细解释。关于李嘉图的价格决定理论,霍奇斯金写道:

由于李嘉图先生假设来自三个大阶级……的购买者,即地主、资本家和工人是不同的,全部财富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就使得这个问题变得相当混乱不清……亚当·斯密在关于地租和利润使物价提高的所有论述中……明确地假设社会由这三个阶级组成。事实上,他和李嘉图先生都主张由劳动来支付所有物品的“实际自然价格”,因此,是什么减少了劳动价值,或需要更多的劳动量才能获得提高价格后的相同商品量,也就不证自明……地租……因全部租金提高价格、利润,因按某种比例减少了劳动成果的价值,而使得劳动者在获得所有商品时面对更高的价格。正是在这层意义上,亚当·斯密说地租和利润提高了物价……如果李嘉图先生的观点成立……地租和利润将不进入物价……我想这就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先生观点的区别。<sup>51</sup>

霍奇斯金在1825年出版的《为捍卫自身利益而反对资本的工人》一书中,将主题放到了驳斥关于“利润是资本的生产力所赚得的回报”观点之上。他对价格决定的分析只不过是重复上面提到过的给普莱斯信中的观点。<sup>52</sup>1827年,霍奇斯金在《大众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再次阐述了霍奇斯金版本的斯密价值理论。<sup>53</sup>他详细阐述了隐含在他早先所有著作里的价值理论,并在某些方面解释了霍奇斯金价值理论与李嘉图价值理论的区别。这就是“自然价格”与“社会价格”的区别。

自然或必要价格的意思是……自然要求人们付出的生产任何商品的全部劳动量……自然没有拿走除过去的劳动以外的任何东西。她只需要现在劳动和所有未来时间的劳动。在与自然的交易中,劳动是原创的、现实的、永远的唯一用来购买的货币。还有一种对价格的描述,我称其为“社会价格”,它是由社会规则加了价后的自然价格。<sup>54</sup>

“社会规则”通过“提高”自然价格而形成社会价格,是一种将不劳而获的收入分配给地主和资本家的法律。社会价格由此必然包括地租、利润以及工资。霍奇斯金非常清楚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的自然价格是一个规范的概念,它只有在被他视为非自然的现有政府和法律彻底铲除后才能实现。“只有他(工人)的劳动,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是自然价格所衡量的。然而,工人们从来就没有按付出的劳动而获得所生产的商品。因此,目前的所有货币价格都不是自然价格,而是社会价格。”<sup>55</sup>

因此,与李嘉图不同,霍奇斯金不相信,在现实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的价值由所包含的劳动所决定,而追随斯密提出的关于价格是由工资、地租和利润共同决定的观点。然而,与斯密及其大多数更保守的信徒不同,霍奇斯金认为,帮助榨取地租和利润的私有财产法律,是非自然的,因此具有内在的不公正性。

### 霍奇斯金论资本

按照霍奇斯金的观点,利润和地租是强加给社会的,是非自然的生产成本,它们提高了价格。事实上它们是不必要的,因为它们完全是生产者呈送给那些有强制权力人的贡品。它们不代表生产过程所必要的任何支付。为了说明这个观点,霍奇斯金认为有必要反驳关于资本是生产的一种分离和独立的要素的观点。

他的反驳从对资本本质考察的基础上展开。按照古典经济学的惯例,他首先考察循环资本的性质,然后是固定资本的本质。他提出,循环资本一般是累积的维持生计的资金,如果没有循环资本,劳动者就不能在他们完成最终商品的生产过程中生存。<sup>56</sup>他接着指出,在现实中这种资金不存在,或充其量也是微不足道的。<sup>57</sup>他概括地说:

所有的人每天在辛勤劳作的时候都抱着一个信念,那就是,无论他们分工干什么,另外的人都会生产出他们目前和未来消费所需求的一切。我作过这样的解释,即这种信念来自于我们的自然法则。我们坚信明天太阳会升起,坚信我们的劳动伙伴明天会来工作,明年他们会像今年一样工作,像过去的这一天一样工作。我希望我也向读者们说明白了,过去的任何劳动产品是不能储藏起来备用的。这种存货的效果往往是和劳动力共存的。资本家是通过控制占有某些人的劳动,而不是占有商品存货,使他能够支持和最终雇佣其他工人。<sup>58</sup>

霍奇斯金认为,“固定资本”是“工具、设备、机器……和他(工人)用于帮助他们劳动或保护他们产品的厂房。”<sup>59</sup>他指出,第一,“所有的设备和机器都是劳动产品”<sup>60</sup>;第二,如果没有工人使用它们,它们就毫无用处。也就是说,机器本身不能生产任何东西<sup>61</sup>;第三,它们需要劳动对其进行定期保养<sup>62</sup>;第四,大多数固定资本不代表资本家手中积聚的财产,而是与劳动一起永无止境地被消耗,被重新创造。<sup>63</sup>

因此,霍奇斯金指出,资本仅仅是众多劳动过程中的不同方面,劳工之间的关系,劳动的产品。它们是所有生产过程的方方面面,在一切社会中都存在。在19世纪20年代的西欧经济中,霍奇斯金认为,将这些生产过程普遍存在的方方面面称作“资本”,会使他那个时代真正存在的、在经济中起作用的资本的最基本特征含义不清:

垄断一国全部产品的资本,除了劳工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外,是“劳动产品”,“是商品”,

“是劳工们吃的食物和他们用的机器”，因此，在被提供这些生存必须条件后，……吃我们自己生产的食物，用我们的技能更多地生产，我们必须得到国家全部产品的巨大部分。<sup>64</sup>

资本是那种如同教堂或国家，或像任何这类抽象词汇一样的高深莫测。它被那些人发明用以欺骗其他人，并在瓜分这些人的利益时，隐藏起自己的手。<sup>65</sup>

### 霍奇斯金的功利主义

尽管霍奇斯金认为资本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一个阶级的强权对另一个阶级生产成果的掠夺，但他不是社会主义者。他指出生产方式的私有权是自然注定的。现有的非自然财产所有权形式与那些自然和公正财产权形式之间的区别，是他最后一本书的论题——1832年出版的《自然的和人为的财产权之对照》。他写道：“自然赠予每个人他自己的劳动成果，就像给了他自己的身体一样。”<sup>66</sup>资本，仅就“生产出来的生产财富”这层含义而言，它既是过去劳动的产品，也是目前和未来劳动的必要辅助。正因为如此，资本的自然所有权应该归生产出它、又用它来进行生产的劳工。那种非生产者占有资本的所有权形式，被霍奇斯金视为非自然所有权。它是绝大多数社会问题的核心。任何允许占有的一部分不是其生产的财产，即不劳而获所有权的法律都是非自然的。霍奇斯金嘲骂现存财产权的辩护者们道：

他们当成自然的、无须顾虑的财产权，仅仅是由那些法律制造者建立和执行的法律……长期以来，这种制造法律的权力是授与那些人的，而且他们的子孙仍然有这种既定权力。他们不懂生意只知道战争，不懂得手艺只知道抢劫和掠夺……欧洲现在的立法者就是这些人的后代——他们只看重他们自己的观点和习惯，按他们自己的原则行动。他们不熟悉任何财富创造艺术，而靠掠夺别人的产品生活。自然没有赐予他们任何财产，他们拥有的一切是用武力从那些自然赐予了财产的人们那里掠夺来的。<sup>67</sup>

霍奇斯金认为，理想的社会是一个不可能存在不劳而获所有权的社会。只有那些劳动者才能获得资本，且只拥有那些帮助他们从事个体生产活动的资本。<sup>68</sup>只有在这样的社会，才没有必要将利润和地租计算到价格里。因此，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自然价格和社会价格才会相等，因为只有这样，劳动者才获得了他们的全部产品。霍奇斯金认为，只有在这个理想社会里，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才是正确的。<sup>69</sup>他相信，工人们的自我教育足以使这种改革得以实现。<sup>70</sup>他的著述有时让人们感到，他似乎相信这种改革的进程正在他的时代发生着。<sup>71</sup>

在这个理想的社会里，所有的生产都是为市场交换进行的。霍奇斯金对自由市场的辩护与汤普森一致，他们的观点都简单地建立在这个观点上，即自愿交换的双方，都从交

换中得到了较其失去部分更大的效用。这种关于自由交换欲望的标准功利主义论断,在霍奇斯金的著作中俯拾皆是。与绝大多数功利主义辩护者关于自由市场“无形之手”的观点相一致,他提出取消一切对供给和需求的限制,无论是来自政府、个人还是团体的。因此,与汤普森的“个人竞争保障制度”一致,他的理想社会是没有资本家的竞争资本主义。

在关于资本本质的阐释方面霍奇斯金的分析比汤普森更精辟。他指出资本既是生产出来了的生产手段,又是一种强制性的社会关系。然而功利主义最终没能为霍奇斯金的没有资本家竞争的资本主义理想制度提供更好的理论营养,汤普森的情况也是如此。不足为奇,汤普森是霍奇斯金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后者的《为捍卫自身利益的工人》出版于1825年。1825年,汤普森撰写了《劳动与资本回报的协调》,这是一本批判霍奇斯金的书。汤普森曾在他更早的著作《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中罗列了“个人竞争制度”的缺陷,并在《劳动与资本回报的协调》里再次提及。显然,他的目的是要说明,即使没有资本家对劳工产品的掠夺,市场经济中的竞争个人主义仍然在社会和道德方面逊于合作社会主义制度。

#### 注 释

1. Robert Owen, "The Book of the New Moral World," reprinted in part in *Communism, Fascism and Democracy*, ed. Carl Cohe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pp. 47~48.

2. William Thompson,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Most Conducive to Human Happiness* (London, William S. Orr, 1850), p. 15.

3. 同上,第1页。

4. 同上,第144页。

5. 同上,第17页。

6. 同上,第6页。

7. 同上,第111页。

8. 同上。

9. 同上,第xxix页。

10. 同上,第133页。

11. 同上,第145页。

12. 同上,第147页。

13. 同上,第126页。

14. 同上,第155~157页。

15. 同上,第35页。

16. 同上,第137页。

17. 同上,第128页。

18. 同上,第454页。

19. 同上,第250~253页。

20. 同上,第 vii~xxxii 页。
21. 同上,第 255 页。
22. 同上,第 258 页。
23. 同上,第 259 页。
24. 同上,第 257 页。
25. 同上,第 259 页。
26. 同上,第 259~260 页。
27. 同上,第 260 页。
28. 同上。
29. 同上,第 261 页。
30. 同上。
31. 同上,第 213~214 页。
32. 同上,第 214 页。汤普森关于性别歧视主义的论述在随后的几页里展开。他在 *Labour Rewarded, The Claims of Labour and Capital Conciliated*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y, 1996) 一书中,也有关于性别歧视主义的论述。此书于 1827 年首次发表。他著有一本分析妇女压迫的专著,书名为 *Appeal of One-Half of the Human Race, Woman*, 1825 年出版。
33. 同上,第 261~263 页。
34. 同上,第 263 页。
35. 同上,第 267 页。
36. 同上,第 269~367 页。
37. 同上,第 19 页。
38. Jeremy Bentham, *Jeremy Bentham's Economic Writings*, vol. 3, ed. W. Stark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54), p. 421.
39. 比较霍奇斯金与斯密、李嘉图、马克思的观点参见 E. K. Hunt, "Value Theory in the Writings of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Thomas Hodgskin and Karl Marx,"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9, no. 3 (Fall 1977): 322~45.
40. Ronald L. Meek, *Studies in 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3), p. 124.
41. 他写了 5 本书: *An Essay on Naval Discipline*, 部分阐述它在军官和驻地人们心中的邪恶效应,若修正制度,压迫就会被立刻铲除, 1813 年出版; *Travels in the North of Germany*, 描述现实和政治制度状况,农业、制造业、商业、教育、艺术以及当地的风俗,特别是在汉诺威王国, 1820 年出版; *Labour Defended against the Claims of Capital*, 1825 年匿名出版; *Popular Political Economy*, 1827 年出版; *The Natural and Artificial Rights of Property Contrast*, 1832 年出版。他还写了几十篇文章,大多数发表于 1844~1857 年的《经济学家》杂志上。
42. Thomas Hodgskin, *An Essay on Naval Discipline, Showing Part of Its Evil Effects on the Minds of the officers and the Minds of the Men and on the Community* (London: Hurst Robinson, 1813), p. 173.
43. 同上,第 192 页。

44. Thomas Hodgskin, *Travels in the North of Germany, Describing the Present State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he Agriculture, Manufactures, Commerce, Education, Arts and Manners in That Country, Particularly in the Kingdom of Hanover* (Edinburgh: Archibald Constable, 1820), vol. 2, p. 97.

45. 同上,第 27 页。

46. 同上,第 228 页。

47. 同上,第 466 页。

48. 同上,第 107~108 页。

49. 1819 年 6 月,霍奇斯金给弗朗西斯·普莱斯批评李嘉图的理论。Francis Place, *Private Correspondence*, vol. 2 (British Museum), add. MSS 35, 153, F142 ff.

50. Francis Place, *Private Correspondence*, vol. 2 (British Museum), add. MSS 35, 153, F67.

51. 同上。

52. Thomas Hodgskin, *Labour Defended against the Claims of Capital* (London: Labour, 1922), pp. 75~76.

53. Thomas Hodgskin, *Popular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6), pp. 219~35.

54. 同上,第 219~220 页。

55. 同上,第 233 页。

56. Thomas Hodgskin, *Labour Defended*, p. 35~36.

57. 同上,第 38~50 页。

58. 同上,第 51~52 页。

59. 同上,第 52 页。

60. 同上,第 54 页。

61. 同上,第 56~58 页。

62. 同上,第 59~60 页。

63. 同上,第 54 页。

64. 同上,第 31~32 页。

65. 同上,第 60 页。

66. Thomas Hodgskin, *The Natural and Artificial Rights of Property Contrasted* (London: B. S. Fabernoster Row, 1832), p. 28.

67. 同上,第 32 页。

68. 这种观点在霍奇斯金的后三本著作里都有表述: *Labour Defended*, pp. 86~105; *Popular Political Economy*, pp. 243~257; *Rights of Property Contrasted*, p. 101.

69. 参见 *Popular Political Economy*, pp. 26~29, 98~102.

70. *Labour Defended*, pp. 26~29, 98~102.

71. *Rights of Property Contrasted*, p. 101.

## 第 8 章 纯粹功利主义与折衷功利主义： 巴斯夏和穆勒的著作

在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中，我们已经看到效用理论和劳动理论这两种观点的融合，这样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资本主义同时拥有社会和谐和阶级冲突两种特征。萨伊和西尼尔则完全否定了劳动理论，他们认为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可以证明所有阶级的利益是和谐一致的，萨伊和西尼尔从这种观点出发来“净化”古典政治经济学。他们认为所有现存的矛盾冲突都是由于无知和误解造成的。萨伊和西尼尔（以及马尔萨斯）的学说都试图根据“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来说明穷人的最终（或潜在的）利益与有产有权的富人的直接（或明显）利益是如何达成一致的。

汤普森和霍奇斯金都接受劳动理论观点，认为只要财富的直接创造者——工人没有控制生产资料，阶级冲突就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他们二人都支持劳动人民的事业，同时提倡通过社会变革以改革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然而，由于这两位作家的许多思想都是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所以他们陷入了一些与斯密和李嘉图同样的矛盾之中。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理论观点产生了激进的社会主义影响。这种影响在 1820～1850 年之间迅速传播。在此期间，社会主义者开始在逐渐壮大的工人阶级运动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因此，保守主义者开始非常急切地寻求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新版本。19 世纪中叶，有两本非常重要的经济理论著作问世——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 年出版）和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的《经济和谐论》（1850 年出版）。穆勒的著作试图将效用理论和劳动理论融合于同一个经济学说之中，这是经济学家在这方面做的最后一次尝试。而巴斯夏的著作从本质上来看是代表纯粹功利主义及其合理结论的最后作品。

## 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最主要的理论根源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通过汤普森和霍奇斯金的著作,这些经济学说被应用于英国的欧文主义运动中,在19世纪30年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然而,社会主义思想在法国发展得最快,尤其在19世纪30、40年代为最甚。

尽管社会主义经济学说大部分起源于英国,但是我们也可以说英国和法国思想在社会主义的产生中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18世纪的法国革命运动的左翼产生了许多社会主义思想。其领导人之一是格拉古·巴贝夫(Gracchus Babeuf,1760~1797)。在罗伯斯庇尔倒台之后,巴贝夫策划了一个密谋——推翻法国政府,试图建立一个平等、友爱的政府。但是由于叛徒出卖,这个计划被泄漏了,巴贝夫也被政府处死。

巴贝夫在其著作中宣称自然赋予人们同等的权利,同时使得所有人的需求也是相同的。因此,社会应该纠正现存的财富和权利的不平等现象。然而不幸的是,大多数社会采取相反的措施:他们设立强制机构以保护有产者和富人的利益。巴贝夫认为存在不平等就意味着存在不公正。他说,资本主义商业之所以存在,“其目的是榨取每个人的血汗以形成一个有利于少数人的金湖”。<sup>1</sup>工人创造了社会财富,然而他们得到的却是最少的;只有消灭私有财产,才能纠正社会的不公平。

亨利·德·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1760~1825)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出生于一个已经陷入穷困的贵族家庭。对于那个时代富有资本家的危害社会的利己行为,他表现出贵族式的蔑视。圣西门强烈谴责个人主义竞争所造成的有害的道德影响。同时他还强调有计划的合作生产所带来的社会价值。对于大量靠劳动人民辛勤劳动供养的闲散懒惰的富人,他也予以强烈的批判。当私有财产被用来提高大众的福利时,他表示支持和鼓励。但是同时,他坚持认为只有扩大政府对生产、分配和商业的干预,才能保证大众的福利得以提高。

圣西门的追随者更加激进。他们编写了不计其数的小册子和书籍,揭露资本主义的陋习弊病、抨击私有财产和继承权、谴责剥削、倡导政府为了全民福利而支配和管理经济生产。

19世纪30年代,查尔斯·傅立叶(Charles Fourier)在法国推广社会主义合作社。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从事对社会有益的工作。由于市场体系所造成的腐败和歪曲,另外三分之二的人要么从事毫无用处的职业,要么则成为毫无价值的、富裕的寄生虫。他鼓励社会生产成员自愿组建合作社——他称之为“法郎吉”(phalanxes),以此来逃避这种剥削压迫和专政暴政。他也是最先领悟到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将



无可避免地导致垄断的几个社会主义者之一:

在对人类劳动权力产生限制的影响因素中,我想提一下那些垄断着某种产业的特权团体,他们可以任意禁止人们从事劳动……两个极端是一致的;商业的无政府状态愈是增长,人们就愈向往相反一端的世界性的特许权……垄断者,……与大土地所有者达成协议后,就能把一切小土地所有者变成商业的附庸……小所有者变成了为商人的同盟而工作的伙计;归根结底,可以看到封建主义以相反的方式,即不以贵族联盟为基础而以商人联盟为基础而重新复活起来。<sup>2</sup>

在19世纪40年代以及之后的几十年中,法国最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者是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 1809~1865)。在其著作《什么是财产?》中,他以一条标语——“财产就是偷窃”回答了书名所提出的问题,这条标语使他闻名于世。他认为财产是“暴政之母”。因为财产权只是少数人的特权,普通大众根本无法享用这种权利,所以必须以强制手段才能得以建立和实施。因此,国家的基本功能就是强制压迫。

财产权不仅是专制暴政和高压统治的根源,同时也会引起经济不平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鉴于由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生产量,由财产权决定产品的分配,所以生产者几乎什么也得不到,而财产所有者却可以利用私有财产法,“合法地窃取”工人的劳动果实。蒲鲁东的理想社会不仅排斥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同时也拒绝工业化。他构想出一个小规模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黄金时代——在这种社会中每一个农民和工人都拥有自己的资本,没有一个人是仅靠财产权而生活的。

### 巴斯夏功利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和研究范围

19世纪40年代,法国社会主义的影响迅速蔓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弗雷德里克·巴斯夏(1801~1850)试图证实私有财产、资本、利润和现存的财富分配制度——也就是整个竞争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将功利主义原理扩充到经济理论中(尽管我们将看到,直到二十多年以后,才出现效用价值论最终的、现代的、系统的阐述,以回应社会主义思想日渐扩大的影响)。

巴斯夏最主要的著作是《和谐经济论》,这个书名表明他非常反对“阶级冲突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这一观点。巴斯夏(与西尼尔一样)主张科学的权威性,并以此为其理论辩护。在讨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显然,他最赞同的经济学家是萨伊和西尼尔)和社会主义(显然,他最反对的社会主义者是蒲鲁东)之间的区别时,他这样描述:

这两个学派的主要区别在于他们的方法不同。社会主义学派跟星象学和炼丹术一样

依靠想象,政治经济学派则跟化学和天文学一样依靠观察。

两位天文学家观察同一事物,可以得到不同的结果。但是,尽管存在这种短暂的分歧,他们却感到,共同的方法将他们联结在一起……可是,天文学家和星象家的关系就不同了,前者进行观察,后者进行想象,尽管他们会有某些共同点,但两者之间的鸿沟却是不可逾越的。

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正是如此。

经济学家对人、对人的社会组织规律以及由这种规律所形成的人际关系进行观察。社会主义者想象出一种虚幻的社会和与这个社会相匹配的人心。<sup>3</sup>

同时,他(与马尔萨斯一样)也用宗教的权威性为其理论辩护:

我们以信仰的名义宣布,以科学的名义提出道德活动非凡的……具有生命力的规律,我们彻底排斥那些……法规,而那些盲目行事的人却随意地把这些法规引入到良好的机制中去。从无神论者的观点看,说听凭运气自由放任是荒谬的!而我们信教的人则有权高喊:让上帝的秩序和正义自由放任!<sup>4</sup>

如果说社会主义者的作品与教徒的有别,那就是他们会这样说:“我们装作相信上帝,但是我们最终还只是相信自己。因为我们不想自由放任,因为我们提出的每项社会计划都比上帝的更好。”<sup>5</sup>

这样一来,巴斯夏便确立了其理论的科学性和宗教的权威性,之后,巴斯夏开始对功利主义经济学展开系统的讨论。在上一章,我们已经看到功利主义提出了两种情况。在第二种情况下,某个个体的效用减少,而其他所有人的效用将增加。但是功利主义却没有告诉我们判断这两种情况的依据。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承认现存的财富分配制度是理想和公正的(或者如果我们完全忽略分配),那么在两种情况下,自愿的市场交换将使所有人的效用都增加。交换后,双方的效用都比之前有所增加。在此,巴斯夏引用了孔狄亚克(Condillac)的观点来加强论述:“交换得以实现这个事实本身表明,参与交换的双方必然都得到了好处,否则就不会有交换。因此,交换对于人类来说是双方获利。”<sup>6</sup>

功利主义要求达到一致。自从人们接受“可交换物品”的定义开始,自愿交换就成为社会活动之一,同时参与交换的人之间也达成了一致。这种一致性需求及其在交换中的实现对于现代新古典经济学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新古典功利主义经济学中,人们之间所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都可以简化为交换行为。这种简化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整个功利主义经济学理论可以归纳为三段论:

一切交换对所有参与者都是互惠的。

一切人类活动都可以简化为交换。

因此,一切人类活动对所有参与者都是有利的。

正是在巴斯夏的著作中,首次对效用方法展开连贯的探讨,以至于将所有的经济理论

简化为仅仅对市场交换的分析。巴斯夏宣称:“交换就是政治经济学,就是社会的全部。因为没有交换的社会和没有社会的交换都是不可想象的。”<sup>7</sup>

当巴斯夏宣称“交换就是政治经济学”时,他就大大偏离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在其将近一千页的《国富论》中,只用了几十页来讨论交换。而李嘉图则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问题是确立经济产品在社会三大阶级之间的分配法则。

在巴斯夏看来,斯密用来描述“看不见的手”的几十页内容,等同于整个政治经济学。由此可以看出,其“清洁”和“消毒”工作做得非常彻底。巴斯夏在宣称“交换就是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就是人们所说的做生意,而生意自然是在个人利益驱动下才会去做的”<sup>8</sup>之后,就开始着手证明“如果人们的行为都以个人利益为动机,那么整个社会将达到和谐状态”。<sup>9</sup>巴斯夏认为他的书是为所有的阶级而写的。同时,他还要证明放任的资本主义对所有的人来说都可能是最好的经济体制:

产业所有者们,不管你们有多少产业,如果我能证明,你们的权利仅限于以你们自己的或先辈的实际服务换取等量服务,这同工人的权利没有两样,那么,你们的权利虽然如今遭到非议,今后却可以具有不可动摇的基础。

资本家和工人们,我觉得自己有能力提出下述规律:“资本从生产总值中的绝对提取额随着资本日益积聚而增加,提取比例则下降;与此同时,劳动从中提取的相对比例增加,其绝对提取额增加得更多。资本缩减时则引起相反的效果。”如果这条规律得到确认,就可证明,劳动者及其雇主之间显然存在着利益的和谐。<sup>10</sup>

## 效用和交换

巴斯夏是以几个“科学规律”为基础来证明资本主义是普遍和谐的,他认为只要通过日常随意的观察,就可以很容易地证实这些规律。巴斯夏认为:“个人利益是人类巨大的动力,对此我们不应怀疑。”<sup>11</sup>人类行为的直接动机是需求。人类的欲望和需求是永远无法满足的,而满足欲望和需求的手段却是有限的:“欲望在飞奔,手段一直一瘸一拐地紧随其后。”<sup>12</sup>满足需求就会产生愉悦:“如果把一切能满足需求的东西都称之为效用,那就有两种效用,一种是上帝无偿赐给我们的,另一种则需用努力去换取。”<sup>13</sup>因此,人类行为的一般原则就是:“不断致力于提高满足与努力的比例,乃是人追求利益的本性使然。”<sup>14</sup>以上只是重述了边沁的效用最大化原则,这个原则是从巴斯夏到目前为止所有保守经济理论的中心内容。

巴斯夏将效用分为两类,这表明他想根据效用来确定物品的价值,同时他还想借助这种分类来避免斯密提出的水—钻石悖论。如果巴斯夏更仔细地阅读边沁的作品,那么他

应该早就可以得出之后新古典经济学的概念——边际效用。然而，他认为大自然会赐给我们一些效用，比如无偿从水中得到的效用；而另一方面，大多数效用，例如钻石的效用，却需要人们付出努力或经历痛苦才能获取。他把后一种效用称为“有偿效用”。产生“有偿效用”的物品需要人们通过努力才能够生产出来。他将这种人类所做的生产性努力称为“服务”。巴斯夏坚持主张劳动只是服务的一种，劳动与地主和资本家所提供的生产性服务在本质上没有区别。这个观点是巴斯夏经济理论的中心思想。

一个孤立的人要由他(她)自己来完成所有的生产性服务，并且这个人的物质生活会非常贫乏，有时甚至连生存也不能得到保证。而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可以通过劳动分工、专业化提高产出，又可以交换富余的产品。所以在一个社会中，人们是为别人提供服务(即付出生产性努力)。实际上，交换就是交换服务。毫无疑问，人们通过交换所获得的效用要多于他只为自己提供服务时所获得的效用。因此，巴斯夏将交换社会中的服务定义为“一种努力，对于甲来说，服务是他付出的努力，对于乙来说，服务则是需要和满足”。<sup>15</sup>

以上关于服务的定义对于我们理解巴斯夏著作中的社会阶级倾向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生产性努力本身就是痛苦的。人们只有通过“痛苦的努力”<sup>16</sup>才能满足需求。这种被解释为“痛苦的”生产性努力就等同于服务。因此，服务也就是人们在生产中所忍受的痛苦。

在巴斯夏的著作中反复出现的主要矛盾就是：他曾经把服务定义为人们在生产中所忍受的痛苦，而后来他又一再把服务称为物质能够满足需求的有用性。

我们在这本书中反复讨论过的一个主题就是：一个思想家自相矛盾的思想最能反映其阶级倾向。因为这种阶级倾向比思想家的逻辑性更能保持前后一致，巴斯夏正是如此。他的主要目的是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辩护。因此，与萨伊和西尼尔一样，他试图证明资本家和地主对生产的贡献与劳动者相似。他认为资本家和地主都提供了服务，因此也都经受了痛苦。但是之后我们会发现，资本家和地主所提高的服务只不过是允许别人使用生产所必需的工具和土地。在巴斯夏有关这些观点的讨论中，我们根本看不出资本家和地主是如何遭受痛苦的。

例如，巴斯夏首先将服务定义为人类为生产所做出的痛苦的努力，接着他又大力赞颂了劳动分工和交换的重要作用。在此之后，他这样写道：

倘若认定，交换既是分工的原因，也是分工的结果，分工使满足随着努力的增长而增长……那么，读者就不难懂得，货币使交换更为方便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它对人类的贡献。<sup>17</sup>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货币提供了重要的服务，所以，货币所有者理所当然应该得到利息。然而，我们要问：拥有货币和收取利息给货币所有者带来了什么痛苦？它们又是如何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通过以上的讨论,巴斯夏得出一个结论:利己的个人发现,专业化、交换服务和商品是使效用达到最大化的最有效的方式。此后,巴斯夏转而讨论交换价值。他认为大自然无偿给予的效用是没有价值的,人们以服务的形式做出的贡献,其价值和买者得到的效用成比例:

萨伊的原理为:价值以使用性为基础。

如果这里说的是人的服务的相对使用性,我不持异议……法语的服务(service)一词已包含了使用性的意思,完全是拉丁语的服务(uti)一词的对译甚至是仿造。<sup>18</sup>

货物与服务相互交换,两者必须有某种共同的东西,某种可使两者相互比较、相互估价的东西,即价值。<sup>19</sup>

价值不是由物质到服务,而是由服务到物质。<sup>20</sup>

巴斯夏把服务的使用性当作效用的来源,进而将其当作产品价值的起因,这样一来,他就将以后的新古典效用理论的规则因果倒置了。在这个问题上,萨伊比巴斯夏更接近之后的新古典学派。但是巴斯夏的理论直接帮助他达到其主要目的——即证明地主和资本家采取与劳动者同样的方式创造价值和财富。巴斯夏认为效用是价值的来源,同时他把产品的价值等同于生产产品所需的服务的价值,但是巴斯夏从未确切地解释过效用是如何决定服务的价值进而决定产品的价值的。直到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激进的劳动价值论开始发挥普遍的影响之后,才产生了解释这个问题的理论。

### 巴斯夏对私有财产、资本、利润和地租的辩护

巴斯夏着手为土地和资本私有制辩护,解释地主和资本家所提供的服务的性质,证明每一个人都会因为严格执行财产法和自由交换而受益,同时证实自由的资本积累给劳动者和资本家带来的益处一样多(如果前者不多于后者的话)。在这些假定的基础上,他确信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是和谐的、对所有人都有利的体制。

巴斯夏首先为私有财产法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进行辩护。他的辩护很简单:私有财产是上帝创造的自然法则,它在人类制定任何法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人类承认私有财产的法律就是符合自然规律和上帝的意志的;而人类侵犯财产权的法律就是不合常理的,与上帝的意志是对抗的。他认为:“财产权不是因为有了法律而存在的,相反,法律是因为有了财产权而存在的。”<sup>21</sup>

对巴斯夏来说,财产权是人类天性的必然结果:

在完整意义上来说,人生来就是一个有产者,因为他生来就有需求,而满足这些需求对于生存来说是必需的;他生来就有器官和能力,只有通过应用这些器官、发挥能力才能

满足需求。能力只是一个人的扩展；而财产只是能力的延展……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相信所有制是神制定的以及人类法律的目标是保证安全的原因之所在。<sup>22</sup>

但是，只是坚持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不够的。即使霍奇斯金同意以上的引文，他也仍然会坚持下述观点：土地和工具是人类生产力的扩展。但是，目前土地和工具几乎全部被那些从来不利用它们进行生产的人所占有，这是不合常理的，也是不公平的。因此，即使霍奇斯金承认财产所有制是合理的，他也会坚持资本主义财产所有制是不合理的，因为不做事的人正是借此来窃取勤劳的人的劳动果实的。

在确认了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之后，巴斯夏做出以下陈述以进一步消除富人的疑虑：

有财产权和闲暇的人们……使你们害怕的混乱来自何方呢？现在乌托邦带毒的香风已威胁着你们的存在了。有人说，并大声叫嚷……你们这样做损害了你们的兄弟。他们说你们……以产权、利息、年金和租金之名向这些赏赐物征了税……

而我说：不……惟一互相补偿的事情就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流淌的汗水、所冒的危险、所使用的才干、所接受的节衣缩食、所付出的辛劳、所享受到的和所提供的服务。你们可能只想到了你们自己，但你们的个人利益本身就被极有远见、极有智慧的上帝用作在人类中不断扩大共同体范围的工具。<sup>23</sup>

在为资本利润辩护时，巴斯夏首先指出工人必须应用以前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然后，他问这些生产资料是如何产生的。对于这个问题，根据劳动价值论，会得出如下答案：像其他产品一样，都是由改造自然的人类劳动生产出来的。然而，由于坚信资本主义财产关系是永恒和神圣的，所以巴斯夏认为这些产品都是资本家所遭受的痛苦的生产物：

资本植根于人的三种特性之中：远见、智慧和节俭。要想形成资本……（资本家）就得牺牲现在，对自己和自己的欲望进行控制……积蓄钱财，就是准备下一代的食、宿、娱乐、教育、独立和尊严。如果不实行最社会化的道德，而且更重要的是将这些道德变成习惯，所有这一切将无法实现。<sup>24</sup>

当时，社会主义者已经认识到：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仅够（有时甚至不够）维持其家庭生活，靠这些微薄的工资，他（或她）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拥有几百万存款的资本家；事实上，大多数资本家的财产都是靠欺骗压榨、出卖背叛、剥削压迫和行贿受贿而得来的；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了一两代的时间之后，大部分资本家的财产都来自于继承的遗产。对于以上这些观点，巴斯夏根本没有考虑过。一个资本家，无论他是善良还是邪恶，聪明还是愚蠢，节俭还是浪费，都可以把一部分资本利润用来积累更多的资本——以便将来得到更多的财富、收入和权利，同时他还可以把一部分利润用以奢侈的消费。

资本家惟一要做的牺牲和忍受的痛苦具有双重性质：首先，他们要用资本赚更多的钱，而不能（比方说）使他们的工厂闲置；其次，如果杀鸡取卵的话，他们就不能持续奢侈的生活——也就是说，因为他们要靠利润、利息和租金才能过奢侈的生活，所以不能把继承的财产全部挥霍掉。巴斯夏认为正是由于这些痛苦和牺牲，使得资本家拥有获取利润、利息和租金的权利是符合伦理道德的。

巴斯夏当时没有探讨资本家巨额家族财产的真实历史来源，这并不意外，因为这一点足以否定他为遗产法的绝对神圣性所做的一切辩护。在强调了财产权的自然性、合理性和神圣性之后，他这样写道：

继承也是如此。任何理论和说教都不可能让父亲不爱子女。热衷于设计空想社会的人可能对此颇感遗憾，但事实就是这样，父亲为子女的满足和自己的满足所付出的努力各占一半，或许前者稍多一些。如果法律竟然违背天性，禁止财产继承，那么，这种法律不但因此而侵犯了财产，而且会产生阻挠财产形成的后果，因为人的至少一半努力会因受到这种法律的打击而失去活力。<sup>25</sup>

因此，如果取消继承法，资本家获取利润的动力就减弱了，他们将不愿再做出牺牲、忍受痛苦，他们的工厂就有可能闲置或被烧毁。因此，资本家的动机是爱而不是个人利益，这一点正是巴斯夏所辩护的而社会主义者所抨击的。这让我们想起了汤普森支持互相合作社会的一个理由——只有在这种社会中，所有儿童（不仅是那些富裕家庭的儿童）和所有因为各种正当理由不能从事生产的人都可以得到竞争资本主义制度所缺乏的保障。

巴斯夏为土地私有制所进行的辩护也同样简单：地主之所以收取地租，并非由于土地自然的、原始的、未经改造的性质，而是由于地主对土地所进行的改良。因此，与工具和机器一样，土地也是资本，只是不能四处搬动：

土地工具是上帝造就的，它生产出使用价值，而这种使用价值是无偿的，地主无权让别人为他付出这种使用价值的报酬。土地工具是地主准备的，他进行过劳动，作了围栏、排干了积水、改良了土壤，并加上了其他必要的工具，这样土地工具才产生出了价值，这种价值代表了真实的人的服务，这就是地主让别人付出酬劳的惟一的一件事。<sup>26</sup>

在这里，巴斯夏所持的观点与斯密和李嘉图不同：即人们并不是因为使用了自然、原始、未开发的土地而交付地租的。但是他却没有提出任何理论来证明这一观点。

此外，巴斯夏还断定，他着眼于事实，而社会主义者却只是凭空想构筑他们的理论的。但是巴斯夏真的看到居住于巴黎和法国其他城市的豪宅中富裕且有权势的地主们，穿上工作服、跋涉到他们的土地上做诸如修建围栏、排干积水、改良土壤等一系列准备工作了吗？如果他真的走到田间，就会发现是农民在做这些工作，而且他们还要向那些不在地主交付地租；抑或是农业工人在为资本主义农场主做这些工作，而由农场主向不在地主交付

地租。

最终,我们发现地主所忍受的痛苦和所做的努力与资本家相似:为了收取地租,地主必须让别人耕种他们的土地而不能让其闲置。

### 巴斯夏关于交换、社会和谐与政府职能的观点

在讨论了私有财产的神圣性以及地主和资本家所忍受的“生产性痛苦”之后,巴斯夏接着说明交换是对交换双方普遍有利的。如果没有自然资源和资本,人们就无法进行劳动。富人必须忍受痛苦——即让这些资源和资本应用于生产。一进行生产,全社会的状况都会比生产前有所改善。因此,通过交换,工人出卖其劳动力,资本家和地主获取利润和地租,每个人都得到了利益,整个社会处于和谐状态。巴斯夏喜欢强调存在于这种制度中的自由。工人们有两种选择:挨饿或者是用劳动力换得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他们自愿进行交换,因此,交换对他们有利,同时对资本家和地主也有利。

巴斯夏认为要使交换对所有人有利,就必须普遍实行竞争。同时他还觉得政府是这种竞争的主要障碍,所以他呼吁政府将其行为限制于“维持所有的自由、所有的财产、所有的个人利益”<sup>27</sup>的范围内,也就是说,政府的职权范围是保护财产权,同时维护人们参与交换的自由和权利。他认为“政府必要的行为方式是动用暴力”,<sup>28</sup>而大自然和上帝都赋予人类一种绝对权力——“相互协商,联合起来,不惜以暴力来维护个人的自由和财产”。<sup>29</sup>

巴斯夏从来没有问过自己——政府为何要支持垄断而限制自由竞争?如果巴斯夏发出过这样的疑问,那么他可能已经发现了答案——这是因为垄断集团比竞争企业的利润更高。由于每个人都受个人利益的驱动,所以对于政府官员来说,接受富人的贿赂和竞选捐款当然比听从巴斯夏的建议更有利。资本家和政府官员不过是进行了一项交易:以贿赂换得保护垄断权利的法规。正如巴斯夏本人的理论所假设的一样,这项交易的交换双方都得到了利益。政府官员获取必需的资金,以保持权力、生活得更“宽裕”;而资本家获取了必需的法律政策,与仅仅实行财产权保护相比,这种政策能使他们赚取更多的利润。交换双方都获利了,只是公众遭受了损失。在其和谐的体制中,巴斯夏根本就忽略了这种交换,这不足为奇,因为在社会主义者以及资本家向政府官员行贿这两者之中,巴斯夏更加关注前者。

巴斯夏深刻体会到了资本主义及其政治经济学的妙处:“政治经济学并非没有自己的诗意。哪里有秩序与和谐,哪里就不乏诗意。”<sup>30</sup>但是同时对工人有时遭受的苦难和剥削他也有所察觉,所以他这样写道:“痛苦在个人生活中有其功能,在社会生活中同样有其功能。”<sup>31</sup>在此,他又一次把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和谐一致作为解救的办法。他以下面的陈述来消除工人的疑虑:



其实,在承认一切资本的增长都会带来总福利必要增长的同时,我敢给这一福利的分配确定以下不可动摇的原则:

“随着资本的增长,资本从总产品中的绝对提取额增加了,而它的相对提取额降低了。相反,劳动从中提取的绝对额和相对额都增加了。”<sup>32</sup>

巴斯夏认为这一原则的“证据”非常简单:“资本越丰富,利息越下降。这是无可争辩和毋庸置疑的一个事实。”<sup>33</sup>

在这里,巴斯夏犯了一个逻辑错误。许多经济学家,从斯密和李嘉图到马克思,以及20世纪的凯恩斯,都认为随着资本积累,利润率有下降的趋势。但是,在利润率下降的同时,资本家手中的资本却越来越多,所以这未必就能表明资本家从总产品中提取的相对份额降低了。如果资本增加的比例大于利润率降低的比例,且其差值达到一定数额时,资本的相对提取额将增加,而劳动者的相对提取额将降低。在此,逻辑错误又一次清楚地表明了一个理论家的阶级偏见。

总之,对于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对抗无处不在……业主与无产者之间,资本与劳动之间,平民与资产者之间”<sup>34</sup>的观点,巴斯夏的回应也很简单,“人的利益既然是彼此和谐的,所以,社会问题的解决完完全全存在于“自由”这两个字之中”。<sup>35</sup>交换自由和财产权保护——这就是最终巴斯夏针对所有社会弊病所开出的药方。当然,如果这种自由指的是禁止拥有生产资料的业主提取利润、地租和利息,那么,他们就有以强制手段禁止工人从事生产的自由。

## 穆勒的功利主义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以下简称《原理》)于1848年首次出版。在此书中,穆勒试图将劳动价值论与功利主义融为一体,这是融合以上两种理论的最后一次伟大的尝试。穆勒自称是边沁和李嘉图的信徒,但是,穆勒的作品几乎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他在表述任何理论时,都试图做到公正、审慎。因此,几乎每一个他所认同的原理都要经过修改和扩展,同时还要被加上许多限制条件,并且往往他所做的修改都十分重大——例如,他对边沁的功利主义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所做的发展——以至使他最终得出的理论与他开始时所主张的理论完全不同。然而,最终穆勒既不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也不是劳动价值论的忠实支持者。由于穆勒给许多原理都加上了大量具有说服力的限制条件,这样就起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即建议读者相信那些与他的思想相冲突的原理才是正确的,有时这些限制条件甚至是在为他所反对的原理做辩护。结果,无论是穆勒的社会哲学思想还是其经济理论都具有折衷的性质,并且往往是前后不一致的。

穆勒和巴斯夏之间的差别十分显著。我们之所以把二者放在同一章进行讨论,是因为他们是功利主义经济学两个不同性质分支的最初代表人物。巴斯夏是后期奥地利学派和当代芝加哥学派的先驱者——他支持极端保守主义,同时坚定不移地护卫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穆勒是新古典经济学马歇尔学派的先驱者(这个学派比前两个学派温和得多)——他提倡自由主义改革和政府适度干预。无论是作为理论家还是作为学者,穆勒都比巴斯夏略胜一筹。穆勒的《原理》知识广博,风格文雅,可以和斯密的《国富论》相提并论。穆勒精炼公正的风格与巴斯夏教条主义、伪善傲慢的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穆勒是一个折衷主义者,他的经济学说存在明显的前后不一致;而巴斯夏的理论则自始至终都坚持以功利主义心理学和道德伦理学为出发点。

在《原理》的绪论中,穆勒就提出一个新颖的观点——“生产财富,显然不是一件随心所欲的事,而是有其必要条件的”。<sup>36</sup>这个观点与之前的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观点以及当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都是相冲突的。穆勒这个观点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在既定物质生产技术的条件下,物质生产规律和生产成果在所有社会中都是一样的。接着他又写道:“与生产规律不同,分配规律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为的制度,因为某一社会中财富分配的方式取决于通行于该社会的法令或习惯。”<sup>37</sup>在这里,他要告诉读者:影响财富分配的财产权和其他制度是人们自己制定的制度,这些制度在过去已经被更改了很多,并且将来还会不断被人们更改。

与巴斯夏不同的是,穆勒并不认为私有制是由大自然或上帝制定的。它只是人类的一项习俗,因此“完全出于人类的一般利益,如果私有制不再有利,它就是不正当的”。<sup>38</sup>穆勒并不认为私有制是神圣的,同时对于功利主义的两个最基本的原则(我们将在下面讨论),他也持反对意见。所以,穆勒不把交换当作政治经济学的中心,并不出人意料:“交换也不是产品分配的基本法则(同道路和马车不是运动的根本法则一样),而只是分配产品的手段的一部分。这些观念的混同,我认为不仅是逻辑上的错误,而且是实际上的错误。”<sup>39</sup>

从巴斯夏到目前为止,所有坚定的功利主义者都认为交换是所有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对此,穆勒持反对意见,这主要是由于他不赞同功利主义的两条基本原则。穆勒总是声称自己是边沁的信徒,他有一本广为人知的著作——《功利主义》,在此书的第二章,穆勒给功利主义下了个定义,但是这个定义和边沁的定义存在明显的冲突。如果我们把边沁的哲学思想及其在经济思想史方面的成果称为功利主义的话,那么穆勒的哲学思想就不能归类为功利主义。这两者具有根本的区别。边沁功利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是:(1)人类所有的动机都可以归纳为追求个人利益或快乐;(2)每个人对其自身的快乐都有其个人的判断,因此,不同人的快乐是无法进行比较的(正如我们上一章所讨论的一样)。边沁曾经说过,如果快乐的数量是相等的,那么孩子的游戏与欣赏诗歌对人同样好。这个例子充分概括了第二个原理。边沁功利主义认为不同性质的快乐是不能进行比较的。

在后面的讨论中我们将会看到,穆勒并不认为人类所有的行为都是受个人利益驱动的。在他看来,只有那些受到竞争资本主义文化影响的人,其经济行为才是出于个人利益。并且,他期望在将来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会拥有“更高尚”、“更崇高”的行为动机。这种对人类动机的比较是完全背离功利主义的,功利主义将人类的所有动机都归结为个人利益,同时认为这种判断仅仅反应了个人的主观偏好。

此外,穆勒还坚持认为有些快乐在道德上优于其他的快乐。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在此笔者完全同意穆勒的看法),那么一定有比功利主义的快乐原则更高级的原则,人们可以按照这个原则对不同的快乐做出道德判断。显而易见,人们做出道德判断的根据是这个更高级的原则,而非功利主义者的快乐原则。穆勒反复强调:“某种类型的快乐比其他类型的更加理想和有价值。”<sup>40</sup>也就是说,不管快乐的数量如何,人们都会认为诗歌比孩子的游戏更有价值、更合乎需要。显然,这与功利主义的结论恰恰相反。以这种观点来看,快乐并不是最终的标准,穆勒毫不怀疑“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Socrates)比做一个傻子好”。<sup>41</sup>这就完全否定了功利主义的理论基础——而自从巴斯夏以来的功利主义经济学家都是以此为基础来构筑经济理论的,同时他们也试图以此为依据来证实交换双方是普遍有利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尽管穆勒自称支持功利主义,尽管功利主义对他的观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他并不是一位始终如一的功利主义者。

### 穆勒的价值理论

在《原理》第一编第一章的开头部分,穆勒陈述了一种劳动理论的观点——即生产只包括改造自然资源的劳动:“生产要素有两种:劳动和适当的自然物品……除了这些为数很少且不重要的情形外,自然所供应的物品仅在由人力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转化以后,才可用于满足人类的需要。”<sup>42</sup>由于穆勒自称是李嘉图的信徒,所以其最初的观点与劳动价值论非常接近:

生产某物品使生产者或者说一系列生产者花费的,是用来生产该物品的劳动……乍一看来,这似乎只是(一个资本家)支出的一部分,因为他不仅要向劳动者支付工资而且还要向他们提供工具、原料,或许还有建筑物。不过,这些工具、原料和建筑物也是由劳动和资本生产出来的;它们的价值……取决于生产费用,而这种生产费用又可以分解为劳动……

所以,商品的价值主要取决于(我们将马上考察是否完全取决于)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数量。<sup>43</sup>

由此看来,自认是李嘉图信徒的穆勒似乎阐述了劳动价值论。但是上述引文的最后

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认为虽然劳动是价值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但其并非唯一的决定因素。正如他给边沁的快乐原则设定的限制条件最终成为对功利主义的批判一样,他对劳动价值论的限定最终也成为对该理论的否定。

穆勒认为只有当所有产业中资本和劳动的比例相同时,劳动价值论才适用;在那种情况下,生产费用与包含在各种商品中的劳动是成比例的。但是对于大多数商品来说,情况并非如此。比如说,由等量劳动生产出来的葡萄酒和毛料,它们的价值并不相等,这是因为要求葡萄酒“比另一种商品在更长的时期内产生利润”,<sup>44</sup>进而,“一切由机器制造的商品,都类似于,至少是近似于,上面所举的葡萄酒的例子”。<sup>45</sup>

当然,李嘉图也意识到了这种商品价值与其所包含的劳动价值不成比例的现象,然而,他觉得这些是次要问题,他认为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同时仍然可以系统地解释这些问题。穆勒不赞同这种观点,他又回到了斯密的加总生产费用论(adding-up cost-of-production theory),大家应该还记得李嘉图曾经提出充分的理由驳斥了这一理论。

然而,穆勒的折衷主义使其理论不断出现前后不一致的现象。有时,他关于利润的观点同李嘉图的一致——即利润只不过是劳动生产出来的、超出供养劳动者所必需的剩余生产物。以下引文清楚地阐明了这种观点:

利润产生的原因,是劳动生产出超过为维持其本身所必需的生产物……这一公理,换一种形式来说就是,资本之所以产生利润,是因为粮食、衣服、材料和工具等物品保有的时间长于其生产所需的时间。因此,如果一个资本家在劳动者的一切生产物归其所有的情况下向那些劳动者供应粮食、材料和工具,则那些劳动者除了再生产其本身的生活必需品和工具之外,还有一部分剩余的时间替这个资本家工作。由此我们知道,利润并不是产生于交换之中,而是产生于劳动的生产力。<sup>46</sup>

但是,在穆勒的简单加总生产费用理论中,市场价值取决于供给和需求。市场价值总是近似于自然价值(与斯密的理论一样),而自然价值又等于三个部分之和:土地的价格、劳动的价格和资本的价格。这种观点与劳动价值论是完全对立的,因为它假定利润是资本的自然价值,而不是剩余的生產物。此外,利润是在交换中支付给资本家服务的價格。因此,加总生产费用论认为利润产生于交换而非生产之中。这与以上引文的内容恰恰相反。

当穆勒转而坚持加总生产费用论时,其关于利润的观点就产生了明显的效果:

工人的工资是对劳动的报酬,同样,资本家的利润,按照西尼尔先生的确切说法,则是对节欲的报酬。利润的获得,是因为资本家不将其资本用于自己的消费,而让生产工人用于生产消费。对于这种克制,资本家要求报酬。<sup>47</sup>

在穆勒的《原理》中,占支配地位的正是这种观点,而非李嘉图的观点。在这里,穆勒

明确表明利润是服务的报酬。同时,他认为存在最低利润率或自然利润率:

资本的总利润……必须符合以下三种目的,即对节欲给予足够的补偿,进行风险赔偿,并偿付实行监督所需劳动和手腕的报酬……所谓可以永久存在的最低利润率是……刚好抵偿资本使用过程中所伴随的节欲、风险和努力的一个等值。<sup>48</sup>

因此,以这种观点来看,利润产生于交换而非生产之中。利润是通过交换抵偿节欲、风险和努力的报酬。

穆勒认为几乎所有商品的自然价值都是由加总生产费用论决定的。与李嘉图和马克思不同,他抛弃了劳动构成商品交换价值的观点。穆勒认为价值只是交换价值或者说相对价值。他根本没有劳动价值的概念,因此,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李嘉图要寻求一个不变的价值尺度(参考第5章),他觉得根本不可能找到这样的尺度。同时他认为这个问题与价值理论毫不相干,所以他对此不予考虑。<sup>49</sup>

穆勒也讨论了一些不符合生产费用决定自然价值这一规律的特例。其中有两个特例非常重要:国际价值和劳动的价格,或者说工资。穆勒关于决定国际价值的理论,可能是他对经济理论所做出的最重要的原创性贡献之一。经过一些修改之后,此理论在目前仍然是国际价值方面的主流正统理论。在此,我们只简略地讨论一下这个理论。在本章的下一部分,我们将讨论穆勒关于工资决定的理论。

李嘉图已经证明(见第5章)如果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生产费用比例不同,那么只要这两个国家各自专门生产自己相对成本较低的商品,双方就都可以获利。这种互惠的利益取决于国际交换比例(也就是国际价值比例),它是介于两个国家现行生产费用比例之间的某个数值。但是李嘉图没有进一步解释如何准确地确定国际价值。

穆勒认为在同一个国家,价值等于生产费用,这是因为竞争使得生产费用趋于相等(利润率也趋于相等),同时使得价值等于生产费用。然而,生产要素不能在国家之间自由流通。所以竞争不能使不同国家的工资和利润率相等;而价值比例也不相等;所以国际价值完全决定于供给和需求——而不是生产费用。

在分析国际供求关系时,穆勒提出一个假设条件——即每个国家都要一直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也就是说,出口的收入必须等于进口的支出。因此,当国际价值等于一定值(在两国现行的生产费用比例之间)时,每个国家都要提供一定量的商品出口,以换得另一个国家一定量的商品。随着国际价值的变化,供给和需求的商品量都会做出相应的变化。如果我们将一个国际收支平衡的国家,在国际价值等于两国生产费用比例之间的每一个值时,其进口和出口商品的数量都画在一个图表上,就可以得出一条曲线,这条曲线被称为“提供曲线”。每一个国家都有这样一条提供曲线,这两条曲线会相交于一点,此点对应的国际价值会使得一个国家需要的进口品的价值都恰好等于另一个国家供给的出口品的价值,反之亦然。所以满足这个条件的国际价值就是均衡价值,在这一点上,“一个国家的

生产物总是按照该国的全部输出品抵偿该国的全部输入品所必需的价值，与其他国家的生产物相交换”。<sup>50</sup>

## 穆勒的工资理论

在第6章中，我们看到西尼尔用工资基金理论证明劳动工资决定于资本家为支付工资预留的资金的数目和分享这笔资金的工人人数。几乎所有的古典经济学家都接受了工资基金理论的某些概念。穆勒在《原理》中也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对劳动的需求仅仅取决于预留给劳动者的基金”。<sup>51</sup>这就意味着工资取决于劳动的供给，也就是分享这笔资金的工人人数。像马尔萨斯和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一样，穆勒也觉得教育是提高劳动工资最有效的方法，因为通过教育可以缩小劳动者的家庭规模。

马尔萨斯认定劳动者缺乏节制性欲的“道德观念”，因此，他们的生活充满痛苦和罪恶，最终他们会被饿死。而穆勒并不认为节制生育是罪恶的行为，他相信通过教育，工人会逐渐采用各种节育方法，这样就会限制家庭规模，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西尼尔用工资基金理论说明工人阶级的联合是没有用的。但是，穆勒得出一个非常不同的结论。他认为通过联合可以积累“罢工经验”而“正是罢工的经验，最能让工人阶级知道工资与劳动的供求是有关联的”。<sup>52</sup>

但是1869年，在为威廉·T·桑顿(William T. Thornton)的书做书评时，穆勒放弃了工资基金理论。在这个书评中，穆勒表明工资并不受资本家预留的工资基金的限制，而实际上，工资的限额是资本家的总利润减去“养活他们自己及其家庭”<sup>53</sup>的花费所得到的差额。因此，工资并不取决于工资基金，而是由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性斗争决定的。穆勒把工资基金理论颠倒了过来：现在，工资基金的数目决定于工资率，而工资率决定于阶级斗争，如果一个资本家“支付更多的工资，多余的支出则来自他自己的收入”。<sup>54</sup>

就这样，穆勒认识到工人联合和罢工不仅是很好的教育手段，而且在将利润再分配为工资的过程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马尔萨斯、萨伊、西尼尔和巴斯夏不同，穆勒非常同情工人：

即使按照目前的生产工艺条件，采用最高的工资率，占社会大多数的劳动阶级得到的报酬仍然是非常少的。在考虑到这一点之后，如果有人仍然不希望劳动者可以获胜、社会开始实现最高工资率的话，那么他的道德标准以及对最理想社会的看法，与桑顿先生或者笔者的观点就是迥然相异的。<sup>55</sup>

穆勒放弃了工资基金理论，这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这种转变促使他形成了一种观点：“工人阶级应该联合成工会，集体与资本家斗争。”然而，这并没有改变他早

期在《原理》中坚持的主张:劳动的价格——工资——并不决定于生产费用。事实上,放弃了工资基金理论更使他坚信——对工资起决定作用的与其说是经济因素,倒不如说是社会和政治因素。

### 利润率下降的趋势

穆勒认为利润率在长期内有下降的趋势,在这一点上,他也自认为是李嘉图的信徒。下面这句话就表示他赞同李嘉图的观点:“当资本积累像通常那样伴之以人口增长时,其作用便是提高粮食的价值和价格,提高地租并降低利润。”<sup>56</sup>然而,与穆勒其他部分的许多理论一样,在此,限制条件仍然比最初的原理更为重要。他对一些违背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情况进行了讨论,总结出一些阻止利润率下降至最低点的抵消因素,其中有两个特别重要——资本输出和周期性的商业危机。

穆勒关于资本输出的论述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与马克思和列宁在欧洲帝国主义成为世界主要力量之后形成的资本输出理论非常相似。穆勒认为资本输出是遏制利润下降趋势的最重要的抵消因素之一:

在资本增长快于邻国、从而利润更接近于最低点的国家,正是这些抵消因素遏制了利润的下降趋势。最后这个抵消因素就是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殖民地或外国,寻求比国内高的利润……这一因素有双重作用。首先,它可以起到火灾、洪水或商业危机的作用,消除一部分增加的资本,从而阻止利润下降。其次,由此而消除的资本并没有被毁灭,而主要是用于创建会大量输出廉价农产品的殖民地……我们能够寄予希望的,正是依靠输出资本来使廉价粮食和棉花的供给赶上我国人口的增长,从而使不断增加的资本能够在不降低利润的情况下在国内得到利用……由此可见,输出资本特别有助于扩大未输出的资本的使用范围,因而可以说……输出的资本愈多,能够留在国内的资本也愈多。<sup>57</sup>

第二个抵消因素“极为简单且极为明显,以致一些政治经济学家……只注意到了这一因素,而忽视了所有其他因素。这就是在过量交易时期和疯狂投机时期以及在随之而来的商业突变中资本往往被大量浪费”。<sup>58</sup>这也就是说,穆勒认为周期性的商业危机浪费了资本,同时遏制了利润下降的趋势。从这里来看,作为19世纪的经济学家,穆勒似乎也与马克思和马尔萨斯一样,反对萨伊定律关于市场资本主义会自行达到充分就业的观点。在穆勒看来,总会周期性地发生“过量交易”和“疯狂投机”,而在这样的时期,“人们开矿,修筑铁路,架设桥梁,并兴办其他许多没有把握产生利润的工程”。更重要的是,“人们超过市场需要建立起许多工厂,安装起许多机器设备,结果却得不到利用”。<sup>59</sup>这样一来,“只要几年不发生危机,所积累的资本就会大幅度增加,以致用它们来投资无法再得到通常的

利润”。<sup>60</sup>当发生这种情况时，就会伴随

许多企业倒闭，或即使不倒闭也不盈利，大量工人被解雇，各个阶层都有很多人挣不到钱……危机过后，他们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了贫困境地。这些都是商业突变带来的结果。商业突变几乎是周期性的，而这种周期性正是我们现在所考察的利润下降趋势造成的后果。<sup>61</sup>

然而，尽管穆勒对经济萧条和商业循环做出了如此透彻的分析，他仍然为萨伊定律辩护。

穆勒在考察马尔萨斯关于“商品的供给总额可能超过需求总额”的学说时，做出以下论断：“在我看来，这一学说在它的概念中就包含着许多矛盾，因此，我感到，要对这一学说作出人们能立即明白的叙述并使它的支持者满意，是很困难的。”<sup>62</sup>

穆勒之所以反对马尔萨斯的学说而支持萨伊定律，主要有两点依据，其中一个定义依据，另一个是理论依据。首先，穆勒坚持把别人所说的“商品生产过剩”或“普遍过剩”改为“货币供给不足”：“在此期间，一切商品确实超过货币需求；换言之，货币供给不足。”<sup>63</sup>但是，无论是马尔萨斯还是其他经济学家，都没有说过商品供给过剩是相对于人们的需求来说的。他们的观点与穆勒完全一致：经常发生的商品供给过剩都是相对于货币需求来说的。穆勒对定义的诡辩根本无法解释其突出的矛盾，进而使他难以清楚地阐明其理论。

其次，穆勒认为，从长期来看市场资本主义会自行度过萧条时期，并最终达到充分就业。这正是他反对马尔萨斯的学说而支持萨伊定律的理论根据。他也承认“市场的这些混乱”是一种社会“罪恶”，但是同时他又坚信这些混乱都是“暂时的”。<sup>64</sup>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20世纪马尔萨斯学说最著名的阐述者，他在回应穆勒和之后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为萨伊定律所做的辩护时说道：“最终，我们都会死去。”与此同时，正如穆勒自己所说的，每一次危机都使无数的人“或多或少地陷入了贫困境地”。

### 穆勒的社会主义思想

穆勒不像萨伊、西尼尔和巴斯夏那样，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穆勒广泛地阅读史书，所以他不像西尼尔和巴斯夏一样凭想象编出一段私有财产和财富的历史——即勤劳节俭、善良正直的人积累了大量的资本，而放荡挥霍的无赖因为浪费而使自己和家人一无所有。关于这一点，穆勒这样写道：

现代欧洲社会制度的开始，并非由于作为公平分配或勤劳所得的结果的财产分配，而是由于作为征服和暴力行为的结果的财产分配。尽管……一直在以勤劳缓和暴力的作



用,这种制度仍然保留着那种滥觞的不少痕迹。有关财产的法规从来都是和用来为私有财产辩护的原则不一致的。<sup>65</sup>

此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几乎所有的生产资料都集中在少数的资本家手中,对于这种现象所导致的结果,穆勒也进行了谴责。他认识到这样会产生一个寄生阶级,这个阶级生活奢侈,但他们的收入却与生产活动没有必然的联系。他坚信,现存的阶级结构“绝非必不可少的或永久的社会关系状态”:

我认为,如果社会中有不劳动的“阶级”,这种社会状态是不公正的,也是有害的,除了那些不能劳动的人或退休人员外,人人都应该承担人类生活中的一份必要劳动。然而,只要依然存在着不劳动阶级这一大社会弊害,劳动者也就构成了一个阶级。<sup>66</sup>

穆勒不仅从道德上反对当时存在极度贫富差距的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同时他还认为这种阶级结构最终将被取消。他在书中写道:“因而可以预言,人类是不会永远分为两个世袭阶级即雇主阶级和雇工阶级的。”<sup>67</sup>穆勒认为,资本主义演变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必须经过一定的社会变革,这种社会变革的方向和速度是他关心的主要问题。同时,他也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毫无疑问要比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优越:

因此,如果要在具有一切可能性的共产主义和具有各种苦难和不公的现今的社会状态之间作出选择;如果私有制必定会带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后果,即劳动产品的分配几乎同劳动成反比——根本不干的人拿得最多,只在名义上干点工作的人居其次,工作越艰苦和越令人厌烦报酬就越低;而最劳累、消耗体力最多的劳动甚至无法肯定能否挣到足以糊口的收入;如果要在这种状态和共产主义之间作出抉择,则共产主义的一切大大小小困难在天秤上都将轻如鸿毛。<sup>68</sup>

然而,尽管穆勒持有一些进步观点,比如: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比当时的资本主义优越,以及“分为两个世袭阶级”的社会是不可能“永远存在的”等等,但是,能否把他称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还不能肯定。在这一点上,穆勒关于不同性质——或者说不同种类的满足和快乐的判断(这与功利主义是对立的),变得非常重要。他认为只有当人们的品德修养普遍提高时,社会主义才有可能实现。而“目前只有人类的杰出人物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切实可行的”。<sup>69</sup>

此时,对于社会上大部分人来说,“发财致富”才是合理的目标:

毫无疑问,在头脑较清醒的人能说服人们关注更美好的事物以前,与其让人的精力无处发挥而生锈,还不如让人们为发财致富而忙碌……如果人是粗野的,则他们需要的刺激也将是粗野的,那就让他们接受这种刺激好了。但与此同时,如果有人并不认为当前人类改良的最初阶段是最后阶段,对普通政客感到欢欣鼓舞的那种经济进步、即人口和资本的单纯增长不那么感兴趣,则这些人也是有道理的。<sup>70</sup>

穆勒鼓励发展欧文和傅立叶提出的小型合作社。他说：“不论这些不同方案可能具有什么样的优缺点，它们确实不能说是不能实行的。”<sup>71</sup>如果长期的实践可以证明这种合作社有利于社会 and 经济发展，那么“毫无疑问……雇主与工人的关系将逐渐为合伙关系所取代。这种合伙关系将采取以下两种形式中的一种：在某种情况下，是劳动者与资本家合伙经营；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而且也许最终将是劳动者之间的合伙经营”。<sup>72</sup>但是这个自发、自愿的过程无疑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穆勒提倡：

同时，我们可以确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尽管无须试行限制人性的最终发展，政治经济学家所主要关心的还将是基于私有制和个人竞争原则的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条件问题；在人类进步目前阶段所具有的主要目标不是取消私有制，而是加以改良，使社会每个成员都能得到好处。<sup>73</sup>

### 穆勒折衷的干预主义思想

尽管穆勒赞同社会主义思想，但是他真正的目标是推行资本主义改良。巴斯夏等人认为现存的私有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穆勒反对这一主张，他相信“当人们认为财产特权妨碍到大众利益时，社会就有权废除或修改这项特权”。<sup>74</sup>根据这种观点，穆勒在《原理》中这样写到：

不能认为保护人身和保护财产是政府的惟一目的。政府的目的同社会联合的目的一样，是极为广泛的。凡扬善避恶的事，都是政府应该做的，既可以直接去做，也可以间接去做。<sup>75</sup>

穆勒主张政府应该在三个主要的领域进行干涉以减轻自由市场经济对社会所产生的不利影响。首先，由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绝大多数人从一出生开始，一生都要做永不断断的苦工，但是却只能得到基本的生活费，并且这种生活费往往也是不稳定的”。<sup>76</sup>其次，与这种极端贫穷状态形成对照的就是“一小部分人生来就可以享受一种优越的物质生活，但是这并不是由于他们具有某种优点或者经过他们的努力而获取的”。<sup>77</sup>第三，有许多职业

须以巨额资本经营才能有利，那么，在大多数国家，能够参加这一职业的阶层被限于很狭窄的范围。因此，这些人能使他们的利润率保持在高于一般的水平上。又如某种行业，由于其本身的性质，被限于非常少数的人，因此，可以靠同业的组织提高其利润……<sup>78</sup>

垄断者可以在消费者能够支付或愿意支付的限度内随意决定价值；但是，他只能通过

限制供给来这样做。<sup>79</sup>

因此,尽管穆勒坚持“一般应实行自由放任原则,除非某种巨大利益要求违背这一原则,否则,违背这一原则必然会带来弊害”,<sup>80</sup>但是他仍然支持政府在这三个领域进行积极的干预。

从穆勒提出的消除贫困的措施,我们可以看出,穆勒完全不赞同“如果得到的快乐量相等,那么针戏就和诗歌一样好”这一句功利主义名言。我们知道,这句名言所包含的原理——同时也是功利主义的核心原理——即每个人总是可以对他(或她)自己的利益做出最好的判断。如果我们还记得前面有关穆勒比较“不满的苏格拉底”和“满足的傻子”的那段引文的话,那么他写出下面的内容,并不会令我们吃惊:

虽然个人可以对自身利益作出最好的判断……在这种情形下,不干预原则的基础便完全崩溃了。具有最大利害关系的人不仅不能对事情作出最好的判断,而且根本不能作出判断。<sup>81</sup>

穆勒认为穷人往往就不能对怎样改善自身利益作出正确的判断。为了改变他们的品质、习惯和判断力,穆勒主张:

对于他们的智力和贫困,需要同时采取双重行动。首先,对于劳动阶级的子女,要进行有效的国民教育。与此同时,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消除整个一代人的极端贫困状态。<sup>82</sup>

为了消除整个一代人的极端贫穷状态,穆勒提出的主要措施就是,首先“由国库补助足够的费用,一举移植极大部分的青年农业人口,使他们在殖民地定居”;其次,是提供“所有今后可以开垦的公有地……把它当作为穷人谋福利的财产”。<sup>83</sup>

有些人认为采取这些措施所花费的大笔资金会使资本积累急剧减少,但穆勒不认同这种观点,他断言“所需的资金……绝非筹自用以维持劳动的资本,而是筹自过剩的资本……(这种资本)如果不投资海外,就会浪费于国内不顾一切后果的投机之中”。<sup>84</sup>

在这里,我们会发现在穆勒的思想中有一个引人关注的前后矛盾:如果这些过剩资本可以或多或少地被整个一代人加以利用的话,那么他又如何才能说明他所坚持的一个观点——即人们之所以储蓄和节欲仅仅是因为现存的利润率?同样,这个前后不一致的观点也表明了穆勒作品的社会阶级倾向。穆勒是一位折衷的人道主义者,虽然他强烈地反对不公正和极端的贫富差距,但是这都不足以使他在思想上完全放弃资本家应该获取利润的观点。

此外,穆勒提倡法律应该保护劳动人民成立工会的权力,应该禁止虐待儿童,禁止雇佣儿童做过于繁重的工作<sup>85</sup>,同时,法律还应该限制工人的劳动时间<sup>86</sup>。由于和资本家交涉时,单个工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必须通过法律来限制一个工作日的劳动时间。

只要资本家可以随便地解雇任何一个工人,并且又能及时地找到替补人员的话,那么尽管缩减工作日的劳动时间对整个社会是有利的,但是单个工人或者是一小部分工人都没有能力达到这个目的。在讨论关于强制所有工厂实行最低安全保障标准的法律时,也可以得到相似的结论。最后,穆勒提出政府应该为那些没有工作能力或不愿工作的人提供最低生活费。在这一点上,他赞同西尼尔的思想,而1834年颁布的济贫法也正是以此为理论基础的。穆勒认为“如果人人都可以得到帮助,但人人都尽力摆脱帮助”,那么这种给予穷人的帮助就是有益的,“这一原则应用于官方救济计划,就是1834年颁布的济贫法所依据的原则”。<sup>87</sup>

穆勒试图通过一项改革——即征收遗产税,来防止巨大财富聚积在少数人的手中:

遗赠权是基于普遍便利的理由应加以限制的一种财产权……应限制任何人通过馈赠、遗赠或继承获得的财产数量,以此防止大宗财产不劳而获地聚积在少数人手里。<sup>88</sup>

穆勒提倡政府进行干预的最后一个重要领域就是:自然垄断和一些经营者串通起来形成的有损社会利益的垄断控制。他这样写道:“在许多情况下,是无法阻止实际的垄断的,是无法阻止垄断者向社会课税的。”<sup>89</sup>在这种情况下,

仅有经营者的利益尚不足以确保社会得到适当的服务,还需要有另外的保障;政府应从一般利益着想使这些领域中的经营活动遵守合理的规定,或保留控制这类经营活动的权力,以使公众能享有垄断利润带来的好处。<sup>90</sup>

## 对穆勒改良主义思想的批判

如果功利主义——尤其是效用价值论和效用交换论——能够保持前后一致的话,那么就可以为市场资本主义现状提供有力的理性辩护,这正是本书的一个中心论题。穆勒虽然自称是一位功利主义者,但同时他又是一位改革者。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他的观点与功利主义的两条基本原则相矛盾,这两条原则分别是:第一,人类所有的动机都可以简化为个人利益;第二,每个人的愿望和快乐就等同于他(或她)自己的福利;也就是说,只有自己才能对自身福利做出最好的判断。

如果穆勒是一位坚定不移的功利主义者,那么我们很容易就能驳倒他的改良主义观点。功利主义认为不同个体的愿望是无法进行比较的(我们在上一章已经讨论过,这是功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其只适用于全体一致的情况),这种极端利己主义使得即使是其本身的社会道德规范也与其个人的道德规范相冲突。这种说法的证据非常简单:如果只是因为某个个体想得到某物,或者该物可以给这个人带来快乐,我们就说这个物品是

有利的;那么只要能够满足某个个体愿望的最大社会总效用就是有利的。根据这一点,如果所有的人都渴望得到最大社会效益的话,那就满足了功利主义的一致性要求,这样也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但是,在这个社会中,只要存在一个愤世嫉俗者,矛盾就会随之出现。愤世嫉俗者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对他来说,最优的情况就是人类痛苦最大化——或者说社会负效用最大化,即社会效益最小化。由于功利主义认为孩子的游戏和诗歌同样有益,所以我们不能说慈善家(如果确实存在这种毫不利己的人的话)的愿望比愤世嫉俗者的愿望更高尚。那么,这又会将功利主义社会道德规范引向哪里?功利主义要求一致性或者说它根本就不存在。

首先,我们假定任何基本理论,首要原理或哲学体系都不能作为驳斥其自身的理论依据。根据这一点,我们姑且承认功利主义的个人道德规范与社会道德规范都是正确的。但是即使如此,功利主义仍然没有使我们能够寄希望于政府会实行改革——以实现效用最大化。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政府只能实行那些所有人都一致支持的改革。如果有少数人反对改革,那么政府就必须把一部分人增加的快乐与其他人减少的快乐做个比较。在讨论20世纪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一直到目前为止,功利主义者都尚未找到一个避免一致性要求的方法。如果利益仅仅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意识形态,那么就必须达到一致同意,因为这种主观意识形态无法直接进行比较。

功利主义不能作为提倡改革的理论依据的第二个原因,我们在前面讨论巴斯夏和边沁的时候已经提到过:政府是由人民组成的。如果人们的行为只是出于个人利益,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政治家的个人利益又是什么呢?答案非常明显——金钱是、并且一直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的生命血液。获得政治权力需要金钱,只有金钱可以使政治权力永存。私有财产法和契约法以及无数有关垄断、补贴和免税等等的法律特权都加剧了现存的极度贫富差距,并且会使其长久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家和那些靠资本主义立法获取了巨额财富和收入的人进行着某种交易。我们很难想象出还有哪一种交换能比这种交易给双方带来更多的利益。

虽然后一个批判对反对功利改良主义具有决定作用,但是它对于其他不接受功利主义的改革者来说,也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在这一点上,穆勒反对功利主义仅仅意味着他之所以提倡改革有可能是出于他的人性观点。如果他是一位坚定不移的功利主义者,那么他就应该相信每个政治家都只关心其本身的利益。根据功利主义的人性观点,只有当改革对其本身更有利时,政治家才会支持损害富人利益而提高穷人福利的改革。但是,穆勒并不同意功利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所以在他心目中,大概期望有一位真正关心大众福利的、慈善的政治家能够掌权。

因此,穆勒的想法并不是不可能的问题,而是不可能实现的问题(在他反对边沁功利主义的情况下)。穆勒的问题在于他本身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分子。在这种体制中,金钱就是权力,而权力又可以产生更多的金钱。用穆勒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

中，“人的精力”是“用于发财致富的”，“如果人是粗野的，则他们需要的刺激也将是粗野的”。<sup>91</sup>

穆勒并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认识到只要资本家和工人阶级彼此对立，政治就是阶级斗争的舞台，而一般情况下，资本家都是这个舞台的统治者。然而，他还是希望富人“发财致富”的欲望最终会减弱，他们会满足于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改革的实现就真的有了希望了。就这一点，穆勒写道：“如果富人们满足于他们的富有，并且不再要求更多的政治特权，那么他们和穷人的利益就大体相同了。”<sup>92</sup>

然而，令穷人感到不幸的是，在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出版后的 143 年里，富人从不“满足于他们的富有”，也从来没有放弃他们对“政治特权”的要求。所以我们今天重读一遍 196 页穆勒的引文，人们就会怀疑他是否会坚持他原先的观点。

#### 注 释

1. 引自 Alexander Gray, *The Socialist Tradition* (London: Longmans, 1963), p. 105.
2. 引自 Sydney H. Coontz, *Productive Labor and Effective Demand*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6), p. 54.
3. Frédéric Bastiat, *Economic Harmonies* (Princeton, NJ: D. Van Nostrand, 1964), p. xxv.
4. 同上, 第 569 页。
5. 同上, 第 487 页。
6. 同上, 第 66 页。
7. 同上, 第 59 页。
8. 同上, 第 81 页。
9. 同上, 第 xxi 页。
10. 同上, 第 xxxiii~xxxiv 页。
11. 同上, 第 27 页。
12. 同上, 第 46 页。
13. 同上, 第 27 页。
14. 同上。
15. 同上, 第 33 页。
16. 同上, 第 27 页。
17. Bastiat, *Economic Harmonies*, p. 75.
18. 同上, 第 134 页。
19. 同上, 第 148 页。
20. 同上, 第 150 页。
21. Frédéric Bastiat, *Selected Essays on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J: D. Van Nostrand, 1964), p. 97.
22. 同上, 第 99 页。

23. Bastiat, *Economic Harmonies*, p. 200.
24. 同上,第 196 页。
25. 同上,第 29 页。
26. 同上,第 253 页。
27. 同上,第 459 页。
28. 同上,第 455 页。
29. 同上,第 457 页。
30. 同上,第 26 页。
31. 同上,第 36 页。
32. 同上,第 192 页。
33. 同上,第 193 页。
34. 同上,第 xxiv 页。
35. 同上,第 xxxvii 页。
36. John Stuart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5), p. 21.
37. 同上,第 21 页。
38. 同上,第 233 页。
39. 同上,第 435~436 页。
40. John Stuart Mill, "Utilitarianism," in *Utilitarianism, Libert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New York: Dutton, 1951), p. 10.
41. 同上,第 12 页。
42. Mill, *Principles*, p. 22.
43. 同上,第 457~458 页。
44. 同上,第 463 页。
45. 同上。
46. 同上,第 416~417 页。
47. 同上,第 404 页。
48. 同上,第 406~407 页。
49. 同上,第 564~568 页。
50. 同上,第 592 页。
51. 同上,第 80 页。
52. 同上,第 936 页。
53. John Stuart Mill, *Dissertations and Discussions*, 5 vols. (New York: Henry Holt, 1874), vol. 5, p. 49.
54. 同上,第五卷,第 50 页。
55. 同上,第五卷,第 75 页。
56. Mill, *Principles*, p. 842.

57. 同上,第 738~739 页。
58. 同上,第 733~734 页。
59. 同上,第 734 页。
60. 同上。
61. 同上。
62. 同上,第 556~557 页。
63. 同上,第 561 页。
64. 同上。
65. 同上,第 208 页。
66. 同上,第 752~753 页。
67. 同上,第 761 页。
68. 同上,第 208 页。
69. John Stuart Mill, "Socialism," in *Socialism and Utilitarianism* (Chicago: Belfords, Clarke and Co., 1879), pp. 123~24.
70. Mill, *Principles*, p. 749.
71. 同上,第 204 页。
72. 同上,第 763~764 页。
73. 同上,第 217 页。
74. Mill, *Principles*, p. 136.
75. Mill, *Principles*, p. 804~805.
76. Mill, *Dissertations and Discussions*, 第三卷,第 59 页。
77. 同上。
78. Mill, *Principles*, p. 410.
79. 同上,第 449 页。
80. 同上,第 950 页。
81. 同上,第 957 页。
82. 同上,第 380 页。
83. 同上,第 381~382 页。
84. 同上,第 382 页。
85. 同上,第 958 页。
86. 同上,第 963~964 页。
87. 同上,第 968 页。
88. 同上,第 809 页。
89. 同上,第 962 页。
90. 同上。
91. 同上,第 749 页。
92. Mill, *Dissertations and Discussions*, 第二卷,第 114 页。



## 第9章 卡尔·马克思

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建树、且能与卡尔·马克思媲美的思想家，历史上寥寥无几。他的思想在理论、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影响已经充分为人所知，在此无需赘述。像古希腊迄今的大多数理论天才一样，他建构了一个严密的、有机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包括的复杂精细概念有：本体论与方法论、人性、社会本质、个人同社会整体关系以及社会历史过程的本质。

由于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因此，只有把其理论体系的任一组成部分置于整个理论体系的适当背景下，才能准确无误地理解。笔者认同此观点，但在本书有限的篇幅内做不到这一点。有鉴于此，对马克思著作许多方面的内容我们将完全忽略；而对于其他方面内容，除非涉及到我们对资本主义经济起源、本质及运行模式的讨论并有必要时，才会很简单地触及。本章将集中讨论资本主义经济的起源、本质及其运行模式。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充分体现在他的三卷本著作——《资本论》中，其中只有第一卷是他生前出版的（1867年）。许多草稿和笔记——本来计划重写并以《资本论》第二和第三卷出版——大部分写于19世纪60年代中期（第一卷完稿前），并且当马克思1883年逝世时尚未完成。后经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ederich Engels）编辑、整理而出版（1885年第二卷出版，1894年第三卷出版）。马克思写了许多其他包含对资本主义分析的专著、小册子和论文；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他1857年和1858年所写的七本为一个系列的笔记，这七本笔记是本来会在《资本论》和其他主题下予以深入论述的众多对资本主义分析的草稿，而马克思本来计划把《资本论》和这些主题包括在一部更为宏大的著作内，其中《资本论》只是这部宏大著作的第一部分。这些笔记在德国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konomie）为标题出版，而其英文译本以“Grundrisse”“导言”为标题出版，作为马克思经济思想的主要来源，它是《资本论》的有益补充。

## 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

马克思同我们在前面章节所讨论的思想家关系复杂。他深受斯密和李嘉图价值理论和利润理论的影响——在某些方面，他的理论可以看作对他们思想的扩展、完善和具体化。但是，涉及到他们理论的其他方面，马克思自认为是一个爱挑剔的批评家。他经常赞许性地对汤普森和霍奇斯金的著作加以引用；然而，即便如此，马克思对他们的许多观点也作了猛烈批评。他把穆勒视作思想对手而认真地对待，而对马尔萨斯、边沁、西尼尔、萨伊和巴斯夏则给予了几乎彻底的批判和藐视。

在马克思看来，这些思想家的最大缺陷就是他们大多缺乏历史视角（尽管这种批评对斯密最不适用）。马克思坚持认为，如果他们能更深入地研究历史，就会发现，生产是一种社会性活动，它可能呈现多种形式或模式，这视盛行的社会组织形式及其相应的生产技术而定。欧洲社会已经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或生产方式——其中包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现在又以一种具体的历史形式——资本主义——来组织。

如果这些经济学家对这些不同的生产方式作了细致研究，他们就会发现：“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sup>1</sup>但是，正如其中某些规定对生产不可或缺一样，理解任何一种生产方式——如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是必须离析出该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和特有特征。

那些非一般的和共同的特征，必须从生产力所有共同特征中抽象出来，以便不致因见到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出现了统一），就忘记了本质的差别。而忘记这种差别，正是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sup>2</sup>

正是未能区分所有生产方式的共有特征和资本主义的特有特征，导致了无数的混淆和歪曲。在马克思看来，有两种混淆尤其重要：一是认为资本在所有生产过程中是一种普遍要素；二是认为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可以简化为一系列交换。几乎所有上述经济学家在第一点上都混淆了（如上所述，惟一例外的是霍奇斯金）。自李嘉图之后著述的经济学家（尤其是西尼尔和巴斯夏）在第二点上也混淆了。

对资本的错误认识源于资本既有具有一切生产共有的一个普遍特征，又有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一种特质。马克思承认：“没有生产工具，生产不可能进行”，也不可能

有生产而没有过去积累下来的劳动……资本，首要的，也是一种生产工具，也是客体化的过去劳动。可见资本是一种一般的、永恒的自然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我恰好抛弃了正是使“生产工具”和“积累下来的劳动”成为资本的那一特殊品质。<sup>3</sup>

对特定社会阶级来说,其特殊性是资本创造利润的能力。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工具”和“积累下来的劳动”才成为收入的源泉和占主导的社会阶级的权力源泉。同那些被他批判的经济学家形成鲜明的对照,马克思试图解释资本的这一属性怎样形成,又怎样保持永恒。

马克思之前的多数经济学家相信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当然,穆勒是一个例外)。而且,他们一般都把财产等同于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现存形式。马克思对此予以反对;他也反对穆勒把生产和分配完全隔离的做法。马克思坚持认为,存在无数财产形式,每一种具体生产方式都有其特定财产形式,并且这些财产形式决定分配。因此,生产和分配并非像穆勒所认为的那样是彼此完全独立的:

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在这个意义上,说财产(占有)是生产的一个条件,那是同义重复。但是,可笑的是从这里一步就跳到财产的一定形式,如私有财产……历史却证明,公有财产(如印度人、斯拉夫人、古克尔特人等那里的公有财产)是原始形式,这种形式还以公有财产形式长期起着显著的作用……

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的关系、统治形式等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是感到,在现代警察制度下,比在如强权下能更好地进行生产。他们只是忘记了,强权也是一种法,而且强权者的权利也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于他们的“法治国家”中。<sup>4</sup>

当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采用马克思的术语)认为现存的资本主义财产权力(产权)是普遍的、永恒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并认为资本是一切生产的共有要素时,在马克思眼中具有资本主义鲜明特征的制度就被置于他们分析的范围之外。那么,在他们试图理解资本主义时,还剩下什么要分析?答案很简单,用巴斯夏的话来说:“政治经济学就是交换理论。”所有经济现象都被归纳为商品买卖行为。关注的焦点完全集中于交换或货币和商品流通领域。

交换开始时,每个人拿他所有的商品去交换。商品只被视为交换价值的体现。当一个工人的劳动只被视作具有交换价值和任何其他商品没有差别的一种商品时,那么,个人之间所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差别都消失了。个人之间的一种抽象平等(并且十分接近完全平等)浮现出来:

实际上,只要把商品和劳动还看作是交换价值,只要把不同的商品互相之间发生的关系看作这些交换价值彼此之间的交换……那就是把个人……只是单纯地看作交换者。只要考察的是形式规定……那么,在这些个人之间就绝对没有任何差别……每一个主体都是交换者,也就是说,每一个主体和另一个主体发生的社会关系就是后者与前者发生的社会关系。因此,作为交换的主体,他们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在他们之间看不出任何差别,更看不出对立,甚至连丝毫的差异都没有。<sup>5</sup>

对卖者来说,一个用3先令购买商品的工人和一个用3先令购买商品的国王,两者职能相同,地位平等——都表现为3先令的形式。他们之间的一切差别都消失了。卖者作为卖者只表现为一个3先令的商品的所有者,所以双方完全平等,只是这3先令一次是以银的形式存在,另一次是以砂糖的形式存在。<sup>6</sup>

因此,表面看来,交换制度似乎是一种平等的制度。

假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完全忽视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那些特征,交换经济似乎又是一种人类自由占主导的经济。在交换关系中

除了平等的规定外,还需要加上自由的规定。尽管个人A需要个人B的商品,但他并不是用暴力去占有这个商品,反过来也一样,他们互相承认对方是所有者……谁都不用暴力去占有他人财产。每个人都是自愿地出让财产。<sup>7</sup>

最后,交换经济似乎还是这样一种制度,在该制度下,那些由纯粹利己心驱动的行为好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形成一个社会和谐的整体。交换的动因显然在于它预先假设了个人不生产或者不拥有那些他们需要或渴望的东西。马克思写道“只有他们在需要上和生产上的差别,才导致交换”<sup>8</sup>。因此,和谐的出现不可避免:

只有在个人B用商品b为个人A的需要服务时,并且只是由于这一原因,个人A才用商品a为个人B的需要服务。反过来也一样。每个人为另一个人服务,目的是为自己服务;每个人都把另一个人当作自己的手段互相利用……但是,这种相互关联本身,对交换主体中的任何一方来说,都是他们毫不关心的……只有就这种相互关联把他的利益当作排斥他人的利益、不顾他人的利益加以满足这一点来说,才和他有利害关系。换句话说,表现为全部行为的动因的共同利益,虽然被双方承认为事实,但是这种共同利益本身不是动因。<sup>9</sup>

因此,只有接受“这样一种断言即只存在惟一的经济关系——交换”<sup>10</sup>时,资本主义经济和谐才可能出现。马克思的结论很明显:

既然迄今为止对货币关系的阐述是在其纯粹形式上进行的,并没有同发展程度较高的生产关系联系起来,那么货币关系的特点就在于:在从简单意义上理解的货币关系中,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内在的对立在表面上不见了,因此,资产阶级民主派比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更多地求助于这种简单的货币关系,来为现存的经济关系辩护。<sup>11</sup>

### 商品、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马克思乐于解释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社会关系的本质。根据经济理论,这意味着解

释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关系。当只考察交换或流通领域时,工资和利润似乎都是简单的商品交换的结果。因此,马克思以对商品和流通领域的分析展开了《资本论》第一卷(副标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批判分析》)。

资本主义是一种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sup>12</sup>的制度。商品具有两重基本属性:首先具有“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sup>13</sup>人们从中获得效用的商品特有的物理属性,使该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在马克思看来,使商品有用的独特的物理属性“同人取得它的使用属性所耗费的劳动量的多少”<sup>14</sup>没有特定的或系统的联系。其次,商品“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sup>15</sup>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一种商品同另一种商品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

交换价值常常用商品的货币价格来表示;也就是说,交换价值用一个人在交换所提及的那1单位商品时能得到多少商品货币来表示。因此,如果1双鞋的价格是2美元,那就意味着1双鞋将会交换2单位的货币商品(在此情况下是2美元),或者可用来交换2美元的一定量的任何其他商品。因此,货币就成为一种被普遍当作价值标准的特殊商品,交换价值通常也用它来表示,而且它还履行着一般等价物的职能。作为一般等价物,它充当了交换的媒介,即在几乎所有买卖中被使用。正是由于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广泛使用,使得货币交换经济同物物交换的经济相区别。当大量财富以纯粹交换价值形式而非使用价值形式储藏时,货币还是一种财富贮存手段。稍后我们将会看到,在某些条件下,货币可能成为资本的一部分。

交换价值是使人们可以直接从数量上比较所有商品的一种方法。交换价值以所有商品中存在某种共同点为先决条件,借助于这种共同点才能进行比较。除了交换价值,商品还具有其他两个共同特征:都具有使用价值并且都只是人类劳动的产物。

正如本书先前所述,这两个共同特征中的每一个特征都曾经被不同的经济理论传统看作交换价值的决定因素。然而,马克思驳斥了把使用价值当作价格的可能决定因素的观点。他写道:“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但是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有量的差别。”<sup>16</sup>而且使用价值反映的主要是人与物的关系。但是,交换价值只存在于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有鉴于此,马克思相信交换价值的基础当中必然包含着那些社会条件所特有的社会关系的某一方面。马克思因此断定,赋予商品使用价值或效用的无限种物理属性,既不可能从数量上直接进行比较,也不会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社会关系。使用价值不可能成为交换价值的基础。

因此,一切商品共有的、可从数量上直接进行比较的、并且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惟一因素就是生产它们所需的劳动时间。劳动似乎是一切社会生产的普遍要素,而且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所特有的。但是,创造商品交换价值的劳动具有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特有的本质属性,这一点下面将要讨论到。当马克思抽象地看待商品,忽视所有的差别和特性,它们被还原为生产中耗费的劳动的物质体现。如此考虑的商品,

被马克思定义为价值：“它凝结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人类劳动的……结晶，所共有的就是——价值。”<sup>17</sup>

马克思以一种常常被误解的方式使用“价值”一词，因为“价值”这个词经常被马克思之前的经济学家使用；而马克思之后的经济学家则几乎用它专指交换价值或价格。在阅读《资本论》时，务必牢记马克思的定义，免得引起混淆。价值虽具有量的规定性，但其本质是社会关系。只有当生产性劳动并不具有直接的社会性时，价值才历史地存在。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社会，即使你消费了我生产的商品，导致我们因此相互依赖，但是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存在这样的社会关系。对你而言，我的社会劳动以包含该劳动的一定商品形式存在，即只作为价值存在。因此，价值的本质属性是这种特定的社会关系。但是价值又具有数量维度。这种数量维度很简单：“一种商品的价值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比例，就是生产前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同生产后者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sup>18</sup>但是，被量化的劳动并不是直接可见的、或经验可观察到的、在人们观察生产过程时可轻易测量的那种劳动，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抽象劳动”。下一部分我们将讨论抽象劳动的本质。

这种对价值概念的混淆容易加剧，因为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并不关注解释实际价格形成的任何理论。相反，他只是试图解释资本本质和利润起源。为此，他认为接受李嘉图的观点较为简便，即凝结在产品中的劳动是交换价值的主要决定因素。对李嘉图来说，诸如机器与劳动比率的差异或不同产业生产过程长短的差异都是影响价格的次要因素。在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中，这些次要影响相对来说无足轻重，并且完全可以借助补充原则予以解释。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采纳了这种观点并抽象掉了这些次要影响因素。为解释资本与利润的本质和起源，他以假定价值（物化劳动）是交换价值的惟一决定因素作为一种抽象的近似等价物。在抽象的层面，亦如在关于斯密和李嘉图章节里所见到的，交换价值与价值（马克思所定义的价值）总存在一定的比例。因此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的“价值”和“交换价值”是交互使用的。尽管在理论抽象层面这是合适的，但是对读者而言，这也加剧了对马克思著作的误读。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价值、交换价值和价格三者之间的差别。他写道：“一看就知道，简单价值形式是不充分的，是一种胚胎形式，它只有通过一系列的形态变化，才成熟为价格形式。”<sup>19</sup>

直到《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才扩展他的劳动价值论来解释实际价格，也就是说，考虑如上所述的影响价格的次要因素。不幸的是，《资本论》第三卷不是由马克思亲自完成的，他对价值和实际价格二者关系的讨论，尽管从概念上讲足够充分，但是通常被人们误解。

在指出了理解马克思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个术语混乱的原因之后，现在，我们转向商品及其交换价值的讨论。

## 有用劳动和抽象劳动

当马克思断定劳动时间决定交换价值时,他将这种劳动时间定义为由简单的同质劳动构成,这就抽象掉了不同种类劳动过程的具体差异:“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人类劳动的消耗。”<sup>20</sup>这导致马克思区别两种不同的考察“劳动”和“劳动过程”的方式。当人们考察特定劳动过程的具体特征时,人们发现这些质的差别对形成不同商品的特定的使用价值是必需的。在这种意义上的劳动就被定义为“有用劳动”;同样,它生产了不同商品的特定使用价值。因此,有用劳动是形成商品使用价值的原因:

上衣是满足一种特殊需要的劳动。要生产上衣,就需要进行特定种类的生产活动。这种生产活动是由它的目的、操作方式、对象、手段和结果决定的。由自己产品的使用价值或者由自己产品是使用价值来表达自己的有用性劳动,我们简称为有用劳动。<sup>21</sup>

但是,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是抽象劳动,抽象掉了不同类型的有用劳动的质的差异:

如果把生产劳动的特定性质撇开,从而把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生产活动就只剩下一点:它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商品价值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sup>22</sup>

当马克思断定抽象劳动决定交换价值时,他有两个重要的条件。首先,只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是重要的,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sup>23</sup>。他还意识到某些类型的生产要求工人耗费大量的时间以便获得特殊技能;而其他劳动过程,简单的非熟练工人就可完成。在这种情况下,价值的计算就要求把熟练劳动还原成多项简单非熟练劳动。

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经验证明,这种简化是经常进行的……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确定的。<sup>24</sup>

当我们谈论马克思劳动力价格(或工资)理论时,我们将会谈及他如何看待由于熟练劳动还原成简单劳动所引起的工资差异决定问题。

因此,在建立了商品交换价值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之间的联系后,马克思表明人类劳动产品成为商品所必需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的条件,这与他早期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批判是一致的。

## 商品生产的社会性质

只有当人类劳动产品的生产只是用于在市场上交换货币,而不是供生产者或与生产直接相关的任何人直接使用或享用时,劳动产品才成为商品。马克思写道:“商品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的最一般的和最不发达的形式。”<sup>25</sup>只有当工人不再为自己的生存生产产品、而必须从资本家手中购买时,商品生产才具有社会生产的特征。这是商品生产社会资本家统治工人的根源。

产品成为商品,需要有一定的历史条件。要成为商品,产品就不应作为生产者自己直接的生存资料来生产……即使绝大多数产品直接用来满足生产者自己的需要,没有变成商品,从而社会生产过程按其广度和深度来说还还没有为交换价值所控制,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仍然能够产生。<sup>26</sup>

要想一个社会在广度和深度上为交换价值所控制,即要使一个社会基本上成为一个商品生产社会,必须具备三个历史前提条件:首先,生产的专业化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以至于每个个体生产者持续地生产相同的产品(或其中的一部分)。其次,这种专业化必然要求“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离”<sup>27</sup>是完全的。因为没有无数使用价值的消费,生活是不可能的,生产者与其产品之间仅有交换价值上的联系,并且只能从其他生产者的产品中获得必要的使用价值。第三,商品生产社会要求具备一个普遍而发达的市场,这要求货币的广泛使用作为普遍的价值等价物来促成每一笔交换。

在商品生产社会,任何一个既定的生产者都是在与所有其他生产者相孤立的情形下从事生产的。当然,生产者与其他生产者之间存在着社会性的和经济性的联系或关系:许多生产者如果没有某一特定生产者生产某种他们需要消费的商品,他们的日常消费方式就难以维持;而除非无数的其他生产者不断生产最初的那个生产者所需要的各种商品,否则该生产者就不能继续这种消费方式。因此,在生产者之间肯定存在必不可少的社会关系。

但是,每个生产者都为市场销售而生产。生产者用销售收益购买其需要的商品。生产者的福利似乎惟一取决于生产者用自己的商品能够换得的其他商品数量。马克思写道:“交换数量不以生产者的意志、设想和行动而转移并不断变动。在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活动采取了物的运动形式。这种物的运动控制了生产者,而不是生产者控制了物的运动。”<sup>28</sup>因此,无论是怎样的社会关系,对每个生产者个人而言,只不过是个人与非人格化的和永恒的社会制度——市场——之间的一种关系。市场似乎只包含一系列物与物——商品——的关系。马克思得出如下结论:“因此,联系个体劳动者和其他劳动者之



间的关系似乎不是个体生产者之间的直接社会关系,而是……商品之间的关系。”<sup>29</sup>

因此,在商品生产社会,有用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如果不借助于市场交换的顺利进行,就不可能被消费或使用。但是,仍然是这些有用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维持了人类生命并创造了得自消费的一切效用。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中的天真和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构建的所有辩护性的理论变种,都源自对有用劳动的浅见。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是肤浅地考察了交换行为和流通领域,就相信这样的效用是交换自身生发的。因此,对他们来说,交换似乎是普遍仁慈的,它使个人的利益和社会上其他人的利益和谐一致。简单的事实就是,有用劳动创造商品的效用,交换只是商品生产社会顺利运行的必要前提。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能想到商品生产社会,于是,市场的出现被视为一种和谐的、互惠的制度,这恰恰掩盖了如下的事实:如果在该社会市场不能运行,那么就无人能享受到有用劳动创造的效用。但是这个事实本身并没有暗示资本主义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社会关系的本质或者暗示这些关系是和谐的还是相互冲突的。

### 简单商品流通和资本主义流通

马克思认为,商品生产所必需的历史条件与资本主义产生所必需的历史条件不同。他感兴趣的是如何理解作为利润来源的资本的具体的历史和社会本质。他坚持认为:“仅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绝不能创造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sup>30</sup>

在非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简单商品生产中,商品的生产 and 售卖是为获得其他可使用的商品。在这种制度下,马克思写道:

商品的交换过程……伴随着如下的形式变换:

商品—货币—商品

C—M—C

整个过程的结果是……一种商品与另一种商品相交换,是物化社会劳动的流通。变换的结果一经达到,过程本身也就结束。<sup>31</sup>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容易观察到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部分——资本家——交换过程则迥然不同。

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是 C—M—C,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再转化为商品,为买而卖。但除这一形式外,我们还看到具有不同特点的另一形式 M—C—M,货币转化为商品,商品再转化为货币,为卖而买。在运动中通过后一种流通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成为资本,而且按它的使命来说,已经是资本。<sup>32</sup>

马克思继续写道：“很清楚，如果  $M-C-M$  这个流通过程只是画个圈子，是同样大的货币价值相交换，比如说，100 镑和 100 镑相交换，那么这个流通过程就是荒唐的，毫无内容的了。货币贮藏者的办法倒是无比简单和牢靠，他把 100 镑贮藏起来，不让它去冒流通中的风险。”<sup>33</sup> 显而易见，该流通惟一可能的意图就是“为了贵卖而买”。<sup>34</sup> 因此，这一流通过程描述为  $M-C-M'$  更贴切，在此， $M'$  大于  $M$ 。不像  $C-M-C$  流通， $M-C-M'$  流通过程终止时实现了比初始时更大的价值。

### 剩余价值、交换和流通领域

$M'$  和  $M$  之差就是剩余价值。在马克思看来，不断追求更大数量的剩余价值是推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动力：

作为这一运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者，货币所有者变成了资本家。他这个人，或不如说他的钱袋，是货币的出发点和复归点……价值增殖——是他的主观目的；只有在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成为他的活动的惟一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因此，绝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这种绝对的致富欲，这种价值追逐狂，是资本家和货币贮藏者所共有的，不过货币贮藏者是发狂的资本家，资本家是理智的货币贮藏者。货币贮藏者竭力把货币从流通中拯救出来，以谋求价值的无休止的增殖，而精明的资本家不断地把货币重新投入流通，却达到了这一目的。<sup>35</sup>

因此，马克思推断  $M-C-M'$  “正如初看上去所表现的一样，事实上是流通领域内的资本总公式”。<sup>36</sup> 对马克思而言，核心问题在于流通领域内发现的超过  $M$  的那部分是否就是产生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商品可能以等于、高于或低于其价值而交换。如果商品以等于其价值交换，那么这就是等价交换，显然不会产生剩余价值。如果商品按高于自身价值交换，那么卖者获得额外交换价值，而买者将损失等量交换价值。显然，双方的交换不会产生剩余价值形式的净收益。同样，如果交易按低于商品价值进行，那么买者所得等于卖者所失。该交易同样不会创造剩余价值形式的净收益。结论就很清楚：“无论怎样颠来倒去，结果都是一样。如果是等价交换，不产生剩余价值；如果是非等价交换，也不产生剩余价值。流通或商品交换不创造价值。”<sup>37</sup>

因此，马克思的结论就是，使剩余价值或利润产生的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不可能在流通领域内发现，于是他将注意力转向生产领域：

因此，让我们同货币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一起，离开这个嘈杂的、表面的、有目共睹的（流通）领域……进入门上挂着“非公莫入”牌子的隐蔽的生产场所吧！在那里，不仅可

以看到资本是怎样进行生产的,还可以看到资本本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赚钱的秘密最后一定会暴露出来。

……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人缔结契约的……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惟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谱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

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用来判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的那些观点、概念和标准就是从这个领域得出的——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sup>38</sup>

### 资本循环和生产的重要性

只要仔细观察资本循环过程,就可以确定剩余价值是在生产领域创造的。显然,在公式  $M-C-M'$  中,所描述的利润创造过程是商业资本利润的创造过程:“ $M-C-M'$  循环,为了贵卖而买,在商品资本中……是最清楚不过的了。”<sup>39</sup>在对流通进行历史研究和广泛分析的过程中,马克思还得出了如下结论:在剩余价值的实际创造过程中,无论商业资本或生息货币资本都没有参与其中。早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他就写道:“在我们研究的进程中,我们将会发现,生息资本和商业资本一样,也是派生形式,同时会看到,为什么它们在历史上的出现早于资本的现代基本形式。”<sup>40</sup>

这两种资本形式在本质上都是寄生性的。它们不是剩余价值得以创造的那个过程的组成部分。相反,它们使自己附属于任何能用来创造和剥夺经济剩余的机制上。在依附完成后,商人和货币放贷者能获得一份剩余,尽管他们的资本并未直接参与这种剩余创造过程。因此,这两种资本形式能够在封建生产方式中出现,并参与剩余分配。

产业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最有代表性的资本形式。它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剩余价值得以创造和剥夺的机制。在马克思资本流通图式中,产业资本可用三个阶段来描述:

第一阶段:资本家作为买者出现……他的货币转化为商品……

第二阶段：资本家用购买的商品从事生产性消费。他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进行活动；他的资本完成生产过程。结果产生了一种商品，这种商品的价值大于它的生产要素的价值。

第三阶段：资本家作为卖者回到市场；他的商品转化成货币……

因此，货币资本循环的公式是： $M—C…P…C'—M'$ 。在这个公式中，虚线表示流通过程的中断， $C'$ 和 $M'$ 表示由剩余价值增大的 $C$ 和 $M$ 。<sup>41</sup>

$P$ 在马克思的公式中表示生产过程；因为 $C'$ 大于 $C$ ，所以 $M'$ 大于 $M$ ，这在公式中很清楚。此外，上述两种情形下的剩余价值也相等。

因此，剩余价值的起源是因为资本家买进一组商品而卖出了一组完全不同的商品。第一组商品 $C$ 由生产所需的商品构成；第二组商品 $C'$ 是生产过程的产出。在生产中，资本家耗费完或消费了他当作商品买进的生产性投入的使用价值：

要从商品的使用上取得价值，我们的货币所有者就必须幸运地在流通领域内即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因此，它的实际使用本身就是劳动的物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这种特殊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sup>42</sup>

## 劳动、劳动力和资本主义的定义

劳动力是劳动能力或称潜在劳动。当劳动力作为商品卖出时，它的使用价值就是劳动的实施——即潜在劳动的现实化。当实施劳动时，它就被物化在商品中，并赋予商品价值。因此，剩余价值的惟一可能源泉就是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价值（潜在劳动）与所生产商品价值间的差异，而商品价值包括已实现的劳动（或所耗费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劳动力绝对是一种独特的商品：它的使用创造了新价值，除补偿原有的价值外还创造了剩余价值。显然，劳动力商品必须更加仔细地考察。

劳动力作为商品存在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

第一，劳动力只有而且只是因为被它自己的所有者即有劳动力的人当作商品出售或出卖，才能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劳动力所有者要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他就必须能够支配它，从而必须自己的劳动能力……劳动力所有者就必须始终把劳动力只出卖一定时间，因为他要是把劳动力一下子全部卖光，他就出卖了自己，就从自由人变成奴隶，从商品所有者变成商品……

第二个基本条件就是：劳动力所有者没有可能出卖有自己的劳动物化在内的商品，而

不得不把只存在于他的活的身体中的劳动力本身当作商品出卖。

一个人要出卖与他的劳动力不同的商品,他自然必须占有生产资料,如原料、劳动工具等等。没有皮革,他就不能做皮靴。此外,他还需要有生活资料……

可见,货币所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sup>43</sup>

这是使资本主义与简单商品生产社会相区别的资本主义的定义特征。在商品生产社会,当少数人——资本家——垄断了生产资料,而绝大多数直接生产者——劳动者——因为没有生产资料不能独立生产时,资本主义就存在了。劳动者可以“自由”地做出两种选择:饥饿至死或将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sup>44</sup>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自然和永恒的;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发展而成的一种具体生产方式,其统治阶级凭借占有商品生产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进行统治。

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自然界不是一方面造成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而另一方面造成只是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本身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sup>45</sup>

在解释了剩余价值怎样创造而被剥夺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花了几百页的篇幅来详尽叙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历史动力。我们将会按照同样的顺序,首先,借助生产和交换,讨论对剩余价值的创造和实现的解释,然后简要提及他认为资本主义演变过程中的一些重要因素。

## 劳动力的价值

我们已经发现劳动力价值和使用劳动力生产的商品价值之间的差别是剩余价值的源泉。因此,马克思通过讨论这二者之间的差别来解释剩余价值。在这一点上,劳动力与生产中所耗费和物化的劳动之间的差别具有重大意义。劳动力只不过是潜在劳动,这是劳动者作为商品所出卖的东西。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事实上的劳动力耗费。在我们考察完马克思对作为一种商品的劳动力价值的解释以后,这一区分的重要性会变得更加清楚。

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特殊物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假设个体已经存在,劳动力的生产就是这个个体本身的再生产或维持。活的个体要维持自己,需要有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因损耗和死亡而退出市

场的劳动力,至少要不断由同样数目的新劳动力来补充……因此,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总和,要包括工人的补充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资料。<sup>46</sup>

劳动力的价值等于工人家庭生活资料的价值。因此,物化在劳动力上的劳动等同于物化在构成这种生活资料的商品上的劳动。这种生活资料并不是生物或生理上的最低生存资料,而是由工人阶级已经习惯的“习俗和舒适程度”所决定的“历史发展的产物”。<sup>47</sup>

不同职业的工资差异反映了某些职业要求“特殊教育和培训”这一事实,“教育费用”会算入不同类型劳动力的“价值总和中”<sup>48</sup>。通过计算不同职业所需的各种教育和培训的劳动成本,所有劳动能被还原为简单劳动的某种倍加。自然,为了计算技能不同的劳动生产的商品的价值,这就允许对不同类型的劳动者所花费的劳动时间进行累加。

“在一个特定国家特定的时期内,劳动者所必要的平均生活资料数量”<sup>49</sup>很容易确定。以一个工人家庭一年所必需的商品量为例,通过计算物化在这些商品中的劳动量,把它除以365,就可以算出每个家庭每天物化在生活资料上的劳动量,该数量就是劳动力每一天的价值。因此,如果为工人们生产食物、衣服和住房的不同劳动者集体花费4小时来生产维持一个工人家庭一天的那些必需的商品,那么使用一个人的劳动力一天的价值就是4小时。

如果每个工人每天仅工作4小时,那么总产品将仅够满足工人的生存需要。就不会产生剩余。每个工人将会生产包含4个小时劳动的商品。每个工人每天工作4小时制造与他的生活资料价值相等的价值也就是与其自身劳动力相等的价值。

### 必要劳动、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产生和实现

劳动和劳动力之间差别的重要性现在应当更加清楚了。劳动力是劳动的能力。根据不同工作类型,人类劳动能力的上限是每天14~18小时。因此,从劳动力一天的使用上榨取的实际劳动量(也就是实际劳动一天生产的商品价值)取决于工作日长短。马克思写道:“所以,工作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变的。”<sup>50</sup>如果工作日的长度只是使“资本家为劳动力所支付的价值得到等量的补偿,它仅仅是一个价值生产过程;相反,如果工作日延长并超过了那一点,那么它成为剩余价值创造过程。”<sup>51</sup>

“工作日的那一部分”,马克思写道,即生产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时间,“我称为‘必要’劳动时间,这段时间耗费的劳动称为‘必要’劳动”。<sup>52</sup>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作日的长度总会超过这一必要劳动时间。他继续写道:被延长的“那部分工作日,命名为剩余劳动时间,把在这段时间内耗费的劳动称为剩余劳动”。<sup>53</sup>因此,正如价值是“许多小时劳动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劳动”。剩余价值也“只不过是剩余劳动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剩

余劳动。”<sup>54</sup>

现在,我们回到产业资本循环公式:

$$M-C\cdots P\cdots C'-M'$$

资本家首先持有货币形式的资本(包含在货币中的大量价值),并用以购买三种不同的商品:原材料、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现在其资本转化为物化在这三种商品中的大量价值),接着开始生产过程。

为简单起见,我们假设所有的生产工具和原材料在一个生产周期中消耗完。这种假设不会改变只是使分析的基本逻辑简单化。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花了将近200页的篇幅讨论资本的“周转时间”或耐久性的影响。限于篇幅,我们不得不化繁为简(尽管这确实会影响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马克思的价格决定理论)。

在生产阶段,资本被转化为最终产品(资本于是变成了物化在产品中的大量价值)。产成品的价值源泉有三种:原材料、生产工具和劳动力。那么首先就原材料和生产工具而言,由于商品、原材料和生产工具的价值由早已物化在其上的劳动决定,生产它们的初始目的只是使最终商品的生产成为可能。例如,原材料可能是羊毛,生产工具可能是纺车和织布机,而产品可能是布。养羊和修剪羊毛所用的劳动先是物化在羊毛中。但是,随着羊毛被转化为布匹,初始劳动的物质载体由羊毛转变为布匹。

布的生产完成后,布匹中包含了生产羊毛所耗费的一切劳动。羊毛转移到布匹上的劳动,不可能比物化在其上的劳动多。因此,转移到布身上的羊毛的价值(其劳动含量)恰好与其初始量相等。同样,当纺车和织布机作为生产工具在生产中损耗尽时,包含于其中的劳动就被转移到布匹之上。依据所有生产工具在每一个生产周期损耗完的假设,很显然,生产工具能够转移给布匹的劳动数量恰好是生产工具自身所包含的劳动量。这样,它们会把所有的(不会更多)价值转移到布身上。

然而,对劳动力又另当别论。利用我们先前所作的商品价值与劳动力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相等的假设,让我们假设物化在一天的劳动力上的劳动是4小时。现在,假设工作日是10小时。因此,一天的劳动力具有4小时劳动的价值,但是,当实际实施劳动时,劳动加给布匹的价值等于10小时的劳动。每一天劳动者辛苦劳作,在此过程中资本家用尽具有4小时物化劳动交换价值的劳动力商品。但是,从一天的劳动力中所榨取的实际劳动所创造的羊毛的交换价值是整整10个小时。

因此,在生产阶段结束后,资本就是物化在商品(布)中的大量价值。这就是马克思的公式中的C:  $M-C\cdots P\cdots C'-M'$ 。

从前面的讨论中,很明显商品C'(布)超过商品C(羊毛、纺车、织布机和劳动力)的那部分价值量与工作日长度超过生产劳动力生活资料的必要劳动时间那部分价值量恰好相等(此处假设资本家只购买了一天的劳动力,如果他购买了50天的劳动力,那么把C'超过C的剩余价值将是该差价的50倍)。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坚持认为劳动力商品是惟

一的剩余价值源泉的理由。

在流通的最后阶段,商品  $C'$  (布) 用来交换相等的货币量  $M'$ 。资本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资本从货币形式转变为商品形式,即经过生产过程变成一组新的商品,资本最终又变成货币。 $M'$  与  $M$  之差额恰好等于  $C'$  与  $C$  之差额。所有的交换都是等价交换,但是资本家此时获得的货币资本价值远大于初始货币资本价值。资本家此时处于一个新过程的起点,只是这时资本规模更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表了这一过程永无休止的重复。资本创造了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成为更多资本的源泉,反过来,这又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如此循环,以一种无穷无尽的动力去积累更多的资本。资本主义的信条就是:“积累! 积累! 这就是摩西(Moses)和所有的先知!”<sup>55</sup>

### 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率

当资本家将其货币资本用以购买生产过程中所必需的商品时,马克思把这种总资本(以商品形式出现)划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不变资本”包括所有的非人力生产资料,即所有的工具、机器、建筑物和原材料。因为这些商品只是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因此称为“不变资本”。所以当被转移到新产品中后,这些生产资料所包含的价值保持不变。资本家购买的劳动力被称为“可变资本”。当所购买的潜在劳动变为现实的劳动并物化在所生产的商品中时,其价值增加。换句话说,当资本采取货币形式时,同样,它也可以分为两类:

资本  $C$  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购买生产资料而支出的货币额  $c$ ; 另一部分是为购买劳动力而支出的货币额  $v$ 。 $c$  代表转化为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 $v$  代表转化为可变资本的价值部分。因此,最初是  $C=c+v$ ……在生产过程结束时得到商品  $C'$ , 它的价值 =  $(c+v)+s$ ,  $s$  是剩余价值。<sup>56</sup>

然后,马克思定义了剩余价值率,在他的分析中这个概念多次反复出现:

可变资本的价值等于它所购买的劳动力的价值,因为这个劳动力的价值决定工作日的必要部分,而剩余价值又由工作日的剩余部分决定,所以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之比等于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或者说,剩余价值率  $s/v$  = 剩余劳动/必要劳动。这两个比率把同一种关系表示在不同的形式上:一种是物化劳动的形式,另一种是流动劳动的形式。因此,剩余价值率是劳动力受资本剥削的程度或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的程度的准确表现。<sup>57</sup>



“剩余价值率”告诉我们劳动者每花费 1 小时用于创造与其自身生活资料相等的价值,他要花多少小时为资本家创造利润。在前面我们所举的例子中,工作日是 10 小时,其中 4 小时用来补偿劳动力价值(或者创造与工人生活资料相等的价值)。因此,剩余价值率就是  $6/4$  或者 1.5,这意味着劳动者每为自己劳动 1 个小时(即劳动力每花费 1 小时为自己创造生活资料),他就要劳动 1.5 小时为资本家创造利润。

虽然劳动和劳动力之间的差别是剩余价值的源泉。正如马克思后来所证明的,利润、利息和地租(和其他非工资收入)都只不过是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级内部的划分。《资本论》第一卷接下来的整个篇幅,为了澄清和解释仅仅凭借财产所有权所获收入的源泉和大小时,马克思一直把剩余价值等同于利润。所有不通过雇佣劳动者提供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的资本都只是寄生性的。它们参与剩余价值分配方式与商业资本和生息资本能够分享封建生产方式中生产的经济剩余一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只有那些雇佣生产性劳动的资本使剩余价值的创造成为可能。

### 工作日的长度

劳动和劳动力差别的大小(在劳动者生活资料需求给定的情况下)主要取决于工作日的长度。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章中,马克思花费了 72 页的篇幅详尽叙述了资本家和工人为确定工作日长度而展开的实际斗争的历史。他认为,只要劳动者繁衍后代因而提供自身的替代者,资本家就会在人类能忍受的极限内拼命延长工作日。

马克思对这一斗争历史的描述丰富详尽,不可能在这里加以概括。他的历史研究揭示了资本家进行斗争的动机:

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它克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因此对待工人就像对待单纯的生产资料那样,给他饭吃,就如同给锅炉加煤、给机器上油一样。资本把积蓄、更新和恢复生命力所需要的正常睡眠,变成了恢复筋疲力尽的机体所必不可少的几小时麻木状态。在这里,不是劳动力的正常状态的维持决定工作日的界限,相反,是劳动力每天尽量的耗费(不论这是多么强制和多么痛苦)决定工人休息时间的界限。资本是不管劳动力的寿命长短的。它惟一关心的是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它靠缩短劳动力的寿命来达到这一目的,正像贪得无厌的农场主靠掠夺土地肥力来提高收获量一样。<sup>58</sup>

马克思清楚资本家并不总是能够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榨尽工人的血汗。但是,工人惟

一能够保护自己免受资本蹂躏的办法就是——始终不渝地斗争。他写道：“正常工作日的规定，是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sup>59</sup>在每一次冲突时，资本家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他们关心”。<sup>60</sup>

## 劳动价值理论及其转型问题

人们对马克思的“价值”概念的理解常常是错误的。劳动价值理论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中处于核心地位，不仅从其经济理论的几乎所有组成部分中可以推出该理论，它还为表明这些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基础。在马克思看来，商品只是为在市场上售卖而生产的产品。任何商品都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由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物理属性、化学属性组成，在一切社会，这些属性都相同（比如小麦，不管是在奴隶经济、资本主义经济或者其他经济中生产的，它都具有相同的物理属性和化学属性）。但是，商品的价值绝不具有物理属性和化学属性，而完全是生产商品的具体历史和社会环境的产物。

在一切社会，在任何时期，生产是相互依赖的生产者的社会过程，即为了使自然环境适合于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在一定的社会组织中从事的改造自然环境的必要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这种相互依赖性随之而来的对劳动进行社会协调的必要性意味着一切社会劳动或生产既是一系列活动，又是一组社会关系。

价值是生产物的一方面，但是它反映了把产品当作商品来生产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社会所特有的社会关系。价值是某种被马克思看作资本主义基本事实的事物的结果——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相互依赖的劳动只具有间接社会性，而劳动的参与者完全不把它看成是一种社会关系。

在前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者对他人的依赖是直接的、明显的，比如，皮革工人认为其工作是给鞋匠提供皮革，鞋匠则为他们生产皮鞋。鞋匠也同样看出这种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这些生产者中的每一个人的劳动都具有直接的社会性。生产皮革与为鞋匠生产皮革是一回事。

但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不是直接的、明显的。每一个生产者都只为市场而生产。他们既不知道、也不关心谁将消费他们的商品，谁将生产他们消费的商品。更重要的是，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并不是直接的、明显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皮革工可能在市场上不能卖出皮革。在那种场合，生产皮革的劳动并不具有社会性；这是他个人的愚行，也是个人的不幸，并不能归咎于社会。

只有当商品在市场售出时，劳动才变为社会劳动。商品以一定的价格购买和销售，将一些数量的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当售卖发生时，商品具有特定价格的经验形式，该价格决定货币交换一单位商品的比率。价值实体是只有通过商品售卖才能转化为社会劳

动的特定量私人劳动。该实体除了商品价格外不具有可观察的经验形式。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相对应的区分是有用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区分。有用劳动是实际经验可以观察到的、具体的,在一定的情形下具体的个人的生理发挥。物理和化学原理规定,只有施加于特定原材料的特定活动才能创造特定使用价值,这些具体的活动就是有用劳动。

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最终关心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通过商品销售而实现的价值。资本家雇佣工人生产商品,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利润。究竟是哪个工人,对资本家来说无关紧要,他们也几乎或完全不知道哪种特定的有用劳动创造一定的使用价值。他们雇佣工人生产,只是为了获得交换中的价值,即价值增殖;对资本家来说,是剩余价值或利润。

如果一种商品的生产不能创造足够多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资本家就让劳动者转而生产其他商品,因为资本家不关心使用价值,只关心价值。资本家也并不关心哪个工人从事劳动,或者说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资本家只关心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抽象劳动——一般意义上的劳动,生产商品一般。马克思强调,价值的实体是抽象劳动,而非有用劳动。

为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我们必须认识到马克思属于科学学派,他区分了既定的、直接的、经验上显性的社会现象表面和更深层的、看不清楚的、但更重要的实体或本质,因为后者是前者的基础。遵循这种传统进行研究,科学的解释包括识别现象的本质,然后阐明本质怎样在表面现象中突显出来。

在马克思看来,事实通常是这样的,人类关系的本质层面常常是那种关系所导致的行为的最一般层面尽管这种一般层面是几乎所有社会或生产方式所共有的,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或在不同的社会,它总会采取非常不同的外表形式。人类行为的一般的、本质的层面总是保持相对稳定,尽管现象发生了改变。

例如,生育对人类自身种类的繁衍和任何社会的延续来说都是必需的。但在不同的社会,社会关系导致并使得生育采取许多不同的可以观察到的形式。特定的人类活动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它们发生的每一种场合,并不总是成为生育的社会关系进程中的一部分。生育也并不总是导致特定的人类活动或人与人的关系(人工受精可以采用许多方式完成)。

在任何社会,该社会的订婚和授爵仪式所包含的诱发个人行动的直接原因是不同的:宗教信仰、同辈认可和经济约束之类。但是,由于人们可以在精神上超越或滞后于这些可观察到的经验因素,人们对这些礼仪的理解则在不断地进步。尽管这些原因千差万别,但是人们可以看出这些礼仪的本质或实质则是人类对生育的普遍需要。

同样,对马克思而言,劳动的社会配置是一切社会的普遍要求。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的配置通过劳动产品的售卖而完成。劳动力商品的货币价格受到几个具体的经验要

素的影响。这些要素包括生产成本、市场结构、消费者的需求量和需求结构以及其他因素。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背景下,如果个人的私人劳动想要转变为社会劳动,则商品价格必须得到实现(即商品必须售卖出去)。私人劳动通过在市场上以一定的价格售卖商品转变为社会劳动,这是劳动的普遍必要社会配置在资本主义社会所采取的特殊形式。简而言之,抽象劳动(通过商品的购买和销售使它具有社会性)是价值的实体或本质,而价格只是价值实体或本质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历史条件下的外在经验形式。

对马克思来说,价格的直接、表面和经验决定因素及这些决定因素与劳动价值关系的理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要使抽象劳动是价值实体这一论点具有说服力,它是必要的。尽管影响价格的因素多种多样,但是,价格是价值实体的实际经验形式。价值和价格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直接可观察的、数量上的关系,因为现有的实际价格具有经验可观察的、直接的成因。

“转型问题”(transformation problem)是指将这些原因及其对价格的影响进行分类以找出实体(价值)和经验表现形式(价格)数量关系的一个问题。

把这些差别牢记在心,我们开始分析转型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商品价值是由物化在生产资料之上、在商品生产中耗费的劳动(有时被马克思称为“死劳动”)和在当前生产周期中所耗费的劳动(“活劳动”)组成。因此,

$$W = L_d + L_l \quad (9.1)$$

式中, $W$  是价值, $L_d$  是死劳动, $L_l$  是活劳动。活劳动可以分为必要劳动  $L_n$  和剩余劳动  $L_s$ 。必要劳动是创造与工人工资价值相等的那部分劳动,剩余劳动是创造剩余价值的那部分劳动。因此,式(9.1)就变成了:

$$W = L_d + L_n + L_s \quad (9.2)$$

在实际的价格形成过程中,马克思相信资本家将生产成本累加后,价格上浮了一个百分比加价,它由社会平均利润率决定。因此,实际价格形成的公式是:

生产价格 = 生产中耗费的商品成本 + 生产中耗费的劳动成本(不变资本) + 利润加价  
(剩余资本)(可变资本)

用  $p$  代表生产价格, $c$  代表不变资本, $v$  代表可变资本, $r$  代表利润率,则得到:

$$p = c + v + r(c + v) \quad (9.3)$$

其中, $r = \{s / (c + v)\}$  并且  $r(c + v) \{s / (c + v)\} \{c + v\} = s$ 。

不同形式的劳动和价格成本组成的一般对应关系就清楚了:

$$\begin{array}{ccccccc} W & = & L_d & + & L_n & + & L_s \\ \downarrow & & \downarrow & & \downarrow & & \downarrow \\ P & = & C & + & V & + & r(c + v) \end{array} \quad (9.4)$$

价格对应价值、不变资本对应死劳动、可变资本对应必要劳动、利润或剩余价值对应剩余劳动,这就是货币价格与抽象劳动的经验表象相对应并且确实就是抽象劳动的经验

表象得以确立的逻辑。

但是,这种对应为什么不是成比例的或者说1比1的关系呢?于是,这就引出了转型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只要在利润率公式中的分子和分母各除以 $v$ 就可以看出:

$$r = \frac{s}{c+v} = \frac{s/v}{(c/v)+1} \quad (9.5)$$

马克思称 $s/v$ 为“剩余价值率”, $c/v$ 为资本有机构成(每个劳动者占有的生产资料数量)。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之间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往往使经济中所有不同部门的工作日长度和工资率有均等化的倾向。因为剩余价值率由工作日长度和工资率决定,由此得出结论——不同部门的利润率趋向均等。竞争和资本流动也存在使各部门的利润率趋于均等的倾向。因此,从式(9.5)中可以清楚看出,要使所有部门的 $r$ 和 $s/v$ 相等,逻辑上就必然要求各部门 $c/v$ 即资本有机构成相等。

马克思知道不同部门 $c/v$ 的差异相当大。然而,他的理论却要求不同部门 $r$ 和 $s/v$ 相等,于是,产生了明显的矛盾。马克思解决这一明显矛盾的办法是一方面对“生产领域”中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创造进行区别,另一方面对流通领域(市场)中通过商品售卖实现剩余价值进行区别。

马克思坚持认为无论资本有机构成差别有多大,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率将总是趋于相等。当剩余价值率以那种形式表述时,它仅在生产领域有意义。但是,当它表述为剩余价值/可变资本时,它就既可以指生产领域创造的剩余价值,也可以指在流通领域通过商品销售而实现的剩余价值。

当剩余价值/可变资本指生产领域创造的剩余价值时,那它就与剩余劳动/必要劳动这一比率相等。在生产领域中,分子和分母都有明确含义。无论资本有机构成有多么不同,在任何产业两者的比率都倾向于与所有其他产业该比率趋于均等。

当剩余价值/可变资本指市场销售实现的剩余价值时它在流通领域就具有意义。当资本有机构成不同时,恰恰是促使利润率相等的不同产业间的竞争使得剩余价值/可变资本(以同样的方式类推)不会相等。但是,马克思论证产业剩余价值/可变资本的比率相等的全部论据清楚地表明,他只考虑了生产领域内创造的剩余价值。

马克思相信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价格大体反映价值,利润率间的差异普遍存在。但是,随着市场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变成更加有机的整体,竞争得到发展且资本流动性更强。在追逐更高利润的过程中,资本家把资本从利润较低的产业转移到利润较高的产业,从而提高了前者的利润率,并使后者的利润率下降。因此,马克思相信:“最初不同生产部门占主导的利润率非常不同。竞争使这些不同的利润率趋同于一个单一的一般利润率,即所有不同利润率的平均值。”<sup>61</sup>

竞争使利润率均等的惟一的方式是供给和需求的变动所引起价格的变动。而供给和需求的变动又是由于资本从低利润产业(因而这些产业内供给减少,价格上升)转向高利

润产业(因而供给增加,价格下降)引起的。这些价格变动,使利润率均等化,也引起生产的均衡价格偏离价值。但是,马克思继承李嘉图的学说,相信这些偏离将会遵循一定的模式,因而完全可以解释。像李嘉图一样,马克思也相信比平均资本有机构成高的产业中,生产价格要高于价值。而在比平均资本有机构成低的产业中,生产价格要低于价值。

马克思认为,当竞争引起价格偏离价值,使不同产业的利润率相等时,必然引起剩余价值的再分配,即从创造它的行业转向其他行业。剩余价值是由剩余劳动创造的,因此,每个产业创造的剩余价值同所使用的可变资本保持一定比例。

但是,使利润率均等化的竞争性价格的变化,引起剩余价值从那些资本有机构成低于平均资本有机构成的产业流向资本有机构成高于平均资本有机构成的产业。只有通过这样的转移,利润率才会趋于相等。因此,商品在市场上以占主导的生产价格销售之后,每个产业的  $s/v$  比率都不相同(剩余价值被解释为在市场上实现的利润)。

认识到这种必然的不均等而仍然坚持在生产领域创造的剩余价值与所雇佣的活劳动数量成严格的比例关系,并不表明存在绝对不一致。这只是意味着  $s/v$ (当解释成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时)在所有行业都相等。

然而,在马克思的批评者中,关于对马克思的分析存在逻辑错误的这种错误指控仍非常普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一段话对该问题已经讲得一清二楚了:

因此,虽然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家在出售自己的商品时收回了生产这些商品所用掉的资本价值,但是他们不是得到了本部门生产这些商品时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从而利润,而只是得到了社会总资本在所有生产部门在一定时间内生产的总剩余价值或总利润均衡分配时归于总资本的每个相应部分的剩余价值。<sup>62</sup>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设计了一个表格来说明这个问题。该表格处理的情况是,价格与价值成一定比例关系,但各部门资本有机构成则不同。价格和价值的比例关系不同要求每个部门的利润率不同。然后,马克思计算了经济整体中的平均利润率,并设计了第二个表格,在该表中对价格作了调整。

对马克思的图表作微调得出表 9.1 和表 9.2。表 9.1 表明,如果每个产业卖出产品的价格恰好足以实现该产业所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就会得到不同的利润率。当不同商业企业之间的竞争使所有部门利润率均等化以后,形势就变成了表 9.2 所描述的情形。

然后,就得到下述条件:(1)每部门的利润率等于总的或社会平均利润率;(2)不同部门价格的升降部分(第二个表)恰好相互抵消,结果两个表中总价格(或平均价格水平)相同;(3)因为价格变动,在表 9.1 和表 9.2 中,一些部门的剩余价值增加了,而另一些的部门则减少了,但剩余价值总量不变。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表格意在说明,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异引起价格偏离价值是以重新安排现存的、在生产过程中已经创造的剩余价值量这种方式实现的。但是,马克思的阐述

是不完整的。问题在于,尽管他改变了产出价格,但投入价格依然与价值保持一定的比例。于是,每种商品就有两种不同的价格,一种是作为产出的价格,另一种是作为投入的价格。

在《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之后不久,就发现了投入价格和产出价格转换的数学方法。<sup>63</sup>但是,在最初的方法中,马克思上述的三种条件中只有两个成立:部门利润率相等,以转型价格表示的剩余价值总量与转型价格总量相等。然而,转型价格改变了平均价格水平(即转型价格总量不等于转型前的价格总量)。

表 9.1 当价格与价值相等时的利润率

产业	1 总资本 (2栏+4栏)	2 总不变 资本	3 耗费的 不变资本(c)	4 可变资本 (v)	5 剩余价值 (s)	6 生产成本 (c+v)	7 商品价值 (c+v+s)	8 利润率 (5栏÷1栏)
I	100	80	50	20	20	70	90	20%
II	100	70	51	30	30	81	111	30%
III	100	60	51	40	40	91	131	40%
IV	100	85	40	15	15	55	70	15%
V	100	95	10	5	5	15	20	5%
总量	500	390	202	110	110	312	422	—
平均量	100	78	—	22	22	—	—	22%

表 9.2 相同的利润率条件下,价格与价值的偏差

产业	1 总资本	2 利润率	3 利润	4 生产 成本	5 生产价格 (4栏+3栏)	6 剩余 价值	7 利润对剩 余价值的 偏差 (3栏-6栏)	8 价值	9 生产价格对 价值的偏差 (5栏-8栏)
I	100	22%	22	70	92	20	+2	90	+2
II	100	22%	22	81	103	30	-8	111	-8
III	100	22%	22	91	113	40	-18	131	-18
IV	100	22%	22	55	77	15	+7	70	+7
V	100	22%	22	15	37	5	+17	20	+17

随后的解决办法普遍证明采用不同的将投入和产出的价格都转换的方法只能保证马克思三个等式中只有两个成立。浩如烟海的文献提出了无数的数学公式,它们每每都自

称是最接近马克思本意的方法。

诚如上述,不同种类的生产耗费都对应着马克思的抽象劳动的概念。如果它们恰好一一对应,价格将同价值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许多原因会破坏这种严格的比例关系,但是,抽象劳动仍是其本质属性,而它又以价格这种经验形式表现出来(尽管采取了一定的歪曲形式)。转型问题的关键与以下论据的普遍说服力有关,即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私人劳动通过变成采取在市场上售卖的商品价格形式,才会转化为社会劳动;同时,还得做出同样有说服力的解释,说明为什么货币价格对抽象劳动的反映是不完全成比例的。对转型问题不同方法的相对优劣进行评价不属于本章的探讨范围。

### 私有财产、资本和资本主义

马克思先前提出的剩余价值的本质和来源问题,现在他已经提供了答案。他已经表明,通过一系列的交换,各种商品按其价值出售,剩余价值不是在交换而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只有“自由的”劳动者把劳动力出售给资本家的社会经济制度,剩余价值才有可能在交换中实现。因此,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自由劳动者”是资本存在的前提。于是,资本就必然包含着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

但是,马克思时代的正统的经济学家只是(并且一直持续至今)视资本为过去生产的生产资料,即“物”的总和。马克思承认资本包含着(至少部分地)进一步生产的生产资料;资本这部分属性可以说存在于一切社会和一切的历史时期。但是,资本并不存在于所有历史时期,它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同样,就生产总是开发和转化自然资源而言,可以推出“某种类型的财产关系”存在于一切社会和一切历史时期。但是,马克思感兴趣的是,资本主义所特有和独有的财产特征是什么以及财产关系怎样将已生产的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理解资本主义,必须知道以下知识:

资本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这种权力的执行者是资本家,它和单个人的劳动所能创造的东西不再发生任何可能的关系;但是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sup>64</sup>

资本的法律基础是私有财产法,因为它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

最初,在我们看来,所有权似乎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至少我们应当承认这样的假定,因为互相对立的仅仅是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占有别人商品的手段只能是让渡自己的商品,而自己的商品又只能是由劳动创造的。现在,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别人无酬劳动[马克思指剩余劳动]或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



的必然结果。<sup>65</sup>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和私有财产法已经变成统治阶级强行剥削工人阶级创造的经济剩余的机制。

## 原始积累

一旦资本和自由劳动相结合,资本就可以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更多的剩余价值又可以创造更多的资本,这是一个连续的螺旋上升过程。然而,要想真正理解资本,我们不得不透过连续的上升过程,揭示资本积累过程的真正开端。

马克思认为,资本的历史起源并不是(像马尔萨斯、萨伊、西尼尔、巴斯夏甚至穆勒所主张的那样)道德精英节约、节俭和节欲的结果。按常理,资本主义制度以一无所有的工人阶级和富有资产阶级的存在为先决条件。马克思把这两个阶级实际形成的历史过程称为“原始积累”。在评价上述经济学家的资本起源观点时,他写道:

这种原始积累在政治经济学中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学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是一样的。亚当吃了苹果,人类就有罪了。人们在解释这种原始积累起源的时候,就像在谈过去的奇闻逸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两种人,一种是勤劳的、聪明的、而且首先是节俭的中坚人物,另一种是懒惰的、耗尽了自己的一切、甚至耗费过了头的无赖汉……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第一种人积累财富,而第二种人最后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没有可出卖的东西。大多数人的贫穷和少数人的富有就是从这种原罪开始的;前者无论怎样劳动,除了自己本身以外仍然没有可出卖的东西,而后者虽然早就不再劳动,但他们的财富却不断增加。为了替所有权辩护……反复叨念这种乏味的儿童故事。但是,一旦涉及所有权问题,那么坚持把儿童读物的观点当作对于任何年龄和任何发育阶段都是惟一正确的观点,就成了神圣的义务。大家知道,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事实上,原始积累的方法绝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sup>66</sup>

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原始积累(尽管它是一个总体社会经济过程)可以被看作:不是创造一无所有经济上处于困境的依附性工人阶级的过程就是创造对生产资料拥有垄断控制权的资产阶级的过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其“历史都是用血与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sup>67</sup>。马克思分别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花了62页的篇幅并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花了其中三章的部分篇幅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两大阶级的形成给予了详细的历史描述。

在前资本主义的封建社会中,农业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工人阶级的诞生导致封建社会联系被摧毁,正是凭借这种联系,大多数劳动人民获得了土地,并因此维持了他们的生产能力。当封建财产关系解体并转变为现代私有财产制时,农民又从封建传统自其先辈

已赋予他们的土地上被强行残暴地赶走。

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氏族财产变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sup>68</sup>

当成千上万“自由”劳动力生成伊始之际,当然没有现成的工作等着他们。即使在产业领域有一些工作,但工作所要求的严格纪律是他们不能习惯的。结果,“他们大批地变成了乞丐、盗贼、流浪者……大多数时候是为环境所迫”。<sup>69</sup>马克思描述了在从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为控制日益膨胀的无家可归人口所颁布的残酷和野蛮的立法。这些人“被他人依据古怪恐怖的法律而鞭打、烙印、残酷折磨”,直到他们被重塑并接受“工资制度所必要的纪律”。<sup>70</sup>

除了土地变成一部分资本以外,还必须有可转化为工业资本的大量财富的积累。马克思对这种资本的一些重要来源叙述总结如下: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接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

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在英国,这些因素在17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sup>71</sup>

因此,在描述整个原始积累过程时,马克思写道,在资本的最初形成时期,“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sup>72</sup>

## 资本主义积累

但是,资本主义一旦诞生,一切都变了。马克思坚持认为,资产阶级的权利得到了新的私有财产法律的保证。当资产阶级变成统治阶级,他们及其代言人就变成了“法律和秩序”的拥护者——其中私有财产法和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的秩序使他们的权力永续。工

人与一切生产资料分离足以使资本主义开始按其“运动规律”前进。“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sup>73</sup>

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法律、经济基础既定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反映了推动该制度的原动力——永无休止、没有尽头的积累资本的动力。资本家的社会地位、声望及其经济的、政治的权利都依赖于他们所控制的资本规模。资本家不可能静止不变,而是在每一个方面受到激烈竞争的困扰。为了超过竞争对手,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地要求资本家积累资本,增强实力,否则,正是这些竞争对手将会使他们陷入绝境并接管其资本。竞争者不断提出更新更好的生产方法。只有积累更新、更优质的资本才能迎接这一挑战。因此,马克思相信资本家:

同货币贮藏者一样,具有绝对的致富欲。但是,在货币贮藏者那里,这表现为个人的狂热,在资本家那里,这却表现为社会机构的作用,而资本家不过是这个社会机构中的一个主动轮罢了。此外,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sup>74</sup>

正是永无休止的资本积累的动机和资本家之间的激烈竞争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或者说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

我们将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讨论竞争和积累引起的四大后果:经济集中、利润率的下降趋势、部门比例不平衡与危机和异化与无产阶级的日益贫困化问题。

## 经济集中

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财富和权力日益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中。集中由如下两种力量引起。首先,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往往造成强大资本击垮或吞并弱小资本。“在那里,竞争的激烈程度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多少成正比,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大小成反比。竞争的结果总是较小的资本家垮台,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sup>75</sup>

其次,随着技术进步,如果想要企业在正常条件下继续发展,那么必定要最小资本量持续增加。为了保持竞争力,企业将不得不经常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规模。”<sup>76</sup>因此,技术进步,尤其是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造就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少的资本家拥有越来越大的企业。以这种方式,少数富裕的资产阶级与社会上大多数无产阶级之间的鸿沟不断扩大。

## 利润率下降的趋势

马克思认为,在他的理论中,“资本构成及其在积累过程中所经历的变化”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sup>77</sup>资本构成是由“资本被划分为不变资本或生产资料价值和可变资本或劳动力价值即工资总额之间的比例”决定的。<sup>78</sup>他把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率定义为“资本有机构成”。他相信连续的资本积累从长期来看,势必引起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也就是说,生产资料价值增加的速度比用来购买操作这些生产资料的劳动力的价值往往增加得更快。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一个后果是利润率不断下降。

资本家的利润率建立在所有资本的基础上,但是只有不变资本创造剩余价值。

因此,不管利润来自何处,它总是一个超过全部预付资本的余额。因此,这个余额总是和资本保持一个比率。这个比率可以用分数 $\frac{s}{C}$ 来表示,其中 $C$ 表示总资本。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与剩余价值率 $\frac{s}{v}$ 不同的利润率 $\frac{s}{C} = \frac{s}{(c+v)}$ 。<sup>79</sup>

当我们把利润率公式 $\frac{s}{(c+v)}$ 中的分子、分母分别除以 $v$ 时,就得到 $\frac{(s/v)}{(c/v)+(v/v)}$ 或者 $\frac{(s/v)}{(c/v)+1}$ 。显然,利润率等于剩余价值率与资本有机构成加1之和的比率。因此,剩余价值率(单就本身来说)的增加总会增加利润率。在马克思看来,这正是资产阶级总是竭力延长工作日长度的原因。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也是仅就其本身而言)将总会引起利润率下降。然而,剩余价值增加引起利润率增加的效果,比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利润率下降的效果要直接而明显。因为只有可变资本创造剩余价值,人们可以发现尽管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了,如果剩余价值不变,那么,一定数量劳动力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将不得被更多数量的总资本分摊,进而得到利润率。因此,如果剩余价值率不变,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将会引起利润率的下降。

马克思认为资本家提高剩余价值率的企图,必定遇到某些实际限制。当这些限制因素发生作用时,“不变资本相对于可变资本的逐渐增加,就必然引起这样的结果:一般利润率逐渐下降”。<sup>80</sup>因此,马克思在资本积累引起利润率下降的理论方面秉承了斯密、李嘉图和穆勒;稍后,凯恩斯(Keynes)也加入这一阵营(确实,“资本积累引起利润率下降”这个概念比其他概念更容易被经济学家认同)。

当然,利润率的下降并不意味着总利润下降或者总产出利润份额的下降(因为总利润由利润率和资本总量决定)。<sup>81</sup>在澄清这一明显事实后,马克思进一步表明了他的看法:即

使利润率下降,一般来说,总利润也会增加。<sup>82</sup>而且,当资本家感到有利润率的下降压力时,他们会采取措施来扭转这种趋势。因此,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几种“反向影响”(counteracting influence)在发挥作用,来阻碍或扭转这种趋势。就因为这个原因,利润率的下降“并不是以其绝对形式,而是以不断下降的趋势表现出来”。<sup>83</sup>

马克思讨论了起反向影响的五种原因(因为其中两个意思基本相同,因此我们只谈四个)。

第一,资本家通过“延长工作日和劳动强度”能提高“剥削程度”。<sup>84</sup>讨论完围绕工作日长度的斗争后,马克思将起反作用影响的讨论限于:提高工人速度、科学管理、或者在19世纪晚期20世纪开始被称作“泰勒制”(Taylorism)的方法。所有这些提高劳动剥削程度的形式往往通过“使剩余价值率上升”<sup>85</sup>来提高利润率。

第二,马克思提及所有可能引起“工资被降到劳动力价值以下的”因素,尽管时间长短不同<sup>86</sup>。这一类包括了马克思第四个起反向影响的因素——相对人口过剩——因为人口过剩能通过压低工人工资而增加利润。

第三,马克思列举了使“不变资本各要素变得便宜”的因素。当生产不变资本的技术方法变革“阻碍了不变资本价值——尽管它在不断增加——以与其物质量增加速率相同的速率增加”<sup>87</sup>时,不变资本各要素就变得便宜。

最后一个起反向影响的因素是对外贸易。此处马克思的分析同穆勒的分析非常类似。他断言“投在对外贸易的资本能提供较高的利润率”。而且,“用于交换可变资本的生活必需品变得便宜”,并因此导致“可变资本相对于不变资本减少”<sup>88</sup>。就其发生而论,这将抵消资本积累所引起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同时也会提高剩余价值率。

马克思只用了三页篇幅来讨论对外贸易作为一种起反作用的影响利润率下降的因素。但是,它却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早期阐发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基础之一(在稍后的章节,我们将会讨论)。尽管相当简短,但是他确实提出了一条原理,这条原理成了稍后这些学说的核心内容:“对外贸易的扩大,虽然在资本主义方式的幼年时期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但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必然性,由于这种生产方式要求不断扩大市场,它成为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产物。”<sup>89</sup>

因此,马克思对利润率具有下降趋势的断言并不只是经验上的预测。它只不过是為了识别能够在任何给定时间对利润率的实际历史趋势产生相反结果的不同力量的一种理论上的或分类学上的工具。对于倾向于压低利润的那些力量的影响,马克思写道:“只有在一定的情况下,并且经过很长时期……它们的效果才会突出显示出来。”<sup>90</sup>回顾起来,马克思对利润率下降趋势分析可能没有讨论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有机构成之间的关系。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意味着生产技术在不断变化。随着技术发生变化,用于工人消费的商品的生产效率提高,可能使得工人的实际工资与剩余价值率同时提高。因此,资本有机构成变化能产生与其自身趋势相反的影响,这种影响强大到足以使利润率上升。在马克思提出

该理论的那个世纪,类似的现象在特定时期内确实发生过。许多发生在 20 世纪的技术变化,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同样可能已经使不变资本的构成更加便宜。这样的技术变化导致了当代经济学家称为“资本节约型”的技术创新。就这种创新已经发生而言,很可能资本有机构成并没有提高(或只有微小提高),尽管资本品的物质实体毫无疑问大大增加了。

### 部门不平衡和经济危机

当马克思宣称工人工资水平趋向于维持工人生存时,他与他之前的几乎所有古典经济学家就此观点保持一致。当他断定这种生存水平是由文化的因素而不是由生理因素决定时,他与穆勒保持一致。但是,就把工资维持在那种生存水平的社会机制而言,他又与所有这些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同。他彻底否定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他反驳道:“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自身特殊的在其自身界线内历史的有效的人口法则。”<sup>91</sup>工人的工资趋向于社会决定的生存水平是由于以下事实:

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隶属于资本,就好象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过剩的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实际增长的限制,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sup>92</sup>

工人之间的竞争使工资维持在生存水平上下,因为由失业工人构成的“产业后备军”通常生活在最低生活水平之下,他们总是拼命接受那些勉强糊口的工作。然而一段经济繁荣期创造了对劳动力需求的急剧增加,以至于产业后备军人员迅速耗尽。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资本家发现他不得不支付较高的工资来获得足够的劳动力。

资本家试图充分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因为单个资本家视工资水平为既定而且是个人力量不能改变的。最有利可图的行动方案似乎就是调整生产技术,即引进新的劳动节约型机器,这样每个劳动者将会推动更多的资本,人均产量也会提高。这种劳动节约型资本积累使资本家用同样或更少的劳动力增加产量。当所有或大多数资本家都各自采用同样的方法时,较高工资的问题就暂时得以缓解,因为被新的生产技术所取代的工人填充了劳动力后备军。技术性失业的产生节省了工作时间,但也引发了新的问题和新的困境。

劳动节约型扩张使总产量增加的同时没有使工人工资增加。因此,尽管新的商品涌入市场,但是工人的工资因为受到限制,结果使消费需求受到限制。工人仍然在创造物化在商品中的剩余价值,但是因为消费需求不足,资本家不能把这些商品转化为货币,或者通过在市场上销售商品而实现利润。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过程,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经济分成两个部门:生产消费品的部门

和生产资本品的部门。<sup>93</sup>经济的平稳、连续扩张要求这两个部门的交换必须保持平衡。也就是说,生产资本品部门的工人和资本家对消费品的需求,同生产消费品部门的资本家对资本品的需求必须保持平衡。如果这一条件不能满足,这两大部门的供给就不等于需求。

但是,在劳动节约型技术被引进之前的时期,两个部门生产能力相对规模至少已经大体确定。因此,在工人工资受到限制后,相对的生产能力并没有根据收入在工资和利润之间的重新分配而调整,消费品生产部门生产能力过剩——或者说它的产品市场需求不足。

在此情形下,消费品产业的资本家必然不会立即添加生产设备。因此,他们将会取消任何增加业已大量过剩的资本存量的计划。当然,这些决策将会大大降低对资本品的需求,从而导致资本品部门产量的下降。与一些早期商业危机的消费不足(萧条)理论不同,马克思的理论把萧条的根本原因假定为两部门生产能力同工资和利润的收入分配间的结构不平衡(后者往往决定对两部门产出的需求)。当这种不平衡出现时,萧条的信号首先就在两部门明显地表现出来。

当资本品生产减少时,工人被解雇,工资总额减少。而且,消费需求减少。这引起消费品部门生产减少,失业增多,需求减少,并因此导致螺旋式下降。结果造成两部门供给普遍过剩,或商品过剩,整个经济陷入萧条。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失业者组成的产业后备军得到大量补充。

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由中等活跃、生产高度繁忙、危机和停滞这几个时期构成的、穿插着较小波动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就是建立在产业后备军或过剩人口的不断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后再形成这样的基础之上的。而工业周期的阶段变换又补充新的过剩人口,并且成为过剩人口再生产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现代工业这种独特的生活过程,我们在人类过去的任何时代都是看不到的。<sup>94</sup>

## 无产阶级的异化和日益贫困化

原始积累过程创造了一无所有只有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工人阶级。工人创造的——资本——逐渐控制了他们。积累过程的深化扩大了资本对数量日渐增多的工人的控制,也强化了资本对所有工资劳动者的控制。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积累的整个过程对工人产生了非同寻常的致命危害,并全面妨碍了工人开发他们的潜能。他们不可能成为情感上、思想上或美学上全面发展的人。

人类不同于动物,因为他们创造和使用工具来塑造和控制自然环境。通过劳动,人类感官和智力得到发展和完善。通过同他所生产的东西的某种关系,个人获得了快乐和自我实现。在诸如封建社会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尽管存在剥削阶级,但是,个人通过劳动

至少可以部分获得自我实现。工作带来的远不止是把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因为剥削的社会关系也是私人的和专制的。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别的关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sup>95</sup>

在资本主义社会,市场把交换价值或货币价格同人与物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属性隔离和孤立开来。生产过程中更是如此。对资本家来说,工资只不过是在计算利润时需添加到原材料和机器成本上的另一种生产成本。如果可以创造利润的话,劳动就只是一种可以购买的商品。劳动者是否出卖其劳动力完全不由自己控制,它取决于冷漠的和完全非人格化的市场状况。同样,作为资本家个人的财产,劳动者的产品同样完全外在于工人的生活。马克思用“异化”来描述这种情形下人的状况。他们感到异化或与其工作、制度和文化环境和同事相异化或分离。工作条件、产品和事实上工作的可能性都是由数量上占少数的资本家及其利润算计决定的,而不是由人的需要或愿望决定的。马克思对异化的后果做了最好的总结。

那么,劳动的外化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而,它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地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最后,对工人说来,劳动的外在性质,就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在宗教中,人的幻想、人的头脑和人的心灵的自主活动对个人发生作用是不取决于他个人的……结果,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性行为,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技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sup>96</sup>

马克思给予淋漓尽致谴责的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这种退化和对工人阶级人性的完



全剥夺,因为它们威胁到个人的发展并创造了一个外在于人们维持生计活动的商品市场。而且,他还认为长期的资本积累加剧了工人的异化。与资本日益集中规律相应的是被马克思称为无产阶级的“日益贫困化”规律。马克思写道:

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变成劳动时间,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但是,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sup>97</sup>

应该注意的是,马克思断言即使工资增加,工人的生活状况仍将恶化。必须强调这一点,因为许多作者把无产阶级的日益贫困化解释成工人可消费的物质形态商品数量将持续下降。尽管年轻时,马克思确实这样讲过,但是稍后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在他成熟的著述中,我们并没有发现任何暗示工资将会持续下降的论点。相反,在《资本论》中他清楚地讲到:实际上,随着资本的积累,工资实际上会提高。他写道:随着资本的积累,

在工人自己所生产的日益增加的并且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产品中,会有较大的份额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中,使他们能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有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费基金,并且积蓄一小笔货币准备金。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允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工资的增大至多也不过说明工人必须提供的无酬劳动量的减少。这种减少永远也不会达到威胁制度本身的程度。<sup>98</sup>

因此,马克思写道,“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多数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sup>99</sup>他绝对没有宣称工资将会下降,他指的显然是异化的扩大和普遍的贫困。他认为,随着资本的积累,工人的创造性的、情感的、美学的和思想的潜力将会受到彻底削弱。毫无疑问,马克思会把一位20世纪精神分析学家的话作为他上述观点的证据,这位精神分析学家写道:“现代公司的经理剥夺了工人思考和自由行动的权利。生命受到否定,控制的需要、创造性、好奇心和独立思考都被压制,其必然的结果就工人而言是逃避或

斗争、冷漠或毁灭和精神堕落。”<sup>100</sup>

这个精神分析学家要表达的要旨是，当资本引起工人“精神堕落”，其结果要么是工人“心灰意冷”，要么是毁灭性的。马克思认为其结果最终必将是毁灭性的——工人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其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sup>101</sup>

但是，他相信，这种毁灭性将同样构成一种创造性的历史行动。在旧的剥削制度的母体内，工人将会创造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其中合作和计划将会代替竞争和市场的无序，人的全面发展代替人的退化、剥削和异化。

自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一百多年间，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此起彼伏。但是，这些斗争一般限于局部地区，并且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中通常遭到残酷的镇压。马克思相信，只有在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才能够建立人道的社会主义制度，因为只有那些国家才具备建立新制度的工业基础和先进的生产力。

资本主义的成功及至今其表面上的生命力反映了马克思当初不曾预见的发展：工人的斗争被残酷镇压使其贫困和异化问题转变成为一种非暴力的形式——冷漠、绝望、情绪萎靡不振、焦虑、孤立和落寞。

但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本质、起源和运动规律的分析与他的这一信念似乎格格不入：工人阶级会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用一种他们能控制而对他们有益的新的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的追随者做出了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预言，但资本主义却存活了下来。我们不能期望马克思或其他类似的思想家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次序和时间做出毫厘不差的预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者任何其他社会的生产方式——只不过太复杂不可能给出明白确定的预言。然而，马克思不仅确实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还提出了无数理论和历史见解，直到今天，他的框架和见解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的结构和功能仍被证明是非常有用的。

1989~1991年初的苏联和东欧事变再次引出了学术界和新闻界广泛宣传的见解，即“共产主义已经终结”、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和过时的。马克思首先是一位试图理解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在这些自称为共产主义国家中所发生的一切，丝毫不可能贬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本质及其运动规律所作的天才般的洞见。如果马克思对那些存在于东欧国家的经济作了预测并论述了它们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那么最近那一地区的一系列

事件证明马克思错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讨论的是资本主义,那么只有发生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事件才能证明他错了,从而证明他的思想过时了。但是,那样的事件至今还未发生。马克思的思想毫无疑问将战胜这种或那种在未来贬损其影响的企图,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像马克思描述的那样运行。

## 注 释

1. Karl Marx, *Grundrisse*, tr. Martin Nicolau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3), p. 85.
2. 同上。
3. 同上,第 85~86 页。
4. 同上,第 242 页。
5. 同上,第 241 页。
6. 同上,第 246 页。
7. 同上,第 243 页。
8. 同上,第 242 页。
9. 同上,第 243~244 页。
10. 同上,第 249 页。
11. 同上,第 240~241 页。
12. Karl Marx, *Capital*, 3 vol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1961), vol. 3, p. 35.
13. 同上。
14. 同上,第二卷,第 36 页(第一卷的中文翻译参考了《资本论》第一卷,中共中央编译局,人民出版社,1975)。
15. 同上。
16. 同上,第一卷,第 37~38 页。
17. 同上,第一卷,第 38 页。
18. 同上,第一卷,第 39~40 页。
19. 同上,第一卷,第 62 页。
20. 同上,第一卷,第 39 页。
21. 同上,第一卷,第 41 页。
22. 同上,第一卷,第 44 页。
23. 同上,第一卷,第 39 页。
24. 同上,第一卷,第 44 页。
25. 同上,第一卷,第 82 页。
26. 同上,第一卷,第 169~170 页。
27. 同上,第一卷,第 170 页。
28. 同上,第一卷,第 75 页。
29. 同上,第一卷,第 73 页。
30. 同上,第一卷,第 170 页。

31. 同上,第一卷,第105~106页。
32. 同上,第一卷,第146~147页。
33. 同上,第一卷,第147页。
34. 同上,第一卷,第155页。
35. 同上,第一卷,第152~153页。
36. 同上,第一卷,第155页。
37. 同上,第一卷,第163页。
38. 同上,第一卷,第176页。
39. 同上,第一卷,第63页。
40. 同上,第一卷,第165页。
41. 同上,第二卷,第23页。
42. 同上,第一卷,第167页。
43. 同上,第一卷,第168~169页。
44. 同上,第一卷,第170页。
45. 同上,第一卷,第169页。
46. 同上,第一卷,第170~172页。
47. 同上,第一卷,第171页。
48. 同上,第一卷,第172页。
49. 同上,第一卷,第171页。
50. 同上,第一卷,第232页。
51. 同上,第一卷,第195页。
52. 同上,第一卷,第216~217页。
53. 同上,第一卷,第217页。
54. 同上。
55. 同上,第一卷,第595页。
56. 同上,第一卷,第212页。
57. 同上,第一卷,第217~218页。
58. 同上,第一卷,第264~265页。
59. 同上,第一卷,第270页。
60. 同上。
61. 同上,第三卷,第156页。
62. 同上。
63. L. Bortkeiwicz, "Value and Price in the Marxian System",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apers*, 2 (1937).
64. 同上,第三卷,第259页。
65. 同上,第一卷,第583~584页。
66. 同上,第一卷,第713~714页。

A. 1. C  
(1937)

67. 同上,第一卷,第715页。
68. 同上,第一卷,第732~733页。
69. 同上,第一卷,第734页。
70. 同上,第一卷,第737页。
71. 同上,第一卷,第751页。
72. 同上,第一卷,第760页。
73. 同上,第一卷,第714页。
74. 同上,第一卷,第592页。
75. 同上,第一卷,第626页。
76. 同上。
77. 同上,第一卷,第612页。
78. 同上。
79. 同上,第三卷,第42页。
80. 同上,第三卷,第208页。
81. 同上,第三卷,第219页。在此引用是因为这些论断常常错误地归咎于马克思。
82. 同上,第三卷,第226页。
83. 同上,第三卷,第209页。
84. 同上,第227页。
85. 同上,第三卷,第228页(第三卷的中文翻译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中共中央编译局,人民出版社,2003)。
86. 同上,第三卷,第230页。
87. 同上,第三卷,第231页。
88. 同上,第三卷,第232页。
89. 同上,第三卷,第232页。
90. 同上,第三卷,第233页。
91. 同上,第一卷,第632页。
92. 同上。
93. 同上,第二卷,第20~21章。
94. 同上,第一卷,第532~533页。
95.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 *Essential Works of Marxism*, ed. Arthur P. Mendel (New York: Bantam, 1965), p. 15.
96. Karl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Moscow: Progress, 1959), p. 69.
97. Marx, *Capital*, vol. 1, p. 645.
98. 同上,第一卷,第618~619页。
99. 同上,第一卷,第645页。
100. 引自 Erich Fromm, *The Sane Society* (New York: Premier Books, 1965), p. 115.
101. Marx, *Capital*, vol. 1, p. 763.

## 第 10 章 功利主义的胜利：杰文斯、 门格尔和瓦尔拉的经济理论

从 19 世纪 40 年代中期到 1873 年（这一年标志着欧洲长期萧条的开始）是欧洲大部分地区经济快速扩张的时期之一。欧洲大陆和美国都在进行工业化。英格兰经历了以重工业尤其是资本品产业为主导的一波工业增长。

在整个北大西洋资本主义世界，这种快速工业增长伴随着资本、工业力量和财富集中的不断加剧。在有些情况下，集中加剧是通过消灭弱小竞争者的进攻性和破坏性的竞争而实现的；在另一些情况下，为了避免无情的竞争导致数败俱伤，强大的竞争者之间结成卡特尔、托拉斯甚至合并以求生存。

在同一时期，交通和通讯也发生了变革。这些变革又加剧了工业集中，因为少数大公司就可以有效地获取持续扩展的市场。股份公司成为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企业能够以此控制大量资本。欧洲和北美形成了庞大的、组织良好的货币市场，使为数众多的个人和小企业的小笔资本可以集中到大公司手中。

到 19 世纪 70 年代早期，资本主义开始表现出新的形式——在工业、金融、交通和营销的重要领域，经济体系都被成百上千家巨型公司控制。尽管这种集中到 20 世纪早期又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资本主义的这种新形式的确是在相当早的 19 世纪 70 年代即已出现。

在这种新型资本主义中，社会关系表现出明显不同的两种形式。在大公司内部，社会关系带有等级和官僚性质。公司是金字塔式的社会组织，其中每一等级严格由上一等级控制和协调。整个金字塔由顶部少数所有者和管理者控制。公司内所有个体行动和经济及生产过程以理性和预计的方式得以整合与协调。实现这种理性控制的方法包括精密的成本核算体系、质量控制和科学管理等。当然，资本家的目标并未改变：利润最大化和积

累更多的资本。

至于它同资本主义经济其他部分的关系,公司的处境同几十年以前小型的个人资本家相比并无不同。在大公司、成千上万不起眼的小企业、数以千万计的工人之间,传统的商品生产社会关系依然如故。所有这些机构和个人组成了一个复杂精细的系统,仍然受制于盲目无情的市场力量。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经济学家似乎应该放弃亚当·斯密有关资本主义经济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因为它建立在大量小企业组成的经济分析基础之上。在这种经济中,个别企业不可能对整个市场产生重大影响。每个企业行为由市场上消费者偏好引导,同时又面临大量其他同样追逐消费者钱袋的小企业的竞争。

我们已经看到,有关资本主义经济的这种观点很自然地与个人主义和伦理上的功利性享乐主义结合起来,进而得出结论——资本主义自然会实现社会和谐。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将这种观点与劳动价值论理念结合,得到了不同的结论,而边沁、萨伊、西尼尔和巴斯夏使个人功利主义信念远远地摆脱了劳动价值论所得出的“危险”的阶级冲突结论。

如果说经济理论史仅仅揭示了经济理论持续不断地反映资本主义制度演变的现实,那么可以预料,萨伊、西尼尔和巴斯夏的个人功利主义观将逐渐为另一种观念所取代,后者能够体现变化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式。

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正当公司资本主义经济集中迅猛发展之时,出版了三本非常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的《政治经济学理论》<sup>1</sup>和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的《国民经济学原理》<sup>2</sup>都是出版于1871年,三年后又出版了里昂·瓦尔拉(Leon Walras)的《纯粹经济学纲要》(以下简称《纲要》)<sup>3</sup>。尽管这三本书中的分析有很大差别,但在内容和方法上的相似之处是非常明显的。

他们都继承了萨伊、西尼尔和巴斯夏的个人功利主义观。他们都各自独立且逻辑一致地解答了水—钻石悖论,该悖论使得斯密断言效用和交换价值之间不可能建立直接联系。尽管萨伊、西尼尔和巴斯夏坚信效用是交换价值的决定因素,但是他们一直未能圆满地解答这一悖论。

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建立的效用价值论版本至今仍然是新古典主义传统的核心。他们还精炼和拓展了萨伊、西尼尔和巴斯夏的思想——最重要的拓展是瓦尔拉的一般经济均衡原理,这是经济思想史上最重要的理论与分析突破之一,后面还将作进一步分析。正因为他们最早在一般的功利哲学观指导下建立了一致的价值论,他们的理论被后来保守的经济学家们称为经济思想的“革命”,19世纪70年代也被看作是划分老牌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科学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水岭。

三位思想家在经济理论中引入了“边际主义”,其重要性取决于史学家怎样看待现代经济理论。经济学界有一部分人特别强调理论的逻辑与数学论证,而不考虑其内容或者

结论的实践意义。在他们看来,经济学家的声望取决于其理论是否具有难懂的、复杂的和严格的数学形式。

边际效用递减原理(由本章介绍的三位思想家各自独立地创立)使得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及其后继者能够具体明确地解释效用怎样决定价值(边沁、萨伊、西尼尔和巴斯夏坚信这一点,但是不能说明)。尽管这肯定是对早期效用论者信条的完善,但是,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的主要贡献在于改变了效用经济学的形式,他们并没有在内容上实现什么大变革。反映人类本性的功利主义观始终坚持理性的、可计算的效用最大化原理,边际主义使它能够通过微分学的形式表达出来。这标志着经济理论复杂数学化趋势的真正开始(尽管门格尔本人不喜欢以数学表述经济理论)。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数理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将杰文斯和瓦尔拉看作现代经济理论的最重要先驱。

三位思想家的边际效用原理无疑是对萨伊、西尼尔和巴斯夏体系的重要发展,但是其意义尚不足以使之被视为革命,或者划分经济理论史的分水岭。他们对广为接受的效用决定价值的效用论模型所作的修正的意义近似于后来的理论家成功解决马克思“转型问题”的意义。除完善效用价格论之外,只有瓦尔拉——在他的一般经济均衡理论中——真正发展了经济学中的效用主义传统(尽管重农主义者和萨伊已经建立了一般经济均衡的简单形式,但是,瓦尔拉远远超越了他们那种简单的、启发性的模型)。

### 杰文斯的边际效用和交换理论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1835~1882)的写作题材广泛——从气象学到逻辑学,再到经济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他在后一领域最重要的著作。在1860年给他弟弟的信中,他写道:“在过去的几个月,我有幸创立的,无疑是真正的经济理论,它无比深入和连贯,这使我无法心平气和地阅读这方面的其他著作。”<sup>4</sup>这一“真正的理论”最终发表于1871年。

在该理论的前言中,杰文斯声明“边沁的思想……是……本书理论的出发点。”<sup>5</sup>他坚信功利主义是科学的经济理论惟一可能的基础:“在本书中,我试图将经济问题视为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而且勾画了……这门科学……应有的形式。”<sup>6</sup>最终的准确结论是“价值完全取决于效用”<sup>7</sup>,这使得他对其他理论非常反感。

杰文斯所用价值一词,总是简单地指交换价值或价格。劳动论者,如马克思,定义价值为商品中凝结的劳动,但杰文斯蔑视地拒绝这种定义:

经济学者如果将价值看作某种物,或依附于某种物,就不可能掌握这门科学或者获得正确的见解……价值一词的正确含义是对其他物的交换比例条件。<sup>8</sup>



因此,杰文斯仅对价格感兴趣。他公然而自信地将其经济分析局限于市场流通领域。正如马克思数年前所指出的,在市场领域,所有人都是相同的。当杰文斯讨论人的时候,总是回避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在杰文斯看来,人们仅具有两个特征使其被称为经济人;而且,每个人都同时具有这两个特征。因此,所有人在理论上是绝对平等的。第一个特征是他们在消费品中获得效用:“个人需要的任何物……必须具有效用。在经济学中,我们尊重人的本性,而不是要求人应该怎么样。”<sup>9</sup>第二个特征是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计算效用最大化的。只有理性的、计算最大化行为才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为了以最小付出获得最大满足——以最小成本追求最大需要——换言之,快乐最大化,就是经济学问题。”<sup>10</sup>

人们从消费商品中获得效用。杰文斯认为,以前的经济学家的错误在于没有区分消费一定量某种商品获得的总效用和消费该商品最后一小份获得的“最后效用程度”(或者,也就是在后来的新古典主义术语中被称为“边际效用”者)。尽管当一种商品的消费量增加时,总效用通常的确会增加,但是最后“效用程度……终将随着数量增加而下降”,<sup>11</sup>杰文斯所关心的就是这“最后效用程度”或者边际效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将构成功利主义的新古典主义重新表述的基石。

杰文斯将边际思想引入功利主义经济学,找到了将人类理性的、计算效用最大化的功利主义观以数学术语表述出来的方式。如果消费某种商品的总效用依赖于消费数量,那么这可以写成数学函数: $TU=f(Q)$ ,这就是说总效用( $TU$ )与消费量( $Q$ )之间存在某个具体的函数关系。在微积分里,函数的一阶导数说明自变量(在这里为消费量)微量变化所引起的因变量(在这里为总效用)的变化程度。总效用的一阶导数给出任何给定消费量的边际效用。最大化原理很容易用微积分说明。当数量增加到边际效用为零时,总效用达到最大。这一点并不深奥。这只不过意味着,为了从消费某种商品中得到最大效用,应该消费该种商品(如果不存在消费成本)一直到饱和为止,也就是说,直到再额外消费小份商品不能进一步获得效用为止。

如果消费引致成本,这些成本就能以数学形式反映出来。例如,如果某人拥有一种商品 $y$ ,并且必须放弃一定量的 $y$ 才能换取另一种商品 $x$ ,那么,此人将比较两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之比 $MU_x/MU_y$ 和两种商品的价格之比 $P_x/P_y$ 。如果 $MU_x/MU_y$ 高于 $P_x/P_y$ ,那么此人通过以 $y$ 换取 $x$ 来增加效用。如果这一过程一直进行到交换利益耗尽为止,那么他或她必定达到了 $MU_x/MU_y=P_x/P_y$ 之处。换言之, $MU_x/P_x$ 说明购买(或售卖)额外价值为1货币单位的商品 $x$ 所获得(或放弃)的额外效用。杰文斯断言,两人将买卖商品直到每种商品的边际效用改变为 $MU_x/P_x=MU_y/P_y$ 为止。此时,价值为1货币单位的 $x$ 或 $y$ 产生相同的效用增量。如果对某人而言 $MU_x/P_x$ 大于 $MU_y/P_y$ ,那么此人就会卖出 $y$ 而买进 $x$ ,这样由于放弃价值为1货币单位的 $y$ 而失去的效用就小于从额外价值为1货币单位的 $x$ 所得到的效用。但是,在他或她放弃 $y$ 而获得 $x$ 过程中,边际效用递

减原理表明  $MU_y$  将增加而  $MU_x$  将减少直到  $MU_x/P_x = MU_y/P_y$ 。此时,交换再也不能实现更多的利益。如果  $MU_y/P_y$  大于  $MU_x/P_x$ ,就会发生反方向发生的类似过程。

以前的功利主义者已经认识到,在自愿交换中,只要从购买中得到的效用大于因售卖失去的效用,个人就会买进和卖出。这始终是提倡自由交换和笃信交换协调每个人利益的理由。杰文斯对该理论的贡献只不过是将该原理数学化并且明确区分总效用和边际效用。<sup>12</sup>因此,杰文斯对于以前功利主义经济学家思想的主要贡献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财富和价值的性质要用无穷小量快乐和痛苦来解释。”<sup>13</sup>“我主张所有科学导向的经济学者必须掌握数学。”<sup>14</sup>

杰文斯试图说明边际效用决定价格。但是,他只是试图说明两个“交易群体”是如何达成两种商品均衡价格的。他构造的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确定的结果,论证边际效用理论转化为价格理论的问题留给了其他新古典经济学家。杰文斯只是说明了,在价格已定的情况下,消费者怎样安排交换以实现效用最大化。

然而,杰文斯并没有从边沁主义的边际效用递减思想中得到边沁的平均主义结论。在批判汤普森的功利主义时,我们提出财富或收入相对效用程度的人际比较是不可能的,因为快乐纯粹是主观个人体验。由此看来,只有在没有任何反对意见的情况下,边际主义才能规范地比较两种社会状态。我们认为这反映了功利主义的高度保守倾向。某种交换的前后状态属于任何社会环境下能够获得全体一致认可的少数情形。如果两方自愿参与交换,那么双方必然都能获利。这一看似平凡的结论始终是功利主义关于市场资本主义自然和谐信念的基础。

与边沁、汤普森和穆勒不同,杰文斯清楚地认识到(并且理解)功利主义的局限性:

读者将发现……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比较两个大脑的感受程度。我想不出任何方法能够实现这种比较。据我们所知,一个大脑可能比另一个敏感一千倍……大脑之间是相互不可理喻的,感受似乎是不可通约的。<sup>15</sup>

毫不奇怪,杰文斯确信市场资本主义的自然状态是社会和谐而非阶级冲突。他声称:“所谓劳资冲突是一种幻觉。”<sup>16</sup>他向往天下大同,还说:“我们不应该以阶级观点看待这些问题。”因为“无论如何,在经济学中,(我们)应该将所有人视为兄弟”。<sup>17</sup>这种社会和谐“大同”自然出现,因为所有人作为交易者时在本质上都是平等的:

每个劳动者,必须像地主和资本家一样,被看作整体的组成部分,争取收获的最佳份额,而市场条件使他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sup>18</sup>

对某物付高价者必定或者极其需要该物,或者极不需要换出去的另一物;在两种情况下,交易都是有利可图的。在这里,能够很有把握地确认一条原则,即没有人会购买一物,除非他预期交易是有利可图的;而且因此完全的交易自由导致效用最大化。<sup>19</sup>

效用观点再次确认了“看不见的手”原理,而现在利用杰文斯的“科学”和“数学”方法,能够证明它将在一个大同与和谐的社会实现每个人效用最大化。

杰文斯还构筑了一种资本理论,与李嘉图和马克思一样,强调生产的时间因素。后来一种非常类似的资本理论成为新古典经济学中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两者都受到门格尔和巴斯夏的影响)的核心。该资本理论在仅仅几年之后由门格尔的门徒——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ohm-Bawerk)加以发展。由于庞巴维克的版本超越了杰文斯,而且资本理论通常与庞巴维克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在下一章专门介绍该理论。

杰文斯资本理论的主要目的是要驳斥李嘉图关于利润率与工资率成反比的结论。李嘉图的结论明确表现了劳资对抗,而杰文斯不喜欢这一点。杰文斯在考察李嘉图的理论时写道:

我们因此得到简单方程:

$$\text{产品} = \text{利润} + \text{工资}$$

从此公式又得到一个简单结论;因为我们由此可知,如果工资上涨,那么利润必定下降,反之亦然。但是此等教条是根本错误的……工人的工资最终是与扣除地租、税收和资本利息之后工人的生产贡献一致的。<sup>20</sup>

在生产成果完成之前,维持劳动正是资本家的职能,由于很多产业在一定的生产成果实现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需要大量支出,因此资本家必定承担了最终利润不确定的风险……资本量依赖于预期利润量,获取工人的竞争将足以保证工人得到产品的合理份额。<sup>21</sup>

既然竞争保证工人获得其“合理份额”,杰文斯期望视资本家为阶级敌人的工会成员“完全停止针对其真正同盟——富有的资本家的对抗”。<sup>22</sup>因为资本积累有利于所有工人,杰文斯相信劳动者应该将资本家视为“为他人而不是自己保有资本的受托人”。<sup>23</sup>富有的“受托人”和“得益于”受托人财富的劳动者从自由交易中共同受益。巴斯夏曾断言经济学就是交换——纯粹而简单。杰文斯写道:

交易在效用最大化过程中如此重要……以致有些经济学家将经济学看作仅仅是研究交易过程的科学……我完全认可看重交易。没有对交易理论的深刻把握是不可能真正了解经济科学思想的。<sup>24</sup>

然而,杰文斯并不愿意将经济学看作仅仅是解释交易行为。汤普森和霍奇斯金站在功利主义立场上声称,在工人自己拥有生产资料的情况下,交易将是更为有利的。杰文斯希望任何人都不要忘记资本家对资本的所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且“这是资本家维持劳动的正当职能”。<sup>25</sup>因此,他将巴斯夏的经济学定义拓展为(这一点巴斯夏一定会赞成):

“那么,经济学不仅仅是交换和价值的科学,它还是资本的科学。”<sup>26</sup>

不足为奇,杰文斯对以前经济学家的反感——这一点在1860年给他弟弟的信中已经表露——并不能推广到以前所有的经济学家,而是主要针对李嘉图和穆勒:

当真正的经济学框架最终得以建立之时,将会看到,能干但神经错乱的李嘉图将经济学引入了一条错误的路线——然而,这种状况又被与他同样能干和神经错乱的崇拜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进一步推向混乱。像马尔萨斯和西尼尔等经济学家更好地理解了一些理论。<sup>27</sup>

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对李嘉图和穆勒进行了大量批判,而对马尔萨斯、萨伊、西尼尔和巴斯夏的学说则充满溢美之词。“J. B. 萨伊正确地……定义了效用”,<sup>28</sup>他写道,而且,该理论在西尼尔“令人羡慕的论文”和“巴斯夏,例如他的《经济和谵论》中”<sup>29</sup>获得了适当的发展。在另一篇文章中,杰文斯讨论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称赞他为“最高尚和杰出的人物”。<sup>30</sup>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最钟爱的马尔萨斯著作中的引语之一可以清楚地说明什么才是杰文斯所谓的“最高尚和杰出的人物”。该引语出自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而正是在讨论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时,杰文斯表达了他对马尔萨斯的崇拜。

一个人出生于已被占有的世界,如果他不能正常地从他的父母那里得到生活资料,而且如果社会不需要他的劳动,他便无权要求最起码的食物,也就没有生存的权力。在自然世界的盛宴上,没有他的庇护所。她告知他离开,并且很快将执行她的命令,如果没有赢得其他来宾的同情的话。如果这些来宾起身让位的话,其他进入者将马上出现要求同样的待遇。大厅里将塞满带着要求的索取者。井然有序的宴会被打乱,丰盛变为稀缺;大厅内满是不幸和无依无靠的景象,以至于喧嚣而纠缠不休的人们正为没有得到本来被告知能够得到的东西而愤怒,所有这一切完全破坏了来宾们的愉悦。伟大的宴会女主人宣布了针对所有新进入者的严格命令,她为了使所有来宾尽兴,考虑到不可能保证没有限制的人数,在没有空位之后婉拒了新来者,来宾们没有认同这些,当他们认识到错误时已经太迟了。<sup>31</sup>

一个被杰文斯认为缺乏同情心的人会有怎样的言行,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问题。

重温杰文斯最崇拜的四位经济学家的理论之后,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杰文斯的思想居然经常被称为经济理论的革命,标志着传统和现代观念的分界。效用论观点和劳动论观点的基本差别在杰文斯从事写作之前已经清楚了,他的贡献主要在于表明边际主义使得马尔萨斯、萨伊、西尼尔和巴斯夏的理论可以表述为完美的数学形式,体现更一致的逻辑性。但是,效用观点的理论及精神实质并未发生变化。

## 门格尔的边际效用、价格和收入分配理论

卡尔·门格尔(1840~1921)以其在经济理论(《国民经济学原理》为主要著作)和方法论方面的(方法论方面的一些成果载于英译本《经济学和社会学方法论研究》)著作而功成名就。<sup>32</sup>在其经济理论中,他拒绝使用数学公式,而是借助数字例子以文字表述其理论。

他对总效用和边际效用的表述与杰文斯类似。他以一张数字表格说明该原理。表10.1沿用了门格尔表格的数字,添加了一些标注以示分类。<sup>33</sup>从该表中,要找到某种商品(例如第Ⅱ种)的边际效用,可以观察第二栏,从上往下移动到消费单位数处。例如,如果消费了6单位商品Ⅱ,第6单位边际效用为4。加总此单位数之前的所有边际效用,即可计算出总效用(表中没有直接显示)。例如,6单位商品Ⅱ产生总效用39。

**表 10.1** 边际效用递减示意图表

消费 单位数	不同商品									
	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IX	X
1	10	9	8	7	6	5	4	3	2	1
2	9	8	7	6	5	4	3	2	1	0
3	8	7	6	5	4	3	2	1	0	
4	7	6	5	4	3	2	1	0		
5	6	5	4	3	2	1	0			
6	5	4	3	2	1	0				
7	4	3	2	1	0					
8	3	2	1	0						
9	2	1	0							
10	1	0								
11	0									

总效用和边际效用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图形显示(假定商品数量是可分的,从而联系效用和消费量的曲线是光滑和连续的)。图10.1反映了门格尔表中商品Ⅱ的边际效用和总效用之间的关系。总量和边际量之间的这种一般关系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反复出现,有几类最大化问题可以用类似的方法进行分析。

门格尔利用他的表格说明消费者怎样使效用达到最大。以下引用门格尔自己对表格

的解释：

假定第Ⅰ栏数值表示某人满足食品需要的重要性程度，这种重要性是随着已经实现的满足程度而递减的，又第Ⅴ栏类似地表示香烟需要程度。可以证明，在一定界限内，此人满足食品需要的重要性超过香烟。但是，如果他对食品的需要满足到一定程度（例如，如果进一步满足食品需要的重要性以数字6表示），香烟消费开始与食品的进一步满足具有同等重要性。此人将力图从此刻起使食品满足和香烟满足达到均衡。<sup>34</sup>

门格尔认为，在所有商品的边际效用均等处达到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均衡。这一最大化条件不如杰文斯的表述准确，因为门格尔没有考虑价格。门格尔的最大化结论只有当所有商品单位价格相同时才成立。此时，在杰文斯的方程  $MU_x/P_x = MU_y/P_y$  中，每个比率的分子相同，从而比率相等就是要求分子（或边际效用）相等。杰文斯的公式是正确的，而门格尔的公式是一种不大可能发生的特例，尽管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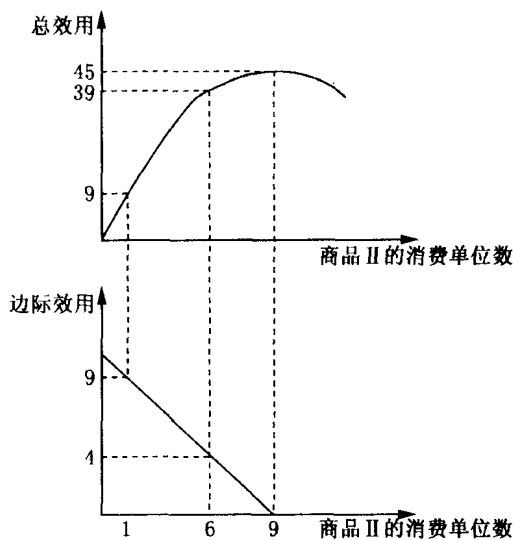


图 10.1 总效用和边际效用的关系

然而，门格尔的价格决定分析超越了杰文斯。门格尔以供给和需求为基础说明价格。所有古典经济学家都已经以供求为基础解释了短期市场价格。因此，在这方面，古典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从来没有分歧。分歧在于解释什么是供求的基础。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试图说明不属于价格范畴的地租、工资和利润。地租、工资和利润是全社会按阶级分配收入的组成部分，也是个别企业产品成本的组成部分。作为成本的组成部分，其总和就是斯密的商品“自然价格”或马克思的“生产价格”。当某一行业处于均衡时，供求决定的市场价格便等于自然价格或生产价格。这就是劳动论观点

中定价过程的实质——收入分配独立于价格,而事实上又决定价格。

效用观点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理解定价过程:供求决定价格,而供求又要由效用解释。因此,效用是消费品价格的最终决定因素。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的价格同样由供求说明。它们的供给取决于要素所有者的效用计算,而需求取决于它们生产消费品时的生产率和享用这些消费品的消费者的效用。可见,按照效用观点,工资、地租和利润至少部分取决于消费品价格。有关定价过程的两种观点确实存在很大差异。在这方面,门格尔超越杰文斯之处在于门格尔以效用论观点说明定价过程。

门格尔是这样解释消费品需求的:如果某种消费品相对于大多数消费者从它获得的边际效用而言价格较高,那么,大多数消费者将通过保留货币而不是购买这种物品而获得较多的效用。但是,随着该物品价格下降,更多的消费者将看到消费该物品而获得的边际效用势必超过因放弃少量货币而失去的效用。此外,随着价格下降,已消费该物品的消费者将发现效用最大化要求他们购买更多的该物品。因此,依据门格尔的边际效用递减原理,他导出需求定律:人们意愿购买的某种商品的数量取决于该商品的价格,需求量和价格互成反向变化。<sup>35</sup>

门格尔的供给分析要逊色一些。他通常将供给看作卖者手中业已存在的数量。卖者依据效用最大化原则决定不同价格水平上的意愿销售量。买卖意愿(都取决于效用)共同决定价格。门格尔进一步表明,与很多销售者销售同一商品相比,垄断者将索取较高的价格,销售较少的数量。<sup>36</sup>门格尔因此赞美自由竞争的好处。

门格尔称为消费而生产的物品为“第一级财货”,生产要素则称为“高级财货”。<sup>37</sup>他希望说明两类物品的关系。首先,很多高级财货需要用以生产低级财货,因此,资本和土地同劳动一样是生产所必需的。<sup>38</sup>我们看到,他的这个主张与劳动价值论并无分歧。其次,他试图证明“高级财货的价值总是无一例外地取决于它生产的低级财货的预期价值”,<sup>39</sup>这一点与劳动价值论是完全相反的。因此,他认为劳动价值论是“一种最奇特的实质性错误,并在以往科学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sup>40</sup>

门格尔的高级财货包括劳动、原材料和工具。同杰文斯一样,他的资本概念不仅仅是指工具和生产原料;它主要强调生产的时间因素。他认为:“我们需求的满足……取决于一定时期内所掌握的经济物品的数量(即资本服务)……因此,资本服务是我们的价值所系。”<sup>41</sup>由于门格尔认为任何高级财货都不能独自生产一种消费品——也就是说,高级财货都是互补的,必须同时使用——他很难说明怎样衡量个别高级财货的生产率。正如几乎如同所有遵循效用传统的思想家一样,他确信每一种个别生产性投入获得的价格反映了这种投入的生产性贡献。可见,测算生产性贡献非常重要。

门格尔对测算问题的解答总结如下:

假定所有高级财货都以最经济的方式被利用,一定量高级财货的价值等于以下两种重要程度之差:一是当我们掌握了该种高级财货的确定数量时所能达到的满足,二是当我

们没有这一给定数量时所能达到的满足。<sup>42</sup>

门格尔的分析是建设性的,但又是充分的。例如,如果所考察的厂商是一家农场,所涉及的高级财货是谷物种子,那么,没有谷物种子,生产便不可能进行。根据他的说法,门格尔必然得出谷物种子生产了所有产品价值的结论,尽管生产中还要用到土地、拖拉机和肥料等。不用说,这并非门格尔的本意。一种与效用观一致的投入定价理论要求投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替代的,而且有可能测量投入的小量边际增量对产出的影响。这事实上正是边际生产力理论所使用的方法,我们将在下一章介绍该理论。

确定投入依据其生产率获得报酬之后,门格尔作出了一个断言,该断言表明了大多数边际效用经济理论的特征:如果每种投入都获得其生产性贡献的价值,那么总产出的价值应该是被耗尽的。可见,不可能存在供任何个人或阶级剥削的剩余。这一结论与斯密、李嘉图、汤普森、霍奇斯金和马克思的理论相反,其经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含义是显而易见的。门格尔的表述为:

共同生产某种一级物品的所有高级财货(也就是说,所有原材料、服务、土地服务、机器、工具等等)的总现值等于产品的预期价值。但是,必须不仅包括技术上生产所需要的高级财货,而且还包括资本和企业活动的服务。因为,与以上提到的技术投入一样,它们都是所有生产所必不可少的。<sup>43</sup>

门格尔认为没有必要以资本家痛苦的节制行为为利润辩护。他只是指出“家庭能够满足的需要可以从财产中反映出来”。<sup>44</sup>然后,他进一步确认:“我们称个人掌握的物品总体为财产。他的财产不是任意的物品组合,而是其需要的直接反映。”<sup>45</sup>他还说明:

人类经济和财产具有共同的起源,既然二者存在的基础都是物品的可得数量少于人类的需要。因此,同人类经济一样,财产并非一种任意的创造,而是对问题的惟一实用的可能解决方法,这个问题本质上是由所有经济物品的需要量与可得量之间的缺口引起的。<sup>46</sup>

我们将在下一节看到,门格尔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其现状表现出一种内在的、确定的必然性。他认为不能也不应该干预社会机构和规则。因此,在他看来,财产的必然性在于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特定的财产关系。

构筑了收入分配(投入定价)理论和说明私有财产之后,门格尔认为无需论证地租和利润(或利息,他将这看作资本所有权的总报酬)。他认定此等收入是绝对必要的和绝对必然的。为什么要责难或证明必要的和必然的事物?只需要承认必然性并接受美好和谐的现状:

曾成为科学争论主题的最奇特的一个问题就是,地租和利息是否需要从道德的角度为之辩护,或者它们是否是“不道德的”。……土地和资本的服务具有价格,总归是由其价



值决定的,而且它们的价值不是任意判断产生的,而是必然的经济结果。这些物品(土地和资本的服务)的价格因而具有必然性,它们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产生,而且其确定性与一个民族的法律体系的完善性和民众的公正性成正比。<sup>47</sup>

门格尔当然正在尽其所能寻求科学的基础以创立和维持“正直的……公民道德。”

## 门格尔的方法论

门格尔是一场有关社会科学适当方法的大论战的主要参加者之一。该论战吸引了19世纪末很多主要的讲德语的学者,并且被称为方法论战。我们不准准备综述该论战中涉及的所有问题;而是仅仅讨论门格尔拥护的两个核心观点。

他的第一个观点是“纯科学”总是非价值取向的。他认为规范、道德或伦理价值是完全与科学无关的。个人价值受到其特定环境、阶级地位和情绪的影响,因而在道德问题上从来不可能达到广泛的一致。但是,科学是对客观事实——而不是某人希望的事实——的描述和理解。可见,科学家能够摆脱价值观的影响而最终达到完全和普遍的一致。

因此,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应该是非价值取向的。门格尔认为早期经济学家作品中的很多混乱,是由于他们不懂得纯经济理论不包括道德标准而造成的。“所谓政治经济学的‘道德取向’”,他写道:“因而是一种不确定的假说,在理论和实际上都没有意义,是思维的混乱。”<sup>48</sup>

这当然只是重复了纳骚·西尼尔的方法论观点。在有关西尼尔的讨论中,我们指出所有理论——尤其是社会科学——都是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然而西尼尔认为他的方法论并不符合上述这一普遍原则;他所有的著作都是试图使读者认可他有关重要道德问题的正确性。门格尔和20世纪许多赞同西尼尔方法论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一直以来微妙而普遍地背离了这一原理,然而,在他们的著作中很容易可以看出这一点。门格尔意图将私有财产和收入分配规则置于理论和道德争议之上,这正是对社会科学不受价值观影响原理的最重要的背离。

门格尔的第二个方法论原理是经济学家仅仅能够科学地了解个别家庭或企业(门格尔称之为“个体经济”)。他们永远不可能类似地把握阶级和国家这些社会总体。门格尔不喜欢“国家利益”这种常被用于为社会改革辩护的说法,因为,他认为这种说法是以一种错误观点为基础的——即国民经济及其利益区别于“个体经济”,是能够识别和把握的。他坚信,这些改革家的错误在于他们将国家“本身看作一个大的个体经济,其中,‘国家’代表有需求的经济消费主体。”<sup>49</sup>这种“科学的”原理与以下错误观点形成对照:

通常被称之为“国民经济”的对象总是表现为由个体经济组织和结合而成的复合整体,然而它并不是严格本来意义上的经济体。<sup>50</sup>

在有关边沁、汤普森和穆勒的讨论中,我们指出了功利主义的极端个人主义导向。因此,从个人需要是惟一好坏标准的观念过渡到总快乐最大化的政策将促进社会福利的原理,必然存在很多逻辑和现实的困难。门格尔正确地意识到以功利主义原理为基础的改革与功利个人主义是不一致的。他因此对所谓可以通过改革增进社会总利益之类的观点持否定态度。

但是,我们还看到效用理论的社会保守主义或经济理论中的市场交易观点总是认为财产所有权的现存规则是自然的、永恒的、无可非议的。因此,要使门格尔的个人主义最终导向他所有著作中体现的道德结论,他必须为私有财产的现存规则做出道德上的辩护,他的确如此做了。

尽管国民经济不能以与个体经济相同的方式得到科学的把握,门格尔仍然坚持认为我们能够获得某种形式的了解。他提出,国民经济是“经济有机体”。<sup>51</sup>他赞赏德国“法律历史学派”(与他批判的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相对照),他们已经认识到国家和确定其特定制度安排的法律组成:

一个“有机”结构,它决不能由个人或几代人任意地确定,它是一种排斥个人、整个年代、人类智慧任意性的较高级的结构……[这种]“潜意识的智慧”体现在有机产生的政治制度中,它高于偏好干预的人类智慧。<sup>52</sup>

门格尔得出结论:“法律不是偶然事物,从基本思想到特定内容,它根本上都是由人类本性和特定条件潜在决定的。”<sup>53</sup>

门格尔表示遗憾,因为没有产生

一个类似于法律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历史学派,它将支持现存经济学派及其利益,而反对经济领域的浮夸改革思想尤其是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学派]将完成德国的使命,避免很多后来的波折。<sup>54</sup>

因此,我们看到门格尔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和他关于理论与价值判断无关的信念决定了他相信现存体制和法律高于改革;按照他的观点,改革行为是不科学的、对社会有害的。他的个人主义最终导致了欣赏慈善的“潜意识智慧”和“有机整体”。他的无价值判断“科学”导致了维持既存经济利益和反对社会主义者“浮夸”的道德重要性的结论。

由此看来,难怪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中,讨论了他所认定的收入分配决定因素之后,门格尔写道:

对一个热爱人类的人来说,资本或一片土地在一定时间内为所有者提供高于劳动者在同样时间尽力工作的收入,这是很糟糕的。然而,其原因并非是不道德的。<sup>55</sup>

当然,说某物是道德的或是不道德的,同样都是价值判断。

所有门格尔著作中的道德取向(西尼尔和声称具有非价值取向理论的大多数20世纪新古典经济学家也一样)在他对既得经济利益的一贯辩护和对改革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反驳中反映出来:

有些人乐于看到社会将可得消费品的比目前更大的份额分配给劳动者……其观点是提供他们更舒适的生活标准和实现消费品和生活负担的更均等分配。这样解决问题无疑需要完全转变我们的社会秩序。<sup>56</sup>

从门格尔相信现存社会、经济和法律制度中存在慈善的“潜意识智慧”来看,这种转变在道德上是不可想象的。

### 瓦尔拉的一般经济均衡理论

瓦尔拉独立发展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他用稀缺(rarete)一词代表边际效用],讨论了消费者通过交换实现效用最大化的方程,这些无须在此总结,因为我们已经考察了杰文斯和门格尔著作中的类似成就。瓦尔拉对经济理论最重要和影响深远的贡献是他的一般经济均衡理论。

尽管以前的经济理论家已探讨过不同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在瓦尔拉之前还没有经济学家提出一般性的概念和理论框架,以分析不同市场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他认识到任何特定市场上供求力量不同程度地依赖于大量其他市场上的价格水平。

例如,正如杰文斯和门格尔已经提出的,消费者对某种商品的需求取决于消费者从消费不同数量的该种商品所获得的边际效用和该种商品的价格。但是,效用最大化条件表明,消费者将购买该种商品直到其边际效用与价格之比等于其他任何可行购买的商品的同一比率。可见,消费者对此种商品的需求还取决于所有其他消费品的价格水平。

由此看来,只要任何消费品的价格如效用理论家所言,完全取决于该种商品的供给和需求,而且任何商品的需求同时取决于所有消费者从消费该种商品获得的效用和所有消费品价格,那么,要确定这种商品的价格,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必须为已知。但是,所有其他商品的需求(从而它们的价格)同样取决于所考察的商品价格。因此,需要一种价格决定的一般理论。在这种理论中,所有价格必须由所有消费效用总和以及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决定。

然而,此等相互关系并非仅仅存在于消费品需求之中。它们还存在于消费品供给,存在于用于交换的其他类型商品和资产的供给和需求之中。瓦尔拉试图建立一种一般性的

理论框架,以此说明所有价格是如何通过所有市场的相互作用而确定的。

这样一种一般均衡理论的纯粹逻辑条件只是(正如在一个理论体系中同时确定几个未知变量一样)未知量个数必须等于用于确定这些变量的独立方程的个数。还必须满足其他条件,以确保联立方程组的解是存在的,确保解是有意义的——即不出现负价格之类的解,因为这与理论赖以建立的假定相矛盾,同时还要确保解是惟一的。瓦尔拉主要考虑的是说明能够建立这样一种理论体系,其中,独立方程个数足以保证求解同样数目的未知数。

但是,如果这就是他所惟一关心的,他可以很简单地给出任意数目的方程(这总是不难构造出来的)。然而,他希望他的方程具有经济含义,描述他所认为在价格决定中具有重要性的实际市场力量。因此,在继续介绍瓦尔拉方程组之前,必须首先讨论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分析思想。

无须说,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同时解释所有现象。这要求完全了解整个世界。显然,所有“一般”理论都是局部理论,因为有很多现象它们都不能解释。经济学中一般均衡理论和局部均衡理论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通常试图解释某个时期整个经济系统中所有交易价格和成交量,而后者将一个或两个之外的所有其他交易价格和成交量视为已知,试图在这些已知价格和成交量的前提下说明选定的一个或两个市场。在下一章,我们将讨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局部均衡理论。

在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中,需要解释所有价格和成交量。这当然意味着必须根据它们与社会经济系统中其他因素的关系加以解释。在他的理论中,必须说明社会经济背景及市场状态的特征,以此解释价格和成交量。

因此,在他的方程中,价格和成交量为因变量,社会经济背景的特征为自变量(这当然被视为因变量的决定因素)。方程的具体形式反映瓦尔拉认定存在于社会经济背景给定特征(他的自变量)和市场上价格和成交量(他的因变量)之间的实际经济关系。

瓦尔拉理论的制度背景是竞争性资本主义,其中“有地主、工人和资本家”。<sup>57</sup>这三个阶级以两种重要的经济方式发挥作用:首先,作为生产性服务(土地、劳动和资本)的所有者,他们在市场上供求这些服务;第二,作为消费者,他们在市场上对消费品提出需求。瓦尔拉将“生产性服务”所有权的现有分配(即社会阶级划分)视为理所当然的——同几乎所有效用传统经济学家一样。将阶级划分——因而生产中各人的作用——视为理所当然的之后,在瓦尔拉看来,社会经济系统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们的主观偏好(subjective desires),即边际效用表。

在瓦尔拉理论中,有三个重要的制度因素。首先是承认现存财产法律和分配在道义上的正当性。这里,他只是明确表明“财产所有权……在法律上是合理的,与正义相吻合”。<sup>58</sup>尽管他有时还说他想说明为什么现存财产权意味着正义,<sup>59</sup>但是他从未做过。相反,他反复声明现存财产关系的正当性。例如,在以上引文之后第11页,他写道:“财产的

主要特征是公平和理性或正当。”<sup>60</sup> 第二,他假定整个经济完全由相对缺乏势力的小企业组成,满足完全竞争条件。尽管他认识到“自由竞争原理并非总是适用……[于]垄断”。<sup>61</sup> 但是他的一般均衡分析完全忽视了垄断。只是在这种分析之后,以及该书倒数第二章,他用几页的篇幅讨论了垄断。他从未考虑过将垄断分析结合于一般均衡分析之中。第三,假定存在可度量的边际效用表。他完全没有考虑这些效用表是怎么来的以及如何随时间而变化,而只是假定在所考察的时期内,“各方效用保持不变”。<sup>62</sup> 因此,效用被当作抽象给定的最基本事实,其他所有现象都由此加以解释。

瓦尔拉的确承认人们的效用表随时间而变化,但是,他假定当这种变化发生时,这只不过是一个新的但本质上相同的问题——即需要为一个不同的时期找到一个一般均衡解。这远不是单纯的分析上的简化。瓦尔拉为市场资本主义辩护的功利主义理念建立在均衡价格准确反映人们的需要或效用,从而人们的满足实现最大化的结论之上。

如果考虑到需求是社会决定的,而且还会不断地变化,效用论的保守理念将会失效。这些可能性导致了用以判断需求本身更高标准的问题——这是功利主义从未考虑过的一个问题。无怪乎他断言:“任何交换价值,一旦确立,便具有自然现象的性质,其起源,从表象到实质,都是自然的。”<sup>63</sup> 相反,劳动价值论强调价格的社会性。

设定现存所有权分配,完全竞争市场,抽象给定的不变效用表之后,瓦尔拉建立方程组说明各种商品的成交量及其价格的确定。他假定有  $n$  种生产性服务,  $m$  种消费品,  $n$  个生产性服务价格,  $m-1$  个消费品价格[其中一种商品被当作“计价单位”(numeraire),其价格已定义为 1]。可见,有  $m+n$  个交换生产性服务和消费品数量,  $m+n-1$  个成交价格,因变量的总数目为  $2m+2n-1$ 。

瓦尔拉建立了四组方程以求解他的因变量值。

在第一组中,每种生产性服务的供给取决于所有生产性服务和消费品的价格。这就得到了  $n$  个方程,它将每一生产性服务的供给量与系统中所有价格联系起来。每个方程的具体形式取决于生产性服务所有者的边际效用表。在每个  $m+n-1$  个价格的组合上,它们能够进行充分计算,以准确确定出售多少生产性服务以购买消费品,从而实现效用最大化。由此可见,任何生产性服务所有者在每个价格组合上都对应一个意愿供给量。联系每种要素供给量和价格组合,都有一个独立方程。

在第二组中,每种消费品需求都依赖于  $m+n-1$  个价格。这就得到  $m$  个方程。其推导与第一组方程类似。生产性服务所有者出卖服务以购买消费品,效用最大化完全确定在每个可能价格组合条件下的服务供给量和消费品购买量。

在第三组中,每种生产服务需求等于其供给,以实现经济均衡。资源充分利用被当作均衡条件。每种生产服务给出一个方程(使供给等于需求)。

在第四组中,瓦尔拉确信完全竞争假定将确保每种消费品的价格必须等于其生产成本。生产成本取决于生产的“技术系数”(或生产的技术内含)和生产性服务的价格。

至此,瓦尔拉得到了  $2m+2n$  个方程——第二组和第四组方程分别有  $m$  个,第一组和第三组分别有  $n$  个——以求解  $2m+2n-1$  个未知量。在下面几段,我们将讨论什么是所谓“瓦尔拉定律”,它表明如果除某个市场之外其他市场皆处于均衡,那么这个市场本身必然也处于均衡。这意味着瓦尔拉的方程组中有 1 个不是独立的,因为如果其他方程同时满足,该方程也就自动满足。因此,他最后得到  $2m+2n-1$  个独立方程——与需要求解的未知量个数相同。

瓦尔拉定律实际上是一个定义恒等式。它表明对于任意给定的一组价格,所有交易物品的总需求必定等于其供给。它由供给和需求的定义而得到,因为在任意一组价格之下,交易需求本义即意味着需要获得某物(需求),而这又必须放弃等值的另一物(供给)。可见,每一个别需求同时就是等量的供给,而这些个别需求和供给分别加总,其总量必定相等。瓦尔拉(其措词“提供”对应于我们的“供给”)以下列方式表述该原理:

某种商品的有效需求和提供分别等于与其交换的另一种商品的按相对价格计算的有效提供和需求……的确,在两种商品交换的情况下,需求应当看作基本事实,而提供是附带的。没有人会为提供而提供。提供某种物品的惟一理由是只有如此才能满足需求。提供只不过是需求引起的。<sup>64</sup>

瓦尔拉定律的真实性显然是由定义确定的。然而,很多萨伊定律的拥护者似乎混淆了这两个定律。萨伊定律意味着存在对所有新生产商品的需求。这并不能从瓦尔拉定律得到。人们可能生产以换取一定数量已有的某种资产,如货币。在现有价格组合之下,货币存量可能不能满足人们需要。此时将出现新生产产品的超额供给,这正好对应货币的超额需求。这就出现了商品的普遍“过剩”(使用马尔萨斯的术语),尽管瓦尔拉定律依然成立。事实上,在任意一组价格之下,即使每一个别商品市场偏离均衡,瓦尔拉定律总是成立的。

但是瓦尔拉定律是有意义的,尽管这仅仅是定义上的。它表明在任何非均衡情况下,超额需求总量(包括需求超过供给的所有市场)必定恰好等于超额供给总量(包括供给超过需求的所有市场)。它告诉我们,如果某种商品存在超额供给,那么,必定有一种以上的其他商品出现超额需求,而总体上超额需求和超额供给等值。但是要记住,该定律不仅包括本期生产的物品,还包括货币、证券,总之已经存在的所有交易资产。

我们至此明白了为什么可以去掉瓦尔拉方程组中的一个方程。如果某个市场偏离均衡,那么要使得超额需求等于超额供给,一个或多个其他市场必定也偏离均衡。由此可见,如果除了一个市场之外,其他市场皆处于均衡,那么该市场也必定处于均衡。因此,给出所有市场均衡条件的方程组中有一个方程是多余的。

要通过分析方程组深刻领会一般均衡的真正含义是很困难的,如果仅仅摆弄  $2m+2n-1$  个方程(特别当数目很大时)更是如此。因此,我们将以图形给出一个简单的三种商品

一般均衡模型。这将有助于表明一般均衡模型的实质,并且以此引出如下问题:当经济系统初始处于非均衡状态时,均衡如何实现或者为何不能实现。我们的模型没有区分生产性服务和消费品。这只是一个交换——而非生产——模型,其中有一种商品充当计量单位。共有5个未知量——三种商品  $a$ 、 $b$  和  $c$  的成交量,及以一般等价物  $c$  表现的  $a$  的价格  $P_a$  和  $b$  的价格  $P_b$ 。

我们的方程是:

$$\begin{aligned} ED_b &= 0 \\ ED_a &= f(P_a, P_b) \end{aligned} \quad (10.1)$$

也就是说,  $a$  的超额需求  $ED_a$  取决于  $P_a$ 、 $P_b$  两个价格。这只是说明,在任何一组价格水平下,  $a$  的市场可能出现三种情况:  $ED_a = 0$ , 也就是,  $a$  的供给等于需求;  $ED_a > 0$ , 即需求超过供给;或者,  $ED_a < 0$ , 即需求小于供给;负的超额需求相当于超额供给。

$$ED_b = f(P_a, P_b) \quad (10.2)$$

即  $b$  的超额需求  $ED_b$  取决于两个价格  $P_a$ 、 $P_b$ ;为商品  $a$  给出的函数的含义同样适用于商品  $b$  和  $c$ 。

$$ED_c = f(P_a, P_b) \quad (10.3)$$

即  $c$  的超额需求  $ED_c$  同样取决于两个价格  $P_a$ 、 $P_b$ 。

$$ED_a = 0 \quad (10.4)$$

即作为均衡条件,  $a$  的超额需求必须为零。

$$ED_b = 0 \quad (10.5)$$

商品  $b$  满足同样的均衡条件。

至此,我们有了5个未知数和5个方程。瓦尔拉定律保证如果  $a$  和  $b$  处于均衡,那么  $c$  也处于均衡。我们本来是有8个未知数和8个方程——未知数为两个价格和每种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实际上,方程 10.1、10.2 和 10.3 都结合了供给和需求方程。这样结合是因为在均衡状态下,任何商品的供给等于需求,且都等于成交量。

我们现在可以利用局部均衡分析中简单供给和需求曲线说明一般均衡。做法如下:在  $a$  的市场上,给定  $b$  的价格,构造  $a$  的供给和需求曲线,它显示  $a$  在不同价格水平下的供给量和需求量。我们然后给定  $b$  的不同价格水平,这就得到  $a$  的完全不同的供给和需求曲线。如果不断改变  $b$  的价格水平,就能得到  $a$  的一组供给和需求曲线。这些曲线,连同背后  $b$  的不同价格水平,给出了隐含于方程 10.1 中的信息。对于  $b$  的任何价格水平,就有  $a$  的一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在  $a$  的某个特定价格水平上,两曲线相交;在  $a$  的该价格水平以及给定的  $b$  的价格水平上,方程 10.4 满足。 $b$  的给定价格水平以及对应的  $a$  的价格水平,构成满足方程 10.4——即使得  $a$  的供给和需求相等的一组价格。如果改变  $b$  的价格,又得到满足方程 10.4 的另一组价格。

图 10.2 说明了前面的分析。第一组供给和需求曲线(实线)是在给定  $b$  的价格水平

$P_{b1}$ 之下构造出来的,第二组曲线(虚线)对应  $b$  的价格  $P_{b2}$ 。

从图 10.2(a)可知,对应  $b$  的价格  $P_{b1}$ ,供给和需求均衡得到  $a$  的均衡价格  $P_{a1}$ 。类似地,对应  $b$  的价格  $P_{b2}$ 又得到  $a$  的均衡价格  $P_{a2}$ 。这就得到满足方程 10.4 的两组  $a$  和  $b$  的价格。如果重复以上过程,就能得到一系列满足方程 10.4 的价格组合。图 10.2(b)给出了满足方程 10.4 的所有价格组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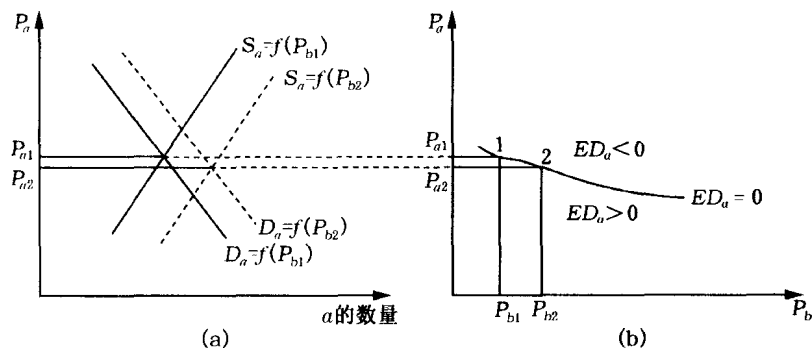


图 10.2 商品  $a$  供求均衡时的价格

标有  $ED_a=0$  的曲线是满足方程 10.4 的所有点的轨迹。(b)图显示了  $a$  的价格(纵轴)和  $b$  的价格(横轴)。 $ED_a=0$  线上任意一点给出使  $a$  的供给等于需求的两个价格。该线上的点 1 对应(a)图中的第一组供给和需求曲线(实线),而今点 2 对应图(a)中的第二组供给和需求曲线(虚线)。

对于图 10.2(b),还需要说明一点:平面上处于  $ED_a=0$  线右上方向的所有点对应的价格组合,将导致对  $a$  负的超额需求(或超额供给)。左下方向的点对应的价格组合,将导致超额需求(或负的超额供给)。

图 10.3 是针对商品  $b$  的同样的分析。图(a)和(b)的关系与图 10.2 原理相同。图 10.4 将图 10.2 和图 10.3 中的(b)部分结合起来。这里可以看到使两种商品供求均衡的所有价格组合。我们看到,只有价格  $\bar{P}_a$  和  $\bar{P}_b$  使得两个市场同时均衡。不在  $ED=0$  线上的所有点分为四个区域。各个区域中的点所满足的  $a$  和  $b$  的超额需求情况全部标注在图 10.4 的右方。

根据图 10.4 的信息和瓦尔拉定律,还能够构造一条曲线,它给出使  $c$  的超额需求为零的所有价格组合。首先,按照瓦尔拉定律,在点  $(\bar{P}_a, \bar{P}_b)$  处,既然  $a$  和  $b$  的零超额需求线相交,也必定满足  $ED_c=0$ 。我们不需要一个对应商品  $c$  均衡的方程(在一般均衡体系的原有 5 个方程组中),因为如果所有其他商品处于均衡,那么商品  $c$  也必定处于均衡。 $c$  处于非均衡意味着其他两个市场至少有一个处于非均衡,因为瓦尔拉定律要求总供给等于总需求。可见,点  $(\bar{P}_a, \bar{P}_b)$  处于  $ED_c=0$  线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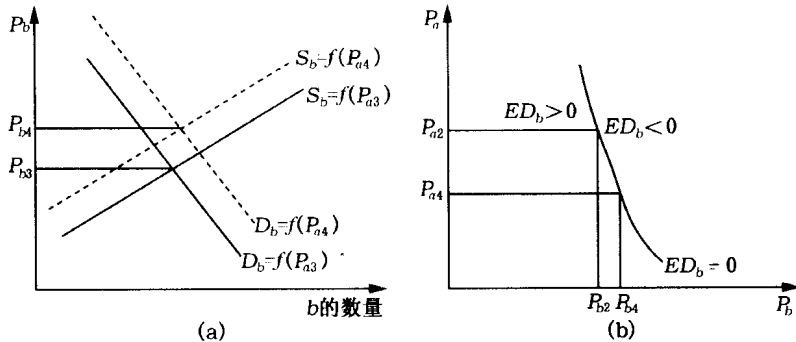


图 10.3 商品  $b$  供求均衡时的价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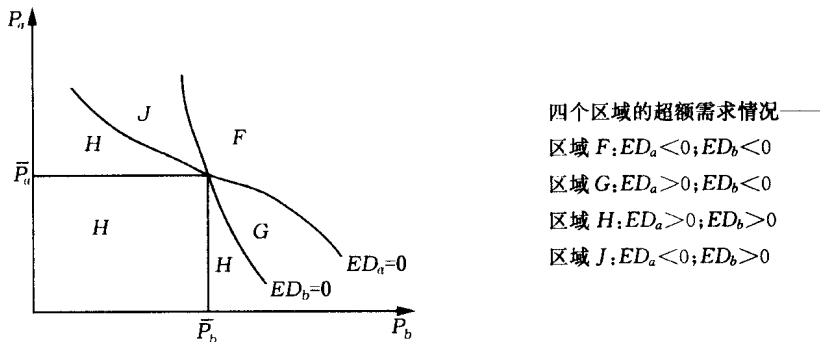


图 10.4  $a$  和  $b$  市场均衡和四个非均衡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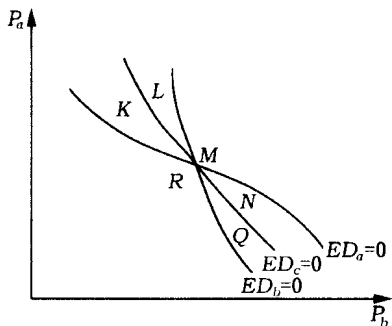
然而,一定还存在其他满足  $ED_c = 0$  的价格组合,所有这些价格组合点构成  $ED_c = 0$  线。我们知道,在任何异于  $(\bar{P}_a, \bar{P}_b)$  的价格组合处, $a$  和  $b$  市场至少有一个是非均衡的(因为  $\bar{P}_a$  和  $\bar{P}_b$  是保证  $a$  和  $b$  两个市场同时均衡的惟一价格组合)。因此,在  $ED_c = 0$  线上异于  $(\bar{P}_a, \bar{P}_b)$  的所有点上, $c$  市场均衡的同时, $a$  和  $b$  两个市场都是非均衡的(因为根据瓦尔拉定律,仅仅一个市场处于非均衡是不可能的)。

进一步说,根据瓦尔拉定律可知,在  $ED_c = 0$  线上异于  $(\bar{P}_a, \bar{P}_b)$  的所有点上, $a$  和  $b$  市场的非均衡正好相互抵消,以保证总需求等于总供给。因此,在  $ED_c = 0$  线上的任何点处,如果  $ED_a > 0$ ,那么必定有  $ED_b < 0$ ,而且  $a$  的超额需求量一定等于  $b$  的负超额需求量(超额供给)。类似地,如果  $ED_a < 0$ ,那么必定有  $ED_b > 0$ ,而且超额需求量和超额供给量一定相等。

回过头来考察图 10.4 可知, $ED_c = 0$  线不可能经过区域  $F$  和  $H$ ,因为在这两个区域, $a$  和  $b$  市场同时出现超额供给(区域  $F$ )或超额需求(区域  $H$ )。只有在区域  $J$  和  $G$ ,才可能出现  $c$  市场均衡,而  $a$  和  $b$  两市场的非均衡相互抵消。

因此,找出  $J$  区域中满足  $a$  的超额供给正好等于  $b$  的超额需求的所有价格组合,和  $G$  区域中满足  $a$  的超额需求正好等于  $b$  的超额供给的所有价格组合,这些点便构成  $ED_c=0$  线。

图 10.5 给出了三种商品的均衡价格组合线。价格组合  $\bar{P}_a$  和  $\bar{P}_b$  使三个市场同时均衡。因此,这就是一般均衡价格。原有的五个未知数已经求出两个。然后,根据供给和需求曲线[图 10.2 和 10.3 中(a)部分],就能准确得到每种商品的成交量。我们没有说明商品  $c$  的供给和需求曲线。它们与商品  $a$  和  $b$  的情况完全相同,只有一个区别:因为  $c$  被确定为一般等价物(其价格因而恒等于 1),我们可以设定  $c$  的供给和需求曲线依赖于  $a$  的价格,此时  $b$  的价格是给定的(然后变动  $b$  的价格水平,得到不同的供给和需求曲线),或者设定  $c$  的供给和需求曲线依赖于  $b$  的价格,此时  $a$  的价格是给定的(然后变动  $a$  的价格水平,得到不同的供给和需求曲线)。两种方法将得到同样的结果。



六个区域的超额需求情况——

区域 M:  $ED_a < 0; ED_b < 0; ED_c > 0$

区域 N:  $ED_a > 0; ED_b < 0; ED_c > 0$

区域 Q:  $ED_a > 0; ED_b < 0; ED_c < 0$

区域 R:  $ED_a > 0; ED_b > 0; ED_c < 0$

区域 K:  $ED_a < 0; ED_b > 0; ED_c < 0$

区域 L:  $ED_a < 0; ED_b > 0; ED_c > 0$

图 10.5  $a$ 、 $b$  和  $c$  市场均衡和六个非均衡区域

这样,从 5 个未知数和 5 个方程开始,我们已经知道怎样确定每种商品的价格和成交量的均衡解。从简单的三种商品一般均衡模型的繁琐推导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分析大量消费品和生产性服务价格和成交量的一般均衡理论的复杂性。

图 10.5 给出了三条零超额需求线。这三条线将空间分为六个区域。在图 10.5 的右方,列出了全部区域的超额需求情况。

## 一般均衡的稳定性

一般均衡理论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市场力量是否自动矫正非均衡,即当一组非均衡价格出现时,市场供求力量是否自动改变价格直到建立均衡。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这种过程需要多长时间,以及会导致什么成本和代价。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学者的政策取向,边沁(在他后来的著作中)、马尔萨斯、马

克思、霍布森和凯恩斯等认为依赖市场会导致巨大的成本,因此应当采取措施降低这类成本(尽管他们提出了不同的方案)。而萨伊、李嘉图、西尼尔、巴斯夏和几乎所有新古典经济学家都相信市场调整的灵活有效性是完全靠得住的。

回过头来考察图 10.5,假定商品  $c$  为货币,那么在区域  $M$  的所有点上,所有消费品过剩——所有的消费品市场存在超额供给(相应地存在超额货币需求)。这种状况是如何产生的呢?从马尔萨斯和萨伊直到现在的经济学家们给出了不同的答案。瓦尔拉坚定地站在萨伊和其他完全自由放任拥护者一边,认为市场会自动而相对无成本地产生适当的充分就业均衡价格。

瓦尔拉将市场实现均衡描述为一个“摸索”的过程。在他对该问题的大多数讨论中,他假定经济开始时处于均衡,然后受到某种商品需求变化的干扰。<sup>65</sup>他总是假定超额需求将立刻引起价格上升,超额供给立刻引起价格下降。此等价格变化将自动重建均衡。或者通过改变人们的意愿购买量,或者通过企业从超额供给部门转移到超额需求部门实现资源重新配置:“价格的上下调整以及企业在亏损行业和盈利行业的有效转移也就是摸索求解方程的方法。”<sup>66</sup>

瓦尔拉的分析存在几个问题(至今尚未完全解决)。首先,我们看到,他的思想结论以完全竞争假定为基础。而在新古典完全竞争模型中,每个厂商都是价格接受者。价格首先在市场上得以建立,然后厂商对此作出反应。那么新的价格是如何确定的呢?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瓦尔拉假定有一个宣布价格的“拍卖者”:

在组织完善的竞争性市场上,买卖通过拍卖完成……拍卖者作为代理人组织交易,其中交易条件是完全公开的,卖者和买者有机会降价和提价。<sup>67</sup>

然而,瓦尔拉设计的拍卖者是不充分的。假定拍卖者宣布一组价格,然后开始交易。如果该组价格不是均衡水平,那么很多市场上会出现超额需求和供给。接着拍卖者宣布下一组价格,这时我们会发现每一位参与者都试图在新的价格水平下实现均衡,与此同时他们又试图矫正因前面宣布的不当价格而产生的错误。除非纯属偶然,否则新的价格组合仍然是非均衡的。所有新的交易以及对过往错误的矫正又形成新一轮错误。所有交易者错上加错,因而市场状况似乎更倾向于远离均衡而不是趋于均衡。

瓦尔拉只有两个选择:或者拍卖者是万能的(即上帝),事前知道均衡价格组合;或者拍卖者相当于拥有很多高速计算机的社会主义中央计划机构。在后一种情况下,拍卖者宣布一组价格后,每个参与者提出在该组价格水平下的意愿购买量和销售量。参与者等待中央计划机构将这些数据输入计算机,统计出每个市场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如果某些市场存在潜在超额需求,拍卖者便提高相应的价格。类似地,降低存在潜在超额供给市场上的价格。这一摸索过程一直延续到拍卖者找到均衡价格组合,此时才真正开始交易。

尽管不喜欢社会主义,瓦尔拉选定拍卖者和中央计划机构模式以解决所谓“市场无政府状态”(用社会主义者的说法):

所有这些物品和服务的价格或交换比例随机提出之后……交易各方将供给那些他认为在相应价格下相对过多的物品或服务,而需求他认为相对太少的物品或服务……。这种方式确定了每件物品的有效需求量及供给量,需求超过供给的那些物品的价格将上升,供给超过需求的那些物品的价格将下降。这时新的价格被提出来,交易各方又供给和需求另一数量。价格继续调整直到每种物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相等。此时价格就是实际均衡价格,而且(只有此时)交易才真正发生。<sup>68</sup>

瓦尔拉当然认识到这种拍卖者并不存在。但是他相信——从来都只是相信——市场实际运行类似于此。瓦尔拉信念中的一个问题(但绝不是最坏的问题)是任一价格改变不仅影响该种物品的供求,还会影响大量其他市场。因此,假定除两个市场之外,其他市场处于均衡。在这两个市场中,一个存在超额需求,另一个存在等量的超额供给。按照瓦尔拉的推理,超额需求市场的价格上升,超额供给市场的价格下降。如果影响仅限于这两个市场,而且供给和需求曲线具有如瓦尔拉所论证的形状,还有如果对于非均衡的仅有反应也如瓦尔拉所设定的那样,那么市场的确会实现一般均衡。

但是,这些“如果”必须被放弃。首先,瓦尔拉一般均衡分析的基本要点是表明任一市场的价格变化影响大量其他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可见,当两个价格开始变化时,许多其他供给和需求曲线将移动[如图 10.2 和图 10.3 的(a)部分所示]。这种初始非均衡将渗透到许多市场。其他价格开始改变,几乎所有供给和需求曲线又开始移动。因此,两个市场的非均衡可以迅速演变为所有市场的非均衡。那么,怎样才能确立均衡呢?

瓦尔拉摆脱困境的方法是假定一定价格变化主要影响该种商品市场。它对其他市场的影响是次要的。他还提出了以下看法:“如果市场上有很多商品,那么,相对于主要影响而言,这些次要影响是不显著的。”<sup>69</sup>

瓦尔拉的跟随者论证了如果瓦尔拉的假定即次要影响足够小,那么,市场的确能够达到均衡。但是他们从未证明次要影响的确很小。

此外,瓦尔拉的其他假定也是很成问题的。他假定因为经济是完全竞争的,相对弱小的企业在超额供给的情况下总是降低价格。然而经验告诉我们,有势力的大企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价格,在面临被视为暂时性的超额供给情况下,倾向于减产以维持价格水平。这种产出减少会降低收入水平,而这又将进一步减少对其他产品的需求。如果生产者对超额供给的反应都是减产,那么,普遍的过剩,即经济危机或萧条将是不可避免的。

此外,瓦尔拉假定所有交易者都会对任一组价格作出反应,就好像这是一组能够维持的均衡价格。同样,经验表明交易者的行为准则通常不是如此,而是在预期未来价格的基础上进行交易。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表明,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这些预期经常

使得不能实现充分就业的一般均衡。

由此可知,瓦尔拉、关于市场自动建立充分就业一般均衡的信念就同萨伊一样只是纯粹的信念——两人的信念在理论和经验上都没有得到证明。

瓦尔拉的一般均衡框架在过去和现在都是重要的。如果我们摒弃他的关于市场自动调整的不现实假定,他的市场相互关联体系表明资本主义体系要实现充分均衡是何等困难。该理论还表明,一旦出现危机,它将如何蔓延到经济各部门而形成普遍的危机或萧条。瓦尔拉的一般均衡模型是分析自由市场的最好的理论工具。许多消费不足论者如果在类似于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框架之下构建其理论的话,就可以避免许多逻辑和理论错误。因此,瓦尔拉一般均衡理论必须看作是经济思想史上最重要的理论成就之一。该理论能够很容易地撇开瓦尔拉关于市场自动调整的天真假定和他的保守的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辩护的功利主义信念。

### 瓦尔拉对资本主义的辩护

瓦尔拉与从萨伊和西尼尔开始直到现在的几乎所有遵循效用论传统的经济学者有一些共同之处。首先,他基本上只是从交换的角度考察经济。即使涉及生产时,他也与大多数效用论者一样,将生产视为一系列交换,而从没有重视生产中的阶级关系。因此,他的分析停留在马克思所谓的流通领域。

瓦尔拉无视生产过程中的阶级关系,这一点在他对企业家的分析中看得最清楚。生产性服务有三种:资本、土地和劳动。这些服务的所有权结构假设已给定。每个人都是效用最大化者,向企业家售卖一定量生产服务,以便购买消费品——整个过程只不过是交换实现效用最大化。企业家完全按照生产性服务在生产中的贡献补偿这些服务。利息、地租和工资分别是资本、土地和劳动的报酬。均衡时,这些生产性报酬刚好耗尽全部产品价值;不存在剩余价值和利润;只有出现非均衡时才产生利润(而这又对应经济系统另外某个地方等量的损失)。

按照这种观点,谁成为企业家纯粹是偶然的。企业家可能是资本家,他补偿劳动和土地服务,自己拥有的剩余(在均衡时)正好等于其资本的利息。同样,企业家也可以是劳动者,他补偿资本和土地服务,自己获得的剩余正好等于其劳动服务的工资。与此类似,企业家还可以是地主或者拥有一定量各种生产服务的所有者。由于均衡利润为零,谁是企业家并不重要:“因此,在生产均衡状态之下,企业家既没有利润也没有损失。他们不是靠作为企业家,而是作为自己或别人企业中的土地所有者、劳动者或资本家而生存。”<sup>70</sup>

可见,所有个人都只不过是拥有各种可交换物初始“禀赋”的效用最大化交换者。亨利·福特(Henry Ford)与他生产流水线上最贫穷、收入最低的工人之间没有什么差别,

二者都是最大化交换者,生产只是某种交换。这就是瓦尔拉理论的精华,它在现代经济学界仍有大量拥护者。

巴斯夏曾声称“政治经济学就是交换”。瓦尔拉发展了比巴斯夏精细和复杂得多的理论,得到了同样的结论:

可见,两种商品在完全竞争市场上的相互交换可以使商品所有者之一或者二者获得最大可能的欲望满足,这与两种商品在市场上按统一价格买卖是一样的。

社会财富理论的主要目的是推广这一命题,首先说明它不仅适用于两种商品的相互交换,而且适用于多种商品的相互交换,然后说明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它还适用于生产。社会财富生产理论的主要目的是说明农业、工业和商业组织原理可以从以上命题推导出来。因此,我们可以说,该命题涵盖了全部理论与应用经济学。<sup>71</sup>

他的整本书都是类似的表述。例如在有一处,他断言:“真正的经济学者都知道交换理论……正是整个经济学大厦的基础。”<sup>72</sup>

同西尼尔、巴斯夏和几乎所有新古典经济学家一样,瓦尔拉认为他看到了伦理价值与科学之间的明确差异。他使读者确信,他的作品是不受任何价值判断影响的纯科学。在《纲要》的第一章,他声称:“的确,科学的本质特征是绝不带着结论——不论好坏——去发掘真理。”<sup>73</sup>同西尼尔、巴斯夏和几乎所有新古典经济学家一样,瓦尔拉也只是部分履行他的主张。在下一页,他很快说明“纯科学”是相对于有争议的社会问题而言的:“众所周知……在过去行会、贸易管制和价格刚性体制下,产业停滞不前。显然,在现代自由企业和贸易这种不同的体制下,产业繁荣昌盛。”<sup>74</sup>

基本问题是社会主义者不了解资本主义慈善、繁荣和和谐的特征。以前的经济学家倡导和维护放任资本主义,在反对社会主义者的主张方面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但遗憾的是,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正确维护却不适当地以瓦尔拉的思想为基础。例如,在批判重农主义者时,他认为:“特别深刻和准确的观点与错误混杂在一起……具有深远意义的观点(之一)表明除非在能够证明其合理的例外情况下自由竞争是财富生产的最佳规则。”<sup>75</sup>

在讨论他自己的利息理论较“英国学派”(他指李嘉图和穆勒)的优势时,瓦尔拉写道:“利息理论……一直是社会主义者偏爱的一个靶子;经济学家的反驳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充分的说服力。”<sup>76</sup>类似地,在同情地批判 J. B. 萨伊及其追随者时,他写道:“这种观点在与社会主义者的论战中特别有用……可惜,尽管很方便,但是它是错误的。”<sup>77</sup>

瓦尔拉在反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时的立场再次体现在下面一段话中:

我们建立的方程确实说明了自由生产(瓦尔拉意指资本主义)是优越的一般法则。自由在一定限度内保证效用最大化……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更倾向于以放任观念作为反对社会主义者的工具,而不是关心怎样证明这种观念。<sup>78</sup>

最后,瓦尔拉肯定了其“寻求绝对真理”的作用。在讨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时,他写道:

伦理学和经济学的关系是1848年左右蒲鲁东和巴斯夏等人热议的问题。在《经济矛盾论》一书中,蒲鲁东提出正义和物质福利(瓦尔拉喻指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矛盾。巴斯夏在《经济和谐论》一书中持相反的观点。我认为他们都没有证明自己的观点。我赞成巴斯夏的观点,但论证方式不一样。<sup>79</sup>

瓦尔拉《纲要》的很多内容精密地论证了巴斯夏的观点: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自由交易使总效用实现最大,而且因此,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是最理想的世界。

从假定“财产所有权……与正义是一致的”出发<sup>80</sup>,瓦尔拉开始证明经济学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交易问题:“在遵循自由竞争规则的市场中的商品相互交换过程,能够使所有商品所有者获得需求的最大满足。”<sup>81</sup>

这一观点在瓦尔拉的《纲要》中以不同形式出现了不下二十次。显然,瓦尔拉相信竞争资本主义必定最大化社会福利,而且这完全是从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的“绝对真理”前提下得到的推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瓦尔拉作品的某些段落中对其自己的功利主义进行了道德批判。瓦尔拉以下一段表述与边沁“如果得到的快乐量相等,针戏就和诗歌一样好”的提法类似:

从其他角度看,一种药物是被医生需要用于治疗病人,还是被谋杀者用于谋杀他的家人,这是很严肃的问题,但是,从我们的意义上说,这是完全没有区别的。在我们所涉及的范围,药物在两种情况下都是有用的,而且可能在后一种情况下更有用。<sup>82</sup>

因此,按照效用论的观点,如果所有药物被用于谋杀家人而完全没有被用于治疗病人,总社会满足也可以实现最大。瓦尔拉本可以按照边沁的逻辑,说明牛奶用于富人香浴比穷困的父母满足嗷嗷待哺的婴儿能够贡献更大的社会福利。

### 新古典边际主义小结

本章开头,我们指出产业集中时期新古典边际主义第一次获得了重大发展(19世纪70年代早期)。在19世纪最后三十年,产业集中加速发展,新古典边际主义(首先由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创立)开始完全支配了经济学中的正统保守传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中的相应变化与经济学中边际主义的出现不可能是完全无关的。

在产业革命的起始阶段(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产业资本家同地主阶级和商业资本家为经济和政治统治权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这一时期,产业资本家通常亲自参与指导、协调和监督实际生产过程。他们奋斗的关键目标是快速积累工业资

本,思考的主要问题是理解资本积累的源泉。劳动价值论观点给出了关于资本积累过程的一种最有用的见解,尤其是区分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它表明,生产性劳动是剩余劳动的源泉,而后者又使得资本扩张成为可能。可见,劳动价值论在其形成最早期反映了产业资本家的利益,有利于满足他们的客观需要。

在同一时期,商业资本家和地主通过所有权和市场交易获得收入。他们的权益最需要倡导资本和土地私有、赞美交易导致社会福利的经济理论。马尔萨斯、萨伊和西尼尔著作中所反映的交易或效用观点最符合他们的利益。

随着公司的兴起,作为产业化的主要形式和本章开头所描述的产业集中的发展,产业资本积累的性质和产业资本家的作用都发生着重大的变化。积累趋于系统化、制度化和规范化。越来越多的经理被雇来指导和监督工业企业,并且自动地将利润转化为持续的积累过程。单个资本企业家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日趋淡化。

产业资本所有者的社会经济作用越来越类似于地主阶级。利润和利息日益成为纯粹所有权的收益。因此,产业资本所有者的理论意识趋同于地主和商业资本家。他们都偏爱一种提倡所有权和赞美交易经济好处的理论。

所以,在马克思著作中的劳动价值论反映工人阶级利益的同时,效用论或市场理论开始服从于生产资料(包括土地、商业资本、金融资本或工业资本)所有者阶级的利益。

个人作为新古典边际主义所描述的理性计算最大化者,从来没有完全反映资本主义社会大多数人的行为。大多数工人在家庭中生活成长,其消费模式被常规化和标准化以适应这个社会。例如,如果他们一贯消费的一种商品的价格大幅上涨,由于购买力有限,他们的消费结构势必做出调整。但是,大多数工人从来就完全不了解什么理性计算边际效用、比较效用比与价格比,以及调整购买结构以达到“快乐最大”。

然而,个人作为理性计算最大化者,通过边际买卖不断寻求最大化的这种观点的确很好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经济中一种人的行为:拥有丰富资产组合的纯粹所有者。这种人拥有大量股票、债券、土地及其他资产,完全凭借所有权获取收入。他们通过专业交易经纪人不断地买卖股票、转换长短期债券、从边际上调整资产,试图总是理性地计算出能够使收入流或资产价值增长率达到最大的资产组合。这种人在边际主义那里得到了最好的描述,即新古典边际主义终于得出了最符合这种人利益的意识形态结论。

#### 注 释

1. William Stanley Jevons,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2d ed., ed. R. D. Collison Black (Baltimore: Penguin, 1970).
2. Carl Menger,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New York: Free Press, 1950).
3. Leon Walras, *Elements of Pure Economics* (Homewood, IL: Irwin, 1954).
4. William Stanley Jevons, *Letters and Journal of W. Stanley Jevons*, ed. Harriet A. Jevons



(London: Macmillan 1886), p. 151.

5. Jevons,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p. 55.
6. 同上,第44页。
7. 同上,第77页。
8. 同上,第127页。
9. 同上,第101~102页。
10. 同上,第101页。
11. 同上,第111页。
12. 杰文斯使用了与此处不同的符号。但是,他的公式含义与此处相同(参见同上,第142~143页)。我们使用标准现代形式的方程以免读者混淆。
13. 同上,第44页。
14. 同上,第52页。
15. 同上,第85页。
16. William Stanley Jevons, *The State in Relation to Labour* (London: Macmillan, 1882), p. 98.
17. 同上,第104页。
18. Jevons,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pp. 68~69.
19. 同上,第173页。
20. 同上,第256页。
21. 同上,第257~258页。
22. Jevons, *State in Relation to Labour*, p. 127.
23. William Stanley Jevons, *Methods of Social Reform and Other Papers* (London: Macmillan, 1883), p. 108.
24. Jevons,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p. 126.
25. 同上,第257页。
26. 同上,第225页。
27. 同上,第72页。
28. 同上,第101页。
29. 同上,第103页。
30. Jevons, *Methods of Social Reform*, p. 196.
31. 引自 John Maynard Keynes, *Essays in Biography* (London: Macmillan, 1933), pp. 126~27.
32. Carl Menger, *Problems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3).
33. Menger,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p. 127.
34. 同上。
35. 同上,第5章。
36. 同上,第222~225页。
37. 同上,第80~87页。

38. 同上,第 85 页。
39. 同上,第 150 页。
40. 同上,第 149 页。
41. 同上,第 156 页。
42. 同上,第 164~165 页。
43. 同上,第 161 页。
44. 同上,第 75 页。
45. 同上,第 76 页。
46. 同上,第 97 页。
47. 同上,第 173~174 页。
48. Menger, *Problems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p. 237.
49. 同上,第 194 页。
50. 同上,第 195 页。
51. 同上,第 194 页。
52. 同上,第 91 页。
53. 同上,第 230 页。
54. 同上,第 91~91 页。
55. Menger, *Problems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p. 174.
56. 同上,第 174 页。
57. Walras, *Elements of Pure Economics*, p. 42.
58. 同上,第 67 页。
59. 同上,第 75、80 页。
60. 同上,第 78 页。
61. 同上,第 115~117 页。
62. 同上,第 117 页。
63. 同上,第 69 页。
64. 同上,第 89 页。
65. 同上,第 146~147 页,第 178~179 页。
66. 同上,第 44 页。
67. 同上,第 83~84 页。
68. 同上,第 179 页。
69. 同上。
70. 同上,第 225 页。
71. 同上,第 143 页;最后一句话改为斜体。
72. 同上,第 44 页。
73. 同上,第 52 页。
74. 同上,第 53 页。

75. 同上,第 396~397 页。
76. 同上,第 422 页。
77. 同上,第 54~55 页。
78. 同上,第 256 页。
79. 同上,第 79~80 页。
80. 同上,第 67 页。
81. 同上,第 173 页。
82. 同上,第 65 页。

# 第 11 章 新古典厂商和收入分配

## 理论：马歇尔、克拉克和 庞巴维克的著作

直到整个经济的运行像传统中所想象和定义的那样，完全表现为理性的、计算效用最大化行为的结果之后，经济理论中关于效用的概念才得以完整。在这种视角下，经济运行的过程聚焦于家庭和厂商。这些点之间存在着连续不断的循环流动。首先，是经济学中所称的“实物流”。家庭被看作是“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和最终消费品的消费者。基于对自身边际效用的计算，他们决定了向厂商出售各种不同数量的生产要素以及购买不同数量的消费品。因此，实物流就成为从家庭到厂商的使用生产要素的流动，以及从厂商到家庭的消费品的反向流动。

第二个是“货币流”。家庭从出售生产要素的使用中获得货币收入。之后，这些货币又作为家庭购买消费品的支出回到厂商手中。厂商做出理性的、计算的、使其效用最大化的决定，其决策方式与家庭的极为相似。

然而，购买消费品所获得的效用减去出售生产要素所放弃的效用之后有一剩余，家庭努力使这一剩余效用最大化。同样，出售消费品所获得的货币收入与支付生产要素所需的货币之间也有一个差额，厂商就力图使这个差额最大化。因此，家庭成为实物流的焦点，而效用成为理性最大化的产物。同样，厂商是货币流的焦点，利润成为理性最大化的产物。因为最大化理论在数学逻辑上同样不考虑投入的用途，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厂商和家庭的分析是高度相似的。

## 马歇尔对效用理论和需求理论的贡献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原为数学家,后转而研究经济学,成为经济学家。他在剑桥大学教授经济学长达数十年之久。尽管早在19世纪70年代马歇尔便已发展出并开始传授自己大部分的思想,但直到19世纪90年代他才出版了一部完整的著作。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逐渐代替了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成为使用英语教学大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科教科书。直到目前为止,马歇尔关于新古典理论的许多论述依旧在高等院校的新古典微观理论的教学占据支配地位。

尽管马歇尔无疑比穆勒更为保守,但通常人们都认为马歇尔在思想方面更贴近穆勒,而远离西尼尔、萨伊和巴斯夏。新古典经济学考虑制定一些较小的变革来促使经济体系运行得更为顺畅,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们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拥护,而马歇尔正是20世纪新古典主义传统的奠基人。

由于在之前的章节里已经讨论了效用理论,我们将把马歇尔对效用理论所作贡献的讨论局限在他超越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的那些领域。与后三位理论家一样,马歇尔明确阐述了边际效用递减的概念以及通过交换实现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必要条件。杰文斯和门格尔都无法成功地将效用理论和需求理论直接联系在一起。尽管瓦尔拉做到了,但马歇尔却更胜一筹。他从边际效用递减的概念中严格地推导出了当代新古典需求理论的结论。

马歇尔运用以下方法推导出了斜率为负的需求曲线:首先,和所有的效用论者一样,马歇尔假定在分析期间个人的边际效用表是不变的。他写道:“我们假定,没有时间允许消费者性格或偏好发生任何改变。”<sup>1</sup> 我们已经指出了这一前提对新古典经济学背后的伦理理论的重要性,也是马歇尔推导需求曲线一个必要的前提假设。然后,他假定一个人的货币边际效用是给定的,并且在分析期内不变。通过设定固定的货币边际效用,马歇尔发现了效用表和价格表之间的关系。

例如,如果一个人认为1美元有2个“效用单位”的边际效用,增加一块面包会为这个人带来4个单位的效用,而增加1磅牛排带来6个单位的效用。那么他或她就愿意花2美元(即4个效用单位)买一块面包,或者花3美元(即6个效用单位)买1磅牛排。再增加1块面包的效用会下降至2个效用单位,而牛排的变成3个。在此情况下,他或她就愿意花1美元(2个效用单位)再买1块面包,或者花1.5美元(3个效用单位)再买1磅牛排。这是因为“货币的边际效用对他是一个固定的数量,因此,他愿为两样商品所付出的价格比率,刚好是那两样商品的效用的比率”<sup>2</sup>。

从这里马歇尔推出了个人的需求表。任意商品的总需求曲线只是单个需求曲线的简

单加总。“如果其他情况不变,在普遍使用中的某样商品的价格每有下跌,不论怎样轻微,也将增加它的总销售。”<sup>3</sup>

“其他情况不变”这句话非常重要。尽管马歇尔简要地讨论了一般均衡的必要条件,但是他的大部分理论都是对一两种商品市场进行局部均衡分析,而忽略了市场之间以及其他所有商品市场之间的内在联系。

除了阐述从效用表到需求表的推导过程,马歇尔还定义并详细阐述了“需求价格弹性”<sup>4</sup>的概念,定义并讨论了“消费者剩余”<sup>5</sup>的概念,并展示了在特殊情况下如何产生一条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sup>6</sup>如果我们关注于描述现代新古典主义分析每个细节的起源,就需要解释这些概念。但这并不是我们的目标,因而解释也就不必要了,建议感兴趣的读者参考相应的教材。<sup>7</sup>

因此,马歇尔拓展了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的观点,对家庭实现效用最大化过程的一半进行了阐释。家庭最大化问题的另外一半则与生产要素的出售有关。在三种传统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中——马歇尔认为只有劳动和资本的供给具有负效用,或者说反效用。他关于地租的讨论基本上与李嘉图和穆勒的理论是一致的。地租是基于土地肥力不同而产生的剩余,并不包含社会成本。<sup>8</sup>和在其他情况下一样,马歇尔对所有收入权利的捍卫表现得并不像马尔萨斯、萨伊、西尼尔、巴斯夏以及其他大多数新古典经济学家那样彻底或极端。

在出售劳动和资本服务的过程中,家庭不得不对效用进行计算。在陈述了原理的一些前提条件后,马歇尔宣称出售劳动时,通常有一个点,超过它时“劳动的边际反效用总是随着劳动量的增加而增大”<sup>9</sup>。增加的劳动反效用可能

由于身体或精神的疲劳,或是由于在有碍健康的环境中继续劳动,或是由于与不受欢迎的同事一同工作,或是由于占用了娱乐、社会或智力活动所需的时间。但是,不论这种负商品(discommodity)的形态如何,它的强度差不多总是随着劳动的紧张和持续而增大的。<sup>10</sup>

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明白劳动是生产的社会成本,从西尼尔开始,保守的经济学家们据理力争;资本家的节欲也包含着相似的社会成本和相似的负效用。马歇尔基本同意了西尼尔的观点,但对这一概念的含义却明显存有困惑:

卡尔·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在研究由罗斯柴尔德男爵(Baron Rothschild)的节欲所产生的财富积累时,觉得很可笑,他们把这种节欲与一个劳动者的奢费对比,后者以每星期七先令收入养活七口之家,他依靠他的全部收入为生,毫不实行经济上的节欲。<sup>11</sup>

马歇尔希望用“等待”(waiting)一词来代替“节欲”(abstinence),以避免这种困惑:

照人类本性的现状来看,我们有理由说,资本的利息是享受物质资源的等待所含有的

牺牲之报酬,因为,如果没有报酬,很少人会大量储蓄;正像我们说工资是劳动的报酬是一样的,因为如果没有报酬,很少人会努力工作。

为了将来而牺牲现在的快乐,经济学家把这种牺牲称为“节欲”。但是,这个名词被误解了:因为财富的最大积累者是非常富有的人,其中有些人过着奢侈的生活,当然不会按照这个名词的同义语“节俭”的意义实行节欲的。经济学家的意思是说,当一个人节制在他消费能力以内的任何东西的消费,目的在于增加他的将来的资源时,他对这一特殊消费行为的节制,就增加了财富的积累。这个名词既然易为人误解,我们还是不用的好,我们说,财富积累一般是享乐的延期或等待的结果。<sup>12</sup>

因此,在马歇尔对家庭的分析中,人们总是考虑进行合理的交换,以使得劳动带来的痛苦最小化或是避免因获得来自于消费品的快乐而进行等待。这样做的话,“他们努力调整他们的减少额,以使总的效用损失达到最低限度”。<sup>13</sup>劳动者也进行同样的效用计算,决定忍受多少痛苦的工作,而资本家则决定忍受多久的痛苦等待。“一个谨慎的人会努力把他的财产分配于一切不同的用途——现在的和将来的,以使他的财产在每一用途上都有相同的边际效用。”<sup>14</sup>因而,效用最大化的计算掌控着从家庭部门到厂商部门的劳动和资本服务的实物流,以及从厂商部门到家庭部门的消费品实物流。为了理解货币流,需要考察厂商的利润最大化行为。

### 新古典家庭理论和厂商理论的对称性

由于任何商品都存在其他可供替代的商品,所以新古典理论认为通过调整出售和购买商品的边际数量来达到效用最大化是可以实现的。消费者购买商品只是因为它们可以提供效用。在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消费者可以从无数商品中的任意一种中获得效用。如果一种特定商品的价格上升,消费者从其身上获得效用的成本就会上升。因为效用被认为在质量上是相似的(这与边沁的观点相同,但同穆勒的相反),消费者惟一要考虑的就是不同商品所产生的边际效用的大小以及这些商品的成本。因此,当一种商品的成本上升时,消费者就会用一定数量的其他商品部分代替对这种更为昂贵商品的消费。通过这种方法,他减少了对边际效用成本相对较高商品的购买,增加了对效用成本较少的其他商品的购买。所以价格升高之后,由于提供效用之商品的可替代性,通过出售和购买的变化会重新回到效用最大化的状态(即  $MU_a/P_a = MU_b/P_b$ , 且对所有商品适用)。

在表述厂商理论时,为了使其最大化问题类似于家庭的最大化问题,我们有必要把生产要素和消费品看成是同质的,把由这些要素生产出的产品销售收入看作是和效用同质的。家庭在为支付消费品的成本而出售生产要素服务的过程中放弃了效用,而消费品又

产生效用。消费这些商品所带来的效用与为获得这些商品而必须支付成本所损失的效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额,家庭力图将这一差额最大化。

马歇尔据此认为,对厂商而言问题也是如此。厂商也要将销售商品所带来的货币收入与支付生产所需的生产要素的货币成本之间的差额最大化;也就是说,它要实现最大化利润。厂商购买生产要素,通过生产畅销商品,为自己创造利润。如果在创造利润的过程中生产要素是可替代的,如同在产生效用的过程中消费品是可替代的一样,那么厂商的最大化问题在本质上同家庭的就是是一样的。

但是,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都曾假设在生产的过程中生产技术系数是不变的。也就是说,他们所假定的固定生产技术意味着一个“处方”,这个处方规定了生产中所使用的不同生产要素的比率是固定的。他们通常忽视用一种要素来代替另一种要素而改变生产要素比例的可能性(尽管李嘉图曾断言当劣地被用于耕种时,人们就会在更加肥沃的土地上通过增加单位土地面积上的资本和劳动数量来精耕细作)。

门格尔也假定生产技术系数是固定不变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假定生产要素是互补的原因,也是他一度无法解释每种生产要素在市场上是如何被定价的原因。在瓦尔拉的著作《纲要》的前两版中,他也假定生产技术系数不变。直到《纲要》的第三版(于1896年出版),瓦尔拉才引入了因相对价格变化导致一种要素代替另一种要素而引起的生产要素比例变化的可能性。

因此,马歇尔对效用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引入了两个密切相关的概念:

第一,企业家通过使用一种要素(factor)——马歇尔有时用 agent 替代 factor——代替另一种要素来降低生产成本:

每个企业家都根据他的精力和才能不断地力图了解他所使用的每种生产要素的相对效率,和可能用来代替它们中间某些要素的其他要素的相对效率。<sup>15</sup>

他对他所用的那些生产要素所支付的价格总额,照例是小于他对那些可用来替代它们的别组要素所必须支付的价格总额。<sup>16</sup>

第二,当厂商相对于另一种要素(例如资本)提高一种要素(例如劳动)的使用量时,第一种要素(劳动)的每一相同增量所带来的总量增加值,在超过某一点时,会从数量上开始递减:“任何生产要素的边际使用这一概念,意味着由于它的使用递加而有报酬递减的可能趋势。”<sup>17</sup>

对厂商来说,生产要素的可替代性与家庭消费品的可替代性是同质的。同样,生产要素使用增加而收益递减的规律与商品消费增加而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也是同质的。从马歇尔开始,厂商最大化理论和家庭最大化理论在分析上就几乎是一致的。

厂商购买投入品并出售产品,试图将投入成本与产出收益之间的差额最大化。因而厂商最大化的问题就可从两个方面考虑:产出或者投入。从前者看,厂商会研究销售不同



数量的产品的价格,之后计算销售的总收入,每单位产品的平均收入,以及产品的微小增加或减少所带来的边际收入。同样,厂商也可以计算生产的总成本,每单位产出的平均成本,以及产量的微小增加或减少所产生的边际成本。从厂商的投入看,它会计算由一种要素生产的总产品的销售收入,每单位要素的平均产出值,以及要素数量的微小增加或减少带来的产量的增加值或减少值。同样,它也会考察购买要素的总成本,每单位要素的平均成本,以及购买要素数量的微小增加或减少所带来的边际成本。

从产出角度考察厂商最大化的问题通常是和当代经济学文献中的厂商理论联系在一起的。马歇尔在这方面的分析随后成为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的基础。因此我们将从这一角度来研究马歇尔对厂商利润最大化行为所做的说明。

从投入角度考察厂商最大化问题成为新古典收入分配理论的基础。这个理论——即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其中一部分是由马歇尔发展的。关于这一理论更进一步的表述则由英国的威克斯第德(P. H. Wicksteed)和美国的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分别独立完成。在简要说明马歇尔分配理论中不足之处的本质后,我们将着手研究克拉克的理论。最后我们将考察克拉克与庞巴维克关于资本定义的差别(直到目前为止,这个差别在新古典理论中依然十分重要)。

## 马歇尔的厂商理论

马歇尔对厂商的分析是其价格决定机制分析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价格由供给和需求决定。需求由消费者的效用表决定,而供给则由厂商的成本表决定。尽管马歇尔简要地讨论了特殊商品销售中的垄断现象,《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分析一个由众多竞争性厂商组成的行业的状况。由于竞争的存在,一种商品的价格是由整个行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决定的。典型的厂商将视价格为固定的(我们稍后讨论例外情况),并调整产出和成本以使利润最大化。

马歇尔的理论描述了在竞争行业中所所谓的“代表性企业”(representative firm)。代表性企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普通的企业”。<sup>18</sup>它没有特别的优势或者缺点,因而它的生产成本反映了这个行业中各种厂商的平均成本。他的分析建立在对三个阶段的区分上。首先,在“市场阶段”,供给固定而价格完全取决于与固定供给相关的需求强度。第二,在“短期”中,资本(或者是一种要素的生产能力,或者是其他的生产工具)是固定的,通过调整与这些生产工具相关联的劳动的数量可以增加或减少供给。第三,在“长期”中,增加或减少资本和劳动可以改变供给。在这个期间可以扩充任意数量的生产工具。

在马歇尔的分析中,“市场阶段”相对不重要,所以我们将讨论局限在厂商的短期和长期行为上。在讨论中,假定厂商拥有众多的竞争者,以至于自己既无法影响投入价格也无

法影响产出价格。

### 短期厂商的生产和成本曲线

在短期中,厂商生产设备的规模是固定的。因此它只能通过雇佣更多或更少的工人来增加或者减少产量。但是工厂(我们将假定厂商是一个制造业厂商)是建立在固定生产技术基础上的。因此,当厂商雇佣了当初设定的工人人数时,每个工人的平均产出就最大化了。厂商可以改变劳动对资本的比例(或者是雇佣的工人数量),但是这种改变会影响工人的平均劳动生产率。这就意味着尽管劳动和资本是可替代的,但它们不是完全可替代的。因此,当资本家雇佣了更多的劳动时,他或她将会达到工厂设计时的最有效率运行状态(也就是说,在这一点上工人的单位产出是最大的);超过这一点,工人的单位产出就会下降。

图 11.1 阐明了所谓的可变比例法则,或者说可变生产要素收益递减法则。<sup>19</sup> 劳动的边际产出( $MP_L$ )线表明了在不同就业水平下雇佣最后一个工人带来的总产出的增加量。劳动的平均产出( $AP_L$ )线表明了不同就业水平下每个工人的平均产出。如果企业从毫无生产的状态开始,劳动的边际产出就会增加直到厂商雇佣了图中  $L_0$  的工人数。超过了这个点后,随着工人人数的增多,劳动的边际产出就会下降。只要  $MP_L$  高于  $AP_L$ , 劳动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就会增加。如果厂商雇佣了图 11.1 中  $L_1$  描述的工人数时,劳动的平均产出是最大的(图中  $O_1$  的位置)。如果它雇佣了更多的劳动者,  $MP_L$  就会低于  $AP_L$ , 劳动的平均产出就开始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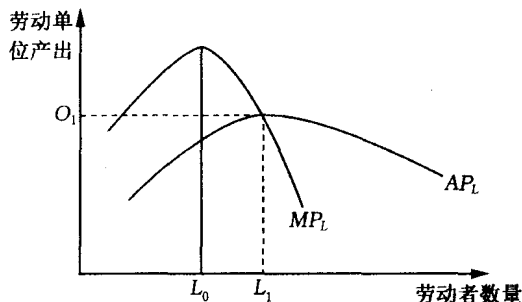


图 11.1 可变比例法则

当厂商计算不同产出水平下的平均生产成本时,它的成本曲线似乎是图 11.1 描述的产出曲线的一个倒影。只要工人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在增加,单位产出中所包含的劳动数量就会减少。因此,图 11.1 中厂商单位产出的平均可变成本(或者是平均劳动成本,直到

目前为止我们假定在短期中劳动是唯一的可变要素)持续下降直到雇用了  $L_1$  数量的劳动。如果它雇用了高于那一点的劳动,它的平均可变成本就会增加(反映了工人的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因为假定在短期中厂商的资本是固定的,那么它的资本成本也就是固定的。当厂商雇用更多的劳动、扩大产出时,单位产出的平均固定成本就会持续下降,这是因为固定成本总量相同,产出的数量却扩大了。厂商的平均成本是其平均可变成本和平均固定成本的简单加总。

厂商的成本曲线如图 11.2 所示。产出  $Y_1$  对应的是图 11.1 中的工人平均产出  $O_1$  ( $Y_1$  是图中  $O_1$  乘以工人数量  $L_1$ )。在  $Y_1$  平均可变成本是最小的,在  $Y_2$  平均成本是最小的。通常  $Y_2$  代表的产量高于  $Y_1$ ,因为平均可变成本最小化后,降低的平均固定成本会抵消上升的平均可变成本,产出就会小幅地扩大。产出超过  $Y_2$  点,上升的平均可变成本会抵消下降的平均固定成本,因此,随着产出超过  $Y_2$  点,平均成本就会持续增加。边际成本不断下降直到产出达到  $Y_0$ ,这与图 11.1 中  $L_0$  劳动力的产量相对应,超过这一点之后,它就不断上升。边际成本曲线与平均成本曲线和平均可变成本曲线的最低点相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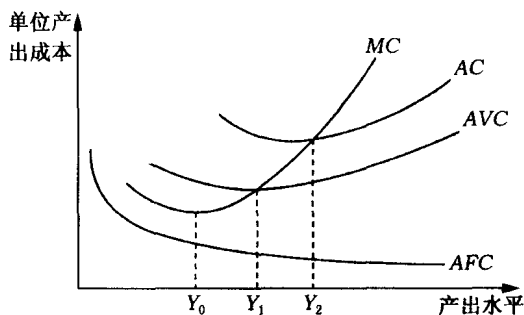


图 11.2 厂商成本曲线

### 短期均衡

厂商在价格(由市场所决定)等于边际成本上生产产品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如果它在较低的水平上生产,生产的扩大会增加利润,因为额外产出的价格会超过其边际成本。如果它超过这个水平生产,额外产出的边际成本会超过它的价格。因此,边际成本曲线表明了在各种市场价格下的竞争性企业利润最大化时供给量,也就是厂商的供给曲线。

图 11.3 表示一个行业的供给曲线(是行业中每个厂商的边际成本曲线之和)和需求曲线(由消费者的效用图决定)。图 11.3(a)表明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点决定了市场价格。图 11.3(b)表明代表性企业的短期均衡。市场产出当然会比代表性企业的产出高

出许多倍。图 11.3 用大写的  $Q$  表示市场产出,小写的  $\bar{q}$  表示厂商产出,表明产出由不同的单位计量(例如, $Q$  或许是吨, $\bar{q}$  则是磅)。

对代表性企业来说,市场价格等于它的边际成本。这并不意味着代表性企业在均衡时无任何利润。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家坚持认为资本的正常或平均利润率是企业资本成本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而这个利润可以归于平均成本(作为平均固定成本的组成部分)。行业中的任何一个厂商的成本如果高于代表性企业的成本,利润就会低于正常水平。如果成本比代表性企业的低,利润就会高于正常水平,或者说超额利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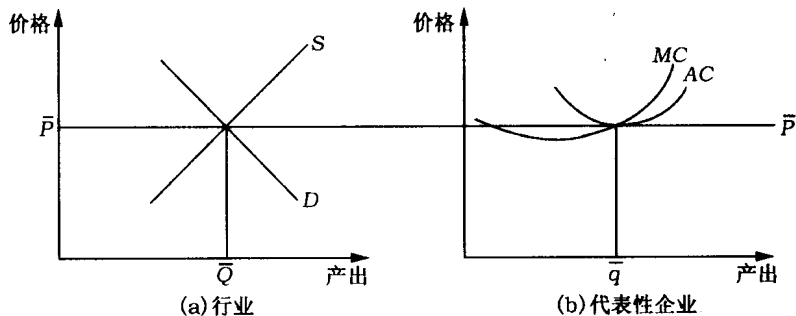


图 11.3 行业及其代表性企业的短期均衡

马歇尔相信,后一类的厂商之所以具有更低的成本是因为它们享有其他厂商所没有的某种自然优势。因此他将这些超额利润称为“准地租”(quasi-rents),称它们和优等地的所有者所收取的“李嘉图地租”类似。但在长期均衡中,这些准地租会被合并到厂商的成本曲线中成为普通的租金成本,而每个厂商最终只会得到正常水平的利润率。

### 长期和竞争问题

在马歇尔的长期分析中,所有的生产要素都是可变的,所有的成本都是可变成本,所有的准地租都消失了。长期均衡同图 11.3 所示的代表性企业的短期均衡类似,能为一切行业中的所有竞争性厂商获得。而图 11.3 所示的均衡与长期均衡主要的区别在于后者的厂商规模或者说厂商生产能力已经被调整至生产效率的最优状态。

马歇尔的均衡法展示了“看不见的手”的支持者们自斯密以来就一直争论的问题:竞争不仅使所有厂商的利润率均等化,也使得生产成本最小化(也就是说,生产效率最大化),结果消费者能够以最低的价格购买所有的商品——这个价格刚好包含了生产中必要的社会成本,任何阶级都没有剩余,无法剥削其他阶级。马歇尔确实解释了他所谓的“消费者剩余”(consumer's surplus)和“生产者剩余”(producer's surplus)。然而,这些概念

与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著作中的经济剩余概念毫无共同之处。他们只是将效用经济学所有理论中的普通观点重述一遍。比较特别的是他们展示了收益——在效用方面——所有交换者通过交换得到的将超过他们无法交换时的效用。就像厂商均衡理论一样,马歇尔的剩余理论只是表明他所相信的竞争交换过程具有内在的“普遍优势”和社会和谐。

而马歇尔在他的长期分析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所有生产要素成比例的变化究竟引起产出同比例、少于该比例还是高于该比例的变化。常理性的结论是(就同从早先到现在的许多经济学家的结论一样):所有投入按一定比例增加会引起产出相应地按比例的增加(即规模收益不变的情况,此时生产规模扩张但平均成本不变)。如果是这种情况,在马歇尔的长期均衡中就不存在关于任何特定规模厂商的基本经济原理(即生产效率)。效用经济学家的著作对竞争的强调,似乎表明了他们或许偏爱对厂商规模进行立法限制用以维持竞争——特别是考虑到19世纪后半期发生的经济集中化趋势。

然而,马歇尔并不认为规模报酬不变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马歇尔继承李嘉图的理论,认为在生产过程中当土地或自然资源比较重要时,就存在规模报酬递减的趋势(或长期中递增的平均成本)。但是当资本和劳动力成为生产中的基本要素时,马歇尔认为就会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的趋势(或长期中递减的平均成本)。他得出结论:“自然在生产上所起的作用表现出报酬递减的倾向,而人类所起的作用则表现出报酬递增的倾向。”<sup>20</sup>

规模变大带来的效率增加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是马歇尔所说的“内部经济”(internal economies)。规模的内部经济是厂商组织结构升级的结果:“劳动和资本的增加,一般导致组织的改进,而组织的改进增大劳动和资本的使用效率。”<sup>21</sup>效率增加的第二个来源是马歇尔所说的“外部经济”(external economies)。外部经济归因于由其他厂商产出和定价机制所自然产生的益处。作为规模的外部经济的例子,“马歇尔讨论了工业区位的好处,以及紧密相关的辅助产业和纺织业的好处”。<sup>22</sup>

马歇尔外部经济的概念(与外部不经济的概念密切相关)在新古典福利经济学中越来越重要。对此,我们将在之后的章节中进行讨论。外部经济在马歇尔分析中的重要性通过下面的引文清晰表达了出来:

本篇的一般论断表明以下两点:第一,任何货物的总生产量之增加,一般会增大这样一个代表性企业的规模,因而就会增加它所有的内部经济;第二,总生产量的增加,常会增加它所获得的外部经济,因而使它能花费在比例上较以前为少的劳动和代价来制造货物。<sup>23</sup>

因此,在制造业部门中,效率更高的大规模生产将必然导致垄断。马歇尔的理论似乎将引出下述结论:首先,他可能放弃功利主义的一般观点(即竞争性市场中看不见的手会协调各种利益,使社会效用最大化)并且在强调巨型垄断公司的社会优势的基础上为资本主义辩护。第二,他可能会争辩:竞争的社会优势比大规模生产的生产效率的社会优势更

加重要；因此，他或许会支持经济中大量的政府干预，这些干预旨在瓦解大公司并强制它们走向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而在这种市场结构中，由于法律限制了公司的规模，从而导致了生产的无效率。第三，他或许会接受马克思的观点，即竞争无可避免地导致产业集中，而资本主义政府会促进而不是阻碍这种趋势，因此，提倡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以此作为利用大规模生产提高效率的惟一可能的方式。

然而，马歇尔并不愿意接受这些现实可能结论中的任何一种。像穆勒一样，他想要保留与“看不见的手”相符的功利主义思想。同时，他也拒绝下述观点，即将改善穷人状况的惟一希望寄托于促进富人对自身物质利益的利己主义追求（该观点被马尔萨斯、西尼尔及大多数持有极端自由放任观点和功利主义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所支持）。因此，同穆勒一样，马歇尔将某些道德和社会哲学原理吸收进了他的理论体系之中，这一点不足为奇。但这些理论同他的功利主义原理并不十分吻合。

### 马歇尔对资本主义的辩护

马歇尔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思想辩护是建立在吸收社会达尔文主义重要因素的基础之上的。与同时代的美国学者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一个彻底的进化论者——不同，马歇尔并没有意识到功利主义社会伦理与经济理论的演变方法是完全不相容的。

马歇尔开始“考虑下一法则在经济学上的主要意义：生存竞争使最适合于从环境中获得利益的有机体增多”。<sup>24</sup>他从演变方法中得出的主要结论体现在《原理》扉页的一句拉丁文上：“Natura non facit satum”（自然界是不能飞跃的）。人类所有的进步，都是很缓慢的，只有通过微小的边际变化才会发生。试图快速改变社会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如果付诸实践也只会带来悲剧。社会进步通常是一个种族或民族有遗传特点的渐进过程。“这种遗传性的影响在社会组织中表现得最为显著。因为，社会组织必然是发展缓慢的，而且是许多代的产物：它的发展必须根据大多数人的不能迅速变化的风俗和癖好。”<sup>25</sup>

在社会制度的缓慢演变中，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或许从表面上频繁地表现出剥削性。但是这种社会结构的长期存在就证明了，在那个时代和环境下，其积极进步的特征会盖过其他任何缺点：

在古代……为世界进步先驱的一切国家，差不多都采取多少是严格的社会阶级制度；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社会阶级的区分是非常适合于它的环境，而大体上它加强了采取阶级制度的民族或国家。因为它既是生活的一个支配的因素，如果它所发生的影响大体上是不利的，则采取阶级制度的国家一般就不能胜过别的国家了。这些国家的卓越成就并不是证明阶级制度没有缺点，而是证明它的优越性——与那个进步的特定阶级相比——

超过它的缺点。<sup>26</sup>

他相信,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表面上资本主义体系是阶级制度的“鲜明对比”。然而,它也展现了“与社会阶级制度具有显著的相似之处”。<sup>27</sup>同时马歇尔坚持认为“马克思对苦难者的深切同情,永远会博得我们的敬意”,<sup>28</sup>但他相信:“个人在关于物质财富的生产上为社会紧急之事的牺牲,在有些方面,似乎像是一种隔代遗传的情况,又回到古代在阶级制度统治下所盛行的状况。”<sup>29</sup>但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如同在阶级制度下一样,现存社会结构的益处远远超过了它的缺点。

事实上,近代经济学的创始者,差不多都是性情温和、富有同情心和为人道的热诚所感动的人。他们很少关心为自己谋取财富;他们却很关心财富在大多数人之中的广泛的分布情况。反社会的垄断虽然是强有力的,但他们也是反对的。在几代之中,他们都支持反对阶级立法的运动,这种立法不许工会享有雇主团体所享有的那些特权;或者他们设法医治旧的救贫法灌输到农业及其他劳动者心中和他们的家庭的毒素;或者他们拥护工厂法案,而不顾有些政客和雇主假借他们的名义竭力反对。他们毫无例外地致力于这样的信念:全体人民的福利应当是一切私人努力和公共政策的最终目的。但是,在勇气和谨慎方面他们是坚强的,看起来是冷静的,因为他们不愿担负提倡向没有人走过的道路急速前进的责任,而对这种道路安全的惟一保证就是人们具有信心的希望,他们的想象力是丰富的,但既不受知识的限制,也不受艰苦思想的训练。

所以,我们应当注意:细心的经济研究的倾向,并不是以任何抽象的原则作为私有财产权的根据,而是以这样的观察为根据的:在过去私有财产权与切实的进步是分不开的;因此,谨慎地和尝试进行废除或改变即使对社会生活的理想情况似乎是不适当的那些权利,是负责的人应做的事。<sup>30</sup>

什么是社会主义者无法理解的最重要的原理以及从哪些方面对他们进行“艰苦思想的训练”呢?那就是“看不见的手”的原理:

如果一个人具有经营企业的天赋,他肯定会为了人类的福利而使用这个天分:他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会引起其他人提供资本,因为他会回以最好的价值;他自身的利益会引导他为员工中的每一个人安排他们最合适的工作,而不是其他;他会购买和使用所有的设备和生产辅助用品,这些在他的手上对满足世界需求的贡献会超过它们的成本。

自然组织的原理比其他原理包含了更多的人类最重要的真理,后者不去理解那些没有足够的研究但却讨论严重的社会问题的人们:是对热心和细心的想法的奇异幻想。<sup>31</sup>

那么,这种“热心和细心的想法”是如何使马歇尔将关于大规模公司拥有更高效率的信条与关于“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需要完全竞争的观点相协调的呢?这是马歇尔为棘手的难题,因为他承认拥有巨型的成长型企业的资本家“能够将胜过其竞争对手的优势迅速

扩大”，而且“上述情况就会继续下去……[直到]他和其他一两个像他这样的人，就可瓜分他所经营的那个工业部门的全部分支了”。<sup>32</sup>

马歇尔关于自然组织的生命周期演变理论再一次拯救了他。他坚持认为：“当森林中的小树向上挣扎摆脱大树的阴影时，我们应该从它们身上学到经验。”尽管那些更高、位置更好的树“能得到较多的阳光和空气，但它也逐渐失去生命力”。<sup>33</sup>

树是这样的，企业也是如此：

大自然以限制私人企业创办人的寿命，甚至以对他的生命中最能发挥其才能的那一部分限制得更严，来压制私人企业。因此，不久之后，企业的管理权就落到即使对企业的繁荣同样积极关心、但精力和创造的天才都较差的那些人手中了。如果这企业变为股份公司组织，则它可以保持分工以及专门的技术和机械上的利益；如果再增加资本的话，它甚至可以增大这些利益；并且在有利的条件下，它在生产工作上就可以保持永久和突出的地位。但是，恐怕它已丧失伸缩性和进步的力量如此之多，以致在与新兴的较小对手竞争时，它不再完全处于有利地位了。<sup>34</sup>

在马歇尔看来行业就像森林。树不断地成长和死亡，企业也是如此；企业“一方面的衰退必然为另一方面的成长所抵消而有余”，从而拯救了自己关于完全竞争永恒性的信条。<sup>35</sup>

在马歇尔看来，大企业的生产效率也不是阻止工人转化为资本家的力量。他宣称，在资本主义中，“阶级的社会关系，以及个人在他的阶级内的地位，过去是为传统的规则所明确地规定，而现在是可以改变的，并且随着当代的变化情况而改变它们的形式”。<sup>36</sup>在回应社会主义者所认为的工人阶级与生产方式的分离会导致工人的相对弱势和资本家的强势时，马歇尔写道：

在说到工人上升到可充分发挥他的经营能力的地位之困难时，主要的着重点通常是放在他缺乏资本方面；但这一点常不是他的主要困难。例如，分配合作社积累了大量资本，而他觉得这项资本难以得到很大的利率；他很愿意把这资本借给任何一类能处理困难的经营管理的问题的人。如果合作者第一具有高级经营能力和正直，第二具有在他的同事中对于这些品质享有很大声誉的“个人资本”，则他在创办大企业所需的足够的物质资本上，就不会有困难；真正的困难倒是在于使他周围的许多人，相信他具有这些难能可贵的品质。如果一个人力图从平常的来源中得到创办企业所需的资本之贷款，情况也是差不多的。<sup>37</sup>

如果工人具有适当的道德优点，他们也可以轻易地成为资本家。当今英国资本家的存在，或者至少是他们的祖先之所以会获得他们的地位，是因为他们“采取了一种严格的生活态度：他们不喜欢打断工作的娱乐，对那些只能通过不懈和努力工作才能获得的物质满足具有很高的标准。他们努力生产具有坚固、持久效用的产品”。<sup>38</sup>任何具有这些性格特征的工人都可以成为资本家。



但是马歇尔承认,对工人来说早期资本主义是一个严苛的体制。在这段期间“自由经营发展得既快且猛,它的作用是片面的,对穷人是无情的”。<sup>39</sup>马歇尔让读者放心:对穷人来说,这种残酷的事情幸亏只发生在过去。他相信资本家会逐渐变得可敬、仁慈地关心穷人的疾苦。

在许多其他方面,祸害可以通过对社会在经济上的慷慨捐输的广泛认识而有所减轻。富人对社会福利的热心,可以大大有助于收税人尽量利用富人的资金来为穷人谋福利,并可以消除贫困之害。<sup>40</sup>

马歇尔指出,要“提防那种夸大我们时代的经济灾难”<sup>41</sup>的做法,对于经济上的慷慨捐输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影响社会进步这一点要有足够的耐心。社会进步最终有赖于人性的进步。

但是在几世纪以来的战争、暴力和卑鄙下流的放荡行为中形成的那些人性因素,用一代的时间也是不可能有太大改变的。

现在像往常一样,那些高尚而热心的社会改造家们曾给他们的想象所便于虚构的那种制度下的生活描绘了美丽的图景。但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想象,其之所以不负责任,就在于它从一个虚伪的假设出发,即在新制度下人性将迅速改变,而这种改变在一世纪内,甚至在有利的条件下也是不可企求的。如果人性可以得到这样理想的改造,那么,即使在现存私有财产制度下,经济上的慷慨捐输也会在生活中占统治地位。而源于人类天性的那种私有财产就成为无害的了,同时也成为不必要的了。<sup>42</sup>

当马歇尔谈及某些“卑鄙下流的放荡行为”时,他理所当然地完全放弃了“看不见的手”背后的功利主义前提——他曾宣称“看不见的手”是“人类最重要的真理”。我们先前对威廉·汤普森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理论的讨论表明,区分仁慈、高尚、自私和粗俗行为的社会哲学与功利主义的理论基石是完全矛盾的,在此无须赘述。需要补充的是,这也是关于下述普遍原理的另一个例证,即一个思想者的矛盾通常提供了关于他或她的阶级立场的一个明晰的线索。

### 克拉克和边际生产力分配论

在本章的前部分,我们对新古典边际主义作了两个重要的考察:第一,假设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生产要素具有持续的边际可替代性,新古典厂商理论在分析上与家庭效用最大化理论呈现出对称性。第二,给定要素的可替代性,厂商利润最大化理论既可以从生产和销售的单位产出的收入和费用角度进行考察,也可以从购买和使用的生产投入的费用和

收入角度进行考察。后者构成了新古典收入分配理论的基石。

尽管马歇尔从产出的角度发展了新古典厂商理论,但他在分配理论上的进展却不如约翰·贝茨·克拉克(1847~1938)。这是因为马歇尔在分析生产投入的定价时,他假定生产技术系数不变而没有考察投入品组合比例的边际变化所产生的影响。<sup>43</sup>在讨论生产要素的替代原理时,马歇尔只分析了不同生产技术间的替代性,而没有考察在给定的生产技术下改变投入品之间比例所产生的影响。<sup>44</sup>

然而,克拉克在这里明显提出了劳动和资本的替代原理。他争辩道:“在制造业和运输业里,劳动也可以常常做若干显著的调整,而不变更和劳动一起使用的生产资料的数量或性质。”<sup>45</sup>通过保持资本数量不变改变劳动数量,可以得出不同就业水平下的劳动的边际产品表。通过这个表可以建立一个类似于图 11.1 的劳动边际产品图。如果我们假定某一固定资本数量下劳动的边际产品在劳动增加时不断下降,那么就可以得到图 11.4(a) 中所示  $MP_L$  的曲线。

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资本家必须了解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和劳动的价格。在竞争性行业中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仅仅是边际产品的货币价值,或者说边际产品乘以单位售价。因此,图 11.4(b) 中的  $VMP_L$  曲线只是 11.4(a) 中的  $MP_L$  曲线乘以产品价格。 $VMP_L$  表明,资本家在不同就业水平下多雇佣一个劳动会增加多少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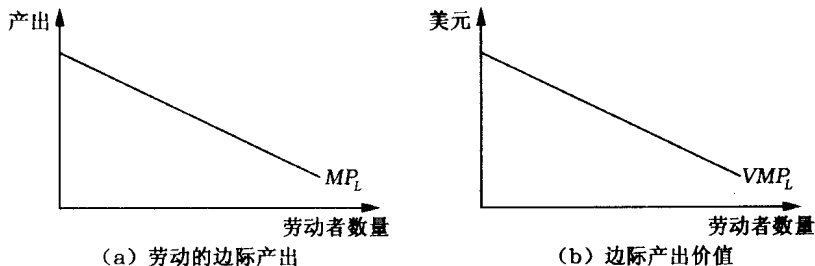


图 11.4 厂商边际产品曲线和边际产品价值曲线\*

对一个竞争性行业中的厂商来说,劳动的价格由整个劳动力市场决定,厂商不论对劳动的价格还是出售产品的价格都没有明显的影响力。图 11.5 表明了(a)中的劳动市场和厂商利润最大化时的劳动就业水平,这种情况在劳动边际产品价值刚好等于由劳动市场所决定的工资率时出现。因此, $VMP_L$  曲线表明在不同的工资率下厂商愿意雇用的劳动数量,也就是说, $VMP_L$  曲线是厂商的劳动需求曲线。因此,接着可以得出劳动的总需求,如图 11.5 (a) 中所示,是所有厂商的  $VMP_L$  曲线的总和。垂直的劳动供给曲线表明,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内,劳动的供给都是由人口规模决定的。

\* 原文图 11.4(a)、(b)中分别为  $MP_1$ 、 $VMP_1$ 。——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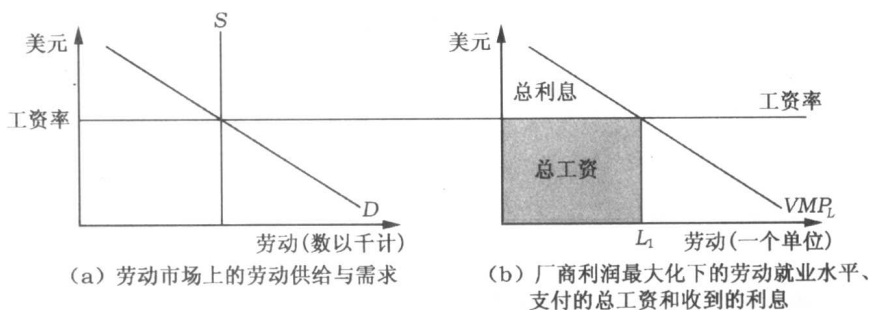


图 11.5 工资率的决定和厂商的劳动就业水平

在图 11.5 中,矩形阴影面积代表厂商支付的总工资(工资率乘以雇用的劳动数量  $L_1$ ),而三角形面积则代表了总利息(支付工资后的总产品价值的剩余部分)。图中所展现的重要的一点是每个厂商都将继续雇用劳动直到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工资为止。这是厂商利润最大化的必要条件。

这是克拉克所得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财富的分配》一书序言的首页开门见山地指出:

本书的目的在于说明社会收入的分配是受着一个自然规律的支配,而这个规律如果能够顺利地发挥作用,那么,每一个生产要素创造多少财富就得到多少财富。尽管工资可以根据人与人之间自由的磋商来调整,但是由自由磋商而产生的工资标准,倾向于和产业中由劳动所生产出来的那一部分产品相等,这是本书的主张。尽管利息也可以根据同样的自由磋商来调整,但利息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和由资本所生产出来的那一部分产品相等。在经济组织中,在产生财产所有权的地方(在那里劳动和资本可以得到将为社会承认的归他们所有的收入),社会处理这种收入的方法,总是依照财产权所根据的原则。如果这个方法没有受到阻碍,那么,每一个人生产多少就得到多少。<sup>46</sup>

因此,克拉克完成了这个从萨伊和西尼尔开始就想要完成的任务,即证明资本家和工人所获得的回报皆基于同一原理。没有剩余也不存在剥削。正如工人一样,资本家获得的回报正是由他们自己所创造的。

如果图 11.5 中的利息看上去是一种剩余,那就是一种错觉,这种错觉基于“资本维持不变,改变劳动即可得到  $MP_L$  曲线”这样的事实。因为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资本和劳动是可替代的,我们可以轻易地维持劳动不变而改变生产中使用资本的数量。除了作为可变生产要素的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图 11.6 和图 11.5 是一样的。

可以看出,在竞争均衡中,如果图 11.5 和图 11.6 包含的总产出是一样的,那么两图中的工资份额和资本份额就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图 11.5 中矩形阴影面积所代表的总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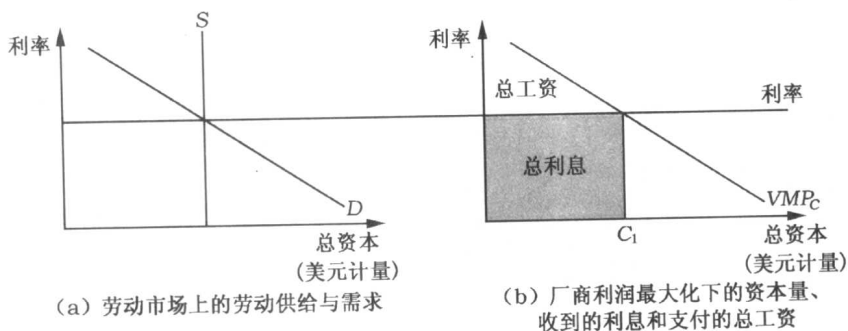


图 11.6 利率的决定和厂商的资本利用水平

资恰好等于图 11.6 中三角形所代表的工资。两个图中的利息也是相等的。

每种要素获得与其边际产品价值相等的收入。尽管克拉克只是假定了这种情况，但是此后的经济学家们严格地证明了在完全竞争市场的均衡条件下，如果每种要素都按其边际产品价值进行支付，那么这些要素的支付会“完全耗尽总产品价值”，绝对没有剥削的可能性。每个人都得到由他的要素所产生的价值，没有剩余供任何人进行剥削。

### 交换经济学和企业家的职能

从交换或效用的角度来看，均衡时不存在利润。工资是劳动贡献的报酬，而利息则是资本贡献的报酬。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完全没有阶级的区别——而这在斯密、李嘉图、汤普森、霍奇斯金、马克思和穆勒的著作中被置于重要的位置之上。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以及马克思曾将利润定义为资本家对所有生产要素进行必要支付后所留下的剩余价值。新古典经济学家保留了利润是超过和高于成本的剩余这一定义。但是在新古典竞争性均衡中，“所有的收入都来自于对生产所需成本的支付。没有剩余，没有过剩，也没有利润”。

新古典经济学是萨伊、西尼尔和巴斯夏传统理论的顶点：“经济学就是交换”。全部的经济过程可以通过以下的情节展现出来：一群利己的、理性的、力图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聚集成家庭，一开始就被赋予了生产要素不可剥夺的私有财产权利。放弃要素的使用就等于牺牲效用。一小部分个人拥有天赋和优势使他们可以成为企业家。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企业家扮演着虚拟的解围人(*deus ex machina*)这一角色，在体系中发挥奇妙却相互矛盾但又绝对必要的功用。

从生产要素的初始禀赋开始，两种动机引发了一系列理性的、追求最大化的交换行

为。首先,家庭要实现效用最大化。他们通过出售要素并买进消费品来实现这一目标,直到出售的每种要素和买进的每种商品边际效用和价格的比率相等时为止。第二,企业家要实现利润最大化。他们通过购买要素和销售消费品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将生产要素组合起来,在生产函数的作用下,这些要素转化为消费品。生产函数支持要素间进行的流畅、连续的替换以至于每种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都是可以确定的。

在竞争均衡中,当企业家按其边际产品价值对各种要素进行支付并以成本销售每单位的产品时,他或她就将利润最大化了。因为要素的支付耗尽了生产出来的价值,要素所有者的收入足以购买所有的消费品。这种循环的过程在不断地发生。每个要素所有者在出售他或她的要素时牺牲的总效用都少于他或她从消费品的购买中所获得的效用。因此,交换使每个人获益,增加了每个人的效用,并保证了公正、合理的利益协调。没有人剥削其他人。每个人都在看不见手的指挥下受益,通过交换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一种完美的、对称的和谐气氛充斥着每个角落,而巴斯夏和克拉克相信只有借助于仁慈的上帝才能解释这个现象。

但是这种分析还需要两个十分重要的解围人(更不必说关于人、生产函数和经济组织的无数不现实的假想,对此我们将会在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章节中进行讨论)出场。我们在对瓦尔拉的观点进行讨论时曾看见过这些解围人,并且几乎在所有的古典分析中他们都再次出现了。第一个是企业家,他们对利润最大化永无止境的追求使得这个体系得以运行,并促使生产要素转化为消费品,从而使效用最大化成为可能。

如果存在关于西绪弗斯\*神话的现代版本,那就是关于企业家的新古典神话。就像我们在瓦尔拉理论中所看到的,企业家是生产的组织者。作为一个没有阶级性的实体,企业家可以是资本家、工人或者地主。如果是一个资本家,企业家仅仅获得了和其他资本家一样的资本利息。如果是一个劳动者或是地主,则和提供同一要素的其他非企业家一样,企业家仅仅获得了工资或租金。当然,真正的企业家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中,而新古典理论中的企业家只是虚构的实体。

这些企业家总是为追逐利润的动机所驱使。但是在新古典竞争性均衡的视野中,利润是不存在的。因此,新古典企业家不断地计划、担忧、购买和销售,追求一个虚构的不真实的幻想。他或她从不知道但却在不断努力追逐着西绪弗斯的目标。用克拉克的话说:

正常的价格是没有利润的价格。正常的价格提供了生产商品所需要的一切劳动的工资,包括监督工场、管理财政、记账收账以及决定事业方针等项劳动的工资。正常的价格也提供了事业上所使用的资本的利息,不管这资本是企业家自己所有,或是向别人借来的。如果价格恰好是正常的,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收入,其原因是:企业家们争着售出商

\* 西绪弗斯(Sisyphus)是希腊神话中的柯林斯国王,被上帝惩罚将一块大石头永无止境地从山下推到山顶。——译者注

品,这就使价格降低为没有利润的价格。<sup>47</sup>

第二个解围人是瓦尔拉所谓的叫卖者(cier)或拍卖者(auctioneer)。没有这个无所不知的拍卖者,新古典经济学家就不可能在一般均衡背景下展示:供给和需求的自由力量是如何自动建立起均衡的正常价格体系的,其中每个人得到的只是由他或她的要素所创造的收入,衰退和非自愿失业将不再成为困扰人们的问题。

因此,一旦私人产权的初始禀赋保证了天赋公正之后,均衡价格由万能的拍卖者建立起来了,神秘的企业家在不断的追逐并不存在的利润,在“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下,每个人都计算着边际效用和价格,希望用1美元含较少效用的商品交换到含较多效用的商品,通过交换实现效用最大化。每个人的利益同其他人的利益都是协调的,每个人都实现了他或她的效用最大化。这就是从交换或效用的观点出发,资本主义机制发挥作用的方式。一些交易者坐着私人司机驾驶的劳斯莱斯车去他们富丽堂皇的30层办公室;而另一些则拿着午餐盒饭,疲惫地前往汽车站;一些人甚至连午餐也没有而挣扎在失业线上。但在这一理论中,这一切都已无关紧要。

### 克拉克对私有财产的辩护

“看不见的手”的福音是建立在下述基础之上的相信现行的法律和私有财产的分配是公平和公正的。<sup>48</sup>克拉克相信拥有私有财产源于人的本能行为:“拥有土地的天性是吸引劳动者进入拥有财富的阶层最有效的动力。”<sup>49</sup>私有财产法则反映了一种社会道德观,它是人们道德情感的具体化:“在自由的国家,人们通过法律来表达对权利的理解;在现代国家这种对权利的理解,事实上也意味着支持土地的私人所有……联邦政府,反映了全体人民的意志,也重申了这一点。”<sup>50</sup>

考虑到社会主义者关于土地所有权的声明显得很有煽动力,克拉克认为维护土地的私人所有权显得特别重要。他相信对土地私有权的维护会最终成为对各种生产要素私有权的维护。“不管反对土地财产有何逻辑可言,都会进而反对所有的财产,或者是激进的社会主义。”<sup>51</sup>

不幸的是,在克拉克看来,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所有人的意愿”或“人们的权利”。由于这个疏忽,一些人攻击私有财产权利说:“人们期待着私有财产的攻击者的数量超过维护者的数量。当一个组织拥有强大的道德力量时,这是正确的。”<sup>52</sup>因此让每个人都理解克拉克发现的“自然法则”就很重要:“社会处理这种收入的方法,总是依照财产权所根据的原则。如果这个方法没有受到阻碍,那么,每一个人生产多少就得到多少。”<sup>53</sup>

## 克拉克论资本

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通过假设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和资本的实物数量与对应的边际产品实物数量的关系,来解释工资和利息水平。

关于如何加总劳动的实物数量是很清楚的。通过将单位劳动定义为一个劳动者一天的工作量,再简单的加上工作的天数,我们即可得出生产中的劳动总量。尽管劳动者之间的差别很大,在大部分种类不同的制造业中,这些差别并不重要:

如果雇主所雇用的工人可以相互替换,无论哪一个工人离开工作,都是一样的。如果离开的人所做的是事业经营上十分需要的工作,雇主只要挑一个正在做最不需要的工作的人来代替他就可以了。<sup>54</sup>

当各种截然不同的技术和培训成为必需的时候,就像我们在李嘉图和马克思的章节中看到的,获取必要技能所花费的劳动时间可以用来将熟练劳动折合为非熟练劳动。因而在对劳动的实物数量进行加总时,通常不会存在无法克服的困难。

资本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情况。在对生产中使用的资本实物数量进行加总时,我们必须把不同种类的物体加总到一起。例如,我们必须决定如何把螺丝刀加到手推车、传输带、鼓风机、卡车和其他无数物品中去。资本家衡量资本的普遍标准是它的价值。也就是说,通过将一件物品的价格加总到组成资本存货的其他物品价格上的方法计算每一个物品。尽管这种方法对于只关心创造利润却不关心利润是如何通过合理的关系被创造出来的资本家而言是完全适合的,但是它对于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来说却是绝对不适合的。

在新古典分配理论中,资本的价值由它的生产力决定。我们不能为了确定资本的生产力而假设它有价值。如果我们这样做了,资本的生产力就会取决于它的价值。而在新古典理论中,这种因果关系需要颠倒过来:资本的价值应该取决于它的生产力。因此,为了让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保持前后一致(即为了摆脱循环论证的问题),需要某种完全独立于价格之外的方法,来量化生产中所使用的资本。

克拉克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令人疑惑——然而直到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在继续沿用克拉克的表达方式。克拉克坚持认为,除非了解资本和资本货物的差别,否则就无法理解他的理论。“资本由生产工具组成”,他写道,“而生产工具总是具体的、实在的东西。”<sup>55</sup>当人们从单个的、实在的、具体的形式考察生产工具时,它们就成了资本财货(capital goods)。因此,资本由资本财货组成,同时,资本的性质与资本财货的性质又不相同:

世界上的资本,就像是在劳动大众手中的一个大工具——人类用以征服和改造自然

的武器。

资本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永久性。资本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如果希望事业取得成功,也决不能让资本毁灭。……可是,为了避免失败,你却必须毁坏你的资本财货。你如果企图不毁坏资本财货,你就会遭受灾祸,就像听任一些资本毁掉一样。

那么,为了使产业兴隆,资本财货不但可以让它毁坏掉,而且必须毁坏。此外,为了使资本永远存在,资本财货也非毁灭不可,如同必须用掉小麦的种子,然后小麦才会生产出来。<sup>56</sup>

另一个区别是“资本是绝对流动的,而资本财货就不是这样”。<sup>57</sup>因此资本是无法毁灭的、永恒的、流动的和可移动的,而资本财货则是可耗尽的、具体的、无法移动的。这个概念在新古典分配理论中当然是有用的,但是对于我们衡量资本却没有多大帮助。克拉克小麦的例子并没有什么帮助。我们可以衡量所使用的小麦种子的数量,并与下一时期的小麦平均存量相比较。但是,小麦是小麦,资本财货则是完全不同的。

克拉克回答说资本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一个抽象数量的生产财富,或一笔永久的资金”。<sup>58</sup>数量一词当然是针对可测量的事物而言的。但是量化通常是指一个具体事物的具体过程,而不是指一个抽象事物的某个特性。然而,除了下文中的,克拉克没有提到任何关于资本的定义:

一定量的财富,或一笔资金——无论其中哪一个,如果不从体现它的具体物品来想象,它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把它想象为实际上所体现出来的东西,它就不是抽象的概念了,而是具体的东西了。

只要防止陷入资本可以离开具体的形态而独立存在的想法,为了进行科学的研究,我们可以使用做生意的人的说法,而不至产生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把资本看作一定金额的生产财富,投放在不断变化的具体东西上(这些具体东西变化无定,但是资金本身却是永久存在的)。这样,资本似乎是以改变它的具体形式而继续存在,它不断地从一种形式改变为另一种形式。<sup>59</sup>

克拉克似乎对他关于资本作为“一个永恒的实体”是可衡量的观点有些不安,他承认“由单位(units)来衡量的生产力是抽象的东西。”<sup>60</sup>然而,他向读者保证:“使用这样的抽象公式来说明具体的东西,在各种思想领域中是很普遍的。”<sup>61</sup>如果读者最终还有疑惑,克拉克最后提出了一个深奥的理念:“生命本身是抽象的。”<sup>62</sup>他却没有给读者提供任何关于用定量来衡量生命本身的方法,而资本作为一个永恒的实体也是一种抽象。

但是,从克拉克所在的时期到现在,不少新古典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生产理论(以及之后的增长理论)中继续将资本总量视为是可衡量的实物数量。由于资本的数量决定了其边际生产力,而反过来,边际生产力又决定了资本的价值。所以,基于理论的一致性,他们无法将资本价值视为衡量其数量的方法。但是迄今为止,基于“生命本身是抽象的”这一



理念,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继续构建理论框架,似乎他们已经找到了衡量这个问题的方法,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 庞巴维克衡量资本的方法

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ohm-Bawerk, 1851~1914),力图阐明衡量资本的方法是独立于任何价格之外的。他明白大多数保守经济学家关于资本定义的不足之处。

庞巴维克拓展了关于资本和利息的理论。他觉得“不得不重蹈激烈争论的道路,并期望对争论问题的公正而冷静的探讨,最后能够使争论平息下来”。<sup>63</sup>他相信他可以证明利息是不可或缺的。“那些要求把它取消的人们,可能是根据权宜之计而提出这个要求的,而不像社会主义者们现在所做的那样,认为这一类的收入在实质上是不公允的。”<sup>64</sup>

庞巴维克断言:只存在两种“初始”的生产要素——土地和劳动。资本是在人们意识到生产需要耗费时间之后才出现的。劳动无法被立刻使用,但经过一段时间会被分摊。更重要的是,不久人们便发现存在许多可供替换的生产方法。一些生产方法是短期的、直接的,需要相对较少的时间;其他的则更为迂回、更为间接,需要更多的时间;他相信从这个发现中得出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

这就是——用迂回方法生产财货所得到的结果,比直接生产它们为大。如果财货可以用任何一种方法来生产,则用间接的方法可以以等量劳动得到较大的成果,或是用较少的劳动得到同样的成果。除此之外,间接方法的优越性还表现在它是能够获得某些财货的惟一方法。如果我可以这样说:它是这样优越,以至于往往是惟一的方法。<sup>65</sup>

庞巴维克认为,在劳动数量给定的情况下,尽管边际收益递减,但生产时间越长,劳动的产出就越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按单位时间长度增加生产时间,产量会一直增加,但是每个连续的时间增量只会带来越来越小的产出数量。

因此,如果生产的惟一目标是将产出数量最大化,人们常会使生产时间尽可能最长。庞巴维克认为事实并不是这样,由于人们从目前各种不同的商品中获取不同的效用,他们也会从现在拥有商品和将来拥有商品中获取不同的效用。这意味着,人们具有时间偏好。更进一步而言,几乎所有的人喜欢现在的商品胜过将来的商品。庞巴维克认为有一些原因可以解释这种偏好。首先,存在一些“目前有困苦和急需的人”。<sup>66</sup>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当然比将来更重要。第二,因为“对将来需要的错误想象而造成的错误评价”或“意志的缺点”或“人生无常”,人们倾向于“低估未来的效用”。<sup>67</sup>

这表明生产的时间模式通过两种独立且相反的方式影响人们的效用。第一,财货越多,带来的效用就越多;生产时间越长,最终可供消费的产品就越多。第二,得到财货越

快,人们的效用评价就越大;而生产时间越长,则消费延滞的时间就越长。

现在,如果我们从短时间生产、低劳动生产率开始,增加时间可能会带来益处(即增加效用),因为更多财货所增加的效用会超过稍长时间地等待这些财货的负效用。但是当我们继续增加相同的时间增量时,会发生两种情况:一是产出的边际增量会不断降低;二是等待的负效用边际增量会增加。显然,在某一点上我们可以使延长生产时间的产品效用边际增量刚好等于等待的负效用边际增量。而在这个点上,社会效用是最大的。

在这一概念中,资本的数量表现为生产过程中的三个独立指数:一是使用的初始生产要素的数量;二是生产时间的长度;三是整个生产过程中当时使用初始生产要素的模式。扩展生产的过程就等于增加资本的数量。均衡时,每个人的时间偏好都由  $MU_t/MU_{t+1}$  比率给定(下标  $t$  和  $t+1$  代表了两个连续的时间段)。这个比率也等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或  $t+1$  与  $t$  的产品价值比)。这两个比率(事实上它们是均衡价值的决定因素)都等于  $1$  加上利率。

因此,在庞巴维克的分析中,通过将时间引入分析,把资本性质的定义完全被纳入到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因为生产中使用的初始生产要素的数量、生产时间段的长度,以及使用投入品的时间模式可独立于价格被确定,庞巴维克似乎找到了克拉克之资本衡量问题的解决方法。然而,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这种资本衡量方式让人彻底失望,因为它只是一些数字指数,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数字会得出与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的前提相矛盾的指数。我们将发现,尽管新古典经济学还没有找到抛开价格去衡量资本前后一致的方法,但由于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的思想价值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大部分新古典经济学家仍然在继续维护这一理论。

## 新古典分配理论中的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

尽管庞巴维克坚持认为他的理论完全不同于西尼尔的理论,但看上去它又似乎仅仅是后者理论的延伸和细化。庞巴维克将资本主义生产界定为迂回生产(roundabout production)。因此他假定,任何一个使用工具和中间产品的生产过程都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下面的引文总结了他对于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主要差别的看法:

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有两种同样性质和同等重要的后果。一种后果是有利的;另一种则是不利的。有利的后果,我们也已考察过了,即这种生产方法有较大的技术生产力。

同资本主义生产方法联系在一起的不利之处,在于它要耗费时间。资本的迂回生产方法是有成效的,然而却是漫长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我们才用迂回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就必须等待,有时要等待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得到最后产

品……如果资本主义生产也像普通无技术的直接生产一样,也可以做一天吃一天的话,那么没有东西可以阻止工人自始至终为他们自己进行这种迂回式生产了……只是由于工人不能等到迂回生产方式……生产出能供消费的产品,所以工人们就在经济上依赖于资本家。<sup>68</sup>

换言之,只有心理和情感态度上的差别才会把资本家与劳动者区分开来。他们拥有不同的时间偏好。劳动者现在就想要他们的报酬,而资本家却具有允许等待的品性。但是,庞巴维克和马歇尔关于等待的定义与西尼尔的节欲的概念在本质上如出一辙。庞巴维克同马歇尔一样,对使用“节欲”一词感到些许尴尬,因为他对马克思批评西尼尔的关于节欲是生产的独特社会成本这一观点感到如芝刺背。庞巴维克从马克思书中引入了以下的段落:

庸俗经济学家从来没有注意到这种简单的思考:任何一种人类行为,都可以认为是它的反对物的‘节欲’。吃是断食的节欲,行走是站立的节欲,劳动是怠惰的节欲,怠惰是劳动的节欲,诸如此类。这些老爷们顶好是仔细想一想斯宾诺莎(Spinoza)如下的命题:规定即是否定。<sup>69</sup>

庞巴维克仅用一句上述“依我看来,这里面雄辩多于真理”<sup>70</sup>便失之简单地驳斥了马克思的观点。

我们梳理一下上述的观点并对本章的内容加以总结。新古典经济学将经济过程简单地视为一系列等价交换的过程。每个人都获益,因为尽管每个人得到的价值与其所放弃的价值相当,但是却得到了比他或她手中东西更大的效用。因此市场协调着每个人的利益,并使每个人的效用最大化。在这个理论中,没有阶级或阶级对立。一些交换者比其他具有更高的道德品性(即一些人节欲,另一些则没有),但是每个人从交换中获得的都是由他或她的要素所创造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是新古典交换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讨论分配理论时,马歇尔对本章所讨论的三大理论家所共同认可的结论(以及此后的大部分新古典主义者)进行了总结。在讨论了他本人关于投入品定价的理论后,马歇尔的结论是:“上述论点和日常生活中的俗语相合,如‘凡事都有找到自己归宿的趋势’、‘大多数人之所得,几等于他们之所值’。”<sup>71</sup>

马歇尔概括了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中内含的道德结论。摘自克拉克《财富的分配》的下述引文,清楚地表达了边际生产力理论的中心论点,它一直激励着自他以降的新古典主义的后继者。

工人阶级的福利情况,取决于他们收入的多寡。但是他们对其他阶级的态度(以及因此而引起的社会治安问题),要看他们所收入的部分是否等于他们所生产的部分,而不管他们的收入是多还是少。如果他们创造的财富很少,但全部归于他们所有,他们也许就不

会想到革命。假使他们觉得他们生产了巨额财富,而所得的仅仅是一部分,那么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就一定会变成革命者,全体工人也将都有革命的权利。许多人指责现在的社会制度,说它“剥削劳动”。他们说,“工人常被夺去他们的劳动成果。这种剥削是通过竞争的自然作用,并在法律的形式下实现的”。如果这种说法被证实,那么,每一个正直的人都应当变成社会主义者,而他对改革产业制度热情的高低,就可以表现和衡量他的正义感的程度。<sup>72</sup>

## 注 释

1. 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8th ed. (London: Macmillan, 1961), p. 79.
2. 同上,第 80 页。
3. 同上,第 83 页。
4. 同上,第 86~97 页。
5. 同上,第 103~109 页。
6. 同上,第 109~114 页。
7. 例如, M. Blaug,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rev. ed. (Homewood, IL: Irwin, 1968), pp. 327~430.
8. Marshall, *Principles*, pp. 120~43.
9. 同上,第 117 页。
10. 同上,第 117 页。
11. 同上,第 193 页。
12. 同上,第 193 页。
13. 同上,第 99 页。
14. 同上,第 100 页。
15. 同上,第 336~337 页。
16. 同上,第 335 页。
17. 同上,第 337 页。
18. 同上,第 265 页。
19. 这章节的剩余部分以及克拉克的分配理论和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都运用了现在时态,因为这些分析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学教科书中的标准形式。
20. Marshall, *Principles*, 第 265 页。
21. 同上,第 265 页。
22. 同上,第 222~231 页。
23. 同上,第 265 页。
24. 同上,第 201 页。
25. 同上,第 201 页。
26. 同上,第 203~204 页。
27. 同上,第 204 页。

28. 同上,第 488 页。
29. 同上,第 204 页。
30. 同上,第 39~40 页。
31. 同上,第 39~40 页。
32. 同上,第 265 页。
33. 同上,第 265 页。
34. 同上,第 263~264 页。
35. 同上,第 263~264 页。
36. 同上,第 204 页。
37. 同上,第 257 页。
38. 同上,第 257 页。
39. 同上,第 615 页。
40. 同上,第 599 页。
41. 同上,第 600 页。
42. 同上,第 600 页。
43. 同上,第 318 页。
44. 同上,第 335~337 页。
45. John Bates Clark,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5), p. 101.
46. 同上,第 1 页。
47. 同上,第 111 页。
48. 关于这一点比较出色的讨论以及克拉克著作的其他方面,可参见 John F. Henry, "John Bates Clark and the Origins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Ph. D. diss., McGill University, 1974.
49. John Bates Clark, "The Ethics of Land Ten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October 1890): 69.
50. 同上,第 62 页。
51. 同上,第 77 页。
52. 同上,第 62 页。
53. Clark, *Distribution of Wealth*, p. 1.
54. 同上,第 103 页。
55. 同上,第 116 页。
56. 同上,第 117 页。
57. 同上,第 118 页。
58. 同上,第 119 页。
59. 同上,第 119~120 页。
60. 同上,第 121 页。
61. 同上,第 121 页。
62. 同上,第 121 页。

63. Eugen von Böhm-Bawerk, *The Positive Theory of Capital* (New York, Stechert, 1923), p. 23.
64. 同上,第 364 页。
65. 同上,第 19~20 页。
66. 同上,第 249 页。
67. 同上,第 254~255 页。
68. 同上,第 82~83 页。
69. 同上,第 123 页。
70. 同上,第 123 页。
71. Marshall, *Principles*, p. 335.
72. Clark, *Distribution of Wealth*, p. 4.

## 第 12 章 托尔斯坦·凡勃伦

在 19 世纪晚期以及 20 世纪早期,资本主义经历了一次重要的基本性变革。尽管这个制度的基础——私有财产法、基本的阶级结构以及通过市场进行的商品生产和分配过程——仍然没有变化,但资本的积累过程在大公司中已经变成制度化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的资本家在积累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从这点看,这个过程依赖于组织性的技巧、计谋、经营本领、残酷无情和不少的运气。然而,从整个社会来看,这与任何个别资本家的运气毫不相干——积累是一个不可阻挡的、不停顿的、螺旋式的过程,该过程不依赖于任何个别资本家的行为,它有自己的发展动力和特定模式。

19 世纪晚期出现了以大公司为形式的积累过程,这种过程具有合理化、规范化以及制度化等特点。“泰勒制”以及科学的管理取代了老式的、较个性化的资本积累模式。一个新的管理阶级变得日益重要。生产资料所有权仍然是资本主义中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方面的主要来源。新的管理阶级,至少其最高层主要是由重要的和强大的资本所有者所组成。管理阶级明确地、决然地臣服于整个资本家阶级。

在这种制度转型的结果中存在两种特别重要的变化。一种就是资本的国际化。我们将在第 13 章中讨论这个问题。另一种就是资本家阶级结构的变化。尽管资本家阶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统治地位保持未变,但是,积累过程的制度化使得绝大部分资本家仅仅通过不在所有权就可以永久地保住其地位。绝大部分的资本家变成一个纯粹的食利者阶层,而一小部分资本家从事管理(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同时还担当一种执行委员会的职能以保护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这种委员会通过一种新的公司结构——“管理管理者”来履行其职责。

这些经济组织和经济活动中的变化,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经济理论领域中得以反

映。在第10章中,我们讨论过一种方式——新古典边际主义用这种方式反映了理性的、食利的不在(absentee)资本家的社会优势,他们为了从所有权中获取最大的利润,经常会调整其资产组合。在第13章中,我们将讨论那些分析这一时期帝国主义扩张的经济理论。但是,最全面地反映和描述这个时期制度和文化转型的是凡勃伦(1857~1929)的著作。凡勃伦很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最具独创性的、影响最深远的社会理论家。

很多作家通过写作风格传达信息,就恰如他们通过作品的内容来表达意思一样。凡勃伦更是如此。尽管在观察当时美国的资本主义时,凡勃伦装出一幅公正的、中立的、无私的姿态,但是事实上,他非常支持“普通人”而反对“既得利益”;支持理性的、和平的人类关系而反对“掠夺剥削”;支持创造性、建设性的技艺而反对“商业阴谋破坏”。他的作品具有一种不可言喻的尖锐的、嘲笑的讽刺。他使用最多的修辞技巧之一就是,将制度和人类实践毫无疑问地描述为他自己道德上的愤怒,然后加上如下一句话,“但是那是好的,并且像它应该是的那样”;我们还会发现另外一段紧随其后的愤怒段落,“对于所有的这些来说没有发现过错,但是,注意到这样的事实是必需的。”因为凡勃伦的写作风格是如此独特,所以我们在本章引用了比在本书中其他章节更长的引文。

虽然凡勃伦的个人生活饶有趣味且非同凡响,但是我们在此不予讨论。不像其他的经济理论家一样,比如纳骚·西尼尔,凡勃伦生活和行为的细节对于理解其思想的作用相对要小得多。只需说一句就足够了,虽然凡勃伦对于许多社会问题非常有热情,但是在他的个人生活中,无论从学术上还是从社会上他基本上被认为是非传统的,而且他过着一种孤独冷漠的生活。他的冷漠毫无疑问地影响了他的写作风格,这种风格具有一种局外人或者社会科学家的腔调,这个人已经被一种外国文化社会化了,这种文化比当代美国文化更具社会性、更加理智,而在道德上更加超前。他以当代人类学家报告“原始”文化传统习俗的方式,记录并报告了美国文化奇异、“野蛮”的特征。

凡勃伦在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任教时,在这两个机构——尤其是斯坦福大学——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著述甚丰,出版了十本重要的著作,为期刊和杂志写了大量的文章和评论。他伟大的天才和不平凡的写作风格使得他所有的著作都很有理论价值,并且受到了大众的喜爱。

### 凡勃伦的演化的社会哲学观

在19世纪晚期,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进化论已经对哲学和社会科学产生了深刻有力的影响,这种影响非常清晰地凡勃伦的著作中得以反映。他把社会视为一个高度复杂的组织——逐渐衰退或者发展,不断变化,适应或者不能适应新的情况。



像马克思的分析一样，他的分析在各个方面进行历史定位：

正如在经济学中，研究的主题是人类处理物质生活资料的行为，科学是对物资文明生活史的必要研究……这并不是说经济学家的研究要把物质文明独立于人类文化所有其他的阶段和方面……但是就研究是经济科学而言，其关注的问题应该覆盖物质生活的计划，同时也要包括仅仅与物质生活计划相关的文明的其他阶段。<sup>1</sup>

对于凡勃伦来说，人类的历史就是社会习俗的进化史。人类的行为是以与所有历史时代相同的某种依稀可辨的模式为基础的。但是，这些非常普通的共同模式在不同的历史、社会和制度场景中被明确地表达为各种各样不同寻常的方式。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凡勃伦把这种人类行为的共同模式叫做“本能”。而20世纪的科学对于类似人类的行为是本能这样站不住脚的任何观念已经不屑一顾，因此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凡勃伦的许多理论在科学上是无用的。事情当然并非如此。当他使用“本能”（这种用法在那个时代的社会科学家中是非常普遍的，他们深受达尔文的影响）这个词的时候，他并没有暗示人类的行为就像动物的行为一样完全出于本能。事实上，他的整个理论与这种观点是完全对立的。

凡勃伦明确地否认任何类似于人类的行为是本能的、是由遗传决定的观点：

在经济生活中，与人类行为的其他链条一样，活动和关系的习惯模式已经形成，并且被习俗安排到制度组织中去了。这些制度……本身有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性的力量……如果情况相反，如果人们通常并不是按照由制度组织提供的习俗性的依据和价值观行事，而只是直接按照人类天生遗传的非习俗化的习性和天赋所提供的依据和价值观行事的话，那么就不会存在制度和制度文化。但是社会的制度结构仍会继续存在，人们依旧会生活在这样的链条之中。<sup>2</sup>

只有在特殊的历史制度框架中，人类行为的共同模式才具有具体的、独有的特征。

像所有人类文化一样，这种物质文明是一个制度体系——制度组织和制度发展……文化的发展是一种习惯的累积的序列，其方式是人类本性对于紧急事件的习惯性反应。这些紧急事件会发生无法控制的、累积性的变化，但是在这种累积性的变化中又有一种一致性的序列不断地发展——之所以是无法控制的，是因为每一次新变动都会形成一个新局面，而这种新局面又会导致习惯性反应方式更新的变化；之所以是累积性的，是因为每一个新局面都是之前发生的变化结果，同时包含了被前面变化所影响的所有的偶然因素；之所以是一致的，是因为使人类做出反应的人类本质的潜在特征（习性、天赋等等），以及习惯产生影响的依据实际上都没有改变。<sup>3</sup>

因此，凡勃伦介于两类理论家之间：一类是效用传统理论家，他们认为所有历史背景下的人类在本质上是—致的（例如，都是精于计算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另一类理论

1914  
★  
—  
凡勃伦

家(包括马克思的一些追随者,但不包括马克思本人)认为人类根本没有什么本性,而是具有不确定的适应性,他们觉得人类完全是特殊文化和制度背景的产物。在凡勃伦看来,无论在什么样的文化和历史时期,人类都像任何一种动物物种一样,拥有某种共同的基因遗传的特征、欲望、习性以及潜能。

正是文化和社会制度使得人类与动物区别开来。这种比动物适应性更强的人类共有的特征,只有在一种文化背景内才能够发现它们精确的、真实的表达。而且,对于这些特征的可能表达来说,存在一个宽广的(但并非不能确定或无限的)范围。此外,某些特征也许在重要性方面被夸大,而另一些却被压抑或者遏制,这都取决于特定的社会结构。某些潜能也许可以实现,而另一些也许保留在理想化阶段。

这就是有关共同特征和潜能的讨论,凡勃伦称这种潜能为“本能”。在刚刚提到的讨论中,我们能够认同凡勃伦最重要的一个追随者的以下表述:

托尔斯坦·凡勃伦是一流的社会理论家,他最重要的贡献是本能理论。虽然目前本能这个概念从科学的意义上讲已经过时了,但是我仍然这样主张。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整整一代含有敌意的批评家将他们对于凡勃伦的嘲弄集中于此——这个看似他的最薄弱之处。但是这样的做法恰恰证明了他们自己不仅对凡勃伦而且对人类行为都缺乏了解。因为即使我们摆脱了对于“先天的”,或者说基因决定的行为模式的错误简单认识之后,事实还是会表明人类行为在本质上与任何其他动物都有很大的区别,而且在某处一定存在这些区别的主要根源。<sup>4</sup>

概括凡勃伦对于人类共同特质的观点是困难的,因为他自己的分类和术语在他的各种著作中不同。然而,这些特质的一个中心特征清晰地呈现在他所有的著作中:潜藏于人类行为背后所有的基本特质,在一种基本的、对抗性的二分法中是相关的,这种二分法以某种形式几乎存在于所有社会中。所有这些特质可以被分为两组,在它们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冲突。一组的中心是凡勃伦的“作业(workmanship)的本能”观念。另一组的中心是他的“剥削”的本能,或者“掠夺的本能”观念。与作业相联系的特质被凡勃伦称为“父母的天性”和“随便的好奇心”,这些特质对于在生产力和人类对自然的控制中已经取得的进步负有责任。它们对于人类对爱、合作和创造性的需求得到满足的程度也负有责任。与剥削或者掠夺性的本能相联系的,是人类的冲突、征服和性、种族以及阶级剥削。社会制度和习俗行为常常会将人类的剥削和掠夺的真实本性掩藏于被凡勃伦称为“公道作风”(sportsmanship)和“恪守礼仪”(ceremonialism)的外表之后。

这两对行为特征的对立以及展示它们的社会制度,是凡勃伦社会理论的中心焦点。凡勃伦起初的主要兴趣是在这种社会理论背景下,分析当时的资本主义体系。在讨论完他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批判之后,我们将讨论凡勃伦对资本主义的分析。

## 凡勃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

凡勃伦对于新古典经济学(他认为新古典理论仅仅是对于边沁功利主义的计算)的基本批评是,它对于人类行为和社会制度持有一个完全非历史的和过分简单化的观点。新古典经济学试图通过用理性的、自利的、最大化行为等术语来解释一切,但是实际上,它什么都没有解释。

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失败之处在于它有关人类本质的观念:

享乐主义关于人的概念是:人是快乐和痛苦的迅速的计算器,他像一个处于刺激的冲动之下的、对幸福充满渴望的均质球体一样来回振荡,刺激的冲动使他在这个区域内来回旋转,但是保持完好无损。他既无前因又无后果。他是一个独立的、确定的人类数据,并且处于稳定的均衡中,除非撞击力的冲击使他向某一个方向或另一个方向发生位移。由于在自然空间中自我加强的力量,他会按照他自己的精神之轴对称地旋转,直到力量的平行四边形征服了他,于是他就沿着合力的方向运动。当这种冲击力被耗尽的时候,他就会静止下来,就像以前一样作为一个充满渴望的独立的球体。<sup>5</sup>

至于新古典经济理论针对的主要问题,凡勃伦非常确定:

自从事乐主义统治了经济科学,科学就在大体上成为分配的理论——所有权的分配和收入的分配……而且与享乐主义精神相一致,这种分配理论也集中于交换价值(或价格)学说,并且根据(一般)价格设计出其(一般)分配计划。这种理论所集中关注的一般经济社会是一个商业社会,这个商业社会以市场为中心,并且它的生活构架是一个利润和损失的构架。<sup>6</sup>

新古典理论的最终目标是:首先,根据资本产出效用来证明对资本的返还是正当的;其次,证明所有的收入都代表了所有者对社会的生产性贡献,他们在社会上、经济上和道德上是没有区别的;第三,证明在竞争性的资本主义体系中,社会和谐是事物的自然或常规的状态。

[在新古典的]理论中,经济生活的中心和外围是……产生“愉悦感”。愉快感觉仅仅依据真实的物质客体(包括人)被生产出来,这些物质客体以某种方式对感觉起作用……资本的目的,就是服务于这个结果——愉悦的增加——在真实的享乐主义体制中,最要紧的是资本同样地服务于这个结果。<sup>7</sup>

在功利主义理论中,每一种收入来源代表了一个对社会有用的、可使用的贡献。没有任何产生收入的事物会是对社会无用的或破坏性的:

在享乐主义的一般的生活框架中,不存在浪费的、破坏性的或者无效的行为。从享乐主义的观点来看,当代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的商业生活框架是正常的。在这个框架内,(一般)并不存在具有浪费的、损坏的或者无效的特征的任何事情……像所有的多样性现象一样,资本的正常结果就是生产快乐和避免痛苦。<sup>8</sup>

由于所有的收入,包括所有对资本所有者的回报都来源于效用的创造,因此针对所有的新古典理论而得出的最后结论就是:

享乐主义的基本原理散发到商业环境中的这种乐观之光是来自享乐主义分类法的最有价值的理论结果之一,对于明智的寂静主义者来说,这也是最有价值的……但是当这束光持续的时候,享乐主义经济学家可以说,虽然他所构思的经济生活框架是一个竞争性的系统,但是竞争者的收入丝毫没有竞争性质;没有一个人(通常来说)的收入是以其他人或整个社会为代价的……在这束光的照射下,竞争性的斗争被看作是服务于大部分人的友好的竞赛,这场竞赛单纯地着眼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sup>9</sup>

通过假设在任何时代的任何社会中人类的行为都是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新古典经济学家得出了下列思想结论。在任何社会、任何地区、任何时代,为获取更多效用而做出的一切努力,都可以归结为用土地、劳动和资本换取商品。因此在任何社会、任何地区、任何时代,由所有人获取和享用的所有效用,都可以归结为工资、租金或利息。按照新古典主义的观点,资本主义与其他社会的惟一区别,就是在资本主义中,这些普遍的人类行为和行为得以报偿的普遍方式,比在任何其他的社会组织形态中更为有效。

#### 工资、地租和利息的范畴

是享乐主义的“自然”范畴,它们的基本分界线穿过任何给定经济环境的事实……即使在有些情况下人们看不到这些分界线……;所以,举例来说,一群为了捕捉贝类和鱼的阿留申群岛的土人,他们使用耙和神奇咒语在破旧的船只和波浪中四处奔波,按照以上的分类观点,他们应该处于地租、工资和利息享乐主义平衡的壮举中。并且那就是其所存在的全部。实际上,对于这种经济理论来说,那就是对于任何经济情况所存在的全部。<sup>10</sup>

实际上,凡勃伦坚决主张,生产通常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其中产出不能被视为任何一个人或者任一生产要素的纯粹结果。生产是一个社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分享知识和技能,并使之代代相传,同时人们在改造自然以适应人类需求和应用的过程中还会进行社会合作。这种过程的分离,以及对这个过程中的不同要素——比如土地、劳动和资本所进行的分类,只不过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一种历史现象。通过工资、租金和利息等方式来分配人类社会努力的成果,也仅仅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一种历史现象。

凡勃伦注意到在克拉克的著作中“许多地方都包含着这一信条——即‘资本’和‘资本

品’这两个事实虽然在实质上是一致的,但是它们在概念上却是有区别的。”<sup>11</sup>他补充说道,将资本理解为一种一般的物质的“永恒实体”,而每一个资本财货都来自并归属其中,这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他认为

资本这种“永恒实体”寄居其中的连续体是一种所有权的连贯性,而不是一个物质实体。事实上,这种连贯性具有非物质性的本质,它是一个有关法权、合同和买卖的问题。这个事情的显著状态被忽视的原因就恰如它有点儿精心设计但又让人不容易看见一样……(不忽视这个明显的事实)当然就可以推翻劳动和资本的“自然”报酬规则,这是克拉克先生从开始就期望得到的结果。它同时也会将垄断这种“非自然”现象作为一种商业企业的常态引进来。<sup>12</sup>

正如资本不是存在于任何社会的永恒物质实体,而是资本主义法律和制度的产物,利息收入也是资本主义的特别现象:

从历史上来看,仅仅在商业运输已经达到某种可观的发达程度之后,诸如稳定的利率之类的东西才会出现在人类的意识中;并且商业企业的这种发展不仅发生在基础行业中,同时也在所谓的货币经济链条中展开……但是一个货币经济……只能出现在由产权制度的成熟发展所能提供的基础之上。整个事情存在于一个确定的制度环境范围内,而只有在一个相对比较短暂的文明阶段才能发现这种制度环境。<sup>13</sup>

同样,只有在资本家垄断了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商业货币经济中,才会存在工资劳动者和工资。仅当资本存在时,并且“只有在这时,‘工资’这个术语,在严格的技术意义上,才能被正确地应用”。<sup>14</sup>事实的确如此,因为像大多数新古典经济范畴一样,“工资”这个范畴产生于资本主义,同时它又反映了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关系:“工资是一个与雇主和雇员关系相伴产生的事实。这个经济范畴的范围完全包含在生产理论之内,而这种生产又是以基于雇员与雇主的关系的方法进行的。”<sup>15</sup>

因此,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作用是模糊资本主义最基本的对抗性本质,即所有者和工人之间冲突。首先,使这种冲突看起来仅仅是表面的而非真实的;其次,使劳资关系看起来是永恒的。凡勃伦强调,当代资本主义显著的、有独特历史意义的、与众不同的特征之一,就是“严阵以待的工人对于其雇主和不在雇主怀有永久的敌意,他们之所以被雇佣正是为了这些雇主的安逸和收益”。<sup>16</sup>在这种形势下,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社会和谐结论对于商人、不在所有者和社会上有权势的“既得利益者”来说,就是颇为有益的:

许多热心公益的市民和对商业感兴趣的富裕市民,对这种在大行业的所有者和工人之间的普通关系中弥漫的分裂情绪和对立目的感到痛惜。在有关这件事的说教式布道中,一般都坚持以下观点——这种分裂情绪是不必要的,同时它会对公众利益造成危害,“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在本质上是—致的”,那些拖拉者和妨碍者的策略只会给故

对的双方均带来贫困和不愉快,还会给整个社会带来伤害和不便。这种说教式的布道一般是面向工人演说的。那些操纵工业生产的商人在考虑到现有情况所允许的条件后可以自由地控制产出、限制就业,这是扎根于古老习惯中的一个常识性的简单事实。那是健全的、真正的和优越的商业所涉及到的问题。但是,工人阶级联合在一起追求他们自己利益的同时会带来失业,失业将会妨碍有序的商业收入,从而带给商业社会挫折和灾难,而且这样也会扰乱和阻止作为收入来源的工业过程。<sup>17</sup>

于是,这是由所有的功利主义、新古典理论最终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局。因而,凡勃伦不仅仅是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逻辑和经验的批判,而且在他自己的理论框架内证明,新古典理论的历史和制度功能就是满足不在所有者和“既得利益者”的需要。

### 资本主义对抗性的两分法

我们在前面说过,凡勃伦认为有两大类对抗性的行为特征,这些特征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其时代所特有的社会制度和行为模式显现出来。凡勃伦主要关注的是分析和理解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把英国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凡勃伦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和20世纪的前二十五年,把美国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典型。对他来说,中心问题就是这两类对抗性的行为特征是如何被资本主义制度显现出来的。

可以从好几种有利的角度来解决以上所提出的问题,凡勃伦至少从三种视角出发来考虑。他从社会心理的观点区分了两类个人和阶级。第一类个人和阶级的行为由剥削本能或掠夺性本能所支配。而第二类个人和阶级的行为由手艺的本能、父母的天性和随便的好奇心的发展所支配。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凡勃伦看到了在他所指的“工业”势力与“商业”势力之间存在着相同的两分法。从社会学的观点看,“有闲阶级”的“恪守礼仪”和“公道作风”与“普通人类”创新和合作特征之间也会显示出同样的两分法。这三种不同标准的分析中的每一种都趋于与另外两种融合,因为凡勃伦实际上在分析一个主要由两大阶级组成的社会,即资本家(他以各种方式提到,像“既得利益者”、“不在所有者”、“有闲阶级”或者“工业巨头”)和工人阶级(他以各种方式提到,像“工程师”、“工人”、“普通人类”)。

### 私有财产、阶级分化社会与歧视妇女

私有产权制度是阶级结构的基础。凡勃伦通过拒绝与私有产权相近的“自然权利”开始他的分析。凡勃伦通过驳斥将私有产权看作“自然权利”的观点开始了自己的分析。

在广为接受的经济理论中,所有权的基础一般被视为所有者的生产性劳动。人们不假思索、毫无疑问地把这看作是所有权的合法基础……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来说,这个公理有多少价值就会带来多少麻烦。它带给他们的麻烦就是要没完没了地解释资本家是如何成为他自己占有的商品的“生产者”的,同时还要解释劳动者得到了他所生产出来的物品这一观点的真实性。<sup>18</sup>

凡勃伦认为,无论是被保守派用来为资本主义辩护,还是被社会主义者用来攻击资本主义,这种私有产权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它的错误在于对作为其基础的生产过程做出的个人主义假设。凡勃伦经常强调,生产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是一个社会过程,而永远不可能是一个个人过程。

这种有关产权的天赋权利论认为孤立的、自给自足的个体所做出的创造性努力成为其所有权的基础。在这样做的时候,就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根本就不存在孤立的、自给自足的个体……生产仅仅发生在社会中——只有通过工业社会的相互合作才能进行。这种工业社会可大可小……但是它往往包含一个大到足以容纳和传播传统、工具、技术知识和习俗的团体,如果没有这些传统、工具、知识和习俗,就不会有工业组织,也不会有个体之间以及个体和环境之间的经济关系……没有技术知识,就不会有生产;因此也就没有积累,没有拥有的财富,不管是对于个人还是其他来说,情况都是如此。并且也不存在与工业社会分离的技术知识。因为不存在个人生产和个人生产力,所以即使在其自身假设的逻辑之下,天赋权利这种先入之见……也会使其自身变得荒谬。<sup>19</sup>

尽管生产往往是社会性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支配社会产品分配的私有产权定律却是私有的或者个人的。在凡勃伦看来,这代表了一种基本的社会对抗。通过社会生产的发展,所有的人类进步已经实现。一般来说,这样的发展是“作业的本能”的结果和“随便的好奇心”的驱使。而私有产权是“掠夺性本能”的结果,并且处于“作业的本能”的对立面。

凡勃伦认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作业的本能是优先于掠夺性本能并且比掠夺性本能更加基本。凡勃伦全部的社会哲学观点集中起来就是:“人的生活就是行为,当他行动时,他思考和感受。”<sup>20</sup>并不是人们的思想和感觉最初决定了他们的行为,而是他们的生活过程和行为决定了他们的思想和感觉。而且,

遍观整个人类文明史,几乎在任何地方、每天的生活中众多的人们都忙碌着转变物质,使其对人类有用。所有工业进步的直接目标就是完成某些技艺精巧的工作。<sup>21</sup>

在人类社会最早的阶段,低下的生产能力使得作业的本能的优势成为生存的社会先决条件。在此阶段,“种族的生活习性仍旧必须具有和平的、生产性的而不是争斗的、破坏性的特征”。<sup>22</sup>在这个早期的阶段中,“在一种掠夺性的生活成为可能之前”和当社会仍然

被“作业的本能”所统治的时候，“出于作业的本能，效率（或）耐用性被人们接受，而无效率或无益却被人们厌恶”。<sup>23</sup>

只是在生产变得更加有效和技术知识及工具被社会性地累积之后，掠夺性的剥削才成为可能。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不同的社会成员间才可能出现各种添加不公平的差别。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才有可能通过残忍的没收和掠夺性的剥削来生活。“但是这种没收和暴力占有很快就获得合法的使用权，而这种占有权通过居住的方式也很快变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了。”<sup>24</sup>

私有产权起源于残酷的强制暴力，同时又通过暴力、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合法化使之永恒。伴随着私有产权的发展，阶级分化的社会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在这种凭借威力占有盛行的地方，人口分为两个经济阶级：一部分忙于工业的职业，另一部分忙于非工业的追求——比如战争、政府、体育和宗教仪式。”<sup>25</sup>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中，阶级分化有些尖锐且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更加明显地被察觉到，“在农奴制和奴隶制下，工作的人不能拥有，而拥有的人却不工作”。<sup>26</sup>

一个阶级分化的社会是一个掠夺性的社会，其中掠夺性本能统治着作业的本能，即使占优势的掠夺阶级与从事工作的普通人相比常常在数目上很小。通过使工人屈从于无数的侮辱和压迫，掠夺性的社会趋向于节制和反对作业的本能，在如此的行为中它使得大部分工作令人生厌，即使自我实现的愉悦感觉天然地存在于作业的本能中。在阶级分化的社会中，

人们确实从精神上厌恶劳动；这主要在于人们对劳动的轻蔑。当然，厌恶劳动这个事实仍然是真正在精神上的厌恶。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这种厌恶才更加实际并且无可挽回。<sup>27</sup>

在一个私有产权、阶级分化的社会里，与作业相关的古老价值观被新的价值观销蚀和取代：

随着掠夺文化得到更全面的发展，职业之间就会产生分化。像超群的美德一样，本领的传统不断扩大范围和增加强度，一直到本领几乎被视为单一的美德。那时只有那些涉及到应用这种美德的职业才是有价值 and 富有荣誉性的。而其他那些职业——其中人们只是温顺地加工无生命的原材料以供人类使用——变得没有价值并且最终以贬值结束。光荣的人不仅要表现出掠夺剥削的能力，而且一定要避免与那些不涉及剥削的职业扯上关系。温顺的职业——即那些对生活没有明显的破坏、对难以驾驭的敌对者没有惊人的压迫的职业——变得声名狼藉，并且被移交给那些缺乏掠夺能力的社会成员，也就是那些不魁梧、不敏捷、也不凶猛的人。这些职业中的人们认为他们缺少体面的本领，而正是这种本领会提高他们的地位。

……因此，掠夺文化中的体格健壮的野蛮人，非常关心他们的好名声……他们把时间



用于激烈的战争策略中,把才干投入设计扰乱和平的方法方式上,用这种方式骗得荣誉。<sup>28</sup>

伴随着私有产权和掠夺性文化也出现了征服妇女:

战斗,与其他一系列涉及到掠夺成分的工作一同成为健壮男人的职业;这个群体的平凡的日常工作落在妇女和弱者身上……虚弱,换句话说就是缺乏掠夺能力,这是被人蔑视的。这种蔑视虚弱的早期结果之一就是忌讳妇女和妇女职业。<sup>29</sup>

从此,人们认为与妇女的过分接触“从礼仪上来说,对男人是不洁的”。这种观点“持续到后期的文化中,就是认为妇女是没有价值的或者是能力不足的;以至于直到现在妇女和男人并列,或者妇女代表任何倡导神圣和礼仪的社团时,我们仍然会觉得不合适”。<sup>30</sup>

尽管在掠夺性文化中的大部分男人屈从于战士——而这些战士仅仅由一小部分人组成——但是柔弱的普通男人在和妇女交往时往往也会仿效掠夺的特性。妇女一般屈从于男性。“在掠夺性思维模式下训练的男性逐渐习惯于将这种两性关系理解为美好的”。<sup>31</sup>这种对妇女的压迫形式导致了在私有产权、阶级分化的社会中婚姻制度特有的形式。这样的婚姻起源于强迫并且常常带有某些“所有权的观念”。<sup>32</sup>

凡勃伦认为,只有当作业的本能再度支配掠夺性本能时才能最终结束对妇女的征服。他相信资本主义已经刺激了作业的本能的发展,即使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它依旧被受掠夺性行为支配的人们所控制。社会力量“在分解婚姻所有权制度方面有了明显的作用,也可以被指望在分解私有产权的相关制度方面起作用”。<sup>33</sup>

## 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与商业对工业的统治

私有产权和掠夺的本能催生了具有掠夺性和阶级分化特征的奴隶和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是西欧封建主义的派生物。然而,掠夺的本能总体上来说在奴隶社会、封建主义中占支配地位,而在资本主义中,作业的本能得到了重要的、意义深远的发展。资本主义——或者像凡勃伦提到的资本主义,“不在所有权和雇佣劳动的政体”<sup>34</sup>——已经开始作为一个“准和平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作业的力量最初已经得到了非常迅速的发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业的力量与剥削的掠夺性力量已经锁定在斗争中。

这种对抗被凡勃伦表述为“商业”和“工业”之间或者“销售术”与“作业”之间的冲突。资本主义最初由西欧封建主义进化而来,因为在那种文化中,掠夺性本能和它的伴生物——族长文化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由于在掠夺思维习惯方面缺乏足够的训练(例如,像在北欧的不完善的家族主义中表现出来的一样),掠夺性文化在欧洲的封建体系中

没有达到所谓的正常成熟。”<sup>35</sup>在“继起的自由劳动”的继起阶段，强制工作对于谋生是必需的而非外力因素使然，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作业的本能繁荣兴旺，而且工业技术展现出巨大的进步。在19世纪，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掠夺性力量威力日增。这种情况一直持续着，直到19世纪晚期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即作业力量和剥削力量都成为强有力的社会力量。

这两种力量被资本主义的两种完全不同的阶层所体现。“两个特殊阶级……的兴趣和关注……各不相同，沿着不同方向，驶入了差别越来越大的两个轨道。”<sup>36</sup>第一个阶级体现了作业的本能：

工人、体力劳动者、机械和技术人员——无论哪一个术语也许都能最好地标明通过社会熟练技术直接导致工业效果的一般人类分工——这些都与工作相关，人们藉此生活，事实上，人们的兴趣和日常工作纪律，都汇聚于对物资的技术性理解。<sup>37</sup>

第二个阶级体现了掠夺性本能：

这些所有者、投资商、主人、雇主、承包商和商人与有利的契约谈判有关……这些职业所提供的培训和其有效需求以金钱管理和远见、金钱收益、价格、价格—成本、价格—利润和价格—损失为条件，即以自我关注和情操为条件。<sup>38</sup>

劳动者成功的本质包含了生产创造力，而所有者和商人成功的本质却包含着剥削他人的便利：

金钱收益是一种不同的收益，而商业是这些不同收益之间的协商……一般地……是商人的开支和收益之间的差别——即正如商人和其直接或间接打交道的非商业的大多数普通人。在这种差别协商中，一方（从金钱的视角）的弱点差不多就是另一方的长处——二者实质上是同一个事实。<sup>39</sup>

这种训练无疑滋生掠夺理念，同时劳动的训练滋生作业理念。尽管作业理念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非常有用的，但是一旦这种理念完全控制了社会，就会摧毁不在所有者阶级奢侈、懒惰和寄生性生活赖以维系的制度基础。因此，反对作业理念的过分发展往往也是必需的：

富裕阶级强加于社会的行为准则在这方面，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将会给普通人的思想带来具有相当大的矫正作用的效果，并且在经济呈现普遍商业局面以后，因此而维持掠夺性理念和成见的有效传播。<sup>40</sup>

获取利润，或者商业，创造出完全远离工业或者作业行为。渐渐地，所有者从事越来越少的生产活动，生产委托给一个“‘效率工程师’的专业阶级。”<sup>41</sup>但是，这个新的效率工程师的管理阶层所关注的，却从来不是生产本身或者对社会的普遍有用性。“效率工程师的

工作……常常[是]商业服务……按照价格和利润。”<sup>42</sup>

这样就逐渐形成了被凡勃伦称之为“新秩序”的东西,在这种新秩序中,工业——正是在工业中作业本能得以滋养和发展——基本上从属于商业,而在商业中人们惟一关注的问题就是获取利润。进一步,商业又从属于不在所有者财富的增长,并为之而存在。

美国商业和工业中的新秩序可以说是随美国工业资源的运行主体,包括运输系统,被不在所有权大规模掌握和控股,以使这些国有资源和工业服从于代表了不在所有者的既得利益者的监视和控制之后,迅速发展起来的。<sup>43</sup>

在凡勃伦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对抗性矛盾,存在于新的生产社会形式与私有产权的法律之间。前者定位于生产效率和服务于全社会,后者将工业控制权放在不在所有者手中,他们指挥工业以获取利润:

因此,新秩序被当作一种不合适事物。它是工业进程和人类资源新方法和手段的组织系统,服从于上层商人阶级不负责任的控制之下,他们沿用旧策略,并导致过时结果。<sup>44</sup>

这种商业控制工业的本质被凡勃伦用一个术语——“阴谋破坏”来表述。为了攫取利润商业往往对工业采取破坏性活动。阴谋破坏被定义为“严重的效率降低”。<sup>45</sup>对于商人来说,“合理的利润实际上常常意味着可以获得的最大利润”。<sup>46</sup>资本主义的问题是,大规模的工业和作业的力量经常增加产量,这些产量能够以一种被给定的资源和工人数量生产出来。但是,在现存极度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情况下,只有大大降低价格水平,这些增加的产出才有可能售出。一般来说,必需的价格下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以低价卖出大量商品要比以高价卖出少量商品赚得的利润更少。因而,在现代资本主义

一直有日益严重的效率降低,工厂不断被闲置或处于半闲置状态,越来越缺乏生产能力,工人不断被解雇……然而同时,这些人又非常需要这些被闲置的工厂和被解雇的工人所提供的各种商品和服务。但从商业利益考虑,不可能让这些闲置的工厂投入生产和让被解雇的工人上班——这是由于缺乏足够的利润引起商人的兴趣,换一句话说,由于没有足够的收入来吸引既得利益者。<sup>47</sup>

由商业对工业的阴谋破坏,就一般的公众而言,当然会引起普遍的苦难和贫困。但是不在所有者从未去正视这种苦难,或者哪怕思考一下他们在引起这种苦难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是当他们传授的只是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时,情况更是如此。在那个由商业控制工业的资本主义体系中:

这种控制和阴谋破坏的持续平衡——这是其主要的控制方法和物质结果——按照商业常规,都以与个人无关和公正无私的方法生效。不在所有权……不受睦邻关系、情绪和其他顾虑的影响……不在所有者与工人没有个人接触……除了通过其代理人那种关系疏

远的、中立的和不带感情因素的接触之外，正如源源不断涌现的收入票据所喻示的一样……因此，不在所有者和他们的不在商业管理者免去许多讨厌的经历，摆脱了许多令人不愉快的生死琐事——资产负债表上的一切琐事，无疑也囊括其中，尽管这些关系下层人物生存的重要票据对他们来说，可能也是足够重要的。<sup>48</sup>

在凡勃伦看来，这样的一幅资本主义图画并非刻画危机和异常状况，而是对资本主义日常运转的勾勒。此外，这种运转方式并不是由于不在所有者天生的不道德而引起的。而是完全嵌入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结构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商业策略彻底地沦为阴谋破坏的目标。实际上，它自然是不当的买卖，它同时也是普通的生意。没有必要对它吹毛求疵，因为这于事无补。这不是个人嗜好或道德败坏的问题，不是在生产中实施这些能够为其带来些许好处的阴谋破坏的企业巨子堕落。他们并不是旨在缩短人的生命或使其同胞更加贫困来论证人类的痛苦。确实，应该认为这些巨子正如其所表白的那样人道，但是，只有通过减少必需品的供给，并因此将匮乏提高到能够足够增加他们收入的那一点，然后，才良心发现地来证实不在所有者对于他们的信任。他们被套在普通生意的圈套中，不得不违背良心，问题不在于这种不当买卖是否人道，而在于它是否是完美的商业管理。<sup>49</sup>

凡勃伦认为，周期性萧条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常态之一。“根据这个论点，可以说相当显著的长期慢性萧条，是机器工业充分发展制度下企业的正常情况。”<sup>50</sup>此外，在整个商业周期和所有阶段，资本主义必然卷入所有者和工人之间持续的阶级斗争。

在所有者和工人的协商中，一般的诱哄和推销术不起什么作用……两者之间的讨价还价几乎是直接地竞相利用失业、贫困、工作和产量的限制、罢工、闭厂和停工、间谍、罢工侦察员和类似的相互干扰的策略。非正式用语称之为“劳动纠纷”。劳资双方的商业关系是敌对的，消极或积极地互相阴谋破坏。有时是从法律和习惯允许的范围内的阻碍和反对，从以消极抵抗和效率降低的方式进行的合法的阴谋破坏，到用暴力侵犯个人和财产的非合法的阴谋破坏。协商……已经成为冲突、武装力量和战争策略的习惯用语。这是在公开策略指导下的敌对势力之间的冲突，其中一方的收益建立在另一方的损失之上。<sup>51</sup>

## 政府与阶级斗争

资本主义体系的最终权力在所有者手中，因为他们控制了政府，而政府在任何社会中都是使压迫在制度上合法化的工具。同样，政府的存在也是为了保护现存的社会秩序和阶级结构。这就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政府的首要职责就是实施私有财产法以及保

护与所有者相关的特权。凡勃伦再三强调：

现代政治是企业政治……不论外交政策或内政方针，情况都是这样。不论是法律的制定、法律的执行还是军事、警务、外交事务等等，它们所主要涉及的是企业关系，是金钱上的利害关系，至于同人类的其他利益只是附带地有着一些关系。<sup>52</sup>

资本主义政府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个人的天赋自由不能推翻财产的习惯权利。财产权……与自然权利同样是不可废除的。”<sup>53</sup>资本主义的首要的自由就是自由地购买和出售。自由放任的哲学规定，“只要对生命……对买卖自由没有明显的恶意企图，那么，法律除了采取预防措施，防止发生……对财产的侵犯行为以外，是不能干预的。”<sup>54</sup>这样，以上内容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一个立宪政府就是一个企业政府”。<sup>55</sup>

这并不意味着凡勃伦否认美国的政府为民主政府。他认识到美国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党派，并且美国国民可以自由选举自己支持的党派。但他也认识到美国政府并不总是平等地代表所有的商业利益。商人之间的冲突会反映在不同的政治党派中。

处于一个政府范围内的企业利益，这时可以说是形成了一种浮泛的组织，它的形态或者可称为一种在默契下的企业联盟或辛迪加，它们基于共识而联合对抗非联盟企业的利益。与这样一种企业联盟在计划上、组织上最相近的是有着默契的和公开的政策纲领的现代政党。各个政党之间在目标的细节上是有所不同的，但是那些不仅是一时或表面存在的政党，它们有一点是相互一致的，它们的意志总是在于促进它们所各自认为社会中最好的、最大的、最能持久的那些企业利益。那些获得民众在感情上最广泛支持的企业团体，通过宪法程序，即负责管理政务。<sup>56</sup>

尽管不在所有者和商人们的金钱是他们控制政治的重要因素，但是凡勃伦并不简单地认为商人们只是买通那些腐败的政治家（即使他们常常这样做）。资本家对政治的控制更主要地依靠他们对社会化和教化过程的控制：

代议政体所代表的主要是企业家的利益。政府大多是在相当单纯的意志下为企业家的利益尽力的。政府这种对企业家利益的关怀是有理由的，是受到当前民众感情上的支持的；因为人民方面有着这样一种天真的、不可动摇的信念，认为在某些微妙的情況下，民众的物质利益与出于政府同样涵育下的企业家的金钱利益是一致的。这种信念是一种群众的哲学观点，笼统地认为利益是一个整体……企业家，上层的和次级的，以及一些专业阶级，对于这种信念特别牢固，而工人阶级等方面与之相反，他们是沾染着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但是由于守旧分子包括着有财力和势力的公民以及安分守己的公民的大多数……甚至还包括一些人，这种人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金钱上的利害关系，因此立宪政府在大体上就变成了企业组织的一个部门，受企业家意见的支配……它大部分的工作，甚至表面上与企业利益无关的那些工作，进行时也在企业利益的监督之下。<sup>57</sup>

这种商业对政府的控制遍及政府的所有领域和所有发展阶段。在凡勃伦看来,美国人历来讲求“实际”。假定商业在美国社会中有着重要的影响,那么讲求实际总是意味着有条理。因此,在所有的政府部门中

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具备有效率的前提,并被所有权逻辑支配——最根本的是不在所有权逻辑。基于此种偏见,立法者、行政官和司法官同样需要如此。自然,这些机关的工作人员应该具有良好的信誉和智力。通常要求他们在这些方面达到中等以上的水平,或至少不低于此……毫无疑问,在诚实和完美的原则下,层出不穷的法令、决定、先例和宪法诠释已经主要地、并以越来越大的效果将不在所有权的需要和优势汇聚到这些条文中。<sup>58</sup>

这样,在工人和不在所有者无休止的阶级斗争中,后者几乎总是获胜。政府作为使压迫在制度上合法化的工具,总是控制在不在所有者的手中。由于工人的人数极大地超过了不在所有者,所以对后者霸权的维护,也就是对现存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维护依赖于不在所有者对于政府的控制。在阶级斗争中,一旦某个行业的工人占了上风,政府就会进行干预:

在这一问题,通过建立实施监视和处罚权利建立起了联邦和州立政府……政府机关对所有者和工人之间协商的干预有利于前者。从本质上说,这也是必然的……正如在民主社会中,这些政府机关是由条理分明的人管理,这些人崇拜商业原则——所有权原则;即现今情况下不在所有权的权利、权力和豁免权。从本质上说,政府官员来自于商业团体……律师、银行家、商人和承包商等等……“实际的人类”,他们的先入之见和判断必然起源于持续和成功的商业行为。律师和管理者依赖所有权的法律成功地进行管理和诉讼并证明了自己,所有权逻辑已经成为他们的第二本性。<sup>59</sup>

当这些政府的官员、律师以及法官进行讨论的时候,他们先前的训练无疑会告诉他们:

以(不在)所有权形式出现的勾结、共谋和联合是可取的和有利的,是社会不惜代价所维护的权利和对所有权的维护。资本增加的收益……在必需时将会由适当的武力所捍卫。

否则……将是工人的串通组织。由于没有建立在所有权的基础之上,他们联合抵制贸易的合法权利是非常不确定的。<sup>60</sup>

企业一般会赢得战斗。工人有很强的作业本能,这种本能一般与思想平和相关。商人有很强的掠夺性本能和竞争性公道习俗。工人的生活习惯是创造性的和建设性的。商人的生活习惯是破坏性的并且以掌握一种阴谋破坏的技巧为基础。商人的支持者还有政府和法庭。最后,商人和他们的代理人几乎垄断了“致命武器”的使用权。

按照法律、习俗和官员偏好推断,不允许没有一定财产的个人或团体使用武力、拥有或处置武器。这实际上是认为武器的使用是用来保护财产及捍卫产权的。这个任务同样适应于私人和政府武装力量。在有关拥有和使用武器的法令的管理下……很容易看出允许持有武器主要是针对富有的市民(拥有相当财产的不在所有者)、公司和被礼貌地称为侦探机构的雇佣兵组织。后者在本质上是罢工和停产时公司雇佣的辅助性力量。所有这些都毫无疑问是按照其应该的样子,其意图也毫无疑问是有益的。<sup>61</sup>

无论私有产权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受到了威胁,财产拥有阶级都会借助于武力作出反应。财产权是这个阶级的权力和“自由收入”的基础,所以他们会不惜任何代价保护这些权利:“这是众所周知的,同时在法律和习俗上也是正当和有益的,当诉诸武力时,平民会付出代价。他们的代价就是失业、焦虑、贫困、流血以及痛苦。”<sup>62</sup>

## 资本的帝国主义

在19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和20世纪早期,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扩张是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在第14章里,我们将讨论几种关于帝国主义的经济理论。关于这个主题,凡勃伦也写了很多内容。他认为对利润的追求不分国界。商业的不在所有者发现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都很有可能获取利润,只要能把这些地区置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之下,或者是置于同意外国从他们国家获取利润的本国政府的统治之下。不在所有者成功地使人们相信个人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还将这种做法扩展到爱国主义领域。爱国主义是一种民族主义情操,这种情操可以为政府代表商人利益的侵略性、帝国主义政策赢得支持。凡勃伦写道:“帝国主义是一种在新的名义下的王朝政治,它是为不在所有者的利益而存在的。”<sup>63</sup>他确信“越来越需要这种国家对商业的援助”。<sup>64</sup>帝国主义是必需的,因为

一国的商人……感兴趣于与国外进行贸易获取收益,即意图使国家不在所有者的权利扩展和延伸至一国之外。

出于一种爱国精神的奇妙变形,忠诚的市民也相信本国商人获得的这些跨国贸易收益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整个社会。商人由此而来的收益自然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但国家团结的幻想使得忠诚的市民们相信这些以纳税人为代价的不在所有者的收益将以某种隐密的方式有利于纳税人——以一种有些含糊难解的方式,忠诚的市民不应对此过多地追询……如果有不那么出名的市民,而不是拥有大批财产的不在所有者,在当权者的号召下犹豫不决地献出自己的生命或维生之道来捍卫国旗的荣誉和不在商业在国外的更大利益,那么他就是“规避职责者”。

通过强调这种普遍的爱国偏见和使文明人相信国家物质利益一致的狂热的固执,那么,民主国家当权者主要的——实际上也是惟一的关心是国家富有市民的赢利性生意……共同体的当权者们实际上构成了商人代表苏维埃,其职责是保卫和扩大国家不在所有者的特殊权利。而与此同时,不在所有者的收益是以下层人民为代价的。

不用说,这一切都不是出于恶意。简单的列举有时就会显得是吹毛求疵。<sup>65</sup>

但是,按照凡勃伦的观点,帝国主义带给不在所有者的利润并不是其最重要的特征。帝国主义是一股极端重要的保守的社会力量。伴随机械生产技术的发展,在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的生产力已经迅速地扩展。伴随生产力增长的自然结果就是作业的本能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特性的发展。当作业及其伴生的特点在文化中占有支配地位时,就会危及不在所有权和掠夺性的商业实践的社会基础。作业特征强调合作而不是竞争,强调个人的平等与独立而不是下属与上司之间的关系,强调合乎逻辑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充当礼仪性的角色,强调平和而不是掠夺。不在所有者必须寻找一些办法,以抵消作业、合作、个人的独立以及寻求平和的手足情谊所导致的颠覆性的后果。

为了完成这个重要的任务,不在所有者转向了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社会角色对于凡勃伦有关资本主义运行的观点十分重要,所以我们在此引证他的长文如下:

在企业原则支配下的文化锻炼,其间最大的、也是最有一个因素是国家政策;说它是最有希望的,在于它是破坏主义者的狂想的纠正者……企业利益对国家政策所迫切要求的是一个侵略政策,在这方面从中指引的就是企业家。这是一个好战的政策,也是一个爱国的政策。好战的企业政策的直接文化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它足以助长民众方面的守旧精神。当战争时期……在军事编制中以及在戒严令下,民权总是被抹煞的;战争气氛越浓厚,被抹煞得就越彻底。军事训练是军纪高于一切、绝对的命令、无条件服从的训练。军事编制实质上是奴性的编制。反抗命令是死罪。这种军事训练越贯彻、越广泛,则社会成员对服从的习惯所受到的训练也越有效,那种在滋长中的轻视个人尊严的倾向、形成民主制度的主要弱点的,就可以获得转移。在这方面首当其冲的、受到最有决定性影响的当然是军人,但其余民众也并非置身事外,不过在程度上有差别而已。他们会渐渐地习惯于从战争的角度来看等级、权力、服从等各方面的问題,对于民权的践踏会越来越觉得习以为常……对战争的追逐在训练上的影响……导致群众的注意力不再集中于财富分配不均或生活需求等方面,而转向别的一些更加崇高的、在制度上的危险性比较低的问题。战争气氛和爱国狂热足以使服从和传统威权那些陈旧的品质获得进一步巩固。习惯于好战的、以掠夺为目的的生活方式,是能够用来抵制由和平的工业和机械操作所促成的现代生活流俗化最强有力的锻炼因素,它能够使在衰退中的身份观念、等级不同的尊严感觉重新抬头。战争,以及由战时编制所带来的那种对统治与服从观念的重视,那种在尊严与体面方面划分等级的坚持不懈,始终证明是野蛮的思想方法的有效锻炼。



在这个方面,对于“社会不安宁”以及文明生活中相类似的不稳状态,显然寄托着能有所纠正的希望。把那些古旧的品质和习惯,诸如忠诚、虔诚、顺服、不同等级的尊严、阶级特权、传统权利等到逐一恢复以后,人民的满意和处理事务的顺手则指日可待。在这一点上的确没有什么重大疑问。这就是一个需要奋斗的国家政策所寄托的希望。<sup>66</sup>

### 金钱文化的社会道德观念

作业的本能发挥重要影响的地方,社会就会向着知识进步、合作、平等和互相帮助的方向发展。但是资本主义的阶级分化依赖于有关剥削掠夺特性的持续——对掠夺技巧的赞美、下级的默许以及神话和礼仪对知识的替代。不在所有者的自由的和不劳而获的收入最终依赖于掠夺性的文化和社会控制,或者依赖于资本主义制度中崇拜金钱或商业的文化。

当掠夺性的本能支配社会的时候,流行的习俗就是有闲阶级(leisure class)的观念,它们构成了社会的占主导主位的因素。凡勃伦认为:“有闲阶级的涌现和所有权的开始是同时发生的……他们不过是社会结构同样的一般事态的两个不同方面。”<sup>67</sup>在所有的阶级分化社会中,有闲阶级和平民的职业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基本的明显的区别。“在这种古老的区别下”,他写道,“凡是值得尊敬的业务,可以归入属于侵占的那一类,不值得尊敬的业务,是那些必要的日常工作,在这类工作中,并不含有值得重视的侵占成分。”<sup>68</sup>

在所有的阶级分化的社会中,一个人或者一个集团的掠夺性力量得到了可能的最高的尊重。如果一个人具有很强的掠夺能力,那么他在社会中就会被赋予尊贵的地位。这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现代经济制度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范畴——金钱的和工业的。工作方面也是这样。前一类工作同所有权或营利有关;后一类工作同作业或生产有关……有闲阶级的经济利益在于金钱的工作;而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则……主要在于工业一类。要跻身有闲阶级,其经由的途径是金钱的工作。

这两类工作对性格倾向的要求,彼此是在实质上有差别的……金钱工作的锻炼所发生的作用是保持并培养某些掠夺倾向和掠夺意志……只要人们的思想习惯是在营利与财产占有的竞争过程中形成的,只要其经济职能不出于以交换价值表现的财富的占有,不出于通过交换价值来进行对财富的管理和融通这个范围,在其经济生活中的经验,就必然有助于掠夺气质与掠夺思想习惯的存在和加强。在现代的、和平的经济体系下……通过金钱工作使工作者日益精通、谙练的是属于机巧诈伪的一般实践。<sup>69</sup>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存在一个职业的等级划分:从最尊贵的——不在所有者——到

最为粗俗和令人厌恶的——创造性劳动。

于是不同的工作在荣誉性上有了高低不同的等级。在各项经济工作中最富有荣誉性的是那些大规模地直接同所有权有关的工作。其次是直接有助于所有权与金融活动的那类工作——例如银行业务和律师职务。银行工作本身也含有巨大所有权的意味；这一行业之所以体面，无疑部分是由于这一事实。法律专业本身并不含有巨大所有权的意味；但是由于律师这个行业，除了用之于竞争的目的以外，没有沾染上有实际生产用途这样的污点，因此它在传统结构中列入的等级是高的。作为一个律师，他所全力应付的是有关掠夺性诈伪的一些具体活动，有时欲成其事，有时加以挞伐，因此把这种职业上的成功看作是在未开化的狡诈气质方面禀赋的标志，而这类气质却总是能博得人们的敬畏的……至于体力劳动，甚至管理机械操作的工作，其间是否含有些微的荣誉意味，当然是大可怀疑的。<sup>70</sup>

但是富有的不在所有者往往居住于大城市，他们大部分时间都会与律师、会计师、股票经纪人和其他顾问在一起，买进和卖出股票和债券，巧妙地处理财务交易，还会经常策划破坏和欺诈的诡计。因此，虽然在比较野蛮的文化中掠夺性美德非常明显和直接，以至于很容易引起平民的赞美和羡慕，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这种掠夺性美德会隐藏起来避开人们的视线，所以引起赞美和羡慕实属不易。

要获得并保持尊荣，仅仅保有财富或权力还是不够的。有了财富或权力还必须能提出证明，因为尊荣只是通过这样的证明得来的。财富有了证明以后，不但可以深深打动别人，使人感觉到这位财富所有人的重要地位，使人一直保持这个活跃的印象而不磨灭，而且可以使这位所有人建立起并保持自鸣得意的心情，在这一点上其作用也是不小的。<sup>71</sup>

在《有闲阶级论》一书中，凡勃伦用了大部分的篇幅，详细描述了有闲阶级是如何通过炫耀性的消费和炫耀性的闲暇使用方式来显示他们的掠夺性才能的。对于凡勃伦来说，炫耀性消费常常是与挥霍浪费相一致的。比如说，富人的住房“比一般教徒所住的房子在华丽程度上，在建筑和装饰的明显浪费程度上，总要高出一筹”。<sup>72</sup>对于富人来说，拥有昂贵、华丽并且基本上无用的——但是昂贵是首要的——主要用于炫耀的行头是必需的。对于有钱人来说，一个物品越是没用和昂贵，就越会被当作炫耀性的消费品而得到珍视。而那些普通人能支付起的有用物品却会被看作是庸俗的。

精心制作的美丽衣物以及炫耀其妻子，对于一个有品味的富人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拥有无数的仆人，这表明妻子无需像普通的家庭主妇一样做那些粗俗的工作，同时还表明妻子本身就是一件用来提高丈夫名誉的、具有美貌但无实际用途的、只是用以炫耀的战利品。海边的别墅、游艇以及精心建造的山洞城堡，所有这些都很少使用，但是很显眼，对于获得尊重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凡勃伦着重描述富人的炫耀性消费,而非热衷于趣闻轶事。金钱文化首先是一种让人厌恶的文化。当个人价值的评估置于一种歧视性对比的金钱体系中,那么,社会中最强的力量之一就是竞赛,这正是社会、经济和政治保守主义的最重要的保证。

有钱人通过使“掠夺或寄生原则”<sup>73</sup>永恒化,用以维持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的行为自然得到一个信条,即“不论什么,凡是现有的总是好的”<sup>74</sup>。他们生来是极端保守的。社会上最贫困的人对于这种掠夺性的金钱秩序几乎不能构成任何威胁:

赤贫阶级,以及所有那些把全部精力消耗在日常生活斗争中的人们是保守的,因为他们再也没有余力去想到明天以后的日子;恰恰跟这些人相同,时运太好,生活过得非常得意的人们也是保守的,因为他们对今天的情况感到不足的机会很少。<sup>75</sup>

一般来说,正是那些经济上比较有保障的工人阶级对社会现状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他们一般都掌握了非常有用的生产技能,这就意味着他们通常都非常以这些技艺为荣。这样一来就持续着一种危险,即与作业的本能相联系的特性——清晰的逻辑思考、合作、互助以及普遍的人道主义——将会逐渐增强,到一定时候这些工人就会转向无政府主义或者社会主义,以达到发展作业特性的霸权使其超越掠夺性的金钱特性的目的。竞赛性消费是消除这种威胁的一种主要方式。然而,竞赛性消费代表了一种单调的工作,人们不可能从中取得任何进步,同时,如果想要摆脱这种单调的工作,即使有可能成功,也会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人一旦进入这种单调的工作,他就会放弃自己的原则而全身心投入这种掠夺性金钱文化的习俗中去。凡勃伦关于竞赛性消费的观点,同他有关爱国主义、尚武精神和帝国主义的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的观点一起,构成了他有关不在所有者和商业利益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统治资本主义的理論的核心。

尽管“自由收入”、特权以及资本家的权利直接来自于财产所有权的法律、财产权集中于不在所有者手里、不在所有者对政府的控制以及致命武器的合法使用权,这一切都是事实。但从长期来看,他们统治社会的权利主要取决于控制大部分工人的情感、思想和意识形态。

如果绝大多数工人最终意识到资本家对于生产过程没有做出任何贡献,资本家的商业和金钱活动是工业体系萧条和发生故障的原因,资本家得到的不成比例的大量财富和收入使得社会上大部分人处于贫困状态,生产过程的退化正是资本家掠夺性风气盛行的结果——如果工人们最终认识到了这些事实,那么他们一定会将工业体系从金钱商业文化的法律、政府、制度压迫和束缚中释放出来,他们一定会以革命推翻资本主义。

资本家依赖两种主要的手段——文化训练和社会控制。正如我们看到的一样,第一种手段包括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尚武精神和帝国主义。第二种手段在感情和意识形态上控制人们,这种手段通过竞赛性消费(这种现象后来被称作“消费主义”)来实现。在凡勃伦的整个理论中,这种现象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将引用他的原文进行详细地解

释:

财富……和威力……是博得荣誉和地位的必要条件,如果在这两个方面分别超过了标准,能够出类拔萃,那就会受到大众的钦仰。

社会中的成员,在勇武精神上或占有财产上如果没有能够达到这一标准的、虽然是不十分明确的界限,就不免要受到同辈的轻视,从而也不免要损失自尊心,因为同辈对他的尊重,往往是他产生自尊心的基础。只有性格反常的人,才能长期受人白眼而不影响他的自尊心……。

因此,财产的保有一旦成为博取荣誉的基础,它也就成为满足我们所称为自尊心的必要手段。在任何社会里……个人为了求得自己心理上的安慰,他所保有的那份财物,就不得少于他所惯于把自己列入同级的那一类人所保有的财物;如果他所保有的比别人还能多一些,他就会觉得非常欣幸。但是一等到新有所获,他对于在财富上所达到的新标准已经安之若素以后,则由于新标准高于原有标准而引起的那种格外的满足心情就不复存在。在任何情形下,总是以现有的金钱标准为出发点去争取财富的进一步增长,这个倾向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这一点反过来又引起了满足心情的新的标准,以自己的资力与同辈的资力作对比,又引起了金钱上新的分等分级。就这里所涉及的问题来说,累积财富时所寻求的目标,是在于争取在资力上与社会中的其余成员相形之下的优势。一个普通的、正常的人,如果在这样的对比下显然居于劣势地位,他就不免要一直在忧怨中度日,不能满足于当前的处境;如果一旦达到了社会的、或社会中所属阶级的所谓正常的金钱标准,他原有的长期不满情绪将为另一种情绪所代替,那时他所片刻难安的将是,怎样使他自己的金钱标准与这个平均的金钱标准之间的差距能够扩大、再扩大。但个人之间的这种歧视性对比的演进是无止境的,在这种对比之下的个人绝不会居于那样的有利地位,以致在金钱地位的角逐中,与其竞争者相形之下,竟不想再爬高一步。<sup>76</sup>

当人们被这种竞赛性消费或者说消费主义所迷惑的时候,不管得到多少收入,他们都会过着一种“长期得不到满足”的生活。凡勃伦认为,工人的痛苦主要起因于赤贫的工人阶级的物质匮乏。而对于其余的工人阶级来说,这种痛苦是由于劳动力的社会堕落以及与竞赛性消费相关的“长期得不到满足”所引起的。对于物质上较优越的工人来说,其痛苦主要是精神方面的。但是,凡勃伦强调这种痛苦“因为是精神上的,所以更真实,更强烈。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也更加实际、更加无可弥补”。<sup>77</sup>

这种痛苦似乎是无可弥补的,因为工人们对它的反应加深和延长了这种痛苦,他们的反应就是认为如果获取更多、消费更多的话,他们就会快乐。所以工人们开始负债,越来越依赖于职位晋升和获取更多的收入,并且最终相信他们解决长期得不到满足的惟一可能的方法就是取悦他们的雇主,永远避免分裂性或激进的言行。

但是这样单调的工作是无止境的。一个人越是努力克服其长期得不到满足而诱致的

和痛苦,就越变得更加不满、更加痛苦。在一个存在歧视性社会等级和炫耀性消费的制度中,工人很少会将自己的困境怪罪于“制度”、“既得利益者”或者“不在所有者”。他们一般会怪罪自己,这样就导致了自尊和自信的进一步下降,同时使得他们和金钱文化的价值观连接得更加紧密。

然而,与金钱文化价值观相反的是与作业本能相关的价值观。绝大多数人的尊严和最终快乐,取决于作业价值观最终战胜商业的掠夺性金钱价值观。凡勃伦对于作业价值观得以取胜所必需的条件毫不怀疑:

与竞争的目的不是绝对的舒适或杰出一样,社会平均富裕的提高也不能终止或减少这种压力。普遍的改善不能平息邻里之间攀比所产生的纷乱。

人类彼此斗争以使自己比别人拥有更多的这种本性,与私有产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自满的标准主要是拥有或享受。相对于合法占有或享受“更多”的可能,人们的不断增强的伤感——那些拥有较少的——茫然地赞成对拥有较多的人进行不利的重新分配。即这种伤感的发展赞成社会主义运动……使得人们必须从私有产权中寻找社会主义产生的纷乱的理由。现代私有产权下……嫉妒和纷乱是不可避免的。

现代工业体制的基石是私有产权制度……进一步说,这也是现代体制下的必然结果——纷乱和不满的最终原因是为争取经济地位。结论似乎是人类的本质本来就是这样,必须承认,不可能有从这种不名誉的竞争,或随之而来的不满中平息的时候,除非废除私有产权。<sup>78</sup>

在这个写于1892年的引文中,凡勃伦认为,潮流趋向于支持社会主义的力量或者说作业的价值,同时反对商业的力量或者说金钱价值观或掠夺性本能。1904年,他仍然比较乐观(不过,程度稍微低了一些),他写到工业职业“特别适宜于打破旧风气旧习惯的养成,这一点与社会主义的倾向是一拍即合的”。<sup>79</sup>然而,掠夺性价值观、金钱商业文化仍然非常强大:

这两个相反的动力最后是哪一个占优势,只有天知道;但就可以想得到的将来的局面而言,似乎总不出于这两者之一。似乎企业的全盛统治是昙花一现的统治。<sup>80</sup>

在以后的二十年里,凡勃伦目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爱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泛滥,盲目的、狂热的民族沙文主义,以及歇斯底里的压制性后果——伟大的红色恐怖,朝圣者袭击,以及绝大多数人盲目地默许政府对所有进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所进行的有计划的镇压。凡勃伦的心情从谨慎的乐观转变成失望和悲观。他对于资本主义被转变成一个体面的、人性化的社会似乎不抱什么希望;也就是说,他似乎对社会主义也不抱什么希望。但是,他仍然坚信,私有产权及其金钱与掠夺性文化是过时的制度,并且是注定要瓦解的带有时代性错误的制度。前途似乎是非常暗淡的:

最终,物资环境变迁的压力自然将塑造人类行为的方式,甚至是带来灭种的危险……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物资必需品匮乏的压力将保证法律和道德礼仪能够使国家免于这种死亡威胁。

不管任何民族经历过既定时期的这种变迁之后,是否仍然存在或适于生存,似乎与人类的洞察力关系甚微,而人类的远见不起任何作用。<sup>81</sup>

## 凡勃伦思想的评价

严格来说,凡勃伦虽然不能被看作是马克思的信徒,但是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之间的相似之处还是非常明显的。他们都坚持用历史方法来研究资本主义,将资本主义看作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短暂的社会,这个社会是建立在为数不多的寄生性所有者组成的统治阶级剥削直接生产者的基础之上的。他们都把资本主义法律和私有产权看作资本家权利和工人地位下降的基础。他们都从非常类似的角度看到了资本主义给劳动人们生活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他们两人都将日益增强的工业集中看作竞争不可避免的后果,都将经济危机和萧条看作资本主义内生的机能。最后,他们两人都将资本主义政府看作是资本家阶级利润和特权的必不可少的实施者和保护者。

当然,在这两个人的理论中也存在着重要的区别。凡勃伦非常强调资本主义的历史和进化本质,以至于他拒绝接受以均衡术语表达的经济理论的大部分形式。虽然马克思相信关于资本主义的历史理解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他仍然认为应该将资本主义的许多特殊的历史变迁环境看作是固定的或是既定的,以便研究这个体系的短期功能。马克思做这些研究时,常常会利用均衡的分析方法(如同在其危机理论中,是证明达到持续的均衡是不可能的)。马克思的分析在很多领域都明显优于凡勃伦,这种区别就是其中之一。这种不同所导致的两大主要结果,凸显了马克思理论的优越性。

首先,尽管马克思和凡勃伦都将工资和利润的决定看作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持续不断地阶级斗争的结果,但是凡勃伦从未能够将这种斗争的结果转化为有关工资率和利润率决定的具体理论。这是因为凡勃伦避开了均衡理论,所以他没有任何价值理论。而无论是效用价值论(凡勃伦和马克思同样厌恶)还是劳动价值论(凡勃伦予以拒绝)基本上都是均衡理论。马克思已经证明在任何特定时期,劳资之间的斗争都会导致某个广为接受的、在理论上予以界定的工人生活最低标准。在短期内将这种标准看作是给定的,这样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使得他可以解释下列问题:利润的本质和起源、劳动力的价值以及利润的数量和利润率。凡勃伦的理论从未关注过这些问题,他仅详细论述了(以最具有洞察力、最精确的方式)那些随着时间流逝可以导致这些数量发生变化的力量,但是对于任何时间段的利润和工资的精确本质和数量,他却从来都未曾解释过。

其次,马克思有关危机和萧条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比凡勃伦的更加全面。两位思想家都对导致资本价值毫无理由的增殖的金融投机方式做了详尽和深刻的阐述,这反过来又会导致金融和工业危机。但是,由于马克思并不否定均衡理论,所以他能够说明平滑连续的“扩大再生产”或者说经济增长的必要均衡条件。由此,他还说明了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实际上不可能持续地满足这些条件,同时他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些条件中的任何一个无法满足都会很容易地引起经济危机或萧条。凡勃伦确实也需要一个相似的理论来调和他理论中的一个表面(但并不是实际上)的矛盾:关于竞赛性消费或者说“消费主义”的精彩描述,似乎可以保证持续充足的总需求,这样一来,他认为是资本主义内生的持续的危机和普遍的停滞将永远不会发生。假如他将某些理论——类似于马克思的部门不平衡理论——融入他自己的理论的话,那么,这个明显的矛盾就会消失,并且竞赛性竞争和萧条都可以被证明是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内生性质。

但是,凡勃伦在某些领域的分析无疑是超越了马克思的。虽然他们都从非常类似的角度看到了资本主义给工人的物质、精神、感情和艺术生活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但是马克思认为工人反抗和推翻资本主义的时刻已经非常接近了。马克思的认识似乎是由于他没有足够关注社会文化规范和习俗,同时也没有考虑它们在工人社会化过程中的影响。尽管这些影响对工人自己的利益是有害的,但是他们还是接受了这些社会化影响,这就促进了资本家的利益。凡勃伦关于爱国主义热情和竞赛性消费力量的分析是非常敏锐和极具洞察力的,正是这些理论使得工人们接受了自我击败的态度。直到今天它都是有关下述问题的最有力、最精准的解释之一:为什么工人们不仅忍受剥削和异化,而且对于引起和维持剥削和退化的这些制度、法律、政府和一般的社会习俗还总是持支持态度?

马克思的理论几乎对于所有社会主义政治运动来说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各种政治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者都非常尊敬马克思。相比之下,凡勃伦的理论似乎一直都没有得到社会主义者足够的重视。当然,对于这个相对的忽视,我们不可能给出全面充分的解释。但是,至少有两条原因可以部分地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大部分社会主义者都是政治积极分子,所以他们倾向于崇拜那些在政治上很积极的人。但是凡勃伦对于政治活动似乎并不热心积极,而马克思在政治上却非常活跃,因此凡勃伦也就无法获得人们像对马克思一样的崇敬之情。但是这个观点有点目光短浅。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斗争不仅是一场停留在组织和开展具体政治活动水平上的斗争;同时它也是一场有关思想的斗争。

如果阶级之间的斗争被视为是有关思想的斗争,那么它就是一场赢得工人和其他社会成员的心灵和思想的斗争,也就是要寻求对资本主义足够清晰的理解,直至有一天它可以有效地转变为一个更人性的有利于完全发挥人类潜力的社会。就资本主义阶级斗争本身表现为有关思想的斗争这一点来看,凡勃伦是一流的政治活动积极分子。他成功地揭露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因素,而关于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和剥削本质,他也提出了清晰和敏锐的观点。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许多社会主义者忽视凡勃伦理论的第二个原因,正是我们认为凡勃伦理论的优越之处。许多社会主义者之所以不喜欢凡勃伦正是因为体现在他晚年著作中的悲观主义。但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这种悲观情绪是由于凡勃伦了解了资本主义文化是一种使工人社会化以促进与其自身相反的利益的手段,同时,凡勃伦也见证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和紧随其后的时间里蔓延于工人阶级中的爱国主义热情。这种爱国主义热情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工人阶级中的绝大部分都默许了战后政府发起的严酷无情的镇压——对那个时期最进步、最富有战斗性的劳工和社会主义组织发起猛攻。但是,凡勃伦又一次以其仅有的方式进行反击——用他谴责性的、犀利的、讽刺的、尖锐的文笔抨击政府的这些政策。

在评价凡勃伦的悲观主义的时候,我们所能够做的都比不上直接引用社会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一本书中的最后两段话。我们认为,这两段话同凡勃伦在结束他的职业生涯时所写的一样,准确地反映了其作品的精神和影响:

任何人在写书的时候,不管其所传达的信息多么令人沮丧,都必须持有乐观主义的态度。而如果悲观主义者真正相信他们所说的,则毫无意义可言。

通过关于个人利益的追求必然导致普遍福利的证明,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们宣称摆脱了道德问题。(新)一代的任务是……将道德重建于技术之上。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就是让他们了解这个任务的必要性和艰巨性。<sup>82</sup>

#### 注 释

1. Thorstein Veblen, "The Limitations of Marginal Utility," in *The Place of Science in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Russell and Russell, 1961), p. 241.

2. Thorstein Veblen, "Fisher's Rate of Interest," in *Essays in Our Changing Order*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4), p. 143.

3. Veblen, "Limitations of Marginal Utility," pp. 241~42.

4. C. E. Ayres, "Veblen's Theory of Instincts Reconsidered," in *Thorstein Veblen: A Critical Reappraisal*, ed. Douglas F. Dow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25.

5. Thorstein Veblen, "Why Economics Is Not an Evolutionary Science," in *Place of Science in Modern Civilization*, pp. 73~74.

6. Thorstein Veblen, "Professor Clark's Economics," in *Place of Science in Modern Civilization*, pp. 182~83.

7. Thorstein Veblen, "Fisher's Capital and Income," in *Essays in Our Changing Order*, p. 163.

8. 同上,第 164 页。

9. 同上,第 166~167 页。

10. Veblen, "Professor Clark's Economics," p. 193.

11. 同上,第 195 页。



12. 同上,第 197 页。
13. Veblen, "Fisher's Rate of Interest," p. 142.
14. Thorstein Veblen, "Böhm-Bawerk's Definition of Capital," in *Essays in Our Changing Order*, p. 136.
15. 同上,第 135 页。
16. Thorstein Veblen, *Absentee Ownership and Business Enterprise in Recent Times*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4), pp. 402~3.
17. 同上,第 407 页。
18. Thorstein Veblen, "The Beginnings of Ownership," in *Essays in Our Changing Order*, p. 32.
19. 同上,第 33~34 页。
20. Thorstein Veblen, "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and the Irksomeness of Labor," in *Essays in Our Changing Order*, p. 85.
21. 同上,第 84 页。
22. 同上,第 86 页。
23. 同上,第 87,89 页。
24. Veblen, "Beginnings of Ownership," p. 95.
25. 同上,第 43 页。
26. 同上,第 42 页。
27. Veblen,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p. 95.
28. 同上,第 93~94 页。
29. Veblen, "The Barbarian Status of Women," in *Essays in Our Changing Order*, pp. 51~52.
30. 同上,第 52 页。
31. 同上,第 55 页。
32. 同上。
33. 同上,第 64 页。
34. Veblen, *Absentee Ownership*, p. 291.
35. Veblen, "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p. 202.
36. 同上,第 187~188 页。
37. 同上,第 188 页。
38. 同上,第 189~190 页。
39. 同上,第 191 页。
40. 同上,第 185~186 页。
41. 同上,第 222 页。
42. 同上,第 224 页。
43. Veblen, *Absentee Ownership*, pp. 210~11.
44. 同上,第 210 页。
45. Thorstein Veblen, *The Engineers and the Price System*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5), p. 1.

46. 同上,第 13 页。

47. 同上,第 12 页。

48. Veblen, *Absentee Ownership*, pp. 215~16.

49. 同上,第 220~221 页。

50. Thorstein Veblen, *The The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5), p. 234.

51. Veblen, *Absentee Ownership*, pp. 406~7.

52. Veblen, *The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 p. 269.

53. 同上,第 272 页。

54. 同上,第 278 页。

55. 同上,第 285 页。

56. 同上,第 293~294 页。

57. 同上,第 286~287 页。

58. Veblen, *Absentee Ownership*, pp. 405~406.

59. 同上,第 404~405 页。

60. 同上,第 409~410 页。

61. 同上,第 411 页。

62. Veblen, *Essays in Our Changing Order*, p. 413.

63. Veblen, *Absentee Ownership*, p. 35.

64. 同上,第 35 页。

65. 同上,第 35~37 页。

66. Veblen, *The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 pp. 391~93.

67. Thorstein Veblen,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5), p. 22.

68. 同上,第 8 页。

69. 同上,第 229~230 页。

70. 同上,第 231~232 页。

71. 同上,第 36~37 页。

72. 同上,第 120 页。

73. 同上,第 209 页。

74. 同上,第 207 页。

75. 同上,第 204 页。

76. 同上,第 30~32 页。

77. Veblen,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p. 95.

78. Thorstein Veblen, "The Theory of Socialism," in *Place of Science in Modern Civilization*, pp. 396~98.

79. Veblen, *The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 p. 351.

80. 同上,第400页。

81. Veblen, *Absentee Ownership*, pp. 17~18.

82. Joan Robinson, *Freedom and Necessit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 p. 12.

## 第 13 章 帝国主义理论：霍布森、卢森堡和列宁的著作

资本主义已成为一种在世界范围内运行的经济制度。捕获并售卖非洲黑人是资本主义初期阶段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对美洲和非洲的强行占领是使贵金属流入欧洲的主要原因，这些贵金属使多数欧洲经济货币化成为可能——经济货币化是商品生产的一个必要前提。在资本主义初期阶段，对无数殖民民族的暴力征服，从而为许多政府所创建或保护的欧洲贸易公司制造了众多牟取暴利的特权庇护所。

然而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上半期，努力实现工业化似乎占据了资本家几乎所有的注意力、时间和金钱。在此期间，资本家对资本主义的诞生地即北大西洋区域以外世界加以征服、殖民、镇压并进行剥削的动力则处于停歇状态。当然，这是暂时的。19 世纪的最后三十年间，当工业、金融和商业权利日益集中于巨型公司之手，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金融帝国(internal financial empires)正在创建之时，资本帝国主义便开始了世界范围内的征伐。为了巨型公司牟取利润和潜在利润的需要，主要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各国进行了无情的暴力征服。

例如非洲，尽管血腥残暴的奴隶贸易已持续了几个世纪，但到 19 世纪早期，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势力却仅限于沿海岸地区。然而，到 20 世纪早期，经过一场残暴野蛮的大屠杀，外国资本主义统治暴力占领了非洲一千万平方英里的土地或大约非洲 93% 的领土。法国大约占领了其中的 40% (多数位于撒哈拉沙漠腹地)，英国占领了大约 30%，剩下的 23% 则为德国、比利时、葡萄牙和西班牙所攫取。

尽管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从事剥削性贸易的历史十分久远，但在 18 世纪后半期和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贸易让位于野蛮的军事占领和残酷的经济、社会剥削。19 世纪后半期，这种剥削变得如此深重，以至于超过三分之二的印度人口严重营养不良；饥

荒、疾病和穷困盛行,1891年,印度人口的平均寿命不超过26岁,而且通常死于贫困。

19世纪后半期,未被占领的亚洲部分也被欧洲资本主义列强瓜分。1878年,英国侵占了阿富汗,并将其置于英国控制的印度政府统治之下。1907年,俄国和英国瓜分了波斯。到1887年,法国已控制了印度支那的全部领土。马来半岛和马来群岛(该群岛延绵将近3000英里)被武装占领并加以瓜分。英国侵占了新加坡和马来诸国、婆罗洲北部及新几内亚南部。新几内亚的北部领土被德国占领,剩余的多数海岛(总面积大约有735000平方英里)则为荷兰所占领。

在此期间美帝国主义同样猖獗。通过一系列针对土著人的阴谋策划、侵略和血腥军事镇压,美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已经控制了萨摩亚群岛、中途岛、夏威夷、波多黎各、关岛、菲律宾群岛、图图伊拉岛、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尼加拉瓜和巴拿马运河区域。

在19世纪后三十年的帝国主义狂飙时期,英国用暴力攫取了450万平方英里土地,并将之归到帝国名下;法国夺取了350万平方英里;德国,100万平方英里;比利时,90万平方英里;俄国,50万平方英里;意大利,18.5万平方英里;美国,12.5万平方英里。总共四分之一的世界人口被征服,并被置于欧洲和北美资本主义政府的统治之下。

就资本主义政府而言,两个原因促使其渴望进行征服和统治。

第一,大多数被征服人民一直生活在一种传统的、非资本主义的、无市场的社会中,因此他们这种传统的、非金钱文化是大型资本主义公司从事商业剥削和资源掠夺的障碍。所以,为了创造有组织的商业剥削所必需的广泛的商业联系和对市场的普遍依赖,借助于类似马克思所说的“原始积累”等方式,这些文化必然遭受暴力摧残。当然,强行摧毁这些社会中的制度及传统生活纽带是一个野蛮而血腥的过程,其情形类似欧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

第二,即使这些不发达国家的传统制度和生活方式已经被摧毁,同时对市场的广泛经济依赖已经确立,但是,如果工业资本主义国家能有效地统治这些不发达国家,他们就能制定对自己更为有利的贸易条件。

新古典经济学家从未对帝国主义问题进行过任何理论探讨(迄今也未予以探讨)。这并不奇怪,因为在他们看来,所有的经济理论都不过是交换理论的扩展和详尽阐述。这些经济学家把帝国主义中不包含纯粹自愿经济交换的诸方面定义为“非经济的”,因而不予理会。包含交换的那些方面则与任何其他的交换毫无区别——即交换不仅使双方受益,而且以和谐为主导。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产生了一个被称作“国际经济学”的专业领域。国际经济学几乎完全是对斯密、李嘉图和穆勒思想的发展,即认为得自国际贸易的利益同得自任何形式的专业化和交换的利益基本一致。在新古典经济理论范围内,国际交换和国内交换的主要差别有两条:首先是,政府会制定关税和其他国际自由贸易的壁垒;其次是,国际交换中牵涉不同国家的货币。新古典国际经济理论主要由功利主义的论证构成,即若想让自由贸易以其惯常的和谐方式惠及所有国家中的每个人,那么就on应该废除所有

的贸易壁垒。它还包括复杂的演绎理论,以表明在完全竞争和国际和谐条件下,不同货币间的汇率如何确定。

因为新古典理论假设其理论范畴——效用、交换、地租、利润和工资——反映了所有社会的普遍特征,而且资本主义是“自然的”和“永恒的”,因此,几乎不可能期望新古典理论家对先前的非资本主义社会传统文化制度遭受的掠夺性毁灭会做出系统分析。问题似乎经常是这些传统社会的人们就是不能意识到,一旦他们的社会对资本主义剥削开放,市场就会带给他们“巨大的利益”和“和谐”。而且,正如新古典效用理论者所说,当无财产的工人用劳动力换取生存工资而不是拒绝而导致饿死时,他得到了巨大利益。他们同样认为,一旦让被帝国主义征服的文化中的人民陷于贫困并依赖市场而生存,这种交换(不管其外国统治者的相对议价能力如何)同样对他们有利。毕竟,进行交换而生活于穷困、匮乏和赤贫中必定胜过不交换而死亡。

公平地说,没有几个重要的新古典理论者是事实上的军事占领的直接和显而易见的辩护者。对经济学家而言,他们只是把军事占领作为不合适的主题而加以忽略,可是,一旦这种占领结束后,他们又忽视了交换者的相对议价能力(正如事实上对所有交换的分析一样)而赞美交换带来的普遍慈善与和谐。

然而,许多新古典传统行列之外的经济理论家关注帝国主义问题。他们试图理解这一问题,希望这种理解能有助于为结束帝国主义剥削所作的努力。在以前的章节中,我们讨论了凡勃仑对帝国主义的性质、原因和结果的看法。在本章中,我们将简单讨论约翰·阿·霍布森(J. A. Hobson)、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列宁(V. I. Lenin)有关帝国主义的性质和原因的理论。

### 霍布森的资本的帝国主义理论

约翰·阿·霍布森(1858~1940)是一位著述颇丰的知识分子,其著作多达30余卷。终其一生,他都是各种激进社会事业的支持者。他的著作《帝国主义:一个研究》,于1902年首次出版。在所有已出版的研究帝国主义问题的著作中,这本著作很可能最具影响。几乎所有对帝国主义问题的后续理解都深受霍布森这本开拓性著作的影响。

霍布森把帝国主义看成是一种“社会寄生过程。国内的金融势力依靠这种过程,篡夺了政权,为了把经济的吸管拴在外国身上而助长帝国扩张,以吸干它们的财富,支持其国内的奢侈生活”。<sup>1</sup>他意识到帝国主义是一种复杂而具有多面性的现象。帝国主义是许多各自独立的社会力量,如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宗教狂热和军国主义共同作用的结果,更是资本家永不休止地攫取更多利润的结果。因此,霍布森所感兴趣的是研究这些不同的社会力量以确定它们对于帝国主义的形成与长期存在的相对重要性。

在使自身合法化的官方宣传中,帝国主义通常被描述为一种为“低等种族”“带去文明”,“带去基督”的仁慈追求。例如,美国总统麦金利(McKinley)把美国军队对菲律宾人独立运动的残暴血腥军事镇压行为描述成“让菲律宾人受教育、提升他们的道德水准并用基督教教化他们”的努力。相同的粉饰之辞几乎为每个帝国资本主义国家所重复。霍布森认为,尽管表面上看来使“世界上落后人民”“教化”“进步”并非纯粹的宣传者的谎言,然而它确实是一种虚伪的、欺骗人的自负,掩盖在它背后的是帝国主义的真实动机:

我们深知大部分英国传教士完全没有被政治上和商业上的混合动机所沾染,他们纯粹以自我牺牲的精神从事其传教事业,极想拯救非教徒的灵魂,丝毫无意于促进英国贸易或“把帝国主义的精神神圣化”。<sup>2</sup>

霍布森相信这种传教工作之所以受到鼓励,是因为它为从事帝国主义剥削的政治家和商人们提供了表面看来高尚的动机:“政治家和实业家往往相信高尚动机使他所获得的利益合理化。”<sup>3</sup>事实上,正是帝国主义的这种基督成分构成了它最恶劣的特征之一:

恰恰在动机的真实含意的歪曲中,存在着帝国主义的最严重的罪恶和最显著的危险。在杂然混合的种种动机中,为了哗众取宠而选择最拿得出去但最不令人信服的动机之时,在把制定政策的人未经慎重考虑的政策结局作为主要原因之时,国家的道德标准降低了。帝国主义的全部政策都隐藏着这种欺骗性。<sup>4</sup>

那个时代的一些理论家把帝国主义仅仅解释成他们所认为的人类天性中所固有的军事主义和主战主义的结果。尽管霍布森承认:“当然,陆海空军从信仰上和职业利益上都是帝国主义者,陆海空军的每一次军事力量扩张都巩固加强了他们的政治权力。”<sup>5</sup>他相信这是所有军职人员共有的一个普遍特点,因此,这不能用来解释最近帝国主义统治的激增。社会上的主导政治力量并不由军职官员构成。而且,霍布森表示爱国主义和主战主义并非人类本性的固有特点。相反,它们是后天从社会中习得的:“主战论不过是旁观者的贪欲,不曾为任何个人的努力、冒险或牺牲所肃清,对其不相识的同胞的危险、痛苦和杀戮幸灾乐祸,但是他对同胞毁灭的希望,是出于盲目的、人为激起的憎恨和复仇情绪。”<sup>6</sup>

这种盲目的仇恨是“人为激起”的,因为“政党、新闻、教会、学校发挥作用,把那些竞争、支配和贪得无厌等原始欲望加以荒谬地理想化,以此来形成舆论和制定国策……现在为了帝国的侵略、扩张和强制掠夺,再度需要这些欲望的刺激”。<sup>7</sup>

另外一些理论者把帝国主义归于政治本性所固有的盲目和无理性。霍布森不赞同这种看法:

此等战争愚蠢得可悲,甚至胜利者也蒙受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损害,这使公正的观察家看得很清楚,他对任何国家能成熟到通达事理感到绝望,并认为此等自发的变动在政治上是根本不合理的。但是仔细分析了商业和政治之间的现存关系,就可知我们企图了解的

侵略性帝国主义,基本上并非盲目激情……或政治家的愚蠢和野心交织的产物。它比乍见之下所看来要合理得多。从整个国家的观点看是不合理的,而从国家的某些阶级的观点看又是完全合理的。<sup>8</sup>

因此,在霍布森看来,促进并指导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是永不停止的一种动力,即积累资本并把得自这笔资本的利润投资于新的但同样有利可图的资本的那种动力。但问题是,随着资本积累,为这些资本找到投资途径变得越来越难:

侵略性帝国主义要纳税人付出很大代价……对于公民更是充满着无穷的危險,而对于投资者却是巨大利润的源泉,投资者在国内不能为他的资本找到有利可图的用途,因此坚持政府应当协助他在国外获得有利的和安全的投资。<sup>9</sup>

而且霍布森证明,投资不再受个人甚至是制造公司(尽管他们当然是重要的)的支配。因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巨型银行和金融机构支配着外国投资:

此等大企业——银行业、票据贴现业、债券发行业、公司发起业——构成国际资本主义的神经中枢。这些企业为坚强的组织关系联合起来,相互之间经常取得最密切和最迅速的联系,设置在各国的工商业中心……主要由具有几世纪金融经验的人所控制,他们在操纵各国的政策方面处于无人可比的地位。除非得到他们的同意和通过他们的代理人,大规模地和迅速地调度资本是不可能的。

每一项重大的政治行动,包括有新资本的输出,或现有投资价值的巨大波动,都必须得到这一小撮金融大王的许可和实际的帮助。这些人所掌握的财富和企业资本,主要是股票和债券,他们必须下双重的赌注,首先是作为投资者;其次,却是主要是作为金融经纪人……

募集新公债、创立新公司,以及引起价值不断发生大波动,是他们的事业获利的三个条件。每一个条件都牵涉到政治,从而使他们袒护着帝国主义……引起被侵略的恐惧和激起商业国家展开竞争的政策,导致巨额的军备支出耗费,并使国债累增,从这种政策所产生的疑惧和危險,不断促使证券价值波动,这对于熟练的金融家是甚为有利可图的。每一次战争、革命、无政府主义者的暗杀,或其他的社会震动,对于这些人而言都是有利益可图的;他们从每一次新的强制性支出和每一次国家信用的突然搅乱中贪得无厌地榨取利润……<sup>10</sup>

在对国外投资所获利润与一般进出口贸易所获利润的经验数据作了考察之后,霍布森得出如下结论:“来自国外投资的利息收入,大大超过来自普通输出入贸易的利润收入。”<sup>11</sup>由于这种巨大的获利可能,加之大银行家和财阀的强大经济和政治权力,霍布森推断,正是他们——而不是基督传教士、或无理性的政治家、军人或主战者——构成帝国主义最主要的动因。



从爱国、冒险、军事企业、政治野心、博爱主义等非经济因素在帝国主义扩张中所占的地位来看,把金融家说成有那么大的权力,似乎陷于狭隘的经济史观。诚然,帝国主义的动力主要不是金融,金融不如说是调节动力和测定其作用的帝国主义这个引擎的控制器,它并非引擎的燃料,也不直接产生动力。金融操纵着政治家、军人、博爱主义者和商人所产生的爱国力量;从这些源泉发出的扩张热虽是强烈而真实的,却是不规则而盲目的;金融势力有为帝国主义行动所必需的集中能力和精明的推断能力。充满野心的政治家、边防军人、狂热的传教士、奋进的商人可以建议甚至发起帝国主义扩张的步骤,也可以培养爱国的舆论以满足新扩张的迫切需要,但最终的决定系于金融势力。<sup>12</sup>

尽管大金融资本家是帝国主义的控制者和指导者,但他们却既不是帝国主义惟一获利者,也不是其根本原因。有三个主要资本家团体受益于帝国主义: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金融家;其次是“某些从事建造军舰的大公司……制造各种枪炮、弹药及其他必要的军需品”;<sup>13</sup>最后一类是“输出品的大制造商,他们依靠供应我们所并吞或开辟的新国家的真实需要或人为需要而获利”。<sup>14</sup>

但是,指出是谁从帝国主义中获利并不足够。霍布森想表明为什么这些资本家赚取利润以帝国主义的存在为条件——为什么他们不能通过国内投资、国内贸易或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赚取利润?为什么一定要征服一个非资本主义文化、摧毁它的传统制度并使它在经济上依赖市场、在政治上依赖其帝国主义征服者?帝国主义的终极原因是什么?或者换种问法,什么是“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

依据霍布森的观点,答案可以在19世纪最后三十多年所发生的产业权力与财富的快速和加速集中里找到。如此巨额的财富集中到如此有限的人手中,以至于年度收入分配变得极其不平等。资本家因每年持有的巨额财富而增加的收入如此庞大,以至于甚至是最浪费、最奢侈的消费支出都不会影响其下巨大的额外收入——或储蓄——对此,他们别无他用,只能用于投资,以期积累更多的资本。

经过一个时期残酷的竞争之后,继之以迅速的合并过程,遂使大量财富落入少数工业巨头的手中。这个阶级收入的增长远远超过其奢侈生活的需要,于是自发的储蓄过程以空前的规模向前发展。此等储蓄之投资于其他工业,又会使这些工业受同样的集中力量的支配。<sup>15</sup>

这种经济形势必然导致失衡。收入分配是如此不公平,甚至当工人将所有收入、资本家将实际可能的一切收入都用于消费之后(假定根本约束是购买和消费商品要耗费时间),资本家仍然有如此多的强迫储蓄,以至于如果所有这些储蓄都被用来增加生产设备,那么生产消费品的生产能力增长将必然超过对它们需求的增长(这种需求受工人收入及资本家的实际最大消费能力的制约)。当生产能力增长快于消费需求增长,很快就会出现

生产能力过剩(相对于消费需求),因此,可盈利的国内投资途径几乎不存在。对外国投资是惟一的解决方法。但是当事态发展到上述问题存在于每一个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程度时,当且仅当非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被“文明化”、“基督教教化”和“改进”——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的传统制度能够被暴力摧毁而其人民如果能够被迫置于市场资本主义“看不见的手”的统治时,这种对外投资才是可能的。所以,帝国主义是惟一的“答案”。

一些霍布森的批评者把他称为“天真的消费不足论者”,意指霍布森没有意识到生产本身创造恰好与其自身价值相等的收入——所以如果花费掉所有的收入,所有的产品都能卖出。这些批评者从未费心阅读过霍布森的著作。像任何一位萨伊定律的保守拥护者,霍布森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个简单的事实。因而他写道:

无论生产多少,或能够生产多少,就能消费多少,因为产品分配所表现的地租、利润或工资,构成社会成员的实际收入的组成部分,他可以消费它们,也可以同其他需要这种消费品的人交换其他消费品。每一种东西生产出来,也就跟着产生了相应的消费能力。如果说商品不能得到消费,或显然因为商品不能得到消费所以不能得到生产,又如果说,因为产品不能得到消费,所以一些资本和劳动不能得到充分运用,则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的惟一可能的解释,是因为有消费能力的人不对商品提出有效需求。<sup>16</sup>

当然,富裕的资本家原则上不会拒绝消费完所有收入。他们将事实上可能的一切收入用于奢侈的生活。而对于储蓄,他们宁愿将它投资于能够在未来产生更多收入的资本之上。问题在于用于消费的基金和那些用于投资的基金不平衡。由于消费受极端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的制约,可盈利投资渠道很快变得短缺。资本家不能继续超越需求扩大消费品的生产能力,也不可能依靠由此导致的未售出商品继续赚取利润。因此,他们有三种选择:(1)继续花费他们所有收入并储存未售出商品;(2)拒绝花费完所有收入(即将一部分收入储存起来),从而降低有效需求,这样就必然使一些以前生产的商品不能卖出而出现普遍的供给过剩或引致经济停滞;(3)依靠帝国主义政府政策找到对外投资渠道。

霍布森相信,只要现有的财富分配格局不变,“富人绝不会如此机敏,消耗到足以阻止生产过剩”,<sup>17</sup>那么,商业周期、大萧条和日益贪婪的帝国主义将是富人不能将所有剩余收入进行可营利投资的必然结果:

到处都出现生产能力的过剩,出现寻求投资的过剩资本。所有实业家都承认他们国家生产能力的增长超过消费的增长,生产的商品越多,就越不能销售获利而且现有的资本越多,也越不能找到有利的投资。

就是这种条件构成帝国主义的根源。<sup>18</sup>

资本主义制造了工人阶级普遍贫穷和受剥夺的景况,与之共存的是尚未利用的更多产品生产能力。这必然导致富裕的资本家阶级通过剥削他们本国的工人阶级并同时“在

很大程度上每年……以国外贡赋”<sup>19</sup>奢侈地生活。

对霍布森而言,帝国主义不能使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整体都受益是显而易见的。它让普通工人以重负和血的高昂代价使富人受益。现存的富裕资本家对工人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操纵体系使得英国的民主是虚伪的民主。在抑制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工人惟一的希望就是自己手中要掌握更多的权力,去创建真正的民主。在真正民主的体制下(与霍布森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看到的财阀统治恰相反)财富和收入将永远不会如此集中。这样,“帝国主义的根源”将被铲除。霍布森坚持主张:“所以工会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帝国主义的天敌,因为他们剥夺了‘帝国主义者’阶级的剩余收入,而这些收入形成了对帝国主义经济刺激的物质基础。”<sup>20</sup>他确信:“一个账册完备,并且拿得出整齐的支出和资产的资产负债表来的纯粹社会主义国家,将会很快摒弃帝国主义。”<sup>21</sup>

### 卢森堡的资本的帝国主义理论

对帝国主义最富有见解的一种分析来自罗莎·卢森堡(1870~1919)。作为德国左翼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运动多年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政治和学术领袖之一,她遭受攻击和严刑拷打,并于1919年被右翼德国士兵杀害。她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体现在她最知名的《资本积累论》(1913年首版)及另一本为此书辩护的、书名为《资本积累论——一个反批判》的著作中。

在《资本积累论》中,以马克思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两部类模型为基础<sup>22</sup>,卢森堡想要证明在一个仅仅由资本家和工人构成的经济中,均衡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她试图证明,随着两部类的增长(第一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第二部类生产消费品),资本主义运行过程中,必然存在两部类的不平衡成为资本主义的机能所在。特别地,她试图证明对第二部类生产的消费品需求的增长不可能与该部类生产它们的生产能力增长得一样快。

她希望由此证明,为了卖出这些剩余产品使资本家实现利润,持续不断攫取新的、非资本主义市场对资本主义是绝对必要的。她认为,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疆域内都存在着许多非资本主义生产残余。因此,这一阶段资本主义的必要扩张主要在国内进行。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可以在单一国家的政治边界内,通过对建筑在手工工艺和独立小商品生产(工人拥有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基础上的生产领域进行不断剥削,并因此将其引入资本主义生产领域而扩张。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国内扩张的潜在资源已经耗尽。因此,对外帝国主义扩张对于资本主义的生存变得必要。

卢森堡对这种扩张存在着逻辑必然性的证明是有缺陷的。她能得出那些结论,仅仅因为她的理论建立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假设上。本书中我们不打算列举卢森堡试图证明资

本主义扩张逻辑必然性的那些理论,也不打算讨论她的理论缺陷。有兴趣了解这些问题的读者应去阅读琼·罗宾逊那本对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令人称羨的简洁介绍<sup>23</sup>。然而,尽管卢森堡的书中存在这些缺陷,她的帝国主义理论仍然是一种有意义的、有说服力的理论。

仔细研究《资本积累论》之后,琼·罗宾逊推断,依据卢森堡所作的许多可辩解的理论和事实断言,“我们可以用一个有关真实案例性质,看似合理的假设来替代假定的逻辑必然性,从而挽救随后的论证。”<sup>24</sup>正是在她“随后的论证”中,卢森堡为我们理解资本帝国主义做出了持久而深远的贡献。因此,我们将首先简单介绍罗宾逊所说的卢森堡对资本帝国主义本质和起源“看似合理的假设”(我们认为那是令人信服的理论),接着对卢森堡在“随后的论证”中的贡献作较详细的探讨。

卢森堡对工资和资本家行为的见解,是她论证对经济中消费品部类扩大的生产能力保持充分消费需求存在困难的基础。她认为工人,作为一个阶级整体尽管并非人人如此,几乎将所有的收入用于消费(早期到现在的可得数据确实表明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而资本家则能将利润用于消费或投资。

对资本家而言,“工人……只不过是劳动力,他们用自己生产物的一部分维持生存是一种不幸的必要,并被降低到社会允许的最低程度”。<sup>25</sup>因此,随着生产力的增长,工人阶级购买力与消费品潜在产量间的差距持续扩大。可以肯定,资本家有购买这些剩余消费品的潜力。但是,资本家阶级“即使有这种奢侈的怪念头”<sup>26</sup>也永远不会这样做。原因有以下两条:第一,就时间和金钱而言,任何个人消费都有一个上限,而许多资本家的年收入远高于这个上限。第二,在卢森堡看来,更为重要的是,资本家主要不是受消费动机而是受积累更多资本、赚取更多利润动机的激励。而且,正如马克思证明的,竞争使得任何资本家,如果想避免被竞争对手挤垮,进行累进性的积累是绝对必要的。因此,在单个资本家希望(和需要)他的同伙资本家如何作为与竞争制度迫使那个资本家如何作为之间存在着基本矛盾。任何个体资本家将会把同伙资本家享受“‘上流社会’的奢侈视作是其所期望的销售扩张,也就是……一种极好的积累机会”。<sup>27</sup>但是同时,个体资本家知道他或自己对奢侈品的过度享受将“是纯粹的疯狂,经济自杀,因为那是从根本上摧毁积累”。<sup>28</sup>

因此,出于对积累资本的不断追求,资本家永远不会以扩张生产能力的相同速度扩大自己的消费。所以必然造成两个生产部类间的不平衡,而资本家日益发现找到盈利的投资途径更加困难。帝国主义似乎是解决这种不平衡的惟一方法。这样,一旦我们抛开卢森堡对帝国主义逻辑必然性证明的不合理主张时,她的理论结论与霍布森的理论几乎相同。我们确实同意罗宾逊的结论,即“就纯粹分析层面而言,她(卢森堡)似乎与霍布森有密切联系”。<sup>29</sup>

如果情况不过如此,我们将会把本章的讨论仅局限于霍布森和列宁。但是卢森堡接着提出了霍布森和列宁的著作中所没有的、对帝国主义本质的丰富见解。

卢森堡意识到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占主导的特定区域内,最终必将产生资本过剩。确保持续的盈利投资途径的惟一方法是暴力摧毁传统非市场经济(或“自然”经济,如她所称)。借助这些传统经济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开放,使潜在剥削可以利用丰富的未开发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储备。但是,开发这些潜在可剥削资源需要大规模投资。这种新投资途径会减少国内过剩资本并刺激对帝国主义国家出口的需求——也就是,会刺激对修建港口、道路、铁路所需原材料及一切剥削被占领领土所必要的物质资料的出口。结果是,资本主义国家新近刺激的出口不会被相应的进口抵消(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存在消费品的过剩);更确切地说,出口会被帝国主义国家资本家对被占领土财富所有权的的增长所抵消。换句话说,帝国主义确实是马克思所描述的“原始积累”的一种延续(参见第9章)。我们相信,这是卢森堡对理解资本帝国主义所作的最持久、最重要的贡献。因此,我们将就对她这方面的分析做更深入的发掘,并通过引用《资本积累论》的重要篇章来阐明她的见解。

马克思认为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只不过解释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而卢森堡把原始积累看作是资本积累的固有特征。她相信,将资本主义的社会和经济关系领域进行扩张从来都是资本积累在现存资本主义领域内成为可能的一种方式。她写道:“在历史上,资本主义孕育并发达于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之中。”<sup>30</sup>

资本主义为着它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然需要一个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外部环境的存在。但并不是所有非资本主义方式都对它有用。资本主义需要……剩余价值的销售市场……生产资料的来源地……和工资制度下的劳动力的蓄积场所。但资本不能依靠自然(即非市场的)经济的生产形态来达到所有这些目的。因为一切自然经济占主导的社会组织——在土地公有制下的原始农民,公社封建的赋役关系,或其他类似的形态——都主要是为了自己内部的需要而生产。从而……没有处置他的过剩生产物的迫切要求。最重要的是,在任何自然经济中,生产之所以继续进行是由于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是在这种或那种方式下结合起来的。共产主义的农村公社和封建庄园及其他类似的组织,把劳动力和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置于法律及习惯的支配之下,借以维持它们的经济结构。因此,自然经济在每一方面都以它强固的壁垒来阻挠资本主义的要求。因此,资本主义总是到处要对它所遭逢的各个历史形态的自然经济,不管奴隶经济也好,封建社会也好,原始公社也好,家长制农民经济也好,进行一场歼灭战。这场战斗的主要方法是政治上的强制力(革命,战争),国家租税的重压及廉价的商品。这些方法,或者同时进行,或者连续进行,互相配合起来。<sup>31</sup>

帝国主义征服自然(非市场)经济的斗争主要有四个目的:第一,最大量地攫取这些国家的原材料,无论是直接取得所有权还是用它们制造廉价的商品;第二,摧毁传统生产方式,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从而创造为了生存必须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工资劳动

者；第三，把自然经济转变成商品或市场经济；第四，将工业、贸易与农业分离，所有这些通常构成了自然经济内紧密联系的整体。

换句话说，为创造攫取剩余价值所必需的市场商品关系，资本家不得不借助于暴力。在萌芽时期，资本不得不运用暴力在欧洲创造这些条件。这是原始积累过程，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相信一旦资本主义已牢固确立，这一过程也就结束了。卢森堡不这样认为。她坚持认为尽管原始积累这一任务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是主要的：

可是，到今天，掌握大权的资本仍然做同样的事情，甚至在更大的规模上——通过近代殖民政策——来进行。如果认为资本主义只满足于通过商品交易所取得的生产资料，那是一个幻想。就在这一方面，资本已遭遇困难，因为在地球上广大地区是属于那些社会形态，它们没有商品交易的愿望，或者，由于整体社会结构和所有制形式的关系不可能出售生产力，而这些生产力正是资本所感兴趣的……由于土著居民间原始的联合体既是他们社会结构的最坚固的保障，也是他们生存的物质基础的最坚固的保障。因此，资本主义一开始就对阻挠它发展的非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安排有组织的破坏与歼灭。这里，我们已越过了原始资本积累阶段，但这个过程一直在进行……具有跳跃式扩张的资本积累，绝不能满足于等待非资本主义形态内部的自然分解从而转变为商品经济，正如它不能满足于等待劳动人口的自然增加一样。暴力是资本所采用的惟一解决方法。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看，资本的积累不仅在它诞生时，而且时至今日，都使用暴力作为一个永久的武器。从原始社会看，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对它们来说，除了拼命进行反抗和斗争，直至全部灭亡为止外，没有其他方法。<sup>32</sup>

接着上述分析，卢森堡对帝国主义借助征服、暴力、欺诈、偷窃和贸易手段对传统经济造成的实质破坏给予了生动、辛辣、深刻而激烈（但准确）的描述。一些传统文化国家被当作殖民地接管；另外一些沦为依赖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市场经济国家，尽管它们名义上保持政治独立。国外经济经历过暴力转型后，帝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经济失衡暂时得以缓解。第三世界人民变得部分依赖于帝国主义经济消费品部类生产的商品。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生产供给超过自身需要（工人与资本家）以上的消费资料，其购买者是非资本主义的阶层和非资本主义的国家”。<sup>33</sup>这意味着帝国主义国家的出口工业对资本品生产部类生产的资本品需求越来越多。此外，要想完全彻底地对这些新领土进行剥削，许多大规模投资支出，如修建港口、公路和铁路的支出是必要的。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生产提供超越自己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并从非资本主义国家中找到购买者”。<sup>34</sup>

这些出口在两方面得到资金供给。第一，被占领领域提供了国内难以轻易获得的廉价原材料资源。“积累过程……必然要求自由获得新领域内的原材料。”<sup>35</sup>对帝国主义国家出口的第二种资助方法是增加帝国主义经济的资本家对被占领领土内资源和资本的所有权。欠发达区域的资本所有权利润很高，因为这些被征服区域内工人的生存条件已被

降低到如此悲惨的境地,以至于高剥削率是可能的:

广大农民成群地被迫劳动着。随着需要,他们从一种工作转换到另一种工作,被人无限制地剥削着。尽管很明显地,为了近代资本的目的而使用徭役劳动,有它一定的技术限度,但足以抵偿这个缺点的是,资本对这些劳动力集体的无限制的支配权力,它可以无限制地决定人们工作、生活和被剥削的条件和时间的长短。<sup>36</sup>

但是没有哪一次征服或哪一股征服浪潮能一劳永逸地化解资本主义的经济失衡。最终,传统的非市场经济完全被资本主义制度同化。然后,资本主义制度——包括新近被同化的领土——将再次遭遇最初导致帝国主义扩张的同一难题。因此,资本主义被迫不断试图扩张其边界。在卢森堡看来,扩展的资本原始积累表现为帝国主义征服及随之而来的对一切非资本主义社会及经济结构的破坏,这是资本主义的永恒特征。

卢森堡对资本帝国主义分析值得提及的最后一个特征是——她对军国主义的讨论。她意识到军国主义从来都是资本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资本的历史上,军国主义履行一种十分确定的任务,它伴随着积累的每一个历史阶段。在欧洲资本的发轫时期即所谓“原始积累”时代,军国主义作为征服新世界及印度出产香料诸国的手段,曾起过决定性的作用。其后,军国主义被用来奴役近代的殖民地,破坏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借以占有他们的生产资料,在社会结构不适宜商品贸易的地方强行进行商品贸易,以及在殖民地用强迫土著居民为工资而劳动的方法把他们变为无产者。欧洲资本在非资本地区的势力范围的建立和扩大,对后进国铁道铺设权的勒索,作为国际放款人所提出的要求的履行,这些都通过军国主义来实现的。最后,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各国在争夺非资本主义文化领域的工具。<sup>37</sup>

除了认识到引起资本主义扩张这一军国主义的基本作用外,她还是最先清楚意识到以下事实的一位经济学家,即20世纪的军国主义正迅速变成一种重要的、能部分抵消使成熟资本主义深受其苦的慢性消费不足的来源。《资本积累论》最后一章的中心主题就是:“军国主义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任务。从纯粹经济观点来看,军国主义是实现剩余价值的一个卓越的手段。”军国主义之所以具备这一功能,是因为它充当了“购买包含着资本化剩余价值的大量生产物的主顾”。<sup>38</sup>

对成熟阶段资本主义基本本质这种见解非常值得注意。卢森堡写这本书时(1913年),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部队编制远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十年的部队编制要小。只是当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我们将在第15章讨论)的著作在20世纪40、50年代赢得广泛影响之后,并且“军事工业联合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中规模变得非常庞大并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时,一大批经济学家才开始清楚地认识到,卢森堡对军国主义重要性的评价是正确的。

然而,如同她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在对军国主义的分析中,卢森堡犀利而敏锐的洞察力超越了她的理论才干。她论证说,大多数军事费用是通过向工人阶级征收间接税强取而来。<sup>39</sup>但是,正像她意识到的,工人阶级事实上将所有收入用于消费。因此,就军国主义的资金供给来自对工人阶级的税赋而言,军国主义无助于总需求。如果她意识到相当一部分利润都用于资助军国主义,那么,对军国主义支撑总需求的重要性这一富有洞察力的见解,卢森堡会给予更有力的理论证据支持。在这方面,军国主义的作用与马尔萨斯的地主阶级奢侈支出的作用大致相同——它们代表着将一部分利润导入经济上非生产性投资的需求来源。这维持了现存的财富和收入不平等、支撑了总需求,然而却并没有增加经济体的生产能力,因为生产能力总是倾向于比总需求增长得更快。

对于军国主义有助于缓和资本主义不稳定性的方式,卢森堡另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犀利而富有洞察力的见解。由于自威廉·汤普森以降的许多经济理论者意识到,即使资本主义经济不存在总需求不足,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也会引起经济不稳定和商业周期。这是因为任何特定资本家的利润决定于成千上万其他资本家和消费者的买卖决策,而这些决策是每个资本家所不能预知的。其结果是,资本家必然不时地预测错误,造成这里投资太多那里又太少的局面。当其他资本家假设出错的资本家会继续这种错误的投资方式时,这些错误经常被放大。由此,投资决策基于错误的假设而错上加错。所以,结果常常是经济危机或经济崩溃(这就导致了对社会资源的不理性浪费使用)。

卢森堡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她还意识到,在巨型公司的投资决策动辄上千万(后来达上亿美元)的时代,市场无政府状态的成本极其高昂。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巨型公司而言,军国主义代表了一种受欢迎的、有利可图的对市场无政府状态的缓和。如卢森堡所言,当军国主义占主导地位时,

为数众多的个人的细小的对种类繁多的商品的需求——这些需求通常在不同时间出现……如今为广泛的、性质相同的国家需求所代替,但是,这种国家需求的满足,是以最高水平的大工业为前提。它要求具备剩余价值生产和积累的最有利条件。在国家军事订货的形式下,消费者分散的购买力大量集中起来,它不再受个人消费的任意选择和主观变动的影 响,并实现了一种几乎自动规律性和有节奏的增长。资本最终借助于立法和制造舆论的新闻界,控制了军需生产的这种自动的和有节奏的活动。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积累这个特殊领域最初似乎能无限扩张。其他一切为资本扩大市场和建立活动基地的企图主要决定于非资本所能控制的历史、社会和政治因素,而军需生产代表了这样一个领域:其有规则的累进扩张,似乎主要是决定于资本本身。这样,资本把历史的必然性变为一个有利因素。<sup>40</sup>

不出意料,卢森堡相信不存在任何资本主义的改革方式,能使得资本主义财产关系(从而资本主义阶级关系)保持完整的同时,又能消灭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压迫和剥削。



这四种罪恶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其社会和经济结构本身所固有的。但是,卢森堡确信资本主义不会永存:

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除了实行社会主义外,没有其他的出路,而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积累,而是以发展全球生产力,来满足劳苦人民的需要。因此,我们看到,社会主义由于它本身的特质,是一个和谐的、普遍的经济制度。<sup>41</sup>

## 列宁的资本的帝国主义理论

V. I. 列宁(1870~1924)是布尔什维克党最具影响的领导人,其著作在当代几乎所有共产主义政党内仍很有影响。《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写于1916年,也是被后人经常被阅读并引用的著作之一。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他肯定了霍布森的书对他具有的影响。列宁告诉读者,写这本书时:“论帝国主义的一本主要英文著作,即约·阿·霍布森的那本著作,我还是利用了,并且我认为已经给了它应有的注意。”<sup>42</sup>在我们下面的论述中,我们将概括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展示其与霍布森理论的相似性,并讨论与霍布森和卢森堡理论的不同之处。

与霍布森相似,列宁的著作也以强调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在所有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规模工业集中开始。他写道:“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工业蓬勃发展,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sup>43</sup>接着他列出了完备的统计资料、图注资料并描述了垄断、寡头垄断、卡特尔和托拉斯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与霍布森再次相似的是,列宁也强调了银行和金融资本对资本帝国主义现象产生的重要性:

随着银行业的发展及其集中于少数几个机构,银行就由普通的中介人变成万能的垄断者,他们支配着所有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几乎全部的货币资本,以及本国和许多国家的大部分生产资料和原料来源。许许多多普通的中介人变成极少数垄断者,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成为资本帝国主义的过程之一。<sup>44</sup>

在列宁看来,银行或金融资本的重要性源自资本家脱离日复一日的工业企业管理这一历史趋势。渐渐地,这种管理工作转交给了职业经理阶层,而大多数资本家则变成了生活奢侈的、纯粹寄生性的、无职能的食利阶级。但是经理阶层不得不依然屈从于资本家阶级。因此,一些资本家不得不代表整体资本家阶级管理并控制非资本家经理。根据列宁的观点,正是银行部门或金融部门履行着监督所有资本家利益的职能。在列宁看来,金融资本控制工业资本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一个显著特征——列宁认为这是一个与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阶段存在鲜明而重大差异的阶段:

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和其他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表明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有统治地位。<sup>45</sup>

银行施加的控制构成了金融寡头,因为通过股票所有权,更重要的是通过设立银行和其他公司、尤其是其他各种非银行公司间的互兼董事会,银行建立了错综复杂的、相互交织的、对工业和商业企业的控制网络:

银行同最大的工商业企业之间的所谓个人联合也发展起来,双方通过占有股票,通过银行和工商业企业的经理互任对方的监事(或董事)而日益融合起来。<sup>46</sup>

正是利用这种方式:“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并且享有实际垄断权的金融资本,由于创办企业、发行有价证券、办理公债等等而获得大量的、愈来愈多的利润,巩固了金融寡头的统治,替垄断者向整个社会征收贡税。”<sup>47</sup>

列宁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分析与霍布森的“主根”理论非常相似:

到20世纪开始时,我们看到已经形成了另一种垄断:第一,所有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都有了资本家的垄断同盟;第二,少数积累了大量资本的最富有的国家已经处于垄断地位。在先进的国家里出现了大量的“过剩资本”。

……假如资本主义能提高在今天这种技术惊人进步的情况下仍然到处是半饥半饱、乞丐一般的民众的生活水平,那当然不会有什么过剩资本了……但是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在这些落后的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sup>48</sup>

因此,列宁和霍布森得出相同的结论:为剩余资本寻找盈利性投资途径这一紧迫的经济必要性导致帝国主义的产生。两人都认为资本输出比商品输出更为重要,而且两人都注意到资本输出引发了商品出口量的相关性或诱致性增长。

在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导致了两种完全独立但截然不同的“对世界的瓜分”。首先是“资本家同盟对世界的瓜分”,如国际企业卡特尔或巨型多国公司。

资本家的垄断同盟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首先分割国内市场,在不同程度上,把本国的生产完全霸占在自己手里。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内市场必然是同国外市场相联系的。资本主义早已造成了世界市场。所以随着资本输出的增加,随着最大垄断同盟的国外联系和殖民地联系以及“势力范围”的极力扩张,“自然”就使得这些垄断同盟之间

达成全世界的协定,形成国际卡特尔。<sup>49</sup>

但是,任何资本家或资本家企业,无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国际性的,其权力最终都源自国家强制力。这样,金融资本统治依赖的不仅是对工商业企业的控制,还有赖于对政府的控制。“除了银行和工业进行‘个人联合’以外,这两种公司又同政府进行‘个人联合’。”<sup>50</sup>因为大多数国际企业卡特尔是由总部设在一两个国家的极少数公司所控制,可以断定,企业卡特尔对世界的经济瓜分,将会反映在由几个超级列强在政治上对世界的瓜分上,这进而又加剧了经济瓜分。

最新资本主义时代向我们表明,资本家同盟在从经济上分割世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定的关系,与此同时、与此有联系的是,各个政治同盟、各个国家在从领土上分割世界、争夺殖民地、争夺“势力范围”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一定的关系。<sup>51</sup>

所以,对世界的第二次瓜分发生在资本主义政府间,它不仅反映而且促进了大的托拉斯和卡特尔对世界的首度瓜分。这使许多帝国主义的辩护者[包括帝国主义的一些温和批评者,如具有影响的德国的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断定,这种对世界的政治分割最终会带来世界的长久和平时代。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著述期间,列宁就知道这不是事实。他清楚地意识到战争是大的资本主义列强间帝国主义冲突的结果,而且他相信,这种冲突必然成为帝国主义的当然本质。

冲突源于这样一个事实——没有资本家、资本主义企业、托拉斯或卡特尔会满足于现有的利润水平,资本主义总是引起每个资本主义企业对不断增加利润的一种无法满足、永不停息的狂热执着。正因为如此,只有当大型托拉斯的董事们确信,任何企图占领对手托拉斯一部分领域的行为导致的损失大于获利时,他们才会满足于既定的世界市场份额。但是在他们的对抗中,每个托拉斯都时刻对导致权力更迭的蛛丝马迹保持警惕,因为权力更迭会使攫取对方领域变得有利可图。只要存在至少两个瓜分世界市场的对立托拉斯,冲突就不可避免,“但是,这两个强大的托拉斯分割世界的事实,当然并不排除对世界的重新分割,如果实力对比由于发展不平衡、战争、破产等而发生变化的话”。<sup>52</sup>

因此,声称帝国主义及其瓜分世界并划入各自“势力范围”会带来有助于世界和平的权力平衡,是建立在诡辩基础之上的一种支持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辩护论调:

有些资产阶级作家(卡尔·考茨基现在也附和他们,他完全背叛了他在1909年所采取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认为:国际卡特尔作为资本国际化的最明显的表现之一,给人们带来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民族间可以实现和平的希望。这种意见在理论上是绝顶荒谬的,在实践上则是一种诡辩,是一种用欺骗的方法替最恶劣的机会主义辩护的手段。国际卡特尔表明了现在资本家的垄断组织已经发展到怎样的程度,资本家同盟究竟为了什么而互相斗争……因为斗争的形式,由于各种比较局部的和暂时的原因,可能发生变

化,而且经常在发生变化,但是,斗争的实质、斗争的阶级内容在阶级存在的时候是始终不会改变的。很明显,掩饰现代经济斗争的内容(分割世界),时而强调这种斗争形式,时而强调那种斗争形式,这是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毒辣,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而且他们瓜分世界,是“按资本”、“按实力”来瓜分的,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不可能其他的瓜分方法。实力是随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变更的;要了解当前的事件,就必须知道那些问题的解决是取决于实力的变更,至于这些变更究竟是“纯粹”经济的变更,还是非经济的(例如军事的)变更,却是次要的问题,丝毫也不能改变对于资本主义最新时代的基本观点。拿资本家同盟互相进行斗争和达成协议的形式(今天是和平的,明天是非和平的,后天又是非和平的)问题来偷换斗争与协议的内容问题就等于堕落成诡辩家。<sup>53</sup>

斗争的目标除了所有居民的全部劳动力,还有对地球及其一切资源的控制。在列宁看来,只要存在更加有利可图的投资前景,资本主义就不会停止。因此,在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或帝国主义阶段,不断的国际冲突和战争不可避免。对资本帝国主义列强而言:“联盟,不管形式如何,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前后两次战争之间的‘暂时休战’。”<sup>54</sup>

不顾经济增长和资本主义国家世界权力在那一阶段的高涨,列宁坚持认为帝国主义代表着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或用列宁的措辞“垂死的资本主义”。<sup>55</sup>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列强正在变成列宁所说的“食利国家”。<sup>56</sup>而且,“食利国家是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sup>57</sup>然而,当列宁说资本主义处于“腐朽”和“垂死”状态时,难以确切理解他想表达什么意思,因为,他这样写道:

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工业部门、个别资产阶级阶层、个别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现在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普遍地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资本最雄厚的国家的腐朽上面。<sup>58</sup>

列宁似乎要描述一种正在增长的且权力均衡在不同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变化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然而他又坚持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必然崩溃的序曲。<sup>59</sup>

### 霍布森、卢森堡和列宁理论的比较

罗莎·卢森堡相信,她的理论已经表明,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向帝国主义扩张的绝对必然性和逻辑必然性,但她的理论包含谬误和不合实际的假设。当我们抛开卢森堡理论不合理的方面,她对资本主义根源的其余解释与霍布森的理论基本一致。另外,列宁的帝

国主义起源理论也与霍布森的理论基本相同。然而,在霍布森作为一方而列宁与卢森堡作为另一方的两大理论之间,存在着一种关键而重要的差别。列宁清楚地认识并阐释了这种差异:

能不能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来改变帝国主义的基础呢?是前进,使帝国主义所产生的种种矛盾更加尖锐、更加剧烈呢,还是后退,去缓和这些矛盾呢?——这些问题是对帝国主义的批评中的根本问题。<sup>60</sup>

列宁与卢森堡都认为,帝国主义力量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任何不触动其基础(私有财产制、市场和阶级划分)的资本主义改革,都不可能铲除帝国主义的弊端。他们还认为只有摧毁资本主义根基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消灭帝国主义。尽管霍布森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并且认为社会主义不具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动机,然而,他相信资本主义改革能够缓和帝国主义的弊病,并使资本主义成为一个某种程度上更加人道的社会。事实上,霍布森积极支持社会抗议运动和改革运动,这些运动的目的是根除或削弱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成为一种更公正的社会。

我们已经列出了卢森堡理论中的错误。同样,我们陈述了列宁的看法,即尽管他承认资本主义比在任何历史阶段都发展得更快,他仍然相信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弱点,我们可以肯定卢森堡和列宁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帝国主义如何运作以及为何这样运作的理解。他们各自见解的主要长处迥然不同。列宁完善了霍布森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他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对巨型公司、托拉斯和卡特尔的增长以及收入分配的极端不平等——这些都被霍布森和列宁看成是资本帝国主义的基本构成因素,但它们似乎已演变为成熟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列宁阐明了为什么处于成熟阶段的资本主义事实上是对早期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和经济制度的重大调整。尽管我们不能说列宁论证了改良资本主义因而使其变得更为人道、更少帝国主义经济制度是绝对不可能的,他确实证明了这种改良必将动摇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的真正基石,而这情况必将遭到是现存资本主义政府和公司——全体资本家阶级不择手段的抵制和抗拒。

在许多方面,卢森堡理论分析的优点与列宁的优点恰好相反。卢森堡证实了20世纪初期的帝国主义同资本原始积累早期血腥与暴虐的社会动乱之间具有某种连续性;而列宁反之证明了资本主义在垄断阶段着重并加强了对世界上经济欠发达区域资本主义剥削的独特性。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并没有直接驳斥占统治地位的、保守的新古典主义观点,后者认为对欠发达国家的外国投资增加了资本,提高了生产力和总福利,欠发达国家将会受益。但卢森堡令人信服地证明,这种投资只有在传统社会制度和人际交往模式被摧毁后,才是可能的。卢森堡、列宁和霍布森都证明,资本主义对欠发达国家的投资实际上是被迫进行的,并极少符合绝大多数人的直接利益,这种投资的目的是要排他性地攫取这些国家的原材料而极少给予回报、并最大限度地剥削这些国家的劳动人民。但是,只有

卢森堡表明,在这些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必然会带来极端的社会破坏。

注 释

1. J. A. Hobson, *Imperialism: A Stud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5), p. 367.
2. 同上,第 203 页。
3. 同上,第 197 页。
4. 同上,第 198 页。
5. 同上,第 50 页。
6. 同上,第 215 页。
7. 同上,第 221 页。
8. 同上,第 47 页。
9. 同上,第 55 页。
10. 同上,第 53 页。
11. 同上。
12. 同上,第 59 页。
13. 同上,第 49 页。
14. 同上。
15. 同上,第 74~75 页。
16. 同上,第 81~82 页。
17. 同上,第 84 页。
18. 同上,第 81 页。
19. 同上,第 53 页。
20. 同上,第 90 页。
21. 同上,第 47 页。
22. 见第 9 章。
23. Joan Robinson, "Introduction," in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by Rosa Luxemburg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4), pp. 13~28.
24. 同上,第 25~26 页。
25. Rosa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An Anti-Critique*(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p. 55.
26. 同上,第 55 页。
27. 同上,第 56 页。
28. 同上。
29. Robinson, "Introduction," pp. 20~21.
30. Rosa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4), p.

368.

31. 同上,第 368~369 页。
32. 同上,第 370~371 页。
33. 同上,第 352 页。
34. 同上。
35. 同上,第 435 页。
36. 同上。
37. 同上,第 454 页。
38. 同上。
39. 同上,第 455 页。
40. 同上,第 466 页。
41. 同上,第 467 页。
42. V. I. Lenin,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in *V. I. Lenin: Selected Works*, by V. I. Lenin, 3 vol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7), vol. 1, p. 677.
43. 同上,第 685 页。
44. 同上,第 697 页。
45. 同上,第 721 页。
46. 同上,第 706 页。
47. 同上,第 716 页。
48. 同上,第 723~724 页。
49. 同上,第 728 页。
50. 同上,第 706 页。
51. 同上,第 734 页。
52. 同上,第 730 页。
53. 同上,第 733~734 页。
54. 同上,第 770 页。
55. 同上,第 776 页。
56. 同上,第 774 页。
57. 同上,第 756 页。
58. 同上,第 774 页。
59. 同上,第 776 页。
60. 同上,第 763 页。

## 第 14 章 看不见的手的成就、贡献及式微： 新古典福利经济学

在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等人的著作出版后的最初半个世纪里，资本主义变化迅速，发生了不寻常的动荡。首要的和最明显的变化是产业的集中和巨型公司的形成，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托拉斯和卡特尔。第二个变化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帝国主义的快速发展。第三个变化仅仅体现在一个方面：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一种不稳定的经济制度，它正在经历着繁荣和萧条时期的不断交替，而且这些萧条时期的长度及其严重性在不断增加，并逐渐积累成 20 世纪 30 年代那样的世界范围内的大萧条。与这些变化以及导致资本主义制度更加不稳定的混乱和社会动荡联系在一起的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大动乱，其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产生。

我们在前两章讨论过其思想的理论家都试图理解这些巨大的变化。经济不稳定性的增加，尤其是大萧条，也使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我们将在第 15 章讨论其思想）对他过去所接受的新古典理论进行重新评价，并重新思考资本主义制度中萧条的性质及原因。

但是，如果我们以一种严格的功利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传统评价这一时期经济学家的著作，我们就很难认识到资本主义正处于一个动荡且多变的时期。萨伊、西尼尔和巴斯夏对斯密、李嘉图的理论进行了整理，他们抛弃了新古典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的每一个因素。相反，他们主要集中于边际主义的观点——强调市场交换；算计的、理性的和最大化的行为；各种收入在本质上的相似性（因而资本主义不存在不同的阶级）；以及由自由市场交换这只“看不见的手”所创造的全体利益的一致性。巴斯夏曾经宣称“政治经济学就是交换”。随着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等人的边际主义分析方法的问世，巴斯夏的口号变成了对几乎所有传统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描述。新古典理论也逐渐模仿中世纪经院哲学，



许多学者进行了无数的研究，以完善、发展、详细阐述、美化社会功利主义观点——这个社会由众多的、分散的、势力相对弱小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所组成，他们不断重复着同一和谐的社会过程。

也许，新古典理论上最令人难懂三个方面是其企业家概念、生产的性质以及竞争性均衡价格决定的过程。我们已经在第11章讨论了企业家：企业家是指那些不断雇佣生产要素，并将其转换成商品，然后再将商品销售给消费者的人；企业家完全由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所驱动，尽管在新古典理论中，当经济处在竞争性均衡状态时几乎没有任何利润产生。但是，企业家从来不会了解这一可悲的现实，他们会不断地购买生产要素并且销售商品以寻求并不存在的利润。当每一个生产阶段终止时（如果均衡普遍存在），企业家发现，给每个生产要素所有者支付的是在生产过程中要素所创造的价值，该价值正好等于要素创造出来的总价值。企业家惟一的报酬是其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自己的要素所获得的正常收益。他不能获得利润，因而如果他将其要素被动地出租给其他企业家且一点也不必关心利润，那么他的境况将获得改善。

正如晦涩难解的新古典主义企业家概念一样，生产过程也是难以理解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谈论生产时，从来不会提及老板、工人、罢工、倒闭、为安全条件或工作时间长短进行的斗争、对工人提出的加速生产的要求、工厂纪律、流水生产线、停工、泰勒制或者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过程中的任何其他负面特征。在新古典理论中，生产是一种神奇的魔力。企业家拥有一个称之为“生产函数”的复杂的数学配方，该函数解释了生产要素的不同数量组合如何被转换成不同数量的制成品产出。企业家考虑的是要素价格（要素由市场或瓦尔拉的“叫卖者”提供）和制成品价格（制成品由与要素相同的渠道提供），选择租用合适的要素并相应地决定要出售的商品。他总是在前面所描述的限制下进行选择，以使其利润最大化。一旦进行了这样的选择，生产问题就解决了。生产函数的神奇力量仅仅是将投入转换成产出以便交换循环得以完成。当竞争性均衡普遍存在时，投入产出的利润最大化组合不会产生利润。任何其他组合会带来损失。

古典经济理论中企业家和生产过程的性质就是如此。下列虚构是有用的，即允许利益一致的市场交易过程不断地重复进行。为此，我们要说的是，尽管将生产和生产函数理论化了，但新古典理论仍然是巴斯夏功利主义观点的现代版解释。它是一种交易理论，因而它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又一个冗长的晦涩、难懂版本，并且在该理论中，几乎很少涉及实际生产过程。

新古典理论中令人困惑的第三个主要方面是其竞争性均衡价格决定过程的思想。在该理论中，单个消费者、单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以及单个企业家都是被动的“价格接受者”。所有价格完全由竞争性市场决定，这个过程独立于任何个人或厂商所采取的行动。尽管这一问题在瓦尔拉的《纯粹经济学纲要》公开发表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是新古典理论家并未从本质上改进瓦尔拉分析以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宣称这些均衡价格是通过一

个“摸索”的过程而获得的,但是他们并没有给出任何经验的或理论的证据以证明这样的摸索只会使经济更接近而不是远离均衡点。他们相信瓦尔拉“叫卖者”这一有用的虚构,但是如此明显地借助于一个有用的虚构来扭转局面试图将理论融为一体,这种做法却削弱了该理论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辩护的有效性。

在专业期刊的非常难懂的文献中,新古典经济学家证明了,在其初始假设下,这样一组均衡价格的存在从逻辑上不是不可能的。这样的论证被认为是对教科书中简单假设的习惯用法的合理证明,教科书中一般假设,这组均衡价格存在,而且对所有个人或厂商都是已知的。

这是一个特别关键的假设,因为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所作的新古典理论辩护的三大支柱,是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将在第16章进一步讨论),看不见的手的概念,以及关于自由市场的供求力量会使经济自动而有效地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信仰(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为了回应凯恩斯理论,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一个分支至少部分地放弃了第三点)。如果市场不能自动地形成均衡价格,那么资本主义的这三大理论支柱就难以成立。所以,拍卖者的第三点有用的虚构与前面两点同样重要。

我们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它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概念的最后的溢美之辞——进行总结以前,必须对这一章和前几章风格上的差异以及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在整个新古典学派中的地位进行三点说明。首先,在这一章我们将很少提及任何重要的经济理论家的著作。这是因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基本上是瓦尔拉相当详尽的阐述,只有很少的修改,没有理论家能对瓦尔拉的理论观点进行如此重要的修改从而为自己的见解增色。不过瓦尔拉的弟子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对理论的修改则可以看作是这一说明的一个例外。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帕累托的贡献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将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称为“帕累托主义”福利经济学。但是,帕累托的主要成就,只不过是根据最早由英国人弗朗西斯·Y. 埃奇沃思(Francis Y. Edgeworth)(1845~1926)发明的“无差异曲线”(indifference curves)而重塑了瓦尔拉的思想。

在阐述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时,我们将遵循帕累托的方法(及教科书中的最新研究成果),使用无差异曲线——以及新古典生产理论中类似的曲线即“等产量曲线”(isoquant)——来说明其思想。但是,我们赞同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约瑟夫·A. 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的观点,他认为,“作为一种纯理论,帕累托的理论是瓦尔拉主义的——无论是基础工作还是详细的论述都是如此”。因此,帕累托及其他所有后继的对瓦尔拉“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进行修正的理论家,仅仅只是修改者和完善者,而且由于篇幅的限制也不准备对其进行单独讨论。所以我们仅仅只是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进行一般性的总结,而没有详细阐述不同新古典经济学家对理论的不同改进。

第二,尽管20世纪40年代对理论进行了极大的改进(关于“外部性”的处理是个例外,外部性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获得了进一步的改进),我们仍然使用目前的一般

形式,因为这一分析仍然是今天新古典主义分析的核心。

第三,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瓦尔拉福利经济学一直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尤其是在美国)。但是,关于新古典福利经济学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这里提出的是主流观点。但也存在着一个延续至今,并深受门格尔和瓦尔拉影响(尤其是方法论)的重要的少数派。这一学派有些不同的观点,它在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中以奥地利学派(Austrian School)著称,然后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以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闻名。我们将在第17章讨论其思想。

### 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

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作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基础,一般可以划分为两个独立的(但是类似的和对称的)部分——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理论”和厂商利润最大化“理论”。两个“理论”是受约束的最大的简单的逻辑证明。

在教科书中,这两个理论导致了一些结论。例如,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理论推导出,一种商品价格的变动,通常(并不总是)会引起该商品需求量相反方向的变动。理论揭示了需求量的变动如何在概念上分为由“替代效应”引起的一部分和由“收入效应”引起的另一部分。经济学学生通常被要求学一点深奥的数学以在概念上区分这两种效应,但是他们很少被告知这一区分在实际中或理论上的重要性。它仅仅是一个人为了证明其作为一个新古典主义理论家的能力而进行的分析方法的练习。从效用最大化理论和利润最大化理论前提所获得的其他大多数分析推论也是如此。

但是,这些微观经济理论中的一些结论却是重要的。这些结论构成了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基础,其重要性纯粹是思想体系上的。我们在这一章要讨论的,仅仅是新古典主义理论的这些方面。

使用无差异曲线允许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边际效用分析放弃基数效用的假设。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消费者能够列出对不同商品的偏好序列。这仅仅表示效用的一个序数(或序列),并不要求对个人之间的效用进行比较,我们已经指出效用在个人之间的比较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为了获得新古典的结论,惟一的要求是无差异曲线具有如图14.1中所表示的一般形式,而且消费者“一致”行动。可以这样来定义一致性:如果某人偏好X甚于Y,同时偏好Y甚于Z,则他一定偏好X甚于Z。

无差异曲线允许新古典经济学家利用图形阐释,当仅仅只有两种可购买或消费的商品时,消费者如何使其效用最大化。从多种商品中也可以推导出同样的结论,但两种商品的情形更简单,而且足够说明关键点。在图14.1中,坐标轴分别表示商品A和商品B的数量。假设消费者个人能够列出其消费的商品A和商品B的所有可能的组合。如果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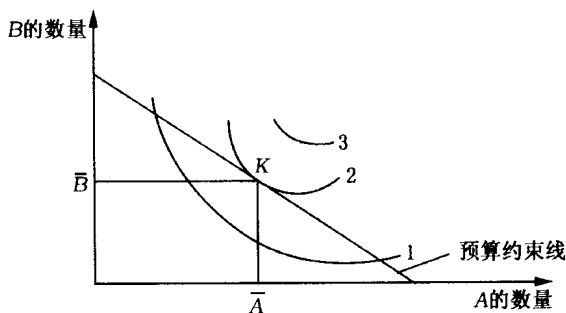


图 14.1 消费者效用最大化

人能够获得更多的 A 和 B, 则其效用在增加。如果个人只能获得更多的 A 和更少的 B (或者相反), 那么假设他总是能够说出在何时由增加 A 所增加的效用正好补偿了因减少 B 所带来的效用损失。图 14.1 中的三条曲线是无差异曲线。曲线上的每一点代表效用相等的 A 和 B 的组合。当我们从同一条曲线上的一点移动到另一点时, 由增加更多的一种商品所获得的效用增量正好被减少另一种商品所带来的效用损失所抵消。所以, 消费者在同一无差异曲线上由不同点所表示的商品 A 和商品 B 的组合对消费者来说是无差异的。

在一个平面图上可以画出个人的任何数量的无差异曲线。图 14.1 中有三条不同的无差异曲线。曲线 1 表示最低的效用水平; 曲线 2 表示比较高的效用水平(在这一范围内通过从曲线 1 移动到曲线 2 可以获得更多的 A 和 B); 曲线 3 表示一个更高的效用水平。

图中的直线是消费者的“预算约束”线, 该曲线显示了消费者个人用其出售生产要素所获得的收入所能购买到的商品 A 和商品 B 的何种组合。预算约束线与原点的距离说明了个人收入购买力的大小。预算约束线的斜率等于商品 A 和 B 的价格比率(在图 14.1 中, 预算约束线的斜率等于  $P_a/P_b$ , 或者说商品 A 的价格除以商品 B 的价格)。

显然, 在图 14.1 所描述的情形中, 消费者通过无差异曲线 2 上购买和消费数量为 A 和 B 的商品来使其效用最大化。任何高于曲线 2 的无差异曲线, 是在既定的消费者预算约束下无法达到的。任何在其预算约束线内可以获得的其他点, 都位于低于曲线 2 的无差异曲线上。所以, 点 K 是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点, 而且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 消费者将总是选择点 K。

无差异曲线上任一点的斜率衡量了该点上商品 A 和商品 B 的边际效用的比率  $MU_a/MU_b$ 。预算约束线的斜率衡量了  $P_a/P_b$  的比率。所以, 在 K 点上, 一定有  $MU_a/MU_b = P_a/P_b$ , 或者  $MU_a/P_a = MU_b/P_b$ 。由此可以看出, K 点满足了由杰文斯和瓦尔拉所计算的效用最大化条件。

而且, 在完全竞争条件下, 由于每一个人都面临着相同的商品 A 和商品 B 的价格,

这说明每个人都会移动到其无差异曲线上满足最大化条件的某一点。因此,由竞争性市场(或由叫卖者)决定的商品 A 和商品 B 的均衡市场价格,完全反映了单个消费者内心对商品 A 和商品 B 的边际估价。也就是说,例如,如果商品 A 的均衡价格是商品 B 的均衡价格的两倍,那么,当单个消费者达到一个最优的消费水平时,他或她会主观地认为商品 A 产生了两倍于商品 B 的边际效用。所以,价格完全反映了每个消费者的边际效用——而且自由市场中这一结果的实现,完全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家“消费者主权”这一术语所指的涵义。

厂商利润最大化的证明几乎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证明一致。在图 14.2 中,坐标轴分别表示厂商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劳动(L)和资本(C)的数量。曲线 1、2、3 现在是等产量线,代表生产某一既定产出(产出既可以是商品 A 也可以是商品 B)水平所必需的劳动和资本的各种组合。每一条曲线表示一种产出水平且由厂商的生产函数导出;离原点越近的曲线所表示的产量水平越低。图中的直线是一条“等成本线”,表示厂商使用一定量的货币支出所能购买到的劳动和资本的各种组合。

在图 14.2 中,厂商在等产量线 2 上的 J 点进行生产。它租用的资本量和劳动量分别为  $\bar{C}$  和  $\bar{L}$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一结论:首先,如果厂商决定在等产量线 2 所表示的产出水平上进行生产,那么等成本线显示了生产这一产量可能的最低成本。第二,如果厂商决定仅仅花费等成本线所表示的那一支出,那么等产量线 2 就表示这一支出下的最大可能产量, $\bar{C}$  和  $\bar{L}$  分别表示这一既定支出下厂商能够购买到的、使用这一支出能够使生产的产出量最大的资本和劳动的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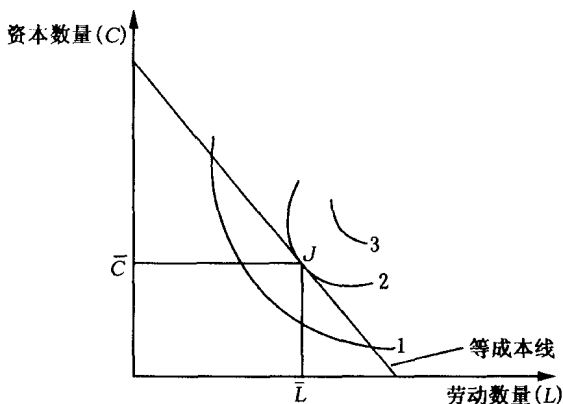


图 14.2 利润最大化

在完全竞争均衡情形下,所有厂商都将面临着相同的资本和劳动价格(资本和劳动的价格也由市场或由叫卖者决定)。因此,所有厂商都将在其等产量线上的某一点如 J 点进行生产。等成本线的斜率是  $P_L/P_C$ (或者工资与利率的比率)。等产量线的斜率是

$MP_L/MP_C$  (或者劳动的边际产量与资本的边际产量的比率)。所以,在均衡点,对于每一个单个厂商来说,有 $(MP_L/MP_C)=(P_L/P_C)$ 。如果完全竞争普遍存在,则其进一步的证明相当简单,而且有 $VMP_L=P_L, VMP_C=P_C$ 。这就是说,每种要素的边际产品价值正好等于每种要素的价格。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确实成立。每一种要素获得的价值正好等于其生产的边际价值。生产最大化了,每一种要素的所有者获得的收入正好等于其要素边际贡献的价值。

### 极乐世界和永恒幸福

在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条件的基础上,新古典经济学家构建了一个精致、匀称、美丽、令人满意的演绎及数学大厦;它“证明”了,在竞争性条件下,追求效用最大化交易的消费者和追求利润最大化交易的企业家,都将自动行动且相互影响,以最终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我们打算对这一结论的数学或几何“论证”进行详细探讨,而仅仅只是简单地用文字说明所包含步骤的性质及该分析所暗含的重要性。有兴趣的读者也许会读到一篇分析简洁的期刊文章,在该文中,弗朗西斯·M. 巴特(Francis M. Bator)对竞争性的、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达到一个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极乐”点,进行了充分的证明。<sup>2</sup>

证明首先假设资本和劳动总量在一既定时间内是可以任意利用的。如果将从生产函数中推导出的等产量线运用于生产出来的每一个消费商品,以上描述的利润最大化条件将被证明是社会达到所谓“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充分必要条件。生产可能性边界是指当所有社会的劳动和资本被有效利用时能够生产的所有可能的商品组合的一个复杂的数学公式。对于任何一种生产的商品组合来说,如果增加一种商品的生产必须减少另一种商品的生产,那么就实现了效率。

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任何一点,表示包含一定量每种商品特殊聚类的总产出。在一给定点,可以计算出任何两种商品的“生产边际转换率”。例如,商品A和商品B的边际转换率是2:1,这意味着如果放弃2单位的A可以多生产1单位的B。

可以证明,在竞争性条件下,当B的均衡市场价格是A的相应价格的两倍时,可以达到上面提到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点(即边际转换率为2:1的点)。所以,在竞争性条件下,商品A和商品B的生产边际转换率总是反映其价格。一旦这一特定水平和组合的产出被生产出来,消费者进行交易并且获得使其效用最大化的商品组合。如果2:1的价格比率是一个均衡价格比率,那么所有消费者都可以购买到他想要的(在其预算约束下)任何数量的各种商品,所有市场都可以出清;也就是说,每个市场上的供给正好等于其需求。

我们已经知道,当消费者进行交易以使其效用最大化时,商品B和商品A的价格比

率 $2:1$ 正好反映了每个消费者商品 $B$ 和商品 $A$ 的边际效用的比率。因此,在竞争性条件下, $A$ 和 $B$ 的边际转换率,与每个消费者 $A$ 和 $B$ 的边际效用比率一样,也反映了 $A$ 和 $B$ 的价格比率。如果这一点不能成立,而且如果边际转换率与边际效用比率不相等,那么,至少有一个消费者可以在不减少任何其他消费者效用的情况下,通过更多的交易或者产出组合的变化,增加其效用。然而,由于在完全竞争性条件下可以证明,当经济处于均衡时所有这些比率都是相等的,那么,这也就证明了,均衡水平和生产的组合及由此产生的生产交换使经济达到社会的效用可能性边界上的某一点。

效用可能性边界上的每一点表示一种状态,在该状态中,没有任何产量的改变和商品交换的增加可能使一些人的境况变好而不会使其他一些人的境况变坏。给定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初始“禀赋”(或初始财富分配),通过生产和交换,效用已经增加到了与初始财富分配相一致的最大可能的水平。

效用可能性边界上的这一点被新古典经济学家称之为“帕累托最优”。它表示社会从一特定财富分配中所能获得的最大福利。竞争性效用和利润最大化行为已经被“证明”可以自动达到这一点。但是,对于每一种初始财富分配,存在着不同的帕累托最优点。所以,一些人可能认为效用可能性边界上表示其他初始财富分配的其他点是更可取的。

但是,正如我们在讨论汤普森的思想时所看到的那样,这样一种判断包含了对不同个人效用之间的比较,而这种比较本身是不可能的。根据大多数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个人偏好更平等的财富分配还是较少平等的财富分配,仅仅只是一个个人偏见或成见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科学的经济学”的问题。毫不奇怪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从来不可能想到使用一个“客观的”或“科学的”标准来判断合适的财富分配,该财富分配同时又在逻辑上与其功利主义哲学的利己主义假设相一致。再一次重复我们曾在功利主义经济学讨论中多次提到的观点:享乐主义或功利主义并没有为人们在不同个人的各种欲望和满足中无论做出什么都使人不满的这种比较提供了一个基础性准则。

但是,如果人们喜欢现存的财富分配,那么,个人最大化行为自动使社会达到的帕累托最优点,在新古典主义著作中被认为是“极乐点”或“受约束的极乐点”<sup>3</sup>。到目前为止,大多数新古典经济学家几乎没有发现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错误,公正地说,新古典主义福利经济学代表了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教义的“极乐世界”和“永恒幸福”。<sup>4</sup>

## 微观经济学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

前一节是简洁的,但对那些不熟悉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难以理解的。其原因是,正如在大多数院校中传授的那样,当代正统微观经济理论是新古典经济学;而且,正统微观经济理论的本质以及不可避免的主要发展趋势,是新古典福利经济

学。这是一个在理解当代经济理论时不得不强调的重要事实。为了使细心的读者全面、熟练地掌握新古典福利经济学,需要列出中级水平的当代正统微观经济理论的教材。目前已经有许多这样的教材,这些教材结构安排严谨合理且写作优秀,那些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阅读。

同时,为了表明我们的观点,我们将讨论两本被选教材中的一本,因为它是微观经济理论最典型的正统学院派的理解(所以代表了新古典功利主义经济学当前发展的准确总结),而且其结构安排也十分合理,写得很好,这本教材就是 C. E. 弗格森(C. E. Ferguson)主编的《微观经济理论》的修订版,该教材由十六章组成。最后一章的标题是“福利经济学理论”<sup>5</sup>,显然,前五章的大多数章节是为了建立最后一章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分析基础,最后一章是全书的最高点和结局。在最后一章的前面部分,弗格森写道:

我们现在希望证明……一个完全竞争的、自由的企业系统保证达到最大社会福利。证据依赖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最大化行为。回顾一下亚当·斯密的声明,每一个个人在追求他自己利益的同时,好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到一个促进所有人一般福利的行动过程中。<sup>6</sup>

接下来是 9 页的总结性解释要点,我们已经在前面章节中进行了扼要的总结。这 9 页中最重要的方面是:弗格森能够用一种前后一致的、简洁的方式,将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证明与极乐的获得紧密联系起来,因为他所做的每一点,都能引导读者参考该书的前面章节。他对正统微观经济理论的标准解释发展了必然导致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结论的理念和分析工具。的确,在考察前面十五章时,我们极少能看见其解释所引出的其他结论。福利经济学的这 9 页证明将全书联系起来然后得出结论:“这种惟一的均衡……被称为‘受约束的极乐’点,因为它代表着导致最大可获得社会福利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惟一组织。”<sup>7</sup>

进一步说,新古典学派是现代经济学中处于统治地位的(并且可能是数目上最大的)学派。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家来说,微观经济理论(例如福利经济学)为每一个专业的理论分支领域和各个领域所得到的理论、实际以及政策导向结论奠定了基础。他们的成本—收益分析和关于对外贸易获得普遍利益的证明,他们有关在应用经济学每个分支领域都会出现的市场效率的观念以及理性价格的观念,除了证明自由企业的、竞争性的市场系统将导致一种帕累托最优状态之外,绝对没有任何别的什么意义。实际上,如果没有帕累托最优状态,这些话语和理念都不复存在。事实上,如果没有一个最优状态,这些话语无论如何是没有意义的。仅仅当新古典经济学家首先假定了帕累托最优状态存在时,这些话语才被赋予意义;然后,通过定义,所有交易者据说都可以获利、资源将得到“有效的配置”,价格据说也是合理的,并且因此导致在功利主义基础上对各种政府工程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进行准确的评价。功利主义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普遍流行,并几乎在全部理论



和实际事务上支配着所有的新古典主义分析。

新古典经济理论是斯密和李嘉图受效用和交换观点支配的思想的直接发展，这些观点在马尔萨斯、萨伊、西尼尔、巴斯夏、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马歇尔和克拉克的著作中得到发展并被详细地阐述。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已逐渐采取了深奥的数学分析的形式，以至于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经济学学生可能花了多年时间仅仅学会了这种分析工具和技巧，并对构成该分析基础的哲学和社会价值观变得一无所知。考察上述作者的思想是非常有用和重要的，这正是原因之一，因为深奥的数学“烟幕”并未掩盖这些价值观。但是，这些在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作品中模糊的但又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哲学、社会和道德价值观，基本上与明确反映在马尔萨斯、萨伊、西尼尔和巴斯夏作品中的那些观点相雷同。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马歇尔和克拉克的作品，开始逐渐地掩盖了这些价值观，最终用精确的、雅致的、深奥的数学建造了辉煌的丰碑。

因为这个理由，构造一个扩充并提炼了这里大多数明确和隐含结论的现代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评论是重要的。这一章的剩余部分将致力于这一批判。

### 福利经济学的享乐主义基础

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直接依赖于享乐主义的先入之见，它既包括精神享乐主义，也包括伦理享乐主义。在19世纪晚期，精神享乐主义是一种关于人类行为的相当粗浅的理论。效用被认为是在人与外部消费物品之间的一种可以用基数来量化的关系。这种关系被视为似乎是抽象地给定的和确定的，因而不是一个进一步研究的合适主题。所有的人类行为然后被归结为试图通过商品和个人被赋予的生产性资源（资源的来源及其适当性，像效用关系一样，在分析的范围之外）的使用或交换来最大化其效用。

然而，直到19世纪末，精神享乐主义一直受到怀疑。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福利经济学行为假设的发展及其完善，仍然得出了与源于被怀疑的理论相一致的结论，因而代表了回避反对精神享乐主义的企图。无差异曲线允许用效用的序数量化代替效用的基数量化。更进一步地，效用一词常常被用来支持偏好一词。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宣称，如果我们假定个人选择是一致的，偏好可以经验地被观察到。然而，这种一贯性仅仅是选择反映一种预先存在的、抽象地给定的“偏好顺序”的假定（当然，经验观察已经不断地证明了，常识应该已告诉经济学家，选择没有这种一贯性）。基数可量化效用或序数可量化偏好具有同样的精神和伦理的重要性，通过两个抽象假定和暗示为永恒不变的实体——偏好顺序和初始财产禀赋，福利经济学仍然坚持为最大化经济人的享乐主义理论，其中人们按照一种完全预先确定或计划的方式采取行动。

福利经济学的伦理享乐主义一直被 S. S. 亚历山大(S. S. Alexander)称之为“贪婪原

理”，即“如果你喜欢某样东西，越多越好”。<sup>8</sup> 这样，福利经济学的基本规范原理可陈述为以下几种方式：从伦理上说，快乐更多比更少好（边沁版本）；效用更多比更少好（19世纪晚期新古典主义版本）；在个人的偏好顺序中，更优的位置比更劣的位置好（现代新古典主义版本）。在每种情况下，单独的个人是惟一有资格评价一个客体的快乐、效用或偏好的法官，因为这些福利量被假定为仅仅依赖于个人与消费客体之间的关系。通过市场购买力来估价，个人需要是社会价值的最终标准。无论何时，个人的效用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事情，也就是说，任何时候，一个人的效用要受到他人消费（或厂商生产）的影响，这种个人之间的影响被称为“外部性”。由偏好顺序的相互依赖（例如，消费被看作是一种社会活动）所引起的外部性，只能被当作单独的例外（下面将进行详细阐述）来处理。福利经济学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个人需要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的社会过程和个人在该过程中的地位的产物。如果新古典经济学家没有忽略这一点，他们将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即规范评价可以由完全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及其相关的个人需要模式组成。福利经济学是马克思称之为“庸俗经济学”教条的直接发展，庸俗经济学是“以一种教条主义的方式将自己局限于系统化并宣称是永恒真理的一种观点，是自负的资产阶级关于其自身世界而且对他们来说是所有可能的最好世界的陈腐观念”。<sup>9</sup>

### 帕累托最优标准的本质

在精神和伦理享乐主义的基础之上构建了帕累托最优标准——福利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我们已经目睹了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如何在帕累托标准下达到顶点。该理论导出这样一个结论：自由市场的、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配置资源、分配收入，并且在消费者中分配消费品，以至于没有任何通过消费、交换或生产上的变化实现的资源再分配能够明显增加正在生产和交换的商品的价值。这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的基本标准。

帕累托最优的基本规则可以表述为：当在没有使其他人的情况受损或恶化（由其他人自己判断）的条件下，没有任何变化能使一些人的处境得到改善（由他自己判断）时，经济状况是最优的。帕累托改进是一种变化，它使社会从一个次优位置移到更接近于最优位置：“任何不损害其他人并使一些人境况变好（根据他们自己的评价）的变化，一定被认为是一种改进。”<sup>10</sup>

关于帕累托规则要注意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其保守的、一致性的特征，但它却忽略了矛盾冲突的各种情况。在一个充满阶级矛盾、帝国主义、剥削、疏远、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大量其他人类冲突的世界中，可能使一些人处境变好而不会使其他人状况恶化的变化在哪里呢？改善被压迫者的处境，将会恶化压迫者的境况（当然由压迫者感知）！任何改善

一个社会单元命运而不遭致自然敌对的社会单元反对的重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态是罕见的。该理论领域看来确实是非常有局限性的，所以，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事实——即该理论不仅被绝大多数新古典经济学家，而且被许多粗心的按照马克思和凡勃伦传统写作的经济学家认为是重要的，则几乎不能保证对该理论进行严肃的探讨。<sup>11</sup>

### 福利经济学的社会价值观

我们已经阐述了新古典主义效率和理性概念的含义，必然与帕累托最优相联。接受自由市场解决资源配置问题的理性或效率，要求人们接受社会价值观以及构成新古典分析基础的经验的和行为的假定。上述享乐主义讨论暗指这些社会价值观，所有这些价值观应该明晰化。

在帕累托分析中，惟一有用的价值观是由其购买力估价的单个个人的偏好。个人主义和分配假定将分别予以考虑。

个人偏好原理是特别受约束的。因为在新古典主义分析中，我们没有计量不同个人偏好相对价值的方法，我们同样没有在给定个人偏好条件下估价其变化的标准。能够做到后一点将意味着可以做到前一点。在构建理论的抽象水平上，个人仅仅在其偏好顺序上不同；在既定个人偏好顺序下的变化就绝对等同于单个个人完全从社会中撤出或由新的个人来替代此人。正因为如此，该理论能够既不考虑社会和个人价值的历史演变，也不考虑其日常波动。这样做就是承认任何暂时分离的两个事件或状况的规范的不可比性，也就是承认从该理论应用的领域排除几乎所有现实生活现象的必然性。相反，允许这样的规范比较，将回到功利主义的激进主义者和像威廉·汤普森那样的社会主义者的平均主义结论，因而严重地削弱了作为社会现状理论支持者的新古典经济学。

因此，很明显，这种理论仅仅当个人偏好或嗜好一直不变的情况下才是可应用的。同样明显的是，每个人，包括盲目狂热者、疯子、施虐狂者、受虐狂者、精神上无能的人、儿童、甚至新生婴儿，必须总是他们自己福利的最好判断者（还可加上的一点就是，所有决策必须由个人而绝不仅仅由家庭或其他社会群体的领导所决定）。每个人必须对所有可行的选择具有完全的知识，而没有关于未来的不确定性。除非这些条件得到实现，否则人们将发现，他们在行动前所指望的效用与行动实现后的效用将没有必然的联系，并且个人选择或偏好与个人福利没有明显的联系。当我们承认嫉妒和同情的存在时，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将会中止，嫉妒和同情的存在，使单个人对其福利的理解依赖于他对于其他人福利的理解（当然，这是下面将要阐述的外部性一般问题的一个特例）。

帕累托最优仅仅涉及到特殊的财富和收入分配时才得以辩护的事实，也许是该理论最具决定性的规范性弱点。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家一般承认帕累托最优的极端受限制的相

对性,但他们倾向于忽略这种限制并转到更安全的主题上。通过使用帕累托分析的规范假设,可以证明,除非存在社会最优的财富和收入分配,否则一种帕累托最优状态,从全社会的角度来说,可能劣于许多非帕累托最优但有更优的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其他状况。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引入一个标准句子来规避这一问题,即“假定财富和收入的现存分配是理想的或者假定政府使用一种税收和补贴制度使其如此”。

在说明这一标准的限制性条件之后,新古典经济学家使用成本—收益工具来进行其政策分析,这一分析假定标准帕累托分析规范和经验是适当的。政府绝不会使用其税收和支出权力以获取公平的财富和权力分配的事实,绝不会得到承认。不承认这一点并不令人惊奇,因为这将促使正统经济学家讨论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的性质;并且既定经济利益及其与政治权力的关系的分析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家来说总是一种禁忌(当然,这是他们的理论与斯密、李嘉图、汤普森、霍奇斯金、马克思、凡勃伦、霍布森、卢森堡和列宁的理论之间的许多重要区别之一)。没有努力获得一个更公平的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原因——而且看起来是非常明显的原因——是进行这种再分配的一般社会的、立法的以及政治的手段本身就是初始财富分配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拥有财富就是拥有政治权力。对于那些不喜欢不公平的财富分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来说,寄希望于拥有政治权力的人矫正现存的经济不平等现象,这也许正是其最耀眼的盲点。<sup>12</sup>

实际上,大部分新古典经济学家无疑仅接受现存的财富分配。他们很少承认,接受现存的财富分配就意味着接受现存的法律制度及道德规则(包括私有财产法),更一般地说,就意味着接受整个社会权力系统,所有上级的和附属的全部角色,以及行使和维护的机构和强制工具。因此,涉及倾向于阶级冲突的经济学家的大部分重要问题,由于帕累托方法的初始假定而从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分析中被排除掉了。

### 福利经济学的实证分析的假设

除了个人主义和分配公正的假设外,新古典福利理论还要求许多附加的经验主义假设和分析假设。这些构成了我们熟悉的中级微观经济理论教科书中纯竞争下均衡必要条件列举的内容(而且从来没有新古典经济学家提出过,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实现帕累托最优的任何其他方法)。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这些假设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 大量的买者和卖者,任何人都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能产生明显地影响;
2. 任何企业都能很容易地进入或退出一个行业;
3. 投入和产出是同质的,且能分成任意大小的单位;
4. 对未来没有不确定性;

5. 对生产和消费的所有可能选择具有完全知识；
6. 生产函数满足“合适的二阶最优条件”（例如，有平滑的曲率、没有规模报酬递增，且沿等产量线的边际替代率递减）；
7. 同样合适的效用函数在整个时期都是稳定的；
8. 生产率一般不受财富、收入和权力分配的影响；
9. 只有那些外部经济和不经济（或“外部性”）可以通过税收、补贴或者新产权的创造得到纠正或抵消；
10. 市场总是均衡的，所有变化都只是从一种静态均衡状态向另一种静态均衡状态的瞬时变化。

这些假设不仅限制了竞争性均衡的新古典主义分析的适用领域；它们占据了整个分析。假设1和假设2是传统竞争概念的基础。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它们是竞争的首先受害者。不像新古典主义教科书的丰富多彩，现实的资本主义竞争是战争，是排除竞争对手并形成垄断的致命的斗争。竞争性的新古典均衡常常被称为“长期均衡”。然而，现实资本主义发展是以相反的方向冷酷地朝着普遍存在的垄断和寡头垄断发展。

关于均衡连续存在的假设10预示着新古典经济学处理经济学现象历史发展的无能。即使新古典经济学家在构建经济增长理论时进行了无数次尝试，但一直都不能一贯地使福利与增长分析一体化。一旦经济增长被承认，新古典分析本身常常表明不稳定性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sup>13</sup>当承认存在不稳定性和失业时，帕累托准则似乎对新古典经济学都不重要了。在新古典体系下，不仅没有什么可以保证稳定、平衡和充分就业的经济增长，而且在增长的经济中是什么使福利最大化这个基本问题都是不清楚的。福利最大化是指最大化增长率、最大化利润、最大化总消费、还是最大化每个人的消费？而且，在这些问题的答案中，没有一个答案有助于解决考虑或权衡下一代人（后代）福利的方法的重要性和性质的问题，而下一代的福利正在明确地受到当前的消费和投资决策的影响。在增长经济中，每种可能的判断福利的标准与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没有必然的联系，并且与静态理论的假设没有必然的一致性。<sup>14</sup>新古典帕累托标准就是不能处理这样的问题。本质上它是一种静态的理论，不可能被扩展用以描述一个增长的或变化的经济。

其余的假设（从假设3到假设9）也都有相似的问题。关于确定性和完全知识的假设4和假设5，是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两个必然的后果中提炼出来的，该后果在理解该制度的不稳定性和资源不当配置的人类成本方面具有非凡的意义。关于投入的同质性（特别是资本的假设3和关于“适当性质的生产函数”的假设6，近期已被皮罗·斯拉法（Piero Sraffa）证明是维持不住的（将在第16章讨论）。最后，关于外部影响的假设9可能是整个分析中最难自圆其说的部分。我们将在下面更详细地加以考察。

## 指导政策制定的新古典福利经济学

没有多少新古典经济学家会认为,构成竞争性均衡理论基础的假设是现实的,但是几乎他们所有的人都接受帕累托福利标准的社会的、道德的和哲学的基础。然而,现实主义的缺乏,并未阻碍新古典经济学家提倡将这种理论模型作为政府官员制定政策的基础。他们认为,这种分析不应该被当作是对现实的描述,而应当看作是一个规范模型,无论什么时候,当上述竞争性均衡所必需的任何假设不能被满足时,就可以应用这一模型来指导政府干预市场。<sup>15</sup>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中政府干预主义的观点,应该做出如下两点批评。

首先,新古典主义观点认为政府是一个虚幻的存在。只要帕累托最优存在,决不会提到政府。当不完美发生时(被认为是如果不产生这种不完美,世界就是完美的),政府就成为一个将该系统恢复到极乐状态的解围人。它是一个冷漠的、公正的仲裁人,它出现在这种不完美的场合下,并有能力实施税收或给予补贴,以使经济恢复到帕累托最优。如果新古典经济学家被问到关于既定利益、腐败(那终究仅仅是市场作用的另一方面)、经济和政治权力,或政府运行过程的阶级控制,他们将蔑视地回答,这些问题是社会学家和政治科学家们所关心的(尽管在大部分保守的、正统的社会科学里,寻找这样的关心也是徒劳的)。

对帕累托最优作为政府政策规范的第二个批评,甚至是更具破坏性的。细读这几个必要的假设,考虑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成千上万的相互依存的市场,你就会确切无疑地认为,任何时候都会存在无数对帕累托最优的偏离。为了回应众多对其理论假定缺乏现实性的批评,新古典经济学家自己对他们的理论进行了修正,以使它更符合实际。这种修改被称为“次优理论”(the theory of second best),但仍然与福利经济学的原先的新古典主义版本一样,它是直接地建立在功利主义的基础之上的。但是,被修改了的该理论版本,却导致了未曾预料的逻辑结论。按照“次优理论”,被用以补救仅仅一些市场而不是所有市场不缺陷(同时补救全部市场缺陷显而易见将是不可能的)的政策,会经常导致与其意图完全相反的结果。用杰出的经济学家威廉·J. 鲍莫尔(William J. Baumol)的话说:

简言之,在数学论证的基础上,这一理论(次优理论)指出,在一种以任何对“完美”最优的偏离为特征的具体状态中,仅仅消除一些对最优安排的偏离,这种局部的政策措施很可能导致在社会福利上的净损失。<sup>16</sup>

那么,这将把帕累托最优这个新古典主义的市场效率和理性价格(不提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古典自由主义的辩护)观念据以为基础的规范理论放在哪里呢?答案是明显的:它是一种规范化的理想,并且被建构在最难以置信的和不现实的基础上,其信徒不可能证

明(甚至在理论上)任何被给定的政策决策将使经济朝更接近于还是更远离这种理想的方向变动;比经济现实更尖锐的矛盾使该理论变得费解,这种现实是理论的起源并且该理论企图为其提供蒙昧主义面纱和意识形态辩护。

## 福利经济学和外部性

福利经济学的致命弱点是其对外部性的处理。在构成新古典理论基础的所有非现实的假定中,那些对外部性的处理是最难以令人置信的。在通常的新古典方法中,生产和消费过程被假定仅仅对正在生产或消费的个人或一些人有“直接”影响。<sup>17</sup> 当一个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受到另一个消费者的消费影响时;或者当一个企业的生产函数受到另一个企业的生产影响时;或者,更为重要的是,当个人的效用被与其没有直接联系的生产过程所影响时,外部性就产生了。传统的新古典主义方法假定,除单个的外部性外,帕累托最优处处存在。利用所有价格而不是被讨论的能够反映“完全市场合理性”的市场中的价格,福利经济学家声称,通过一种外推或者内插的计算方法(通常被称为成本—收益分析),可以为未定价的外部影响模拟出可能是正确的、合理的市场价格。

用来纠正外部性的成本—收益分析本身,仅仅是配置效率的帕累托理论的扩展,正如一个重要的现代新古典理论家所陈述的:

一个同意应用配置效率原理的人,不需要新的假定来扩展其同意现存成本—收益分析的应用。总之,不仅经济效率的原理,而且成本—收益分析的原理,都从帕累托准则得到灵感,并且一个具有一致性的人,不能接受一个原理而否认另一个原理。<sup>18</sup>

这里所分析的外部性,并不是实际所想象的对帕累托最优的现实偏离。相反,可以断定,这种处理外部性的方法,仅仅是一种对现实的相当近似的反映。这位新古典理论家进一步断定:“虽然不能指望经济在某一时间的任何时刻达到一种最优位置,但在它变动需求和供给的连续的调整中,对于任何被延长的时期,可能不会离一个总体上的最优位置太远。”<sup>19</sup>

因此当我们发现存在某种外部性时,就需要一个仁慈的、公平的政府;这时,以一定的数量征税或者补贴,可以抵消或中和单一外部性的影响,恢复帕累托最优。但是构成处理外部性的税收—补贴方法基础的成本—收益分析,与简单陈述不存在外部性一样,是不现实的,因为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运用,取决于这样的假定——即除了讨论中的市场以外,其他全部市场的价格都是帕累托最优的。<sup>20</sup>

当我们意识到外部性无处不在时,一个更具毁灭性的批评便产生了。<sup>21</sup> 当提及外部性时,经常被考虑的典型例子是,一个工厂排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硫和微粒物质,引起附近居

民的呼吸道疾病；或者露天采矿作业，在农村留下一个不可恢复的、极为不美的伤疤。然而，事实上，我们每天从事的大部分数以百万计的生产和消费，都包含外部性。缺乏现实主义的福利经济学，只不过是功利主义的个人享乐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正如凡勃伦令人信服地证明的那样，生产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过程，而不只是一个单个的个人或者甚至是一个孤立的个人群体的过程（即使当群体数目很多就像大型现代公司那样）。同样地，所有的人类行为，包括消费都是社会性的。每个人的福利，都以上千种方式受到社会模式和制度的影响，正是这些社会模式和制度，决定着谁消费什么和怎样消费。人主要是社会的动物，而不是被孤立的、不相关的原子。

在一个市场经济中，引起其他个人或企业快乐或痛苦并且未被市场定价的个人或企业的任何行动，都构成新古典福利经济所谓的外部性。因为大量的生产和消费行为都是社会性的，也就是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与许多人有关，那么，这样的行为将包含外部性。在餐馆里的进餐举止，我们的房子、院子和个人的外在表现，我们的个人卫生，我们为一个快乐旅程所挑选的路线，我们修剪自己草坪的时间——都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快乐和幸福。而且，我们的大部分生产活动甚至对没有直接关系的众多人产生更广泛的和无处不在的影响。一个企业重新给其工厂选址搬迁，可能使一个社区在经济上极端穷困。一个工厂的空气污染，可能给无数与工厂没有直接关联的人带来身体上的不适、巨额的清洁费用、疾病甚至是死亡。水的污染和露天采矿，可能毁坏有价值的社会资源，并破坏一个人们赖以生存的整个地理区域的生态平衡。但是，在新古典功利主义的“看不见的手”的世界中，每个人仅仅被看作只是与他或她自己的行动有关，并且大众福利当然也就因为所有利己行为而得到促进。

有了对于外部性无处不在的重新认识，税收—补贴的解决办法就被清楚地视为只是幻想。这个解决办法将要求数以千万计的税收和补贴种类（这还只是在美国）。而且，这种强加的任何单一类型的税收或补贴，将无疑创造出的一系列全新的外部性，因为税收和补贴会创造出新型的嫉妒和同情。这种嫉妒和同情所形成的新的外部性，必须有新的税收和补贴去处理。这个过程将无限继续下去，因为无限的税收和补贴绝不会把我们带到与那所有的个人主义的、功利主义的狂想中最难以捉摸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更近的位置。

但是，正统的新古典理论家中更反动的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将在第 17 章讨论），从未接受对市场过程的任何可斟酌处理的政府干预原则。因此，许多年以来，他们只是简单地忽视外部性。然而，在 20 世纪 50 年代晚期和 60 年代早期，他们形成了对学说新的阐述，使他们参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变得非常流行的关于外部性的争论，在当时，即使是正统的理论家，也不能再忽视美国资本主义所导致的环境退化。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这十年中，芝加哥学派理论家形成了一个处理外部性的政策建议，他们的观点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仍然保持不变。

芝加哥学派新古典主义者的政策是：创立一种污染环境的新产权，然后创立一个能使



这些污染的权利自由买卖的新市场。<sup>22</sup>并假定这样的交易将持续到这样一点，即增加1美元的污染时，污染者的边际效用刚好与污染的受害者的边际负效用相等为止。在这一点上，通过增加或者减少污染来影响帕累托改进，将是不可能的，并且，在这一点上，将达到一个包括污染在内的新的、自由放任的、竞争的帕累托最优。

有人可能要问这些极端保守的新古典主义者：中立的、公平的政府将把这些污染权分配给谁？是分配给那些被污染的贫民窟中的贫穷居民，还是分配给被任意选择的人们？或者分配给制造这些污染的巨大的垄断者或者寡头垄断者？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从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关于过去一百年的每个政策问题的回答中得到预期：如果我们假定完全竞争；如果我们假定在所有生产者和所有消费者方面的完全的知识；如果我们假定没有交易成本（例如，如果一个公司污染者的受害者能够没有成本地组织他们自己与该公司讨价还价）；那么，我们就可以证明，“初始的产权安排对配置效率没有影响”。有了这些假定，一个必然的结论就是，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条件下，“不能达成共同协定……可以被认为是……净的潜在的帕累托改进不可能的第一证据。”<sup>23</sup>然而，这对于更公正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来说显然是辩护性的。例如，一个最重要的新古典理论家（不是芝加哥学派的成员）写道：“以这种方式合理化现状使经济学家更危险地接近为它辩护。”<sup>24</sup>非常危险地接近！但是这个新古典理论家没有能指出的是，更温和的新古典福利理论家（就像他自己）提供了一个甚至更有效的关于现状的合理化方法——之所以更有效，是因为它以少得多的露骨的辩护，取得了几乎一样的结果。

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极端个人主义倾向，反映在他们关于外部性性质的观点中。他们简单地考虑外部性及为此提倡产权及产权市场的建立，就似乎是抽象地给定和确定的。通过忽视社会生活的相关方面，他们的理论忽视了个人几乎可以随意地创造外部性这样一种事实。如果我们假定功利主义经济学的最大化经济人，并且假定政府当无论什么时候发现外部不经济，就建立产权及其产权市场，那么，每个人能够有目的地将外部不经济强加到其他人身上，知道在政府即将建立的新市场内讨价还价，肯定会使他或者她的境况变好。被强加在一个人邻居身上的社会成本越重要、越不令人愉快，一个人在讨价还价过程中所获得的报酬将越大。紧接着最大化经济交换者的传统假定的是，每个人将创造一个最大化的令人厌恶和有害的社会成本，并将其施加于他人。这个一般过程能十分恰当地被称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市场的“看不见的脚”。“看不见的脚”保证我们在一个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仅仅追求他或她自己最大利益的每个人将自动地、最有效地尽力使大众的痛苦最大化。

要了解该原理为什么具有一些有效性，应注意到一个自我寻找的、计算效用最大化的个人，将通过设计出一种创造非市场商品或损害他人的外部不经济的新生产函数，以使得参与这些新组织的市场所取得的价值最大化。将这一生产可能性集用作创造惹恼、危害、损坏其他人的外部不经济或者非市场商品，他或她将仅仅选择那些比通过市场交易可以

获得更高的边际报酬的不经济。但是这样做,他或她将使其他人的苦难、痛苦和悲惨或者仅仅是成本最大化,因为他或她的收益总是其他人的损失。这些被合理计算的社会暴行或者外部不经济的接受者,将承担预防支出或者支付贿赂,直到帕累托效率的一般边际条件得到满足。因而,这个接受者的成本将被最小化,而且一个外部不经济的或者相互进行社会破坏的有效率的模式将会出现。

但是,如果这些外部不经济,按照对发起者的价值,在社会里被最大化了,并且如果接受者有效地与之抗争,那么,我们可以对合理的、最大化的个人和帕累托效率进行完全相反的操作。那就是说,我们不是去获得那些具有最高效用和最小成本的生产品,而是生产具有最大负效用、痛苦和苦难的商品,这些商品将如此分配以至于它们将具有提供者能施加的最严重的影响,根据接受者的成本以及生产成本,这种影响正在被最小化。正如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所证实的可接受的原理那样,经济是有效率的,但仅仅在提供灾难。可以改写该理论的一个著名前辈的观点:每个人必须努力地使每年的社会外部成本尽可能地大,的确,他一般既没打算促进公众痛苦也不知道自己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痛苦。他只盘算自己的利益,并且他实际上也是这样做。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脚”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意味着是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痛苦。如果属于新古典经济学家话系的保守的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将说服政府采用他们处理外部性的方法,这个资本主义的“看不见的脚”的原理会起同样的作用。<sup>25</sup>

新古典经济学家之所以完全不能适当地处理这些问题,是由于他们没有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尽管所有的生产和消费行为是社会的(正如它们在其他类型的经济制度中一样,而控制生产和消费的激励机制几乎完全是个人的(正如它们在其他类型的经济制度中不是也不必是一样)。当然,建立各类物质的、生物的和社会的相互依赖的合法产权,或者建立一种排除生产和消费(或者外部不经济)社会方面的合理的税收体系,是一种完全不可能的任务。相反,为了建立一个更合适的且更公平地满足人类需要的经济体制,正如私人财产制度一样,构成资本主义自身基础的激励机制也需要改变。然而,不用说,这是远远超过正统新古典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一项任务。

该理论对于处理普遍存在的外部性问题束手无策,尤其是试图部分地达到帕累托最优却很可能取得截然相反结果的次优理论的结论足以使任何一位理性的人确信其不中肯性。其实该理论还远远不止是不中肯的。一些更坦率的正统经济学家也是承认这一点的。其中一位非常卓越的经济学家写道:

经济理论的成就……既给人深刻印象,又以多种方式给人以美感。但是不能否认,在如此多人的完善经济状态分析的迷人胜景中也存在一些藏污纳垢之所,毫无理由地进行假设的事情时有发生。这可能也是危险的。均衡经济学,因其众所周知的福利经济学内

涵,容易被转变成对现存经济安排的一种辩护并且经常被如此转变。人们怀疑,在天平的另一端,对总处于均衡状态的经济的最优计划的近期相当精致的分析,已经误导人们相信我们实际上知道经济将是怎样受到控制的……它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和……不诚实的事件。<sup>26</sup>

### 对帕累托分析的批判

一些更激进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对这种事件感到遗憾。“太糟了,”他们说,“理论是如此的不恰当。它是如此优雅且分析复杂,好像具有这样普遍的标准要求。”正如我们在整本书中努力证明的那样,这一可悲的事情被误导了。关于新古典功利主义理论的规范性异议比所有对于这一点的实用的、经验的和分析的异议更具有破坏性。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接受现存的个人需求作为社会价值的最终的伦理标准,该个人需求由体制、价值和现存社会的社会过程等产生,并且由收入、财富和权力的现存的分配进行估价。因此,理论变得无力过问关于一个伦理上的好社会及其伦理上的好个人的性质的问题。功利主义理论规范准则的表面合理性,来源于对一个全能中央政府观念的广泛的道德厌恶,这一全能的中央政府常常武断地且反复无常地规定个人的选择和行为模式。然而,从道德上拒绝这一“奥威尔主义幽灵”(Orwellian specter),不应该导致反映出现存社会该幽灵的对立物的幻想。尽管,《奥威尔的1984》仅仅描述了他看到的他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趋势,但对21世纪的大多数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仍有公正的描绘。

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化的个人的现存愿望构成功利主义所有道德判断的基础,因而我们应该首先讨论这些愿望。对为资本主义社会引起的种种欲望所困扰的人进行全面的精神分析,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写道:

人们今天被购买更多、更好和特别新的东西的可能性所迷惑。他是消费饥渴的,购买和消费的行为已经成为一个强迫性的、非理性的目标,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结束,与所购买和消费商品的使用或快乐几乎没有什么关系。购买最新的精巧的小装置,以及市场上任何产品的最新款式——与使用这些产品所感受到的实际快乐是十分次要的相比,是每个人的梦想。现代人,如果能对其天堂的概念表达清楚,他将会描述一个看起来像世界上最大的百货商店的幻想,即百货商店里有新的物品和精巧的小装置,他自己有用来购买这些商品的充足的货币。他将在他的精巧的小装置和商品的天堂内到处徘徊,装腔作势地说,假设有更多的、更新的东西可购买,或许他邻居的特权只是稍微比他少一点点。<sup>27</sup>

人性并不会自行产生——自动最大化,对我们的经济制度的平稳、获利运行是如此必需的——消费饥渴。资本主义人类及其大多数需求是由一个社会控制、操纵、欺诈和文字

污染的精致的制度所创造的。

在建立于腐败和欺诈基础之上的这一经济和政治制度中，每个孤单、孤立的个人在残酷的竞争中都要对付所有其他的个人。结果几乎是普遍的迷失、薄情和绝望，这是奇迹吗？生活的空虚和无意义的普遍感觉是公司广告执行者创造资本主义个人需求的基础。这样的个人注视着聪明、快乐、活泼的人们购买新车、住房和立体音响的商业广告。他或她然后努力通过购买来克服其特别的不幸和焦虑。购买、购买、购买成为他或她的摩西(Moses)和资本家的利润。但是这并没有给他或者她带来安慰，因此他将目标确定为一辆更大的汽车、一所更昂贵的房子等等，于是他或她就开始了艾丽斯仙境里踏车似的消费主义的单调循环。

这些就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创造的孤立的、自我主义的、疏远的、被操纵的资本主义个人需求。这些需求形成构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道德基础。而且个人需求被赋予的道德权重，当然仅仅由那个人的财富和收入决定。当面对这一章中的辩论(以及可能遭到的许多其他批评)时，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会承认福利经济学不可能在规范的、经验的或者分析的基础上被辩护。尽管如此，他们继续运用这一思想，虽然这一思想仅仅在帕累托分析在应用经济学的大多数领域内被接受时才可以被辩护。帕累托效率观念支持以下几点：(1)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利益理论；(2)公共财政的新古典理论的大多数规范结论；(3)大多数成本—效益分析；(4)新古典经济学影响政策建议的几乎所有其他领域。更为糟糕的是，在大部分意识形态上被玷污的所有新古典学术研究、比较经济体制或者社会主义经济分析中，假装神圣地提出那些几乎无法辩解的关于“合理价格”和“市场效率”的陈词滥调和教义。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东欧经济改革最有趣的方面也许是——尽管存在上面详述的许多弱点，新古典辩护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许多改革者天真地且毫无批评地接受。这种情况看起来就好像是东欧共产主义的缺陷促使许多改革者接受了一种隐藏和模糊了资本主义缺陷的理论，他们孤注一掷地希望具有许多缺陷的资本主义仍然可能比他们的经济制度要优越。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期，所有这些经济都退化到了一个存在大量的贫困的失业、有组织的犯罪、卖淫及财富和收入极其不平等的境况。

先前我们宣称现代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是西尼尔和巴斯夏观点的直接发展，我们通过重复这一观点而结束本章。像那两位19世纪的思想家一样，新古典经济学家将资本主义制度视为一种自然和谐的和普遍福利的制度。维持这一种观点的代价是常常忽视或否认所有重要的社会问题和所有重要的社会矛盾。维持这一观点的收益当然是，人们可以坐享其成且休闲娱乐，忘记这个世界的所有不快，享受极乐世界和永恒幸福的美梦。

#### 注 释

1. Joseph A.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860.

2. Francis M. Bator, "The Simple Analytics of Welfare Maxim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7(1957):22-59.

3. 新古典批评家可能反对这样的观点。新古典文献中的“极乐点”被定义为效用可能性边界上的一点,该效用可能性边界位于“社会福利函数”的最高可能点。但是,由于新古典文献证明了,这样的“社会福利函数”是不能被计量的,该“社会福利函数”具有清楚、明确的判断财富分配的原则,同时在逻辑上与个人主义的功利主义基本教义不矛盾,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新古典理论中这样的“社会福利函数”导致了关于个人偏见的简单说明。

4. 这一章节的标题取自于公元5世纪著名基督哲学家圣·奥古斯丁的著作“上帝的城市”一书中两章的标题。由于边沁将他的哲学看作是“快乐的计算”,而且由于边沁观点的新古典详细论述是不受时间限制的,因而“永恒的”模型这一标题似乎是合适的。

5. C. E. Ferguson, *Microeconomic Theory*, rev. ed. (Homewood, IL: Irwin, 1969), pp. 442-66.

6. 同上,第444~445页。

7. 同上,第454页。

8. S. S. Alexander, "Human Value and Economists' Values," in *Human Values and Economic Policy*, ed. S. Hood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107.

9. Karl Marx, *Capital*, 3 vol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61), vol. 1, p. 81.

10. W. J. Baumol, *Economic Theory and Operations Analysis*, 2d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5), p. 376.

11. 参见 E. K. Hunt, "Orthodox and Marxist Economics in a Theory of Socialism," *Monthly Review* 24, no. 8(1973):50-56.

12. 这一点在下文中得到详细说明: W. J. Samuels, "Welfare Economics, Power and Property," in *Perspectives on Property*, ed. Gene Wunderlich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2).

13. F. H. Hahn and R. C. O. Matthews,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A Survey," in *Surveys of Economic Theory*, vol. 2, ed. American Economic Assoc. (New York: Macmillan, 1966), pp. 95-99.

14. 同上,第99~113页。也可参见 Richard Goodwin, *Elementary Economics from the Higher Standpoi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15. 欲了解这一观点的讨论,参见 E. K. Hunt, "Orthodox Economic Theory and Capitalist Ideology," *Monthly Review* 19(1968):50-55.

16. William J. Baumol, "Informed Judgment, Rigorous Theory and Public Policy,"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October 1965):138. 关于次优理论的关键性的公式,参见 R. G. Lipsey and Kelvin Lancaster, "The General Theory of the Second Bes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4(1956):63,64,65.

17. 通过使用直接的这一形容词,我遵循 E. J. Mishan, "The Postwar Literature on Externalities: An Interpretative Essa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9, no. 1(March 1971):被排除的是通过瓦尔拉一般均衡体系中相关价格的变化而获得的“间接效应”。

18. E. J. Mishan, *Economics for Social Decisions: Elements of Cost-Benefit Analysis* (New York: Praeger, 1973), p. 17.

19. 同上,第80页。

20. 同上,第79~83页。
21. 关于普遍外部性含义的分析,参见 R. C. d'Arge and E. K. Hun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xternalities, and Conventional Economic Wisdom: A Critique," *Environmental Affairs* 1, no. 2 (June 1971): 266-86.
22. 关于这一观点的清晰的公式,参见 Thomas Crocker and A. J. Rogers, III,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1).
23. Mishan, *Economics for Social Decisions*, p. 17.
24. 同上。
25. 看不见的脚的原理最先在下文中被说明: E. K. Hunt and R. C. d'Arge, "On Lemmings and Other Acquisitive Animals: Propositions on Consump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7, no. 2 (June 1973): 337-53.
26. F. H. Hahn, "Some Adjustment Problems," *Econometrica* 38, no. 1 (1970): 1-2.
27. Erich Fromm, *The Sane Society* (New York: Fawcett, 1965), p. 123.

## 第 15 章 新古典主义理念和自我调节的市场神话：凯恩斯的著作

在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新古典思想体系中，功利主义学派达到其最高级的、最综合的、最精美的状态。新古典功利主义的三个基本的思想要素分别为：(1)关于分配的边际生产力理论，该理论认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是达到公平分配的最理想方式；(2)“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该理论将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实现理性和效率的一个理想方式；(3)对市场自发的自我调节本质的信仰，它论证了政府的主要功能是保护契约的执行并维护私有财产的特定所有权。

虽然保守的功利主义者提出的上述三种基本要素的每一条表述都在掩盖资本主义的实质，但是其自由创造利润的思想还是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前两种思想要素纯粹是在赞美资本主义，它们通过使公众相信资本主义是仁慈的方法来掩盖事实，从而一点也没有阻碍资本主义发挥其功能或进行利润创造。第三条原理(市场的自发性)则毁誉掺半。

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资产阶级对产业利润的获取通常被代表旧商人和土地所有者利益的政府所阻隔。更有甚者，当时几个欧洲君主专制反复无常的暴虐行径直接引发了资产阶级对政府当局的憎恶。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英国议会，该议会以不代表多数人利益的独裁专制而臭名昭著。因此，在自由放任的旗帜下，资本家可以竞选政府官员从而更有效地、且不受限制地创造利润，并且这种政治活动看起来更像是推动大众消除专制政府弊端所做的人道主义努力，从而为民众争得自由。市场自我调节的理论(萨伊定理)对于限制政府当局的功能是有效的，但是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从未自动平稳地调节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上。事实上，并没有人拥护瓦尔拉，况且资本主义市场体系通常处于无政府状态：资本主义的历史即是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历史。

再者,在19世纪后期,世界范围的资本市场的形成及生产和运输条件的改善使得工业生产能力和工业力量都快速集中于大型公司、联合企业和卡特尔。这种日益加深的工业集中产生了以下两种严重后果:第一,无秩序的竞争使这些大型公司成本和风险增大。第二,由于大公司使市场失去了原先拥有的灵活性和调节性,从而加剧了市场的无政府状态,进而,经济萧条发生得更频繁、持续时间更长且程度更深。

因此,对市场自我调节的信仰在影响政府政策的同时,也让资产阶级付出了不断增加的高昂代价。而且在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初期,资产阶级仍未完全控制他们的政府,这一局面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得以改变。此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已被资产阶级牢牢控制。在这种环境下,资产阶级将依靠政府力量这惟一手段来摆脱19世纪末期的恶性竞争和无政府状态带来的损失惨重的经济萧条是不足为奇的。

以美国为例,1887年的州际商务法成立了州际商业委员会,而该法案的签署显然是为了规范铁路从而提高公共利益。这只是政府为此目的而创设的众多管理委员会中的第一个。事实上,这些管理机构从一开始就主要是由本应被控制的产业的前任管理者任职,因此,它们成为提高和保护这些产业利益的政府机构。同样,1890年的《谢尔曼反垄断法案》(该法案在参、众两院以仅有一票反对的绝对优势通过)是第一个为促进竞争而设立的反垄断法案,然而,事实证明此法案仅被用作控制工会和解救那些因“不公平竞争”而被诉诸法庭的企业。

因此,上述这些政府职责的延伸在主张自由放任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框架中很容易理解。事实上,这些政府职责的延伸可以用以证明“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该理论通过实证研究推测到在每一个产业中均有大量小规模、相对势力弱小的竞争者处在被大公司统治的境况中,因此问题就出现了:管理机构和反垄断法案迫使这些大企业像那些小企业公平竞争一样运作,并且创造一种被认为近似于完全竞争的所谓的“可运行的竞争”环境,这被认为是接近良好的竞争局面的一种方式。该理论还认为,政府对经济进行一定的干预只是为了保证“看不见的手”的良好协调运行而对经济进行一定的干预。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加剧,对市场自我调节的信仰使资产阶级(社会其他阶级亦然)付出了越来越沉重的代价。在19世纪的上半叶,美国仅发生过两次经济危机(爆发于1819年和1837年),英国发生了四次(爆发于1815年、1825年、1836年和1847年)。在19世纪下半叶,危机爆发次数增加且程度加深,美国发生了五次(爆发于1854年、1857年、1873年、1884年和1893年),英国有六次(爆发于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和1900年)。到了20世纪,形势更加严峻,持续发生的危机使资本主义损失惨重,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大萧条是这种持续发生的危机达到顶点的结果。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是一种遍及世界的现象,几乎影响了所有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以美国为例,1929年10月24日(后来此日被称作“黑色星期四”),纽约证券



交易所的证券价值一落千丈,这一事件最终打击了所有商人的信心。结果,商人大量减少生产和投资,随之国民收入和就业率骤减,反过来更加挫伤了商人的信心。一时间,成千上万的公司纷纷破产,上百万人失业,美国历史上最惨重的一次灾难降临了。

1929~1932年期间,超过85 000家企业惨遭破产;5 000多家银行停止营业;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股票价值从870亿美元跌落到190亿美元;失业人数增加到1 200万,即约1/4的人口无法继续养活自己;农场收入减少了一大半;制造业产出也几乎减少了一半多的生产。<sup>1</sup>

美国从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变成一个成千上万人生活在贫困失望的境地之中的国家,其中尤以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为甚。黑人在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比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高出的部分由60%增加到400%。<sup>2</sup>其中某些地区又比其他地区情况更严重。阿拉巴马州的议员乔治·哈得逊在1932年1月的报告中写道:

我所在的地区,共有108 000个工人,我相信现在只有不足8 000人拥有正常收入。至少有25 000人没有工作。他们有些已超过12个月找不到工作,可能有60 000或75 000人每周工作1~5天,而事实上所有人的工资都被严重削减,很多人平均每天的工资不足1.5美元。<sup>3</sup>

许多城市汇报说他们的救济金仅够发放很短的时间,通常是一周。纽约市的福利委员会的主席这样描述了失业者的困境:

当养家糊口的人失去工作时通常最先会用光他们的积蓄,然后会借光他们的失业保险。继而向亲友借钱直到他们不能负担。接着他向街边的商店和肉店赊账,在这些店主要缴纳税金和租金时他们会被要求还钱。过一段时间当这些方法都用尽时,这些人不得不请求救援。

上百万人要面对饥饿的恐惧,他们从未考虑过失业是怎样的遭遇且当失业降临时将要如何面对。<sup>4</sup>

1932年一份描述芝加哥垃圾场的报告中,这些可怜的人被描写道:“每辆未卸载的垃圾车旁以及其他垃圾旁均围着35个人,当这些垃圾倾倒下来后这些人会用木棍,有些人甚至会用手开始翻拨垃圾,搜索着任何一点食物和蔬菜的残渣。”<sup>5</sup>

是什么使商品和服务的生产骤然下降呢?自然资源仍如以前一样丰富,国家仍拥有那么多的工厂、工具和机器,人民仍有同等的技术并希望能参加工作。然而成千上万的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在乞讨、借债、偷窃,在慈善机构门前排起了长队,同时,许多工厂要么闲置着,要么以远低于实际生产能力的水平生产。这在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制度中可找到解释:工人原本可以开工,而且也能有工作,但由于商人这样做不能赚取利润,使得这一切都无法实现。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决定生产的主要因素是利润而并非是人

的需求。

在这种悲惨的情境中,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并非全部)清楚认识到市场自我调节的神话只在其理论体系中发挥作用,不受调节的无政府主义市场对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有学派的众多经济学家明显认识到只有政府能在一定范围内对经济施加强硬的政策。

强调市场自主性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的弊病无药方可下,那是因为在新古典理论中根本不存在经济衰退,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对其进行修正。但是新古典理论若要在这场危机中起点作用以继续发展他们苦心经营的理论的话,该理论则要做出极大的修改。为完成这一历史任务,20世纪最卓越的一位保守主义经济学家应运而生,他就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在他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里,凯恩斯试图说明资本主义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并据此提出了能够维持资本主义体系的措施。

为理解经济大萧条,凯恩斯可能考察了包括以马尔萨斯和马克思为代表的几乎所有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的经济学家的著作。虽然凯恩斯的著作中多次提到马克思,但在他的所有作品中并未发现有他读过马克思作品的线索。凯恩斯清楚地知道马克思和马尔萨斯各自的阶级立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科学理论并没吸引凯恩斯的兴趣,对凯恩斯来说仅将它视为一种社会现象。

凯恩斯没有利用马克思主义,从他对于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所呼吁的每一个教义都表现出憎恶的情绪可以看出来:

我认为没有任何经济的发展是以革命为必要手段的,另一方面,暴力使我们失去了一切。在西方工业社会里,采取解放革命的策略会将所有人民推向贫困与死亡的深渊。<sup>6</sup>

并且,他坚信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不平衡的意图在于推翻资本主义。

马尔萨斯针对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也提出了一个理论,并且和马克思相比他是一个更安全的经济学家。提到马尔萨斯的理论,就必然要提到他的“社会分为资产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以及由追求利益为本质原因而构建的大工业体系”。<sup>7</sup>虽然凯恩斯没有明确赞同马尔萨斯的理论,但这种对资本主义存在的必然性的信仰却帮助了他:

以我而论,我相信,存在着社会上和心理上的理由来认为:相当大的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是合理的,但不平等的程度应该比目前存在的差距要小。有价值的人类活动的一部分需要赚钱的动机和私有财产的环境才能取得全部效果。不仅如此,通过赚钱和私有财产的存在,人类危险的癖好可以被疏导到比较无害的渠道之中。<sup>8</sup>

令人惊异的是,凯恩斯认为:“如果19世纪的经济学家以马尔萨斯而并非是李嘉图的理论作为源头的话,今天的世界将会是一个更理性和富足的世界!”<sup>9</sup>

## 凯恩斯分析的理论框架

凯恩斯的理论是建立在与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相同的概念架构上的。该理论分析了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连续过程。在一个给定的生产周期,一个企业生产一定货币量的产品。在出售这些产品时公司会支付这批产品的生产成本,包括工资、薪水、租金、供应品和原材料及借款的利息。支付这些后剩下的是利润。

需要记住的重要一点是:一家营利性企业的生产成本也代表着个人或另一家企业的收入。而且利润也是一项收入——属于企业所有者的收入。因为产品的价值由生产成本和利润构成,而后两者都是收入,所以生产出的价值应等于由生产引起的收入。

从整个经济层面上看,其加总的情况与单个企业相同:在一定时期中,经济中生产的所有产品的价值等于同期获得的总收入。因此,商家若要售出全部产品,人们就要消费掉所有收入。如果在商品和服务上的花费等于社会总收入,那么产品的价值就是在销售中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利润很高,商人会愿意在下一时期生产等量或更多的产品。

这一过程可以看作是一个循环的过程:货币以工资、租金、利息和利润的形式从企业流入社会;当社会大众购买商品、消费劳务时,这些钱又流回企业。只要企业卖出他们所生产的产品并获得满意的利润,这一过程就会维持下去。

但上述过程并不是自动发生的。当这些货币由企业流向公众后,有一部分并没有直接流回企业,现金循环产生漏出。因为,从一开始人们就不会消费所有收入,而通常是把收入的一部分退出消费流转而存在银行里。此外还有两种漏出途径:人民购买国外的商品和服务,因此这部分收入花费在进口品而非本国商品上;同时人们缴纳的税金也是从消费流中漏出的。

这三种漏出(储蓄、进口和税收)会被三种注入收入——消费流中的支出所抵消。第一,进口会被出口所抵消。当外国人在美国购买的商品与服务价值等于美国从国外进口时,进出口就完全抵消。第二,政府用税收对购买商品与服务进行补助。当政府将所有税收用于此目的并使预算平衡时,则政府支出将在消费流中冲抵税收。第三,当商人欲增加其资本时,他们可以借出储蓄形成的资本来投资于资本品,此时,投资会冲抵储蓄。

如果进入收入——消费流中的这三种注入等于三种漏出时,支出会等于产值。假定所有相关价格的结构能反映出对不同行业产品的需求,以至每个行业中的供求相等,那么所有生产出的产品都可以售出,经济就会达到繁荣。

这是正统的新古典主义对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正常运行的看法。总就业和总支出的水平由生产函数和生产要素所有者的自由决策来决定。正如在第11章中我们所看到的,在短期内,假定存在一定量的资本,总就业和总支出由边际劳动产品决定。假定劳动需求

给定,新古典理论可运用劳动供给来解释工资率和总产出量。借助图 15.1 分析,其中 VMP 代表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S 是劳动供给。

在图 15.1 中,如果有 100 个人愿意工作,那么他们必须接受每人 2 美元的工资(这由其边际产品价值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工资总额是 200 美元,此外有 50 美元是利润(第 11 章中对此作了解释),此例中的总产品价值 250 美元。现在若有 125 个工人都愿意工作,那么劳动的边际产品的价值会降到 1.75 美元。由于更多的人想找到工作,工资率也会随之下降。如果那 125 个工人都被雇佣了,工资总额将是 218.75 美元( $125 \times 1.75$  美元),总利润是 78.12 美元,则总产出是 296.87 美元。因此,新古典主义认为,在短期中,给定生产函数和由此决定的劳动需求曲线(按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支付工资),劳动供给将决定工资率和总产出水平(亦决定了总工资和总利润)。这是 20 世纪 30 年代最正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对产出和就业水平的标准分析。

若这种分析中存在失业,也是因为工人不愿工作,除非他们得到高于其边际产品价值的工资。例如,在图 15.1 中,若工资率是 2 美元,仅有 100 个工人被雇佣,若 125 个工人想工作,他们就要接受 1.75 美元的工资率。若他们愿意接受,则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家会保证 125 个工人均被雇佣。若工人拒绝工资削减,25 个工人就会继续失业,新古典经济学家定义这些工人为自愿失业者,并坚持就业仍是充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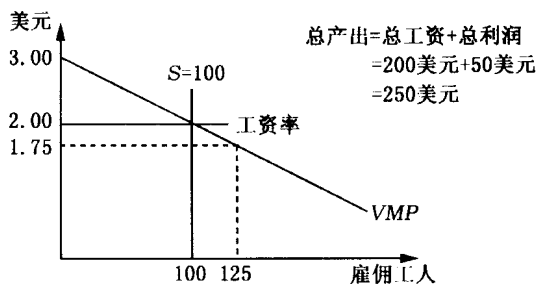


图 15.1 新古典主义的工资率和总产出决定论

只有工人在其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时愿意工作却没有找到工作时,新古典经济学家才承认非自愿失业的存在。但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会在工资等于边际产品价值时雇佣所有的工人,因此,新古典主义者总结说利润最大化保证了无自愿失业。经济中存在失业,也只能是因为,由于大量工人被雇佣导致劳动的边际产品的价值降低,而工人们拒绝接受为了和该价值相等而必须减少了的工资。

若工人愿意接受与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相等的工资,则总供给通常会等于总需求。所有收入一般也都会被消费掉。另外收入—消费流中的三种注入也会等于消费的三种漏出。这是因为:(1)新古典理论表明供求的自由变动将平衡国际交易的收支;(2)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和大多数政治家看来,适度的财政政策能指导政府在支出与税收间保持平

衡;(3)利率经常会使储蓄与投资相等。

最后一点要指出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与凯恩斯理论的关键分歧,因此我们将详细阐释新古典理论的观点。在这种观点里,比起未来消费,人们总是更偏好当期消费(参见第11章),因此只有在能得到回报时人们才会去储蓄,利息便是他们从储蓄中得到的回报。利息越高,他们的储蓄越多;反之,利息越低,储蓄也越少。投资建新工厂和设备或其他资本品的人要为投入的资金进行支付,而支付量是由利率决定的(若用他们自己的钱投资,利息将衡量他们由于投资而放弃放贷所造成的收入的损失)。利率越低,使用资金成本越低从而投资越多。图15.2显示了利率与储蓄、利率与投资之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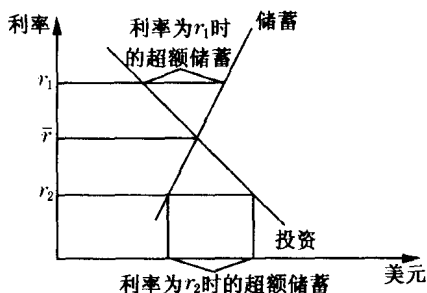


图 15.2 利息、储蓄和投资

图 15.2 中,若  $r_1$  是当前利率,则储蓄大于投资,储户找不到足够的投资者来吸收他们所有的储蓄,他们将会争相寻找投资者使得利率降至  $\bar{r}$ 。若  $r_2$  是当前利率,则投资者找不到足够的储蓄来满足投资,他们将竞相寻找可获得资金使得利率提高至  $\bar{r}$ ,在  $\bar{r}$  点,储蓄等于投资。

因此,在新古典理论中,竞争会自动在储蓄等于投资时创造平衡的利率。这也意味着收入—消费流中的三种注入会自动与三种漏出相等,则总需求也会自动等于总供给。

几乎所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都认为非自愿失业存在的惟一可接受的理由是工资下降足够多时有部分人拒绝工作。因此,在大萧条时期,当政府向新古典经济学家咨询对付萧条的有效措施时,即使是那些最仁慈的同情工人苦境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能提供的建议也只是大规模地削减工资。<sup>10</sup>

### 凯恩斯对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的辩护

凯恩斯基本上赞同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在充分就业的工资水平下总供给总是等于总需求这一点,凯恩斯基本认同新古典理论的其他

所有理论)。他的著作《通论》一开始就陈述到新古典的“就业理论”是建立在“两个基本假定”的基础上的,第一个假定是“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出”。<sup>11</sup>在陈述他不赞同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时,凯恩斯很谨慎地安慰读者,说他赞成新古典主义的第一个假定——劳动者获得与其边际产出相等的报酬:

在着重指出我们与古典理论体系的分歧时,我们不应忽视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因为,正同过去一样,我们将维持第一个假设前提,仅使他受到和在古典理论中相同的限制条件。我们必须在此稍停一下,来考虑这一做法所牵涉到的是什么。

它意味着:在既定的组织结构、设备和技术的条件下,实际工资和产出数量(从而和就业量)是惟一相关的,因此,一般说来,只有在实际工资率下降时,就业量才会伴随着实际工资的下降而增加。<sup>12</sup>

可以看出,凯恩斯的就业理论似乎与同时期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相同,且其对提高就业的建议也与他们一样是通过削减工资来增加利润。这种观点真伪难辨。凯恩斯陷入了逻辑矛盾中。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一样,凯恩斯认为要提高就业,就应削减工资,同时提高利润(当时许多知识贫乏的保守派认为凯恩斯是激进主义分子)。如果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激励资本家在工资等于边际产出时雇佣所有愿意工作的人(正如凯恩斯和所有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认同的一样),那么,削减工人的实际工资是对存在失业的惟一解释。凯恩斯在试图赞同新古典主义者的同时又否定了他们。

他以一种最难以置信的方式论证了这一点,他提出有两种方法可以降低实际工资。第一种是当用工资购买的商品价格保持不变或稍许下降时,工资的货币价值因此而降低(此方式是多数新古典经济学家推荐的)。第二种是用工资购买的商品价格升高,同时,工资的货币价值保持不变或稍许升高。凯恩斯指出工人不会愿意接受第一种降低实际工资的方法,对于第二种方法却可以或多或少地平静接受。<sup>13</sup>

这个理论无法令人信服,因为在工资谈判中,工人通常像关注工资一样也在关注他们生活费用的情况。当工人占据有利的谈判位置时,他们通常坚持工资应随着他们生活费用的上涨而同比例上涨。况且,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处于困顿的状况下,仍有成千上万名工人在积极地寻找工资合适的工作。

如果在大萧条开始前的1929年被雇佣的工人得到的报酬等于其边际产品价值,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既有实物资本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就业量的大幅下降应该导致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大幅上涨,这是符合凯恩斯所认同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的逻辑的。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实际工资并未上升,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工资是下降的。按照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的逻辑,可以得出工人获得的实际工资实质上是小于其边际生产力的这一结论。并且,成千上万的工人想得到现有工资水平的工作却未能如愿。

## 凯恩斯对资本主义经济萧条的分析

在《通论》的剩余部分,凯恩斯坚持认为在大萧条时期实物资本的生产能力利用率是急剧下降的,并且受雇工人的数量也是急剧下降的。凯恩斯在他的理论中以其富有洞察力和条理清晰的风格描述了大萧条时期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但大萧条时期的另一个明显事实是当雇佣工人数量减少时工人的实际工资并未上升,因此凯恩斯坚持的边际生产率理论与他其余的理论产生了矛盾。

正如本书中我们经常指出的,伟大的思想家(凯恩斯算得上是第一流的逻辑大师了)理论中的逻辑矛盾帮助我们深刻地洞察思想家的逻辑倾向。凯恩斯想用具有理论性的真知灼见来武装资本主义政府,但是他这样做必然得放弃新古典理论中的一些基本原理。但是,另一方面,又如我们所见,他想尽可能地保留新古典理论,所以他坚持认同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和自由市场可有效配置资源的理论(一旦达到充分就业时),尽管这两个理论的逻辑都是建立在对自由市场可自动创造充分就业的信仰上,即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即使也有许多理论家拥有像凯恩斯那般非凡的逻辑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往往最终会被思想意识形态战胜。

凯恩斯反对这样一种说法,即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拥有充分就业的前提下,利率会自动调整使得储蓄和投资相等,进而使总供给等于总需求。他与包含新古典的自动调节理论的学说有两大分歧点:第一,虽然他认同新古典理论的储蓄受到利率的影响,但他认为比起利率来,总收入水平对储蓄具有更大的影响力。第二,他不认为储蓄和投资能够决定利率。利率是货币供求平衡时的货币价格——这远远不同于(虽然不是完全不相关)储蓄和投资所决定的利率。

这的确是十分重要的分歧,虽然凯恩斯只想达到第一个效果(推翻对市场自动调节理论的信仰),同时完整保留另外两个理论,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它们不仅破坏了新古典的市场自动调节理论,而且推翻了新古典思想体系的两大支柱,即边际生产率分配理论和自由竞争的市场将在帕累托最优条件下配置资源。

凯恩斯与新古典的储蓄理论的分歧引出了一个重要的原理——即凯恩斯所谓的“消费函数”。他认为消费和储蓄都是“收入的函数”,也就是说,消费和储蓄主要由收入水平决定。他承认“利率的实质变动的确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sup>14</sup> 储蓄,但这种影响比之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却小得多:

人们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水平的费用通常首先从他们的收入中扣除掉,然后,他们会把生活水平的费用 and 实际收入之间的差额储蓄起来……较高的绝对量的收入水平显然也会扩大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差距。其原因在于:满足人们及其家庭的现行的基本生活需要通

常要比积累具有较强的动机。只有在达到一定的舒适程度以后,积累的动机才会转变为较强。由于这些原因,当实际收入增加时,人们通常会储蓄其收入中的较大的比例。<sup>15</sup>

消费函数描述了收入水平与储蓄和消费的关系。收入变动与由之引起的储蓄变动之间的关系(或储蓄的变动与收入变动的比率)被定义为“边际储蓄倾向”。收入变动与由之引起的消费变动(或消费的变动与收入变动的比率)被定义为“边际消费倾向”。无论是边际消费倾向还是边际储蓄倾向,其基本决定因素都不是利率。

凯恩斯与新古典的市场自动调节理论的第二个分歧点是他否定新古典的利率决定论。

消费倾向……决定每个人把其收入的多大部分用之于消费,又把其收入的多大部分以某种支配权形式加以保存,以备将来的消费之用。

一旦做出这个决策,他还必须做出另一个决策,即他以何种形式来持有对将来的消费的支配权。……他是否准备把将来消费以具有瞬息流动性的支配权的方式(即货币或类似货币的东西)加以保持?或者,他是否准备在一定的期限和非固定的期间内放弃这个支配权的瞬息流动性……换言之,他的流动性偏好的程度有多大?在这里,一个人的流动性偏好是用此人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愿意以货币形式加以保存的其资产的价值……

显然应该看到,利息率不可能是储蓄的报酬或被称之为等待的报酬。因为,如果一个人把他的储蓄以现款的形式贮藏起来,虽然他的储蓄量和不以此方式保存的储蓄量完全相同,他却赚取不到任何利息。恰恰相反,仅利息率的定义本身就能告诉我们,利息率是在一个特定期间内放弃流动性的报酬。因为,利息率不过是一笔钱去除它的报酬而得到的比例,其中的报酬系来自在规定的时间内放弃对这笔钱的控制来换取相应的债权这一事实。

由此可见,由于利息率是放弃流动性的报酬,所以在任何时期的利息率都能衡量持有货币的人不愿意放弃流动性的程度。利息率并不是能使对投资资金的需求量和自愿放弃目前的消费量趋于均衡的“价格”,而是能使以现金形式持有财富的愿望和现有的现金数量相平衡的“价格”……假使这种解释是正确的,那么货币数量便是另一个因素来和流动性偏好在一起决定在既定条件下的利息率的高低。<sup>16</sup>

因此利率是由货币的供求决定的。在任意给定时期内,中央银行或货币管理机构总将货币供应量维持在一个固定水平上。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对货币的需求量——同流动性偏好一样——由以下三种动机决定:

(1)交易动机,即由个人或业务上的交易而引起的对现金的需要;(2)谨慎动机,即为了安全起见,把全部资产一部分以现金的形式保存起来;(3)投机动机,即相信自己比一般人对将来的行情具有较精确的估计并企图从中谋利。<sup>17</sup>



由投机动机引起的那部分货币需求是与利率相关的。为理解这种关系,我们必须理解债券(或是股票,或任何需支付利息的债务证明)的价格是怎样反映利率的。如果我们购买了一份承诺一年后支付给我们1 000美元的债券,利率是3%,那么这份债券的现值是970美元(那额外的30美元是我们一年后会赚取的利息)。然而若该债券在我们购买后的第二天利率上升至6%,那么这份价值1 000美元的债券现值为940美元(额外的60美元是我们在6%的利率水平下赚取的利息)。显然若此时我们被迫要卖掉债券,我们将蒙受损失。况且,即使我们没有像预期中的被迫卖掉债券,我们也期望利率上升至6%。因此我们最好在利率为3%时不购买债券。如果我们持有现金并等待利率上升,那么(若我们对利率变化的预期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可以以940美元而不是970美元购买债券。将额外的30美元用来购买其他债券的话,我们会赚得更多利息。

因此,在凯恩斯看来,货币需求中有一部分是取决于我们对未来利率变化的预期。当利率非常高(与以前利率相比)时,很少有人会预期利率在未来会升至更高,因此,极少有人会会为投机而持有货币。相反,当利率很低时,很多人相信利率会上升,结果,那些预期未来利率会上升的人将为投机目的而持有货币。这样,由投机动机引起的货币需求量会随着利率的下降(上升)而减少(增加)。

图15.3反映了凯恩斯的利率理论即利率与储蓄和投资的关系。这可以与图15.2显示的正统的新古典理论进行比较。在图中的(a)部分,货币需求部分地反映了投机动机,由此它随利率的上升而下降。在最初的货币供给下(由货币管理局决定) $r_1$ 是货币供求平衡下的利率水平。但是在 $r_1$ 时储蓄大于投资,如图中(b)部分所显示。如果这种状态一直持续,总需求将小于总供给,所有的产出将不能全部售出。当企业不能卖出其全部产品时,会发现未售出货物的库存增加。每个企业都只能看到自身的问题:产出的数量多于可出售的数量,因此会削减下个时期的生产。大多数企业在此类情形下都会采取同样的行动。结果是生产骤减,就业和工资均下降。但是,收入下降后,下一时期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消费也会减少。因此企业发现即使在低水平下生产,他们仍不能售出所有产品。于是他们再次削减产出,整个经济就这样不断地螺旋向下。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没有多大动力去扩大生产(因为生产能力已经过剩),因此,投资骤减。各种类型的消费也骤然下落。随着收入的下降,储蓄更大比例地下降。这个过程要一直持续到由收入降低引起的储蓄下降到大于降低了的投资水平为止。在这种低工资水平下,经济再次达到均衡。收入—消费流的漏出再次等于注入。经济达到稳定状态,可此时失业率很高并有相当大的生产能力被闲置。

但正如图15.3所表明的,这个问题可以很容易得到修正。货币当局可以提高货币供给使 $\bar{r}$ 成为当前利率(见图15.3)。在这个利率水平下,储蓄等于投资。

总供给等于总需求,经济不存在问题。在凯恩斯看来,货币政策在某些情况下足以保持充分就业(降低或增加货币供给),但仍有一些情况下货币政策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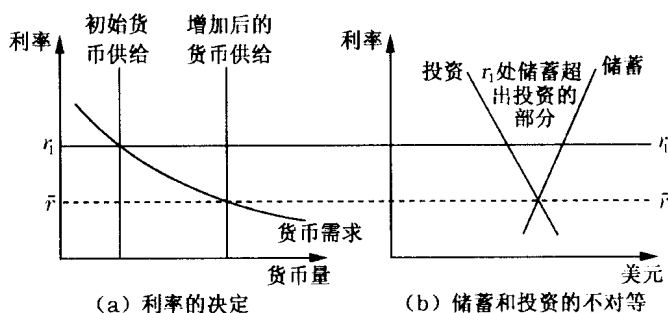


图 15.3 利率的决定及储蓄与投资的不对等

恩斯对后者更感兴趣,因为他相信这些是使资本主义经济持续发生萧条所需的实际条件的非常现实的特点。

此类情况的第一种情形通常是在收入分配极度不平衡(收入较多的富裕阶层的储蓄远远多于工人,从而造成储蓄上涨),并且充分就业条件下的产出和收入高到无论利率降低到何种程度,储蓄和投资均不能相等的时候发生。图 15.4 明白地显示了这种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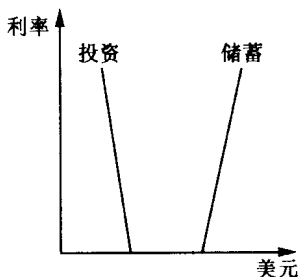


图 15.4 利率不能使充分就业水平下储蓄与投资相等的情形

但凯恩斯认为并不是非要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异达到十分巨大的程度,货币政策才会无力阻止经济发生灾难性的大萧条;有可能在使储蓄与投资相等的利率十分低时,货币政策就已经无法有效的降低利率了。当货币当局将利率降到十分低的程度,以至于每个人都认为利率在未来会大幅上升时,即使货币当局在经济中注入大量现金,人们还是会更愿意持币而不是购买证券:

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货币数量即使大量增加也只能对利息率施加相对微小的影响。……对将来利息率的看法可以达到非常一致的程度,以至现行利息率的微小变化可以使大批的人转向于持有现金。<sup>18</sup>

图 15.5 显示了此种情况。可以看到当利率接近于某一最低点时,货币需求曲线渐趋

平缓,表明即使货币供给大大增加,大部分增加的货币也将被私人持有。在图 15.5 中,货币供给的大幅增加只引起利率的微小降低并且储蓄仍大于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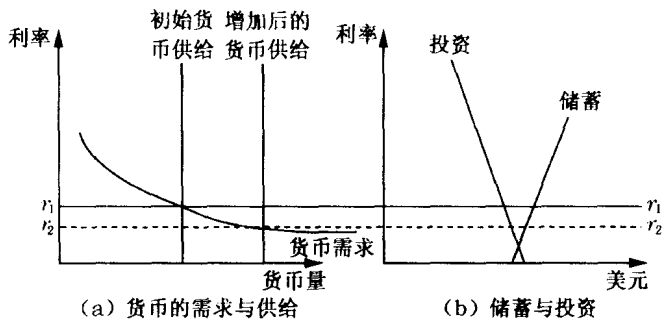


图 15.5 货币政策不能使充分就业水平下储蓄与投资相等的情形

无论是图 15.4 还是图 15.5 所显示的情况均表明,自由竞争的市场会导致经济发生大萧条;此时货币政策也无力阻止发生这样的社会灾难。显然,我们需要一种更根本、更有力的手段。

从本质上讲,凯恩斯的理论与马克思(见第 9 章)和霍布森(见第 13 章)的观点没有太大区别。这三位思想家都认为:造成经济大萧条的最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难以寻找到足够的投资机会来消化经济增长带来的大量储蓄。凯恩斯的独特贡献是指出了在大范围的失业的状况下,储蓄是通过怎样的关系使收入能保持在一个稳定但十分低的水平。

马克思认为这种大萧条的诟病是无药可救的,霍布森开出的药方是公平分配收入从而降低储蓄。霍布森的药方有用吗?这个问题可能无多大意义。在大部分资本主义工业国里,财富和经济权力决定了政治权力,那些掌握这些权力的人决不会愿意牺牲手中的权力来挽救整个经济体系。

以 1925 年的美国为例,300 000 家非金融性公司中,最大的 200 家所创造的利润远远超过剩下的 299 800 家的利润总和。总人口中最富有的 5% 的人拥有了几乎所有的股票和债券,赚得的收入超过了剩余人口的 30%。毋庸置疑,这 5% 的人掌控着美国的政治权力。在这种情形下,那些对收入和财富彻底重新分配后的情景所进行的猜测只不过是一场白日梦而已。凯恩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更加现实了。当储蓄大于投资时,政府会出面借出多余的储蓄然后投入到对社会有益的工程中,而这在将来并不会提高经济的生产能力或减少投资机会。政府的这种消费会增加对支出的注入并且创造出充分就业下的经济均衡。同时还不会增加资本库存,因此不同于投资支出,政府支出能够使在下一时期达到充分就业下的生产水平也不会那么困难。因此,凯恩斯这样总结他的观点:

古代的埃及具有双重的幸运,而其神话般的财富毋庸置疑地来源于此,因为它进行了两种活动,即建造金字塔和探索贵金属,而由于这两种活动的果实能不被消费掉的方式

来满足人们的需要,所以它们不会由于数量充沛而降低效用。中世纪则造教堂和做道场。对于死者而言,两座金字塔、两次道场带来的好处要两倍于一座金字塔和一次道场。<sup>19</sup>

政府应做出何种类型的消费呢?凯恩斯本人偏向于建设有用的公共设施,如学校、医院、公园等公共便利设施。但是,他意识到这样做会使中低层收入者得到比富有阶层更大的利益。而富有阶层掌握着政治权力,因而他们会坚持使收入不被重新分配,从而保全自己的财富。为调和上述矛盾,凯恩斯认为政府应将这种支出交由大公司运作,即使这样做对社会产生的直接利益极其微小。

如果财政部把用过的瓶子塞满钞票,而把塞满钞票的瓶子放在一个开采过的矿井中,然后,用城市垃圾把矿井填平,并且听任私有企业根据自由放任的原则把钞票再挖出来……失业问题便不会存在……确实,建造房屋或类似的东西会是更加有意义的方法,但如果这样做会遇到政治和实际上的困难,那么,上面说的方法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sup>20</sup>

### 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效验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从1936(该年《通论》出版)~1940年,经济学家们一直热烈讨论着凯恩斯理论的价值和该理论的政策时效性。当各国政府开始飞速扩大军备生产时,失业问题开始消融。在战争期间,在大量的政府支出刺激下,许多资本主义经济迅速由严重的失业状况转向劳动力的极度缺乏状态。

美国的军备力量动员了1400万人,他们必须参军,政府为他们提供吃住。1939~1944年间,制造业、采矿业和建筑业的产出翻了一番,生产能力增加了50%。美国生产了296000架飞机、5400艘货船、6500艘军舰、64500艘陆舰、86000辆坦克、2500000辆卡车以及大量的其他军备和战略物品<sup>21</sup>。1939年间,近乎20%的劳动人口处于失业状态。持续不断的严重失业状况延续了整整十年。随着战争的爆发,这一问题在一瞬间几乎反了过来,美国经济遭遇了严重的劳动力大量短缺的情况。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次战争经验验证了凯恩斯的理论。他们宣称资本主义可以通过政府明智地利用权力去征税、借债、消费来加以挽救。资本主义重新被认为是一种可行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公众信心也重新恢复。

1945年后,大部分的政治家联合经济学家共同鼓吹将凯恩斯主义正统化。1946年,国会通过了就业法案,该法案赋予政府法律意义上的责任去运用其税收、借款、支出的权力以维持充分就业,一时间乐观主义占据上风。在这样一个萧条将会消失而繁荣成为常态的凯恩斯主义新时代,许多会议的召开都是为了讨论“社会优先权”和“国家目标”,并以此来指导政府政策。

毫无疑问,战时大量的政府支出将美国经济从数十年的停滞与萧条中拉了出来。然而奉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们的乐观态度被证明有失公正性。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发生的萧条比起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轻缓多了(由此产生了“衰退”这个现代的委婉的词,该词取代了许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词典中的“萧条”一词)。在1948~1949年间,发生了一次持续11个月的衰退;1953~1954年间的衰退则持续了13个月;1957~1958年,衰退只有几个月;1960~1961年又有9个月的衰退期。虽然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争进一步刺激了美国经济,但是到60年代末,旧的经济模式再次建立。1969~1971年间的衰退持续了将近2年。1973年~80年代初,一场新的更剧烈更混乱的灾难袭击了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期间,美国经济(还有几乎所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严重的衰退(伴随着失业,据美国政府统计,失业率由6%上升至接近10%)和严重的通货膨胀(美国平均价格水平每年上升5%~11%——食物、房屋、医疗及其他工人阶级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甚至以更快的速度上升)。许多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甚至更糟。

1981~1982年间的衰退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此后,在80年代的剩余时间里通货膨胀率逐渐下降并且经济条件得到改善。1990~1991年间的衰退持续了8个月,随后也经历了温和而长期的扩张。

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和东欧的发展被广泛认为是冷战结束的代表,军备开支似乎应该降低。然而军备开支仍保持相当高的水平,“流氓国家”和“恐怖主义组织”取代苏联成为庞大军事开支的原因。

尽管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失业率仍未达到大萧条时的水平(据官方数据显示,大萧条时期的失业率达到20%~25%,但若使用更现实的对失业的定义和收集的统计数据,失业率可能接近于30%~35%)。50年代和60年代的平均失业率是4.6%。在越南战争的刺激下,60年代中期失业率下降到3.5%。整个70、80年代,失业率在5%~10%之间变动。仅在1990~1991年间的衰退过后不久,失业率就达到7.9%的最高点,随后又平稳下降至90年代末的3.9%。2000年末到2001年期间,随着新的衰退降临,失业率再次上升。

比起许多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在其20世纪40年代的著作中对资本主义所持乐观态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记录并未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停滞和资本主义体系几近崩溃,可以说近六十年的时间里凯恩斯的经济政策运行得还算良好。不过有时正如看病一样,一种全新的之前未经检验的治疗方法会有副作用,并且这种副作用可能与最初得的病一样严重。当我们看到国民生产总值和就业资料表面下的实质时,会发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只是采取两种新的形式来缓解仅以一种形式出现的资本主义危机,这两种新形式分别是一个持续的战时经济的结构转变和一个不稳定的债务结构,而构建在此基础上的整个经济比起20世纪30年代更易发生流行性

的严重崩溃。发生在1989~1991年的债务危机只是这种脆弱的债务结构所隐含的巨大问题的一个小迹象。同时，“冷战结束”的假设并未改变经济对军备支出的依赖。

## 军事经济

从1947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的军备支出接近2万亿美元(如此巨大的数字在头脑中很难形成一个准确的概念:这数字代表了2000个100万美元)<sup>22</sup>。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战争支出和为潜在的战争所准备的战争总支出及相关总支出从1947年每年的279亿美元增长到1971年每年的1123亿美元。<sup>23</sup>这些数字分别代表了1947年和1971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2.2%和11.1%。若考虑到这种军备支出对未来总需求所产生的“乘数”效应,对经济的影响将更大。更细致地研究这种效应会产生两种上、下限的估计。保守的估计表明,1947年直接和间接的(通过引致效应和乘数效应)军备支出分别占1947年和1971年需求总额的24.4%和22.2%。用上限估计,上面两个数据分别是30.5%和27.8%。<sup>24</sup>这期间仅有几年的数据稍微低一点,而一些年份的数据则非常高。20世纪70年代军备支出以相对较低的速度增长,但到了80年代就开始扩大。70年代的后期许多经济学家预测会有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将要到来。的确,1981~1982年间的经济衰退是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不过它并未如预测中的那般严重。而这随后的几年经济出现繁荣,而人们无须太费力就能找到这场经济繁荣的原因。1980~1987年间,美国的军备支出增加了一倍多。1980年的国防支出仅有1340亿美元,1983年攀升到2100亿美元。仅1982年,美国就建造了两艘核能的航空母舰、两艘核动力的进攻型潜水艇和五艘战舰;购进了F-15战斗机,制造了B-1B隐形轰炸机和MX导弹,而仅这几项就创造了约30万个新就业岗位。通用动力公司(General Dynamics)雇佣了7000个新工人为建造M1坦克工程工作。罗克韦尔国际公司(Rockwell International)增加了4000名雇员建造B-1B轰炸机。勃姆(Boeing)、洛克希德(Lockheed)、雷神(Raytheon)、麦克道尔·道格拉斯(McDonnell Douglas)、联合技术(United Technologies)和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等公司都大量增雇劳动力生产新的军用装备。1981~1985年间,美国国防部增加了255000个雇员。<sup>25</sup>毫无疑问,80年代的繁荣主要是因为军备开支的大幅增长。布什总统在1991财政年的财政预算中就包括了直接用于国防的3030亿美元和用于“国际事务”、“科学、太空和技术”及“增加老兵福利”的650亿美元,这几种支出大部分都是变相的军备支出。在这个十年里,国防支出仍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1990~2000年平均每年支出2800亿美元,并且随着乔治·W. 布什提出新的“反恐战争”计划,军事支出几乎注定要攀升到更高的水平。

此外,军事支出的变化与资本主义周期性的波动之间有着显著的关联性。<sup>26</sup>军国主义

(militarism)似乎总与资本主义共生,这类似于金字塔与埃及、大教堂与中世纪。

这种军事主义是对国际事务危机的必要反应,还是军备支出具有自己的特征使得它成为政府支出十分有效和必需的形式呢?要全面地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对“冷战”必然消亡这一命题加以进一步讨论——而这个内容不是本书要讨论的内容,在此不加赘述。但是越来越多的历史文献收集了相当可观的证据表明冷战是美国政治家、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控制下的新闻媒体共同策划的一场蓄意的带有欺诈性的创举。<sup>27</sup>如果这个观点正确的话,那么冷战一定会复活,或者一定会发现一个合适的替代品)。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就是美国再一次扮演国际警察角色的范例,也是我们新的冷战。在对美国军备支出进行研究时,无论研究者对冷战的实质持何种立场,都会发现这样两个事实:第一,军备支出为资本家提供了几乎所有其他的政府支出形式所不能提供的独特、显著的(好处);第二,军备支出已经如此完全地植根于美国的经济结构中,以至于越来越难以想象,若没有整个美国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完全重构,如何能够取消它。

军备支出给大公司提供了无尽的好处,例如:(1)在不把收入从富人那里重新分配到穷人的前提下军备支出刺激了总需求的增加;(2)武器构造再精巧都不为过,政府财政一直支持更新改进武器的研究,并且恐怖事件使公众相信持续上升的军备竞赛对于生存是绝对必要的;(3)资本主义经济中最易变、最不稳定的部分——资本品工业受军用品生产的影响一直保持在接近生产能力的水平上运行,但这并未增加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能力,结果,军备支出长期以来造成的生产能力问题并没有恶化;(4)由于所有的军用品生产事实上均由大型和私人企业来完成,或由大公司转包给私人小公司,因此不与私人创造利润产生竞争。相反,由于给予了公司不受市场变化影响的稳定的需求核心,从而降低了自由市场的混乱状态;(5)虽然无法获得精确的数据,但大多数证据表明军用品的生产比起自由市场的生产更有利可图;(6)正如罗莎·卢森堡指出的,大量军备对于维持和扩大资本主义国家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范围”是必要的,由此可以保证有利的外国投资和贸易条件;(7)正如凡勃伦指出的,强硬的外交政策、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也许是最有效的方法,该方法可以使工人顺从,并在工人中推行这样一种看法,即工人的利益与资本主义的利益是一致的。

但是,军事工业联合体的发展,可以反映出我们为军备所付出的代价,这已成为嵌生于美国工业结构的“心脏”上的无法根治的“肿瘤”。

许多美国最大的、实力最强的公司对军用品合同的依赖性十分强。同等重要的是大量城市、地区,甚至整个州在经济上都十分依赖这些大公司或大量的军事基地来支撑其地方经济,并且借此在持续的高失业困境下保持就业率。军用品产出的大幅下降或军事基地数量、规模的缩减均会在经济上对整个国家造成损害。因此,最轻微的削减军备支出的暗示都会引起军队领袖、大公司、政治家和工会最强烈的抗议。

1989~1990年间,冷战的结束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因为大多数东欧经济体包括苏

联均实行了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使得借口对共产主义的厌恶而进行大量的军事支出变得十分困难了。然而,军事支出的削减仍受到内部力量的强有力的抵制。如果军备支出明显削减,美国经济将面临停滞和萧条的局面。因此,似乎很大程度上在美国尚未找到“共产主义威胁”的替代品前是不会允许冷战太过“冷却”的。伊拉克、阿富汗或其他任何非工业化国家将永远不能以其自身取代苏联成为美国新的敌人,因为它们都是可以摧毁的。因此,为了给军备支出提供合理的借口,要寻找新敌人的问题会变得更难解决。

## 债务经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的适度改善很大部分是建立在大量的、持续增加的债务上的。凯恩斯已经指出,为刺激总需求靠借债来融资的政府支出比靠税收支持的政府支出更有效(税收将一部分可用于他处的资金转移到政府,而政府支出的一部分则是由私人支出的减少来抵消的)。大量政府支出的增长是靠增加政府债务(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各有不同的负债水平)来实现的。另外,在大萧条前消费者负债水平很低(20世纪20年代末大约占消费者可自由支配收入的8.5%),资本家发现通过大量的广告宣传活动和扩大消费者信贷,会有效刺激消费者需求。到1974年,消费者负债上涨到约占可支配收入的17%。如果计算时将抵押贷款包括进来,那么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由1955年的65%上升到1974年的93%。

为满足政府和消费者这种不断上涨的借贷消费需求,商业界也很快增加了其负债水平。1946~1974年间,美国国内总债务量由4000亿美元上升到25000亿美元,1960~1970年间债务量翻了一番,在70、80年代增加得更快,1988年超过了80000亿美元。美国这种迅速增长的债务仅仅只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紧密相关、急速增长的债务中的一部分。这种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债务数额惊人,国与国间债务密切交织并且越积越高,以至于造成以下后果:(1)为支付日益增长的利息,债务量必须继续快速增长;(2)如果一个占据重要地位的跨国公司或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面临破产并无力偿还利息和债务时,一场极危险的债务拖欠的连锁反应将造成比1929年金融危机更严重的后果。下面的例子验证了上述后果的第二点。借贷机构组成金字塔状的债务关系,一个借债者向他人借债,再将这笔钱以更高的利息借给其他人。如果一个主要的债务人拖欠债务会造成贷款者(其本身也是一个债务人)无法偿还利息或无法分期还债,由于他们的贷款人也是负债者,依此类推,一场后果惨重的债务拖欠的连锁反应就形成了。

这并非只是偏激的杞人忧天者的噩梦。美国颇具代表性的保守的商业出版物《商业周刊》1974年就登载了一篇颇具冲击力的文章:“债务人的拖欠和债权人的失败造成的连锁反应的灾难”。这篇文章随后强调说“这种危险超过了30年代,国内外具有风险的债务



量和杠杆利率均愈变愈大”。危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大多数借款是“属于那些自身流动性通常很弱的银行”。<sup>28</sup>

20世纪80年代里,债务迅速增长。1981年美国政府的债务达到9 140亿美元。1988年里根总统离任时,债务量超过了26 000亿美元——8年时间里债务量超过了1981年以前所有债务的三倍还要多。里根时代经济的繁荣是由政府举债得来的。20世纪80年代,全国四分之一的家庭借债超过2万美元。对80年代政府债务进行仔细的研究就会得出结论:“认为经济运行良好是一个错觉,这种错觉是建立在借来的时间和金钱的基础上的。”对此研究的作者说道,“这是一场在道义上规模相当惊人的蓄意的不负责任的事件”<sup>29</sup>。到了1990年,经济看上去运行良好,联邦政府也“跳出”了令人困扰的借贷工业。但是某些评估者认为挽救这场灾难的代价相当于平均摊给每个美国公民2 000美元。如果债务危机发生在经济繁荣期,那么这种可导致整个信贷结构坍塌的经济环境带来的灾难会十分严重,以至于超出了经济学家的预测能力。在2001年经济进入衰退,美国政府拨出150亿美元用于航空工业,并且许多其他工业也在请求“保护”的情况下,这种预测已隐隐显现。

因此,结束这一部分时我们要再次重述这个事实,那就是凯恩斯理论的拥护者所认为的政府支出的大幅增加可以减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经济萧条的严重程度。但是这种繁荣(如果有人认为失业率经常性地接近10%也叫做经济繁荣的话)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首先,这种繁荣是建立在经常会导致经济发生灾难性毁灭的世界性信贷结构的基础之上的。其次,这种繁荣会导致持续的战争导向的经济,即相当一部分的社会生产资源是用于生产一些更为复杂的用来摧毁人类的工具和方法。

如果资本主义政府遵照凯恩斯的指示去创造充分就业的经济环境,那么他们会“没有理由认为现存的经济体系正严重地对生产资料进行不当的使用”。<sup>30</sup>在凯恩斯式的经济政策出现六十多年后再次对之进行回顾,我们可以说,这种乐观是站不住脚的。

## 凯恩斯思想的基础

我们已经指出,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在逻辑上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中当实际工资不变或下降时失业率却急速上升这种现象。并且,如果工资不能反映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无法反映),且存在没有被利用的生产资料(萧条时期这种情况通常是存在的),那么基于新古典理论基础上的严谨逻辑推理是不能认为帕累托最优、有效资源配置或是理性价格的说法(一句话,所有关于“看不见的手”理论的论断)具有现实或经验性的意义。

在本章的开头我们指出,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新古典理论的思想体系中存在三个思想

要素：对自由市场可自动调节经济并使产出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的信仰；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既可以作为理想的分配公平模型，也可以作为阐述收入分配实际是怎样发生的理论；还有一个是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或称为是对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可以达到理性价格和资源“有效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的信仰。我们看到，对后两个原理的信仰的传播只给资产阶级带来了好处。而第一个原理则是一个混合的祝福。向世人广泛宣传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仁慈是一码事，在资本主义体系发生一系列剧烈变动并直接威胁到其生存时仍坚信并积极维护这种思想体系则是另一码事。但是新古典理论的这三个基本原理形成了一个逻辑严密、相互一致的知识体系，从逻辑上讲，不可能在主张其中两个原理时不暗含第三个原理。

但是，这正是凯恩斯力图去完成的。他想放弃市场自主调节的假定，从而将资本主义从自我毁灭中挽救出来，但同时他又想保持对分配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的信仰。他希望在资产阶级追求利润的过程中政府应尽可能少地干预，而在挽救社会于危机时才发挥作用。然而，他附带提到他个人更倾向于稍微不那么极端的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公（然而，对此我们只能长叹一声，并重述实用主义的通用教义也只是如一首诗一般用处有限）。

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在阅读了凯恩斯的《通论》正式出版前的手稿时均对凯恩斯的理论表示震惊。因此，凯恩斯在结束《通论》时指出，他本人的思想体系与新古典经济学家是一致的：

如果我们的中央控制机构能够成功地把总产量推进到相当于现实中可能达到的充分就业水平，那么，从这一点开始，古典学派的理论仍然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假设总产量为既定的，即取决于古典学派思想体系以外的力量或因素，那么，我们对古典学派的分析并没有反对意见。我们不反对它所分析的私人的利己动机如何决定生产何种产品，以何种比例的生产要素来进行生产，以及如何把产品的价值在生产要素之间加以分配。还有，虽然在节俭问题上与古典学派的想法不同，但对现代古典学派理论关于在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的私人和社会利益的一致程度却没有意见……

更具体地说，我看不出任何理由来认为现有的经济制度对已经被使用的生产要素具有严重的使用不当之处。当然，存在着预期的失误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并不会由于中央集中的决策而得以避免……在这个天地中，传统的个人主义的有利之处仍然会继续存在。

因此，虽然对19世纪的政论家或当今美国理财家而言，由于使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导相互协调而引起的政府职能的扩大是对个人主义的严重侵犯，但我要为这种扩大进行辩护。我认为，事实恰恰相反。它不但是避免现在的经济制度完全被摧毁的惟一可行之道，而且也是个人动力（即创造利润）能成功地发生作用的前提条件。<sup>31</sup>

一些作家试图故意将凯恩斯歪曲成一个激进的改革家。他们频繁地引用凯恩斯创造

的一个空洞的词语：“食利阶层的安乐死”。我们已经看到凯恩斯相信的确有“社会上的和心理上的理由来认为：相当大的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是合理的”。<sup>32</sup>然而他坚信，从长期来看，资本主义体系中会有一股力量能自动地减弱这种分配上的不均。遵循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的逻辑，凯恩斯得出的结论是随着资本的积累，资本收益率必将下降。同时，他对收入分配不均的程度必将减轻的信仰与巴斯夏（对此我们已在第8章进行过批判）的观点几乎一致。马克思在他自己的关于利润率趋于下降的理论中指出了上述观点的错误，认为即使资本收益率递减，资本所有者所得到的总收入也仍可能增加（见第9章）。而这却是凯恩斯清楚阐述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使收入分配更公平的惟一希望。此外，我们已经知道，凯恩斯认为在短期内，为了刺激就业，实际工资应该下降，同时利润必须相应地上升。

下文中引用了凯恩斯文章中对“食利阶层的安乐死”的描述。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重读一下第8章中对巴斯夏（他大概是19世纪最保守的经济学家了）的理论的讨论，比较下面凯恩斯著作中的一段话可以看出这几乎与巴斯夏的文章如出一辙：

我感到肯定的是……把资本数量增加到使它的边际效率下降到很低的数值是不难做到的事情。这并不意味着使用资本设备几乎不用支付代价，而仅仅是说，资本设备的收益在补偿其折旧和老化费用以后，再减去偿付风险以及技能和决策的运用的费用，剩下来的属于资本所有者的数量不会有多少……

虽然这种状况相当符合于某种程度的个人主义，但它意味着食利者阶级的消亡，从而也意味着资本家利用资本的稀缺性来扩大其压迫力量的消亡。<sup>33</sup>

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令人费解的文章了。当然，凯恩斯（作为最高级别的逻辑推理者）知道资本收益率的递减与资产阶级收入份额的增加是一致的，他当然也知道许多资产阶级和保守的经济学家都相信资本主义距离资产阶级获得的资本收益“在补偿它的折旧和老化费用以后，再减去偿付风险以及技能和决策的运用的费用，剩下来的属于资本所有者的数量不会有多少”这一情形已很久远了；当然他也知道使用“安乐死”这一术语也只是—种意识形态上的蒙昧主义。那么，凯恩斯怎能写道在现存的资本主义体系下“并无理由去反对经典理论分析的……最终产品是如何分配的分析”，同时又提到，“资产阶级是怎样用不公的力量去发掘资本的稀缺价值的呢”？

在这样的混乱与蒙昧状态下，我们惊讶于凯恩斯会急切地安慰无用的食利资本家“食利者阶级和已经没有社会职能的投资者绝不会突然消亡；就像我们近来在英国所看到的那样，它们的消失会是逐渐而漫长的过程，从而不需要进行革命斗争”。<sup>34</sup>并且急切地要让这些资产阶级相信他们将他们的利益牢记心头，凯恩斯安慰食利阶层说并没有强烈理由要实行“国家社会主义……重要的并不是生产工具的国有化”。<sup>35</sup>他希望政府的作用仅在于保证资产阶级可持续获取利润，并且他保证这样的政府功能“可以逐渐采用，从而不会割断社会的一般传统”。<sup>36</sup>

## 注 释

1. 数据来源于 Louis M. Hacker, *The Course of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Wiley, 1970), pp. 300~301.
2. 参见 Lester V. Chandler, *America's Greatest Depressio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0), pp. 40~41.
3. U. S. Congress, *Senate Hearings before a Sub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n Manufacturers*, 72d Cong., 1st ses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2), p. 239.
4. 引自 Chandler, *America's Greatest Depression*, pp. 41~42.
5. 引自 Leo Huberman, *We the Peopl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4), p. 260.
6. 同上, 第 130~131 页。
7. T. R. Malthus,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and a Summary View of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ed. A. Flew (Baltimore: Penguin, 1970), p. 144.
8. Keynes, *General Theory*, p. 374.
9. John Maynard Keynes, *Essays in Biography* (New York: Norton, 1963) p. 12.
10. 诸如此类, 参见 Robert Lekachman, *The Age of Keyne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5), pp. 59-61.
11. Keynes, 同上, p. 5.
12. Keynes, 同上, p. 17.
13. Keynes, 同上, p. 13~14.
14. Keynes, 同上, p. 95~96.
15. Keynes, 同上, p. 97.
16. Keynes, 同上, p. 166~168.
17. Keynes, 同上, p. 170.
18. Keynes, 同上, p. 172.
19. Keynes, 同上, p. 131.
20. Keynes, 同上, p. 129.
21. Hacker,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p. 325.
22. 军事支出的数据是很难计算的, 因为政府统计员通过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资金划分到非军事支出项目里来掩盖军事支出费用。包括这节引用的数据在内的大部分数据均是从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对美国军事支出的综合研究中得到的: James M. Cypher, "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ostwar U. S. Economy: 1947~1971,"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1973.
23. 同上, 第 136~137 页。
24. 同上, 第 164~165 页。
25. 数据来源于 Benjamin Friedman, *Days of Reckoning*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8), pp. 273-74.
26. Cypher, "Military Expenditures," pp. 328~32.

27. 见 D. F. Fleming, *The Cold War and Its Origins*, 2 vols. (New York: Doubleday, 1961); Gar Alperovitz, *Atomic Diplomacy: Hiroshima and Potsda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65); David Horowitz, ed., *Corporations and the Cold Wa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9); David Horowitz, *Empire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0); Gabriel Kolko, *The Politics of War* (New York: Vintage, 1970); I. F. Stone,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52); Stephen E. Ambrose, *Rise to Globalism* (London: Penguin, 1971).

28. 这些数据,包括以下章节的数据均来源于 Douglas Dowd,“Accumulation and Crisis,”*Socialist Review* 5, no. 2(1975):27—30.

29. Friedman, *Days of Reckoning*, pp. 5, 24.

30. Keynes, 同上, p. 379.

31. Keynes, 同上, p. 378~380。

32. Keynes, 同上, p. 374。

33. Keynes, 同上, p. 375~376。

34. Keynes, 同上, p. 324。

35. Keynes, 同上, p. 378。

36. Keynes, 同上。

## 第 16 章 可测资本生产力神话的破灭： 斯拉法的著作

新古典功利主义思想体系的三个基本的原则是：竞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通过自由交换协调各方利益，创造合理的价格并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自由市场自动实现充分就业的原则；工资率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以及利润率（或者利息率）等于资本的边际产品价值的原则，这意味着每一个社会阶层得到了它拥有的生产要素创造的价值。第 14、15 章讨论了前两个原则。在这一章，我们将讨论最后一个原则——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

### 新古典分配理论的现状

新古典经济学完全地统治着当代和传统的学院经济学。正统的凯恩斯经济学已经变成仅仅是新古典理论的一个分支，但正如我们将在第 18 章看到的另一个传统，后凯恩斯主义——却强烈地反对新古典主义。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几乎是所有新古典经济学家（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入围条件在下一章讨论）一个不变的毫无异议的信条。尽管在当代新古典主义者的著作中，当代新古典分配理论已经加入了更多精致的数学表述，但是，它自从被克拉克和庞巴维克阐述以来，并没有本质的变化。

马丁·布朗芬布伦纳（Martin Bronfenbrenner）教授的《收入分配理论》概括了新古典分配理论的现状。这是一本准确反映了主流经济学正统的书。作者在前言中写道：

这是一本守旧的关于收入分配的书。这本书由一个理论经济学家所著，并且着重阐释经济理论。这本书保留了约翰·贝茨·克拉克的《财富的分配》（1899）中的传统观念……

这本书的守旧主要表现在内容的重新阐释上……我不愿意放弃新古典经济学无论是边际主义还是生产函数,无论是在微观经济层面还是宏观经济层面。<sup>1</sup>

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论证的顺序上,布朗芬布伦纳都真诚地追随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正统。他从利润最大化的厂商理论开始,厂商购买投入,然后利用这些投入生产(按照一个标准的、“表现良好”的新古典主义“生产函数”)一种产品在市场上销售。为了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要素组合能够被选择,生产函数允许生产要素之间平稳的、连续的替代。在微观经济学层面上,没有劳动者和资本家,仅仅有表示为  $a$ 、 $b$ 、 $c$  等等投入的所有者。

单个厂商从事的微观经济生产过程可以用一个生产函数表示:

$$x = F(a, b, c, \dots)$$

……一阶偏导数……(生产函数)是投入  $a$ 、 $b$ 、 $c$  的边际产量或者边际生产率……一般假设任何两种投入  $a$  和  $b$  在生产中可以彼此替代……生产函数的二阶偏导数一般是负的……这是投入收益递减原则的一种形式。<sup>2</sup>

这些假设给出了我们熟悉的每一种投入的边际产品价值(value of the marginal product, VMP)曲线。就像我们在讨论克拉克的章节中所看到的,这些曲线向下倾斜,构成了利润最大化厂商对一种要素的需求曲线。其结论是:“如果所有的价格已知,各种投入的价格和各自的边际产品价值相等时,投入生产要素的数量达到最优值(也就是利润最大化)。”<sup>3</sup> 即在边际意义上,每一种要素都得到它们实际创造。

然后,我们就转到宏观经济层面的分析。在微观经济水平, $a$ 、 $b$ 、 $c$  没有社会、政治和经济意义上的区别,现在变成了资本和劳动,其报酬现在变成了利息和工资。在布朗芬布伦纳看来,“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将经济看作一个显而易见的厂商或者一个行业”。<sup>4</sup> 购买这种“显而易见的企业”的产出不存在总需求是否充足的问题,因为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的思想价值与萨伊的自动性传统或者凯恩斯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总需求和总支出的保持或者按照萨伊定律来源于自动……或者是被一些政府部门提供例如货币或者财政政策。”<sup>5</sup>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和劳动仅仅是被我们庞大的“显而易见的厂商”为了利润最大化用于生产的两种生产要素。对劳动的需求,像微观经济分析的  $a$ 、 $b$  和  $c$  一样,向下倾斜且反映劳动贡献在边际意义上的价值:“劳动需求函数……在边际生产率的意义上向下倾斜。”<sup>6</sup> 按照逻辑,劳动者获得他们的边际产品价值。对资本的分析是同样的,资本或者劳动就是微观经济水平上的  $a$ 、 $b$  或者  $c$ , 它们都获得它们的边际产品价值。

然而,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尽管把雇佣的劳动数量加总(为了确定边际生产力)的意义是完全清晰的,但是,将资本加总的意义却并不清晰。如果我们说 100 个劳动者工作一个星期,这个意思是毫不含糊的。但是我们说 100 单位资本工作一个星期是什么意思呢? 100 个工厂吗? 不同规模的吗? 100 个铁铲? 50 个工厂, 25 个铁铲和 25 个炼油厂

吗？这显然是荒谬的。一单位资本的范围可以从一个螺丝刀到一个雇佣成千上万工人的巨型工厂。答案很明显，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家是按照每一个项目的价格加总资本的。如果一个螺丝刀的价格为1美元，而巨型工厂的价格为5亿美元，那么加在一起的资本价值为500 000 001美元。这是所有务实的资本家为了创造利润所需要知道的。但是资本家创造利润，而新古典经济学家构建思想体系。

资本家关于总资本的测度无法达到新古典思想体系的目的。在边际生产力理论中，资本的价格是由它的获利性决定的，而它的获利性取决于它的生产率。因此，正像布朗芬布伦纳教授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在新古典资本理论中，“我们说一项资产……价格是它的收入的资本化价值”。<sup>7</sup> 换句话说，资本化物品的价格是通过这个物品能够获得的所有收入的贴现美元价值（或者资本化价值）。然而在新古典理论中，资本获得收入是由它的生产力所决定的。

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家为了明确资本的生产率，首先必须将资本加总。但是他们不能将不同的资本按照它们的价格加总，因为资本的价格取决于它的生产率（除非资本可以加总才能计算）。这个问题和关于克拉克被凡勃伦批评的问题是同一个问题。克拉克说，既有资本物品，也有由“物质上永恒的实体”的连续体构成的一般资本。凡勃伦正确地指出：

资本的“永恒实体”的连续体是一个所有权的连续性，而不是一个物质实体的连续性。实际上，连续性是一种非物质性质的连续性，是一个合法权利问题、契约问题、买和卖的问题的连续性。专利权为什么被忽略，尽管它是精心创造的，但是它是不能被看到的……（没有被忽略这么明显的事实）将，当然……推翻克拉克先生一开始论证的“自然”的劳动和资本报酬的定律。<sup>8</sup>

资本数量的量化必须独立于任何价格，否则对现存的工资和利润率的解释和合理化，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是完全不堪一击的。庞巴维克建议用“平均的生产期限”作为资本的一个测度。大多数新古典经济学家拒绝用这个测度有两个理由：首先，它是一个包括四个单独的完全不同的变量组成的复杂指数，这四个变量是：土地的数量，劳动的数量，时间的长度，劳动和土地在不同时间段使用量的分布。庞巴维克的结果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而且大多数新古典经济学家一开始就意识到这种方法无法克服的“指数问题”。因此，大多数新古典经济学家坚持克拉克将资本作为一个一些神秘物质的永恒实体的连续体的概念，将这个实体加总便得到新古典主义者的资本总量，从而可以计算边际生产力、收入回报和资本的现值。

拒绝庞巴维克的方法的第二个理由是，在他的基本的资本概念里，这种方法与劳动理论的观点危险地密切相关。在庞巴维克看来，仅仅土地和劳动是最初的或者最终的生产要素。资本的存在仅仅是因为生产的时间要素。从生产的概念到把生产视为早已存在的自然资源的转化，一个通过劳动而且只通过劳动的转化，这仅仅是一小步。



因此,布朗芬布伦纳紧密跟随新古典主义者的主流派而拒绝庞巴维克的资本定义:“我们不……遵循把劳动和土地看作‘最初’的投入或者生产要素的传统,其生产率是被假设包含在‘引致的’投入如资本的生产率之中。换句话说,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有从劳动和土地的生产率中分离出来的含义。”<sup>9</sup>

那么,什么是凭借价格独立加总的资本的“连续体”或者“物质永恒实体”呢?克拉克坚信实体是存在的,但是并未给它命名。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继续坚信克拉克的信条,但是试图赋予实体各种的名称。布朗芬布伦纳列举了新古典经济学家给予实体的四种名称——“灰泥”、“胶状物”、“民事法庭”和“组合装置”——而且指出给实体命一个名(或者甚至四个名)实际像创造它一样。他告诉读者,他的理论依靠几个假设。其中一个假设是“资本工具……将……被均质化……到多用途的机器中——‘灰泥’或者‘胶状物’或者‘民事法庭’或者‘组合装置’——具有相同的使用年限。也就是说,资本在长期内被看作是可锻造的和可塑造的,而且有同样的边际生产力。”<sup>10</sup>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资本像劳动一样,获得等于它的边际生产力的报酬。

在对已问世的新古典生产和分配理论最全面和最系统的数学和文字总结中,C. E. 弗格森(C. E. Ferguson)实际是遵循布朗芬布伦纳的论证顺序。弗格森从微观经济理论扩展到宏观经济理论,在其微观经济理论中,生产要素仅仅作作为“ $x_i$ 's”被提及。

在第6、8和9章[弗格森的书],引致投入需求的理论构成微观经济的分配理论。加之传统的“规则”,如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边际产出和实际工资率相等,用类推的方法得到宏观经济的分配理论。为了专门研究两个同质投入劳动和资本的理论,一个人必须用K和L替代第6章和9章中的 $x_i$ 's。<sup>11</sup>

弗格森曾经(相同的分析可以从当代新古典主义者的几百本书中找到)简单的将他的微观理论中的未加说明的和无差别的 $x_i$ 's变换成一个纯的、无差别的资本的加总,资本包括一些“永恒实体”,这些“永恒实体”允许它的加总独立于任何价格。

得到一个对资本纯粹的物质加总的必要性在于,新古典总分配理论的中心试图去证明利息(当经济处于一般均衡状态时,所有利润被假设为利息)仅仅是资本的报酬——反映资本的生产率并由资本的生产力所决定的报酬。但是资本的加总和它的边际生产力的决定对新古典理论的重要性远远超越了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的边界。在前一章中,我们讨论了凯恩斯拒绝市场的自动调节却继续为看不见的手理论和分配理论辩护的企图,我们指出,从逻辑上讲不能拒绝这些新古典思想体系原则中的任何一个却坚持其他两个。这三个原则在理论上和逻辑上是相互联系的,而且这三个思想体系原则中最重要的理论联系就是新古典的资本理论。

在分配理论中,加总资本独立于价格之外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没有这样一个加总,就不能得到资本或者是劳动的边际产品曲线(因为在这个理论中,劳动的生产率部分

地依赖于所用资本的数量)。在关于自由市场将自发地调节到充分就业状态的理论中,一个中心论断就是,如果储蓄迅速提高,而利息率随之下降,那么为了提高资本的数量,大量的投资将是必需的,或者提高每个工人的资本率,直到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和利息率相等。换句话说,新古典市场的自动调节理论完全依靠一个普遍存在的利息率和每个工人的资本率之间的反向变动关系。如果我们不能加总资本和决定它的边际生产力,这样的理论是没有意义的。最后,在看不见的手理论中,或者在新古典福利经济学中,资本在不同行业中的有效配置的概念,和资源在不同时点上的有效配置的概念(两个都是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所必需的)没有任何意义,并且还涉及到逻辑上的不一致,如果(1)我们不能够加总资本和决定它的边际生产力,(2)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在资本的数量递增时(相对于劳动的数量)没有出现递减,(3)较低的利息率并不总是能够导致资本劳动比率的递增。

因此,资本代表一个包含永恒实体(abiding entity)的物质连续体(physical continuum)的概念是整个新古典思想体系的中心。在精细的数学结构基础上构造他们的理论,并且真正理解该理论含义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无疑认识到并承认这一点。因此,弗格森正确地表述道:

新古典分配理论和增长理论无疑是衍生的理论,前者主要依靠生产理论,后者主要依靠资本理论。资本理论和生产理论是更加紧密综合的和更具基础性的理论。但是在最新的新古典理论分析中,在它的简单和不是那么简单的形式中,依靠被称为资本的“物品”的基本属性。<sup>12</sup>

什么是资本的基本属性?从克拉克的《财富的分配》的出版到20世纪5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家对保留不能验证的资本的永恒实体的基本属性问题是满意的。所有这些在20世纪60年代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当时新古典经济学家从保守的自满转为被迫的守势。

在1962年,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所有当代新古典经济学家中最有影响的一位(我们将在第17章中讨论),发现把克拉克的资本概念贴上“J. B. 克拉克的神话故事”是必要的。萨缪尔森承认克拉克的资本概念不具有逻辑和经验上的可辩护性,但是却认为它是非常有用的“寓言”,按照类推的方法,此“寓言”说明了一个不能被直接公式化和辩护的“事实”。萨缪尔森1962年的论文标题是《资本理论中的寓言和现实主义:代理的生产函数》。<sup>13</sup>新古典生产和资本理论不是科学的事实,而是能够解释事实的寓言。

弗格森是最机敏和富有洞察力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之一,他认识到萨缪尔森是正确的,因为这些理论是纯粹的寓言。但是他也认识到这些寓言构成了整个新古典理论的中心:

用克拉克的类比,资本就像一个瀑布。每一秒钟,不同的水通过瀑布;但是瀑布自身是保持不变的。也就是说……有一种真实的称为资本的物质,资本的损耗是不断被重置的以致物质自身是保持同质的。

用这个简单的概念,一系列太多而无法一一列举的经济学家已经发展了简单的新古典理论的现代版本,“J. B. 克拉克的神话故事”。当然,理论的详细版本是可以被构造的。但是简单版本产生了我们理解大部分现实经济世界的简单寓言。尤其是,这些寓言给我们一个生产领域和市场之间的直接关系,以及建立了所有微观经济定价理论的基础,当然这是新古典理论的中心。<sup>14</sup>

但是萨缪尔森和弗格森都不是新古典主义的批评者。与此相反,他们为该理论辩护。弗格森认为他的理论是“(加总)新古典生产理论……和分配理论,或者萨缪尔森称为‘J. B. 克拉克的神话故事’的一般形式。就生产和分配来讲,模型似乎是一个有用的和令人满意的现实的模拟体。”<sup>15</sup>

什么使得新古典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处于防守地位?为什么新古典理论最有力的辩护者承认他们的真理是建立在神话和寓言的基础之上的?这些问题在1960年出版的一本经济思想史上最要著作之一——皮罗·斯拉法(Piero Sraffa)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中找到答案。<sup>16</sup>这本著作最初的目的是解决李嘉图关于寻找一个不变的价值尺度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劳动价值论。这本书有难以置信的长达几乎四十年的酝酿时期,<sup>17</sup>但是它一旦出版,不仅成功地完成了最初的目标(发现一个不变的价值尺度),而且对新古典资本理论和分配理论发起了毁灭性和决定性的批判——全书八十七页,另加三个附录。这两个成就的每一个在经济理论的发展历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一章剩下的部分,我们将考察其对新古典理论的批判,而在第18章将考察斯拉法对不变的价值尺度的构造。

### 斯拉法对新古典理论的批判

新古典经济学家试图将他们的分配理论建立在关于市场交换和包含在生产函数中的生产技术条件的一般命题的基础之上。他们认为,他们的理论是如此全面以至于不需要用关于经济制度的、经济历史、或者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信息去解释收入是如何分配的。而在微观经济上,他们试图证明最终消费品的价值(在效用的基础上)怎样创造一条关于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在生产函数决定它们边际生产力的基础之上)。生产要素的需求,和这些要素的供给(通常看作固定和不变的),共同决定生产要素的价格——即要素所有者的收入。

最明显的批判已持续数十年(并不断被忽视),商品的需求和要素的供给受到收入分配显著的影响。这涉及到在微观理论无法回避的一个循环难题。然而理论家们为了提供一个证明利润和工资之间的阶级收入分配合理的宏观经济思想体系,毫不犹豫地拼凑边

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中的诸多范畴。

自从约翰·贝茨·克拉克时代以来,新古典分配理论已经被极大地精炼了,但是其指导思想仍然和克拉克一样,证明在这个最公正的世界上,“在自然法则下,一个社会阶级得到的是它对行业总产出的贡献”。<sup>18</sup>

最早对该理论展开的攻击之一来自于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教授。<sup>19</sup>尽管我们必须将批判的发起者归功于罗宾逊,但是她承认她最重要理论观点受益于斯拉法。<sup>20</sup>对罗宾逊来说,最重要的要点是,不可能“发现一个资本被数据测度的单位,也就是一个指数,它与相对价格和分配无关,以至于可以和劳动一起放在生产函数中……它可以解释国民产出的水平。”<sup>21</sup>

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如果一个人能够在生产函数中计算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资本必须可以简化为一个不可分的同质的数量。G. C. 哈考特(G. C. Harcourt)已经做了最全面和最富洞察力的关于资本理论的当代经济文献的综述。按照我们在本章第一部分的表述,他发现新古典经济学家简单地假设这样一个同质实体或者物质而且给它命名。这个物质被假设是可以任意和无成本地转化为任何具体形式的资本。这些明显荒谬的假设引发了关于量化资本方法的争论,这使得人们开始认识到资本是异质的而且生产函数不是光滑的、连续的和可微分的函数。<sup>22</sup>

考察这个问题的第一步,是用生产投入和产出的所有各种组合的一系列“处方”代替新古典“生产函数”。然后,我们接受关于利润最大化是决定资本家选择运用生产技术的驱动力的观念。这个假设被新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几乎所有其他人)所接受。

利润最大化将导致一个单一的生产技术的选择(利润最大化),给定不同的生产处方,这是由利息率和工资率决定的。问题立即就出现了,即工资率和利息率的变化将引起生产技术或生产处方何种变化?

斯拉法首先在他的书的第三部分有效地阐明这个问题的答案,第三部分的标题是“生产方法的转换”。<sup>23</sup>这个证明导致大量关于争论“转换技术”<sup>24</sup>问题的文章的出现。尽管争论是非常深奥的,但是建立的一般原则是非常简单的,而且在经济学说史上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它们代表着19世纪体现着主流和正统的新古典理论的功利主义经济学,其知识传统逻辑上和理论上的毁灭。

我们对生产技术转换(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再转换)的证明将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我们按照庞巴维克的定义,将资本处理成一个“生产时期”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转换的证明是纯文字的。接下来,我们将把现存的商品投入看作资本并力图证明再转换现象。这个证明将使用简单的数学公式和图表。

而在证明庞巴维克关于将生产时期的概念作为资本的测度的逻辑不一致性时,我们首先描述一个可能的情形,庞巴维克的资本定义能产生与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结论一致

的结果。然后,我们将描述一个情形,庞巴维克的资本定义在边际生产力理论中导致了逻辑矛盾。

假设生产一种商品可以有两种技术。技术A涉及到大量的劳动投入,但是劳动时间主要集中于生产过程的后阶段;技术B涉及到较少的劳动投入,但是劳动时间主要集中于生产过程的前阶段。如果工资非常低而利息率非常高,技术A将具有最大获利性且被选择。如果工资开始上升而利息率开始下降,很明显技术B将在一个点变得更具有获利性。随着这种利息率和工资变化趋势的持续,技术B将一直保持最大获利性,而与工资将达到多高无关(或者利息率降为多低)。这是正统的情形且与新古典理论的结论完全一致。

但是现在假设在技术A的情况下,大量的劳动被运用在生产过程的早期阶段。在技术B的情况下,假设我们有一个更长的生产时期,在生产时期开始的时候投入很少的劳动而在生产时期结束的时候投入大量的劳动。技术B投入的总劳动超过了技术A,但是技术A的劳动投入或者超过技术B的早期小量劳动投入,或者超过技术B的后期大量劳动投入。

在利息率非常高(或者低的工资率)的情况下,利息率的复合效应使得劳动运用较早的技术B(记着,它比技术A有一个更长的生产时期)的成本上升如此之大,以致比技术A的工资和利息成本高。因此,技术A是低成本技术,并且它将被应用。

当利息率下降的时候(工资率上升),技术B的总成本将在一点低于技术A的总成本,因为技术B的大多数劳动运用在生产时期的终端,而且较小的、早期的劳动投入的复合效用是不重要的。因此,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家将转向技术B。

但是如果利息率不断地下降而工资率不断地上升,利息率的复合效应变得甚至不重要了;相反,提高的工资率变得更加重要。较多劳动投入的技术B一定是较昂贵的生产过程。资本家将再转换为技术A。在新古典的资本和分配理论里,这种技术的再转换是不可能的。再转换是可能的,这一事实证明新古典资本和分配理论是错误的;也就是说,新古典分配理论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当利息率下降的时候,在新古典理论里,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将总是运用更多的资本。相似的,当工资率上升的时候,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凯恩斯经济学)告诉我们,利润最大化企业将总是雇用较少的劳动。自从李嘉图以来,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在一个给定的产出水平下,工资率的提高总是包含着(或者成为必要)利息率的降低。按照新古典边际生产力理论(以及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和新古典自发调整市场的理论),伴随着利息率降低的工资率提高,必然总是使得利润最大化厂商提高生产过程中资本和劳动的比率;也就是说,他们必须用资本替代劳动而且转向一个更加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技术。

在刚刚描述过的例子中,显而易见,新古典理论不可能运用庞巴维克的资本定义的逻辑。庞巴维克的资本测度、生产的平均期限是一个测度关于生产过程的时间和在该过程

中各个时点的劳动投入量的指数。为了使得新古典理论更有意义(用资本的测度),在我们的例子中,告诉我们技术 A 或者 B 的中哪一个的资本密集度更高,在理论上来说是绝对必要的。

技术 B 涉及一个较长的生产时期和更多的劳动。它应当是更加资本密集型还是更加劳动密集型呢? 必须用一种清晰的、合乎逻辑的和明确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否则新古典经济理论完整详尽的结构将土崩瓦解。

但是答案是模糊不清的。新古典理论从没有给定任何判断技术 A 或者技术 B 是更加资本密集型的标准,除了断定当利息率降低和工资率上升时,利润最大化厂商将总是从一个较低资本密集度的技术转向一个较高资本密集度的技术。在我们的例子中,我们看到很高的利息率(相应的较低的工资率)使技术 A 具有较低的成本,因此技术 A 是利润最大化的技术。当利息率下降(工资率上升时),技术 B 的成本较低,因而,利润最大化的厂商从技术 A 转换为技术 B。因为在利息率降低(工资率上升)使得利润最大化厂商从技术 A 转换为技术 B。如果要使得新古典理论有意义或者有逻辑上的一致性,新古典理论必须得出技术 B 是比技术 A 更高的资本密集度技术的结论。

但是,我们也在例子中看到利息率持续下降到很低的水平(工资率持续上升),就会达到技术 A 重新变成利润最大化的技术的那一点。厂商从 B 转换(或者再转换)为 A。由于利息率递减导致从技术 B 转换为技术 A,定义技术 A 是比技术 B 更高的资本密集度技术,对新古典理论来说则是绝对必需的。

在整个过程中,技术 A 和技术 B 是保持不变的。然而,我们已经看到,新古典理论要求我们定义 B 比 A 更具有资本密集度,而且也定义 A 比 B 更具有资本密集度。新古典理论因此被证明是建立在一个无法逃避的逻辑矛盾之上的。

重要的是,在相同条件下用在相同时点,同样类别的物质资本品造成相当大的对依赖于当前利息率和工资率的资本价值的偏离。进一步,即使生产的物质条件是相同的,生产不同商品的相对成本也会发生变化。斯拉法正确地得出结论,他已经成功

证明将和几个不同的劳动量联系的“时期”加总成为一个被看作代表资本数量的单独量是不可能的。面对不变的生产方法,相对价格变化方向的逆转不能够与任何作为一个同分配和价格无关的测度量的资本概念相协调。<sup>25</sup>

但是,尽管庞巴维克的资本测度已经被证明具有逻辑矛盾,为了检验一个逻辑一致的资本测度是否可能,我们必须考虑克拉克的资本概念,并仅仅考察直接的生产时期,这个时期内劳动和由以前生产的商品组成的资本一起运作。我们必须用一些方程式和一些简单的图形来说明这种情况。

为了尽可能地简化,我们假设一个经济仅仅生产一种资本品和一种消费品(证明在数学上可以被扩展到包括任何数目的资本品和消费品)。我们也假设有两种不同的生产技

术,每一个包含两种商品生产的方法。

当均衡时,每一种商品的价格等于工资的成本加上再生产中运用的资本的利息加上等于再生产过程中资本损耗或者毁坏的数量。从而,我们能写出两种物品的价格(或者成本)方程。<sup>26</sup> 这些方程将可以运用到任何一种生产技术中:

$$1 = l_a w + c_a p_c (r + d) \quad (16.1)$$

和

$$p_c = l_c w + c_c p_c (r + d) \quad (16.2)$$

这里 1 是消费品的价格(也就是说,它是个计价标准); $l_a$  和  $c_a$  是在生产消费品中运用的劳动和资本的数量; $p_c$  是资本品的价格; $l_c$  和  $c_c$  是在生产资本品中运用的劳动和资本的数量; $w$  是工资率而  $r$  是利息率; $d$  是生产过程中资本损耗或者毁坏的百分比。

从这两个方程式中,可以得到工资率和利息率之间的数学关系:

$$w = \frac{1 - c_c(r + d)}{l_a + (l_c c_a - l_a c_c)(r + d)} \quad (16.3)$$

工资率( $w$ )和利息率( $r$ )之间的数学关系可以用一条直线在图形中表示。表示  $r$  和  $w$  之间关系的直线有三种可能的形状中的任何一种,这些图在图示 16.1 的三个平面图中。 $r-w$ 线(表示  $r$  和  $w$  之间关系的直线)将完全依赖两个行业中物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比率(或者,按照马克思的术语,两个行业中的资本有机构成)。在资本品行业中的物质资本和劳动的比率  $c_c/l_c$ ;在消费品行业的比率为  $c_a/l_a$ 。当比率相等的时候,线是直的,在图示 16.1 中的(a)部分。当比率不等的时候,线或者是凹的或者是凸的,在图示 16.1 中的(b)和(c)部分。

图示 16.2 说明怎样分辨两个技术中的哪一个具有较低的成本,因而将被利润最大化的厂商选择。离图形中原点越远的直线将总是代表最小成本的生产技术(因为给定工资率,离原点越远的曲线对应较高的利息率)。在图中,两条曲线  $M$  和  $N$  代表两个不同的生产过程。

利息率  $r_1$  以上部分(相应的,工资率  $w_1$  以下部分),技术  $N$  是利润最大化厂商将要选择的低成本技术。在利息率  $r_1$  和  $r_0$  之间直线  $N$  被描为粗线的部分,表示在这些利率水平上由于成本较低,获利性更高,技术  $N$  将被选择。利息率不会超过  $r_0$ ,因为在此利息率,工资率将变为零。在零和  $r_1$  之间直线  $M$  被描为粗线的部分,表示在这些利率水平上由于成本较低,获利性更高,技术  $M$  将被选择。

在图 16.2 中,如果我们从利息率  $r_1$  以上部分开始,技术  $N$  将被选择。如果利息率降到  $r_1$  以下任何部分,那么利润最大化厂商将转向选择技术  $M$ 。对应利息率  $r_1$ ,  $Q$  点叫做转换点。在这样一个点,厂商转换生产技术将获得更多利润。

在图 16.2 中,新古典理论得到完全一致的结果。技术  $M$  明确地比技术  $N$  资本密集度更高(因为利息率下降,厂商从  $N$  转向  $M$ )。生产技术是假设在两个产业中资本和劳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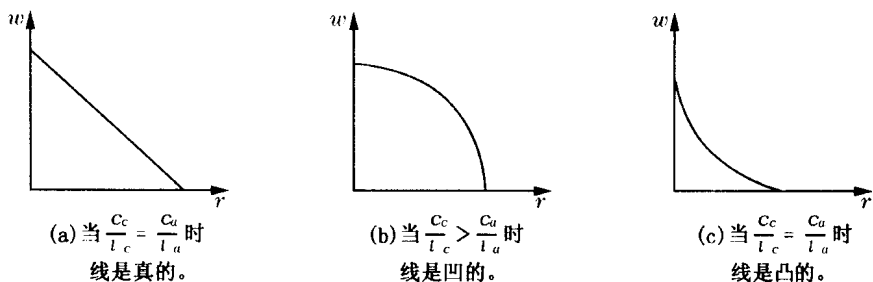


图 16.1  $r$  与  $w$  的三种可能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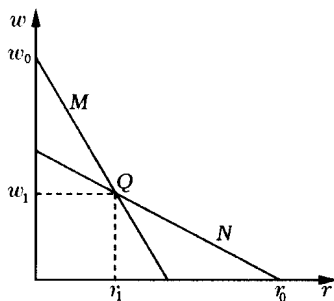


图 16.2 选择成本较低的生产技术

的比率相等。因此，正如图 16.1(a) 部分所示，两个技术均具有直线形的  $r-w$  线。

在图 16.3 中，技术  $M$  假设满足图 16.1 中的 (b) 部分的条件，即  $(c_c/l_c) > (c_a/l_a)$ ；而技术  $N$  假设满足图 16.1 中的 (c) 部分的条件，即  $(c_c/l_c) < (c_a/l_a)$ 。在各种利率水平上，我们还是用粗线描出低成本技术。现在有两个转换点  $Q$  和  $P$ 。这种情形下再转换发生。新古典理论再次表现出逻辑上的不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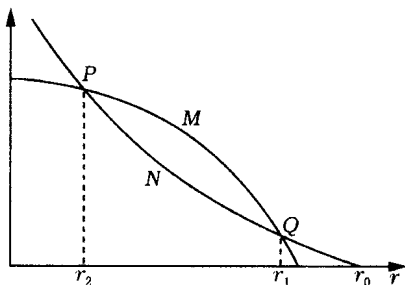


图 16.3 再转换的生产技术



利息率  $r_1$  以上部分,技术  $N$  被选择。当利息率降到  $r_1$  以下,(但是  $r_2$  以上)技术  $M$  被选择。因此,新古典分析的逻辑要求我们定义技术  $M$  比技术  $N$  具有更高的资本密集度(因为当利息率下降的时候,利润最大化厂商将从  $N$  转向  $M$ )。但是如果利息率继续下降,直到降到  $r_2$ ,那么利润最大化厂商将从技术  $M$  转换(或者再转换)为技术  $N$ 。因此,新古典分析的逻辑要求我们定义技术  $N$  比技术  $M$  具有更高的资本密集度,我们陷入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中:我们必须同时定义技术  $N$  比技术  $M$  具有更高的资本密集度,以及技术  $M$  比技术  $N$  具有更高的资本密集度。

现在,技术再转换是否发生的问题,使得新古典经济学家陷入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中,这个问题是一个不常见的、特殊的情形,这种情形被看作是一个理论没有涉及到的独特的例外,或者再转换的可能性是否视为一般情况。如果这是一般情形,那么所有依靠资本的可测度性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的概念的新古典理论(新古典思想体系的三个基本原则通常依靠这两个概念)在逻辑上是矛盾的,因而在逻辑上是无效的。

在图 16.2 中,我们证明仅仅在两种技术在两个行业中具有相同的资本—劳动比率时,再转换才不可能发生。而在所有其他情形下,再转换是可能的,而且新古典经济理论陷入一个逻辑矛盾中。

这是一个极具历史性的讽刺。新古典经济学家几乎总是将劳动价值论看作是价格和劳动量成比例的命题。正如我们在第 5 章和第 9 章所看到的,当资本的有机构成(或者物质资本和劳动的比率)在不同的行业变化时,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则要求一个调整原则来证明价格通常是偏离这样严格的比例的。但是,劳动价值论的支持者一直努力拓展这一调整原则。

斯拉法对新古典理论富有启示的批判和讽刺在于:新古典主义者始终拒绝承认劳动价值论的调整原则在逻辑上和理论上的有效性;他们嘲笑和拒绝劳动理论,因为它要求在所有行业存在相同的资本有机构成;新古典主义者始终正确地坚持的这个假设,对经济现实的描述却是荒谬的。但是,按照斯拉法的批判,这些表述应该反过来。劳动价值论不要要求资本有机构成的等同,但是新古典理论要求这种等同。新古典经济学家仅仅在每一个行业资本有机构成相等的时候才能逃避再转换的两难悖论。既然如此,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则(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 1 卷)在不要求调整原则的情况下,也可以被证明其正确性。但是,劳动理论家毕竟已经认识到这是不正确的,并且已经对劳动价值论的调整原则做了调整和拓展。

在图 16.4 中,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再转换的可能性是一般情形。两个生产技术,每一个由图 16.1 中的  $r-w$  线三种类型之一描述,仅仅在图 16.2 中描述的特殊情况没有两个转换点的可能性(因而没有再转换的可能性)。所有其他可能的情形被图解在 16.4 的三个平面图中。在每一个平面图中,有两个转换点,随着再转换的发生,新古典理论陷入到一个逻辑矛盾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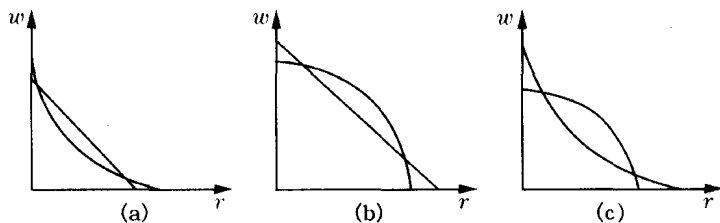


图 16.4 再转换的一般情况

新古典经济学家推出最好的数学家试图挽救他们的理论。但是每一次努力仅仅强化了斯拉法的观点,演绎出关于加总资本—劳动比率和利息率—工资率之间的关系——新古典价值和分配理论的中心——的结论是不可能的。

在《资本理论的寓言和现实主义:代理的生产函数》一书中,保罗·萨缪尔森作出巨大的努力去挽救新古典理论(和思想体系)。他接受斯拉法的批评,但是,他认为能够构造一个简单的而且显然不现实的“寓言”,这个寓言将是逻辑一致的,通过类推,可以阐释 J. B. 克拉克的“真理”。但实际上,这些真理本身经受不住经验和逻辑的批评。在这一点上,哈考特的话值得引用:

新古典的传统,像基督教一样,认为深奥的真理能够用寓言来讲述。新古典寓言的目的就是启发信徒和非信徒关注关于决定利润获得者和工资获得者之间收入分配的力量,决定资本积累方式和经济增长的力量,以及决定和这些发展相联系的生产技术的选择的力量……[这些]真理……被认为是成立的……在近来关于双重转换争论中,正确和错误的预言书揭露之前。<sup>27</sup>

萨缪尔森的“寓言”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和简化基础之上的,这些假设和简化是如此极端以致被人嘲笑,这无非是令人绝望的挽救一个思想体系的最后企图,这个思想体系非常方便和详尽地证明现存的收入分配的合理性。萨缪尔森发现,正像我们从再转换的讨论中预料的那样,他的寓言仅仅是在他的假设下成立,他假设资本—劳动比率和投入的时间模式“在所有的生产过程中是完全一样的”,而且所有的“价格是与劳动的时间成比例的”。<sup>28</sup>

然而,当他为 1996 年《经济学季刊》关于再转换争论的专题研讨会撰写概要时,萨缪尔森凸显了理论危机的严峻性。

病理学阐明健康的生理学。帕西内蒂(Pasinetti)、毛利西马(Morishima)、布鲁诺—伯迈斯特—谢辛丝(Bruno-Burmeister-Sheshinsi)、加雷尼亚尼(Garegnani)是值得我们尊敬的,由于他们对再转换在任何技术中——可分解或不可分解的技术——逻辑可能性的证明。无论再转换,是否具有经验上的可能性,它确实提示了我们几个重要的可能性。

较低的利息率可以带来较低的稳态消费和较低的资本—产出比率,如此低的利息率的转变能够伴随着递减收益的否定和使当前的消费是增加的而不是减少的资本深化逆转。

除了在较低的利息率和较高的实际工资所采纳的事前事后无谓的重复,结果经常是没有将不同的过程描述为“资本密集型的”、“机械化”或“间接的”模棱两可的方式。这样一个同义反复标签被证明,在再转换的情况下,导致不变技术之间的不一致排列,取决于何种利息率正好在市场中占优势。

如果这令那些对新古典主义著作的旧时代寓言持怀旧态度的人头疼,我们必须提醒自己,学者不是天生生活在一个无忧的现实中。我们必须尊重并评估生活的事实。<sup>29</sup>

但是,新古典理论的思想价值对于它的信徒来说太具有吸引力,因而不愿意仅仅因为理论的不一致而抛弃它。哈考特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新古典分配和价值理论的逻辑不充分之后,得出结论:“它是新古典分析的一般方法论,而不是在攻击之下得出的任何特别的结果……。作为一个赌徒,我知道我应当押钱给谁;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从来没有期望道德战胜死亡。”<sup>30</sup>

C. E. 弗格森在他为本章前面所讨论过的著作所写的前言里,给信徒们一个公正而简短的赠言:“信任新古典经济理论是一个信仰问题。我个人具有这种信仰,但是目前我能说服其他人的最好方式就是求助于萨缪尔森的权威地位。”<sup>31</sup>

琼·罗宾逊用下面的话作为对弗格森著作评论的结束语:

毫无疑问,弗格森教授关于“资本”理论的复述将被用来培养新一代的学生为他们无法解释的术语提供似乎精美的论据,并且坚定了计量经济学家解答难以启齿的问题的信心。批评毫无影响,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它是一个信仰的问题。<sup>32</sup>

#### 注 释

1. Martin Bronfenbrenner, *Income Distribution Theory* (Chicago: Aldine-Atherton, 1971), p. xi.
2. 同上, 122 页。
3. 同上, 134 页。
4. 同上, 268 页。
5. 同上, 271 页。
6. 同上, 269 页。
7. 同上, 301 页。
8. Thorstein Veblen, “Professor Clark’s Economics,” in *The Place of Science in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Russell and Russell, 1961), p. 197.
9. Bronfenbrenner, *Income Distribution Theory*, p. 299.
10. 同上, 298 页。



# 第 17 章 当代经济学 I： 正统经济学的分裂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两个主要历史性事件极大地影响了 20 世纪后期的经济学思想历程。第一个事件是 1917 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及随后的国内战争）以及随后几十年间苏联史无前例的快速工业化。其中，苏联的工业化进程令人印象尤为深刻。因为它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遇到了相当于第二次内战的阻碍，并且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德国对其不断打击的情况下实现的。第二个对此后的经济学理论有着重要影响的事件是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我们将在本章中简要回顾这两个历史事件，然后将在本章及最后两章中说明这些事件对后来创立的经济学理论的影响。

## 布尔什维克革命和苏联的工业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削弱了俄国的经济与政治结构，这导致沙皇政府于 1917 年倒台，一个临时政府取代了它。但是，这个政府也不能应付当时混乱的局面。在 1917 年的 10 月，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们，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靠一场几乎未流血的革命夺取了政权。然而，那些困扰着沙皇和临时政府的问题是很广泛的，并且布尔什维克们中的大部分人又都是些没有管理经验的政治运动家，所以当他们首次执政时也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新政府很快就发现自己陷入一场同反革命力量的战争之中。这场战争不仅摧垮了经济基础，使交通和通讯几乎陷于瘫痪，还使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无序状态。反革命力量得到了主要资本主义政权的支持。他们称之为白军的军队不仅得到了财物支援，而且大部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府还派出武装军队去摧毁苏维埃政权。美国总统威尔逊在这场

战争中就派出了数千名美国士兵,并花费了纳税人数百万美元。但当时很少有美国人知道这些,因为这场战争和半个世纪以后的越南战争一样,是不宣而战的。被称为红军的布尔什维克军队虽然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是却经历了三年的艰苦战斗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马克思曾经认为,共产主义将会在已经实现工业化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工业基础上产生。然而俄国经济是由没落的封建主义和新生的资本主义所组成的前工业化混合体,它属于马克思所认为的那种不能支撑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类型。共产主义者们都赞同快速的工业化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虽然在这一点上意见相同,但在列宁死后的20世纪20年代晚期,却爆发了筹措工业化资金最有效方法是什么的争论。为了给制造资本品的工人提供吃穿,也为了给工厂和机械建设节省必需的物质资源,大量的剩余产品不得不为政府所挪用。如果把这部分剩余产品拿到西方国家的市场上出售,就可以购买到国外的资本品。由于苏联绝大多数劳动力都从事农业生产(其产量的大部分仅够维持农业部门自身的需要),因此很明显,大部分剩余都不得不自农业。但是苏联的经济学家和政治领导人在如何最好地挪用农业剩余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一派是以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为首的保守共产主义者。布哈林认为工业计划应该着眼于增加对农民所需的农业机械和生活资料的生产。应向农民高价购进谷物,低价售出生活资料和农业机械,使他们能够扩大生产,并能够到市场出售逐渐增加的剩余。布哈林认为,工业发展是受到农业生产增长率限制的。

另一派则由更激进的共产主义者组成。并以曾任红军总司令、在内战期间担任列宁主要助手的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和当时最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叶夫盖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Eugenii Preobrazhensky)为首。他们赞成通过向农民低价购进农产品,高价售出制成品以及向农业利润征收高税收的方法,从农业中最大化地抽取剩余。他们认为,通过将私人的小块土地合并成大规模集体农庄的方法,应当可以更有效地组织农业。为了将尽可能多的资源和劳动力投入重工业的快速扩张中,需要有意地忽略或者减少某些经济部门。当工业全面运转起来后,就可以有效地创造出资本,用于加紧发展那些在工业化初期被忽略的行业。

约瑟夫·斯大林(Josef Stalin)利用争论产生的敌对情绪为自己获取了权力。起初他与保守主义者结成同盟,把托洛茨基和他的左翼支持者们赶下台。接着,他又发起了对布哈林及其追随者们的攻击,并且成功地剥夺了他们的权力,使局势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斯大林凭借已经获取的权力开始推行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提倡的发展路线,并且他的行动比他们所主张的要更快也更猛。

在1929年11月,政府宣布了一项通过促进集体经济来增加农业生产的政策。起初,集体化是自发的。然而到了30年代早期,政府突然决定尽可能广泛地强制推行集体化,并且决定通过把富农财产交给集体的方式来消灭富农阶级。由此而引发的改变是影响深远的,而1929~1934年所发生的事件也构成了历史上极具戏剧性的一次事件。

能通过说服自愿加入集体经济的只有贫农,但是他们拥有的牲畜和资本品都太少,仅靠他们集体化根本无法获得成功。中农和富农都抵制这种带有苦难和残忍性质的强制性合作化。有时候,这种抵制的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几乎可以将其称之为第二次内战。当富农意识到他们不可能直接打败政府时,他们就开始烧毁房屋、毁坏设备、屠杀牲畜,到1931年,苏联共有三分之一的牲畜,二分之一的绵羊和山羊以及四分之一的马匹被屠宰一空。

对于集体化过程中的这种戏剧性斗争,很多书都有描述。我们有充分的依据认为,虽然这场集体化运动造就了巨大的社会成本,但它却实实在在地给苏联的农业带来了一场革命,并使得工业化成为可能。集体化的成功大幅增加了政府所征收到的谷物量。从1930~1931年的收成中所征收的2210万吨农作物,相当于政府在1928~1929年间征集到的两倍还要多。

当集体化运动使大量的经济剩余集中于政府之时,苏联的工业化在20世纪30年代一系列成功的五年计划基础上得以迅速发展。事实上,如此快速的工业增长是史无前例的。苏联的官方数字表明20世纪30年代工业产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6%。西方经济学家通过不同的工业产值指标体系,研究得出的增长率略低(大约在9%~14%之间)。但就估算出的任何一组数字而言,这种成绩都是空前的。

苏联所获得的主要成就不仅仅体现在很高的工业增长率上,还体现在整个社会的重大转型上,这种转型使得工业的增长能够持之以恒。在1928年以前,苏联的人口大部分都在农村;到了1938年,城市人口已经增加了三倍——人口从乡村稳定的流向城市,新观念也源源不断地从城市向乡村传播。在1928年以前,苏联有80%的人口是文盲;到了1938年,超过90%的人可以进行阅读和写作,同时还有大规模的成人教育运动,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接受了学校教育。换言之,苏联已经从1928年的一个欠发达国家转变为1938年的主要发达国家之一。这种惊人的增长率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在此期间苏联遭受了空前的损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杀害的苏联市民数目估计在2000万左右,甚至有些学者认为这个数字应高达3000万。在战争初期,希特勒迅速攻占了在战前拥有苏联一半生产能力的地区。德国人占领的地区中囊括了苏联70%的煤矿、60%的铁矿、50%的钢铁和33%的粮田。

苏联军队在撤退时,毁坏了很多生产设施,防止其为德国人所用。而当德国人后来被迫后退的时候,他们也推行了焦土政策,即撤退时毁坏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苏联的工厂和房屋遭受了相当严重的破坏。除了杀害了超过2000万的苏联人,德国人另外还摧毁了2500万人的家园,总共铲平了约2000个城镇和7000个村庄。

数以百万计的人口被杀害,房屋、工厂、数不清的牲畜、铁路、交通、通讯系统被毁坏,战争留给苏联的几乎完全是一个毁灭性的“胜利”。靠付出昂贵的社会成本和人力成本在20世纪30年代所获得的经济成就,大部分都因纳粹企图占领苏联而付之东流了。

尽管遭受了这些损失，苏联人依然保存了他们的经济组织和基本技能，以及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实施经济计划方面所获得的经验。他们以神奇般的速度恢复了元气。到1950年，不仅工业总产值超过了战前水平，农业产值也恢复到了战前水平。马克思曾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是构建共产主义惟一可能的基础，而苏联经济与之相比是非常不发达的。因此这种经济，无论是就其所在那个年代的表现来说，还是就其在更近期的表现来说，从严格意义上讲都不能用来检验建设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然而，这种快速的工业化对第三世界欠发达经济体而言，却具有着很大的示范效应。苏联工业化的速度是史无前例的。显然，对于那些正经历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规模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运动的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当考虑到工业化过程中需要克服的障碍时，苏联的经验就是关于如何在落后的国家实现工业化的一个理想范本。

## 大萧条

资本主义的捍卫者在这一历史时期非常担心苏联的工业化会给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提供榜样。并且，这种忧虑也因第二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发生而加剧，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在20世纪的前三十年间，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经历了几波经济周期。然而，这些周期中的萧条状态是相对轻微的，并且总的来说，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在这些年代里都是很繁荣的。

然而，这样一个持续繁荣的时期在20世纪30年代戛然而止。美国在经济陷入严重大萧条的1929~1932年期间，共有超过85 000家企业倒闭；超过5 000家银行停止经营；纽约交易所的股票价值从870亿美元跌落到190亿美元；1 200万工人失业，并且整整1/4的美国人无法维持生计；农场收入下降了一半之多；制造业的产出减少了将近50%。

大萧条首先冲击了美国但很快就扩散到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美国的实际收入指数从1929年的100下降到1931年的68。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也经历了类似的滑坡。在1932年，西欧的失业人数从300万上升到了史无前例的1 500万。在1932年的德国，43%的劳动力没有工作。世界贸易量急转直下，并且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一场充满着贫困、饥饿和对经济普遍感到绝望的危机。

这个时期所承受的经济困难比大部分战争和自然灾害所带来的都要严重。然而，自然资源还是像以前一样丰富；对从事生产充满渴望的劳动力也像以前一样多；工厂、商店和其他生产机构都像以前一样充足，准备随时投入运营；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和渴望仍然像以前一样强烈。问题在于当失业的工人们失去栖身之所，不能养活自己和家人时，自然资源、厂房、工具和机器却处于闲置状态。



相信自由市场可以自动调节的资本主义经济萎缩了,数百万人要么转向了右倾的纳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要么转向了左倾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只有少数热情洋溢的支持者。几乎每一个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赞同政府对市场进行广泛的干预。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之所以在该时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然而资本主义经济借助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从这种危险的状态恢复了过来。随着连续几年武器、军火以及与战争有关的物资的大幅持续增长,几乎每一个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都经历了政府对市场体系的大规模干预。以美国为例,1940年,相关的军事开支是32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2%;在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激烈的时期,军事开支几乎占据了国民生产总值的40%甚至更高。利润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资本家们开始意识到,大规模的军事支出可以如此之快地结束一场萧条,还可以保证他们的资本有高额的回报。

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新古典经济理论处于守势。我们看到,新古典经济理论包含着对资本主义三个基本思想的捍卫。第一个是看不见的手的观点,即自由的市场交换可以协调所有人的利益,产生“合理价格”,并且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所进行的大量福利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为后来批判福利经济学奠定了基础(见第14章)。这些研究把新古典主义者推到了辩护性的立场上。第二个思想信条是自由市场可以自动调节至充分就业均衡的新古典信条。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凯恩斯的著作已经引起了人们对这个命题的极度怀疑。第三个思想信条是,相信收入分配是由不同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所决定的,并且每个人得到的收入,都和自己所拥有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所创造出的价值相等。直到1959年,随着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的出版,这个命题才在理论上遭受了最致命的打击。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者而言,从来就没有说服力。在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大部分人贫困的悲惨遭遇与有钱精英们的富裕生活所产生的对比是如此强烈,以致于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一理论适用于这些经济体。这种思想因此就处于一种智力混乱(intellectual disarray)的状态,并且资本主义(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同时也在工业化国家中)陷入到其合法性受到质疑的严重危机之中。

新古典理论的先驱者——萨伊、西尼尔和巴斯夏——运用这些理论信条来支持极端自由放任的政策。这些先驱者们希望政府能够实施合同法和私有产权法,运用它的力量去保护那些已经存在的权利和财富不平等。而一旦这些存在的不平等受到了政府的强制性保护,自由市场中的交易就足以让他们继续存在下去。如果工人除了靠在市场上出卖劳动力谋生外没有其他的出路,并且如果让一群贫穷的失业工人为了获得部分工作岗位而始终处于竞争的状态(这在资本主义中确实是一种常态),那么自由市场就可以让大部分财富和权利集中到极少部分资本家阶层手里,并且使这种情况持之以恒。在资本主义的这些基本条件下,自由市场仅仅是一个金融屠宰场,在那里,富人是靠刹碎穷人来增加

他们的财富的。

新古典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一直进行着这三个方面的思想辩护。然而,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新古典经济学已经分裂为两个完全不同的(并且常常是敌对的)传统。这种分裂既是其所处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下的产物,又是回击针对新古典思想的批评意见的产物。这种分裂至少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经存在。苏联工业化、大萧条、冷战和第三世界的反帝运动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所带来的冲击,又大大加剧了这种分裂状况。

问题在于当新古典经济学继续为资本主义复杂的思想体系构建理论基石时,大部分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已经失去了对自由市场的信任,失去了对从这种理论推导出来的自由放任政策的信任。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经济理论中两个重要趋势快速发展的同时,这种信仰的流失已日趋明显。第一个发展趋势是对凯恩斯经济学迅速且几乎一致的接受,第二个发展趋势是在发展经济学这个新领域,大量的文献不断产生且呈爆炸性的增长。作为新生事物的凯恩斯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共同放弃了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信仰,并且都提倡政府采取对经济过程进行广泛深入干预的相关政策。

然而,对自由放任主义的新古典论证在整个时期都保持着重要的地位,它们一直都在捍卫最详尽的、表面上最科学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在这样一个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信任处于低潮的时期,自由放任的教条之所以依然能够存在,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例如在美国经济中,政府干预通常采用的形式,要么是各种各样的政府管制机构,要么就是在太空计划和军事支出上的“军事凯恩斯主义”。这些干预对资本主义各类企业的影响是不同的。管制机构通常采取以牺牲中小规模企业为代价的方式去保护并帮助巨大的垄断性厂商扩展权力。而从太空合同和军事合同中获得的巨大利润,源源不断地流向那些经济中最大最有能力的公司。并且,美国这个经济帝国从世界范围内所获取的利润也大致流向了那些最大最有能力的跨国公司。

对数以千计的中小规模资本主义企业而言,政府行为向经济领域的扩张已经逐渐削弱了它们与巨头公司竞争的能力。它们认为,即便自己能从政府扩张经济的活动获利,也只是获得微不足道的利益。对它们来说,更大的政府,只是意味着和大企业相比不断恶化的竞争环境、堆积如山的“繁文缛节”、官僚化的争论和不断增长的税收。控制中小企业的人热忱地支持一种极端保守的、自由放任的政治主张,即减少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角色的作用和规模。但是,控制大公司的人则往往在经济和政治主张上更偏向于“现实”或者“自由”。用美国人的政治术语和行话来说,更多政府行为的倡议往往和自由主义联系起来,而更少政府行为的倡议往往和保守主义联系起来。这两种政治倾向同时存在于民主党和共和党中,其经济基础主要是在企业界。

得到了工会官员支持的大公司,通常支持两党中的自由主义者;而得到独立职业者和其他中产阶层支持的小企业,通常支持两党中的保守主义者。在美国的政治里,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没有质疑或批判过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也就是说,他们都是相当保守

的,但各自也代表资产阶级中不同的——通常是对立的——阵营。

所有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里都存在着共同的线索,也正因为这点,尽管各自有所差别,他们仍可被称为“新古典学派”。这些共同线索是:(1)他们都捍卫私有产权的资本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所有的基础性制度,并简单地认为这些制度是天经地义的;(2)他们仍然认为,经济行为是独立的、自利的、计算效用最大化的个人的行为,或者是如凡勃伦所说的渴求幸福的“均质球体”;(3)他们都捍卫新古典理论的三个基本信条或与之相似的看法。因此,尽管各自有所不同,但他们对于个人和社会的总体看法继续反映着食利阶层的观念(见第10章的讨论)。

在本章剩下的篇幅中,我们将简要地回顾一下三位当代经济学理论大师的思想。他们都曾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且每一个人都对正统经济学有着深远的影响。W. 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是创造了发展经济学这一分支学科的主要推动者之一。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完全无视大萧条和对自由放任主义的新古典政策的信任危机,继续保持着那种对极端经济思想的热忱拥护。可能在这三个理论经济学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保罗·A. 萨缪尔森,他做了很多工作,使得新古典理论成为一种深奥的理论,并且只有那些受过高等训练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才能理解。最重要的是,他开创了成为当代经济学正统的新古典折衷主义,这是对传统的新古典思想与新凯恩斯主义和发展经济学之间近乎极端的分歧加以调和的产物。

### 阿瑟·刘易斯和发展经济学的起源

在1945年之前,几乎从没有人使用过“发展经济学”这样的提法。标准的看法是经济理论应当是普遍的,并且适用于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的任何经济体(见第12章凡勃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但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被那个时期的理论家们称之为“后发”(backward)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受到普遍关注,并作为经济学界一个研究领域而涌现大批著作。

在20世纪40年代的晚期,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第三世界国家将民族主义和反殖反帝相结合,爆发了大规模且影响深远的运动。随着联合国宪章宣布了殖民主义解放的目标。到1950年,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以色列都在名义上成为了独立的国家。而在50年代,这种获得名义上独立的趋势在柬埔寨、老挝、越南、马来西亚、利比亚、索马里、苏丹、摩洛哥、突尼斯、埃及、加纳、多哥兰、喀麦隆和几内亚有方兴未艾之势。当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不再普遍表现为露骨的殖民主义时,那些地方的反殖民主义民族浪潮仍然表现得像当初在亚洲和非洲的前殖民地上所发生的一样猛烈。

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公民反对种族主义和经济政治上的任何剥削,并认为这些行为对大部分国家的极端贫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我们日益清楚地看到,名义上的独立和事实上的独立不是一回事,经济剥削可以采用新的形式,由此所产生的巨大的障碍即使是没有阻止,至少也延缓了人们所渴望的独立进程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确信,仅依靠自由市场是不可能改善他们的状况的。苏联经济快速实现工业化的实例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此时,正统经济学的任务应该是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某种现实的方案,有计划地、有力地推动它们的工业化进程,使这些国家的人民有希望达到更高的生活水平;同时,也要保证这些国家拥有必要的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和行政制度,确保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安全且有利可图。

W. 阿瑟·刘易斯通过一系列的论文和著述为这个任务构筑了必要的理论框架,其中最著名的是1954年发表的名为《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和1955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理论》<sup>1</sup>一书。刘易斯从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眼中的共识开始:工业化需要对经济的生产能力进行重新定位。在经济中应当用生产资料的生产,例如工厂、机器和工具,来替代生活资料的生产,例如食物、帐篷、衣服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换言之,通过强制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只依靠更少的物质供给生活,来提高除去必要消费品之后的经济剩余。

在英国这个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典型国家中,因上层阶级的贪婪本性而无情地掠夺并加强给城乡工人阶级的剥削,已被众多历史学家记载无遗。而在苏联则恰恰相反,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工人阶级固然在承受痛苦,然而工业化所需的经济剩余,大部分都是靠剥夺资产阶级和富有地主阶层的财产和大量收入而获得的。

而在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中,农民和工人阶级处境悲惨,因为他们生产出的大量经济剩余都为本土精英和外国资本家所瓜分。但问题是,虽然外国资本家通过控制农业和资源采掘业获取了大量的利润,但是他们似乎并没有兴趣花费任何利润来提高这些国家其他经济部门的工业化建设。而本地的精英阶层则通常秉承“前资本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观念,更多的是在模仿封建领主而非工业资本家。因此,一方面工人阶级已在遭受最大可能的剥削,另一方面经济剩余的获取者们却从来没有使用经济剩余去实现普遍的工业化,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苏联模式在这个时期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

然而,刘易斯使得争论的焦点发生改变。他认为,在近乎实现充分就业的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中,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是正确的,并且工人的工资可以反映他们的边际生产力。但在第三世界经济中,资本主义发展不完全,工资也不是由边际生产力决定,而是根据社会习俗决定:“在大部分人是农民的经济中……[资本主义雇主]对劳动力的最小雇佣量是由农民的平均产品决定的。”<sup>2</sup>刘易斯相信,虽然“这种传统部门的生存收入给资本部门的工资规定了一个下限,但是在实际情况中,资本部门的工资比传统部门的要高,

通常资本部门的工资和传统部门的生存收入之间有 30% 或者更大的差距。”<sup>3</sup>

在刘易斯看来,第三世界国家贫困的原因在于资本的短缺,因为大部分工人都在传统部门工作,而这些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是“可忽略的,为零的,甚至为负的”<sup>4</sup>。刘易斯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他把那些不替资本家工作的工人定义为“非生产性的”。在承认马克思所指出的古典经济学家所犯基本错误的同时,刘易斯又混淆了已经生产出的(或可再生产的)生产资料与资本的概念。生产资料是为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人们所使用的,而资本则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出现而产生的,因此不能将资本等同于所有已生产出的生产资料。这一混淆几乎影响了所有资本主义思想的捍卫者。刘易斯表示,当他宣称不替资本家工作的劳动者是非生产性时,他是严格站在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

传统部门是……经济中不使用再生产性资本的那部分。因为没有资本的推动,这个部门的人均产出要比资本主义部门的低……随着可用资本越来越多,从传统部门被吸引到资本主义部门的工人也就越来越多,并且他们的人均产出会随着他们从一个部门流向另一个部门而增加。<sup>5</sup>

问题然后就变得简单了。第三世界国家需要更多的储蓄来转化成投资,用资本来吸引非生产性的工人。在传统部门中,这些工人的边际生产力是“可忽略的,等于零或者为负”的;而在资本主义部门,他们的边际生产力将会高得多。并且随着劳动力从传统部门流向资本主义部门,他们将会增加经济的产出,最终增加每个人的经济福利。

这些国家最基本的问题是低储蓄。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的增加来自资本家除利润外的储蓄;在一个不发达的经济中,储蓄对国民收入来说相对较低,原因并不在于人们很穷,而在于资本家的利润相对国民收入较低。随着资本主义部门的扩张,利润会相应地增加,并且国民收入中用于再投资的比例也会增加。<sup>6</sup>

问题就在于要增加马克思所说的“原始积累”,也就是说,扩大被资本控制的部门,减少并最终消灭掉传统经济。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这成为了发展经济学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几乎每一个正统的发展经济学家都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并且为了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蔓延,几乎每一个发展经济学家都提倡把广泛的政府干预——既包括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政府也包括第一世界的政府——作为解决问题的惟一方法。

这种反共情结统治着大部分的发展经济学说。这点可从当时几乎任何一篇重要的研究文章中看出。看得最清楚的可能是沃尔特·W. 罗斯托(Walt W. Rostow)的著作。他发表于 1960 年的《经济发展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无疑是保守的发展经济学家在 20 世纪 60 年代所写的最有影响力的书。在 1983 年的著作里,罗斯托回顾了他的反共生涯。他曾经认为,“若要阻止和牵制不断膨胀的共产主义力量的推进,这样的斗争将是长期的,

并且需要新的观念来巩固美国的外交政策”。<sup>7</sup>他也坦率地承认,他对共产主义思想攻击曾得到美国中情局财力上的支持。<sup>8</sup>当然,这种坦率在保守的经济学家中是十分罕见的。

当发展经济学像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一样,看似放弃了新古典自由放任的保守主义时,大部分发展经济学家却都认为这样的状况只是暂时的。一旦这些第三世界的经济体完全融入资本主义体系,那么新古典主义将成为完全适用的理论。

## 自由的和保守的新古典经济学

从19世纪晚期到现在,自由派和保守派在新古典主义的思想传统上就一直存在着分歧。这些术语有时候会出现混淆,因为在19世纪,自由放任主义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而今天对自由放任主义的更极端的宣扬则被称为保守主义。那些调和了自己的分析,并提倡通过政府干预去纠正市场不完全或市场失灵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现在则被称为自由主义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二十年里,新古典主义的两个分支在鼓吹某种政策方面表现出了相同的热情。这种政策致力于摧毁在任何地方存在的共产主义,阻止第三世界的经济体进行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试验。因此,即使是拥护自由放任政策的最保守的人,都支持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和推行侵略性的外交政策。

然而,保守主义者们没有受到大萧条多少影响。他们依然坚持着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信仰。但是,自由主义者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却存在很大的保留。他们认为,有四个需要通过政府的积极干预来提高国民经济福利的基本领域,凯恩斯所看到的资本主义内在不稳定,仅是其中的一个。自由主义者相信,依靠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资本主义即使不能排除这种内在的不稳定性,也一定能够缓解它。

第二,自由主义者们意识到经济中那些强大的巨头公司,如果放任不管,将不会按完全竞争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去行动。自由主义者相信,政府的反托拉斯法和管理机构可以强迫这些巨头们按有利于公众利益的方式去行事。所以,在政府的小小帮助下,看不见的手基本上仍可实现它仁慈的、创造和谐的目标。

第三,自由主义者们意识到部分商品是由“社会消费的”,并且即使私人资本家不能在这类商品的生产上盈利,依然存在着对这类商品的需求。他们再次相信政府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政府能够生产并分配这些商品,使得社会的总福利最大化。

第四,自由主义者认识到“外部性”(见第14章)会导致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包括污染的成本)不一致。他们认为,通过一系列的税收和补贴使得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政府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不仅提倡极端的自由放

任主义,还热情的支持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政府成为一个解围人,使得自由主义者在承认新古典理论的大部分反对意见有其合理性的同时,依然可以捍卫新古典主义的三个基本思想信条。他们承认,单靠看不见的手是不够的,针对自由放任的诸多反对意见,他们似乎洗耳恭听,实际上最终还是要捍卫新古典主义的三个基本思想信条。他们作出了含糊不清的结论,尽管“看不见的手”有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拳”(visible fist)帮助,但它并不是完美的,而在人类现有的知识水平里已趋于完美。只要我们继续 19 世纪的改革,这些依然存在的困难看上去是可以解决的。

### 保罗·A. 萨缪尔森、米尔顿·弗里德曼 以及保守的新古典主义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和保守传统产生最大影响的两位经济学家分别是保罗·A. 萨缪尔森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其中,萨缪尔森的影响超出了当时所有其他经济学家。由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当时的经济学学术领域占据着主流地位,而萨缪尔森的思想又主导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和传播进程。因此,他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

弗里德曼对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极端自由放任主义虽然影响很大,但并不如萨缪尔森对自由主义传统所产生的影响那么具有决定性。因此,我们将萨缪尔森作为当代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惟一代表,并在下一节中具体讨论他的理论思想。紧接其后,我们也将讨论弗里德曼以及其他极端自由主义倡导者的主要思想。

令人惊讶的是,萨缪尔森与保守的新古典主义者之间的关系与 19 世纪中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弗雷德里克·巴斯夏(见第 8 章的讨论)之间的关系出奇地相似。萨缪尔森同穆勒一样是个折衷主义者,这种立场既是他成功的主要原因,同时也为其理论缺陷埋下了伏笔。萨缪尔森和穆勒一样有着温文尔雅、灵活多变且不墨守成规的性格,经常会对许多针对新古典主义的批判和反对意见加以思考,并承认其合理性。当人们接触到萨缪尔森的思想时,就好像看到了穆勒的思想。他们都希望资本主义体系变得比现实中的更加人性化,都会毫不迟疑地承认现实中许多不平等现象都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甚至都信奉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需要进行逐步的、渐进的改革。撇开萨缪尔森思想中的折衷主义不谈,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新古典思想使功利主义经济学的三大主要思想信条成功地获得了人们的广泛认同。

与萨缪尔森相反的是,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家则一心一意地继承了巴斯夏对效用主义辩护的态度。因此,他们所写的文章和巴斯夏的一样显得僵化,且带着教条主义的色彩。他们只是简单地反对与自己理论不符的事实,在承认资本主义现实以及新古典主义

理论的难题时,不能表现得像萨缪尔森一样灵活和开放。但是就像巴斯夏一样,虽然不如穆勒有天赋,但对隐含在功利主义前提下的结论的捍卫,却显得比穆勒更具逻辑一致性。坚信自由放任的保守的新古典主义经济者与萨缪尔森相比,在理论阐释方面有着更清晰的思路,并且在逻辑上更能保持一致性。

### 萨缪尔森对功利主义的辩护

萨缪尔森在年轻的时候,就在其著作《经济分析基础》中,对散乱的新古典主义思想加以系统化,并引入了数学公式。<sup>9</sup>这在经济学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是这本书的贡献,使他在1947年获得了美国经济协会(AEA)颁发的第一个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这个奖项是专门为那些在40岁前就为经济理论做出巨大贡献的最杰出的经济学家设置的。也正是这本书,为他获得197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萨缪尔森对经济学领域最大的贡献还是在于他所撰写的教科书《经济学》。自1948年首印以来,该书已重版了17次(最近的几版是与威廉姆斯·诺德豪斯合著的),并已被翻译成世界上各种主要语言,售出了几百万册。萨缪尔森《经济学》的第一版主要是为了深入浅出地解释凯恩斯的理论。但是正如我们在本书第15章中所看到的,凯恩斯这位新古典经济学家只是想让功利主义摆脱对市场自我调节能力的盲目迷信,而萨缪尔森则非常成功地实现了他的愿望和意图。在接下来的每个版本中,萨缪尔森都试图在书中加入更多关于资本主义的传统新古典理论。在1955年,萨缪尔森终于完成了将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相融合的“伟大的新古典综合”。在这种综合中,凯恩斯的理论提供了保持充分就业经济所必需的知识 and 市场体系在凯恩斯理论框架下,是如何根据新古典理论中古老原则来分配资源和收入的。

萨缪尔森像大多数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样,清醒地认识到自由放任的思想至少在四个领域中是不完善的:(1)以自由市场为特征的资本主义体系具有内在不稳定性;(2)寡头垄断和垄断的存在使得竞争具有效率的这一新古典观点完全不切实际;(3)存在着公共产品,这种产品是由全社会共同消费的,如果只由个人生产则是无效率的;(4)普遍存在着与公共产品密切相关的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问题。经济个体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会受到许多自身所无法控制的生产和消费行为的影响。但是,萨缪尔森认为这四个方面的问题不会削弱人们对新古典主义思想的信任。

第一,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是不稳定的。但是萨缪尔森认为政府的扩张,已经创造出一种“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个看得见的拳所组成的混合经济”。这种混合经济虽然不能完全消除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但至少已经让这种缺陷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且能够为人们所接受。



即使经济周期没有完全成为过去式,但它至少受到了控制。虽然民主制度下的混合经济很可能永远不会再度经历老式的、持续性的萧条。然而,衰退和相对停滞的时期无疑仍会到来,即便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缓和他们的频率、强度和期限。<sup>10</sup>

于是,萨伊定律中的一些观点因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变得可以接受,并且能够继续维持下去。

第二,萨缪尔森也意识到强大的垄断性厂商的存在。他在书中写道:“在评价寡头时,我们必须看到,公司为他们已经投入的资本谋取丰厚利润的欲望有时与消费者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sup>11</sup>正像我们所希望的,他要让读者确信“政府调节和国家的反托拉斯法是混合经济用以改善价格体系发挥作用的主要武器”。<sup>12</sup>所以在对功利主义的自由放任信条的第二点进行论证时,他总结道:

我们不能希望竞争在每一个地方都像经济学者所严格规定的那样“绝对的完全”。但是,我们应该争取的是,如已故的 J. M. 克拉克在很多年前说过的“有效竞争”。……但是,我们不能依赖自由放任做到这一点。公众的觉醒和对反托拉斯法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sup>13</sup>

因此关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第二个异议,也因为政府这个“解围人”而再次得到排除。同时,某种被称为“有效竞争”的东西也因为“公众的觉醒”和政府的干预而实现。

第三,萨缪尔森意识到了“公共产品”的存在。这类产品为全社会所需要,但若由资本家生产销售却无利可图。他在书中写道,在混合经济中,人们可以通过“在选举日去投票,也可以从遵守政府的强制性法令中,而未必会从我们日常的个人购买中”<sup>14</sup>表现出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从而,公正的、仁慈的政府再次拯救了功利主义。

第四,萨缪尔森也从未忽略过这样的事实,即消费和生产行为会对那些没有直接参与这些行为的人们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些外部性引起了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谓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异。正如我们在第 14 章中看到的,存在的这种差异越大,就越不能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产生合理的价格,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我们也同样不能做出其他方面的判断)。毫不奇怪,萨缪尔森接着又提出“由于创造利润的个人既没有动机又没有力量去解决这类‘外部经济’的问题,所以显然,政府应当进行某种干预”。<sup>15</sup>再一次,政府这位好心的“解围人”使经济恢复到了一个人们乐于接受的状态——充分接近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所谓的“最优点”(见第 14 章)。而它通过使用“补贴或公共管理的办法来增加产生正外部经济效应的活动,用赋税或制定法令的办法来减少产生负外部经济效应的活动。”<sup>16</sup>当然,萨缪尔森并没有告诉读者,他所提出的这些措施将毫不夸张地要涉及数以百万计的不同种税收和补贴,就像我们在第 14 章中已经了解到的一样。萨缪尔森单纯地相信政府有能力也将会创造出一种尽可能接近于“帕雷托最优点”的经济状态。

在意识到政府必须无数次地干预经济,并且相信资本主义政府拥有不偏不倚的仁慈

之后,萨缪尔森又为以其他形式表述的新古典主义三个基本信条进行了辩护。

首先,众所周知,在颇具洞察力的凯恩斯理论指导下,政府能够引导市场达到一种基本接近于自动充分就业的状态。

第二,随着政府对市场进行无数次分散的、善意的干预,一种接近于帕累托最优的合理价格和资源有效配置的经济状态能够实现。萨缪尔森这样写道:

亚当·斯密说,“看不见的手”会使每个人的自私自利的行为趋向于一个非常一致的最终结果,他的话确实有道理。斯密从来未能准确地说出或证明道理在哪里,但是,现代经济学可以把理想的竞争性价格的这一性质述之如下:处于完善的完全竞争之下,当一切的价格最终等于一切的边际成本时,当一切生产要素的价格最终等于其边际产品价值而一切的总成本均到达最低点时,以及当个人的真正欲望和福利都被以他们的货币选票所表示的边际效用代表时——那么,由此而造成的均衡具有“除去损害别人利益以外无法改善任何人的境况”这一有效率的性质。

这段话的准确含义是什么呢?它意味着一个组织者不能沿着放任其事的规则去行事,去发现一种不同于自由放任且能够改善每个人福利的解决方案。<sup>17</sup>

但是萨缪尔森并没有坚持认为自由市场能够自发地实现良性和谐的最优化状态。他认为这需要好心的“解围人”——政府的协助。读者可以通过回顾本书第14章中关于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基本假设的讨论,看到这些假设不仅与现实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差异,而且充满了疑点。然后,再来判断萨缪尔森的“解围人”能否胜任这份工作(或者即使它能够理想的完成这份工作)。在《经济学》一书的前面部分,当萨缪尔森还未讨论到政府的善意行为能尽可能地修正各种对完全竞争状态的偏离时,他写道:

不用说,纯粹的完全竞争条件和物理学上钟摆完全无阻力的条件一样是难以满足的。我们能够逐步地趋近于完全,但永远不能达到它。然而,这种事实未必使这个理想化概念的有用性受到严重的损害……

可以肯定,在今天,不是所有的市场都能接近于经济学家所说的完全竞争市场,我们将在以后看到……垄断的力量或市场不完全性等因素会掺杂进来,而这些不完全性要求我们修正竞争的模式。当学会如何处理这些情况之后,我们会认识到加上适当条件限制的竞争分析,对于理解现实而言,依然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工具。<sup>18</sup>

新古典主义学说的第三大信条是关于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的。而萨缪尔森公然退出这个问题的激烈讨论(见第16章),则表明了他已经抛弃这个理论。像弗格森一样,萨缪尔森还是坚信他那“童话般”、“寓言式”的理论能够深入地说明资本主义的本质。因此,他告诉读者“资本的需求曲线是它的净生产率曲线”。<sup>19</sup>同样的,对于所有要素的需求也取决于各种要素的生产率。而资本家“将要使用越来越多……[任何要素],直到它产品的边际

收益等于它的市场租金为止”。<sup>20</sup>

由于“公正感”和折衷主义作祟,萨缪尔森在两页附录中对技术的再转换进行了简要的讨论。<sup>21</sup>附录的结尾,他给出了一个使这个问题复杂化、模糊化的说法:“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还不具备实际的材料来判断,现实世界究竟更加接近于下列两种理想的且是完全相反情况中的哪一种:(a)新古典学派的寓言,(b)简单再转换模型。”<sup>22</sup>

这种说法是在故意混淆视听,原因有两点:第一,如前所述,萨缪尔森亲口承认的再转换争论表明,在很多例子里(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具有普遍性的例子),在定义不同的生产技术中哪一种更趋向于资本密集型时,缺少一种能保持逻辑一致性的方法。这意味着,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表明“资本更密集”会产生新古典“寓言”所预示的结果。事实上,萨缪尔森在其未为人熟知的期刊论文中已经承认了这点,但在那本影响着上百万人的《经济学》中,他却持否定的态度。萨缪尔森试图混淆的第二个问题是,他并没有向读者说明再转换论证已完全破坏了新古典主义寓言的根基和那些在“看不见的手”的争论中最具有新古典主义色彩的观点,然而他却曾在其期刊文章里予以公开承认。

然而,毋庸置疑,萨缪尔森对最显而易见的现实的混淆,源于他对政府作用的认识。他始终认为政府作为一个善意的、中立的“解围人”,能够以一种尽管不完美、但人们可以接受的方式修正所有对竞争性最优状态的偏离。他既没有论述政府本应管制寡头垄断厂商、但事实上却普遍增加了这些厂商的部门利益这一事实,也没有提及在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的政策实施中,霸权主义和军事主义已经成为主要工具,而这使得发生危机的可能性不断加强,并且这些危机将比政府机构已经避免的那些危机更加严重;另外,政府从未试图通过一系列补贴和征税的方式来公平的消除外部性问题这一现实,也为萨缪尔森所忽略;当然,他选择闭口不提的问题远不止这么多。最后仍要提到的是,甚至连政府几乎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去明显减轻收入和财富严重不平等现象的事实,萨缪尔森都加以回避。

所有的这些缺陷,体现了新古典自由主义缺陷的症结之所在——他们对于资本主义体系中政府性质的看法。这些缺陷和这种对政府的错误定义掩盖了隐藏在自由主义分析下的极端保守主义。我们可以用上文提到的最后一个缺陷来作为例证——即关于政府能否促进财富和收入公平分配的实现这一论题。

综观《经济学》一书,萨缪尔森虽然通过宣称“市场的有效性”来反复证明他对市场的热情称颂,但事实上却忽略了关于财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这一问题。而且,萨缪尔森也一直没有向读者解释,这种不公平是如何全面颠覆了自由市场有效性的规范意义的——尽管千方百计地捍卫市场有效性的概念,这和我们在第14章中所提及的观点有所不同。此外,萨缪尔森也从未正式推荐过任何能具体有效地重新分配财富、权力和收入的措施和方法。相反,他只是重申了他的信念:“当一个民主社会不赞成在自由放任条件下用货币选票进行分配时,它可以用再分配性质的税收来改正这一情况。”<sup>23</sup>人们也许要问,政府何时才能以某种系统的、卓有成效的方法去实现这一目标?答案是遥遥无期。

但也许人们还会问,萨缪尔森是否意识到这种不公平仅仅是因为财富(尤其是生产资料)被少部分人独占,而这部分人仅靠收取他们资产的利息就可以积聚丰厚的收入?另一方面,只有当大部分从事生产的人没有足以维持他们自身消费的收入或者缺乏能够控制生产的资金时,他们才会被迫将他们生产所得的很大一部分以利息的形式支付给这些垄断财富的所有者。而萨缪尔森却完全忽略了这些资本主义的基本现实。

以“利率的公平性和不可避免性”为标题《经济学》一书章节中,萨缪尔森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利息是不是因为得到了某种有价值的服务而要给予个人公平的支付?他的答案如下:

我们做出合乎事实的假设:当我从你那里借钱时,我的目的不是把现款保存起来,而是用现款来购买资本货物。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些中间性的资本货物是如此的稀缺,以致在它们自己的重置成本之外还创造出一定的净产品。因此,如果我不支付给你利息,那么,我便是真正地欺骗了你,因为,如果你自己把这笔钱直接投资于这种生产性的投资项目,你也会得到同样的收益。<sup>24</sup>

真的是公平的吗?当透过自由主义冗长的措辞,我们可以看到,萨缪尔森并没有讨论生产手段的阶级垄断,也没有解释他为什么要隐瞒“再转换论证”的重要性——这就使得他能够为资本主义社会下收入的阶级分配进行辩护,认为它是公平的。总的说来,萨缪尔森对所有权收入的思想的辩护,与萨伊、西尼尔、巴斯夏、克拉克以及保守的新古典主义者的普遍做法,并无本质不同。

## 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

西尼尔和巴斯夏的思想在当代的继承者和代表者是一群宣扬极端自由放任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群经济学家真正代表的是两支相互独立、但思想上却又相近的流派——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奥地利学派的奠基人可以追溯到卡尔·门格尔(见第10章)。门格尔极端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是奥地利学派理论的社会哲学基础。

虽然门格尔的第一代门徒中有不少社会变革家和保守主义者,但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传统中的极端保守主义本质却更像是门格尔第二代门徒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弗里德里奇·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的思想产物。有趣的是,这两个人都曾在芝加哥大学从事过一段时间的教学。而同样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多年的弗兰克·H. 奈特(Frank H. Knight)则对芝加哥学派的形成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在芝加哥学派过去几任继承者中,米尔顿·弗里德曼是最具影响力的一位,他于1976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将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区分开来的原因是,虽然两者都强调交易的普遍有益性,宣扬极端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的教条,但他们在方法论上还是有着一定的区别。通常,奥地利学派的经济理论崇尚理性主义方法,而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他的追随者们则大多推崇经验主义方法。尽管目前在经济学学术领域,人们时常会听到极端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对自由放任的传统鼓舌如簧,并通常都会把这些言论归之于“芝加哥学派”。但如果以方法论为标准的话,把当代新古典学派大体分为奥地利学派和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芝加哥学派两股力量也许会更恰如其分。当然,我们认为这种方法论上的差异并不是特别显著,<sup>25</sup>因此我们将把这些极端自由放任思想的当代宣扬者放在一起予以讨论。

这两个学派最耳熟能详的言论之一,就是声称他们的理论是纯粹的、价值中立的、不包含任何规范性判断的科学。这和西尼尔以及巴斯夏所宣扬的如出一辙。例如,弗里德曼就曾表示,“从原则上讲,经济学中是没有价值判断的”。<sup>26</sup>同样,理查德·麦肯齐和戈登·塔洛克(Richard McKenzie & Gordon Tullock)也曾写道:“经济学家所采用的方法应该是非道德性的,经济学所考虑的不是应该是什么……而是了解人们为什么这么做。”<sup>27</sup>他们还辩解说他们的“分析完全(尽可能)摒弃了我们个人的价值判断”。<sup>28</sup>阿门·阿尔钦(Armen Alchain)和威廉姆·艾伦(William Allen),在从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观点出发所撰写的一本被广泛使用的教科书中也提到“经济学理论是‘明确的’或者说是‘非规范性的’”。<sup>29</sup>

这些学派不仅声称他们的理论是纯粹的、非价值取向的科学,而且还宣扬只有他们的理论才堪称为“经济学”,并且在任何时候、任何社会体系,对任何人都适用。比如麦肯齐和塔洛克就曾在他们著作的导言中声称:“事实上,判定一个人是不是经济学家要看他们(从书里面反映出)的思维过程或心智技能。”<sup>30</sup>这些学派的信徒们所表现的谦虚,只局限于他们的理论所声称的范围,因为他们声称其理论是“经济理论的核心,适用于所有的经济制度和国家”。<sup>31</sup>

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宣称要构建一种非价值取向的经济理论来解释在任何时点、任何社会经济中所有人的行为。我们建议读者在被这番豪言壮语吓倒之前,先仔细揣摩一下琼·罗宾逊(她在摒弃新古典主义之前,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之前,曾为新古典理论作出过许多独创性的贡献,无可否认地充实了自由主义理论)以下的论述:

社会科学中存在着大量令人迷惑的有关“价值判断”的争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意识形态、道德观念和政治立场。试图假装自己没有任何价值判断,并且是十分客观的行为,注定只能自欺欺人或者仅仅是蒙骗他人的伎俩。一个坦白的作者会清楚表明他的先入之见,并且容许那些无法接受这些观点的读者对之不予理睬。这种态度关系到一个科学家的职业操守。<sup>32</sup>

阅读过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文献会发现,他们所研究的和西尼尔、巴斯夏以及门格尔所研究的所谓无价值取向并无不同。事实表明,价值观不仅成为极端保守主义、功利主义以及自由放任主义的基石,更是形成了这两个学派的理论依据。这些学派的文献可以运用巴斯夏理论中的边际最大化微分形式准确地表述出来。

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通常不会遇到上文提到的四个麻烦问题。新古典自由主义者相信,竞争性的自由放任理论并不能针对这四个问题予以现实合理的解释。因此,与自由主义学派不同,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在保护现存的市场体系力量(也就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和契约的执行)之外,基本看不到关于合理的扩展政府行为边界的理由。他们把人类所有的行为都归结为交换行为。正如马克思在评论巴斯夏和这些学派的其他先驱时所指出的,如果一个人只关注交换行为的话,那么他很容易就陷入到这样一种幻觉中: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的权力——包括自由、平等、财产和边沁主义——名副其实的“伊甸园”(见第9章中关于马克思的引文)。

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概述了新古典自由学派针对极端自由放任的四点反对意见。

第一,他们坚信萨伊定律中关于市场自发性的观点。他们轻易地断言在资本主义中所观察到的不稳定性完全是因为政府的过度干预造成的。因此,弗里德曼写道:“事实上,那次经济大萧条像其他大多数时期的严重失业一样,是由于政府的管理不当造成的,而非源于私有制经济的任何内在不稳定性。”<sup>33</sup>

第二,他们轻易地否认了巨型公司通常会产生强大的且影响日盛的垄断势力。弗里德曼再次写道:“关于企业垄断最重要的事实在于,从经济整体的角度来看,它们是相对不重要的。”<sup>34</sup>而且小规模微不足道的垄断势力的存在绝对不是资本家的行为所引起的。他还向读者保证,私人资本家想要确保垄断势力的任何尝试“一般都是不稳定的,而且在时间上是短暂的,除非它们能够获取政府的支持”。<sup>35</sup>因此,是政府而不是资本家,再一次成了罪魁祸首(即使它们的恶行并不严重):“垄断力量最主要的来源或许出自于政府直接和间接的援助。”<sup>36</sup>

第三,这两个学派认为,由社会公众共同合法消费且应由政府提供的惟一产品是国防。“我和你开出的国防开支数额不同,但我们都得不到我们所期待的数额。”<sup>37</sup>只有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政府才能为我们提供防卫。而在其他绝大部分情况下,“政府的干预都直接限制了个人自由的范围”。<sup>38</sup>因此干预是不必要的。

第四,我们已讨论过了这两个学派对外部性问题所做出的回应(见第14章)。他们的答案是设立关于污染方面的产权,再建立一个自由的产权交易市场。我们看到这种想法是建立在这两个学派个人主义信念基础之上的。他们认为外部性仅仅是空中楼阁。一旦人们意识到,在事实上个人是能够任意产生外部性的(因为在现实中,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化的、有着相互联系的世界里,而不是上百万个独立的个人组成的世界),那么他就会看

到这两个学派的建议毫无疑问地会将自由市场变成一只“看不见的脚”，自发地使人们的痛苦最大化(见第14章)。

可见，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没有理会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所关心的所有问题，而是在一味的宣扬极端自由放任的学说。例如，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米尔顿·弗里德曼就宣称要废除：(1)公司税(2)累进所得税(3)免费的公共教育(4)社会保障(5)政府对食物药品的安全管制(6)医生和牙医的资格认证(7)邮政行业的寡头垄断(8)政府对自然灾害的救助(9)最低工资法(10)高利贷发放者收取利息率的上限(11)禁止贩卖海洛因的法律，以及除了实施产权法、契约法和提供国防之外的所有其他形式的政府干预。这些都是巴斯夏的那些聪明追随者们所得出的有关无价值取向的科学的结论。他们相信，“看不见的手”可以理性且有效地完成任何事，并且最大地保证自由。

虽然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大部分思想家都抛弃了“再转换论证”中具有毁灭性的结论(见第16章)，但这却支付了巨大的理论成本：他们不得不否认资本主义的存在。用他们的观点来看，不存在一种被称为资本的普遍东西，因此，他们无需计算资本的生产力。而掩盖劳动与资本之间差异的全过程是从萨伊、西尼尔和巴斯夏开始，最终经由这两个学派完成。在他们的理论中没有劳动者和资本家，只有参与交换的个人。比如，阿尔钦和艾伦(Alchian and Allen)就认为：“每个人……都是资本品的一种形式，并且几乎每个物质产品都是劳动的一种形式。从某种程度上说，某人用于制造这一资本品的劳动的价格就与该资本品的价格一样。”<sup>39</sup>

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全面且一致地发展出了一种功利主义的社会观，即认为每一个人或家庭都是能使交换最大化的、自发的、精于计算的理性人。根据弗里德曼的说法：

在由自愿交换组成的社会中，由许多单位自由交换所组成的经济构成了一个发生作用的模型——即我们一向称之为竞争的资本主义。以它最简单的形式而论，这类社会包含着许多独立的家庭——好像是许多不同的鲁宾逊。每个家庭利用他所控制的资源来生产物品和劳务并与其他家庭所生产的物品和劳务进行交换，而这种交换是根据双方的意愿进行的。<sup>40</sup>

多么有趣且美好啊！每个独立的家庭就像是一个由家庭开办的小型工厂。没有资本家，没有工人——只有家庭中的个人通过交换使得自身的效用最大化。没有工人罢工，没有业主为抵制工人的要求而停工，没有冲突，只有和谐的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个人。

那么，什么是利息率呢？根据这两个学派的理论，利息率仅仅是支配交换的价格。个人在某一时刻进行交易，却在之后交换商品。也就是说，他们现时买卖的商品，却在未来发生实际的商品交割。而利息率是用来对以下两种数量值进行衡量(它们在均衡中是相等的)：一是衡量个人关于现时消费和未来消费的主观偏好，二是衡量商品如果现

在不被消费而可以随着时间升值的客观能力(这简直不可思议)。这样看来,人们根本没有必要加总资本,因为根据该学派的观点,要么所有东西都是资本,要么根本就不存在资本。

巴斯夏的名言“政治经济学就是交换”,在这种理论中被演绎到逻辑极限:所有人类的行为和相互作用都被简化为简单的、理性的、以效用最大化为目的的交换行为。根据他们的理论定义和假设,世界永远处于帕累托最优的状态,任何事物都是理性且有效率的。

这种将所有的人类行为和相互作用都简化为简单的交换行为,源起于这些学派对厂商和生产过程所下的定义。关于利息理论最权威的版本则来自于赫斯雷夫(Hirshleifer)的《投资、利息和资本》。此书首先从上天(或者可能是马尔萨斯所说的人生际遇)给予每个人一份初始禀赋(initial endowment)开始。所谓“初始禀赋”,即“作为最优选择起点的一揽子商品(这个出发点是多么的方便啊!)”。<sup>41</sup>然后,个人要么通过将自己初始禀赋所拥有的物品直接与其他力图实现最大化的交换者相交换,要么通过自己亲自生产,来达到自身效用最大化——或者使自己达到最优的状态。

厂商被定义为“由一个或多个人组成的专门从事生产行为的小组(通过与自然打交道而不是通过与其他经济机构交换来影响商品组合的转换)”。<sup>42</sup>因此,新古典理论的两个主要分支——消费理论和生产理论——消费理论仅仅涉及个人之间的交换,而“生产理论则是与自然‘相交换’”。<sup>43</sup>所以,所有经济活动仅仅是不同的交换行为。正如我们在本书中多次看到的,功利主义经济学最“深刻”的思想完全存在于下述观察现象之中:如果交换是自愿的,参与交换的双方一定全体受益且和谐共处。当然,这个理论完全忽视了资本主义体系是怎样创造出这样一种状态的,忽视了一些交换者拥有强大的讨价还价能力(对全社会有用的事情却做得很少),而其他交换者则只能以一种无能为力甚至绝望的处境为起点开始交换。但是,给定一个“初始禀赋”——功利主义经济学中一个多么神奇的概念——交换双方都能获益;那就是,在任何工作环境中,为任何一种工资水平工作都会比挨饿强。在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关于资本和利息的讨论中,所有的物品都被赋予了现期价值和未来价值:工资率(付给现在或者将来的劳动)同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一样也是一种价格形式。投资仅仅是与自然或其他交换者,进行现有商品与未来商品之间的交换。利率也仅仅是现在商品和未来商品价格比率中的一个因素。资本也仅被定义为所有未来消费品的现值(它们的未来价值除了要以利息率来贴现外,还与从现在到未来消费时点之间的时间长短有关)。因此,根据定义,每个人都必然拥有资本(如果他或她将在未来消费商品)。而且由于每个人都能进行相同的跨期的和自身效用最大化的交换,他们每个人都成了资本家。

新古典主义批评家 D. M. 纽第(D. M. Nuti)对这一理论的实质做出了很好的描述:

该种思想的局限性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生产是与自然进行交换”,生产性投资被当作是一种发生在未来的与自然进行的交换。这损害了该理论在对以下几种情况进行分析



时的灵活性:技术表现为种子及时且不费力气就落到地里且最后同样被轻易收获的这样一种生产过程;劳动者像牲畜一样被随意买卖的奴隶经济(即他们能够在现在和未来被自由买卖和交付);一种由不停工作和自给自足的机器人构成的经济;一个由只有个人或合作生产者构成的经济体(即该经济体中劳动力不能买卖,生产者只能控制自己拥有的生产资料)。除了这些例子之外,被雇佣的劳动者,除了劳动属于自己之外并无其他初始禀赋,因此相应于给定的初始禀赋(商品或资金),生产可能性边界也随着劳动者的工资率而改变;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自身的劳动是其初始禀赋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就该记住,在资本主义体系里,对于所有商品而言,劳动力是属于不可能拥有期货市场的那一类商品。这得归因于劳动力作为一种投入所具有的特殊性质:工人——不像奴隶、牲畜和机器人——只要他们愿意,随时都可以离开他们的工作。<sup>44</sup>

这一批评严重冲击了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我们已经看到,“自由”劳动者的存在是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劳动者的自由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之中:劳动者只有在有限的、规定的时间内出卖其劳动力——劳动者不能将自己像奴隶一样出售给奴隶主——而且大多数劳动者不受与生产方式有关的控制;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出卖一次自己的劳动力以维持生计。这不仅是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而且在新古典理论中,这也是劳动力市场在每个时期都是“完美”的必要条件。

为了避免隐含在“再转换论证”(见第16章)中的毁灭性批评,这两个学派所付出的代价是:他们的理论不具有普遍性,对资本主义也不适用。它只能用来描述以商业为导向的奴隶经济,或者一个完全由无数小型的、独立的、拥有自己生产方式的生产者所构成的经济体。而正如我们在前面弗里德曼的引文中所见到的,他认为能代表这两个学派观点的正是这后一种经济体。

但是,这两个学派希望他们的读者能够相信他们的理论是用于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的。所以,他们尽力掩盖该理论在解释资本主义时所出现的不适应性以避免这种困境。这一点可以从阿尔钦和艾伦下面这段论述中体现出来:

即使现实中有无数种的投入,但我们觉得只提及其中的两种应该会比较方便的。与在每个生产过程中辨明每种具体的投入,我们不如直接把那些投入叫做 A 或者 B。更常见的做法是,分别给这两大类投入以标准的名称:劳动和资本。<sup>45</sup>

对于阿尔钦和艾伦而言,使用劳动和资本的“标准名称”确实很“方便”,因为他们在紧接着上文关于分配的讨论之后,就认为资本的数量是能够加总的,有着可确定的边际产品,并且能够根据它的边际生产力获得一定的“报酬”。<sup>46</sup>

阿尔钦和艾伦在讨论的结尾做出了“一些预警性的评论”,其中说道“目前的分析不需要这样的假设,即认为资源只是在形式上存在着一系列的差别,而本质却是相同的”。<sup>47</sup>他们没有告诉读者的是,如果我们放弃了关于资本包含着一些同质的永久实体这一假设,那



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加入资本主义社会三个进步阶层的行列……。要想成为一个资本家(一位储蓄者)、一个企业家(一位投资者或资本品拥有者)或者一个新技术的设计者,所需要的是智力和意志力。一个富人的继承者可以拥有一定的优势,因为他可以从比其他人更优越的条件出发,但他在市场竞争中的任务并不轻松,甚至有时比那些新人所承担的任务更加繁重,但得到的报酬却更少。<sup>49</sup>

同情一下那些资本主义财富的可怜继承者们吧!他们的任务比其他人所要面对的更为“繁重”且只能得到“更少的补偿”。但是尽管如此,仍不知为何(毫无疑问是由于先天的优越性),像洛克菲勒这样的家族能一代接一代地经营下去。而工人能够交换他们的劳动,把它卖给那些进步的、有头脑、有意志力且拥有财富的人,并由此获得巨大收益。事实上,人们甚至可以颠覆亚当·斯密的格言,说工人们不付出努力就能获得回报,因为工人们能够通过市场利益的和谐,“享受到资本家成功的果实”。米塞斯写道:

市场经济一个代表性的特征就是:通过三个进步阶层的努力——那些储蓄资本、投资和资本品以及那些精巧运用资本的新工艺——而取得的进步的很大一部分都被分配给了不够进步的人民大众……市场进程给普通人提供了享受其他人成功果实的机会,这迫使那三个进步阶层以最好的可行的方法为不进步的大众提供服务。<sup>50</sup>

所有从事生产的那些普通工人能够“享受”到食利者、红利获得者和其他只靠收取利息生活的不劳而获者的“成功果实”是多么幸运啊!这些人丰厚的收入是他们进行“繁重”的“智力和意志力”运用而得到的“合理报酬”。如果没有这个善意的、无所事事的投机阶层,工人们该怎么办呢?米塞斯根本不相信工人能够离得开这一阶层。但霍奇斯金、马克思、霍布森、卢森堡、列宁和凡勃伦的观点与之大相径庭。

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最终将所有的人类行为都看作是理性最大化的交换行为,以此来证明,就经济中和非经济中诸方面而言,一个自由市场,即资本主义体系是世界上所有制度中最好的一种制度。

回顾一下麦肯齐和塔洛克的说法,他们想让我们了解只有他们的理论才真正构建了经济学,并向我们阐释这些深刻而亘古不变的真理。在他们的书中有一章是以“人们为什么要在草地上行走”为标题的,其中描述了一个将要对是否在草地上行走做出选择的个人(或者说是一个因此而要进行交换的人):“在踏上草坪之前,他必须快速地反映出这样做的收益,并计算出所要涉及的成本……结果计算出的收益大于成本,所以他就踏上了草坪——他这样做是多么理性啊!”<sup>51</sup>在他们看来,能够理解在资本主义中,即使在草坪上行走都是一种理性的、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是一件多么鼓舞人心的事,因为这种行为可以促使我们达到和谐的最优状态。

但是,难道这些功利主义者真的相信,即使当人们以所谓的激情作为行事指南时,他们仍然是理性的、以计算为乐趣的机器吗?麦肯齐和塔洛克试图让我们相信,所有的一切

都是理性最大化交换行为的结果。他们还以性行为为例子进行说明：“性是一种能被生产且能获得的服务（即可以进行交换），像所有其他生产过程一样……性经历也需要成本。”<sup>52</sup>因此，对于所有我们这些理性的、效用最大化的“自动化机器”而言：

性的需求量也是价格的反函数……这种关系的存在仅仅是因为理性人在消费性时，会一直消费到其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为止……如果性的价格相对于其他产品提高了，消费者会理性的选择增加其他产品的消费而减少性的消费（比如冰淇淋或由相对价格决定的具有替代性的其他产品）。<sup>53</sup>

麦肯齐和塔洛克也提到了“正常的性关系”和卖淫行为。在卖淫行为中，支付的是货币，而在“正常性关系”中，使用的则是“非货币”。<sup>54</sup>一般而言，所有的性对于理性的、以最大化为乐趣的机器而言是相同的。两位作者继续告诉我们如何在选择结婚对象甚至“繁衍后代”时，做出同样理性的、效用最大化的交换。他们说“孩子也是经济产品”，<sup>55</sup>所有养育孩子的行为——包括打骂——都只是一系列理性的、效用最大化的交换行为。

我们可以看到，斯密和李嘉图以其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洞察，分别从效用（或交换）和劳动（或生产）的角度来观察经济。新古典经济学是效用理论最后的也是终极扩展。我们已从本书看到，这一理论的发展从李嘉图之后就呈现出智力上的退步，现在已尘埃落地。其中只有像穆勒、凯恩斯和萨缪尔森这样的折衷主义者才能逃脱退步的宿命，因为他们拥有足够的常识把更多的现实观察与效用观点相结合。麦肯齐和塔洛克的陈词滥调可以说是纯粹的、逻辑一致的、个人主义色彩浓重的功利主义发展的最后一个胜利，也是其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

在我们看来，麦肯齐和塔洛克充满敌意的陈词滥调是一种深深的悲哀。这不仅仅因为他们自身的陈旧迂腐——总有人并且将来也总有人会支持这种枯燥无味的思想——还因为这种陈腐所代表的内容。而这种悲哀源于对社会现实的严重偏离。而这也导致了麦肯齐和塔洛克的理论事实上只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行为的充满偏见的描述——人们承受着如此沉重的精神负担，以致他们只能是一群接近于理性的、精于计算的自动化机器。

功利的边际主义无疑是体现着强烈偏离的一种社会性征兆。正是这种哲学使得人类的行为极大地偏离了现实，受到束缚，在感情上被分裂，受到不合理的损害。这种哲学还在继续着这种假设，认为它普遍体现了人们的本性并将这种本性上升到了神话中人类潜能的高度。

在马克思和凡勃伦的理论中，这个问题并不表现为如何做成一笔最有利的性交易，如何实现最精明的“生育”投资，而是如何创造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可以充分发挥自己在感性上、审美上、智力上和身体上的潜力；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无疑会把自己连同他人人都视为独一无二的、有价值的人。也就是说，人们最终还是他们自己而不是商品，人

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刚好帮助我们满足绝大部分人的真实需求。这刚好与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所吹捧的把人当作商品,使其行为商业化、理性化的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由于这两个学派的兴旺发展并且日益成为经济学学术界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使得它与社会现实的偏离所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也只有在一个严重偏离长期存在的社会里,这种对人类价值的傲慢断言才能冒充为一种纯粹的、非价值取向的科学。

#### 注 释

1. W. A. Lewis,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Manchester School, May 1954; and W. A. Lewis,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55).

2. Lewis, "Economic Development," p. 148.

3. 同上,第 150 页。

4. 同上,第 141 页。

5. 同上,第 147 页。

6. 同上,第 190 页。

7. W. W. Rostow, "The Marshallian Long Period," in *Pioneers in Development*, ed. G. N. Meier and D. Se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40.

8. 同上,第 241 页。

9. Paul A. Samuelson, *The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10. Paul A. Samuelson, *Economics*, 10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1976), p. 267.

11. 同上,第 521 页。

12. 同上,第 523 页。

13. 同上,第 531 页。

14. 同上,第 160 页。

15. 同上,第 811 页。

16. 同上,第 479 页。

17. 同上,第 643 页。

18. 同上,第 69~79 页。

19. 同上,第 603 页。

20. 同上,第 560 页。

21. 同上,第 617~618 页。

22. 同上,第 618 页。

23. 同上,第 47 页。

24. 同上,第 605 页。

25. 参见 E. K. Hunt, "Rationalism and Empiricism in Economic Theories of Valu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4, no. 3 (1977): 11-26.

26. Milton Friedman, "Value Judgments in Economics," in *Human Values and Economic Policy*, ed. S. Hook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86.
27. Richard B. McKenzie and Gordon Tullock, *The New World of Economics, Explorations in Human Experience* (Homewood, IL: Irwin, 1975), p. 6.
28. 同上,第7页。
29. Armen A. Alchian and William R. Allen, *University Economics* (Belmont, CA: Wadsworth, 1964), p. 5.
30. McKenzie and Tullock, *New World of Economics*, p. 5.
31. Alchian and Allen, *University Economics*, p. 5.
32. Joan Robinson, *Freedom and Necessity* (New York: Pantheon, 1970), p. 122.
33. Milton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p. 38.
34. 同上,第121页。
35. 同上,第131页。
36. 同上,第129页。
37. 同上,第23页。
38. 同上,第32页。
39. Alchian and Allen, *University Economics*, p. 433.
40.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p. 13.
41. J. Hirshleifer, *Investment, Interest and Capital*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0), p. 2.
42. 同上,第12页。
43. 同上。
44. D. M. Nuti, "Vulgar Economy in the Theor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n *A Critique of Economic Theory*, ed. E. K. Hunt and Jesse G. Schwartz (Baltimore: Penguin, 1972), pp. 230~36.
45. Alchian and Allen, *University Economics*, p. 433.
46. 同上,第433~451页。
47. 同上,第452页。
48. 同上,第453页。
49. Ludwig von Mises, *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 (New York: Van Nostrand, 1956), pp. 40~41.
50. 同上,第40页。
51. McKenzie and Tullock, *New World of Economics*, p. 28.
52. 同上,第52页。
53. 同上,第51~52页。
54. 同上,第52页。
55. 同上,第108页。

## 第 18 章 当代经济学 II： 制度经济学和后凯恩斯主义

当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和苏联经济的迅速工业化导致了新古典理论的信用危机时,另一种新的非正统理论流行开来了。如前所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获得了迅速的认同,它在经济学家中的影响接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新古典主义。

保罗·萨缪尔森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消除了这两个理论学派倡导者之间的争斗,使他们信服新古典经济学(也就是现在所熟知的微观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就是现在所熟知的宏观经济学)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它们都只是传统经济学的密切相关的支持者。它们之间的区别,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之间的矛盾,都可以被忽略掉。要是当一个人考虑微观经济学的问题时,他就会忽视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当一个人考虑宏观经济学的问题时,他就会忽视新古典主义的思想。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就融合了作为正统经济学两大重要支柱的宏观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和微观经济学(新古典主义)。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满足于这种调和。事实上从一开始它就受到了来自许多新古典经济学拥护者的攻击。制度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几乎完全反对新古典理论,他们主张用不同的社会观点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机能来取代新古典主义的观点,他们对新古典主义观点的反对依赖于对新古典主义全面深刻的批评(倘若可以被接受的话)。

当大多数凯恩斯主义者欣然接受作为正统学说的两大支柱理论之一时(琼·罗宾逊是一个显著的例外),许多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保守的新古典主义的拥护者非常不满意于萨缪尔森将他们的理论和另一种他们认为在逻辑上和理论上不一致、且在政治和思想意识上对立的理论融合在一起。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新古典主义对凯恩斯的攻击来源于一位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奥

斯卡·兰格(Oscar Lange),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后,兰格就曾努力尝试着使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与更接近于新古典主义的瓦尔拉一般均衡理论相协调,凯恩斯也试图解释存在大量非自愿失业的经济均衡,也就是说,在劳动力市场这个巨大和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市场中,一般均衡实际上是处于不均衡状态。

兰格还得出结论:凯恩斯主义者的均衡和瓦尔拉的主张是矛盾的,在后者看来,一般均衡就是所有市场的同时均衡。1940年兰格出版了《价格弹性和就业》一书,他在书中试图利用瓦尔拉一般均衡的模型来重新修正凯恩斯的观点。兰格说,凯恩斯基本上已经确定出一个有关非自愿失业和瓦尔拉系统不均衡的特殊市场环境,在这个系统中市场机制不能创造平衡,并且这种不均衡将会持续存在。兰格的影响可以追溯至一系列来自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的理论学家,其中包括唐·帕蒂金(Don Patinkin)、罗伯特·克劳尔(Robert Clower)和阿克森尔·莱永赫夫维德(Axel Leijonhufvud)等人。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正统凯恩斯主义理论失去了其主要地位,而且上述这些理论学家的观点在经济学上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看作仅仅只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特例。宏观经济学已经越来越成为是对关于市场将或多或少自动达到瓦尔拉一般均衡的整体条件以及关于问题产生的特殊条件的研究。宏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即所谓的“理性预期学派理论”强调的市场的自动调节,其中对自由放任思想体系的重新辩护是显而易见的。尽管一些大学课本中仍然用一到两章的内容来讲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但是到了1990年后,它便不再被视为正统理论两大重要支柱之一,新古典理论再一次完全占据正统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大异端学派马克思主义和制度经济学继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地独立于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本章的前半部分,我们将要讨论几个关于制度经济学理论的不同流派的发展趋势。它们是建立在托尔斯坦·凡勃伦、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克拉伦斯·E.艾尔斯(Clarence E. Ayres)等人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在这章后半部分中我们将讨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凯恩斯的信徒们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建立起来的新的非正统经济学,这些凯恩斯信徒们并不赞成新古典经济学,并且还坚决反对将凯恩斯理论合并到新古典主义的框架中去。

### 克拉伦斯·E. 艾尔斯的制度经济学

凡勃伦与正统经济学理论间的分裂越来越尖锐和极端,他否定了均衡分析说和新古典主义关于社会中充满了效用最大化的交易者的观点,他试图理解人类的生物本性并且强调这种生物本性总是促使人类成为独立的社会生物。然而人类的这种社会本性并不意



意味着社会关系或社会行为是生理上所决定的。人类存在于各种各样的社会条件下。每个单独的个体都具有很强的可塑性。这种可塑性使得人类可以适应和习惯各种根本不同的思想、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这些是为了与各种根本不同的社会体制相适应或一致所必需的。

随着新古典主义关于个人效用最大化理论的逐渐深入,同样,对于硕士生来说,研究也就越来越困难。而只有具备深厚的数学知识背景以及数年来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深入分析,才可以在大多数的大学里获得经济学博士的头衔。对于绝大多数的经济学毕业生来说,这就意味着很少或几乎没有时间来研究哲学、人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凡勃伦的许多观点都是从这些学科中总结出来的。而且在许多经济学系中这种保守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占据了主流地位,这就出现了下述情形,对个人来说,关于凡勃伦著作的研究,就像研究马克思著作一样被视为政治上和思想意识上的“不明智”行为。很明显,一个年轻的经济学家认真对待马克思或者凡勃伦经常被看作是缺乏智力的表现。因此,制度经济学流派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虽然还是少数,但它们仍然具有影响力。

克拉伦斯·E. 艾尔斯(1891~1972)于1917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是一位系统关注人类存在的方方面面的“伟大的”思想家。从一开始他就显示了对经济学极大的兴趣,就像他研究哲学一样,在获得博士学位一年后,他出版了一篇思想较为偏激的文章,题为《经济学理论的功能和问题》<sup>1</sup>。他的第一个教学职位是在阿默斯特学院,任教期间深受沃尔顿·汉密尔顿(Walton Hamilton)影响。汉密尔顿是一位出色的青年经济学家,他首次提出“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这个术语。艾尔斯做学生时就掌握了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并且被指派为汉密尔顿的助教。艾尔斯曾描述过汉密尔顿对他早期思想所产生的影响:

当汉密尔顿教授向大一新生演说时……当他向我们这些大一的学生阐述有关边际效用这些基本理论时,我开始感到很惊奇。最后,我终于鼓起勇气问他,尽管44年过去了,但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他眼中闪耀着的诙谐的光芒,他回答说,要是我自己理解了,我就将马上去做了。就像亨利·芬尼(Henny Penny)一样,这个非凡的年轻教授不同凡响的思维过程令我感到似乎天空崩塌了。难道边际分析这种精密的工具竟然是毫无意义的?<sup>2</sup>

艾尔斯确实得出结论——即新古典理论是毫无意义的。他意识到效用的概念和另一个理论——在市场资本主义制度里,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自动地达到最优境界——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核心。同样,他还意识到这个理论基础的空洞和累赘:

效用概念尤其被批评为是同义反复。

效用当然可以被认为是满足某种需要的性质,不论那是什么需要。但是在我们无法衡量这种需要的时候我们怎么能衡量效用呢?我们当然可以说价格可以衡量效用。但是如果我们缺乏一套独立的效用衡量尺度,我们只能定义价格和效用相等。这样一来,从这

种相等中不能得出任何结论。<sup>3</sup>

在艾尔斯看来,新古典经济学只不过是设计出来,用以维持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力量的现状。

在艾尔斯最早的著作之一——《更为神圣者》中,他的思想就明显受到凡勃伦的影响。他思考为什么那些似乎有知识的人会接受那些相互独立的理性人都显然无法接受的基于迷信的思想、观点、传统习俗和民俗。他相信问题的答案就是,从功能中可以看出,这些所谓思想、观点、传统习俗和民俗所维护的正是社会中富裕的统治阶层的权力。

艾尔斯的观点起源于凡勃伦对服装样式迅速变化的解释讨论中。凡勃伦认为,富人的衣服明显区别于穷人的,服装设计者仅仅只是想要创造出富人和穷人之间明显的完全不同的不同。设计者们的动机很少是从真正美学的标准出发。今年样式的审美角度的丑陋将会引发反叛,进而导致明年、后年,年复一年的激烈变化,只要以这种令人反感的差别而不是美来作为设计的动机,就会存在一种导致富人的服装发生永久性的、强烈的变化的反叛。

尽管艾尔斯受到凡勃伦很深的影响,并且非常尊敬他,但是因为两个理由他反对这种分析。首先,他否认存在任何固有的超然的审美标准,可以用来判断衣服样式的美丑;其次,他认为衣服款式变换的速率,完全取决于向劳动阶层销售低成本服装的资本家可能模仿这些式样的速度,并将这些廉价模仿品销售给欲仿效富人的穷人的速度。如果富人不能使他们衣服的款式发生新的剧烈的变化,那么这就将减少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别。

艾尔斯继续争辩说,世间不仅没有评价美丽的一般标准,更没有评价道德的正直与善良的一般标准。在这些事情上,人们的态度只不过是关于社会习惯与习俗的偶然反映,甚至大多数人对于真理与科学的态度也仅仅持迷信态度。

但艾尔斯对无政府主义以及鼓吹某种形式的极端文化相对主义并不感兴趣。这里仍然存在这样一些问题:是否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解释人们对于民间传说和迷信的信仰,以及是否其中一些信仰较其他有更多的真实价值,对艾尔斯产生了巨大影响的第二个因素显然就是约翰·杜威的哲学。

杜威反对他那个时代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中都占有主要地位的观点,即结果和方式本质上是不同的,并且总能够被明显地区别开来。艾尔斯深受杜威理论的影响,方式和结果从来不是完全可分的。在杜威看来,人们选择某种方式是因为他们想要达到某种结果。但是如果一个人研究为什么问题中的结果是欲望对象的原因时,他就将发现它被需求是因为它又是达到另一个更深层次结果的方式。因此,如果我要去杂货店,我就有几种交通方式可供选择。这些可供选择的交通方式都还只是“方式”,但它们被视为结果,因为我知道我经常需要它们是由于它们能使我到达商店(或其他别的地方)。到达商店看起来是结果,然而它没有自己内在的价值。到商店去是我想要得到食物的一种方式。得到食物

看起来好像又是结果了,但是它也没有自己内在的价值,它仅仅只是我满足饥饿的一种方式。杜威还指出,如果你调查大多数的结果,你会发现它们之所以被需要是因为它们又是提供到达另外一种结果的方式。而且,大多数方式由于相同的原因,同样可以被看作是结果。他认为生活是由一系列起因与结果、方式和目的组成。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先前起因的结果,是接下来结果的起因。没有任何一件特别的事件可以被仅仅称作一个起因或者一个结果,只能说既是起因又是结果。就像事件、环境、情形和行动从来都不只是被人们视为是一个结果或者说是一个起因。如果它们是到达某种有价值的结果的方式,那么它们本身也是有价值的。同样地,几乎每个结果的价值就在于它又是到达另外一个结果或一些结果的方式。

艾尔斯采用了这种观点,我们日复一日的经历并未显示出结果和方式的不同,我们生活中的每一条既是结果又同时是一种方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经历中没有任何实质和本质的不同来区别方式和结果。<sup>4</sup>

艾尔斯追随凡勃伦,相信大多数人的行动和价值观都是一分为二或对立的。其中一个极端就是迷信、仪式性的价值和行动。这种价值和行动的社会功能就是创造并维护社会和经济上的阶级差别,以及成为造成社会不公正的基础。另一个极端则是技术性价值和行动。这一类价值和行动为推进被艾尔斯称作的“一般生活进程”提供了必要方式。

不管是从认识论还是从伦理学的角度,艾尔斯均否认绝对主义及虚无主义的相对主义。他追随杜威,认为自己找到了一种既能保留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两者优势,又能摆脱这两者缺陷的中间道路。

我们知道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将它与价值和福利联系起来可以非常客观地定义和理解。不仅仅因为社会进程是一个时间上连续的概念;从技术角度看,它也是一个逻辑连续的过程,时间进程中的每一项都暗含着它是那同一过程中的一系列项目,而每个项目又是起源于它先前的一系列项目。这是一个集合了价值与真理的技术性连续过程。<sup>5</sup>

真理和价值都源于在推进“一般生活进程”时,对自然的技术性把握。“当我们判断一个东西是好还是坏,或者说一次行动是正确还是错误的,我们的意思是说,在我们看来,只要我们能够预见这个东西或行动,那它就不会推进生活的一般进程。”<sup>6</sup> 在他最后一本主要著述中,他指出“道德和价值的分裂才导致 20 世纪的道德危机”。<sup>7</sup> 当这种分裂发生时,真理就将被迷信所取代。他认为大多数广泛流传的迷信都是旨在维护社会现状的仪式性价值和行为的结果。而技术上的、形式上的价值观的分裂促使艾尔斯开始了他的写作,一位当代主要的艾尔斯门徒对此作了简要的阐释:

价值结构……从价值构成的两个体系之一获得其社会依据。价值既不是形式上的证

明也不是有益的依据。制度二分法的核心包含在现存社会中的两种社会价值模式的区别之中。

形式化价值观是被那些合并了社会地位层次以及反映各阶层价值的不公平的等级差别的习俗和社会风俗所证明了的。它们使权力关系和植根于现状中的权威方式合理化。

因此,和形式化价值观有关系的行为模式,被视为那些在人类行为中已证明其力量和强制性的社会惯例。社会惯例要求不公平的等级差别和社会地位关系来证明它们的存在。另外一方面,与工具性价值有关的行为模式在社会生活进程所依赖的解决问题的活动中得以证明。<sup>8</sup>

凡勃伦和艾尔斯的观点被许多当代的经济学家重新加工和拓展,其中包括(但绝不仅限于)保罗·D·布什(Paul D. Bush)、托马斯·R·德格雷戈里(Thomas R. DeGregori)、威廉·M·达格尔(William M. Dugger)、戴维·汉密尔顿(David Hamilton)、F·格累戈里·海登(F. Gregory Hayden)、路易斯·容克尔(Louis Junker)、菲利普斯·克莱因(Phillip Klein)、安妮·梅休(Anny Mayhew)、沃尔特·C·尼尔(Walter C. Neale)、鲍德温·兰森(Baldwin Ranson)、沃伦·塞缪尔斯(Warren Samuels)、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马克·图尔(Mark Tool)。布什和容克尔还用他们自己的观念——“形式上的包装”对这一基本的制度主义分析作了重要的拓展。用布什的话来说:

能够带来制度化调节的动态力量是一种在社会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知识储备的扩张物。根据形式上的包装这一理论,新的知识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合并到制度化的体系结构当中去,只有到了一定程度,它才能被恰当地形式化,也就是说,只有到了那样的程度,它的合并才会成功地完成而不会扰乱现存社会价值结构的形式上的主导地位。<sup>9</sup>

换句话说,一个既定社会使用新的解决问题的知识的能力会受到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统治形式的限制,这些都要由那个社会的强有力的富人来执行。因为统治阶级既定的利益具体反应在一个社会的主要的制度规范中,数百万靠这些制度谋生的普通老百姓就成为那些保护其社会地位的形式化价值观的拥护者。布什还提到一个发生在美国的有关军事工业化综合体的例子:

缩减军备对美国的影响不仅在于严重威胁到军火工业联合公司的既得利益,而且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了数百个大大小小的地区的经济基础,尤其是在这个严重依赖于军火贸易的国家之中。

经济废物固有地存在于军事化—工业化综合体中的资源和技术的形式上的包装中,同样也是数百万美国人民安全收入的来源,只要冷战的意识形态还支配着美国人的世界观,数百万美国人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就将被联结着的反共产主义的邪恶学说、军事合同担保的利润和自助的爱国心融合在一起。<sup>10</sup>

同样，F. 格累戈里·海登揭示出：在化学、农场器材和农业综合企业等行业中的庞大企业为了追求利润的增长和企业的控制力，都要在它们各自的领域中加强对科学和技术的控制力，利润的增长往往都伴随以牺牲土地和必需的社会和生态系统的保护为代价。<sup>11</sup>

威廉·M. 达格尔还指出，美国当今的大公司都是讲究形式的中心基地。美国社会关系和个人行为对捍卫和维护美国权力、特权和阶级差别并使之永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大公司力图保卫和维持这些关系。因此，在美国生活中，大公司总是趋向于支配其他机构。这种共同的霸权是通过四个社会机制来维持的：歪曲、玷污、竞争和神秘。用达格尔的话来说：

歪曲将所有的制度联系起来是为了让非公司的制度被用作公司的方式。玷污将公司的地位角色推动到非公司的地位角色。竞争允许公司领导成员在非公司领导阶层中获得认同甚至是敬重。而神秘就像给这种公司的霸权披上了保护性的神秘的外衣。<sup>12</sup>

通过这些机制，公司可以掌握对技术的控制，摒弃它们不能利用的技术并且将技术的其他方面放在从属地位以供其使用。因此，仪式包装使技术价值处于使权力和特权永存的形式化价值观的从属地位。

在这个过程中，宣传和思想控制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一点上，达格尔就曾指出大学和学院是如何成为公司利益附属物的。大学里自由的探寻和师生智力的拓展的有益目标，通常成为保守的意识形态的教学、职业的训练、特殊行业所需要的教学研究的附属物。因此，大学的社会任务就是服从于对社会不利的工业需求。

事实上，学术界是充满了不公平级别的森严的等级体系——永远对形式上的保守意识形态进行宣传的理想体系。在这个等级的顶部是著名的常青藤大学和其他一些著名的私立和公立学校。这些学校将决定在经济学里哪些观点是“可敬的”。他们同样也训练那些在主要的州立大学和其他私人的研究性大学中任教的教授，而后者的学校则训练那些在等级制度最底层的州立学院和私人学院任教的教授。

在这个等级的顶端，意识形态的纯洁度仍然被维持着。保守的意识形态在学术上和知性上被称作“科学的”，而批判性的理论则被打入冷宫。你一旦在学校里就会明显地发现这一点：那些持不同观点的学派诸如制度学派、后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理论并未在这些精英大学中传授。另一方面，保守的新古典学派中的绝大多数有影响力的理论家和学者都在这些精英大学中任教。而制度学派、后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派则在中层或较低层的学校任教，并且不断努力维持其“值得尊敬”的地位。因此，当学院的等级巩固了形式化价值观凌驾于工具性价值观之上的统治地位时，它同时也巩固和捍卫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等级体系，不同的权力和特权以及个人之间重要的社会阶级差别均依赖于这个等级体系。

最后，约翰·蒙克尔斯(John Munkirs)指出，在美国社会中公司的主导地位依赖于他

所称的集权部门的计划编制系统(CPSP)。这个经济学意义上的计划编制系统是由庞大的金融和工业化公司所统治,他还指出,正是这种保守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有意识地掩盖了这一统治地位。约翰·蒙克尔斯写道:

不幸的是,在美国,我们的科技知识可能实现的真正选择(选择在不同的产品和分配系统之间,举例来说,中央集权对地方集权)或被限制,或被压缩于我们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内,特别是限制在利己主义、对利润的追逐和自由放任的价值观之内。简而言之,存在于美国当今社会中的集权计划编制的特殊形式既不是依赖于技术决定论也不是靠什么阴谋诡计。CPSP是将利己主义、对利润的追逐和自由放任与某些科技可能性融合在一起的直接结果。<sup>13</sup>

在本篇有关艾尔斯和他的几个当代弟子的理论的简短说明中,我们只是简单涉及了当代制度经济学部分领域。制度经济学家试图理解更多的关于市场供给和需求的运转原理。他们感兴趣的是整个社会的进化过程,他们检查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力量的制度基础并且研究这种力量是如何被市场所影响的,同样也对市场施加有力的控制。如上所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作为巨大的社会价值进程的一部分,其重要性远远大于产品定价问题。他们再一次将社会价值基础分为两个部分:媒介的和形式的。当人类进步依赖于工具性价值的优势地位时,而现存经济秩序是以形式化价值进程的主导地位为特征的。正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这一方面丝毫不起作用,因为其大多数信条都具有强化形式化价值的社会作用,这种形式化价值可以维护强调权力和阶级差别的社会现状。

制度经济学家在如下领域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包括劳动经济学、工业组织、法律经济学、比较经济系统、公共选择、农业经济学和政府干预经济等领域。作为一个当代的经济学流派,制度经济学仍然保持着活力和朝气。

##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凯恩斯认为他的理论只是对新古典主义的一种批判。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早期,人们纷纷议论“凯恩斯革命”。然而,就像我们在这一章刚开始所看到的那样,新古典经济学家对凯恩斯《通论》的部分观点予以详细论证和发展。直到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的观点才被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视为仅仅是更一般的新古典理论的一个特例。

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间,一群经济学家复活了关于凯恩斯和新古典经济学不相协调的观点。他们将这些观点同米哈乌·卡列茨基(Michal Kalecki)、琼·罗宾逊和皮罗·斯拉法的观点融为一炉,重新主张凯恩斯主义传统中激进的一面,从而创造出了一种被称作“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Post-Keynesian Economics)的新的经济学派。

后凯恩斯主义所关心的是经济增长。几乎所有的经济增长理论都起源于“哈罗德—多马”(Harrod-Doma)增长模型—— $G=s/v$ ,其中 $G$ 代表增长率, $s$ 代表平均储蓄水平(或者说储蓄与国民收入和产值的比率), $v$ 代表资本与产出比率(或者说每生产一单位的产出所需要的平均资本的单位数)。为了解释这个模型,我们引进了一个简单的假设,在每个市场中和整个经济中,需求都等同于供给。这就意味着经济中的储蓄将会自动转化为生产新产品的资本。在这个假设条件下,储蓄与收入的比率 $s$ 将会自动等同于投资收益率或者说是资本存量的增长(比如说投资)与收入的比率。

这种增长的资本存量增加了经济的产出水平。因此如果所有的市场都保持均衡,那么所有的产出水平都将被有效利用,收入和产出将会比前段时期有着较大的增长。增长率就表述了这种用总收入百分比表达的产出和收入上必要的增长规模。

如果资本与产出的比率 $v$ 为1,也就是说,每1美元的新的投资将会导致资本存量相应的增加足以生产出1美元的额外的产出,额外产出水平的总的增量(我们假设,在新的产出和收入情况下)将会等同于总的储蓄率。因此,在这种假设下,增长率就等同于平均储蓄率。

如果 $v$ 为2,也就是说,每2美元资本的增长将会生产出仅值1美元的新商品的价值,那么总储蓄只能增加其二分之一的美元额的产出水平。因此,在这种假设条件下,平均储蓄水平的一半才等同于经济增长率。

哈罗德—多马模型不是一个理论,它只是一个概念框架。经济学家在这个框架内观察储蓄、投资、资本存量、产出、收入和增长率等变量间的数量关系。这个一般体系结构几乎曾被所有学派的经济学家使用过。例如,新古典经济学家曾利用这一体系结构来证明: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支柱对于随时间而增长的经济是完全有效的,而这些支柱(自发性、效率和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是其理论的核心。鉴于偏好外生决定(与收入分配共同决定储蓄)及生产函数和资源禀赋外生决定(与偏好和收入分配共同决定生产的数量和构成),在一系列不切实际的假设下,我们就可以理解经济是如何自动适应于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增长率。同样也能够解释这种增长率是如何使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的,每一种产出因素(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是如何在达到边际生产力水平过程中起作用的。

整个论证在分析的逻辑中是一种抽象的作业,其中所包含的“时间”是“合乎逻辑的时间”而不是真正的时间。这段时期是如此之长,以致于新古典经济学家足以论证所有合乎逻辑的和数学的关系。

反过来说,后凯恩斯主义理论关注的是一种真实的经济,而它存在于固有的历史条件下并适应于发生在真实的特定历史过程里的不均衡的力量。这种适用或调整过程在许多其他方面依赖于经济代理人如何看待过去及预期未来。他们预期的精确性不仅取决于他们对过去和现在估价的正确性,而且还取决于他们基于该预期所做出这些决策的相容性或非相容性,以及在经济上与之相关的成百上千的其他经济代理商的决策。因此,一个知

识渊博的企业家能够作出非常仔细谨慎的计算和谨慎的投资,但是这种投资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同时还取决于竞争者、供给商、消费者所做的决定和一些其他不可预见的因素。竞争者、供给商或消费者可能基于不完全的信息行动,甚至做出不合理的行动。在这些情况下,即便是企业家最仔细构建的未来计划也可能是错误的。

一个杰出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 J. A. 克拉格尔(J. A. Kragel)教授曾对该理论的这个方面作过如下阐述:

凯恩斯所选择的关于分析不确定世界的方法,是从不确定性和失望的影响中二者择其一……事实上,凯恩斯也曾说过他的方法并不代表完美的预见和充分的信息,因为在这样一种假设下,他主要的理论贡献——有效需求的理论——是毫无意义的。

进一步而言,凯恩斯对于其一般理论方法的观点是它能够被用于分析一系列问题除了他发现的最紧迫的问题如产出水平的决定和充分就业以外。然而,不同的问题当然需要对具有依赖性的、既定的和独立的系统中的变量作出不同的基础性假设。

最后……所谓的“后凯恩斯主义”理论是通过凯恩斯的方法论来试图分析各种不同的经济学问题如资本积累和收入分配等。<sup>14</sup>

特别地,基于凯恩斯和克拉克的理论,后凯恩斯学派开始分析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在卡尔多(Karldo)模型中,我们再一次假设储蓄等同于投资,在凯恩斯模型中  $s$  代表储蓄的倾向,而  $S$  和  $Y$  分别表示一段时期内的储蓄和收入。因此  $S = sY$  为“储蓄函数”,用于定义收入变化如何引起储蓄变化。卡尔多将经济学中的收入分为两大类:工人的收入,包括他们付出劳动应得的工资和薪水;资本家的收入,包括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所取得的租金、利息、股息和利润。

现在,代替凯恩斯的储蓄函数,我们可以得到

$$S = s_w Y + (s_p - s_w) P \quad (18.1)$$

其中  $s_w$  表示工人的储蓄倾向,  $s_p$  表示资本家的储蓄倾向。假设投资等于储蓄,根据这一均衡关系,我们可以得到

$$I = s_w Y + (s_p - s_w) P \quad (18.2)$$

我们将等式两边同时除以  $Y$  再重新整理可以得到

$$\frac{P}{Y} = \frac{1}{(s_p - s_w)} \cdot \frac{1}{Y} - \frac{s_w}{(s_p - s_w)} \quad (18.3)$$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工人生活在或接近于维持基本生活水平时,他们的收入全部用于消费,而资本家则全部用于储蓄。如果我们这样假设的话,那么  $s_w = 0$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假设,资本家取得了如此多的收入,以致于消费成为他们收入中不相符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将他们的收入全部用于储蓄,我们可以将这种假设近似化即  $s_p = 1$ 。如果  $s_w = 0, s_p = 1$ ,那么式(18.3)可以简化为



$$\frac{P}{Y} = \frac{1}{Y} \quad (18.4)$$

这个模型有利于解释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投资比率与国民收入中资本家所占的份额间的基本关系,投资水平越高资本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也就越大,工人所占的国民收入的份额也就越低。

一个更为现实点的模型就是假设资本家的储蓄倾向低于1。在这种情况下,式(18.3)就变为

$$\frac{P}{Y} = \frac{1}{s_p} \cdot \frac{1}{Y} \quad (18.5)$$

在这个公式中,我们看到后凯恩斯主义的一个经典结论。在一个既定的投资水平下,资本家的储蓄倾向越低,他们所占有的国民收入的份额也就越高,工人所占有的份额也就越小。它同时也揭示了一个秘密,资本家的高收入来源于他们努力储蓄的结果。在这个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储蓄得越少,那么他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也就越大。这个荒谬的结论是来源于后凯恩斯主义关于投资和储蓄的决定论的观点。投资是由资本家对未来投资收益率预期所决定的,取决于他们对未来是抱着乐观还是悲观的态度。另一方面,储蓄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收入水平的变化发生着较为被动的变化。

因此,我们看到如果资本家对未来抱有非常乐观的态度并且决定增加投资水平,那么这种投资将会刺激产量和收入水平(资本家收入所占有的份额)的增长。随着资本家收入的增长,他们的储蓄也随之增长。这种过程将一直持续到资本家收入的增长足以引起一个新的储蓄水平,此储蓄水平恰好抵消了投资的进一步增长,最终达到一个新的凯恩斯均衡。如果资本家的储蓄倾向非常高,那么收入就需要一个相对较小的增长才能达到必需的储蓄水平。如果他们的储蓄水平很低,那么收入将会需要一个较大的增长才能产生新的储蓄水平从而达到一个新的均衡水平。

因此,在对未来既定的期望和相应的投资水平下,资本家将他们的收入用于消费的越多,他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也就越大。节制和节约将会降低他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新古典学派的观点,至少还得追溯到纳骚·西尼尔,节欲作为资本家高收入在道德上的合理理由的无效性在这里慢慢显现出来。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除了关注分配和增长以外,在货币理论领域内也做了大量的研究。他们指出真正的商品和劳动力的流动在经济领域内则表现为货币的流动。在他们看来,货币具有独特的特征:它在价值贮藏以及交易媒介方面,都具有可忽略的替代弹性。这些假设都使得后凯恩斯经济学家和新古典货币理论学家,同时,使得前者颇为娴熟地阐明了,从商业银行到投资经纪人这些金融机构是如何做到共同增减货币存量,从而增大或减少外来冲击对经济体制影响的程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阐明了这些货币的调整是如何导致相对于真实工资率的货币工资率独立地发生变化的。<sup>15</sup>

## 斯拉法的价格理论

在价值理论领域内,后凯恩斯主义是建立在斯拉法所创造的基础之上的。在本书第16章我们阐明了斯拉法对新古典学派的资本、增长、破坏和效率理论的强有力的批判。如果说斯拉法只是发展了这种批判他就已经为经济学界做出里程碑式的贡献。但他并未局限于此,而是又提供了一种新的更精巧的古典价值理论的版本。斯拉法在他的著作《用商品生产商品》中的主要目的,就是作为一种对新古典边际效用理论的选择来发展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有鉴于此,他解决了李嘉图寻求不变的价值尺度的问题。

斯拉法的分析起源于一个简单的只生产两种商品的维持生存状态下的经济模型。<sup>16</sup> 每种商品又是生产这两种商品的必须投入品。这两种商品,小麦和铁的生产数量几乎不足以作为后一阶段相同产量的生产投入。“假定在全部产品中,包括生产者的必需品在内,280 夸特小麦和 12 吨铁被用于生产 400 夸特小麦,而 120 夸特小麦和 8 吨铁被用于生产 20 吨铁。”<sup>17</sup>

这一段时期的产量水平如下:

$$\begin{array}{rcl}
 280 \text{ 夸特小麦} & + & 12 \text{ 吨铁} & \rightarrow & 400 \text{ 夸特小麦} \\
 120 \text{ 夸特小麦} & + & 8 \text{ 吨铁} & \rightarrow & 20 \text{ 吨铁} \\
 \hline
 400 & & 20 & & 
 \end{array}
 \tag{18.6}$$

生产总量一定被用于生产性的投入来维持同样的产出水平。

显而易见,为了使这一过程持续进行,小麦种植者必须用 120 夸特的小麦才能交换到 12 吨铁。一吨铁的价格因此一定是一夸特小麦价格的 10 倍。既不是效用也不是任何类型的边际主义参与了这种计算。然而,问题在于,劳动力如何参与了这种计算。如前所述,商品投入包括劳动力这个必需品。在后面的题为《过去劳动数量的递减》一章里,<sup>18</sup> 斯拉法就向我们阐述了这种分析是如何从商品作为惟一的投入品转换为劳动力作为惟一的投入品的。

为了弄清楚这种转换过程,我们从商品生产中直接使用的劳动总量开始。直接进入生产的商品可以使它们自己转化为直接的劳动和用来生产其他商品。这些商品同样地也可以依次被转化,这个过程持续进行到最后将终止于一点,计算中剩余的商品仅代表被讨论中的商品价值中的非常不重要的一小部分并且可以被排除掉。剩下的仅仅只是过去的劳动的数量,在被讨论的商品产量中已达到最大值。这种讨论是简单易懂的,但它是以商品的形式为依据。这种分析可以被简单地推广到生产  $n$  种商品的维持生活的经济中去,其中每种商品至少又作为几种其他商品的投入品。对于每种商品特定的价格决定将由  $n$

种类类似于铁和小麦的方程式来决定。

斯拉法接下来考虑的是关于在生产中维持生计之后有剩余的一种经济。以下是可能存在的假定的生产条件：

$$\begin{array}{rcl}
 280 \text{ 夸特小麦} & + & 12 \text{ 吨铁} & \rightarrow & 575 \text{ 夸特小麦} \\
 120 \text{ 夸特小麦} & + & 8 \text{ 吨铁} & \rightarrow & 20 \text{ 吨铁} \\
 \hline
 400 & & 20 & & 
 \end{array} \tag{18.7}$$

再一次假定 400 夸特小麦和 20 吨铁中包含了维持劳动生存之外，并且有 175 夸特的小麦剩余。再假定总的剩余将以利润的形式分配，并且竞争使两个行业的利润率相等。如果小麦的价格是 1，铁的价格是  $p_i$ ，利润率为  $r$ ，以上等式就可以转化为：

$$\begin{aligned}
 (280 + 12p_i)(1 + r) &= 575 \\
 (120 + 8p_i)(1 + r) &= 20p_i
 \end{aligned} \tag{18.8}$$

这个等式的结果是  $p_i = 15, r = 0.25$

我们再将它一般化，存在  $n$  种商品，我们有  $n$  种等式来决定  $n$  种未知因素（一种价格是设为 1 的，另外的  $n-1$  种价格以及利润率是未知的）。这就是“古典的马克思主义的解答”，其中工资水平是由基本的维持生计水平所预先决定的。

但问题远比这要复杂。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维持生计的工资是由社会因素，而不是生理因素决定的。在工人与资本家的阶级斗争中，维持生存的实际工资水平随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变化。并且因为工人本身并不耗费投入的商品，那么生产各种商品的生产条件的变化（和由此带来的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就可能要求货币工资率调整以维持实际工资水平。所以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即使实际工资水平依然恒定，货币工资率可能偏离实际工资率或相对价格和其他商品变量。

工资率的变化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以上例子中，所有的价格都是以小麦作为货币的计量单位。然而，如果小麦不是以社会平均有机资本构成来生产的，那么工资率的变化将会产生两个后果：首先，它将会导致小麦的价格和它的劳动价值分离；其次，小麦行业的货币利润和在小麦行业中所生产出来的劳动形式的剩余价值脱离开来。（这两个效果都是各种行业中资本有机构成不同所造成的，这点已经在第 5 章和第 9 章中讨论过了。）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来说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价格背离劳动价值的第二条原理（参见第 9 章）要求这种背离要以不同行业中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别予以解释。但是如果小麦的价格不仅仅反映出它的劳动价值，如果其他商品的价格都是以小麦为计量单位，那么劳动价值和价格的背离将不能简单地反映在各个不同的行业中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别。在这个例子中，劳动价值和价格的背离反映了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别，和小麦的价格偏离其劳动价值的程度（因为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都以小麦的价格为依据）。

在这个例子中,第二个原理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价格与劳动价值的背离,以及测量尺度,即小麦价格的变化,又在何种程度上会引起这种背离。因此,我们又可以回到第5章和第9章得出的结论中去,劳动价值理论需要一个不变的价值尺度,其价格总是完全反映劳动价值,或者说(就像我们将在第19章所看到的那样)马克思建议劳动价值理论必须放弃劳动价值和价格之间的两个特定联系之一(总价值等于总价格,总剩余价值等于总利润),并且找到了连接劳动价值分析和价格分析的新方法。

然而,在这一点上斯拉法的观点不同于李嘉图和马克思的。他放弃了社会决定生存工资水平这一观点:

迄今为止,我们把工资当成包含了维持工人必要的维持生活的开支。因此,如同燃料对于发动机或是饲料对于牲畜一样情况。现在,我们必须考虑工资的另一面,除了包括维持生活的必需品,它们可能包括部分剩余产品。考虑工资的这种双重性,并将剩余产品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进行分配,也许应将工资的这两个部分区别开来,并只将“剩余”当作变量。与此同时,将工人维持生计的必需品,如同燃料一样,当作生产资料的一部分。

然而,在本书中,为了避免与传统的工资概念冲突,我们将根据惯例,将总工资当成一个变量。<sup>19</sup>

在这篇文章中,斯拉法完全同马克思的观点分离开来。对于斯拉法来说,劳动力价值的决定不同于其他商品。因为劳动不能够被分解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所以剩余劳动无法被解释为剩余价值的源泉。斯拉法将工资和利润的总和定义为剩余价值。所有抵消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物资资料后的剩余产品都被定义为剩余价值。因此,斯拉法既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没有接受李嘉图的理论(至少在这一点上),或者甚至是接受劳动价值论。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确实为李嘉图版本或是马克思版本的劳动价值论提供了一种必不可少的分析工具。

在定义了剩余价值包括工资和利润后,工资率 $w$ 现在变为未知的了,系统中的未知变量比其方程式又多了一个。我们必须在整个系统确定前先为一个变量假定一个确定的值。斯拉法总结道:“这个体系的演算有一个自由度;如果确定了一个变量,其他变量也可以确定。”<sup>20</sup>

然后,斯拉法开始研究当工资率从劳动没有任何剩余价值这点移动到劳动得到全部剩余价值那点时,相对价格和利润将会如何变化。斯拉法书中的这部分对于劳动价值理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这里斯拉法遭遇了劳动理论的传统逻辑的报复——劳动与生产资料不同比率的影响,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不同资本有机构成的影响。很明显,当工资增加时,不同商品生产成本的相应的影响将会取决于用于生产中的劳动和商品投入所占的比例(对于这点曾在第5章和第9章中作过更详尽的讨论)。使用相对较多劳动的商品的成本将会比使用相对较少劳动的商品的成本以更高的比率增加。但是商品又是

其他商品的生产性投入。如果一个给定的商品是劳动密集型的,但它主要的商品投入是资本密集型的,工资的增加将会增加被讨论中的商品的劳动成本,但同时也会降低生产中所消耗的商品投入的相对成本。很显然,价格将会取决于这些对立因素的最终结果。不可能预先决定工资率的增加将会引起怎样的结果。同样地,对所有商品的劳动投入和商品投入的了解本身并不足以决定相对价格。

显而易见,尽管我们找到一种商品是以劳动与生产资料的社会平均比率来生产的,工资水平的变化将会影响作为该商品生产资料的那些商品的价值,除非这些投入同样在社会平均条件下进行生产。因此,要想一种商品的价格反映的只是它的劳动投入,并且当工资率发生变化时却不发生变化,那么,这种商品必需:(1)以劳动与其他商品投入的社会平均比率进行生产;(2)只有当其他商品在相同的社会平均条件下进行生产时,才能被当成商品投入;(3)具有相同的平均生产条件,并扩展到所有商品投入,在任何时间点上,商品生产链上的这些所有商品投入构成作为不变价值尺度的商品中的一部分。

斯拉法论证说,找到一种商品作为不变的价值尺度远远比李嘉图、马克思或者任何后来的劳动理论学家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斯拉法处理这个困难的方法是这本书中最具有独创性的贡献。可惜的是有关具体的论证由于过于冗长在这里就不必再重复了。<sup>21</sup>

经过斯拉法理论上的处理后所得到的最终结果是证明了——不考虑在各个行业的生产过程中劳动和各式商品的比例,总存在一个所谓的“综合”或“标准”行业使我们能够解开这个方程组。用米克的话来说,“一旦我们知道了  $R$ [在标准行业中的净产品(剩余价值)与生产资料的比率]和  $w$ (标准行业中进入工资的净产品比率)就可以从总体上决定利润率。”<sup>22</sup>对于劳动价值理论来说,从总体上决定利润率是至关重要的。在第5章和第9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嘉图和马克思均认为只要单个竞争性的资本家企业加权其生产成本并加上一个由经济中通常的利润率决定的边际利润,就可以得到“自然价格”和“生产价格”。

然而,就像李嘉图和马克思所意识到的,这些成本和利润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以先前价格为基础,或者说其他人不可能有一套真实的价值理论。生产成本包括劳动成本和用于生产中的资本品成本。劳动成本就如我们在第9章中所看到的,是由劳动者生产维持生存的必需品所需的劳动量所决定。资本,就如我们在以前所有关于劳动理论的讨论中所提到的那样,可以简化为一系列以时间为顺序的过去劳动的耗费。但是,为了加总这种过去劳动以得出现在的资本成本,就必须在这些劳动出现的时间段,以及生产过程最终完成时的主要利润率下,加总过去劳动成本。最终,我们必须在生产的最后阶段,将资本家所获利润与劳动成本和资本成本(由总竞争性利润率决定)加总。只有经过所有这些计算之后,我们才能得出既定商品最后的均衡价格(或是自然价格,或生产价格)。

显然,最后的均衡价格是由生产过程中的劳动量和其时间顺序所阐明的。那么,我们

必须能够解释生产技术基础之上的利润率(例如,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及其时间顺序的基础之上)。这正是斯拉法所做的(至少是在这个模型中,他认为劳动者的消费包括生产过程中必需的商品投入)。其标准行业中的生产技术条件使我们能够决定经济中总的利润率,而无须事先了解价格。显然,标准行业的存在和可识别性对于该理论是至关重要的。斯拉法著作中最重要的观点就是他对于这种“标准行业”存在(它确实是工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其在实际经济中的可识别性的精彩论证。<sup>23</sup>

为了构建标准行业模型,斯拉法特别提出了他所谓“基本商品”的概念。基本商品直接或间接地进入到各种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从全部基本商品的生产技术系数中,斯拉法确认了各种基本品间的比例关系,以便使得在标准行业中,各种商品作为生产资料投入时和作为产出时比例是相同的。

在标准行业中,剩余价值同生产资料价值间的比率不会由于工资上涨而变化。这是因为(劳动密集型生产过程中的)成本增加恰好被(资本密集型生产过程中的)成本减少所抵消。这样斯拉法就得到了一个由生产技术条件决定而与工资和利润率变动无关的剩余价值与生产资料的比率。

这一理论的关键点在于完整经济体系包含了与标准行业相同的基本方程,但是其比率是不同的。因此只要掌握了各种行业中劳动和物品投入的信息,加上标准行业中关于剩余产品中劳动贡献份额的信息,我们就能够确定整个经济体系的平均利润率,并进一步确定各种价格而无须考虑效用概念或边际分析法。这种理论的另一个优点就是它不依赖于有关规模生产的生产性收益的任何特别的假设。

斯拉法的标准商品概念因此似乎可以作为李嘉图和马克思没有能够找到的理想的“平均商品”(average commodity)。虽然斯拉法对劳动价值论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如我们将在第19章中所看到的),但他并未提供同马克思一样精密的有关转型问题的解答,这是因为标准商品只有在限定的特殊情况下才是一个常量。当标准商品作为其自身的生产资料时,其价格相对于变动的工资和利润率而言是一个常量。而一旦标准商品被规定为其他某种具体的商品,则收入分配的变化将导致该商品价格的变动。此外,技术状况的改变也会使标准商品的构成发生变化。但是斯拉法的标准商品分析法还是为在马克思关于利润的性质和源泉的分析(这一分析仅见于《资本论》第一卷对劳动价值的论述)与他关于生产价格的分析(这一分析见于《资本论》第三卷对货币价格的论述)两部分之间,建立相互关系提供了关键方法。我们将在第19章中简要介绍劳动价值和生产价格间的这种关系。

目前还不清楚斯拉法的价格理论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宏观经济理论之间是否存在一种理论的直接联系。并非所有后凯恩斯主义者都接受斯拉法的理论,但很多对后凯恩斯主义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学者同时也发展、精心演绎和延伸了斯拉法的学说。或许这种联系仅仅就是两个学派都在以剑桥大学为中心的同一种理论传统中的发展。

## 注 释

1. C. E. Ayres, "The Function and Problems of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6 (January 1918): 69—90.
2. C. E. Ayres, *Toward a Reasonable Societ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61), p. 28.
3. C. E. Ayres, *The Industrial Econom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2), pp. 337—38.
4. C. E. Ayres, "Instrumental Economics," *New Republic*, (October 1949), p. 19.
5. C. E. Ayres, "The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Planning," in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enterprise*, ed. S. Eldridge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1943), p. 477.
6. Ayres, *Toward a Reasonable Society*, p. 113.
7. 同上, 第 49 页。
8. Paul D. Bush, "An Exploration of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a Veblen-Ayres Foster Defined Institutional Domain,"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17, no. 1 (March 1983): 36—37.
9. Paul D. Bush, "On the Concept of Ceremonial Encapsulation," *Review of Institutional Thought*, 3 (December 1986): 30.
10. Paul D. Bush, "The Concept of Progressiv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Policy Form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23, no. 2 (June 1989): 460, 461.
11. F. Gregory Hayden, "A Geobased National Agricultural Policy for Rural Community Enhancement, Environmental Vitality, and Income Stabi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18 (March 1984): 181—221.
12. William M. Dugger, *An Alternative to Economic Retrenchment* (New York: Petrocelli Books, 1984), p. 57.
13. John Munkirs,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apitalism*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5), p. 179.
14. J. A. Kregel, "Economic Methodology in the Face of Uncertainty: The Modelling Methods of Keynes and the Post-Keynesians," *Economic Journal* 86 (June 1976): 222.
15. 后凯恩斯主义在货币理论方面的重要著作包括 Paul Davidson, *Money and the Real World* (London: Macmillan, 1972); J. A. Kregel, *The Re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An Introduction to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New York: Wiley, Halsted Press, 1973); and Hyman Minsky, *John Maynard Keyn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16. 这部分特别受益于罗纳德·米克对于斯拉法理论的精彩论述: Ronald Meek, "Mr. Sraffa's Rehabilitation of Classical Economics," in R. Meek, *Economics and Ideolog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967).
17. Piero Sraffa,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p. 3.
18. 同上, 第 34~42 页。
19. 同上, 第 9~10 页。
20. 同上, 第 11 页。

21.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以下书中斯拉法的精密数学论证: Peter Newman,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a Review" in *The Subtle Anatomy of Capitalism*, ed. Jesse Schwartz (Santa Monica, Ca: Good-year, 1977), pp. 346--62.

22. R. Meek, *Economics and Ideology*, p. 173.

23. Sraffa,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 pp. 26--33.



## 第 19 章 当代经济学Ⅲ：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复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十五年内，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进入了一个影响深远的保守主义时期。在战争中受到严重破坏的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都得以复苏。成为战胜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或多或少都取得了稳步的增长（至少与大萧条时期相比，这种增长是令人满意的）。在资本主义国家统治下的大多数第三世界殖民国家，也开展了广泛的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这使得大部分殖民地获得了名义上的政治独立。人们普遍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帝国灭亡的先兆。

在大部分欧洲国家中，劳动者、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人士都日趋保守。他们不断地调整自己以适应资本主义基本的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并成为旨在如何在资本主义体系下改善工人状况的改革的拥护者。在美国，迅速蔓延的反共产主义、冷战以及麦卡锡主义在社会各个方面以及政治上和智力上普遍的压制，导致了劳工组织、学院、大学以及美国社会各个领域中原本颇具影响力的激进社会运动遭受严重破坏。

这是一个悲观和乐观相交织的时代：一方面，冷战的宣传使大多数人都相信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毁灭性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大多数人也相信如果资本主义单独存在，它会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并且最后必将消除贫困阶级差别、帝国主义以及经济的波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为“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已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他们声称北大西洋地区的国家已经迅速实现了普遍受益的政治和经济民主，所谓社会阶级差别和阶级利益已不复存在，因而将这一时代称之为“意识形态的终结”。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局限在：前者坚持已成为资本主义体系组成部分的 20 世纪 30 年代的那些改革措施，后者认为应该摒弃改革继而回到大萧条以前的老路上去。显然自由主义者占了上风。

在经济学学术界中,凯恩斯和萨缪尔森的观点以绝对优势反映着整个社会的形势。从传统的马克思理论和凡勃伦理论中汲取精华的理论者越来越少,并且理论者们还经常否定马克思和凡勃伦的观点以保持自己在学术上的地位。<sup>1</sup> 尽管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规模比激进学派还要大,但也只是在少数学校的极少数部门占据支配地位。而且,若无意外,这些成员都会被当作极端分子来看待。在著名大学中占主导地位的都是微观经济学领域信奉萨缪尔森新古典自由主义综合以及在宏观经济学领域信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追随者。

然而,上述状况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几十年处于一个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的慢性危机时期。这些危机影响着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只是具体程度有所不同。伴随着高失业率和严重通货膨胀的国内经济危机和国际货币危机同时出现,几乎一度作为普遍真理的凯恩斯政策有效性受到了严重的侵蚀。社会危机,其中最典型的是美国的民权运动、1960 年市区犹太人起义和反战运动,破坏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和谐稳定。第三世界国家无数的秘密颠覆和军队政变行为,使人们不得不怀疑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代是否真的结束。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败北,严重扰乱了民众关于冷战意识形态的信仰。最后,政府不计其数的谎言、欺骗和骗局被揭露,尤以水门事件为顶点,破坏了许多人心中的资本主义政府的中立、慈善和民主的公仆形象。他们原以为政府感兴趣的只是谋取每个人的福利最大化,促进和平、协调和全世界的兄弟情谊。

这些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危机导致了并被冷战思维下的严重危机所反映。在学术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危机既导致了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在数量上和影响力上的快速增长,又导致了马克思和凡勃伦的批判主义传统的复苏。本书最后一章正是要对批判政治经济学复苏的若干发展做一简要概述。

## 劳动价值理论的复兴和发展

尽管关于“转型问题”这一概念的适当解决方案早在 20 世纪早期就已被提出。但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劳动价值论都还一直为正统理论经济学家们所忽视(并且常常被轻视)。对于那些知识匮乏的正统经济学家而言,这种忽视是建立在一种文化无知的基础上的。因为他们认为劳动价值论只是简单的指出价格总是与劳动价值成比例的,他们对这种观点不屑一顾。继而,他们错误地认为这种理论不应当受到重视。

然而,越来越多知识渊博的正统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转型问题的解决方案已经形成了。他们忽视了劳动理论是建立在需要证明价值的衡量标准是不变的基础之上的。如同我们在第 5 章和第 9 章中看到的,价值衡量标准不变的证明非常困难。从李嘉图时期开始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劳动理论家们就一直为这个难题所困扰。但在第 8 章,斯拉法在

李嘉图劳动价值论公式的基础上,不仅揭示了这种理论是存在的,而且还证明了关于价值衡量的不变标准是存在于任何资本主义经济之中。

当斯拉法所证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性被一些经济学家广泛认同时,正统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间,就斯拉法的理论形式和马克思的理论形式的本质区别(以及重要性)展开了争论。阿尔弗雷多·米蒂欧(Alpedo Medio)在1972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利润和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表象和实质”<sup>2</sup>的文章中指出,在斯拉法的理论形式与马克思理论形式之间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

米蒂欧的分析指出了马克思理论和“新李嘉图主义”理论最重要的区别。他指出:

价格源于价值,关于“转型问题”的解决办法只是对马克思的补充和证明。尽管这个问题已经被解决,但仍然需要解释利润是如何产生的。”在某种意义上,新李嘉图主义的理论推动经济分析又回到了先前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虽然是在更加复杂和严峻的形势中。然而,利润在资本主义社会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些关于利润的理论是必需的——正如一个实行了种族隔离的国家必然需要种族理论一样。从这个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构成了对关于资本家收入来源和本质的新古典解释惟一有效的替代。<sup>3</sup>

但斯拉法的方法是,当定义所有产出的剩余超出了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物质生产资料时,并且在生产技术给定的前提下,工资和利润的比率是如何影响价格的。因此,斯拉法在他的分析中并不需要劳动价值理论,所以他就没有转型问题。如果有人接受这种观点:“价值论的‘正确’目的在于研究工资、利润率与相关价格、价值分析之间的数量关系,并且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相关概念因此不再成为需要兜圈子的问题,那么所有关于转型问题的讨论都只是庸人自扰。”<sup>4</sup>

正如我们在第9章所看到的,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分析和利润的来源都需要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概念。因此,不同于斯拉法的分析,马克思的理论需要将价值转化为价格。因而这是一个更为宏大的理论,包含着更多重要的课题。米蒂欧简单陈述了对于斯拉法和马克思观点间联系的看法,即在承认斯拉法的“理论为解决‘转型问题’提供分析工具的同时,却否认了它们之间的联系”<sup>5</sup>。

米蒂欧然后用一种数学方法证明了转型问题的解决方案。这种方案具备了传统解决方案的大部分特征,并且可以被表达出来。这使得斯拉法的标准商品(正如我们在18章中所看到的,在任何经济中都可以存在)给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中对利润来源的性质分析与马克思关于生产价格的分析之间提供一个至关重要的桥梁。李嘉图和穆勒都认为,在工资率和平均利润率都既定的情况下,生产技术决定价格,价格将等于生产成本加上一定比率的利润。马克思意识到李嘉图和穆勒都没有解释利润的来源和性质。考虑到商品仅仅作为劳动的价值,马克思又对利润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做出了深入且深刻的分析。

如果并且只要人们此前提出过劳动力价值理论和利润,那么马克思认为李嘉图和穆勒的生产成本价格理论是对生产价格决定所做出的最好分析。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这两个必要条件通过把商品视为劳动的价值而得到发展。但马克思也意识到,他将不得不把价值术语的分析与价格的分析联系起来。在第9章中我们看到,马克思认为,在不同的产业中,只要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同,价格就将背离价值。遵循着李嘉图的思想,马克思证明了价格比率与价值比率的背离程度取决于不同产业中资本有机构成的不同。

马克思试图通过以下两种方法建立起价格与价值之间的联系:第一,总的价格始终等于总的价值;第二,总的利润也与总的剩余价值相等。然而,在解决转型问题的证明过程中,马克思忽略了投入的价值可以转化为价格。这个疏忽为后来的理论学家所更正。然而,这些理论家发现,这些问题一般不能通过马克思遗留下的劳动价值与价格之间的两种关系得到完整的解决。如果问题得以解决并且使得总的劳动价值等于总价格,那么总的剩余价值一般都不等于总利润。同样,如果解决的方法是使得总剩余价值等于总利润,那么总价格一般就不与总劳动价值相等。再者,我们在第9章中看到,在劳动价值转化为价格之后,为了获得等式中的任何一个条件,就必须去找到一个计价标准来计算总量。这种计量标准只可能是一种商品,且这种商品的价格在转型之后总是等于其价值。

在第18章,斯拉法的标准商品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衡量价值的不变尺度标准(当标准商品的价格以它自己的生产资料表现时,它将恒定的改变工资和利润的比率)。现在,这种非常特殊且受到约束的恒定性使斯拉法的标准商品作为理想的计量标准受到了限制。这种理想的计量标准是以劳动总价值等于总的价格或者总的剩余价值等于总的利润的形式存在的(除了在大多限制性的和不切实际的假设条件下)。因此,米蒂欧的方法不得不抛弃马克思用来联结劳动价值与价格之间关系的两个等式。

然而,马克思提出第三种方法来使价格与劳动价值相联系。在第三种方法下,米蒂欧证明了斯拉法的标准商品为马克思理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马克思意识到如果一种商品能够根据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而进行生产(据斯拉法的观点,我们必须增加一种情况,即在这种平均商品的生产过程中达到顶点的每种投入,必须在同样的社会平均状况下被生产出来),那么,所有包含于那种商品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的利润率将会是一样的,而无论所有的商品是否是按他们的劳动价值或者按把他们转化成货币之后的步骤出售。因此,这种商品的利润率将完全由劳动的价值来决定。更有甚者,因为竞争使得利润率均等化,可以看到社会平均利润率(这种利润率使得所有的价格计算将由价格的生产成本理论决定)将与平均商品的利润率相对应——这种利润率将完全由劳动价值的计算来决定。

米蒂欧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论所需要的关于劳动价值与价格的惟一联系。对劳动的分析仅仅是为了展示作为剩余价值的利润的性质和起源。价格的生产成本理论随后展示了竞争是怎样导致剩余价值在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的(通过价格变化),以致于不同产业中的利润率趋于均等化。如果衡量总利润和总剩余价值的计量标准(或是衡量总

价值和总价格)不能建立起来,那么利润率由劳动价值决定的一个平均产业将足够联结关于劳动价值的分析和价格分析。

在米蒂欧证明产业中的斯拉法的标准商品时,马克思关于利润率的公式为: $p = (s/v)/(c/v + l)$ ,这个公式始终是正确的。在米蒂欧的证明过程中,利润率( $p$ )就是资本家为了和价格保持一致所用以标出货币成本的货币利润率。剥削率或者说剩余价值率( $s/v$ )是以劳动价值的形式定义的。这种剩余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的,因此在每一个产业中都是相同的。资本的有机构成( $c/v$ )在米蒂欧的公式中一直有着特殊的意义。它仅仅是由劳动价值决定的,但它又是生产标准商品的所有产业在生产过程中的一种加权平均。每一个过程都被赋予了一个权重,这个权重是由数学乘数决定的,而数学乘数又是存在于标准产业生产标准产品的过程之中的。当然,标准企业是一种臆想,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斯拉法却证明了在任何现实经济中用以达到组成标准产业的估算程序是可行的。因此,米蒂欧对在标准产业中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加权平均水平的估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整体经济中资本总有机构成的指数(严格按照劳动价值的形式),并向劳动价值论提供了劳动价值分析和价格分析之间极其重要的联系。这就完成了对劳动价值论讨论长链中的最后一环——这一环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中仅仅部分被完成,而另一部分则是在李嘉图的《经济学原理》第一次出版之后才告完成的。

斯拉法的分析对马克思经济学原理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使得劳动价值论更加严密且更具说服力。同时也展现了仅仅当所有部门的有机构成都相等时,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才具有适用性。因此这个曾错误地被用来揭穿马克思理论的原理,现在则被证明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原理的一个必要条件。这就意味着,基于科学和公正,理论经济学家将不能再歧视那些拥护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这种歧视曾长期存在,这点为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所承认,也反映了他们思想的偏见和顽固。

20世纪80年代,关于转型问题的另一些解决办法被提出来。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是安瓦尔·谢赫(Anwar Shaikh)。他所提出的解决办法体现在发表于1977年和1984年的两篇重要论文中。<sup>6</sup>在1977年的关于转型问题的论文中,谢赫考虑要建立马克思理论与他所认为的“正确”价格的联系。这种正确的价格源于拉迪斯劳斯·冯·博特基威茨(Ladislaus Von Bortkiewicz)在1907年写的一篇文章。博特基威茨假定每一个产业所生产的所有黄金,在它的价值等于它的生产价格的情况下,也可以作为一种计量标准。在这种假设下,他展示了转型问题的永恒解决方案是如何被计算出的。他的结论是总的剩余价值总是等于利润的总货币价值。但是,总的生产价值却不必要等于总的生产价格。

不同于发展出一种新的数学工具,根据谢赫的理论,所有人都不能不接受马克思的步骤,并运用这个步骤进行一系列的连续重复计算。如果有人接受了马克思的产品价格并把它们运用到投入上,然后运用马克思原理来获得新的产品价格等,最终将会汇聚到博特

基威茨价格。然而在谢赫实际上所采用的步骤里,其中一些假设可以在博特基威茨的价格论上找到,却不能在马克思的相关书籍里发现。他假设每一步中的总价格都等于总价值,并且在每一步中都调节货币工资以保证能让工人以先前的价格消费一定数量的商品。谢赫的步骤确实获得了与博特基威茨方法一致的一系列价格,并且同博特基威茨一样,他仅仅获得了马克思总量条件中的一个。谢赫的方法中,总的剩余价值不等于总的利润。这是他在1984年的论文中所研究的课题。

在1984年的论文中,谢赫认为转型问题的解决办法不应该采取特殊的假设以迎合马克思的两个总量条件。相反,他还推理,我们应该期望总剩余价值与总利润不同。这种不同归结于价格—价值的偏离程度和奢侈品部门的规模。当奢侈品部门中存在价格与价值的偏离时,通过收入的循环作用就可以获得或失去剩余价值。谢赫关于这场争论的证明利用了平衡增长的假定。在平衡增长条件下,他展示了剩余价值与利润率是不同的,并且这种不同与奢侈品生产部门中价格与价值的偏离程度成比例。

解决转型问题的第三种方法,被一小群数量虽少但人数却处于不断增长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称之为“新的解决方案”。它于1982年第一次被利佩茨(Lipietz)介绍给英语读者,但是最初解决的解决办法是G. 迪梅尼尔(G. Dumenil)于1980年形成的,后来被邓肯·福莱(Duncan Foley)于1982年独立“发现”。<sup>7</sup>这个新发现需要回到马克思的两个重要假定。第一个就是“总价格等于总价值”应该被修正为“净产品的总价格(被定义为增加的价值)应等于净产品的总价值”;第二个假设认为,应该把分配定义成工人获得的实际货币工资的价值或者是工人在现有价格下所购买到的一系列商品的价值。一旦这两种假设得到肯定,在马克思两个总量条件的性质下,任何一种价值都可以转化成任何一种价格。

迪梅尼尔和福莱对于采用他们净产品独一无二的标准化程序,做出了两点说明:第一,他们宣称这个标准化的过程可以避免重复计算。另外,他们都认为这个标准化过程遵循了马克思关于价值的观点——即价值“是连接在一个生产时期付出的总劳动与净产品的桥梁”。<sup>8</sup>第二,他们认为工资应该在价格的基础上计算而且并不是按照工资束的价值来计算。这种分配的观点避免了当价格背离价值时,以价格形式存在的剥削率依赖于工人所购买的一系列特殊的商品,而不取决于生产过程。他们进一步指出,在以前的公式中,如果工资的任何部分被节约下来,那么剩余价值率就变得难以计算。与迪梅尼尔相反,福莱继续争辩,认为工资不应该被作为束来考虑。福莱宣称工资是在现有的价格下可以购买任何商品的总货币。另外不同于工资束,货币工资揭露了资本主义关系的剥削本质,因此证明了马克思所断言的市场的一般功能,揭露了资本社会关系的真正本质。

另一种意见则与此相反。在“新的解决方法”中的生产价格下,不变资本的总价值不等于其总价格。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证明了这个结论是成立的。另外,分配的假定需要事后知识。在工资率确定之前,一定要知道价格的真实组成。我们不可能一步一步从价

值移向价格。当新的解决方法仅仅只为从这个领域到那个领域提供了一个测量程序时,两个领域就必须分开进行考查。

当大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开始复苏时,劳动价值论也处于不断发展中(在这一章,将会简单地讨论这方面的问题)。这场全面的复兴也使得劳动价值论的另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将有技能的劳动转化成无技能的“简单”劳动的问题。虽然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针对这个问题发展出更为严格且系统的方法,但可能大部分的诡辩性分析都出自于鲍勃·罗斯(Bob Rowthorn)的一篇名为“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熟练劳动”的论文。<sup>9</sup>这篇文章证明,无论是从表面上还是从数学上来看,熟练的劳动技能都可以被看作是非专业技能的简单劳动和教育性训练活动的结合。在这种观点中,熟练劳动被当作是一种可以生产出来的商品,它与训练和教育的费用一起构成了生产成本的组成部分。罗斯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可以用来解释熟练劳动的价值(把熟练劳动分解成非熟练劳动)。同样,马克思主义价值论也可以解释其他商品的价值。

### 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过程的变化

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他认为单独讨论孤立的、抽象的特定生产要素是没有意义的。生产是一种纯社会性的人类活动,是将不可用的环境转化成有用生产物的人类劳动。当然,人类的生活是以环境为先决条件的。地球是一个未知的几百万年前就有人类存在的地方,它提供一些要经由人类劳动转变的原材料来维持生命的延续。经过近两个世纪功利主义思想的涤荡,这段陈述显得不言而喻甚至于有点迂腐。这种思想使我们认识到土地和资本几乎是以同样的劳动方式来生产商品,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获得了与他们要素产出同价值的收入,这一点与劳动者获得工资是完全相同的。

功利主义观点完全模糊了这样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生产是将先前不能用的地球外壳改造成可以维持人类生存且能提供享受的人类劳动过程。土地能够自己生产并以某种方式转化成农产品的观点又是多么的可笑。当资本被视为是物质生产资料时,它显然应该被理解为它仅仅是过去劳动的产品。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有一些神秘的“永恒实体”在生产的过程中通过资本生产力的特点能够被测量,这无疑是非常荒谬的。而认为资本能够自我生产的观点是相当荒谬的,并且当我们认真审视它时,很容易就能推导出,人类迂回的、耗费时间的劳动过程通常是更有效的而不是更短暂的、更直接的人类生产过程

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类劳动才会被贬低到一种商品的形态,才可以使其他商品上升到人类的水平并且认为它们是按与人类生产一样的方式进行自我生产的。这是来自于功利主义经济学的一种蒙昧主义思想。

正如马克思所坚信的,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它是非生产性部门向生产性部门勒索大部分生产产品的一种权力。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而产生,是需要一些历史、社会和科技背景为先决条件的。在这些条件中,劳动部门的扩张是极为重要的。如果劳动的分离前行至一点,例如:制鞋商不生产鞋或制鞋工具;织布工不生产毛织品和织布机,何况大部分其他生产过程都是相互关联的。如果他们普遍否认了生产中必需的生产资料(原始积累)(由其他工人生产),那么工人将不能生产出产品。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所有权关系构成了这样一个否定,否认工人的生产能力赋予了资本家对工人生产出的部分产品进行压榨的权力。在资本主义社会,大部分收入被划分为利润、利息或租金,这三者显然都是源于剥削。

资产阶级的收入源于强制性地创造出并维持使工人阶级处于依赖和无助的社会地位。在资本主义初期,对一切生产资料(原始积累)的强力且血腥的掠夺足以赋予资本家这种力量。但是,只要劳动者还保留着他们的知识和技能,他们就保留下了一些权利和独立性。资产阶级的力量需要这些知识和技能在工作中,与使用它们的人们最终走向分离。工业革命和工业生产的崛起加速了工人们无助和依赖的过程。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描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了在生产的过程中劳动分工在性质方面是怎样发生戏剧性、历史性、不曾预料到的变化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分工对应着生产一种或两种产品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例如:制鞋商具有生产鞋子所需要的一切知识和技能,但要依靠其他专门的生产者来生产衣服、食物和其他必需品。任何一个专门部门的工作都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然而,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过程中,一种戏剧性不同形式专业化产生了——脑力劳动从体力劳动中分离出来。

只生产一种商品的工厂劳动被分解成了许多简短的重复性劳动。工人每天每时每分都只需重复进行单调的操作。这种生产方式对于资本家来说有两重好处。第一,这使得资本家能够对工人进行更苛刻的训练并实现更有效的控制。第二,它剥夺了工人生产商品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并且更加重了工人的无助和对资本家们的依赖。这就是为什么路德分子捣毁工厂和机器,以及为什么资本主义政府要通过一项法律使破坏机器的人接受死刑惩罚的原因。

当这种专业化的过程使得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发生分离时,它将多种形式的工厂工作降低到了一个低于人类本能的水平。同时它产生了这样一个观点,即白领或脑力劳动者是工人阶级中享有特权的社会阶层。当这种观点在20世纪早期的工厂体系中被付诸实现时,白领的特权地位就成为了一种神话。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20世纪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复苏过程中,哈里·布雷弗曼(Horry Braverman)的《劳动和垄断资本,20世纪的劳动退化》成为了标志性著作。<sup>10</sup>通过对20世纪不同类型的劳动过程进行各种研究以及对劳动过程中正在转变



的性质进行大量的数据积累,布雷弗曼发现在白领工人(脑力工作表)的工作中,大多数生产性的努力已经将整天的工作分解为每分钟的、无止境的、重复的、单调的任务,工厂的工人因为这种工作分解方式而彼此疏远。另外,白领的工资比工厂中工人的通常要少。布雷弗曼写道:

办公室是脑力劳动的场所,而车间是体力劳动的最初场所……科学管理使办公室垄断了概念、计划、判断,以及对结果的评价工作,而在车间里,除实际执行办公室里所想出的工作外,不进行别的事情。果真如此,那么把办公室工作同用脑筋和受过训练的劳动混为一谈,把生产过程本身同不用脑筋和未受过训练的劳动混为一谈,就有些道理;但是,当办公室本身也受到合理化过程的影响时,这种对比就失去说服力了。思考和计划的职责,集中在办公室越来越少的一些人身上;对于办公室的大量人员来说,办公室像工厂一样,也是体力劳动的场所。随着管理工作变成一种行政管理的劳动过程,体力工作就进入办公室,很快变成大量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工作特征。<sup>11</sup>

因此布雷弗曼扩展了马克思的理论分析并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产业工人劳动的退化(马克思已用历史细节予以详细描述)已成为一种标准并且蔓延到了所有行业之中。在布雷弗曼的文章中:

使劳动人民变成一种“劳动力”,一种“生产因素”,资本的一种工具,是一个不断的无穷无尽的过程。这情况是使受害者厌恶的,不论其工资高低,因为它破坏了人的工作条件。由于工人作为人并没有受到毁坏,而只是被非人地利用了,所以他们的批评能力、才力和构思能力,不论如何削弱、如何降低,对资本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一种威胁。<sup>12</sup>

威胁来自于工人不可摧毁的人类潜力,这必然构成了资本主义体系的长期挑战。这些冲突主要发生在家里、学校和社会,也发生在工作场所。资本家的目的在于使工人变成无意识、温驯服从的自动生产机器。工人们斗争是为了维护其有感情、有体力、有美感、有智力的特征并使他成为人类。当工人意识到这完全是一场以他们自己为战争因素的斗争时,作为人类不可避免的结果,或者作为纯粹的个人,他们要求从空虚、厌倦、不安、焦虑和自卑的情绪中解放出来。资本家在这场争斗中还有最后一招——那就是让工人们把这场战斗看作是纯粹个人的斗争而不是阶级的斗争。

新古典经济学家和激进的经济学家最显著的不同点之一在于,前者倾向于认为对社会经济各方面的理解可以完全独立于任何社会学、心理学或者政治学的理解,或者认为理性的、最大化的“经济人”观点解释了人类行为的所有方面;而后者则认为经济学家研究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现实经济与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都是息息相关的。一旦与整个社会的有机总体相隔离时,社会中没有哪个方面能够单独被人们充分地理解。

因此,当布雷弗曼在书中分析发生在工作场所中阶级斗争的影响和效果时,就直接指

出,这些发生在工作场所的各方面阶级斗争,一般也会出现在家里、学校里、政府中和社会里。我们先暂且考察发生在工作场所之外的阶级斗争,然后再回到布雷弗曼关于在工作场所阶级斗争结果的分析中去。

建立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和中期威尔海姆·赖希(Wilhelm Reich)理论成果的先驱性工作上(忽略他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20世纪40年代的著作,因为在这段期间赖希患上了精神衰弱症),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试图说明文化风俗如何更多地支配家庭生活,尤其是性别角色的社会化,这就否定了许多人类最深层的需要。他们认为这种否定产生了有益于资本主义的精神抑制。赖希认为这种抑制最主要的形式就是性压抑。他坚信资本主义性压抑的根源是家庭生活中性别角色的社会化,这种抑制形成了一种被动的、顺从的人格。这种人格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必需的,因为他们可以用民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表象去掩饰和模糊资本主义体系的独裁功能、不民主以及欺骗性。根据赖希的观点:

性需求的压抑产生了普遍的智力和情感功能的弱化,特别是它使人们缺乏自主能力、意志力和一些重要的能力……强迫的家长式的家庭以这种方式通过性道德和在有机体内发生的变化创造了一种精神结构,这种精神结构产生了依赖于社会权威规则的大众心理。这种附庸体系是性别软弱、无助的混合体,渴望获得领导权,惧怕权威,惧怕生命和神秘主义……这种结构下的人们是不可能获得民主生活的。<sup>13</sup>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已经超越赖希所强调的性压抑,他们试图展现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管理家庭生活的主导文化习俗,从而在许多方面培养一种疏远的、消极的和顺从的人格,这些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成功运作而言是十分关键的。代表这些观点的著作有:布鲁斯·布朗(Bruce Brown)的《马克思、弗洛伊德和日常生活的批判》和埃礼·扎瑞特斯凯(Eli Zaretsky)名为《资本主义、家庭和个人生活》的论文。<sup>14</sup>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广泛地研究了资本主义教育体系。他们发现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学校教育抑制了好奇心,诱导学生产生了消极的、服从的和逆来顺受的心态,并且不断复制出这种类型的性格、知识和技能,这对于阶级结构能够永恒存在以及隐身其中的分工体系而言是必须的。代表这些观点的文献有:米丽亚姆·沃瑟曼(Miriam Wasserman)的《非神秘化学派》<sup>15</sup>、塞缪尔·鲍尔斯(Saruel Bowles)和罗伯特·金德斯(Herbert Gintis)的《美国资本主义下的教育》<sup>16</sup>。教育体系在反复灌输为资本主义地位辩护的各种思想方面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前大部分课本中的分析展现了占据主导地位的学术传统是如何努力进一步系统地接受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辩护的思想。

对资本主义持接受态度的大量通讯媒体也是同等重要的形式。控制这些媒体的公司,理所当然地只对保持住他们的地位感兴趣。广告客户是媒体行业收益的主要来源。许多激进作家广泛且详细地说明了大众通讯媒体为了控制舆论是如何歪曲和审查新闻稿

件及其他材料的,代表性著作有:詹姆斯·阿伦森(James Aronson)的《报界与冷战》<sup>17</sup>和罗伯特·克林诺(Robert Cirino)的《不要责备人民》<sup>18</sup>。毋庸置疑,其中研究最彻底的、最具学术性的是爱德华·赫尔曼(Edwards Herman)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制造同意:传媒政治经济学》<sup>19</sup>。

最后,激进学者研究并揭示出了,披着民主外衣的政府被资本家们控制的程度以及他们推动并促进资本家利益的程度。让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永存的一种主要手段在于:限制对一些问题进行合法的政治辩论。这些问题会对经济命脉的控制和资本主义运行的社会过程产生挑战。在这一领域做出激进研究的著作有:G. 威廉·多姆霍夫(G. William Domhoff)的《谁在统治美国》和哈瓦德·L. 里尔特德(Howard L. Reiter)的《美国共同体中的政党和选举》<sup>20</sup>。

这种调节和控制工人阶级的非经济方法巩固了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但资本家权利最重要的基础和每一种形式的控制所产生的结果都在于控制生产的过程。布雷弗曼的研究表明了这种开始于工业部门,然后扩散到其他领域部门中的控制是如何系统的剥夺掉工作中所有的感性、审美和精神满足,从而使许多白领的工作变成单调的、重复的并且把几乎所有工人都贬低成像机器附属物一样非人的角色,而机器的运转仅仅只是人工智能在某个方面的模拟。为了对经济进行最大程度的控制,大量其他形式的情感和智力控制是完全必需的。

在私人企业的层次上,资本主义代表着一种非常复杂的、以理性计算的形式来进行经济计划的经济体系。用布雷弗曼的话来说:

现代管理部门所采用的控制概念,要求生产中的每一活动,在管理中心都有其若干平行的活动;每一活动在整个进行过程中和完成时都必须加以设计、预先计算、试验、布置、分配任务、发命令、核对、检验和登记……正像人类的劳动要求劳动过程既在工人的头脑中进行也在工人的体力活动中进行一样,现在,已经从生产中转移到一个独立的地方和一个独立的集团中的劳动过程的映象,也控制着劳动过程本身。<sup>21</sup>

当资本主义在私人公司的层面上以计划为特征时,而在总量的层面上,整个经济像它所一贯表现的那样,依然处于无政府和市场非理性的状况。

### 总体水平下的资本主义状况

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取决于资本家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垄断。这种垄断不可避免导致了收入分配极端不平衡。从马尔萨斯到马克思再到凯恩斯,许多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这种不平衡导致了整个社会的不稳定,停滞的趋势,无理性以及表现为资本主义特征的社

会机能混乱。在凯恩斯之后,许多传统经济学家认为这种不稳定性和非理性将会通过政府干预,如果没被消除的话至少明显减轻了。随着20世纪60年代批判性政治经济学的复苏,许多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凯恩斯主义不曾也不能消除这种资本主义本质中的非理性。

1966年,保罗·A. 巴兰(Paul A. Baran)和保罗·M. 斯威齐(Paul M. Sweezy)出版了一本颇具影响力的书——《垄断资本》。在这本书中巴兰和斯威齐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剩余(economic surplus)(被定义为“社会产品与社会生产成本之间的差别”<sup>22</sup>)具有跨时代的永恒性。由于资本主义中收入分配的极端不平衡,商业公司还需要继续熬过艰苦的时期去寻找足够的总需求。当总需求不足时,剩余将不能被售出(或“被吸收”,或被利用)。根据巴兰和斯威齐的理论:

剩余的大小是生产能力和财富的指标,是一个社会享有多大自由来完成它给自己树立的任何目标的指标。剩余的组成部分表明一个社会是怎样利用那种自由的:它在扩大它的生产能量上投资多少,它以各种形式消费多少,它浪费多少,是怎样浪费的。<sup>23</sup>

大部分垄断资本被试图理解为美国资本主义是如何吸取其经济剩余的。初始和最明显的吸取,来源于资本家的消费和投资。在与马尔萨斯、马克思和霍布森、巴兰还有斯威齐相似的一些分析中发现:支持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制度是如此强大以致于当资本主义成长时,资本家消费和投资支出的规模虽然缩减了,却依然足够吸取更多数量的剩余。

不管人们怎样转弯抹角,终究没有办法可以避免得出这个结论:垄断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制度。它总是形成越来越多的剩余,可是它不能提供为吸收日益增长的剩余所需要的因而是为使这个制度和谐运转所需要的消费和投资出路。既然不能吸收的剩余就不会被生产出来,所以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状态就是停滞。在一定的资本总额和一定的成本与价格结构之下,这个制度的开工率不会高过生产出来的剩余数量能够找到必要出路的那一点。……如果听其自然——即是说,当不存在构成这个制度的所谓“基本逻辑”的一部分的抵销力量时——垄断资本主义会越来越深地陷入长期萧条的泥沼中。

抵销的力量确实是存在的。如其不然,这个制度早就应当自行崩溃了。因此,理解这些抵销力量的性质和含义是一件最为重要的事情。<sup>24</sup>

第一种对抗力量是大公司的“销售促进”：“经济系统中的竞争是残酷且无情的,并且除了其中少数竞争对手会削减价格外,广告在竞争中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武器。”<sup>25</sup>通过“广告”,巴兰和斯威齐继而认为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促进销售。这些方法包括“广告,各种各样产品的外观和包装,有计划的报废、款式的改变、信用计划和类似的方法”<sup>26</sup>

导致更多剩余被吸收的促进销售的主要方式并没有引起人们中间更高比例的支出或是一些支出能够转化成更多数量资金的储蓄(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它确实有这种作用);最

重要的影响在于它制造了大量的浪费。大量的开支花在过时的计划以及昂贵且不必要的款式改变,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广告和促销工作表。所有的这些对于生产或商品的实际适用性毫无贡献。从社会的某种角度来看,所有这些支出纯粹是浪费。而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这种大量浪费性的支出被许多企业“准确地称为‘复苏的必要手段’”。<sup>27</sup>所有这些形式的经济浪费都吸收了一部分剩余价值:“不同于净利润形式吸取的剩余价值构成,以销售成本形式出现的这一部分并不要求在资本家的消费中有与之相对应的部分,没有投资的途径,它确实由自己向自己提供补偿和出路。”<sup>28</sup>

第二个对抗的力量是政府。根据巴兰和斯威齐的观点,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投票只是政治权利名义上的来源,而金钱才是真正的源泉。换言之,这个体系在形式上是民主的,但实际上却是由财阀统治的”。<sup>29</sup>因为资本家在政府部门和政府开支中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因此,他们以这种方式吸收剩余价值,将提高或者至少不会影响已有的财富和收入不平衡结构的存在。用巴兰和斯威齐的观点来看,这严重地限制了“民选政府支出”的范围。

政府部门关于诸如公园、图书馆、贫民窟的清理和一般福利上的支出必须限制在一定水平上,以保证既能稳定穷人和失业者温和的情绪,同时又能保留现存的财富和收入分配状况。根据巴兰和斯威齐的研究:“在给定的美国垄断资本主义权利结构下,民用支出的增长在1939年就已经到达了它最大的边界。反对进一步扩大支出的对抗力量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不能战胜。”<sup>30</sup>此后,政府支出的大量增加,作为国民生产总值的一部分,主要来自于军事领域和帝国主义领域。

政府支出在军事领域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些我们在第15章就已经讨论过了。然而,巴兰和斯威齐关于资本帝国主义的重要讨论必须进行下去,因为他们书中的内容涉及越南战争,而越南战争使以资本帝国主义为主题的利润复苏。他们的说明虽然简短但极具说服力,这引起了人们对这个论题进行重新研究并撰写著作。我们将提及这类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几个例子。

巴兰和斯威齐总结说,尽管这些对抗性支出已经足够避免大范围的萧条或社会灾难,但在未来是否足够仍然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他们认为,阻碍这些支出连续扩张的最重要力量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些运动多半是由社会主义者领导的,并且他们的目标在于把自己的国家从那些追逐利润的跨国公司手中解放出来。

尽管我们不知道资本主义的命运究竟会怎样——巴兰和斯威齐并没有预言它们即将来临的崩溃——这些对抗力量阻止了资本主义陷入到停滞和萧条的泥沼之中,却急剧增加了浪费和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巴兰和斯威齐由此得出结论:

一方面,社会的生产方法和体现这种方法的组织越来越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运转和对它的理解却呈现没有衰退的自然性和不合理性,两者的矛盾,造成了意识形态上的一片荒原,这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标志。但我们必须坚持,这并不是——像某些对

现状的辩护者想要我们相信的——“意识形态的末日”；这是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和没落的意识形态取代了上升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现在的这种意识形态的主要支柱就是反共产主义，这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由于各种政治力量的暂时的结合，就像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政策和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备战和“冷战”一样。这些政策只能是反对；没有剩下什么东西是它们所要拥护的。<sup>31</sup>

在重新唤起经济学家们对资本帝国主义现象的兴趣方面巴兰和斯威齐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或许在这场复苏中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是哈里·马格多夫(Harry Mogdoff)出版于1969年的《帝国主义时代：美国对外政策的经济学》。<sup>32</sup>马格多夫的贡献不是主要在于推进了资本帝国主义理论并超越了我们在第13章中所讨论的理论范围，而是在于他运用了大量数据来证明这些理论持续的适用性和应用能力。马格多夫清晰地证明了有关帝国主义的许多数据，例如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相比，可能显得不那么重要。但在估算美国经济资源需求和大型跨国公司的利润时，这些数据却是至关重要和具有战略性意义的。

在评价资本主义美国同第三世界经济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时，马格多夫将注意力又放回到下述事实。被美国国防部门定义为“战略性的和至关重要的”的62种原材料主要依靠进口，其中的38种新的供给品有80%~100%都是进口的，有多于14种原材料的40%~79%是进口的。再者，他引用有关第三世界经济实体的研究成果：有37个不发达国家从不到6种商品的出口中赚取58%~99%的出口收入。<sup>33</sup>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这些经济体占据着极其有利的贸易形式，从而保证了自身有廉价的原材料可进口和有利可图的投资出口。日益增长的美国公司销售额和利润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美国公司国外附属公司的出口和销售，这些进口和出口当然大部分是通往第三世界国家的。<sup>34</sup>但是，贸易顺差通常都是以这些国家中人们的生活水平为代价的。因此，这些国家的大部分民族解放运动都是指向美国和资本主义的，所以美国政府就必然会利用和甚至扶植这些国家的政府以保护和增进美国公司的利益。马格多夫指出了53个不同的“美国国防承诺和保证”，即允诺美国将会动用武力来维护这些国家现存的政府，而这些政府一般都是其人民所反对的。<sup>35</sup>

马格多夫引用了通用电气公司一位官员如下的言论：“追求利润的动机让我们站在逐步推动国际贸易的国家政策这一边。并且这种国家政策在反对共产主义的冷战中是增强自由世界的一种手段。”然后，马格多夫得出结论：“正如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有利于寻求利润，因此寻求利润又进一步促进了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还能够想象出来有什么是比这个更完美更和谐的利益呢？”<sup>36</sup>在19世纪90年代，帝国主义试图以所谓的“让基督来教化、提高和教育”生活在第三世界的人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则称之为从共产主义的“魔掌”中拯救人们的灵魂。上述一切做法都完全是蒙昧主义，并且使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剥削在道德上合理化。

在20世纪70年代,激进经济学家提出了有关帝国主义数不清的案例研究和理论探讨。这些著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这三期专刊(Spring 1971, Winter 1972, and Spring 1973)。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文章和书籍都反映了美国帝国主义许多具体做法。其中最有说服力的也最骇人听闻的是爱德华·赫尔曼的《真实的恐怖网络:事实中及宣传中的恐怖主义》。<sup>37</sup>依据可靠的信息来源,赫尔曼引用了不计其数的数据,并用大量篇幅引用了各种组织的正式报道。所有这些描述从头到尾都带着令人压抑的情绪,并最终得出一个结论: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安置并维持了(在经济和军事上)不受欢迎的、腐败的、野蛮不道德的政府;这些政府代表着极少的本土精英分子和跨国公司的利益;这些政府奉行着致使这些国家中现存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进一步恶化的政策;他们制造出广泛且普遍的恐怖来控制人民向他们效忠;他们用谋杀和折磨来对待任何一个被怀疑成有反政府倾向的公民。美国政府直接或间接地支持和教唆(偶尔指导并监督)这些国家的恐怖、折磨和谋杀行为,而在名义上冠以“共产主义”战争和保护“民主”。那些被谋杀的很少是共产主义者(即使身在民主国家,他们也只是被假定成拥有捍卫自己政治哲学的权利)。受到保护的集权主义和军事主义政府从来都是不讲民主的。用一句话概括:美国可以运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来捍卫利润并创造利润,甚至包括严刑拷打和谋杀。

### 对本书社会观的评论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在许多经济学家做出重大贡献的基础上,激进经济学的复苏已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前面的探讨并未对此进行全面的论述,仅仅只是对其中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要完成一篇当代激进经济学的全面概述,至少需要与写完一整本书相当的工作量。笔者愿意用隐含于书中的一般方法论、社会和伦理观点来作为本章及本书的结束。所有这些观点可能与激进主义传统的经济学著作存在不同之处。

所有的社会理论都基于人类行为心理学的一些假定和人类在伦理及合理的范围内可行的一些假定。关于功利主义经济是无价值取向的说法,经常被西尼尔、巴斯夏、门格尔、弗里德曼等思想家所论述。这种观点是十分荒谬的——读过这些思想家著作的读者将很容易察觉这一点。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所有的社会理论似乎都取决于一种特殊的心理和伦理的理论,不管这些理论是被明确定义的还是含蓄假定的。大多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和所有新古典经济学家把他们的经济学理论建立在人类心理学和伦理学的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概念之上。功利主义心理学和伦理学特别适合为资本主义思想披上一层保护的面纱。

纵观历史,资本主义的强大力量在于它无限增长了超越自然的人类需求,改革了人类

的生产,并且只有这样做,才可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释发了所有人都可以生活在安全及舒适的物质世界的可能性。然而,与此同时,这个社会体系会造成社会的、心理的、情感的和伦理上的伤害。对于这些伤害,我们束手无策。对于这种不断增长的生产力,我们也无法以社会或个人的方式加以运用。

功利主义基于两个理由为这种社会体系提供了一种理想的理论辩护。第一,功利主义下的个人感觉、情绪、思想、行为方式和需求被简单地处理成抽象的东西。社会化的方式以及人口增长和人类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限制,已经从考虑范围中排除了出去。基于人道主义而对资本主义一般化的批评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它已经超过了任何基于功利主义心理学和伦理学的社会科学范围。第二,功利主义者不仅把人类需求看作是独立的社会关系,还把人类当成是这些需求的满足,进而把满足这些需求当成是商品消费。这并不令人惊讶,资本主义——从整体上而言,在被功利主义经济理论狭隘定义的人类福利范围内,在扩展商品的能力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本书中,对功利主义的批评是基于人类的需求大部分是由社会决定这一信条的。同样,他们的满足可能会增加也可能不会增加人们的福利;人类生产是一种社会现象,没有人(而不是作为一个无生命的物体,例如一片土地或者一台机器)可以为大量产品的生产独立负责。最终目标和生产成果的利用是由社会决定的,并且既能对人类的存在产生有益影响,也有可能产生有害影响。

作为公民的我们,如果没有如此彻底地被灌输功利主义观点,那么上述两种观点显然都是不证自明的。我们都知道,对瘾君子和精神病患者需求的满足并不能增进人类福利,我们,也知道人们不能简单而臆断地被认为是瘾君子或者是精神病患者。当我用偏激的事例来阐述我的观点时,论证的逻辑性对于评价人类福利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我们能够也必须对需求自身以及满足需求的社会手段做出伦理上的评价。尽管功利主义仍普遍深入地影响着我们大多数人的思想,但总有一天,还是会在平凡生活的实际需要中被丢弃。人类的活动、思索、写作是建立在包括道德情感、规则和概念在内一些事物的基础之上的。尽管功利主义教条四处泛滥,并对维护资本主义的地位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但每天日常行为中所反映的一些基本情感却显示了我们大多数人并未用功利主义方式去行动和思考。据此,笔者很乐意把构成本书的一些心理学和伦理学的假定清楚地展现出来。因篇幅所限,只能对它们做一简要阐释,因为关于它们的讨论还会纷至沓来。

本书中潜在的伦理学观点是建立在以下观点基础之上的。第一,根据凡勃伦和马克思的理论,笔者认为所有社会中所有人都会具有一些共同需要,因为他们都是人。这些普遍需要不幸被凡勃伦贴上了“本能”这一标签,这就模糊了普遍需要和动物本能之间的本质不同。人类的普遍需要通过我们的生活在不可避免且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但它们与有意识的人类欲望是有区别的。例如,酗酒者有意识的欲望就是消耗大量的酒精,但并不减少他们对基本营养品的需要。然而,人类的基本需要只有在社会体系中才能转化为有意识的欲望和作为个人参与社会过程的结果。



事实上,社会化可能是使一个人达到这样一种状况:他还没觉察到任何有意识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来自于一种天生的普遍需求并可能导致普遍需求的欲望。这种情况一般会在神经焦虑的个人身上达到极点。社会化可能导致有意识的欲望阻碍一般人类需求的满足。答案再次是神经质的焦虑。在社会心理学家卡伦·霍妮(Karl Horney)看来,这种焦虑意味着“一种渺小感、软弱感、无助感”。<sup>38</sup>但在一定程度上,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这个世界是由彼此虐待、欺骗、袭击、侮辱和背叛的人类个体组成的。这些感觉是神经质的,只不过因为个人总是感觉到环境是自然的、不可抗拒的,并且这些感觉来源于人类个体所具备的本质以及社会本质。这两种来源都是固定不变的。如果人们意识到,他们对个人的真实本性产生了社会否定,并且一个否定人类自身人性的社会在事实上可以通过人们的集体行为发生改变时,那么这种感觉将不会演变成成为一种神经质。

第二,人类的一般需求是具有层次性的。事实上,一些需要与其他需要相比具有优先权的惟一理由,在于它们被划分成了“更高层次”或是“更低层次”。所有的人类一般需求都具有不可削减性、基础性和自发完整性。人类一般需要的适当满足对于实现人类生活目标而言都是基本的,且至关重要的。<sup>39</sup>

在人类需求中最低层次或者最基础的需求是对食物、水、住所、衣服、休息、锻炼和性的生理需求。接下来高一层次的是对安全感的需求。这两个层次的需求必然是与人类最起码的生存需求充分满足相关联的。如果最低层次的需求都没有得到满足,一般会影响到更高层次需求的满足。事实上这种影响可能会大到使得更高层次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处于无意识的状态”。<sup>40</sup>因此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写道:“毋庸置疑,这些生理需要是所有需要中最具优势的”。<sup>41</sup>如果这些需求没有得到满足,“那么其他有意识的需求层次将变得不复存在”。<sup>42</sup>

第三层次的需求是由马斯洛所谓的“归属感和爱的需要”组成的。这些需要包括对热情、友情和爱情的需要。这些需求的满足要求我们出于自己的本性而被爱,确切地说,是作为一个结果而不是作为一种方式,或者是作为一种商品。这些情况在资本主义中经常出现(在麦肯齐和图洛克的著作中,人类价值被庸俗化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深入的商品关系与这些需要的满足具有反作用力。这样我们很少可以使这些需求得到完全的甚至充分的实现。而且,根据马斯洛的理论:“阻碍社会中这些需求满足的是普遍存在的失调和更加严重的精神病理学情况。”<sup>43</sup>

第四个层次是由被他人赏识、欣赏和尊重的需求组成的。它们不仅仅是对名利和地位的需求,而且是基于个人发展自我特性的重要性。凡勃伦将这种特征与作业相联系。这种需求现在表现为渴望“控制、胜利、自信地面对这个世界、独立和自由”。<sup>44</sup>只有当这些特征获得发展时,来自他人的尊重与自我尊重才相一致。这是基于“从他人获得应有的尊重而不是外在的名利或名声和无根据的奉承”。<sup>45</sup>就像我们在有关马克思和凡勃伦的章节中所见到的,类似的观点也同样出现在本章所讨论的布雷弗曼的著作中,即资本主义历史

是以逐渐减少我们社会中大部分人获得他人尊重和自我尊重的可能性为特征的。

第五个也是最高层次的需求是对阅历的渴求,对唯美的欣赏和对知识本身的追求。这一切需求并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本身。这些需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几乎总是得不到满足。

本书所包含的伦理学观点是关于人类或人类福利能更好的构成我们社会结构的信条。这样,每个人都被其他人视为是他或她自己的另一投影,而不是简单的视为是一种手段或是一件商品。把每个人都视为终极目标仅仅意味着这是一种普遍的需求,即每个人都获得了最大化的自我满足,或者每个人都将她或他在生理上、情感上、智力上、创造力和道德上的潜能发挥至最大可能的限度。这种发展只能通过特殊社会环境中与其他社会成员的相互交流才能获得。事实上,它只能通过社会的一般性功能促进自我关注和社会关注,并使得这两种关注在一个适当的社会环境中相互统一才能实现。对个人追求的任何有益促进,只有通过把个人追求的满足与参与社会的集体性重构相结合,才能使得社会与个人的所有人类需求满足最终可能实现。

当然,整本书都潜在地证明了——非价值取向的社会科学是不可能存在的——即使存在,也无意义可言。我们是人,并且我们当中没有人能够是一般社会中其他人客观的、超然的、漠不关心的观察者。我们不可能要求写出这些观点的作者也能够做到当一个公正无私的观众。所以说,已经占据了主流地位的任何一种类似的宣称要么是一种自欺欺人,要么是欺骗别人。我们能够询问一个作者最多的也只能是他或她在学术上诚实与否。

就本书中所引用并评述的诸位思想家的著作,笔者已经把我所认为最重要的部分同读者进行了诚实的交流。但笔者不可能试着去扮演一个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公正无私的观众角色,而是有偏好的,甚至可能带有成见的。为了便于读者独立判断,我想清楚地阐明我对资本主义本质的看法。它来自于在美国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期间所得到的整个人生经历、经验观察、反省、阅读、讨论、思想乃至情感。

第一,资本主义是一个建立在矛盾和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制度。

第二,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是资本主义中所有社会关系的基础。这就意味着,大多数人只能满足于最基本的或是最低层次的一般人类需求,我们创造性的潜在生产力必然被归纳成在市场中出售的一种商品或劳动力。

第三,因为延续生命的活动一般需要出售劳动力使之成为一种商品,所以在我们把别人看成是一种商品的同时,我们也被别人看作是一种商品,也就是说,我们自身仅仅只是存在的方式而不是结果。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化的压力几乎完全是人类诸关系中的商品关系的一般应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人类的基本人性反抗着这种非人性(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像麦肯齐、图洛克这样的功利主义经济学家的著作也被归结到庸俗一类。他们的一些观点不幸而言中,即商品导向的社会化盛行,已成为不争的现实。

第四,市场的混乱和成千上万的失业人员的存在给我们带来不安全感,并因此影响了

我们中很多人更高层次的一般人类需求的实现。

第五,把人类关系归结为商品关系将长期阻碍我们对真正的人类热情、友情和爱情的需求。事实上,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品质是阻止我们最终沦为商品的人性力量。

第六,把创造性生产的过程简化成一系列严格约束的、不自由的、单调的、重复的努力剥夺了我们大多数人在此过程中对创造性能力和控制能力,以及自尊和社会尊重需求的满足。

第七,这种夹杂着社会破裂和情感破碎的异化在我们中间产生了焦急、恐惧和不信任的情绪,同时也产生了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这些歧视被用在少数民族和妇女进行系统的剥削上。它还产生了为经济帝国主义辩护或使之合理化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等观点。这些主义沉重地压迫着成千上万的第三世界的人民,进而为我们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制造障碍。

第八,人们相互疏远和看问题片面的弱点也为企业的广告部门经理们所利用,导致了凡勃伦所谓的“攀比性消费”。我们为了消费更多的商品反而使自己陷于孤独、恐惧、焦虑和空虚之中。这导致我们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于未能消费足够多的商品和增加工资,而不是归咎于无止境的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

第九,生产过程中追逐利润的动机驱使我们不再将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投入到诸如公园、游乐场、儿童医疗中心和公共交通系统等几乎无利可图的纯公共工程的建造和维护中去。

第十,由于出卖劳动力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绝大多数人可以维持体面生活的惟一方式,所以我们的制度迫使那些不能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人,比如未成年人、老人、残疾人和必须照顾年幼子女的单身父母,陷入到极度贫困中去。

第十一,资本主义体系要求我们把教育和其他文化机构从人类用以培养美德和不受外界干扰的独立思想能力的圣地转变为传播理念、技艺和所谓主流思想以维持和延续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工具。

第十二,由于一味追求利润,众多企业污染了我们的水、空气乃至整个生态环境,损害我们的健康,使我们的家园不再可爱,以至于不再适宜居住。

功利主义经济学教导我们:不论我们的实际感受如何,资本主义永远是理性的、有效率的、公平的制度。并且,它将永远是最符合每个人利益的制度。它迫使我们所有人在利己心的驱动下尽量充分利用自己的各种资源、能力和社会关系去追求个人财富积累,如果这些财富没有被少数永不满足的富人们所控制的话。

在本书的写作中,笔者尝试如实地去描述我所理解的不同经济学家的各种重要思想,但并非持中立或无偏见的态度。笔者不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理性的极致,我相信,它曾为人类征服自然提供过最重要和最先进的武器。但资本主义过去的进步性和合理性,现在已被反动和荒谬所替代,这个制度现在彻底沦为阻挠人类全面发展的障碍。正因为

如此,这一制度只能是无效率的和不合理的。

笔者相信,正如凡勃伦与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绝非人类发展的最高阶段。只要人类坚持用共有的人性去克服资本主义的非理性,我们将开创一个在资本主义时代不可想象的新世界。

#### 注 释

1. 例如,保罗·巴兰,作为哈佛大学极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被迫用笔名写了大量的文章。这个时期的期刊和季刊目录上经常出现大量用假名撰写的文章。

2. Alfredo Medio, "Profits and Surplus-Value: Appearance and Reality in Capitalist Production," in *A Critique of Economic Theory*, ed. E. K. Hunt and Jesse G. Schwartz (Baltimore: Penguin, 1972), pp. 312~46.

3. 同上,第326页。

4. 同上,第325~326页。

5. 同上,第326页。

6. A. Shaikh, "Marx's Theory of Valu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 in *The Subtle Anatomy of Capitalism*, ed. J. Schwartz (Santa Monica: Goodyear, 1977); and A. Shaikh,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Marx to Sraffa," in *Ricardo, Marx, Sraffa*, ed. E. Mandel (London: Verso, 1984).

7. A. Lipietz, "The So-called 'Transformation Problem' Revisited,"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26, no. 1 (1982); G. Duménil, *De la valeur aux prix de production* (Paris: Economics, 1980); D. Foley, "The Value of Money, the Value of Labor Power and the Marxian Transformation Problem,"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4, no. 2 (Summer 1982): 37~49.

8. G. Duménil, "Beyond the Transformation Riddle: A Labor Theory of Value," *Science and Society* 47, no. 4 (Winter 1983): 442.

9. Bob Rowthorn, "Skilled Labour in the Marxist System," *Bulletin of the Conference of Socialist Economists* (Spring 1974): 25~45.

10. Harry Braverman,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其书中提出了一些关于奖学金的例子,可以参见下书中的文章: Samuel Bowles and Richard Edwards, eds.,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Hants, UK: Edwards Elgar, 1990)。

11. 同上,第315~316页。

12. 同上,第139页。

13. 引自 Bruce Brown, *Marx, Freud, and th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3), p. 56.

14. Eli Zaretsky, "Capitalism, the Family and Personal Life," *Socialist Revolution* 3, no. 3 (January-April 1973): 69-125.

15. Miriam Wasserman, Comp., *Demystifying School* (New York: Praeger, 1974).

16. Samuel Bowles and Herbert Gintis,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17. James Aronson, *The Press and the Cold War* (Indianapolis, IN: Bobbs-Merrill, 1970).

18. Robert Cirfno, *Don't Blame the People* (New York: Vintage, 1971).

19. Edward S. Herman and Noam Chomasky,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8).

20. G. William Domhoff, *Who Rules America?*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7), and Howard L. Reiter, *Parties and Elections in Corporate Americ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7).

21. Braverman,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p. 125.

22. Paul A. Baran and Paul M.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6), p. 9.

23. 同上,第9~10页。

24. 同上,第9~10页。

25. 同上,第115~116页。

26. 同上,第115页。

27. 同上,第119页。

28. 同上,第126页。

29. 同上,第155页。

30. 同上,第161页。

31. 同上,第341页。

32. Harry Magdoff, *The Age of Imperialism: The Economics of U. 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9).

33. 同上,第99~100页。

34. 同上,第57页。

35. 同上,第203~206页。

36. 同上,第200~201页。

37. Edward S. Herman, *The Real Terror Network: Terrorism in Fact and Propaganda*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2).

38. Karen Horney, *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 (New York: Norton, 1937), p. 92.

39. 我根据马斯洛的理论进行讨论并对普遍人类需求做出划分, A. H. Maslow,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1954)。但是,在满足人类需求的最终手段这一问题上,我不赞同马斯洛的观点。

40. 同上,第101页。

41. 同上,第82页。

42. 同上,第82页。

43. 同上,第89页。

44. 同上,第90页。

45. 同上,第91页。

## 阅读推荐

此清单是作为本书内容的补充。书中讨论的经济学家的主要著作已经列在各章的注释中。该书单仅仅是书中内容的补充资料。它不是一个综合性的书目,而仅仅是一些建议而已,我认为这些材料有助于对本书的学习和理解。

### 第 1 章

Dobb, Maurice.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3.

Edwards, Richard C.; Michael Reich; and Thomas E. Weisskopf, eds. *The Capitalist System*. 2d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8.

### 第 2 章

Letwin, William. *The Origins of Scientific Economics*. London: Methuen, 1963.

Meek, Ronald L. *Studies in 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 2d e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6, ch. 1.

### 第 3 章

Dobb, Maurice. *Theories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 since Adam Smith*.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ch. 2.

Macfie, A. L. "The Scottish Tradition in Economic Thought."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June 1955): 81-103.

Meek, Ronald L. *Studies in 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 ch. 2.

Rogin, Leo. *The Meaning and Validity of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58, ch. 3.

Samuels, Warren J. "Adam Smith and the Economy as a System of Power."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31(October 1973):123—37.

#### 第 4 章

Blaug, Mark.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3re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ch. 3.

Rogin, Leo. *The Meaning and Validity of Economic Theory*, ch. 5.

#### 第 5 章

Blaug, Mark. *Ricardian Economic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8.

Dobb, Maurice. *Theories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 since Adam Smith*, chs. 3 and 4.

#### 第 6 章

Bowley, Marian. *Nassau Senior and Classical Economic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37.

Halevy, Elie. *The Growth of Philosophical Radicalism*. Boston: Beacon Press, 1955.

Hutchison, T. W. "Bentham as an Economist." *Economic Journal* 66(June 1956):288—306.

Schumpeter, Joseph.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 615—25.

#### 第 7 章

Blaug, Mark. *Ricardian Economics*, pp. 140—150.

Halevy, Elie. *Thomas Hodgskin*, London: Ernest Berm, 1956.

Hunt, E. K. "Value Theory in the Writings of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Thomas Hodgskin and Karl Marx."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9(Fall 1977):322—45.

Pankhurst, R. K. P. *William Thompson*. London: Watts, 1954.

#### 第 8 章

Blaug, Mark.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ch. 6.

Mitchell, Wesley C. *Types of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7, ch. 5.

Rogin, Leo. *The Meaning and Validity of Economic Theory*, ch. 8.

## 第9章

- Catephores, George. *An Introduction to Marxian Economic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9.
- Dobb, Maurice. *Theories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 since Adam Smith*, ch. 6.
- Hunt, E. K. "Philosophy and Economics in the Writings of Karl Marx." In *Marx, Schumpeter and Keynes, A Centenary Celebration of Dissent*, ed. S. W. Helburn and D. F. Bramhall.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6.
- Hunt, E. K. "Joan Robinson and 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7(1983).
- Hunt, E. K., and Jesse Schwartz, eds. *A Critique of Economic Theory*. Baltimore: Penguin, 1972, ch. 13.
- Meek, Ronald L. *Studies in 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 chs. 4 and 5.
- Meek, Ronald L. "Some Notes on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 *Economic Journal* 66 (March 1956): 94-107.
- Schwartz, Jesse, ed.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56.

## 第10章

- Dobb, Maurice. *Theories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 since Adam Smith*, ch 7.
- Rogin, Leo. *The Meaning and Validity of Economic Theory*, chs. 10-12.
- Spengler, Joseph J., and William R. Allen. *Essays in Economic Thought*. Chicago: Rand McNally, 1960, pt. 6.

## 第11章

- Blaug, Mark.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chs. 911.
- Rogin, Leo. *The Meaning and Validity of Economic Theory*, ch. 13.
- Stigler, Georg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Theories*. New York: Macmillan, 1941.

## 第12章

- Dorfman, Joseph. *The Economic Mind in American Civilization*, vol. 3.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49, ch. 19.
- Dowd, Douglas, ed. *Thorstein Veblen: A Critical Reappraisal*.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8.



### 第 13 章

- Fieldhouse, D. K.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Imperialism*. London: Longmans, 1967.  
 Kemp, Tom.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London: Dobson, 1967.

### 第 14 章

- Carter, Michael. "To Abstain or Not to Abstain (Is That the Question?)." In *The Subtle Anatomy of Capitalism*, ed. Schwartz, pp. 36—50.  
 E. K. Hunt, "A Radical Critique of Welfare Economics." In *Growth, Profits & Property*, ed. E. J. Nel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Nath, S. K. *A Reappraisal of Welfare Economics*.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9.

### 第 15 章

- Blaug, Mark.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ch. 15.  
 Minsky, Hyman P. *John Maynard Keyn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Rosen, Sumner. "Keynes Without Gadflies." In *A Critique of Economic Theory*, ed. Hunt and Schwartz, pp. 397—419.  
 Shaw, G. K., ed. *The Keynesian Heritage*. Vols. 1 and 2. Hants, UK: Edward Elgar, 1988.

### 第 16 章

- Harcourt, G. C. *Some Cambridge Controversies in the Theory of Capital*.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Hunt, E. K. and Jesse Schwartz, eds. *A Critique of Economic Theory*, pts. 3 and 4.

### 第 17 章

- Samuels, Warren J., e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Vols. 1, 2, and 3. Hants, UK: Edward Elgar, 1988.  
 Sawyer, Malcolm C., ed.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Hants, UK: Edward Elgar, 1988.

### 第 18 章

- Ricketts, Martin, ed. *Neoclassical Microeconomics*. Vols. 1 and 2. Hants, UK: Edward Elgar, 1988.

Littlechild, Stephen, ed. *Austrian Economics*. Vols. 1, 2, and 3. Hants, UK: Edward Elgar, 1990.

### 第 19 章

Bowles, Samuel, and Richard Edwards, eds.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Vols. 1 and 2. Hants, UK: Edward Elgar, 1990.

King, J. E. , ed. *Marxian Economics*. Vols. 1, 2, and 3. Hants, UK: Edward Elgar, 1990.

## 术语对照表

### A

Absentee ownership	不在所有权
Abstinence	节欲
Abstract labor	抽象劳动
<i>Accumulation of capital</i>	资本积累
<i>Accumulation of capital, The</i> (Luxemburg)	《资本积累》(卢森堡)
<i>Accumulation of capital—An Anti-Critique</i> (Luxemburg)	《资本积累——反批判》(卢森堡)
<i>Age of Imperialism, The</i> (Magdoff)	《帝国主义时代》(马格多夫)
Agriculture	农业
Agribusiness	农业综合企业
Alienation	异化
Antitrust	反托拉斯的
Austrian school	奥地利学派
Average fixed cost	平均固定成本
Average product of labor	平均劳动产品
Average variable cost	平均可变成本

### B

Banks, and imperialism	银行和帝国主义
Beatific vision	极乐世界
Bolshevik Revolution	布尔什维克革命
<i>Britannia Language</i> (Petty)	《大不列颠的语言》(配第)
Bullionism	重金主义
Business firm	商业企业

## C

Capital	资本
<i>Capital</i> (Marx)	《资本论》(马克思)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i>Capitalism and freedom</i> (Friedman)	《资本主义和自由》(弗里德曼)
Capitalist imperialism.	资本帝国主义
Capitalists	资本家
Catholic church	天主教堂
Centralized private sector planning	私人计划的集中
Ceremonial values	仪式价值观
Ceremonialism	恪守礼仪
Chicago school	芝加哥学派
Child labor	童工
Circular flow	循环流动
Class	阶级
Class conflict	阶级矛盾
Classical economic theory	古典经济理论
Classical liberalism	古典自由主义
Clothing styles	服装样式
Cold war	冷战
Collectivization	集体化
Combination Act(1799)	结社法(1799)
Combinations, worker	工人,联合
Commodities	商品
Commodity-producing society	商品生产社会
Competition	竞争
Constant returns to sale	销售的固定回报
Consumerism	消费主义
Consumer's surplus	消费者剩余
Consumption, emulative	炫耀性消费
Consumption function	消费函数
Cooperatives	合作社
Corn law	谷物法

" <i>Corn Theory of Profit</i> "(Ricardo)	《谷物利润理论》(李嘉图)
corporations	企业
Cost-benefit analysis	成本—收益分析
Cost curves	成本曲线
Cost-of-production value theory	生产成本价值理论
Craft guilds	手工业行会
Crier theory(Walras)	叫卖者理论(瓦尔拉)
Crusades	十字军
Cultural discipline	文化训练

## D

Debt economy	债务经济
<i>Demystifying School</i> (Wassermann)	《教育解惑》(瓦尔塞曼)
Depressions	萧条
Development economics	发展经济学
<i>Discourse on trade</i> (Barbon)	《论贸易》(巴邦)
<i>Distribution of wealth</i> (Clark)	《财富的分配》(克拉克)
Distribution theory	分配理论
Domestic industry	国内产业
<i>Don't Blame the People</i> (Cirino)	《不要谴责人类》(奇里诺)

## E

Economic concentration, Marx on	马克思论经济的集中
<i>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i> (Lewis)	《劳动力无限供给时的经济发展》(刘易斯)
Economic equilibrium	经济均衡
<i>Economic Harmonies</i> (Bastiat)	《经济和谐》(巴斯夏)
Economic welfare	经济福利
<i>Economics</i> (Samuelson)	《经济学》(萨缪尔森)
<i>Elements of Pure Economics</i> (Walras)	《纯粹经济学纲要》(瓦尔拉)
Employment Act(1946)	劳工法(1946)
Emulative consumption	炫耀性消费
Enclosure movement	圈地运动
English Navigation Act(1651 and 1600)	英国航海法(1651年和1600年)

Entrepreneurs	企业家
Equilibrium theory	均衡理论
<i>Esquisse d'un tableau historique des progrès de l'esprit humain</i> (Condorcet)	《论人类精神进化的过程》(康多塞)
<i>Essay on Naval Discipline</i> , An(Hodgskin)	《论海军纪律》(霍奇斯金)
<i>Essay on the influence of a low prices corn</i> , An(Ricardo)	《论低价谷物对资本利润的影响》(李嘉图)
<i>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i> (Malthus)	《人口原理》(马尔萨斯)
Eternal felicity	永恒幸福
External economies	外部经济
Externalities	外部性

## F

<i>Fables of the Bees</i> , The(Mandeville)	《蜜蜂的寓言》(孟德维尔)
Feudalism	封建主义
Firms, business	厂商,商业
Flow	流动
Foreign imperialist expansion	帝国主义的向外扩张
Foreign trade	对外贸易
<i>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i> The (Samuelson)	《经济分析基础》(萨缪尔森)
<i>Function and Problems of Economic Theory</i> , The(Ayres)	《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和问题》(艾尔斯)

## G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一般均衡理论
<i>General History of trade</i> , A(Defoe)	《贸易通史》(笛福)
<i>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i> (Keynes)	《就业、利率和货币通论》(凯恩斯)
Gluts	过剩
<i>Grundrisse</i> (Marx)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
Guilds	行会

## H

Harrod-Domar growth formula	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
Hedonism	享乐主义
<i>Holier Than Thou</i> (Ayres)	《更为神圣者》(艾尔斯)
Human needs	人类需求
Hunting stage	狩猎阶段

## I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
<i>Imperialism: A study</i> (Hobson)	《帝国主义研究》(霍布森)
<i>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i> (Lenin)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
Income distribution	收入分配
<i>Income Distribution Theory</i> (Bronfenbrenner)	《收入分配理论》(布朗芬布伦纳)
Indifference curves	无差异曲线
<i>Individual economies</i> (Menger)	《个体经济》(门格尔)
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
Industrial capital	工业资本
Industrialization	工业化
Inflation	通货膨胀
<i>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Rent, An</i> (Malthus)	《地租的性质及原因》(马尔萨斯)
<i>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Distribution Wealth, An</i> (Thompson)	《财富分配原理》(汤普森)
Institutionalist economics	制度经济学
Internal economies	内部经济
International cartels	国际卡特尔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国际经济学
International prices	国际价格
International trade	国际贸易
Interstate Commerce Act (1887)	州际商业法(1887)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An (Bentham) 《道德和立法原理导论》(边沁)

*Introductory Lecture on Political Economy* (Senior) 《政治经济学绪论》(西尼尔)

*Investment, Interest and Capital* (Hirshleifer) 《投资利息和资本》(赫什利弗)

Invisible foot 看不见的脚  
 Invisible hand 看不见的手  
 iron industry, Industrial revolution 钢铁工业, 工业革命  
 isoquants 等产量线

## L

Labor, division of 劳动分工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Braverman) 《劳动和垄断资本》(布雷弗曼)  
 Labor power 劳动力  
 Labor theory of value 劳动价值论  
 Labor unions 工会  
 Labor uprisings 工人起义  
 Laborers 劳动者  
*Labour Defended against the Claims of Capital* (Hodgskin) 《捍卫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霍奇斯金)  
*Labour Defended* (Hodgskin) 《捍卫劳动》(霍奇斯金)  
*Labour Rewarded* (Thompson) 《劳动报酬》(汤普森)  
 Laissez-faire doctrine 自由放任学说  
 Law of the increasing misery 日益贫困化规律  
 Law of variable proportions 可变比例法则  
 Leisure class 有闲阶级  
*Leviathan* (Hobbes) 《利维坦》(霍布斯)  
 Living standards 生活标准  
 Luddite revolts 路德反抗

## M

Machinery 机器  
 Macroeconomic theory 宏观经济理论



Malthus, Thomas Robert	马尔萨斯, 托马斯·罗伯特
Mananagerial class	管理阶层
Manorial system	庄园制
Manufacturing	制造业
<i>Manufacturing Consent</i> (Herman and Chomsky)	《制造同意》(赫尔曼和乔姆斯基)
Marginal product of labor	边际劳动产品
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 of distribution	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
Marginal utility	边际效用
Marginalism	边际主义
Market economy	市场经济
Market period	市场周期
Market perspective	市场观点
<i>Marx, Freud, and th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i> (Brown)	《马克思、弗洛伊德与日常生活批判》(布朗)
Mccarthyism	麦卡锡主义
Mercantilism	重商主义
Merchant capital	商业资本
Merchant-capitalists	商业资本家
Microeconomic theory	微观经济理论
<i>Microeconomic Theory</i> (Ferguson)	《微观经济理论》(弗格森)
Militarism	军国主义
Minorities, exploitation of	对少数民族的剥削
Modes of production	生产方式
Monetary flow	货币流通
Monopoly	垄断
<i>Monopoly capital</i> (Baran and Sweezy)	《垄断资本》(巴兰和斯威齐)
Mores, social	社会习俗

## N

<i>National Economies</i> (Menger)	《国民经济学原理》(门格尔)
<i>Natural and Artificial Rights of Property Contrasted, the</i> (Hodgskin)	《自然的和人为的财产权之对照》(霍奇斯金)
Neoclassical economic theory	新古典经济理论

Net produce	净产出
Neurotic anxiety	神经质焦虑
<i>New Order</i> (Veblen)	《新秩序》(凡勃伦)

## O

Oligopoly	寡头垄断
<i>Outline of the Sci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i> (Senior)	《政治经济学大纲》(西尼尔)

## P

“Parable and Realism in Capital Theory” (Samuelson)	《资本理论中的寓言和现实主义》(萨缪尔森)
Pareto optimality	帕累托最优
Partial equilibrium theory	局部均衡理论
<i>Parties and Elections in Corporate America</i> (Reiter)	《公司化美国的政党和选举》(赖特)
Pasturage stage	游牧时期
Peterloo Massacre	彼得卢大屠杀
Physiocrats	重农学派
Pig Principle	贪婪原理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Poor” (Senior)	《穷人政治经济学》(西尼尔)
<i>Popular Political Economy</i> (Hodgskin)	《通俗政治经济学》(霍奇斯金)
Population theory	人口理论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后凯恩斯经济学
Poverty	贫困
Predatory instinct	掠夺的本能
<i>Press and the Cold War, The</i> (Aronson)	《压力和冷战》(阿伦森)
Prices determination, numerical example	价格的决定的数字示例
Prices elasticity of demand	需求的价格弹性
<i>Prices flexibility and employment</i> (Lange)	《价格弹性和就业》(兰格)
Primitive accumulation	原始积累
<i>Principles of economics</i> (Marshall)	《经济学原理》(马歇尔)
<i>Principles of economics</i> (Menger)	《国民经济学原理》(门格尔)

<i>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i> (Ricardo)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李嘉图)
<i>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i> (Malthus)	《政治经济学原理》(马尔萨斯)
<i>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i> (Mill)	《政治经济学原理》(穆勒)
Private ownership	私有制
<i>Problems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i> (Menger)	《经济和社会问题》(门格尔)
Producer-capitalists	生产者—资本家
Producers, social relationship among	生产者之间的社会联系
Producer's surplus	生产者剩余
Production	生产
<i>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i> (Sraffa)	《用商品生产商品》(斯拉法)
Production perspective	生产观点
Production-possibility frontier	生产可能性边界
Profit maximization	利润最大化
"Profits and Surplus Value"(Medio)	《利润和剩余价值》(梅迪奥)
Property	产权
Protestantism	新教
Public goods	公共物品
Putting-out system	外包制

## Q

Quasi-rents	准租
-------------	----

## R

Real flow	实物流
<i>Real Terror Network, Terrorism in Fact and Propaganda</i> (Herman)	《实际生活中的恐怖组织、恐怖主义和宣传》(赫尔曼)
Recessions	衰退
Rentier class	食利阶层
Rentier states	食利国
Reswitching	再转换
Rogue states	流氓国家

## S

Say's law	萨伊定律
<i>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i> (Gintis and Bowles)	《资本主义美国的教育》(金蒂斯和鲍尔斯)
Self-adjusting market	自我调整的市场
Serfs	农奴
Sherman Antitrust Act(1890)	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890)
"Skilled Labour in the Marxist System" (Rowthorn)	《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熟练劳动》(罗索思)
Social control	社会控制
Social Darwinism	社会达尔文主义
Social harmony	社会和谐
Social mores	社会习俗
Social relations	社会关系
Social surplus	社会剩余
Socialism	社会主义
<i>Some Thoughts on the Interest of Money in General</i>	《关于货币利息一般问题的几点意见》
Specialization	专业化
Speenhamland system	斯宾汉姆兰德体系
Sphere of circulation	流通领域
Sphere of production	生产领域
<i>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The</i> (Rostow)	《经济增长的阶段》(罗斯托)
Statute of Artificers(1563)	手工法令(1563)
Statute of Monopolies(1624)	垄断法(1642)
Steam engine	蒸汽机
Substitutability, theory of	可替代性理论
Supply curve	供给曲线
Surplus labor	剩余劳动力
Surplus value	剩余价值

## T

Tableau economique(Quesnay)	《经济表》(魁奈)
-----------------------------	-----------

Taylorism	泰勒制
Terrorist networks	恐怖主义组织
<i>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i> (Lewis)	《经济增长理论》(刘易斯)
<i>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i> , the (Jevons)	《政治经济学理论》(杰文斯)
<i>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i> (Veblen)	《有闲阶级论》(凡勃伦)
<i>Theory of the Moral Sentiments</i> , The (Smith)	《道德情操论》(斯密)
<i>Three Lectures on the Rate of Wages</i> (Senior)	《工资率三讲》(西尼尔)
<i>Travels in the North of Germany</i> (Hodgskin)	《北德之行》(霍奇斯金)
<i>Treatise on Political Economy</i> (Say)	《政治经济学问答》(萨伊)
<i>Two Lectures on Population</i> (Senior)	《人口论二讲》(西尼尔)

## U

Unemployment	失业
Urban growth	城市发展
Use value	使用价值
Useful labor	有用劳动
Utilitarianism	功利主义
<i>Utilitarianism</i> (Mill)	《功利主义》(穆勒)
Utility	效用
Utility maximization	效用最大化
Utility-possibility frontier	效用可能性边界
Utility theory of value	效用价值论

## W

Wages fund doctrine	工资基金说
Walras' law	瓦尔拉定律
<i>Wealth of nations</i> , the (Smith)	《国富论》(斯密)
Welfare economics	福利经济学
<i>What is Property?</i> (Proudhon)	《什么是财产》(蒲鲁东)
<i>Who Rules America?</i> (Domhoff)	《谁在统治美国》(多姆霍夫)
Women, exploitation and oppression of	对妇女的剥削与压迫

Worker combinations	工人联合
Workers, overpopulation of	工人过剩
Working class	工人阶级
Working day	工作日
Workmanship	作业